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八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八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PDG

目　　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 …………… 向忠发（1）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 ……………………………（13）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 ……………………（22）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
决议案 …………………………………………………（25）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 ……………………（29）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 ……………………（32）
——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中共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的决议 ……………………（43）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中共中央关于鄂豫边特委工作的决议 ………………（47）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军行动方针
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 …………………………………（53）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 ……………………（56）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 (68)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等的信 ……… (87)
——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 毛泽东 (90)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的训令 ………………… (93)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 陈绍禹 (101)
（一九三一年二月）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
前委等的指示信 …………………………………… (252)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 ……………… (259)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 …………………… (261)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互济会工作的决议 ……………………… (265)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中央通知第二一〇号 ………………………………… (268)
——反帝大同盟的策略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党的工作的决议案 ………………… (270)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 …………………………… (275)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毛泽东（290）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中共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 ……………………（296）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
中共中央给共青团四中全会的信
——青年团的三个中心任务 ……………………………（301）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
红一方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
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 ……………………………………（305）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敌我形势和争取
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 ……………………………（311）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317）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322）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中共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 ……………………………（324）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
中共中央对于鄂东鄂南两特委及红十六军
工作的决议 ………………………………………………（328）
（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 ………………（334）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红七军工作报告 …………………………………… 邓小平（343）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接受
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365）
（一九三一年四月）

中央巡视条例 …………………………………………………… (374)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通过）
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 …………………………………… (380)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通过）
红一方面军关于动员部队帮助群众
插秧耕田的训令 ………………………………………… (386)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 (388)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 ………………………… (399)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 ………… (406)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 ……………………………… (414)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
中央通知第二二三号 ……………………………………… (418)
——永远开除叛徒顾顺章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
和一切叛徒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 (420)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报告 ……………………………………………………… (425)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 ……………… (435)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宣言 …………………………………… (439)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
决议 …………………………………………… (442)
(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央通知第二二八号 …………………………… (451)
——党的机关组织与工作方式的转变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
中共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 ……… (454)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毛泽东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 ………………… (468)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
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 ………………… 刘少奇 (470)
(一九三一年夏)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训令第一号 …………………………………… (483)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特别紧急通知
——动员准备三次战争的问题…………………… (485)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 朱 德 (488)
(一九三一年七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灾荒、秋收斗争
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 ………………………… (494)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

红一方面军关于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
命令 ………………………………………………………… (497)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
红一方面军关于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 ………………… (499)
（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给各省委的指示信 …………… (501)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给四川省委的信 ……………… (504)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为扩大灾民斗争给各级党部的
指示信 ……………………………………………………… (508)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
徐向前、曾中生等关于鄂豫皖苏区红四军情况
给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 (512)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 (524)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 ………………………… (531)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分局的信 …………………………… (539)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江苏省委工作的决议 …………………… (542)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
事件宣言 ………………………………………………… (547)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
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 (551)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
决议 …………………………………………………… (563)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刘少奇关于工运的意见给中共中央的信 ………………… (570)
(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 (574)
——关于动员和组织拥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运动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 ………………………………… (578)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给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 ……………………… (581)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
国民党的统治？ ……………………………… 张闻天 (588)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及目前苏区
中心任务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 (606)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发展苏区等问题
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 (608)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 (610)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
建设问题决议案 ……………………………………… (625)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 (641)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 (647)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649)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 ……………… (654)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 …………………………………… (657)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 ………… (66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 ……………………… (67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给湘赣省委的信 …………………………… (68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及其强盗集团——国际联盟告全国革命民众书 …………………………………… (691)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的通令 ……………… (694)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 (696)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 (703)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 ………………… (716)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 (720)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 ……………………………… (724)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
（第一号） ……………………………………………… (727)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 ……………………………… (730)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 (735)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建立辅助组织问题 ………………………………… 刘少奇 (738)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
与缺点的决议 …………………………………………… (743)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
中共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
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 …………………………………… (747)
——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
行动方向与编制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 …………………………… (754)
——关于敌人加紧“围剿”鄂豫皖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 ………………… 张闻天 (759)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刘伯坚给季振同、赵博生等的信 ……………………… (763)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 (765)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 ……………… (767)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
工作的决议 ……………………………………………… (774)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六路军革命士兵委员会敬告全国士兵兄弟书 ……… (782)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 ………… (789)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 (794)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向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向　忠　发

中央政治局要我来向扩大的四中全会，做一个扼要的关于党内问题的报告。我分下列几段来说：

第一，共产国际的路线如何来指导中国党呢？

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上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份"。因此，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

第二，然而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

什么呢？

六次大会后，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涨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的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委，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一地说，已由四千多退到一千人左右。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即最近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后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南通淮盐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

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等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破坏党的活动；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必要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损害革

命，帮助敌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掩盖着富农路线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 AB 团、鄂西北极会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大大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

第三，那末，立三路线是怎样形成？他的理论系统是什么呢？

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

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茨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克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主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第四，结果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

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六月十一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现在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

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

第五，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

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1]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全会政治

决议案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第六，此外还有对于国际代表的不尊重。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三中全会时，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是："虽然从二中全会之后，政治局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然而从六月以来，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之下，接受了错误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而走上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这种意见，国际代表屡次的提出，然而政治局终是反对，因此没有加入三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这种争论问题又没有清楚报告，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第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

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明显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

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第八，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的转变。

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案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

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

现在党内的情形，因为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的开展，党是有了新的气象。自然，一切工作在实际中的转变还执行得很少，这是需要党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才能推动党更向前进。

第九，目前时局更加重了我们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

尤其因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处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机：在世界上在中国，阶级斗争都是日益深刻。全世界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与他们指使中国国民党军阀加紧进攻中国红军苏维埃区域，已成为反动统治不可分离的中心任务。现在国民党军阀调动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统治的阶级力量，从各方面向革命进攻，再加上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和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都一齐向红军苏维埃区域进攻——这就成为对于革命的主要危险。尤其因为革命战争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受到部分的失败，便更加深了这一主要危险。但如果因此便说立三路线已断送了中国革命，则这一右倾估量必然要走到取消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去。全中国的危机是存在着的，在这基础上的革命高涨还在日益生长，尤其是农民战争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更加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反动统治不能根本消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可是，目前革命势力能否冲破敌人的包围，击退反革命的进攻，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去执行国际的决议。如果全党的布尔塞维克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一致的

实行国际的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一定能领导群众去冲破敌人的“围剿”，走向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十，首先便要解决党内不可迟缓的任务。

为着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中央政治局特向扩大的四中全会提出下列不可迟缓的任务：

第一，要从理论上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这里，必须实际执行国际决议，必须在全部工作中有坚决的转变。不能仅仅限于纯粹在口头上的反立三主义的斗争，要真正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的当前最主要的紧急任务。为着这个，中央政治局提议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方面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并且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

第二，党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实行坚决的转变，这就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这些本是立三路线的实际基础，将要成为反党倾向的表现。

第三，要恢复已经破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这首先就是赤色工会。

第四，在改造各级党部中，应提出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

第五，党要全部的动员，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实行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正在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些，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依照这个方针，要决定一切新的工作计划。

第六，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

第七，政治局已经执行了改变青年团中央成分的建议，并得到青年团中央的同意。为着必要的缘故，扩大的四中全会应批准青年团在最近期间也召集团的四中全会。

第八，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包含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反立三路线便能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所以党要反对“左倾”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尤其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更加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党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去进行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反对由这一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偏向，如极端民主化与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等等，尤其要反对的还是以各种形式来掩藏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错误的企图。同时更要绝对的反对托陈取消派破坏中国党中国革命的阴谋，这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最大的危害。

最后，还要补充两点：

（一）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我个人，更应当负责的。当时，虽是立三同志的提议，但大半是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有许多是我作结论。当时所有的争论，我是站在“左倾”的观点上来批评他，反而帮助了他的路线之形成，这是我应当负责的。

（二）中央犯了错误，不能领导全党，同时我看到各方面的现象：A. 在反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同志们大半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分开，B. 没有了解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党的伟大的进步，C. 反对立三路线要加紧实际工作的联系，不能与实际工作分开。

同志们！这就是政治局的主要建议。我要求扩大会的全体

同志仔细讨论这一报告，揭发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并审查政治局提出的扩大会决议案的草案。

扩大会的同志们，将要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周围，来接受国际的一切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执行彻底的坚决的转变！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

PDG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共产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以及以前的决议，明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以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动员革命势力，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国民党反革命作开展的进攻的任务。然而正在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了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要把立三同志反列宁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施行所产生的一切严重的恶果数个清楚，是不可能的。四中全会现在指出最主要的实际恶果是：党对于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党动员群众的能力是大大的缩小了；一切群众团体的行动是削弱了；我们的职工运动是向后倒退了；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和组织，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远远的后退了；党由于立三的领导，不但不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之下用尽一切方法去巩固党、青年团和群众团体，反而实行在事实上去取消群众团体，取消青年团和涣散党。别方面，立三同志对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的制度，引导了党内生活到完全非常态的地步。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使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行动，别方面使党内右倾分子的行动，

都得以乘机活跃起来。同时，好些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举行了的暴动——不估计环境，没有必须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威信，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国内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任务，却完全被忘记了。党内的领导对于开展非苏区农民运动的日常斗争几乎丝毫都不加以注意，因此对于在非苏区农村中领导、发展和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斗争，使之能达到直接帮助和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程度的任务，也完全被放弃了。最后，从立三同志的立场所发生的极蠢的错误，在苏维埃区域也发生了。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当我们多少巩固的后防都不曾有，任何必须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进行，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群众的帮助的时候，便发出了过早的冒险的固执的指示，去夺取大城市。长沙的失败，也是由于这些错误的缘故。另一方面，在苏区内对于立三同志过去的联合富农的理论没有充分坚决的斗争，对于组织贫农团、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也没有做任何工作。因为地方党部的完全疏忽与由于立三政策的结果，使富农分子得以侵入指导机关，为他自己的利益而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李立三所提议的集体农庄及一切过早的社会主义办法，事实上不能不使富农地位反而更加巩固。禁止贸易自由与土地买卖的指令，使苏维埃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这些错误，使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受到危害，使极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受到危害。李立三的领导，完全忽视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完全忽视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并且发出取消游击战争的指令，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阶段——这样，就使现在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是已经大大削弱的状态。所有这些，亦就是红军现在受着严重失败的大部分的原

因。同时，没有进行广大的帮助苏维埃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对于召集苏大会的准备工作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扩大的四中全会在计算立三路线产生结果的总结的时候，特别要指出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为止，中央虽然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成绩。由于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这种成绩中的一大部分已经消灭了。

二、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的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当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曲解而且实际上拒绝了马克思列宁的武装暴动理论，就在理论上去替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建立基础，并且实际上推动党走上这条道路。在这里有关系的，就是立三说："工人只愿暴动，不愿做罢工斗争"。总合起来，立三路线完全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矛盾，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而到现在党内还没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立三同志依仗了这样绝对错误的路线，实

行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而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的理由，来说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四中全会坚决的斥责一九三〇年六月到八月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以及他对于共产国际敌视的绝对不能容许的态度，并且特别指出：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三、共产国际要求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在实行中去完全消灭他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中国现在的形势，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区域，更加使党必须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坚决的转变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路线上去。从这个观点来估量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现在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只指出了立三同志的个别错误，并且在指出这些错误的时候，也是异常温和的。在决议案中间，甚至连影子都看不出。这里问题是关系到一条绝对错误的路线，原则上和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对于有名的六月十一议决案还给他肯定的估量，而六月十一议决案正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的作用；（三）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也给了肯定的估量，而这期间政治局的工作里，正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占着统治地位；（四）明显的，从这种错误的对于立三路线调和的立场里面就发生好些具体的错误——包含在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及其他议决案的个别条目里面。

三中全会通过的议决案，证明当时党的领导还没有认识立三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唯一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自然，这议决案没有造成必要的前提，使党的整个方针有坚决的转变。这些议决案不能够成为揭发立三同志的“理论”和实行上完全克服这些错误理论的基础。

其余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错误的程度更大，更加混淆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要求的党的路线上的纠正。例如：（一）三中全会的告同志书把政治议决案的措辞更加减轻了，于是使党员们完全不能知道共产国际路线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区别；（二）秋白[1]同志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在《实话》第一期上和三中全会决议共同发表的，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起错误，更说不到提起立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了；（三）中央在三中全会之后的通告里，不但没有去揭破立三同志的路线，反而给以根据去解释立三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和国际决议一致的路线了。三中全会的总的调和路线，引导到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党部的工作里丝毫没有党的政策真正转变的痕迹。在这个时期里边，北方局、南方局、江南省委和其他党的组织，都通过了不正确的决议。

此外，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这种不尊重表现在：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互相预先同意了对于三中全会政治议决案的修改和词句（其中有关于立三路线和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的工作的估量），可是，虽然讲好了，却没有加进政治议决案里去。而且，这又没有预先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以致于共产国际代表不能够及时的对于政治局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倾向加以纠正。四中全会承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造成

纯粹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的可能，以及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的。

四、虽然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工作给了正确的估量，指斥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方面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一决议的第二条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埋没了，他的政治意义大大的损失了。

九十六号的通告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好些错误。这个通告没有宣告立三主义的破产，而说党的危机——党其实正在现在进了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再则，这一通告指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证明对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了解是不正确的。不错，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反立三路线决没有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右倾机会主义可以找到并且已经找到（如郭妙根等）其他的方式去表现他自己。不可忘记对于立三路线之盲动主义作斗争虽是异常重要，但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且必须牢牢记得党只有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对于他们的调和主义作斗争，并且克服他们，才能站在国际路线基础上来实行开展革命的进攻。这些在九十六号通告的措辞中都没有提到。这样，部分的也就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之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些右倾分子正在假的反对立三主义斗争的旗帜之下积极活动，来曲解国际路线，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来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否认右倾危险的存在和模糊反右

倾斗争的必要，企图使有些下级组织用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来反对立三主义。例如：否认党内有转到实际工作上去的必要，要求极端民主化，无除外的撤换整个中央与一切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的武断口号，企图把原则斗争变成派别的和个人的斗争，拒绝自我批评等等。三则，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不错，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立场的动摇，使他不能够领导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可是九十六号通告这样去解释中央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的过程，却是不正确的，更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

五、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为着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起见，对于全党提出下列的最不可延迟的任务：

（一）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去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着重的指出：要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实际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必须党的全部工作有坚决的转变，不能够仅仅限于纯粹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团结起来，来坚决执行党当前最重要紧迫的许多任务。

为着执行这个任务起见，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

（二）党的全部工作里面实行坚决的转变，这个转变之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实行斗争去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的分子。他们造成各种反党的倾向和偏向的基础，并且也是这些倾向的表现。

（三）恢复已经损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工会，特别应当注意工厂中的工作，巩固和加强支部的活动，党必须认真利用合法的可能。同时党必须用尽方法去发展和巩固自己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

（四）引进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

（五）党的全部的各方面的动员，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进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组织工人阶级，农民反对正在准备着的对于苏联进攻——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六）扩大的四中全会委托新的政治局根据这个议决案去规定指令和实际任务给各地党部，以代替三中全会的那些决议。

（七）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

（八）四中全会指出，青年团的三中全会接受了党的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路线，并且反映到他自己的议决案里面去，而青年团的中央局直到最近期间还表现过纠正自己以前的立三路线的不坚决，实质上没有执行少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到实际工作上去。四中全会认为，政治局已经执行的改变青年团中央局的成分是完全对的，青年团中央在改组以后确实已完全站到国际路线上去工作。四中全会同时批准在最近期间召集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

（九）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依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和革新了党的领导，去保证这一路

线的执行。四中全会深信，全党将像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自己的队伍来，和睦的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担负执行他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这就是党的新的成功，这就是中国革命高涨的继续和必然的向上发展中工人群众的新胜利的担保。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

PDG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

全党同志们！

在敌人燃烧我们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烈火中，在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的准备中，党经过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召集扩大的四中全会，整顿了党的斗争行列。

扩大的四中全会一致的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是根本不相容的。在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指斥了三中全会用外交手腕掩护着立三路线的企图。四中全会严格的指斥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的延缓与阻碍党走向健全道路的一切动摇与调和。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已经改造了，新旧干部中最好的成分与许多新的工人同志吸引到党的领导中来。这样，在组织上来创立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保证。四中全会已决定愈快愈好的妥当的准备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扩大的四中全会严厉的反对郭妙根、何孟雄、彭泽湘等同志利用反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在这里，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要我们无时无刻不要忘记右倾危险，不要忘记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要危险的时候，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才能更有效果。

我们反对立三路线，他抛弃我们在苏区中地位的加强，他抛弃苏维埃区域的巩固与扩大。但是我们也用一切力量与取消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叛徒们斗争。我们毫不调和的反对立三路线，他只是空喊，而不真正去准备群众罢工与政治罢工，他放弃领导与发动经济罢工。但是我们也要用一切毅力，与右倾机会主义者郭妙根等同志向党建议取消政治斗争的观点斗争。我们打击了立三路线以及一切调和派，因为他们企图以空谈、消极与冒险来代替暴动的群众准备。但是我们声明，狂喊革命失败、党及革命已经破产、已被取消的人们，是党与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扩大的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但同时要用一切力量反对机会主义者与取消派，他们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企图把党送到右倾的泥坑中去。

全党同志们！

在对于共产国际铁一般的忠实中，密切的坚强的巩固我们的队伍。对于只是口头上反对立三路线，而实际上继续机会主义与消极的人们，不要再容忍下去了。我们要揭露掩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下的努力右倾活动的企图。

不要再损失一分钟的时间了。处在资本进攻烈火中的工人们渴望着我们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渴望着城市的拥护与援助。革命的责任要求全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反对正在准备着的对于苏联的总进攻。

这几个月来的严重错误，已使我们丧失了一些区域与遭受了部分的挫折。我们应该恢复这些区域，并在革命的斗争中夺取新的区域。

吸引大批新的工人到党中来，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吸引数十万新工人加入赤色工会，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把千百万工人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站在一切群众斗争的前面，准备与发动斗争，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的群众，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有这样，这才是对于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现实帮助，这才是以革命政策代替机会主义冒险辞句的政策，这才是使党前进。

反动势力强横的向党进攻，"左"右倾取消派采用分裂的企图与混淆的手段来反对党，来拥护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是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是能够打破这些进攻与勇敢的前进的。中国的革命高潮是必不可免的。如果全党像一个人一样，接受了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口号，并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一口号是：党到群众中去，站在群众前面，向着前进！

要立刻检阅与改善党的一切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肃清一切派别倾向，彻底克服立三路线以及对于他的调和态度！

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

千百万的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去年苏维埃运动飞快的发展，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的统治以直接的威吓。这样，中国又重新证实了马克思所说的“革命促进着反动势力的团结”！谁都知道，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是互相争雄，各派军阀间是互相矛盾。可是，在正在发展着的工农革命前面，一切反动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运动。在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的威逼之下，南京的国民党遂把镇压苏维埃运动认为自己主要的首先的任务。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努力热心动员一切反革命力量，以破坏中国苏维埃运动，原因是很明显的。他们不仅为的要保护其在华的统治地位，保护其对中国群众的剥削，而且这也是他们正在筹划着的武装干涉苏联必要的预备的步骤。

为着保障帝国主义的利益，保障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封建制度和一切特权，南京的国民党就同其他军阀妥协，以便把一切力量用来进攻红军与红色游击队。国民党估计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把二十五师以上的政府军队，五十个以上德国顾问，在中国讲来算是很好的军械（而且有航空队），一齐开往湖南、江西来与红军作战。开始的国民党却得了些实际的胜利，把我们的力量从重要中心区域排挤出去了。

因为苏维埃运动第一次胜利，便想在全国组织绝无准备的盲动主义的暴动，这是不正确的。可是，因为这一次的失利便颓丧悲观起来，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既不能因为胜利而头昏，又不能因一时的部分的失败而垂头丧气，遂认为苏维埃运动已经失却前途，我们应放弃政治的斗争，仅能进行经济的斗争等等。共产党应当肃清这两种倾向，应当很灵敏的把用日常斗争来夺取群众的工作同政治的国家的任务的解决来溶合起来。至于说到苏维埃运动，更应当分析环境，深刻的研究第一次失利的原因，并指出将来斗争的前途与我们的任务。

我们应当指出，我们第一次失利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带有军事战术的性质，敌人的人数是超过我们，武装亦比我们好，并且有集中的指导等等。而我们的力量非常散漫（这能将我们截断为几个部分），我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使我们各部互相联系起来的战略计划。第二个原因是苏维埃区域内我们所领导的土地、经济与组织政策的错误。这些错误的结果（四中全会已经指出这些错误的实质），使我们在几个区域内没有充分的群众的拥护。

但是，在将来军事进展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这个原因将失其尖锐性，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比较顺利的前途。在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军阀间的矛盾，仍旧存在现在南京派、广东派、广西派、湖南派、江西派军阀间已开始争执，无疑义的这要使他们的一部分力量无法来进攻我们。另一方面，南京不能撤退用以抵抗张学良的一切军队，恰好相反，在最近南京还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张学良。现在基本的斗争是进攻苏维埃运动，但不能完全取消张学良反对南京战争的可能。张学良表面上与北方军阀开战，实际上，却是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南京。苏维埃运动目前对于张学良尚无直接威吓的形势，因此他

能利用南京政府的弱点而向南京开战。这个可能爆发的新军阀混战，一方面使我们苏维埃区域的斗争容易进行，另一方面将使全中国劳苦群众更加革命化。过去南京与北方的战争以及经济的恐慌，已使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活跃起来。农民运动及游击战争虽不及南方的激烈，但总是已经波及北方了。新战争的爆发，更要助长北方正在开始的农民运动的发展。最后说到我们的前途，不能不见到许多南京军队在与红军与土地革命已有基础区域的接触时将要瓦解。在被苏维埃军队占领的时候，无疑义的，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将把南京军队破坏或分化起来。同时，我们红军的力量将加强并集中。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而且愈前进愈会发展。最近我们所得的胜利即其明证：南京的三师军队被缴械，获枪五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架。这个胜利证明，南京不仅调遣自己的力量，且把西北军也要开赴江西，而鲁涤平、何键却又纷纷呈请辞职。

我们不应以一次胜利为满足。无疑义的，将来的斗争，在我们如能运用正确的政策，动员我们一切力量，一定能得着新的胜利。革命斗争的向前高涨，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纯粹靠党的策略与行动。从这个观点出发，政治局认为必须执行以下的迫切的任务：

一、最高限度的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为着达此目的，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分，他必须即刻改正在经济的土地的组织上政策所犯的错误，建立真正群众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府，设法巩固政府机关、红军、贫农团，并发展游击运动。

二、赶紧在苏维埃区域内组织职工会的领导中心，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并发展雇农、苦力工会的工作。

三、立即派遣有军事经验或军事准备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

员到苏维埃区域中去。

四、动员上海工人一千、香港工人二百、津唐工人一百以及其他城市工人去巩固红军。这个运动应根据自愿原则，由党、青年团、赤色工会来举行，并应于最短期间内尽可能的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应与宣传苏维埃及吸收工人同志加入党、团、赤色工会的工作联系起来。

五、各地党部应最高限度的加紧发展破坏敌人军事力量的工作。并组织扰乱敌人后防的工作（兵工厂、飞机场、铁路等），与加紧工人的斗争与罢工的领导，这就是给红军英勇斗争以直接的拥护。否则，无异等于忘记苏维埃口号而为革命的罪人。

六、红军根据最后特别训令，应集中自己力量于湘赣南方，应打退军阀们的反攻，保护苏维埃区域。必须避免在不利于我们条件下的殊死战，必须保全并巩固自己的真正力量。

七、认为最好很快在苏区内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应机械的一定要在二月七日来开，再延期与否应由苏区中央局去决定），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召集。委托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党团最后的起草苏维埃大会决议草案，交由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上海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改为拥护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并在所有各企业、各城市、各乡村中组织这种同样的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在立三路线之下，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失却其对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作用。过去党报对于各种工作未曾给与指示，没有整顿各种斗争的经验，没有发展党内的讨论（自然在站在国际与党的路线上的讨论）。同时，文章偏于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不能带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来指示实际工作，尤其是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

二、因为党报没有起领导的指示的作用，所以党员群众认为党报乃是“空谈理论”的刊物，或者是对外的宣传品，没有认识党报应有的作用。同时，直接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没有把自己的经验整顿起来，以供献党报，来教育全党。结果，党报的工作完全落到党报的编辑身上（这些编辑又脱离群众工作），使党报不能回答一切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使理论问题的文章不能很好的联系到实际工作。

三、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党报不仅要解说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解说党目前的中心口号，同时要极可能的多收集关于实际工作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党的组织任务的文章。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

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同时，各级党部应当解说党报的作用，使同志来正确的认识党报，来实际的帮助党报，写文章帮助发行。

四、中央机关报是全国的最高的党的刊物，每个机关报的性质如下：

红旗日报　中央机关报

实　　话　中央经济政治机关报

布　　报　中央理论机关报

党的建设　中央关于组织问题机关报

五、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

各机关报设主笔一人，四主笔成立一中央党报编辑处。

六、各省委应根据这个决议讨论地方党报的具体工作计划，执行党报工作中的转变。

七、建立中央党报的通信网，指定各地同志负责通信，写文章，督促发行，及建立工农通讯员及读报班。由党报委员会起草详细计划。

八、因为印刷及发行的困难，现在应该减少刊物的数目，集中力量改善几个中心刊物，使这几个刊物的内容、印刷、发行能尽量的改善。

九、中央各机关报编委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定出各报具体计划。

十、为建立党的及其他革命刊物的全国完备发行网，应当在中央、省委、区委成立发行部（或科），管理整个发行网的工作。中央及各级党部应当经过党团，建立工会、青年团、互济会及其他团体的自下而上的发行系统。党中央发行部负领导、监督并统计全国的发行工作。中央党报的印刷事宜由中央发行部管理。决定由现在中央组织部下的发行科起草建立全国

发行网的计划，并由常委发一关于发行工作的通知，由各地党部去执行。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

——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日益剧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为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向革命运动作生死的斗争。在中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也正在红军汇合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两次进攻长沙之后，暂时终结北方的军阀战争，加紧来反对全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加紧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几月来，蒋介石调动了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围剿”苏区，南京政府拨借大批款项作为“剿共”经费，尤其是因为党在立三路线之下领导错误的结果，红军苏维埃区域在许多地方都受到暂时的失利——这样，便使我们与反革命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条件更加复杂。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应有一明确的估量，并依照这一估量定出自己的斗争任务。

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很明显的看到：中国苏维埃运动对于他们有莫大的危害，是推翻他们统治地位的致命之点。帝国主义列强也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会根本破坏他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基础。因此，他们对于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怀着极大的恐惧与阶级的死恨。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军阀

也就能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和帮助之下，与我们进行决死的战争。

无论如何要彻底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是国民党反革命今天的口号。国民党为了自己的阶级自卫，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为了夸扬自己表面上的和平与统一，为了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好进行大借款，尤其是为了企图取得美帝国主义五万万元的大借款作为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的代价，他必定要企图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

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直接指使之下，又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决死的斗争。他否认伯力协定，破坏中苏会议，在中东路上准备第二次的进攻，这都表示他与帝国主义的其他走狗（如波兰、罗马尼亚等）正一致的准备帝国主义所预定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战，其目的是在要消灭苏联。这种情况更加重了我们与反革命国民党斗争的意义。因为上一次中东路事件正明白的告诉我们，在将来反苏联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将是帝国主义整个战线中一支东方的袭击队。所以他们共同摧残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也就是进攻苏联的第一步。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阀为着在新的军阀混战中保持自己方面的安全，他们也必须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帝国主义列强为着企图顺利的进行他们在中国的争夺，他们也必须指使国民党军阀首先消灭中国苏维埃运动。

所有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

三、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与帮助之下来向革命进攻，不仅利用武力，他们还动员了一切社会力量。苏维埃区域中的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成为他们的内应，如江西的 AB 团、鄂西的北极会、鄂东北赣东北的改组派都很活跃的来进行破坏

苏区的阴谋。非苏区的“铲共”团、改组派、托陈的取消派、第三党以及一切黄色领袖、工贼走狗，都在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政策的帮助之下，进行破坏罢工斗争，压迫革命运动，以直接帮助资本进攻与“围剿”红军。并且国民党政府更采纳了取消派、改组派的建议，定期五月间召集国民会议，来欺骗劳动群众，来对抗工农政权的苏维埃旗帜。在这底下的一切裁厘政策、增加关税、收回租界与取消领事裁判权运动，都是同样的欺骗。所以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愈加在进攻红军苏区的大屠杀中，愈加要加紧改良主义的欺骗，来和缓革命斗争的发展，以减弱对于苏区的直接帮助——这正是对于革命的最大危险。

四、正因为处在这一历史重要时机，而党的指导机关又犯着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致使两次进攻长沙成为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而不能巩固这一胜利。因为立三路线反对巩固根据地，致使目前红军在对抗敌人的“围剿”中，便不能有基础的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很顺利的冲破敌人的“围剿”。因为立三路线布置全国武装暴动的结果，致使我们在大工业城市与群众的联系大大削弱，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不能得到党及赤色工会的领导，而给红军苏区以直接的帮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苏区的农民群众与红军遂形成孤军独战的形势。尤其是在目前反革命国民党正暂停其军阀战争，集中一切空闲力量来对付我们，这更加重了对我们的压迫。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五、然而无论如何，却不能得出革命已经失败已被取消的结论——这是取消派的说话。同时，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说：我们的苏维埃运动被立三路线妨碍到不能有最低限度的发展，

至今还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的公函），于是便有人要求改变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全国的口号（郭妙根同志）。这显然是退却的路线。

目前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只有日益深刻，工农劳动群众只有更加穷困，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而新的军阀战争也将是不可免的。因此，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并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

六、当然我们要用全力反对立三路线的假进攻，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真正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真正进攻路线。目前实现这种进攻路线的最主要条件是：第一，各地党部尤其是各苏区党部应当切实的了解，目前的紧急任务，是在组织反抗敌人“围剿”的运动，要能在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和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求解放的两个口号下，来动员广大群众，要切实在政治上组织上来夺取广大群众，要正确的根据国际决议，指导这些群众在敌人向我们总进攻的现时条件下，能为其阶级任务而斗争。第二，苏区各级党部与红军在革命的群众团体帮助之下，要切实实行红军各部队的集中动作，并与农民群众斗争相配合，与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相配合，与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相配合，以击破敌人的“围剿”。并且我们不要在口头上而要在事实上在军事上以及在政治上来加强红军，使广大群众对于红军真有最高限度的援助。这样，才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第三，要更加扩大和开展非苏区的工人经

济政治斗争和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十倍加强我们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发动一切反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反抗敌人的总进攻，才是对于苏区的直接帮助。

如果不执行或不切实执行这些条件，都会发生莫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在敌人开始“围剿”的结果，我们会陷于一时涣散的地位，红军会到处分散，而得不到群众的充分赞助。这样，就会给敌人以各个击破我们的可能。不用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运动潮流会一时陷于停滞。这里，就更加说明：执行以上的条件是目前全党最不可迟延的**中心的紧急任务**。

七、现在四五省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正处在敌人严密的“围剿”中，这使党对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来击破“围剿”，要看成刻不容缓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这首先就应巩固苏区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组织。要立刻肃清苏区境内富农和地主残余的一切反动组织和军事反抗，要根本肃清富农路线及其领导，要完全排斥他们于苏维埃政权及红军之外。第二，要在红军战斗的过程中，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要动员斗争中的农民群众与城市失业工人加入红军来改善红军的成分，要派遣大批的工人干部去担当红军的指挥员与政治委员，要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委员制度与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要有铁的纪律。这样，来配合着广大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以击破“围剿”；这样，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第三，在战斗中，要联系各苏区的行动，尤其是江西、闽西、湖南、湖北的苏区。要在这些根据地区发动起广大的苏维埃改选运动，并依据着红军，建立起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并应当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真正劳动群众自己的政府，应当公布并且实行自己的政纲，用铁的事实给全中国工农

劳动群众看：中国苏维埃政府是能够去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解放中国劳动群众的。第四，土地问题依照立三路线的过早办法，是一方破坏与中农的联盟，另一方又是对于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消极，而帮助了富农。现在党应以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为中心口号来发动群众，应当彻底赞助农民群众之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要求，要坚决打击富农的一切企图和抑制富农，要防止与中农决裂，而巩固对中农的联盟。第五，要再不许迟延的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加紧对城市剥削者与富农的斗争。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要组织一切独立劳动者于各种社会团体之中，但剥削阶级的任何组织都当禁止。第六，要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应当避免立三路线的过早办法或一无办法的消极。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人团体监督生产，要极端的改良工人生活，要订立最小限度的社会法与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群众生活的改善，尤其是保卫苏区的动员，必须从阶级斗争和群众工作中去求得，而不是倚靠苏维埃政府的命令。第七，对于帝国主义者，苏维埃政府必须应付手段，去避免我们巩固前的决定胜负的冲突。但这决不是不去准备与帝国主义冲突的群众力量与武装力量，相反的正要十倍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第八，在敌人“围剿”当中，我们决不能等待，退守或孤守一地，我们要发动广大群众的自卫力量去抵抗进攻。在以红军作主力的大规模作战中，要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截断一切交通运输以围困敌人。派遣工农群众中红军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中的得力分子，去到敌人军队作最有力的鼓动，以动摇敌人的兵心。这样来便利红军的作战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进攻。最近江西朱毛红军的胜利，与这一策略的运用有极大关系。

这一切，都是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与反抗进攻红军的先决条件，而为立三路线所抛弃的。现在苏维埃区域正处在极残酷的战斗当中，党更要以加百倍的速度去执行这一当前的紧急任务。要在反对立三路线之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斗争中，同样要加强反对因为敌人进攻而走到右倾、消沉、失望、分散、逃避乃至取消的观念——这也正是立三路线的实质。自然这决不能解释成我们是要红军固守一个区域的。假使在敌人大部队的集合包围中，红军力量有被敌人击溃或消灭的危险，则我们便应站在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的观点上，移动红军的主力，去选择新的区域，准备适当的进攻。同时，原有的苏区也决不应放弃，相反的，应当更发动广大的群众的游击战争，去阻碍敌人的“围剿”，以继续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

八、党在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与敌人残酷进攻的条件下，更加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更加要使全国的群众斗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及反抗进攻红军的任务联系起来。在这里，第一，党要去发动和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为加工资，发欠薪，减少工时，要米贴，要改良待遇，反对裁人关厂以及年关新年与失业要救济等等的斗争。从这种斗争基础上，继续发展罢工运动，发展经济斗争，从反对资本进攻、反对黄色工会欺骗与反对统治阶级压迫上，联系起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尽量去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这样，去定出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在发动工人斗争中，首先要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要真正去发展下层的厂内的赤色工会分会的组织。要恢复被立三路线所抛弃的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工作和工人群众中的辅助组织（如俱乐部、读书班），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并争取无组织的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的周围。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目前党和赤色工会争取工人群众大多数在自己影响之下的最迫切

的组织任务，要反对立三路线对工厂委员会的误解与忽视。工人斗争自卫的组织（如纠察队、自卫队）久已被立三路线下的赤色先锋队的组织所取消了，现在必须恢复起来，并且要超过赤色工会的范围去发展。

第二，党要取消立三路线下到处组织地方暴动的错误策略。党应依照各地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去发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的斗争，去发展与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去领导灾民和红枪会运动。在这里，党要排斥一切富农豪绅的领导，将斗争的群众夺取到自己的影响之下，去深入土地革命，去发动游击战争，去拥护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在非苏区中，党要利用一切农民群众的组织方式，去发展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组织，去进行自己的革命斗争。

第三，党要根本取消立三路线下取消兵变，将兵士暴动结缚在工人武装暴动上的错误策略。党要将兵士运动看成最中心任务之一，要真正去加强我们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发动兵士群众的日常斗争，号召他们同情工农革命运动与接受土地革命口号，以增长其阶级仇恨，这样去造成组织兵变兵暴的真实前提，去到处捣乱和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在现在更有必要，为着直接帮助苏区与减弱敌人“围剿”的力量，党、青年团、赤色工会及一切革命团体都应动员所有力量去进行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

第四，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一切压迫与侵略，是目前党的最中心任务之一。党要利用一切可以发动群众的帝国主义强暴的罪恶，去引起群众反帝的斗争，去联系到反对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帝同盟的组织要凭借着革命群众的阶级组织（如赤色工会、农会）的基本力量，更去发展无组织的群众成为他的个人

会员，以充实他的战斗力量。党在这个紧急时机，更要加强反对一切“第三派”的运动，要在群众中公开暴露国民会议的反动性，指出这是在替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欺骗群众破坏革命的走狗。过去立三路线完全站在忽视资产阶级欺骗作用与对于帝国主义无办法的观点上，而走到对于反“第三派”反帝运动的消极，现在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第五，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在立三路线下也多是指导他们去作孤露的示威和冒险的农民暴动，而没有注意到怎样去发展他们自己之中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回民、内蒙古与苗瑶中少数民族运动一直到现在，还没能引起地方党部的注意，这是必须改正的。

第六，自从在立三路线时代党组织总行委，实行党的组织军事化，党及青年团、赤色工会所受到的损害极大。党现在要恢复曾被损坏的组织，首先就要大量的吸收工人、雇农入党，要努力的发展青年团员与赤色工会会员。要加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支部的厂内活动。要加强党报在群众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和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要改造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

这一切的转变，在目前都是万分紧急的任务。而且在现在，不但红军的胜利是给敌人的直接打击，便是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群众发动、每一个士兵斗争，都是对敌人进攻革命的直接打击，同时，也就是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真正在实际中的表现。

九、并且现在和以前更加不同了：一方面苏维埃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曾提高了非苏区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另一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目前加紧进攻红军苏区，也更加重了工农劳动群众之反抗进攻红军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责任，所以为建立苏

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正是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旗帜。要以发动工农劳动群众的年关斗争，去准备“二七”运动与共产国际所决定的二月二十五日的世界的失业工人运动与□□（见另一□□），党要以发动工人日常斗争联系到苏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党要以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联系到苏区农民之分得土地，党要以发动军阀军队中士兵反抗军官的斗争，去联系到红军中的待遇平等与兵士分得土地，党要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去指示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这一切斗争和宣传的过程，都为的更能扩大苏维埃大会的选举运动，更能加强反抗进攻红军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更能有力的联系到反抗进攻苏联的运动——这是目前党的最紧急的任务。

十、党要保障坚定的执行国际路线，要保障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紧急任务，就只有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给以坚决的反对，并根本肃清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错误。方开过的四中全会对于这一任务是给了一个保障的。四中全会接受了国际路线，严厉的指斥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解决了党内问题，改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所以全党现在要执行国际路线，必须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且必须使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从思想上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现在苏维埃区域广大群众与红军的革命战争，正渴待着全国工农群众的帮助与党的领导，全国的群众斗争正日益迫切的需要党及赤色工会的领导。在这时，谁要只是口头上反立三主义，而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和怠工，谁便是假的反立三主义，而实际上是在掩藏右倾机会主义的活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揭去之后，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失望、恐惧乃至取消观念统统都暴露出来。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

争中，要不加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认定他仍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则必不能正确的解决当前任务，而执行国际路线。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是进步了，同时在一些消沉失望的基础上，却产生了反共产国际的情绪及一些不正确倾向。如极端民主化，停止工作来反对立三主义，以无□□的派别□□来反对立三主义等等，都是与党有危害的。自然这些反国际情绪与不正确倾向是与立三路线历史根源有关系的，但现在右倾机会主义却要来强制利用，党应予以坚决的指斥的。尤其是托陈取消派在这一时机要回到党来进行破坏党的阴谋，这对于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更大的危害，全党必须在坚决的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中揭破取消派的一切阴谋，团结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在共产国际的周围，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大道。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

听了贺昌同志关于河北工作报告后，根据国际路线与扩大的四中全会方针，有以下的决定：

一、立三主义统治全党下的北方党部工作从各种事实证明，河北党部在各种理论问题一直到实际工作方式，不但坚决执行了立三路线，而且发挥了立三路线。这些事实特别表现在：争取北方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布置全北方的武装暴动，提出工人管理生产，无条件的扩大政治罢工，随时随地的举行地方暴动与兵暴，压制党内自我批评。在四五月间就开始了这种工作路线，八九月是它登峰造极的时期！

二、三中全会后之北方工作，经过北方局的扩大会，在表面不举行武装暴动之下，仍积极布置三大区域（直南、保北、京东）的农民战争，创造新苏维埃区域；在表面准备总同盟罢工方针之下，布置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唐山）的政治同盟罢工与四大铁路的同盟罢工。因为在客观形势分析上仍然否认革命运动不平衡之特点，争取北方革命首先的胜利（通告第二号上说：调动全北方的劳苦群众，与南方革命运动配合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开辟革命总进攻的局面）。在组织上取消自我批评，反对保留政治意见。这些一切都充分证明调和主义的实质是在重复与继续了立三路线！

三、以“左”倾空谈掩护右倾实质的北方立三主义，特别表现在：对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的不了解，对于军阀战争估计的机会主义观点。富农地主豪绅领导下的自发农民武装斗争，认为是革命战争。长期的认抗捐税是土地革命内容，招兵买马的和平组织红军，认示威运动是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直接斗争，而北方的苏维埃的下层基础反认为就是目前工厂委员会与农民委员会。

四、正因为立三主义在北方党有长期的统治，变相的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扩大，用“左”倾词句玩弄暴动示威（天津广暴示威），玩弄政治罢工，不做真正群众工作，不去领导发动群众斗争，不做苏维埃选举运动，使革命运动受了部分损失与挫折，使党脱离广大群众，使党的政治影响缩小，使党受了很大危害，干部大批被捕，同志数量减少，组织涣散，取消妇女工作，取消青年工作，使党内表现一般消沉甚至退出逃跑的现象！这就是立三路线之结果！

五、家长制度与派别观念北方党部更特别严重。在军事化口号之下，开除处罚了许多积极干部，大批（如唐山）开除许多很好同志，工作之做不起完全推到支部同志的右倾，逼得同志愿意被捕而怕开除。尤其严重错误的，对河南陈原道同志等之处罚，用许多造谣的方式在三中全会及北方局扩大会上谩骂这些正确路线的同志，对何子述同志之斗争，这都完全是由非布尔什维克及派别观念出发的！

六、尤其不可允许的现象，是国际来信之后，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不但不愿抛弃反国际的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反而对国际路线怠工，不把国际信发到支部，压制反立三路线之斗争，仍以派别观念对待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同志。当下级同志自动起来拥护国际路线反立三路线，河北省委仍持

“不理”的消极态度，障碍斗争，这完全证明河北省委之领导完全破产！

七、在上述情况之下，北方的同志接到国际来信之后，不断的似怒潮一样，反对立三路线之河北省委与调和路线之中央，要求召集紧急会议，解决党的问题，这显然证明党的进步，有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但在这种热烈斗争情绪上同样也发生了不正确的倾向，如“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正表现了这种倾向。现在四中全会正给了我们改造党的正确方针，如果党有了正确领导的时候，还不立即停止这一行动，这必然会发展到对党极有害的地步。党应有正确的领导，使河北党能达到实际工作上真正迅速的转变到国际路线！

八、现河北党的工作仍是立三路线与变相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统治着。要达工作的转变，必须采取下面迅速办法：

A. 中央迅速派人去领导拥护国际路线四中全会与坚决反立三路线之斗争，尤其要发动自我批评，使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

B. 立即停止原有的河北省委工作，并取消现有的筹备处，组织临时省委。除中央派人外，一定要多吸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反立三路线的同志参加，以保证国际路线之执行。

C. 在中央领导之下，用迅速非常的办法召集会议，多吸收下级干部、反立三路线坚决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参加。接受国际指示与四中决议，对过去工作审查，定出今后工作的方案，取消过去一切政治决议（尤其是扩大会的决议），正式成立省委！

九、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调和路线！但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裂党的行动，一定要加以严重的打击。加紧两条战线之斗争，在国

际与四中全会路线之下，巩固与统一中国共产党，尤其要反对托陈取消派企图到党内活动。

十、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之执行，完全要打破北方党的家长制度与由上而下的包办制度，提高政治水平，发展产业工人同志，吸收工人干部，养成地方党部的独立工作！

十一、北方的客观形势，在不断的长期军阀战争之下，政治经济危机之深入，工农革命运动的向上发展（天津、唐山及各地农运），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紧急任务之下，河北党必须真正发动与领导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年关斗争、二七运动、失业斗争）与组织群众工作，从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总方针，真正肃清立三路线！

十二、号召北方党的每个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拥护国际路线，拥护四中全会，督促与帮助现在的中央，完成反立三路线之工作，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党的一些根本问题！

十三、我们坚决指出，在顺直委员会上林育南提出反四中全会的主张，这完全是右派机会主义观点。因为四中全会完全站在国际路线上彻底揭发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并且改造了党的领导机关，在国际指导与帮助之下，可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四中全会正确的完成了政治上与组织上应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抗国际路线反对党，他必然阻碍反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这一个倾向发展的前途，必然与托陈派汇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鄂豫边特委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

一、过去鄂豫边党是长期的脱离中央指导，因此，很长的时期是完全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如南阳党对杨虎臣的幻想，鄂北党专以打土匪去号召农民群众，以致完全放弃了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去实际发动群众作反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和平发展的趋势。在党内的成分上，富农甚至小地主占了不少的数目，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是在这些成分和知识分子的掌握中，这更是形成富农路线，阻碍土地革命任务实际进行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仍然表现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二、在立三路线统治着党的时代，鄂豫边党是立三路线发展最好的基础，正是用一些"左"倾空谈掩盖了一切机会主义的消极，因此，红军虽然有了相当发展，然而在赤色区域内的土地仍未分配，苏维埃政权也没有建立。红军也没有能从广大群众为分配土地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里面包容了许多土匪富农成分，以致红军甚至做出违反农民利益的行动（如地主跑了，红军向农民收地主的租），至于红军向郑州发展更是不正确的方针。

三、在立三路线空喊同盟罢工、地方暴动口号之下，鄂豫边党在实际上完全忽略了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与组织工人群众

的工作。党在城市中的组织与影响没有发展，在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村中不去做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反帝运动是一般的忽视。最近鄂北的破获更使党成为非常涣散的状况。

四、根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鄂豫边区的党在一切工作中须要迅速坚决的实行转变。只有切实执行下列主要任务，才能使党的工作能够迅速的发展。

一、建立强固的苏维埃区域

（一）必须在赤区内发动群众，即刻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根据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原则，实行分配土地，使土地革命的利益真正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而不为富农所攫得，并且绝对反对富农阻碍分配土地或以生产工具为分配土地标准的富农办法。而要以人口劳动力为混合的标准，以加增雇农贫农的利益，并巩固与中农的联盟。鄂豫边特的党绝不容许对于这一任务执行的丝毫动摇、犹豫与迟延。

（二）在上面这些区域，必须于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同时建立真正有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府。鄂北革命委员会应当改组，应当使党的得力分子、工农群众的领袖来参加而加强这一组织。鄂北革命委员会应公开号召群众来做建立与改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这首先要切实从一乡一村做起，然后到特区政府的成立（特区政府成立时，革命委员会则宣布取消）。在各级苏维埃中，必须防止富农小地主再混入进去，绝对要保证雇农与贫农的领导作用。已成立的两个区苏维埃，应立即举行改选。

（三）在上面这些区域，必须立刻进行雇农工会的组织，并切实领导雇农利益的斗争，使雇农成为赤区领导中心力量。同时就要开始建立贫农团的组织，广泛组织赤色警卫队，并帮

助青年团发展少年先锋队。农协必须使他随着苏维埃的成立而逐渐消灭。赤色妇女协会应取消，将这组织内的分子分到各种组织中去，并团结在政权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周围，以加强妇女工作。

（四）现在鄂北的苏区（襄樊、枣阳与宜城之间），必须在坚决执行上列任务中去求得巩固，如果在豫西南之唐河也有了赤区（听说第九军现在此地），也应如此去巩固，使这两个赤区渐次联系起来。整个鄂豫边赤区必须在自己的发展上，注意与鄂豫皖边及湘鄂西苏维埃区域取得直接联系。

二、强固红军并加紧兵士运动

（一）过去第九军虽有相当历史，但在他的成分和行动上表现完全是在富农小地主领导之下，还没有执行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观念。不是在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分配土地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严格说来，他还不能算为真正的红军。这些情形都是由于过去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的结果，因此，第九军必须从今天起坚决执行路线上的转变，去创造保证共产党绝对领导作用的“铁军”。

（二）以后红军所到的区域，必须肃清反动势力，发动群众起来没收地主土地，采取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去巩固并扩大苏区。绝对禁止过去代地主向农民收租，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办法。

（三）要在实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吸收得着土地利益的农民群众（贫农、雇农以及中农中得力的分子）到红军中来。这样去坚决执行红军成分的改造，要把一切富农小地主分子洗刷出去。在分配土地时应分配好的土地给红军兵士，改变过去

立三路线红军战斗员不分土地的错误办法。

（四）在九军中要创造强固的党的组织，保证党在红军中绝大的威信。要努力加强政治工作，建立政治委员的制度。要调换一切对于路线动摇的军事及政治干部，坚决由红军内部提拔或特委供给新的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加强或补充。中央特派××同志负九军军事责任，×同志在军事上尚好，但党必须加强对他的政治领导，同时中央派定××同志去任九军政治委员，××同志可到红军中任政治委员工作。

（五）九军在全国红军未改编前仍用原有番号。一般的说来，他还是一种游击队的形式，其队伍的组织和编制必须适合于游击战争，应把现有的枪支编为几个纵队，每纵队约配枪××左右。目前的工作方针就是首先肃清赤色区域内一切反动势力，实行土革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扩大鄂豫边区游击战争。其发展方向……（略）。

（六）反动白军中的兵士工作，党及红军都必须十分加紧。这必须有计划的执行征调一部分同志及工农打进去，去建立工作基础，加紧去鼓动并组织有群众的兵变。这一工作在今天敌人进攻期间是特别非常重要的工作，党必须领导革命群众动员起来做这一工作，忽视这一工作也是等于帮助了反革命。为着这一工作，中央特批准××元津贴，此款须完全用于兵士运动费。

三、建立几个中心城市工作，加紧发动非赤区农民斗争

（一）在这里首先就必须征调力量去恢复并发展老河口、襄樊、枣阳等最后破获了的组织，加紧南阳城市工作，同时特

别注意襄河船夫、堤工及襄庄汽车路工人中去建立工作基础，其他破获了的区域同样要注意去恢复并发展组织与工作，然必须集中力量于上列区域的工作。

（二）在这些中心城市和工人群众中，最主要的迫切任务就是切实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之下，去领导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经济政治要求的斗争，使这些部分日常斗争联系并发展到公开反国民党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切实去进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赤色工会、工厂作坊委员会及其他辅助组织。

（三）在反动统治的农村中，尤其是赤色区域周围和其他几个有基础或占重要地位的区域里，党必须去加紧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组织农协、雇农工会和农民委员会。这些斗争和组织一开始就要注意保证雇农贫农的领导和与中农的联合，绝对要防止富农成分混入到这些组织中来。过去已有的农协多是在富农路线领导之下，必须排斥富农成分，肃清富农路线，使他成为真正斗争的组织。

五、坚决执行上列的任务，切实实行工作中的转变。这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去肃清立三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执行反对进攻苏区与红军，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方针。在这些斗争中必须要特别注意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并加紧反帝同盟的组织工作，同时要联系到反对国民会议的宣传，特别是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六、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去进行，特别要发动支部联系到实际工作去讨论，使同志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与恶果。特委应当注意到鄂豫边党是有很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而并且全国的右派正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现在已经是破产中)。在坚决领导反立三路线斗争中，必须认识右倾是党

内主要危险，防止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假的拥护国际路线反立三路线下进行一切企图，尤其是要努力肃清一切富农路线。

七、在执行上面任务及反立三路线过程中，党要坚决执行改造工作。第一就要加紧在城市工人及农村雇农贫农中发展组织，立刻洗刷党内富农小地主的成分；第二，要坚决提拔新的工人雇农干部来参加指导机关工作，要撤换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干部分子；第三，要切实去建立支部工作。

八、以后鄂豫边特委是直属中央指导，特委接到国际文件、四中全会决议及本指示信后，应即根据上列文件检查过去工作，并讨论工作转变，订出新的工作计划。特委本身中央认为有加强的必要，特决定调东北特委的×××同志来担任书记，并派其他同志参加特委。特委并须筹备在最近召集代表会议，来改选新的特委。以后特委经费应完全自给。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军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

鄂豫皖边特委：

皖西同志来此，得悉了一军目前的一些消息。据云，一军在皖西已得着相当胜利，现在已离皖西向鄂东罗田方面去发展了。

关于目前一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有以下的意见：

反动统治的进攻红军，一般的说来，它们第一步的“围剿”计划是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在赣西南，敌人遭受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一、三军团得着了中国工农红军未有的胜利。就在一军、二、六军方面都有相当的胜利。自然呵！国民党军阀绝不止此，此刻正在重新计划布置，重新向红军进攻，准备三十师以上的兵力来对付我们，在赣西南已经准备了二十师以上的兵力了，这就是国民党企图挽救他们死亡的挣扎！另一方面也就是表示我们群众拥护苏区力量的增大。

对于敌人这些进攻，国际一切决议与来信，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后的一切决议，中央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给红军的训令中，一般的原则问题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都是正确的确定了的，应作为一军行动的基本文件。当时指出一军的政治任务是在巩固苏区，他的发展应向平汉线南，一军的后方地区是在

鄂豫皖边。要实现这一指示，就须首先注意下列各点：

第一，不应当很机械的不顾后方的不估量客观形势的横冲直闯的企图达到平汉路线，这是错误的。应当在现在的地域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武装斗争力量，消灭当前的敌人，随时打破敌人的“围剿”的一方。在这些地方应当要十分的用力发动群众起来巩固新旧根据地，以百倍的力量改造与巩固红军的成分、干部与党的领导，尤其是政治工作的加强。这样，以主力军与群众斗争联系起来，逐渐的向平汉线两方面发展。

第二，现在的新旧根据地应当首先把它打通联系起来。尤其是皖西与罗田、麻城及固始的中间白色区域与反动势力必须配合群众力量将它消灭与肃清，不使再有“梅花”形的区域存在，这是在群众斗争与红军的作战上万分紧要的。

第三，红军新占领的地方，必须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及红军兵士，并鼓动和赞助基本农民群众之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加紧反对富农，在分配土地中不使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便宜，并且只能给他以坏的土地，当他愿以自己劳动力来耕种的时候。建立由群众选举和保护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基础上发动贫苦农民加强红军。这是最中心最基本的工作。坚决的反对专图攻打城市以解决经济问题，而不顾新占领地的巩固，无目的兜圈子式的游击。

第四，旧有根据地如被敌人强力的压迫，我们亦不必企图固守，但必须继续在该区域内发动斗争，尤其要发动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抵抗敌人的进攻，同时不顾根据地的逃走也是绝对错误的。过去钟笙[1]有放弃鄂豫皖边穿过铁路向西发展的意见，是绝对不正确的。

第五，特委与红军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上，必须注意当地群

众斗争的要求，必须注意当前的问题，如春荒斗争等，来发动群众深入土地的斗争，一直做到没收与分配。尤其是各区域的群众组织（特别是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与工人运动更要加紧去做。在这里，更要特别加紧严厉的肃清反动势力的工作，尤其要注意改组派与取消派的活动。

此外，关于交通的问题，直到现在不曾打通，不久中央曾派有同志由皖西进去，但特委始终未有派一人出来打通建立交通的关系，这是十分不对的！现在，一方面由中央由外建立进去，同时你们必须立刻的由内打通出来。至闻一军在皖西缴得敌人无线电机一座，不知确否？如果确实，你们很好的保存着，中央马上派人并送一切符号密码来。

中　央

二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曾中生。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

赣东北特委：

去年汪涂[1]两同志走后，中央曾又派林邱[2]两同志前往，并带有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致特委一信。嗣因交通断隔，行至中途又复折回。不久，庭铨[3]同志自东北来，一月吴先民同志又到，因得知汪涂两同志到后的赣东北情状。现在中央根据目前的情势，择要的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一、去年十一月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国党中央的李立三路线为害于党，为害于革命的全貌。今年一月七日召集的扩大的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接受了国际路线，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九月三中全会是在秋白[4]同志领导之下做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全国工作的布置与指导，是在调和路线之下，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在四中全会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几个主要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增加了中央委员会新的成分。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企图。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其反四中全会反国际的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立江苏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到满洲、到香港去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更派人到苏维埃区域去捣乱苏维埃政权、红军与党的领导。右派的反党活动是有他的政纲的，他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对于目前形势作右倾估量的观点出发，右派小组织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路线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去，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在正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的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关于国际决议来信、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后的一切重要文件，均应是执行国际路线实行彻底转变的基本根据，赣东北特委应在四中全会接受的国际路线之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的决定，来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根据国际来信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赣东北党的工作，首先就应指出东北党的路线问题。在去年唐邵[5]两同志未回赣东北前，东北党的工作是有右倾错误的。苏维埃运动历来虽有发展，但孤守着乡村，不要城市。城市的工人运动完全放弃，诿为不懂工人运动，要省委派人去做。在乡村，又是割据着某些地方，而不向外发展，不去注意苏区外之非苏区的工作。没收地主土地后，执行富农路线，而不平分一切土地。因此，在当时许多发展的机会失去，而已胜利的苏区又不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显然是右倾的错误。等到唐邵几同志回去之后，得到苏代会的决定及中央的指示，你们便走入立三主义的错误道路上来。那时候正当军阀混战剧烈的当儿，东北的苏区是发展了，红军是扩大了，但都没有巩固的基础。那时候的中心观念是"占领湖口，震撼九江，夺取彭泽，截断长江"的单纯军事行动，以这样行动响应以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武汉暴动

或是朱毛[6]之占领南昌。在这一方针下，遂完全忽视了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工作的加强。在你们的一切工作中，不去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不去鼓动和赞助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以消灭封建残余的剥削，反而在分配土地时依照人口计算，连地主的残余也算入，富农可分得好田。在征收土地税时，从一亩算起，使赋税的担负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不是落在富农身上，这是富农的路线。不去组织阶级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以加紧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反而用苏维埃政府名义公布低廉工资，不许工人要求加工资，说怕惹起农民的反感，这更是富农的路线。不去建立与扩大真正劳动群众自己的工农兵会议的政权，不去实现苏维埃政府自己的政纲，不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去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反而以党来包办苏维埃政府，有时还以政权力量来保护商人，这简直是违背阶级利益的行动了。但有时又实行没收一切商店，实行对外的经济封锁，实行抑平物价，这样，便更增加苏区根据地之巩固的困难。在红军的扩大上，虽然他的成分是雇农贫农占大多数，但没有工人干部的领导，缺乏好的指挥员，缺乏强健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党的领导的威信还很弱，这样，就使红军的扩大变成了“拉夫招兵”的方式，在群众中竟发生有“逃兵”不愿当红军的现象。另一方面，因为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来，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就大大的削弱。这一切，就使苏区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成了脱离群众毫无基础的向前冒进。所以有些地方如都昌、湖口、鄱阳、乐平、万年、德兴、浮梁一带，红军一走，白军一来，整个区域或大部分都丧失了。这显然是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必然造成的恶果！三中全会后，中央给你们的第一信中（十月二十八）提到占领长江要塞，割断长江交通。在赣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上，

尤其是在整个长江局势上，这一指示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你们现在要在两条战线上来斗争，要反对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党内富农路线，要反对盲动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冒进攻坚，脱离群众，放弃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正是帮助富农路线的存在与发展，便利一切反革命的活动与进攻。赣东北的党必须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中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

三、现在敌人正在四处进攻红军与苏区，赣东北也受着十二团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各地红军在这次敌人"围剿"中是得着初步的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不过单就赣东北来说，苏区的确缩小了，红军也受到部分挫折。依着现在的情势与东北行委及十军前委的争论来看，你们不是回到"固守老巢"的退守观念上去，便要回到在假的进攻口号之下实行"兜圈子"式的游击而逃跑的办法。因为东北行委所主张的"打小仗"、"扎口子"、"吃补药"的策略，实际上也是回避与敌人大队伍接触的退守办法。所以当着胡祖玉三团人集中在一起"步步为营"的前进时，你们便没有办法阻挡他，消灭他，以致他能从鄱阳、乐平、万年、余江、贵溪而长驱直入弋阳，逼近横峰；同样的，浙江省防军亦一无阻挡的直入玉山、上饶、河口。而我们的红军呢？口子既扎不住，十军前委又因其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从浮梁打秋浦以后，每与敌人硬碰，不胜，则东窜西逃，这几月来十军的行动完全成为"兜圈子"式的逃跑行动。因为"扎口子"也罢，"避重就轻"也罢，果使成为一种战略，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游击行动，来深入土地革命，来阻碍或扰乱敌人的前进，则在适当的条件下均可采用。相反的，如将某一种战略定成原则，排斥了另一种战略，而又绝对忘记与广大群众的联

系，不执行地主土地的没收和平均分配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则必然要引导到错误与失利的道路上去。因此，你们的争论也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

现在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要站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上，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与组织，要没收地主土地，要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要到处发动劳动群众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在敌人方面不只计算他的兵力，要连地方上可以为他用的反动势力也算在内。在我方，红军外，特别要计算到我们必须发动与依靠的广大群众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来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来威胁敌人回到反攻为守的地步。在这一方针上，你们的战略应当是：以广大的农民游击队袭击敌人的进攻部队，阻碍敌人前进，即使他已占领某些城市，你们也须以广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给养来围困他。同时，要集中十军的主力（自然有时需要战术上分散来扰乱敌人，但不能违背主力军集中的原则），在适当时机，利用敌人一方弱点，来各个击破他。在这里，十军要计算到当着敌人大部队集中在一起时我们正面接触的困难，我们便应改变战略来对付，但决不应因此便回避战争而逃跑开去。只要敌人退守到城市中去孤守着，则我们便更能广大的发动城厢以外农民群众，彻底的平分土地，肃清地方上一切反动势力，巩固乡村中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我们更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这样，将要使敌人的前进受着阻碍，而已被占领的城市也会因被围困着而自动的放弃（这在赣西南东南常有这样事实）。并且

农民游击队必须凭借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加紧向四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扩大赤色区域。在这里，更要让得力干部去领导非苏区的群众斗争，一直发展到没收地主土地，平分一切土地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形势看来，闽浙赣边与信江南岸特别有这可能。在这里，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但这绝不是因此便放弃信江北岸，恰恰相反，必须在敌人不能长驱直入东北根据地的条件下，红军主力才能移到南岸来发展，来深入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与信江流域的联系，也必须急速完成。这是东北苏区必须注意的后方！最近浙西工作的发展，中央已要他们向着衢州、江山、常山注意，你们也应派人去工作。

四、此外关于怎样巩固苏区与目前军事行动已见中央两次军事训令，现不再及。至于苏区工作计划，因为是在调和路线之下发出的，所以还有许多错误，中央将另有文件批评。主要的是国际各种决议案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现在单指出东北党的几个严重问题，要你们立即注意与执行。

（一）关于东北行委与十军前委的争论问题。第一是军阀战争问题。行委关于“会剿”的分析是对的，但主张调回十军向赣东发展，却有放弃正面敌人听其深入苏区、完全没有注意群众行动的错误，前委认“敌人绝对没有力量向我们进攻”，这是错误的立三路线的观点，自然决定的行动方针也是错误的了。第二是东北革命委员会与党的行委前委的职权划分问题，这也是立三路线中的一个错误。党的领导必须是统一的，政权的组织党只能经过党团从中起领导作用，而不能代替与包办政权。所以在政权的领导下，十军必须接受革委会的命令，只有苏区中央政府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可以改变东北革委会的决定。在党的系统上，前委本是红军中一种临时的党的组

织，他应服从东北特委（行委应取消）。在苏区中，军委会应成为政权机关一部分而直接指挥军队，同时党的特委会亦可直接指导军委，而不用经过政权的革委会或特区苏维埃政府。总之，特委是东北一切政治军事行动的最高指导者，过去立三路线的中央将红军与前委规定直属党的中央军委指挥，这是错误的。第三关于没收商店问题。目前革命阶段中的经济政策，对于贸易自由是允许的，凡是不遵守苏维埃法律或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商店、企业、工厂，得实行没收。十军前委在红军已占领景德镇后，还领导工人暴动，没收全体商店，后来特委又将没收的东西搬运了五千车回众埠街去，这都是错误的。第四，关于优待红军问题，应从分配红军战斗员以好的土地，苏维埃政府替他料理耕种事情并优待他的家属来了解，不应从废除薪饷多发零用钱上来着想。尤其应在群众中做广大的拥护红军运动，组织起群众来为红军战斗员缝衣缝被洗衣裳，为红军做食品，开慰劳会送纪念品。这样，来密切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来坚定与提高红军的战斗情绪，并更能加强基本农民群众与城市工人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决心。至于苏维埃政府职员之领取薪资，当然也要有一最高度的规定，不能超过当地工人工资以上，但不能因此便解释为这是优待职员而不优待红军。

（二）关于土地、农民问题。在赣东北苏区中，许多地方还没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绝大的错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你们对于以人口和劳动力作混合的标准的了解也是有错误的。如先以被分的土地的一半用人口来平均，后以被分的土地的另一半，依劳动力来平均，这里，就包含富农分子甚至地主残余都与基本农民群众享有同等权利，甚至可以分得好田。纠正这种错误的正确办法，大致可用苏区工作计划中的规定，但必须认识为要消灭地主阶级与镇压反动势力，地主

残余即使无显著反动证据，他的家属子弟也必须派他们去做苦力工作，绝对没有权利分得土地。对于富农，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时，如果他愿以自己劳动力来耕种田地，则可以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但必须给他以坏的土地，而不能与贫农、雇农、中农享有同等权利。至于已经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富农分子，则必须褫夺他们这种权利。在这里，你们对于农民阶层的分析也是错误的，如你们只分别佃农与自耕农，说佃农革命性高过自耕农，这种分析将模糊了农民中剥削阶层的富农与被剥削阶层的贫农雇农的对立，这将障碍着平分一切土地之贫农雇农的要求。这是完完全全的富农路线！在东北党及苏维埃政府中有很多富农分子存在，甚至创出“田分了雇农便没有了”的理论，以掩盖对于雇农工会组织的怠工。要肃清这一富农路线，首先便须坚决的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党内的富农分子必须立即开除出党，政府中红军中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必须从斗争中将他们肃清出去。尤其是要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来加紧反富农的斗争而吸引中农在自己的周围。这一切，当然还只是政治上解除富农的武装，还不是根本的消灭富农。

（三）关于经济政策问题。东北党关于土地税的规定，必须立即改正从一亩田起便征税的富农办法，而应使土地税的担负落到富农身上。要免除贫农（雇农与工人更不用说）与城市贫民的一切负担，营业税的担负也要放在有盈余和有雇佣劳动的商人身上。不论是土地税或营业税，都应是统一的累进税。在现时还不应禁止土地买卖，卖田的人除非因他犯有其他反革命罪，否则处以死刑是绝对错误的。目前对于商店的全部没收，是自杀的封锁政策。也正因此，红军给养的筹给也将更成问题。十军要后方垫款，特委责备红军不自筹给养，这都还没找着流通经济的正确办法，譬如过去赣东北存米甚多，苏区内

米卖到一元八一石，而白色区域则七八元一石。苏维埃政府如容许在苏维埃法律下的贸易自由，则税收与公益捐的筹措必较临时征发为更有办法。

（四）关于工人运动问题。过去东北党根本没有工会工作，没有城市工作，以致红军虽占领了这一城市，却不能保障这一城市的胜利。相反的，因为党无城市工作，无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所以在红军一度占领之后的地方如万年还发生过群众投向白军的事实。在景德镇有那样多的瓷工，但七八万工人中只有两千工会会员，乐平矿工三千多人中，只有二十多党员。可见党对工人党员的吸收，对于赤色工会的工作，完全没有放在第一等的位置。此外，还有广大的船工、脚行、苦力以及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是赣东北党必须活动的对象。而发展工人斗争，更是加紧工人运动的必要前提。八小时工作制必须立即实行，减工资的规定必须立即取消，且必须领导工人进行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对于失业工人，应吸引他们到红军中去当干部。当着红军占领着城镇时，必须将斗争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自卫，以彻底肃清城镇中一切反动势力。过去对于景德瓷工、乐平矿工的抛弃，甚至他们投入红军都遭拒绝，这是绝对不容许的错误。再则，信江流域中的船工、赤色会员只三百余，党员只二十余，而且是涣散的。现在你们必须特别注重这一工作，如果将这些船工都能组织起来，那不仅增强苏区的群众组织力量，并且对于苏区与非苏区的政治上的宣传，经济上的流通，交通上的运输，军事上的侦查与破坏，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五）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赣东北的苏维埃政府至今还没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各县区的苏维埃政府也多与群众隔离，而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管理的政权。有些地方不是

党包办了政权，便是党代替了政权的作用，这是必须立即改正的错误。一定要明白，苏维埃是工农政权的组织，党必须经过其在苏维埃中的党团来执行党的一切决定，党决不能命令或代替苏维埃。苏维埃的建立与改选运动，必须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成立赣东北特区的苏维埃政府，来扩大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准备工作，选举代表出席大会。苏维埃政府中的腐化现象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党必须提高党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党员在政府中的行动与工作，要比一般非党员来得更艰苦更勤劳，才更能为一般群众的表率。同时，东北的苏维埃政府必须更努力于肃清内部反动势力的工作，这不仅要用武装的力量去肃清与消灭一切反动的武装，如改组派、民团、靖卫团等等的军事组织，并且要用政治的侦查与群众的斗争力量，来镇压一切反动的活动与企图。这里，就必须进行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详细办法将另有文件发出）。

（六）关于红军及群众武装问题。赣东北十军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干部的成分与党的领导问题。依据庭铨同志的报告，十军中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民，且是雇农与贫农居多。成分虽还不坏，但因为土地没有实行彻底的平均分配，而且又没能特别优待红军家属，这样自然使红军的战士还不能都了解于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的重要。尤其重要的，十军中的指挥员还多是旧日军官或兵士转过来的，真正的工人干部简直没有，党员最近发展虽已过千人，但还不能都算真正的党员，在十军中起最有力量的核心作用。在这里，最主要的办法，除掉中央军事训令已有的不说外，应特别注意于军事干部的训练，要多选工人成分来充当。当着工人干部来做政治委员的时候，即使他的能力或者文化程度较弱于其他分子，但必须给他以工作的机会去学习，因为在阶级的坚定性上，他总比其他分子为更可靠。十军中工

人成分太稀少了，不仅指挥员、政治委员如是，便是战斗员也如是，故你们除努力于干部工人化外，还应吸引大批工人尤其是失业工人到十军中去当战斗员。兵委的组织要从他的权限缩小直做到完全消灭为止，团营以上的兵委现在便应取消。十军现在已进到大规模的红军组织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总要妨碍集中制的执行，为战争的利益应将他取消而更提高党的威权。各地游击队的组织必须尽量扩大。赤色少年先锋队应成立他的独立组织系统，只在作战时，他应隶属于军委会或红军的指挥之下。各地游击队的屡次失败，主要的因为他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只凭几杆枪来游击，这是绝对错误的行动，并且各游击队彼此间的联系亦没有，这也是造成失败原因之一。还有一样，东北党与红军对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也是异常忽视。所以过去鲁涤平的军队在鄱阳、乐平、浮梁常常驻扎，却没见有转变到红军中来的事实。最近，十军俘虏过来的敌人士兵却反有叛变逃走的现象，这决不是偶然的。望你们立即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多派得力干部与工农群众到敌人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以破坏敌人队伍，吸引兵士到革命方面来。

（七）关于赣东北党的问题。东北党要坚决执行改造党的任务，要从下而上的实行改造，要将一切腐化分子、富农分子立即开除出党，要广大的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要毫不犹疑的引进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担任实际工作，而绝对不是空担名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创造干部。你们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政府中的工作方式，有些还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的遗留，这必须立即改正，必须以深入群众说服群众的方式代替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工作方式。东北党对于妇女工作也是一向忽视的，现在应依照中央规定的苏区妇女工作计划，去改正过去错误与建立新的工作。过去不许离婚的规定也必须废

除，应依照自愿的原则去解决。

以上这一切工作，东北党都要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去求实现。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右倾，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这正是加强右倾立场的机会主义，并且更要反对对于“左”右倾调和的错误。在反对右倾及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来检查过去的一切错误，来纠正党的路线，来巩固党，来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这必须反对右派及其他一切反党分子，企图以反立三路线的名义来破坏党，分裂党，想把党送进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去。东北党必须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执行坚决的转变，领导赣东北群众冲破敌人的“围剿”，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三一年二月十九日

附：有了这一信的指示，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信废弃不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指汪明、涂振农。
〔2〕指林育南、邱泮林。
〔3〕指胡庭铨。
〔4〕即瞿秋白。
〔5〕指唐在刚、邵式平。
〔6〕指朱德、毛泽东。

PDG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国际执委：

一、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份。”因此，国际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

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

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到现在这种空喊政治口号与厂外号召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动委员会，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而取消了青年运动；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甚至还不知道，即去冬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江苏南通淮盐、浙南、皖西、直南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

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1]同志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王稼蔷[2]、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回党阴谋以达到破坏党的目的，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如郭妙根），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如王仲一、罗章龙等）。

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当时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成熟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特别是武汉、南京的损失最大），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如武汉、香港、河南、南京等处）。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而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机会主义与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

攻坚，这样，就更加帮助富农路线在苏区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AB团、鄂西北极会、赣东北改组派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受到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自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便没有发展了，相反的，现在一三集团军及第一军都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群众与英勇的战争，曾经击破了敌人一方而得到相当发展。

三、在这里，我们要说到立三路线怎样形成及其理论的系统。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斯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

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要用脱离革命运动的兵士暴动来代替工农兵武装暴动，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

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斯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吉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四、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和报告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共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以后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

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

五、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秋白、伍豪[3]两同志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

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全会政

治决议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

六、此外，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更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已有信给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不信任，同时他在莫斯科解决学生问题时，也同样有不尊重国际指导机关的态度。三中全会时，国际代表与几个政治局同志预先商量好了的，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案的修改词句，后来也没有完全加进去，其中有关于立三错误是原则上的与中央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工作上的估量。并且，又没预先通知国际代表，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

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显明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总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

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去年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

八、去年十一月国际来信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

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

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

九、但在这里，党内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开展是有了新的气象的。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便遇到了许多下级同志因为执行立三路线不通，发生了怀疑、怠工或消极的反抗。这里边，也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显著的如当时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河南省委中代表立三路线的少数同志（童长荣同志等）与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徐兰芝、陈原道等同志）的争论——这都表示当时党内确已有了反立三主义斗争的萌芽，而打破了立三同志所认为的立三路线团结了党内一切积极干部的错误认识。相反的，在立三路线发展与统治之下，许多机会主义动摇与投机分子却能利用“左倾”的空喊混入党的指导机关，而掩盖其对于革命真实任务之执行的消极。这一现象，在立三主义破产之后，更加看得明显。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并且暴露了他在济难会工作中一切腐化，官僚主义与背叛阶级利益的行动，而被党宣布开除；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在立三主义统治时候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贺昌、晓野[4]、童长荣、吴振鹏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之最坚决的执行者，但在反立三主义与拥护四中全会的斗争中都曾发生过动摇。这证明只有国际路线，才能团结一切布尔塞维克在党

的指导机关周围，而立三路线却只能相反的给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以压迫和打击，并且给机会分子以一些可以利用为反党基础的机会。所以当着国际来信到后，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发表，党内立刻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意见在发展：一种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要求中央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任何留恋的调和态度，这种意见可以拿陈韶玉[5]、沈泽民、夏曦等同志的意见书与在各种会议中的发言为代表；一种是也站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但暗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活动，而公开的说立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甚至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意见的代表是以罗章龙为领导的全总党团、海总党团（海总党团在后来是承认了自己错误而坚决反对右派了），以王克全为领导的上海工联党团，林育南同志所领导的苏准会工作人员等等；还有一种是站在对立三路线不断调和的立场上来接受国际路线，因此，对国际路线的接受是不彻底的是不真实的，对立三路线的揭发与反对，自也不能彻底与真实了，这种意见的代表可以说是九十六号通告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一些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如贺昌等。在这三种意见的发展中，共同发出要求紧急会议的呼声。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紧急会议的召集是可以容纳更多的反立三主义的下级工作同志，并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当时中央已经完全破产，召集紧急会议是等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要求立刻推翻整个中央，主张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紧急会议；第三种意见的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方面是接受了第一种同志的提议，也主张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容纳更多的新的分子，改造中央指导机关，并发出九十六号的紧急通告，放弃了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调和主义的立场。自九十六号通告发表后，前后两种同志的意见便一致了，共同

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彻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筹备紧急会议。但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却仍然坚持立即撤换中央领导的错误主张，以进行他们分裂党的活动。关于紧急会议，后来经过国际代表的解释，经过国际对于四中全会召集的批准，中央政治局便完全了解了四中全会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紧急会议成为不必要的要求了。

十、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扩大的四中全会便于本年一月七日开过。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会议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收到了伟大成功。在会议上，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便是右派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国际路线），大多数的同意于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草案。在这报告与草案中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指斥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秋白同志所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并具体的规定了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办法。会场中的发言，有些立三主义者如贺昌、罗迈[6]等同志还承认错误不彻底或不真实。而右派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领袖的小组织，便在会场上暴露了他们分裂党的尝试，他们开始在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的前提之下，要求会议表决他们直到那时还主张的紧急会议，但为大多数所拒绝了。继之他们对于许多同志所严厉指斥的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决议案是右倾纲领，加以绝对否认，对于他们在立三主义下所做的错误，完全不实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攻击过去的中央。最后他们表示不满意国际代表最有力而正确的结论，并在选举时候，提出他们推翻整个中央的名单，等到大多数不予同意，便以退出会场、捣乱会场为要挟、为恐吓。但是不管右派如何捣乱，国际代表的结论终得到最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政治局

改造了，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7]、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十六人中十个是工人出身。这在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上，确达到了他的任务，并请求国际批准。

十一、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右派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便愈加暴露出来。本来，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这件事在锡根同志开始承认错误后才知道）。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何孟雄、王仲一领导之下遂实行对党的分裂。首先便是海总党团在陈郁同志领导之下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继着，出席四中全会一部分不满意或认识不清楚的同志十三四人在罗章龙领导之下，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人中包含有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会议中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会后，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右派的临时中央既成立，于是王克全、徐畏三、蒋云、陈资华、吴国治、刘瑞龙便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

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罗章龙的第二党更派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这一切分裂党的活动逐渐暴露，全党反右派的斗争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明显起来。在这里，中央与江苏省委首先成立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活动。当时政治局中，陈郁同志开始转向拥护四中全会方面走，徐锡根同志虽举手通过这一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保留几点，王克全则放弃表决。从此，王克全一直不服从中央任何决定，并在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敌人破获被捕三十多人后（内中也有不是右派而被地址牵连的，被捕原因是由于右派内部中有叛变分子告密，现在已被枪毙的二十三人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蔡伯真、龙大道等同志均在内），而说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因此，中央决定开审判委员会，审判他这一问题，他又两次抗议不到。先是中央开除他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停止他的活动；不听，乃开除他的党籍。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王凤飞同志则因他的行动完全与王克全一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这三个人的问题，均请求国际予以批准。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惟对于四中全会问题还没能彻底承认错误，故中央曾与远东局有一度决议，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现在并未出席政治局会。陈郁同志则转

变虽早，但承认错误（也有一次声明书）还不忠实，直到最近一次政治局会，他始说出他曾参加过右派代表团会议，罗章龙并要他做负责的，他没接受但也没反对。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并不满意于陈郁同志承认错误不彻底，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李震瀛、唐宏经到香港、满洲都遭了省委拒绝。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麟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同时，在这次与右派的斗争中，又发生立三主义者与右派联合的企图，中央为此事曾给贺昌同志一警告，并要罗迈、秋白等同志写声明书，他们均已写来。党现在正处在两条战线的坚决斗争中，尤其是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破之后，右倾的悲观、消沉、失望、怠工都一齐迸发，而要求党走向退却路线，同时这便是反党的基础。所以右派在这一时机又一度抬头。中央政治局现在在远东局直接指导之下，深深认识要彻底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及右派小组织与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则不仅理论上要加紧这一工作，尤其

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执行国际路线之彻底的转变。

十二、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艰苦，许多干部受到右派影响而动摇，使中央与各级党部在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受了很大阻碍。同时，敌人进攻革命的加紧，无论对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围剿”，或是对非苏区的白色恐怖，都使党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这一个半月中，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约有以下各点：

第一、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试做。

第二、对于全国党部方开始执行改造的工作。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委正在加紧这一工作，要使上海每一工厂作坊的支部，真正能起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而发动厂内活动与斗争。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做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现在主要的办法是重新打入生产。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都已派了省委市委的人去，执行这一转变。

第三、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

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其余赣东北、平浏、修铜、闽粤赣、七军等处，亦决定加派政治领导人去。各军政治委员已决定改换得力的工人成分或有威信有能力的同志去。党的干部及工运人才正在由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商调。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现在对各苏区的交通方开始恢复，最近一月可去苏区一百上下的干部。

第四、对于苏区工作的指示，除四中全会前有一给红军的军事训令（十二月十日）外，最近复与远东局准备好了关于苏维埃大会的五种文件：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对各个苏区的指示，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已有指示信发出，对鄂西的新的指示正在起草中。中夏[8]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一三集团军最近因反 AB 团的斗争与赣省行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央现在仅收到一部分的报告，还不能作任何最后的结论。因此，中央政治局得到远东局的同意，决定派全权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同时即成立中央局与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各苏区与红军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虽受到了一些挫折与损失，但敌人第一期“围剿”的计划却也遇到失败。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曾于一月一日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发展到四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第二集团军也发展到近万的枪支。第一军人数枪支均过万。七军也有发展。按区域说，赣东北、鄂西洪湖、闽西龙岩等根据地域是削弱了，但新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蒋介石现在

正订出第二次“剿共”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集中他们的主力，徐图红军的内变以便聚而歼之。针对着敌人“围剿”的计划，依据着我们发展的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我们能不能坚决的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来采取适当的正确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中央与远东局决定了一个给红军与各级党部的训令，通过后即将发出。

第五、关于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中央曾成立一决议，要非苏区的城市党部首先征调工人去苏区和红军中。现在这一工作仅上海才开始做，二三月份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可去。别的地方还没开始动员。在敌人军队中或后防的破坏工作，中央曾输送了六十多人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兵，有效果的尚居极少数。在工人群众中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没有切实的做。选派到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没有几个是广大群众选出来的，即有一两个是较多群众选的，也没做很好的宣传。过去苏准会的工作完全是空机关，现已改为发动群众去在各厂各乡村成立各种各式的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委员会。

第六、对于全总党团，现在已实行改组，工作人员与机关已大大缩小，中心工作要建立在发动与领导真正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要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络，要发展真正群众的赤色组织及其辅助组织，并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与工厂作坊委员会的组织。对于全总工作，中央已通过决议，并派了十个以上的得力同志给全总党团，为的派往各地去建立基本工作。关于二月二十五日失业工人运动，中央早有决议，但因各地无工作基础，恐届时不能有多大发动。三八妇女节，中央也发出决议给全党，现在有妇女工作的除苏区外，还是上海，已督促省委加紧这一工作。

第七、对于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工厂

法、工会法、大借款等等，现正在开始加紧来做。

第八、党报工作，在立三主义最盛时期虽办得很有规模，但以后迭受摧残，到现在《红旗日报》还只能日出一极小张，而且只能印一千多份，这是最大的不利。现在正计划恢复较大张的日报，并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党报的领导，以实现党报在政治上领导全党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党报现分四种：（一）《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刊物；（二）《实话》五日刊——宣传党的政策的刊物；（三）《红旗日报》——鼓动的刊物；（四）《党的建设》——党内的刊物。这四种刊物，除掉印刷困难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做工作同志没有养成读党报与写文章的工作作风，所以常因稿少不能按期出版。

第九、济难会的工作，因检查结果发现党团负责人不仅政治观念错误，并且将救济经费最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在救济在狱战士及被难家属身上，现已解散旧党团，重新成立新党团建立工作，并开除了负责同志戴晓云。

第十、中央本身工作，最近也开始在执行转变。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尽量减少，要求得人少而得力。尤其是秘密工作，现在更成为巩固中央的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的报告便暂止于此，望国际给我们以批评。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向　忠　发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李立三。
〔2〕即王稼祥。
〔3〕即瞿秋白、周恩来。
〔4〕即余泽鸿。
〔5〕即陈绍禹。
〔6〕即李维汉。
〔7〕即任弼时，刘少奇。
〔8〕即邓中夏。

PDG

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等的信

——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诸同志：

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日益剧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为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向革命运动尤其是向社会主义苏联作生死的斗争。在中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也正在红军汇合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两次进攻长沙之后，暂时终结北方的军阀战争，加紧来反对全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加紧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几月来，蒋介石调动了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围剿”苏区，南京政府拨借大批款项作为“剿共”经费，尤其是因为党在立三路线之下领导错误的结果，红军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受过暂时的失利。但一般的说来，红军英勇的战斗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是使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计划遇到了失败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的英勇行动，消灭了鲁涤平将近两师的兵力，并给新五师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第二集团军、第一军都扩大了自己的战斗力量和武

器，十六军更是转战于平浏修铜上高万载一带，牵制了敌人五六师的兵力。红军与广大工农群众这种英勇的胜利，是增加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

但是敌人决不会因此死心的！蒋介石最近又增加了十万兵力，重新规定第二次的“剿共”计划，在计划中最中心的问题是：集中兵力，徐图红军内变，以便一举而歼灭之。所以蒋介石政府现在不仅调动武力，并且调动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不仅动员后方，并且动员苏区内部反革命的力量，来进行破坏苏区与捣乱红军的阴谋。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是反革命必然要动员的力量，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而党内立三路线的领导和影响更给了AB团富农分子以莫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利用一刻不停留的去打南昌、武汉，集中一切农民武装到红军中来的立三路线之盲动冒险主义的策略，来便利他们在后方捣乱。有时他们更要夸大他们的力量来恐吓革命，故意散布谣言与污蔑，来动摇革命战线，来扰乱群众视听。真正的布尔塞维克，老练的革命党员，在这种地方便要首先稳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路线，认清自己的斗争任务，来确立行动的方针。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

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

同志们！阶级决战是你们斗争的任务！不仅在战场上要拼命的一致的与蒋介石的军队肉搏，并且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这首先便须肃清党内的立三路线。敌人越从外部来进攻，内部的阶级斗争便越发尖锐。不统一指挥，不能巩固战线；不巩固战线，不能肃清内部的反动；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战斗的任务！中央深信这一指示到达各地党部后，一切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战士，都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为着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央的决议而斗争。一切的阶级敌人，都将在革命团结的力量面前失败、死亡和消灭。

为着红军的胜利而斗争！

为着肃清 AB 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

为着冲破敌人“围剿”建立巩固根据地而斗争！

为着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而斗争！

为着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

为着统一党的领导而斗争！

中　央

一九三一、二、二十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农民动手耕的很少呢？有些固然是习惯上的原因，耕田时季素来推迟，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据我们调查还有（一）田没有分定，（二）耕牛缺乏，（三）红白交界靖匪威胁不好耕田几种原因。

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那些说农民余钱剩米归苏维埃公用的话完全是谣言。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

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希望各级苏维埃及民众团体负责同志大家明了的。实行上述办法，AB 团等反动派别或者要乘机造谣，说共产主义不成功了又要恢复地主制度。各级政府负责同志，便应根据民权革命的意义加以驳斥，说明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决不是什么恢复地主制度，那些反动派别的话，完全是错误的。

缺牛一层，第一，要提倡耕种互助，邻近乡村牛多的帮助牛少的耕田。但这种帮助，不是完全白送，除牛多人家自愿送耕不要租钱之外，应该准许租牛，只有正式准许租牛，才能相当解决缺牛问题。第二，全乡或全区缺牛太多简直不能下耕的，县区乡等级政府，应为设法调剂，鼓动牛多区乡把牛出借或出卖。在这里县区两级政府，应有全县全区牛数的调查，有了这个调查，才能实行调剂。第三，禁止杀牛。现在一边缺牛，一边各圩市尚有杀牛的，违反贫农利益，应加禁止。第四，红白两区域一般农产品与工业品流通交易，应许完全自由，没有特殊情形（如米荒时）不加禁止并不限价（红色区域内部更不限价）。但目前贩牛出口，因为红色区域缺牛太甚，影响很大，应暂时禁止。

至于红白交界，农民受靖匪威吓不敢耕田，以致荒了许多田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领导工农武装向地主武装猛力进攻，使红色区域向前发展，过去不能耕种的地方，便可以耕种了。

以上意见望讨论施行并复信给我们为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的训令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国民党军阀与站在他们后边的帝国主义强盗，虽以大量的军队向红军与苏维埃区域举行总的攻击，但现在却遭受了失败。反革命的主要兵力向江西一、三集团军进攻的，一部分是被红军消灭了（如十八师、五十师之被俘虏与新编第五师之被击溃），一部分是溃散了，因此只得暂时停战。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强盗向其他红军的进攻（如向第二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七军等），直到现在，同样没有得到什么胜利。我们的红军在到处，不仅大致能坚持主要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差不多所有的红军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武装的增加与斗争经验的充实），尤其是最近数月斗争的结果，使一、二、三集团军及第一军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便是其他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成百万的农民新队伍日渐增多的起来，与中国的反革命和帝国主

义作斗争，而农民游击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土地革命中强有力的，事实上是中国英勇红军直接的得力的助手。

红军这次胜利又重新证明出：无论已被党开除的取消派、右派的叛徒以及暗藏在党内的动摇分子，怎样来咒骂红军是土匪是流寇，但是他们始终是中国伟大革命的真正队伍，他们是与中国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他们是为实现工农群众的阶级任务而始终在一起斗争着的。

二、中国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可蔑视的力量，因此，反革命为对付这个力量，就派出比蒋阎[1]战争时还要多的军队，来实行更大规模的总的进攻。仅仅江西一省，蒋介石就派了将近二十师的兵力，至于派去镇压整个苏区的兵力，已经超过三十师，人数则超过三十万。

这次国民党以这样大的兵力向我们“进剿”，在反方面正是表现了革命发展的力量和范围。

三、国民党军阀在第一次进攻红军失败之后，又在准备向红军作第二次的进攻。国民党自觉到自己的日暮途穷，企图以最后的挣扎，来镇压苏维埃与消灭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著名刽子手——蒋介石，除了已派往前线的大量兵力外，新近又派了十万大兵到苏区去，又用了无数金钱到苏区去组织侦探与进行秘密恐怖，来组织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同时反革命又在非苏区内极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与工农革命群众，已经破产的国民党的刽子手企图用此种残杀酷刑来消灭中国革命。

四、照南京政府所定的计划，这次新的进攻的主要目标，仍旧是向着我们主要的力量一、三集团军。国民党将以二十五师的兵力来进攻我们，同时也向着第二集团军、第一军以及其他各部队进行攻击。这个“围剿”计划，预定在六个月内实行。反革命除了积极反对红军外，还要更有系统的消灭已被白

军占领的地方的所有革命的农民分子。这种非人的屠杀工作已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盛行。国民党更希望用封锁政策，来饥饿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队伍，而使他们投降于敌人。

反革命的国民党感觉到，要消灭红军与镇压苏维埃决非短时间的军事行动所能奏效，于是在新的计划中，便准备用铁血、饥饿和封锁，来消灭现在苏区内以及倾向于苏区的农民群众，来消灭工农的革命运动，来镇压苏维埃与摧毁红军。

我党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国民党刽子手这次新计划的危险性，应当有极深刻的了解。要懂得在反对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中，国民党任何的罪恶行动都可采行的。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是国民党反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是国民党整个的生死问题，同时也就是我们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因此，这次新的“围剿”将要关系于中国工农大革命向前发展的命运。

五、应当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国民党的屠杀计划是不足以惊骇我们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士群众不愿攻打红军，离营逃跑的日见增多，有去当土匪的，有下乡找工作的，有投奔到苏区去的，而整队投入红军的事亦时常发生。军阀们除了用肉刑、鞭挞、枪毙和收买（这是非常的）的办法来驱使兵士攻打苏区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并不是反革命手中可靠的工具。就是南京政府自己也是深刻的知道，也是不能在军队中树立起必须的军纪的，但是他又没有别的方法不派这些好几个月不发饷、没有纪律而又仇恨官长的士兵到战线上去。

工人与农民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并无半点信仰。反革命之所以尚能在许多工业中心城市立足的，所以尚未被革命推翻的，就是因为靠了白色恐怖的手段，无情的压迫一切群众运动（甚

至还不是革命的，而是单纯的激进改良主义的表现，也被禁止）以及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还不够。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军阀进攻的新计划，则我们不仅能坚持了已有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同时还实行了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成为这几省强有力的根据，同时更巩固了中国工农革命继续胜利的发展。要这样做，只有苏区的一切工作与非苏区的一切共产党员与革命工农的工作，真能依照国际、中央与四中全会的训令，真实的赞助红军，加紧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们中的士兵暴动（就是兵变），进行破坏与扰乱敌人后防的工作，更多的发展农民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湘鄂赣、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并且要组织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起来拥护苏区与红军。只有实行这些办法，上述的任务才能真正的实现。

现在除了承认与补充以前中央给你们的指示外，更因为国民党军阀有了进攻红军的新计划，所以又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甲、关于红军与苏区方面的

1. 在第一次军阀进攻的失败之后，敌人在江西及其他各省，多半是暂时放弃积极的进攻，而采取防御的形式（如在江西各地建筑战壕，以备在新的进攻中可以实行必要的军事动作，此外又派遣新的队伍等等）。最近斗争的发动差不多都操在红军的手中，红军应尽量利用这种优势。要击退国民党军阀的新进攻，只有各苏区红军能始终坚持自己地方的苏维埃根据地，能积极勇敢的动作，来消灭敌人活的力量（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增多自己的武装），能建立各苏区间的密切联系

（与各个红军的队伍），以便各红军间的战斗动作能够得到一致与配合。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敌人有整顿自己队伍的可能，要击破敌人的弱点，要扰乱敌人计划的实现。要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对于占优势的了解，不只是在数量上，而是与一切能够给我们在斗争中占优势的东西的配合，特别是群众动作的配合。当着进攻敌人时，要计算用强大的力量；当着敌人退却时，应进行坚决的追击，一直到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为止。但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加紧红军中的纪律与政治工作，并且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指挥的统一。当着红军必须从旧有的苏区根据地中退出时，仍应用很大的力量，保存群众组织，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去镇压反革命从中的捣乱，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前进，而继续深入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以便向外发展。

2. 要尽量在战区内扩大与指导农民游击战争，地方与红军中的党部应派遣得力干部与工人来执行这种工作。要晓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及其后方，如无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胜负的胜利的。推动成百万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进攻苏区，这就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应当使劳动群众了解，在必要时红军的退却并非失败。他们对红军最好的帮助，不是在于与红军的队伍一齐退，而是留在当地能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使他做到瓦解，如拒绝供给敌人粮食，不替敌人作向导，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隐藏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使敌人知道，为红军作侦探，并在兵士中宣传拥

护苏维埃与红军，煽动兵士倒戈，组织士兵暴动与哗变等等。这就是红军队伍临时退却时革命农民群众的任务。因为群众与红军一同进退，固然可以使敌人受到大的损失，但同时亦可使我们因供给军队与广大退却群众的给养，发生食粮不足的困难。

3. 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力量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外，还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士兵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士兵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的使用。这种工作应与红军的武装战斗不断的同时进行。国民党军队的现状、兵士群众的情绪及其不愿与红军作战的表示，再加以我们坚决勇敢而灵活的政治与组织工作，我们夺取国民党军队中兵士群众中同情是一定有保障的。

4. 苏区中党的组织及红军应灵敏的坚决的执行国际及中央在土地问题经济政策上的训令，应扩大已有的与建立未有的工会、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最高限度的加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使苏维埃和他的机关实际能表现出是在执行劳动群众的利益，使苏维埃获得这些群众的信仰。并且必须更加坚决的与地主残余和富农及其组织的 AB 团等等斗争，必须特别注意武装农民的自卫力量和少年先锋队，以作红军的后备队与直接的帮助者。应更加努力的进行在江西召集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

所有这些工作，红军应在战线上武装战斗的可能下作最努力的参加。

乙、关于非苏区党部方面的

在叙述了苏区和红军的任务之后，非苏区的任务也就明显了。他的主要任务如下：

1. 根据国际指示及四中全会与政治局的决议，党和群众的工作都应积极起来，主要的是组织和扩大职工会，在工业中心组织工人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在这一切工作中，必须求得彻底的转变。

2. 各地党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全国的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省。

3. 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兵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把国民党手中的武装夺取过来，破坏他的军队的前途，但现在的环境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敌人的兵士群众很明显的不愿同我们打仗，他们对于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一天增高一天，这是因为政治上生活上的痛苦所造成（不发饷，不给军用品，肉刑，鞭挞和枪毙等等）。直到现在，我们利用正在发展的兵士群众的不满去做工作，还是极端不够。许多地方，成群的军队兵士跑去当土匪，而没有跑到苏维埃区域去，假使不是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不足，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呢？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是目前党的主要口号之一。每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每一个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的重要，要尽力分化他们和使他们革命化起来。没有在反动军队中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帮助苏区。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就谈不到红军的重大胜利。

4. 必须立刻恢复广州、长沙、九江、南昌、武汉、萍乡、

汕头和其他大的人口多的战线区的党的组织，要晓得没有党的组织，是没有可能领导这些区内的工农革命运动的。

5. 全国各工业中心的党部应以上海为例，进行征调工人到苏区去做苏维埃和军事的工作。

中央认为，我们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如果坚决的执行上一次和这一次训令中所指出的所有任务，而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那末，反革命向苏区的新进攻不可免的要像第一次计划一样的失败。我们的运动就是更加向前发展。只有击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巩固的打成一片的湘鄂赣三省的广大的苏维埃区域，才可以造成任何反革命力量都不能击破的革命根据地。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二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PDG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一九三一年二月）

陈　绍　禹

几点必要的声明

一、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是根据我对于六月十一日决议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的发言原则（这一发言我有书面东西交中央）写的，第二部分是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及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在接到国际十一月关于立三路线来信时，我检查我所写的这一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有许多问题，我没有国际来信所说的那样深刻），不过只在小册子后面又加写一段关于“维它[1]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那一段，同时，加写了前面一个引言和后面一段组织结论。以后又开始了实际工作，所以没有工夫继续写下去，以致不能批评中央九六号通告以前及九六号通告本身错误的东西。

二、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所以文气有许多不十分衔接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

三、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

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

四、这一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个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

五、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斗争，绝未有丝毫的结束，而只不过是在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来从理论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线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小册子对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统的节目来（原来是多少次继续写的，没有目次），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

韶　玉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上午于武汉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一、这一本小册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线时所写的几篇意见书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现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二、再版书后，一方面是为的补充对立三路线各个问题底

说明，另方面，是为的阐明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

三、小册子后面附录的那几种文件，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加明了反立三路线及反罗章龙派斗争的主要内容。

四、同志们要想更详细地研究反立三路线的问题，必须想法购买苏联伯力国家出版部远东分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反立三路线》的文集。这文集里面有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致中共信，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有各种反立三路线的文章。

韶　玉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庐山

编辑部底话

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底政治决议指出："在中国，有革命形势，而且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有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近年来的发展和胜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内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密切关联着。韶玉同志底这本小册子，反映出两年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底实际内容。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

这本小册子，在国内早已出版了。可是，直到现在，国外侨居的同志们，还不是每个人都已经读过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编辑部就把我们从国内接到的一份拿来翻印，以供给我们的全体同志以及一切注意中共布尔塞维克化问题的读者。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周年纪念日）

PDG

三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两条路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书后》，所以改为现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时光荏苒，我们党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迅已将近十年。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反革命的本质。罗章龙及其亲近的信徒们，早已作了反革命的公开侦探走狗，李立三路线也全部宣告破产。同时，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的同志们，有的则已英勇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始终为革命奋斗，这便是斗争双方是非曲直的最好证明。

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本无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书，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当本书第一版时，作者曾在几点必要的声明里说："这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些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

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这一段话在小册子三版的今天，也还适用。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和空间，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所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如果我以今日的见解，来修改十年前关于具体问题的历史性的著作，则是去掉历史和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是不应当的。因此，除对个别词句作必要的注释或修正外，我对于本书现在不作任何重要的修正。

我们党进行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距今已十年了。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主要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何子述同志早已在北平监狱内痛苦而死；沈泽民（即书中所写的则名）同志早已在鄂豫皖苏区病饿而死；陈原道（即书中所写的列甫）同志早已在南京被反革命所屠杀；夏曦（即书中所写的劳侠）同志早已在红二方面军工作时英勇牺牲；殷鉴同志早已因在北平监狱中多年磨折而病死；张子之（即书中所写的戒知）同志早已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反革命奋战阵亡。当本书三版之际，抚今思昔，缅怀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殉难之各战友，无任怆然！本书之三版，或亦可作为对已故诸战友之一点纪念！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本书初版、再版时，均用“韶玉”

这一笔名，此笔名，作者开始用于一九二八年夏季作者与其他同志所译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之一书上（此书系专为我党六次大会代表看的，作者在前面曾用韶玉笔名写有序言）。其后，因秘密工作关系，作者在编《红旗报》、《劳动报》和《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上曾用过各种笔名，如：慕石、兆雨等等。王明这一笔名，系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采用的。近年来汉奸托匪分子，在许多刊物上故意发问说："为什么陈绍禹又叫王明呢?"把这说成好像"不光明"的事，企图以此来迷惑还未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能不随时改换姓名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同时是最光荣的事情。这些专门出卖革命者的血腥人头贩子，大概到现在还悻悻于怀地问我说："你原来为什么不写陈绍禹于上海，而写韶玉于武汉呢?"换句话说，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几年以前未曾捉到作者去领取那十万元至十五万元的赏格。当然，对于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说?对于这种人的言论根本没有驳斥的价值。但是当本书三版之时，作者已能用真姓名问世，为使读者明白前后署名不同的原因，故特附志于此。

陈　绍　禹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于延安

两条路线底斗争

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
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1. 引　　言

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

都有很大的成绩。在李立三路线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虽然犯过许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联合富农、改组派估计的问题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线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们深刻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组织上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则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千百万广大工农群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绩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部分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并存的。李立三路线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分的损失和打击。现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作残酷的斗争，每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立三路线的真面目，来坚决无情地反对李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来彻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取得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2. 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一、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要正确了解现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正确，就产生了现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

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以布哈林为首领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则以为“第三时期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维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认为没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决议上写下也无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计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红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说：“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并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见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简单地是继续表现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现时的经济危机”。（见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

由此，可见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认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质。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

之便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规律——不平衡规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

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立三同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列宁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中，又表现出来；可是，目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中，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程度虽然不平衡，可是资本主义之总的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还可以度其繁荣的生活，可是今日，这种形式已经不会有了，英国与美国可以有程度、速度、范围都各不相同的危机，但必定是一样地走向没落、崩溃与死亡（这些同志惯用中国革命胜利、美国还没有革命的假说，真是美国除外主义的思想）。”我们从立三同志这一大段话当中，便可明了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想昏乱、糊涂到何等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常识的地步了。第一，他以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开展着的全世界经济总危机的事实，并且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这一点，也不过还只是将来的趋势。这样，就不仅取消了第三时期的存在，并且根本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质，以至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市侩的意识。第二，他以为英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程度、速度和范

围的不同"，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以前，有另外一种趋势——不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只是到了第三时期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才和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这种"美国例外"的思想，恐怕是受了叛徒罗佛斯通的影响吧！第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表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一致'"，而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不一致"，这真是空前未闻地对于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曲解，这真是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形式底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调。实际上，"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规律"（列宁），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这一规律更加明显地有效。"目前的世界危机发展得不平衡，虽然总的方面都有危机，但是各国的危机是不平衡的。"（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危机现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质的不一致。在有些国家中（加拿大、澳洲），美国危机的影响直接引起它们的危机形式；在另些国家中（东欧、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南美各国、日本），占有广大领土的正在开始着经济衰颓；在第三种国家中（德国）——一般危机正在增长；在第四种国家中（英国），许多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慢性衰颓加剧；在第五种国家中（法国）——危机现象最初的征候已经发生，生产开始低降，裁减工人，股票跌价。"（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通过的关于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群众失业与罢工运动的决议）立三同志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所以形成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有些同志公开指

责立三同志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错误时，他更发出毫无常识和令人发噱的理论，他说："有些同志把总危机与不平衡对立起来或割离起来。"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笑话；总危机与不平衡是一桩不能分离或对立的整个肌体，如果不先见到总危机，哪里会发生总危机发展不平衡的论据来呢?！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不同，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之一，这一问题密切关联到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否首先胜利的问题，一个国家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势的真实状况问题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不正确，便不能正确的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不能正确地了解苏联的一切对内对外根本政策，不能正确的了解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各国革命间的正确相互关系。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立三同志因为对于第三时期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非列宁主义的了解，于是便不能不怀疑和反对苏联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期，特别在苏联革命胜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暂时低落的时候，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无疑义地要成为帝国主义的伙友，无产阶级的叛徒，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必然归宿。可是，在现在的第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大爆发的前夜，不把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问题，提到无产阶级的前面，而提出中国革命是否可以维持胜利的问题……这一提问题的方式，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从立三同志这一段话的内容看来，就是苏联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政策不是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不是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援助世界各国革命运动；而应当是马上“完成世界革命”。立三同志这种论点的来源是，在他看来：“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决难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见《布报》四、五合期立三的《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同时，“帝国主义世界与苏联及苏维埃的中国不能同时对立并存。”他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只看见消极的方面，仅指出“中国革命的爆发……更加促起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见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而不看到积极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减弱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见中共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便得出奇怪的结论来：“或者中国革命与苏联共同一下子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在消灭中国革命时同时也消灭了苏联。”“苏维埃的中国及苏联不能与帝国主义世界同时对立并存的。”（见立三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论文）

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应当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一定要更加影响和推动世界其它各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爆发和胜利，同样更加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便充分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以为：帝国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革命一爆发，“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等灭

亡的到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是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只有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同上《布报》论文）所以“中国革命的意义比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更要伟大得多”。（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立三同志却完全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他说：“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点是我加的——玉注），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布报》第四、五期）他只认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劣点，但他完全不认识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条件中包含的优点，例如（一）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万几万万的广大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底世界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战斗；（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军阀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三）无产阶级的年龄比民族资产阶级老，而且力量比它大；（四）无产阶级有千百万广大破产、失业、饥饿、贫穷化了的半无产阶级成分作亲密的战斗员，城乡的阶级斗争都极明显而且尖锐等等。他不相信中国国内的丰富的革命动力（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他不相信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伟大影响和力量，他不相信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

同情声援的力量；因此，他不相信，在现在国际形势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尤其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中，一方面凭借本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伟大战斗力，另方面得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暴动与骚动等帮助之下底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不仅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而且有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的实际内容，可以简括起来说明如下：在革命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便是一切，世界革命，没有什么！"在革命力量上讲："世界革命，便是一切；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前者的思想来源是孙中山式的"我大中华民族主义"，后者的思想来源是对于强有力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示畏缩、失望、投降无出路的情绪，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方面表现，其中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辩证的联系。

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地用取消主义观点来解释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公开地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成功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才有爆发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李立三机会主义者则躲藏在"左倾"的词句之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空想高调之下，来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

二　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一、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

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分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极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

三〇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来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〇年《布报》四、五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2]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把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

引起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三、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〇五到〇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〇五——〇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流）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

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对富农。"（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四、革命政权问题

列宁同志时常指出："一切革命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时常指出，革命的正确阶级定义的必要。他说："没有对于专政的了解，便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的定义。没有专政的准备，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立三同志不能了解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法（他只空喊扩大革命战争和地方暴动，但反对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和不注意创造能为这一政权支柱的红军），不能了解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发展进程上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他自己在三中全会的发言里，承认他以为"在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区域里建立临时革命中央政府，是开玩笑！"），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革命政权底正确阶级性（他所写的文章中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上，都只就地说说"建立革命政权"，但不能也不愿指出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工农民主专政），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权初步的实现；这一政府的任务有它的过去与将来两方面，即一方面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方面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不清楚"，他在三中全会发言中自己承认的。因此，他便

没有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和扩大政权的一切应有的和必需的认识、决心、勇气、能力、准备与实施。因此，他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李立三同志等以不认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作用与前途来忽视和放弃苏维埃政权。

五、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二月[3]）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便指出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执委的历次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都确切指明和确定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前途。同时，并且指出由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相当的一定的必经的阶段，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的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前途，经过一定步骤和阶段，完成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而且国际的（苏联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经济危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与国内的（A. 反帝国主义斗争；B. 不仅与封建残余和军阀制度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C. 共产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维埃形式的政权；D. 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革命新的高潮的最初几个时期，已经相当地形成起来；E. 工业农业的深刻危机，需要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

等等）各种条件，都有利于而且促进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些条件之中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具体地主要地是由自己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争取和实现，共产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阶级策略，灵活的组织方式，灵巧的工作方法和勇敢、坚决、勤奋、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毅力去启发、教育、动员、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和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立三同志始终不能明白了解决定中国革命转变前途的那些国际的（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上说："决定革命胜利以及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国内的条件（他曾经公开取消赤色工会、公开联合富农、公开主张不反对资产阶级，他忽视雇农工会，不懂组织贫农团，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等等）。他始终忽视共产党根本任务和根本政纲（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他尤其忽视和放松保障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任务（首先表现明显地，就是他忽视党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他以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主观与革命形势发展没有关系！"）。他忽视和放松了党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的领导。因此，他对于革命转变前途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他一方面说："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是不会有丝毫间隔的"，摭拾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牙秽，企图跳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必经步骤和阶段；另方面说："我们不要幻想和平的转变"，服膺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不相信可以经过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来逐渐

实行革命的转变（当然要经过极残酷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阶级斗争），以为还须再来一次武装起义推翻现在阶段革命胜利的既存政权而再去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就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转变前途。

立三同志对于上述的这一切革命根本问题，都有了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见解，都或多或少的堕入托洛茨基主义与孟塞维主义的泥坑，结果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当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长的紧急关头，完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而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

三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一、对时局的两种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于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机的具体特点，有最正确的估计，并在客观上证实了的估计。我们布尔塞维克总是尽力之所及以求忠实于这个要求，从无论哪种政策的科学根据上看来，这要求无疑地是必须遵守的。"（列宁——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远方来信》第一信）只有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阶级相互关系的状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根据事变发展的特点来正确地科学地估计时局的情势，估计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才能正确地了解与规定在革命运动的每一历史阶段上的党的具体任务和为实现这任务的具体策略。今年（一九三〇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时局的实际状况究竟是怎样呢？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剧烈和深刻的基础之上，开展和加深着全中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军阀战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崩和破裂（国民党改组派联络北方各派军阀在北平成立政府以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过去几年因为中国反

动统治的结果，中外资本拼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恶化到极度，再加以现时极深刻的农村经济危机、大批的群众失业、金贵银贱、物价腾贵（首先就是米贵、米价涨了百分之七十）的结果，使工人的工资更加低落，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简直几乎快要到了饿死的程度。战争连绵不已、交通破坏、金融紊乱、捐税加重、征发不断，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扩大和加深其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乡贫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范围与程度，成千累万的农民活活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手工业者和农村手艺工人大批的破产和失业。工农劳苦群众这样痛苦颠连的生活，使他们更加认清在现在这种统治之下没有出路的事实，使他们更加对于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改良民生等等）表示绝望，使他们不能不一天一天地革命化，使他们不能不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底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势力的打击之后已逐渐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因为厌恶军阀战争和不满意牛马生活，时常有部分哗变逃跑等事变的发生，有时也有直接投奔红军和援助工农斗争的事实发现，军阀制度的崩溃情势日益明显。革命的爆发一天一天的接近。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革命新高潮生长的过程之中，表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和弱点，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一方面表示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不能适度呼应的相互联合和汇合，南中国许多省份里的好多县的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工人、雇

农、苦力等群众，在共产党一般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已经实行起来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开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而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是一般的高涨，但在中心城市和中心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还极散漫而且薄弱，斗争性质也还未达到直接为政权而战斗的地步。另方面又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地域上的不平衡，农民战争广大发展的省份，还只限于湘、鄂、赣几省的区域，就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策源地的广东，比湘鄂赣也不免落后，福建农民战争还只停留在闽西的一部，河南、安徽、广西、四川的地方暴动还只限于边境的若干县，江苏、浙江的农民游击战争还不过是零星局部的现象，北方各省（山东、山西、直隶等）以及西北各省（陕西、甘肃、新疆）虽然广大的农民的半原始性的自发斗争时常发现（如红枪会、大刀会、回民骚动等等），但共产党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还极其微弱，以致运动的领导主要的还操在小地主、富农之手，还未真正走向革命斗争（虽然客观上有反军阀制度与反军阀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的轨道，云南、贵州的运动还一般地落后，东三省的情形与长江流域有着显著的差别。工人斗争比较发展的，也还只限于上海、天津、青岛及其他一切次要的城市（如景德镇、自流井等），就连武汉以及香港的斗争，也还零乱脆弱。共产党在全国各重要中心城市中组织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会员在全国十万人中，苏维埃区域便占去了绝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人团员的数量，绝对的减少（原来数量即比党少）。把上述这整个事实的全景综合看来，我们便可正确估计当时的时局真相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日益生长，但是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走到政治上完全破产的地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没有汇合起来，农民的革命

斗争，广大发展着的还只不过南中国几省的有些区域，整个军阀军队的兵士——尤其是主要军阀的基本部队，还未达到应有的和必须的崩溃和革命化的程度，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力量，还不能保证必须的力量，去根本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这种估计毫无疑问的是合于客观事实及事变特点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估计。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立三同志怎样估计当时的中国时局呢？“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见《布报》四、五期立三同志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革命运动发展，表面上是不平衡的实际上是平衡的。”“万事俱备，只候东风，只要在中心城市有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便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的结论）“目前全国的形势，无疑地是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形势。”（见立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案）这种估计显然地是不符客观事实，不计算阶级相互关系，不顾及每一阶段的事变的特点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估计。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讴歌中国统治阶级的稳定，根本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事实，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新高潮已经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将来”的论调，毫无疑问地都是张伯伦、汪精卫、蒋介石等的应声虫的唧唧哀鸣，根本值不得客观事实和列宁主义武器的一击。

二、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革命运动高潮是什么呢？这就表示“革命运动的继长增高”，（见斯大林同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一书中“革命运动的高潮与低潮”一段）即表示统治阶级的力量日趋削弱和崩溃，被统治阶级力量日益增长和强大。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党的策略应当怎样呢？“党的策略是进攻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总罢工、武装起义以及革命斗争等等。”（见同上一书）所以高潮是表示革命运动由开始发展到最高顶点整个时期的形势，革命形势是高潮发展的顶点，高潮在一定条件之下发展到适当的时候，要发展成为革命形势，只有在高潮发展成为革命形势的时候，武装起义才是直接行动的指令。革命形势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的说，什么是革命形势的标志呢？假如我们指出下面的三个标志，大概我们是不会错误的，即：（一）统治阶级再要形式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统治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或那种的‘上层’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与愤怒。通常革命的到来，仅仅‘下层不愿’忍受旧式的统治还不够，还要‘上层不能’按照旧式的统治而生存；（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的剧烈大非寻常可比；（三）由于上述的原因，大大地增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群众在‘和平的’时代，让人家安静地掠夺，而在风雹的时代，整个革命的环境以及‘上层’自己将他们吸引到独立的历史的事变中去。……没有这些不仅不依各种派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不依各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变动，按照一般通例，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著《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因为武装起义及起义胜利的条件是：“第一，要起义胜利，应当不凭借少数人的阴谋行动，不凭借党，而凭借先进的阶级；第二，应该凭借民众革命的高潮；第三，起义应该凭借正在滋

长的革命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即当民众先锋队伍的积极性最大时，即当敌人营垒中与柔弱的、不彻底的、不坚决的革命朋友的队伍中发生动摇最剧时。”（列宁）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是正确地了解在高潮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策略的必要前提，是正确地准备武装起义和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决条件。立三同志的论文以及以立三为领导时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上，都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成一谈，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同一范畴来相互并用（“日益逼近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当有些同志指责立三同志这种理论上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具体策略错误时，立三同志把这种严重的策略争论，曲解成“名词争论”、“翻译错误”，他的“十足”理由，便是：（一）在中国党同志的习惯上以及一般文件用法上，都是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表示武装起义形势而相互并用；（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便是“直接革命形势”。其实，这两点理由，都不过是立三同志强词夺理的遮羞之词。我们姑不引证中国党一般同志的习惯用法并未将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相互并用的各种例子来驳斥立三同志的谰言，即就立三同志自己的习惯用法来讲，也可看出立三同志这种说法的欺人自欺的愚笨可笑。例如立三同志在《布报》五期上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一文的三二、三三、三七各项上说：“工人群众罢工的高潮”、“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工人斗争的高潮”等等，难道都可以解释成“工人群众罢工的直接革命形势”、“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工人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吗？恐怕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吧?！第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不即是革命形势一节，就决议上高潮所指的意义和事实上看，便可以明白地证明并非把它即当作革命形势，例如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上

说："……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象征，如：（一）反帝运动的复兴；（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逐渐兴起……（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已可以见到……"，难道这可以解释成直接革命形势吗？难道可以说在六次大会时中国已经见到革命形势的象征吗？恐怕就连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吧?！然而立三同志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所谓名词（含有革命现状估计及策略决定严重意义的名词）混为一谈呢？在他把这两个名词合而为一的手法之下发现了些什么把戏呢？第一，他用窜改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案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了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增长的高潮（他把去年国际执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及莫洛托夫报告中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改成世界革命运动"复兴"或"浪潮"）；第二，他用涂改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特别是工人斗争的高潮（去年国际在论职工运动的信上已经指出："在中国已经有罢工运动的高潮。"）（去年一年中国罢工人数七十五万人，占世界第一位，印度第二位，五十三万一千人），在今年春季论改组派信上说："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立三同志等将这些高潮都改成"复兴"或"浪潮"，直到今年对于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案争论时，立三同志还否认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他在《红旗报》上还极力否认"高潮已经到来"以至"高潮开始到来的"事实。此外，即就文字的涵义来讲（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名词涵义，有极大的具体策略意义的，"理论"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复兴"或"浪潮"绝不能代表"高潮"的意义，"复兴"是表示已经毁灭和衰亡的事物重新还元或复活，"浪潮"有"高潮""低潮"的不同，都不能显示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真实意义；第三，他在高潮与

直接革命形势的混合及全国形势都是日益逼近革命形势的这一好听的名词之下，根本否认了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之下，革命形势有首先包括一省或数个省份的可能的事实，因而就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和不相信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立三同志等在高潮即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高潮。

三、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

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第一个革命高潮中，已经显明的呈露过。这一不平衡发展的来源，是根基于中国经济政治的背景。第一，半殖民地的中国被世界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在经济上政治上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在每个一定势力范围内，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有相当的独立性；第二，因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畸形，以致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生活，还保有极有势力的封建残余，政治上还存在着军阀制度的割据形势，以致全国还不能够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单位；因此，第三，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里，阶级的组成与力量的对比关系不能齐一的一致，以致各个区域里统治阶级的崩溃的程度与速度是不平衡的，工农群众斗争的经验、决心与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会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特点和弱点以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所以在政治决议案上说：“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

的首先胜利。”在这一次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过程中，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显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和特点。从地域上讲，新的革命高潮首先成熟的地方，大部分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地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从工农斗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工人运动比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武装斗争要落后些，就是工人斗争还没有表现于直接为争取政权而战的形式。”因此，虽然一般地看来，革命运动新高潮是大体上具有全国范围的性质，但这一高潮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展成为革命形势。革命形势可能而且难免只首先在那些条件最具备的地方（统治阶级崩溃破产的程度和速度特别剧烈，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经验、决心、勇气与力量都特别深广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例如湘鄂赣各省等）成熟起来，在那些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地域，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立三同志为领导的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们，既把高潮与革命形势混为一谈，既否认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和弱点，既躲藏在“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存在的事实，当然不能不作出：“在中国革命中，只有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问题，绝对没有巩固或维持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的策略结论，自然不能不认为“割据一省或几省来促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是极端严重的右倾错误”，是“和平割据”、“保守观念”等等。立三同志等既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特点，当然不能了解所谓中国革命首先可以在一个或几个省份胜利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究竟何在。他们不了解如果所谓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涵义，只是一省与几省首先举行武装起义，“紧接着”便是全国武装

起义，那末，根本便无所谓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了。难道俄国十月革命不最先在当时的彼得堡起义，然后才在莫斯科起义，然后才在南俄等处发生起义吗？难道法国、德国等革命一定是全国各地同时一齐举行武装起义，而没有一点先后之分吗？为什么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不提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问题呢？为什么不说法国、德国等等革命，也有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呢？因此，可见所谓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的实质，绝不仅是说革命先在某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而是讲不仅在这一省或几省可以首先爆发，而且可以首先胜利，不仅在这一省与几省可以首先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而且有可能与必要来巩固与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以便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实行真正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实现，要引起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战斗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引起全国阶级斗争的更加尖锐化和深刻化，引起全世界各阶级的震栗咒诅与兴奋同情；同时，还必须要懂得，我们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实现以后，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动员、组织与武装既经胜利区域的千百万群众，以及发动和领导反动统治区域里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各样各式的革命斗争，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建立起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彻底实行我们的革命政纲，使我们既经胜利的区域，能够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点和根据地。立三同志等把巩固既得的一省与几省的革命胜利的问题，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问题分割和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巩固既得的胜利作为革命根据地，正是将全国革命运动统一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而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最实际最重要的步骤和手段

之一；因此，便不能不作出“或者全国暴动，全国胜利，或者一处也不暴动，一处也不胜利”的“左”表右里的结论。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

四、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根据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党的任务的了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目前时局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之下，彻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在反动统治区域里，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分的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加紧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加紧去作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以争取群众中党的政治影响底斗争，加紧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加强党、团、赤色工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根

据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对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马上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里的党的任务没有丝毫的差别（六月十一政治决议案没有一点提到党在苏维埃区的任务，便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这样对党的任务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两条政治路线，两个策略，两种组织任务，两种斗争方式与方法，两种工作方法与方式。

A.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一）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地方苏维埃政权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指出：“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国际指出：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真正工、农、兵群众的代表机关，真正由群众团体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政权，真正有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而团结起来广大贫农、中农群众在周围的政权组织，“每个党部，每个党员，必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帮助雇农、苦力、工人与贫农选出精干的代表，向中农宣布要选举最勇敢、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代表。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心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民众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而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

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和苏维埃区有些党部作了些什么呢？关于在相当区域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立三同志自己承认说："他们以为在未打下武汉以前在山头上去建立中央政府，是开玩笑。"（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他们为苏维埃区发展的实际环境逼迫，勉强地指定一些代表在今年五月在一个非苏区里（!!）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虽然决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对于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依然搁下不提。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中央努力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便统一集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领导，而立三同志等还表示反对与怠工；到经过同志们三、四次严厉督促以后，立三同志等才勉强发出一号召这一大会的宣言，成立些架空的脱离群众组织的苏准会机关；对于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样的忽视和怠工，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有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不加以应有的注意。苏维埃政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处罚"、"成问题"的同志去干这些"党外"工作，以致形成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们把到苏维埃政权中工作看成"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见赣西南的报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经常有计划的执行，以致有些地方富农、地主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指使之下，不仅时常在赤色区周围内部打游击，而且阴谋组织许多名目的反革命团体（AB团——即反共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等等），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分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以致直到现在，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二）关于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问题

国际政治决议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同时，更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具体办法是：（一）改善红军的社会成分——使大部分红军兵士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贫农、中农和苦力；（二）健全红军的指导干部——首先就是坚强的工人成分；（三）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四）集中红军的军事政治的指导；（五）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将现有红军新编红军加以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改造和训练，使之成为真正政治上坚定、有强固战斗力而能担负大规模作战的"铁的"红军。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对于红军建立问题的指导与实施怎样呢？最初一个时期，完全抱着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今年苏区代表会以前，差不多各地红军苏维埃运动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觉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来发展的，直到某部分红军建立起来时，立三同志等只限于派一个或几个军事同志去当军长、师长或大队长，对于红军的其它一切建设工作，都未曾采取过正确的和积极的指示。到湘赣鄂红军有了相当庞大发展时，立三同志等由一个极端又转到另一个极端，以为红军已经是"打天下"的力量了，每天调动刚刚形成的红军去攻城掠地，唯一的指导口号是："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工作人员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讨论会上的报告与结论）至于改造红军社会成分、建立健

全领导、加强军事政治教育训练工作等等，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做过，连想都未曾想到过。以致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二三十军红军，实际上战斗力真正比较坚强的还不过朱、毛、彭、黄[4]所带领的几军。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

国际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支柱的红军，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形成与反动统治明显对立的中心，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立三同志等始终认为这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他们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的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与意义，他们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他们不懂得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正是真正准备发展和实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必需手段，他们把巩固胜利与扩大胜利的问题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政权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随着红军游击队的来去而生灭）的现象，以致形成赤色区域的广大逃难难民的现象（跟随红军“跑反”），以致国民党便于利用红军流动的机会来屠杀苏维埃区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如安徽六安、英山、霍山等几县苏维埃成立后，当时红军第一军全部开赴武汉附近游击，并且地方武装亦完全开走，国民党乘机派遣大批白军杀戮民众一万数千人），以致有些苏维埃区工农群众多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以致形成红军无目的地攻城掠地的行动，以致到一九三〇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

（四）土地农民问题的解决

国际几次关于土地农民问题的指示——尤其是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曾坚决地指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党对于这样的富农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的农民的土地上去。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立三同志等对于中国土地农民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和解决；在六次大会后的第一个时期，立三同志等曾经公开地主张联合富农，在联合富农的理论和实际受到国际指责与一部分同志抗议及江西农民反富农的事实的打击以后，二中全会上立三同志等便来一个"只反对兼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不反对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的决议，结果依然是联合富农的变相策略；当立三同志等这一理论与策略，受到一部分同志抗议及农民革命行动打击以后，立三同志等便又想出别种口号在客观上执行富农路线，他们说："变动了富农的土地，便消灭了乡村雇农，消灭了党在乡村中的阶级基础。"（立三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结论）——少有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他们反对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在当时召集的所谓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土地暂行法上，规定："分配没收来的地主

阶级的土地给农民”，而未指明应当怎样和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农民各阶层的不同办法应该怎样等等。因此，很多地方实行这种分配的结果，富农不仅不吃丝毫的亏，而且得到新的土地——因而基本农民群众有时得到很少的土地。另方面，他们又在“左”的行动之下来危害革命利益；如土地暂行法令上规定着：“不分配大私有者的土地”、“立刻实行组织共耕”、“组织集体农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过早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办法，以及“在全国革命未胜利前，不分土地给红军兵士”的错误办法——使红军不能巩固和扩大的办法。立三同志客观上执行了富农意识。至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革命胜利的联系宣传，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分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 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至于立三同志所谓中国北部的土地革命的中心内容，只是抗捐抗税，这更加明显地证明立三同志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有一贯的富农路线。总而言之，立三同志等始终企图（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中国土地革命成为少数富农的，而不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的根本问题，完全与国际采取相反的路线。

（五）雇农工会与贫农团问题

国际决议指出：“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地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任务联系着，和组织贫农团的任务联系着。”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

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以立三为领导的有些地方党的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怎样解决呢？他们以为“雇农在分配土地后完全消灭了，完全用不着组织工会”，“雇农组织工会，农民反对，所以不应当组织雇农工会”；“雇农没有知识不革命，所以用不着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组织雇农工会的富农理论，存在于有些苏维埃区域；“减低雇农及农村手艺工人的工资来解决所谓‘剪刀’问题——即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的问题——的办法”，在有些地方曾经有时实行过。苏维埃区域中，只有闽西一部分有雇农工会的组织。至于贫农团的组织，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决定作过，而且也未曾梦想过，因为他们只听见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组织过贫农委员会，所以他们正等着革命转变时再来谈贫农组织问题。他们不懂得用组织雇农工会及贫农团的办法来彻底保障土地革命的彻底实行和准备革命将来转变的条件。

（六）经济政策

国际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与适合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就是一方面要处处顾到工人和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尤其是雇农、苦力、贫农的利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另方面不采取一些过早的办法，以保障工人阶级对广大基本农民群众的联合。前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军事上绝对必要时，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必要时限制和调节一部分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燃料、盐、煤油等）底价格，反对营业者投机和怠工等；后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允许商业自由，暂时不禁止土地买卖，不实行集中供给，不一般地限制境内商业和商品物价等

等。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才可以调剂苏维埃区的人民经济生活和供应红军的需要，否则便要受到被敌人经济封锁及自己造成经济混乱的危害，因而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过去海陆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的经济政策，根本不谈；如果有同志提到，便骂人家是“保守观念”与“建设观念”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然，如果谁幻想在现有苏维埃区域里“和平地”实行苏维埃经济建设工作，而且因此忘记了革命国内战争是当前最急切的任务，自然是“土地分了，革命成功了”的不正确意识的反映；但是，苏维埃区的正确经济政策却是万分必要的东西，不仅对于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对于革命战争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当的建设工作，便不能顺利地进行革命战争。因为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没有一定的经济政策作领导，于是有些党部及苏维埃便各随所愿地作出许多时“左”时右的行动；有些地方不懂得怎样执行限制资本剥削的办法，不抽收任何累进税，作出许多离开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有些地方却又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自己造成经济的困难。

（七）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

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只有以民众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已认定了的原则。但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的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在自己的力量还未达到一定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时，有没有可能暂时地采取某些灵活策略，以避免在我们未有准备充分以前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准备反帝战斗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这种策略的主要目

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时机以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群众力量来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只以外交手腕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间的矛盾的幻想，与我们所说的上项策略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立三同志等始终不了解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他们对于苏维埃区的指导，或者是叫他们简单地避开外交谈判，或者是叫他们用些土枪土炮轰击一切外国商船、兵舰。立三同志等的策略就是或者不战而降，或者冒险奋战而死，绝不懂得怎样应用灵活策略来极力准备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作战。在立三同志看来，对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从无出路中去找出路，立三同志等就幻想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中国民众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

B. 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

（一）对于工人运动的策略

国际的决议是：“要党去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现在工人斗争，唯一方式是政治罢工与总同盟罢工，罢工口号只是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有时附带联系到某些经济要求，把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完全割离起来，以为只有“武装暴动”的口号，才能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忽视和放弃一切日常的经济斗争，空洞地规定总罢工的计划（上海四月间五次，五月间四次），在“左倾”词句之下，

宣布说中国绝对没有一点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说黄色工会已经完全破产和完全法西斯蒂化，因而实际上一般地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会员多半是流动性的；不去努力发展赤色工会，以为只要等到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马上便可以发展会员到几十万、几百万。结果使党逐渐与广大工人群众隔离，工人群众许多自发的斗争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天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跑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

（二）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在反动统治区域里现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以及一切反军阀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帝国主义等各种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但并不一定而且也不能在一切地方都要从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作起。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全国各地，无论南方北方，无论近郊僻地，游击战争与地方起义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所以地方起义是目前农民运动中的唯一的工作内容。结果便放弃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斗争的组织和领导，结果把地方起义变成完全无条件的或者完全无配合的行动，结果是或者根本发动不起来，或者少数人发动起来，被敌人很快地各个击破。

（三）对于士兵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要注意领导士兵群众的一切部分斗争，准备和造成兵变或军队参加工农武装起义的条件，准备和造成夺取、分

化敌人基本部队的工作。兵变或兵暴一定是军队的群众行动或与工农斗争配合联系的行动，不要过早地或无目的地把我们在敌人基本部队中的潜伏力量揭露出来，或消失下去。为的是在革命紧急关头时，使这些革命军队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立三同志的策略是：兵变或兵暴的条件到处完全成熟了，有三个人也“变”，五个人也“暴动”，在上海也立即举行“兵暴”，在南京也马上组织“兵暴”。结果如何呢？使我们失去了广大军队阵地，使我们在客观上自己把敌人军队中的我们的最好力量断送和消灭。

（四）对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国际指出我们“要加紧发展领导反帝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的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部应当利用它们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和示威”。立三同志对于反帝运动异常忽视，半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暴行层出不穷（如日本军队再四屠杀满洲中、韩农民，日军演习攻长春，日舰队在长江合操示威，法水兵淹死船板夫，芜湖日轮打死忻丁昌案等），立三同志等都未能领导党的地方组织去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抗议运动，党内许多积极干部对于这一点非常不满意。他们常常自动地做了许多英勇的反帝工作。最可笑的，当忻丁昌案发生时，江苏省委一声不响，各区委群向省委质问时，省委一个同志说：“国际决议来了，我们工作转变了，所以我们不作声，看你们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注意，那就证明你们还不懂工作的转变。”这真是一段十足遮羞怠工的说话，这是对于国际决议执行上的最可耻地机会主义的曲解的最好例证，这是根本不了解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政治事变应有和应尽的责任。

（五）对少数民族工作

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的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曾要中央加紧注意这一工作，并且要中央准备好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立三同志等对这一工作，不仅未作过应有的实际的设施，并且在重要决议案上都未曾作出对这问题的提案或答案，这一点充分证明“大汉族民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在立三这类同志的头脑中有极大的影响。

（六）对于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达到目前党的策略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加紧注重争取群众中之政治影响的斗争，加紧去进行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斗争，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证实他们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不过是拼命救济反革命统治的忠实走狗。立三同志在写六月十一日决议时，把改组派与取消派看成完全无分别的东西，说它们都已经完全破产；不指出取消派虽然在主要政纲上与改组派无分别，但它们打起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企图打进工人阶级内部来作资产阶级的奸细这件危险的事实；因之六月十一日决议对于那时正在组织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及胡适民权派等都一字不提。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更说“改组派是老爷，取消派是马弁”，以及取消派根本没有多大作用等等“左倾”谰言，来忽略和轻视反取消派的斗争。对改组派、取消派等，立三同志等始终没有作过系统理论的斗争，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

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产生的来源，当然主要地是由于苏区内部地主、富农的积极活动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底培植和援助；但是，如果我们在肃反工作中采取了积极正确的办法，那么，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就要缩小和减弱得多了。

（七）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党担当目前历史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注意党的主观力量的加强，首先就要使党员数量发展——尤其是工人党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线提高，党报的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党的各级指导引进新积极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加强领导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连系的工作方法，加紧发展赤色工会与青年团组织，尽可能地扩大自我批评，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等等。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怎样呢？在理论上首先就说："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只要直接革命形势到来，马上党员就可发展到几十百万"，"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有了足够担负伟大事变的力量"，于是在立三路线之下的实际表现就是：工人党员并未大量增加，有时甚至减少，借口"暴动"事忙，停止中央及许多省委训练班，对于各级干部及新加入同志，绝没有任何政治教育训练工作，《布尔塞维克》停版几个月，将《红旗》三日刊与其他报纸合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一切理论策略指导的刊物，仅有一张主要是刊登国际和上海消息的秘密日报。自中央到各级党部，对于培养和吸引新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在立三同志等从未加以真正的充分的注意。对于苏维埃区域，立三同志等固然不懂得指示他们准备任何秘密工作，以预防暂时挫折或暂时退却的事变到来，而致有些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机体遭受挫折的危害；对于反动统治区域内，立三同志等，更是一方面

不注意和不懂得秘密工作，另方面纯粹不了解利用公开可能来进行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工作，把利用与争取公开可能变成冒险盲动的行动。立三同志等从来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工作的原则，是尽量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影响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一方面我们保障与工农群众的亲切联系，另方面能够保证干部的安全。"立三同志所了解的秘密工作，不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掩护，而是脱离群众。立三同志所了解的争取公开可能，不是凭借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而是少数人的冒险。立三同志借口现在是"军事时期"，造出非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理论，完全公开地反对任何方式的自我批评（立三同志本来也就没有了解和承认自我批评的方法和意义），完全肯定和扩大了六次大会公开指责过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家长制度、惩罚主义、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等。对于同志们有任何原则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或方法上提供自己的意见或不同于指导机关的意见时，便马上加以各种捏造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取消派暗探"，甚至"反革命"等等），而加以组织上的处罚（停止工作、警告、严重警告、留党查看、开除等等）——而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的意见，尤其视若仇雠，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尤其仇视到极点。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当然是绝对需要的东西；然而这需要有领导同志或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正确，执行纪律的条件和方法合乎列宁党的原则，党员能自觉地了解和接受纪律的制度，铁的纪律才是巩固和加强党的力量底主要工具之一。共产党内全体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绝对一致，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条件；然而这首先就需要党的领导同志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坚决反对有路线不同的政治意见的斗争，才是健

全和统一党的战斗力的根本工具之一。立三同志在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前提之下，来抑制一切自我批评和滥用党的纪律，于是结果就造成许多干部及同志对于策略上工作上有许多意见而不敢公开发表，好些的沉默不言、埋头工作；坏些的消极沉闷、敷衍了事。做报告时，必定“多少要吹点牛皮”，在开会要发言时，必定先准备好“我完全同意”，使党的生活不能健全和有活气。这些不好现象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党内许多同志们的幼稚，同志们政治准备的不充分，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不够；但另方面，立三同志等所实行的家长制权威的日甚一日，确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长制度是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密切关联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领导，不能不凭借这种权威来压制党内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拥护者。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以后，立三同志等在全国成立总行委，取消了党的经常组织和工作（一切由行委解决），取消了工会的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取消了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成立了产业委员会及许多空架机关（如各级苏准会），实际上完全混乱了党与群众组织的系统，把党与非党组织完全混合（在苏准会等系统中，都公开地把党列为与各革命团体——工会、互济会等——一律的团体之一!），使党失去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使群众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作用缩小到极度，事实上不仅取消了团的与工会的组织，而且同样地差不多取消了党的组织!

尤其重要的，国际决议特别指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因为，“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要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任务，保障真正在实际上能够

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闭关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地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它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清楚地真正布尔塞维克式地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怎样呢？根本没有所谓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始终以为“‘左些’总比右些好”，“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新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的斗争”（见《布报》四、五期立三论文），因而不仅对于左倾——以“左”的词句或旗帜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倾向（如关门主义、强迫罢工、冒险盲动、某些苏区的经济上过早办法等），始终不采取任何斗争的步骤，反而尽量启发和奖励，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只是提出“右倾”这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所指出的东西，最多不过是“尾巴主义”、“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割据观念”、“例外主义”，一些零零碎碎的空泛的缺乏实际内容的论调。至于党内当时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存在的整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从经济问题起到工作方式止），虽然许多时候是用“左”倾空谈掩盖着，立三同志等自己不仅不愿和不能指责，并且反对同志们的驳斥；当七月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我和几个同志提出党内一部分同志以“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时，引起了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立三、忠发[5]等）狂热的愤怒，认为是反中央和反党的路线，“因为这些同志所说的右倾和左倾观点，都恰是中央（实际上

主要地是立三的观点——玉注）的观点”（见立三、忠发说话）——事实上这些“左”右倾观点，确是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的观点，而且暂时的在政治局内占着优势地位的观点。当然立三同志等自己不独不会和不能反对，同时还要反对和打击那些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反加说话同志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立三同志等和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办法，是共产党内不可允许的办法；他们把同志们的正确发言和意见，完全不发表；另外自己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捏造许多与别人意见完全相反的谣言。或把原则斗争解释成许多无原则的个人攻击或纠纷，混乱斗争的真相，模糊同志们对党内斗争的正确观点，结果，是阻碍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障碍了党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帮助了“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主义者在党内外的影响。

四　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

七月二十九日红军第八军及长沙近郊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这一事变，对于立三同志等简直是晴天霹雳，使他们震撼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全国武装起义形势——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因此，立三同志等虽然在中央七十号通告上，即空喊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在实际上立三同志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群众动员上，并没真正为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准备与布置；对于苏区红军并没有指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指示他们建立各地强健的苏维埃政权及各地苏维埃间的联系，并没有帮助他们强固工农红军及建立对红军的政治军事统一集中的领导。当长沙事变既经到来之后，据立三同志等估计，当时

既还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则长沙的占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不可思议的事变；所以对于长沙红军及各地红军并没有给以正确坚强的指示。在长沙占领之后，立三同志等简直不知如何办才好。在他们想来，既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红军如何会占领长沙？而红军既已占领长沙，大概全国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他们已为事变所惶惑，莫知所措，因此，在反动统治区域内，对长沙事件一声不响，立三同志等在红军占领长沙直到红军退出长沙的整个时期中（自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九日）没有发表一个决议，没有发表一个通告，没有决定采取些什么办法来帮助红军的今后行动，当胜利的红军和武装农民游击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强大武装压迫之下，不能不退出长沙城的时候，立三等又下令去再次进攻长沙。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在长沙被红军占领后，大大地讨论："什么人占领了长沙？"他们回答说"土匪"，因为他们公开地反对占领长沙的工农红军，他们帮助统治阶级摇旗呐喊。立三同志等，在长沙占领后，大大地猜想："为什么占领长沙？"他们回答说："莫明其妙。"然而在立三同志等一猜再猜之后，结果猜出其中奥妙来了，他们猜定了："我们的理论大概是不会不合乎实际吧？大概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了吧？"在这样一种懵懂幻想之下，立三同志等便决定：一方面下令集合三四五八军红军再攻长沙，同时，下命令全国重要城市——武汉、香港、广州、南京、镇江、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等，马上组织武装暴动。同时，立三同志等根据自己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便企图马上"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暴动起来进行全世界的最后阶级决战！企图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同时一致地大战起来，中国革命便可"乘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来，便

把原来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一跃而成为最冒险、最投机的“左的”盲动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左的”盲动主义的形式之下，正式形成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一贯系统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然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实际不相容，当然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公开走上反共产国际的地位；因此，当共产国际指令制止立三同志等全国武装暴动行动及指斥全世界大战的可耻空想时，立三便公开发表出反对共产国际的言论。

二次进攻长沙遭受失败，南京、上海的浦东和南市及武汉各地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利用这些机会流了我们一部分英勇同志的鲜血。如果不经国际再三严厉的抗议和制止，如果不经过党内干部在理论上实际上的反抗，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可以造成断送中国这次革命高潮的罪恶！血的教训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正确，宣告了立三同志等的政治路线的死刑。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斗争方式上、工作方法上正式暴露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最后原形！从立三同志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内占着优势时，即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时，正式开始了党的领导的危机，到此时，便形成立三路线领导的破产。

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和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

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

据上所述，可见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的产生来源，不简单地由于：（一）立三同志等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相当理论基础，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唯物辩证法也完全不懂（这点是立三同志等公开承认的）；（二）立三同志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布尔塞维克的观点来积聚经验；只是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来了解和聚积工作经验；（三）脱离群众已久，不能了解政治生活的实际；（四）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层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无穷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拼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这一部分冷意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遇到了当前紧张的革命关头，便不免被历史怒潮把他们冲激到正轨以外去！

五　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

一、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

自六月十一日决议产生，直到三中全会开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不仅在理论上完全创造出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在实际上以“左的”盲动主义的行动，几乎酿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指示来到中国后，立三同志等一方面把它们隐藏起来，不向全党公布，另方面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去命令全国武装暴动（二次进攻长沙，指定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南市、浦东等暴动，均在国际指示到后决定举行的！），到中国事变完全证明国际路线正确与立三路线领导破产的时候，才不得已来召集所谓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应有的任务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呢？三中全会应该做的是：（一）勇敢地、公开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全揭露过去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的完全破产；（二）诚恳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决议的指示[6]，根本改变中央政治局内占着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的反国际路线；（三）在政治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在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根据国际正确路线的基础，决定三中全会本身及全会后的各种工作，坚决号召与领导全党进行一个真正的路线上、策略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上的大转变，把党从反国际路线的破产了的立三路线领导中挽救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如此！

二、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第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尽量否

认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曾经有过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一口咬定国际与中央路线是完全一致（?!）；因此，第二，就拼命把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根本路线的错误和因此错误而造成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及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涨的罪恶完全抹煞，轻描淡写地说："犯了些'左倾'的个别策略错误"，以自欺欺人的手段来模糊全党同志的意识；于是，第三，便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之下来曲解国际决议，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续立三路线，因而就产生了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三中全会在血的教训和事实打击之下，同意了国际指令的某些部分，停止了全国暴动的行动，取消了总行委及各级行委的组织，承认国际指出的党目前的两方面（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方针；但因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照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

三中全会决议及全会本身工作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全会的主要领导者仍然是立三同志及赞助立三路线的维它同志等，所以三中全会的一切错误，都是要由立三、维它等同志负最主要责任的。

三、维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A. 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一）维它同志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并未表示接受最近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部决议案，——维它同志等在此次决议上，虽然因为许多原因，不便再公开采取前此立三同志对于国际来信的办法（将国际来信压下不发，先发出几号与国际来

信大约相同的通告，然后再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决议上说：国际来信恰恰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然而维它同志等决不愿诚恳依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完全接受国际决议，他把国际决议，只作为三中的参考材料。他在决议上并不如布尔塞维克党一般通例一样，在开始便写出：中共中央扩大的三次全会完全接受和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而只在决议的第二部分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这充分地表明出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绝不容许的不诚恳态度。

（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根本否认存在过立三路线——国际决议的根本内容和根本任务，便是以布尔塞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扫除以立三为首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首先确定下："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同时，坚决肯定："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变更党的路线。"而对于从六月到三中全会前在政治局内立三路线曾经占着领导地位这一点，却一字不提，这就是根本否认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存在过，这就是根本否认过去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路线，这就根本减弱了和模糊了国际决议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根本减弱了和降低了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

B. 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

（一）对于路线问题的模糊

"路线"问题，这几个字在立三同志等的玩弄中，变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东西。立三同志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

于革命全部问题，几乎完全错了，他们却还要说："路线绝对正确"。其他同志要提出任何政治问题的意见或疑问，立三同志等马上便加以"动摇中央路线"，"与中央路线不同"，"党内绝不许有两条路线存在"的严厉抵抗。究竟什么叫"路线"问题呢？立三同志等一部分负责同志可以有因人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答复。但综合起来，不外下列几种主要的意见：

第一，"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路线问题。这个路线，立三同志等与国际是绝对一致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党在这一整个革命阶段上的总的根本任务问题，对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国际不会不一致也不能不一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赞同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不是党内在某个阶段上的政治意见的分歧。

第二，"国际路线是进攻的，中央也是进攻的，所以路线是一致的。"对的，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完全没有丝毫列宁主义常识的人，才会侮蔑国际路线是"退守"的。然而仅说空洞的"进攻"两个字，是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进攻"的问题，要看如何进攻及向什么方向而来决定是否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有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也有孟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有出奇制胜的进攻，也有以头撞壁的进攻，有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进攻，也有立三同志等的盲动冒险的进攻。当然，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

第三，"国际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立三同志等也是这样说，所以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同上两种一样滑稽，在党内发生路线

不同的问题的争执，只能是如何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绝不能是根本要不要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如果谁公开说：不要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试问他还有什么资格配称作共产党员呢？

到底什么是政治路线问题呢？就是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方向与方法问题。任何阶级的任何政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战略），在这整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一定的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策略），同时，在每个阶段的总的策略路线之下，还有个别的策略问题。我们一般地讲到某个政党内部在运动某一阶段上的政治路线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对于当时时局估计及策略任务的了解问题。立三同志等与共产国际执委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虽然这一分歧远根基于对于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但主要地还是对于时局估计和策略任务了解的不同；根据对于这种估计和了解的分歧，就产生出一条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另一条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究竟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否一致呢？我们再不拿多的理论与实际来证明和解释，就拿维它同志写的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本身作解答就够了。决议第九项上说："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

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中之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的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接着在决议第十项说：“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起义前提的斗争。”无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怎样用尽全力来证明国际与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的一致，无论此处所引证的决议本身在解释国际路线及承认错误上，还带有许多不正确性及外交性，然而即就这两段东西比较看来，我们已经有十二万分地把握断定：是把两个绝对不一致而且相反的东西，强词夺理地说成一致！把这两段话详细看看，如果再去辩论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是否一致的问题，那不是有意多费唇舌，便是决心不顾真理了。

（二）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维它同志等既然在三中全会上首先确定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还是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决定的，同时，又迫切声明：“决不变更党的路线”，当然在许多主要问题中，都不能不继承立三同志的路线。

1. 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及目前世界革命运动新高涨问题，依然不了解；（乙）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

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一声不响，而且不懂得；（丙）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及中国革命与苏联相互关系方面依然只看到消极一方面，只看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而不见到另一方面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最有趣味而且最可证明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事实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这一部分决议底前一大部分文句，差不多完全是从联邦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联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底决议中抄录下来的，但抄的时候，它却只抄半段——例如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的那半段，而把另一段——说明更加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和增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困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更加革命化等等的那半段——丢掉了，以求与立三同志等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相吻合）；（丁）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正确相互关系问题，只淡淡地指出：“只有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的公开取消派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以及“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亦是非常错误的”，而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的“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却默不作声，对于中国革命有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先进国和殖民地国家爆发、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依然否认！

2. 对革命转变及前途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国际决议所指出的转变条件、转变阶段的实际步骤，以及转变前途等等问题，都一字不提；（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一声不

响；对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一省与几省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没有丝毫间隔的”的观点），只淡淡然地说道：“是不清楚的、机械的”；（丙）在决议案的第八页上，维它同志等说到“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时，简直作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毫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维它同志写道：“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哈哈！看维它同志等怎样来推想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从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不仅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不能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推翻和国民党统治的死亡；而维它同志等推想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是国民党的统治是死亡日期一天天的接近而已。难道这可以作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的解答吗?！这样的观点，是立三路线的掩蔽者的观点的发展底必然的归宿！

（三）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形势的估计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实质及原因问题，依然不了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决议第五段上，说到“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时，写了一大段，都只不过是说明革命运动发展在各个区域的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对于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却“忘记”了。这件“小事”的“忘记”或“疏忽”，结果便会产生出不加紧工人运动的危害策略。至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决议上一字不提，维它同志在结论中只说：“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而对

于不平衡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各种原因一字未提，实际上就是不了解不平衡形势的特点和弱点；（乙）对于将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混在一起的理论原则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于时局估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一字不提，依然把它们解释成“名词问题”，依然继续着过去曲解共产国际决议及党六次大会决议的错误；（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时局估计时所犯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真正实质和来源，不加正确解释，只简单地说明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估量得过分”，企图用这些所谓“名词”问题来掩饰问题本身的真相，即掩盖对于时局估计时不从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不根据客观事实等等为基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估量的真相，以及因这种估计以致产生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的策略的真相；（丁）对于立三同志等在估计时局上把“主观”与“客观”绝然对立和完全隔绝的错误（“革命形势的到来，纯粹是客观原因，与主观没有关系”的立三理论），隐瞒不提；有意地或无意地模糊全党对于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就使同志们不能了解对这问题的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

（四）对于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问题

1.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A. 土地农民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领导的所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法令上，及有些苏维埃区行动上所犯的“左”的错误，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和危害革命发展的过早办法，如：决定在现在即组织苏维埃农庄，强迫共耕，大私有经济的土地不

分配给农民，绝对禁止土地买卖，不分配土地给雇农，红军兵士在全国苏维埃政权未建立以前不能分配土地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和打击；（二）对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个帮助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口号，不加以任何的打击；（三）对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联系宣传，根本不提到；（四）对于土地革命一定要使之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少数富农的这一点，只字不提；反而公开地继续着富农路线的要求和办法，在决议上说到苏维埃区域政策里，只含糊地写一条：“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不具体指出分配什么土地和怎样分配土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立三同志等对于富农问题，始终没有一点正确的辩证法的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或者联合富农以及完全不动富农土地的富农路线政策，或者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他始终不了解：在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中，可能要反对富农，但不可能消灭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这种平均分配土地当中，经过乡村雇农工会、贫农团及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运用和指导，不仅将富农所有的多于按照一般平分原则所应得的那部分土地分配出去，并且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民、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同时，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以避免混乱现时乡村阶级斗争战线的主要内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动摇中农的情意（关于这一个问题，请

参看再版书后B部第1页)。

B. 职工运动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过去忽视甚至反对雇农工会独立组织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打击；（二）对于有些苏区里一部分同志忽视工人运动，甚至反对工人群众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任何的斥责；（三）对于国际决议特别指出的“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这一条，完全删去；他不了解“工人生活的改良，要经过工会工作及阶级斗争中来求得，而不是简单地凭借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见国际决议），他完全忘记了和忽视了现时有些苏维埃区域对于职工运动问题不能容许的情形。

C. 经济政策方面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有些地方实行的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的过早办法，如：绝对禁止贸易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二）对于军事需要及广大群众急需的物品（如煤、油、盐等）在必需时加以价格限制和由政府专卖的必要，以及对于投机怠工的工商业的处置，也未特别指明；（三）没有指出，在保障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利益之下，允许商业自由原则，而只是笼统地说“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四）将国际具体指明的，征收统一累进税及阶级税（税捐应该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的我们阶级的租税政策，改成为一般空洞的“超阶级性的”“租税政策”。

这样一来，对苏维埃区域目前的几个根本政策，都作成了与国际不同的决议；所以虽然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接受了国际指出的苏维埃区域现在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和真正工农红军的任务，但实

际上不能认真完成这些任务。

2. 对于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

A. 对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

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国际决议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总同盟罢工的方针。"（见《国际七月决议》）维它同志在写三中决议时，却依然和六月十一日决议一样的说："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党的任务是……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起义"。这两个说法在理论上在实际策略运用上，都是不相同的。国际策略是加紧领导、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同时发展政治罢工，以便真正创造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必要前提。立三、维它同志等的策略是：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为的实现这些东西，不能不附带的联系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这种策略在实际上的运用，一定依然是所谓"只要大干，不要小干"，一定依然放弃和忽视工人阶级的一切日常的经济的局部的战斗，而空喊和盲目计划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实际上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在三中全会后，马上规定和计划实现北方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太原）和四大铁路（平汉、平绥、平奉、京浦）的总同盟罢工，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依然是以空洞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的

计划，代替了实际上领导工人阶级各种日常斗争的艰苦工作。至于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将秘书所起草之号召广州起义纪念示威宣言上之“罢工、罢课、参加广州起义纪念和拥护红军示威”的口号中的“罢工、罢课”等口号取消，认为谁再提罢工、罢课等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继续，那毫无疑义地是一方面对国际路线的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另方面是对立三路线的最露骨的拥护和继续。

B. 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错误是：以为全国各地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的条件已完全一律地成熟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工作，便是马上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因而放弃和忽视了农民群众的一切局部的、日常的斗争的领导和发动。因此，国际此次决议特别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党另有特别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必须注重于推动一切后备军来帮助先锋队，但是，这里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从游击战争及地方起义做起。以后，仍然应当利用军阀之间一切部分的以及小的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逐渐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更高阶段，力争改善雇农的劳动条件，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减租与抗租，这些斗争都依然是中共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维它同志等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农民运动的错误，不加以指责，而依然只简单地提出“发动游击战争与地方暴动的任务”，不遵照国际指示来提出目前的工作主要内容和真正发动游击战争与准备地方起义的前提；以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是继续过去的错误。例如北方局领导同志在最近决议中，规定北方各省组织革命战争是目前中心任务，这毫无疑义地是直接阐发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议论。

C. 对士兵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这一问题的错误是：无条件地发动兵变（或兵暴），以少数士兵的逃溃行动代替了瓦解敌人军队和夺取广大旧有军队到革命方面来的策略，将军队哗变看成与工农斗争，甚至军队本身斗争没有联系的行动；借口士兵运动中没有进行日常的为局部经济或政治的要求的斗争的可能，以为只有或者什么不动，或者拖枪逃跑，以致使敌人便利地消灭了敌人军队中的革命力量，放弃了广大军队工作。所以，国际曾经再三地指出过去这种兵运策略的错误，指出他们根据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瓦解和夺取敌人的军队——尤其是使敌人主要部队能在革命最紧急的决定胜负的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例如进攻红军的敌人队伍投降红军，重要城市的敌人军队响应红军和工农武装起义等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的目前工作，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兵变做起，而是加紧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加强使士兵群众革命化的工作，使兵变成为广大士兵群众投奔革命民众的行动，成为工农兵武装起义的肌体的一部。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同志这一错误，未加以严厉的打击。

此外，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指示的几个重要策略问题，都几乎完全置之不顾。（一）对加强反帝运动问题——国际决议曾郑重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险，尤其是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表示畏缩的危险，要求中国党加强领导广大中国民众的各种各式的反帝运动。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几乎是日有所闻；然而立三同志等却未能抓紧一件事

变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这是极端错误底现象。维它同志等却轻易地将这件“小事”忘掉了。在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一个同志所起草的苏区工作计划上，也没有提到关于反帝运动的重要和策略，这无疑的是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没办法的错误表现。（二）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境内有几千万回、蒙、藏、苗、满、瑶等小民族，这些弱小民族，不仅同样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还受中国军阀政府的压迫和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这些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中国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及目前事实上都表现得异常明显。所以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特责令中央加紧注意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并准备具体的民族问题的政纲交第七次全国大会。国际屡次关于中国问题指示，均特别指出正确地提出中国境内弱小民族问题的策略的必要；此次来信并特别唤起中国党注意环绕中国周围的安南、朝鲜等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然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个问题依然一声不响，依然客观上表现出继续李立三同志的“我大汉民族主义”的错误。（三）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问题——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是：（甲）将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别，都一律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乙）只指出取消派与改组派在政纲上没有分别，而不指出取消派躲藏在假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旗帜下，企图从工人内部来破坏革命是更加危险；因而不能使全党对于反改组派反取消派的斗争，有异常明显的坚定的和系统的认识与办法。而维它同志等在三全文件上，却将改组派取消派等称作“企图在反革命与革命间占一席”的所谓第三派，显然继续着过去立三路线的错误。

对于这一切主要策略问题，维它同志等都作下了对立三路

线调和、投降以至继续的错误，所以使三中全会不能完成执行国际决议的任务。

（五）对于长沙事变的估量问题

红军和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大的胜利，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汇合的英勇企图，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部分开始。长沙的占领，是因为在全国革命运动一般高涨及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湖南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长沙的退出，部分地是因为立三同志领导在事前及当时没有争取和保障这一胜利的决心、准备与布置。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力量已经在相当期内准备和增强起来，另方面是由于我们轻易错过第一次长沙胜利的机会，暂时松懈了群众斗争的情绪，轻易放过了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正确与否，对于目前策略的决定，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依然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的错误：就是一方面，轻视这一事变的意义，认为长沙“第一次进占而又退出”，以及“第二次进攻不能得到胜利”，“是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一回事；（见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却又故意暗中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的正确，认为它是“进兵的斗争”——“它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第一种估计的错误，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的观点，是与过去立三路线一般轻视长沙占领事变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没有两样；第二种估计的错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为“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失败的广州起义所谓“退兵的战斗”的反面（维它同志正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右倾观点；因为所谓广州起义是退兵的战斗的意义，是指它

的失败结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高潮；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开始了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那末，就是承认在占领长沙前，中国还没有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第二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全国革命爆发的开始，却并非一省与几省革命的发展（维它同志等又恰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以为长沙占领后应该全国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的"左"倾观点：因为如果对于长沙事变撇开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而一般地提出全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的问题，无疑义地是承认在长沙占领时已经成熟了全国革命形势。至于有人以为长沙胜利的未能持久保障，恰已经是证明国际决议上所指出的："已经看见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的正确，换句话说，就是以为红军退出长沙这一事变，已经是革命新高潮部分失败退却或暂时沉寂的表现，毫无疑义地是对于国际决议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

（六）三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维它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利用国际指出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正确指示，来作掩护"左"的盲动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护符，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只轻描淡写地说成"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而把"左"的盲动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来源，解释成"只看见少数先进分子的情绪"；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以为中国经济只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应反对资产阶级，忽视农民战争的意义和作

用，忽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忽视赤色工会作用，拒绝在黄色工会内进行斗争，尾巴主义……等等），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对于某些个别领导同志在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斗争中所采取的动摇调和的态度，未加以任何的指责；对于立三同志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底罪恶行动与侮蔑国际底事实，未加以丝毫的举发和申斥；对于因立三路线的冒险策略失败后，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则将不可免地要更加引起与加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失败情绪、消极、沉闷、无出路等等）的事实，未加以严重的指出。而在三中全会上，竟补选乐迈、××[7]等同志为中央委员，乐迈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是李立三第二，是南京、镇江、上海儿戏暴动底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江、浙、皖三省工作损失的主要负责者；在组织上及工作方式上是实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反对任何自我批评的最好模范！××同志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发挥者，是执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最标本的一人。然而乐迈、××等同志，竟在三中全会上不受到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制裁，反而得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尊信；立三、维它同志等始终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方法，经常不了解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经常把党内许多原则斗争曲解或劣化成无原则的斗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最近几月来立三同志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非布尔塞维克方法将同志们正确意见书隐藏起来，反而在会议上和党报捏造一些与正确意见书完全相反的意见，妄加同志们以右倾机会主义者头衔……如对陈、王、秦、何等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意见，河南问题对列夫（即陈原道）同志处罚等，不仅不加以指责，反而继续和扩大这类错误。这些都毫不足奇，它是三中全会上维

它同志等政治错误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六 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

三中全会闭会已经两月了，就连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的组织，也还未有接到和讨论国际的决议。三中全会前，维它同志等把国际决议隐藏着不发布出去，说要候三中决议一齐发出去；三中全会后，依然不发，说要候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一并发下去；江南省委决议也出来好久了，然而国际决议依然还是停滞在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处里，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各区区委最好的不过是刚才得到国际七月政治决议；至于支部，则国际决议根本没有得到，讲到讨论国际决议和根据国际决议来真正检查过去工作和实行目前彻底的转变，是根本没有做过。上海的工作，除了不得已停止暴动及取消行委组织以外，没有任何变更；而行委取消后，成立了广暴纪念筹备会的组织。这一组织名义上已经不是党、团、工会三者合并的组织，但是实际工作，依然是为纪念而作纪念工作，脱离经常工作，脱离厂内斗争，只有上层号召，没有群众基础的架空组织。一切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依然是照旧一样。工作情形是“九一”比“八一”坏，“九七”比“九一”坏，“双十节”比“九七”坏，十月革命纪念节比双十节更差，已经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立三路线还继续在上海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占主要地位，而且继续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例如一个区委负责的同志，平时不作经常工作，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一天的晚上，才急得自己出马，拿一包传单在马路边散发，引起四、五个工人的注意和拾看；这一件事却受省委负责同志大大赞扬。因为立三路线继续发展和国际路线不能传达到一般同志及广大群众中

去的缘故，结果便发生许多同志的消极、沉闷、无出路的状况。因为他们一方面听说过去错了，但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另方面现在工作还是走不通，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好。于是一部分干部，还在那里拼命努力埋头干，总想干得好结果出来，但依然是费尽心力，得效甚少；另一部分在那里找不到正确出路，只有敷衍工作；甚至两月以来，上海同志离开工作或离开组织逃跑的，竟达数十人之多——这种对革命怠工和开小差的现象的来源，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这些分子中有些人的“半途革命家”的劣根性，另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确有一定的作用。这一些现象，不能不使每个布尔塞维克党员得到警惕，警惕到因党的立三路线领导破产而同时国际路线又被隐蔽起来不能传布到全党中去，以至延续着党的混乱的现象，警惕到怎样唤起全党来健全党的肌体。

二、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

长沙事变后，中国军阀战争已经部分地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感觉到革命势力猛进发展的威胁，于是便在张学良出兵的局面下，造成暂时休止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境况，以便反革命势力得以一致地去进攻苏维埃区域。我们只有认识进攻红军是反革命与革命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是目前政治生活中第一等重要事变，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固然不因敌人的进攻而抱消极悲观的观点，但另方面绝不能取淡然视之的乐观态度。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这是目前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危险，我们必须设法战胜这一危险，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危险。就是我们必须向苏维埃区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广大劳苦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意义，鼓动他们积极起来以无限的觉悟、勇气、决心与战斗力来回答敌人的进攻，必须遵照国际决

议，一方面在苏维埃区域，彻底执行正确的苏维埃的政策，以便用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战术（在政治上、军事上）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另方面，在反动统治区域，加紧号召、发动、组织和领导工、农、兵、贫民、少数民族的一切部分的发动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如罢工、示威、不运兵、不运械、不造枪弹打工农红军、游击战争、地方起义等等行动来捣乱敌人后方和牵制敌人的“进剿”。但是维它同志等因为根据着自己的反国际路线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又完全错误了。维它同志在起草中央第十二号通告时，分析敌人进攻红军意义说：“事实上他们进攻红军，正是‘肃清后方’以准备新的军阀混战的一种步骤，甚至于各派军阀正在共同进攻红军的时候，也有开始自相冲突的新的军阀混战的可能。”这种陈独秀的向导式的分析，陈独秀式的对于中东路的分析，不但不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警觉，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反而麻醉和模糊了群众的警觉，妨碍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和组织群众与反革命斗争。在维它同志等这种错误分析的领导之下，江南省委常委领导同志在三次常委会上，认为现时军阀内部的冲突大过红军与军阀的冲突，即是认为反革命内部的矛盾目前还大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这真是十足的非阶级的观点。在这样一种严重错误认识之下，那里会谈到真正鼓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冲破敌人对于红军的“围剿”？在反动统治区域里，我们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红军的情绪和行动，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至于苏维埃区方面，如果按照维它同志等所决定的一切苏区政策去做，则是完全仍违反国际指示而继续立三路线，当然难于战胜敌人的“围剿”。这一切都切实证明：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

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

三、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底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来信，是彻底暴露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性。维它同志等接到这一来信后，应当如何诚恳地承认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否认有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调和以至继续立三路线底错误。然而维它同志等却不这样做，维它同志等在国际这样严厉来信的逼迫之下，不能再不承认过去有一条以立三为领导的政治路线，然而他们却不诚恳承认：（一）立三路线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暂时占过领导地位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曾经在政治局里“占着优势”底路线。（二）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路线不能并存的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是“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路线”。（三）不公开承认立三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尽力掩盖错误，是非布尔塞维克态度，反而认为：“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三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见中央印发的立三发言），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员检查工作和批评错误，而是一个乡下的臭讼事在县公堂上搬弄字句的态度，他把他的政治路线错误，解释成无足轻重的错误。他拿些什么“了解机械”，“不了解今天”，“不了解过程”，“只看见前途”……等等名词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想到他这一路线错误如不公开揭发出来，对于党和革命本身有如何深沉的危害，他只顾到他自己和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所谓个人“威信”！（四）不公开承认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反而认为：“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五）不公

开承认要立刻在国际来信指导之下来接受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而坚决地说："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错误，解释成为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的反国际路线的供词，因为国际来信的根本用意，就是要求立三同志等改变自己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地代替着李立三等说话，因为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人，才说要求变更中国党的路线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是退守的路线。（六）国际来信说："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争论'（维它同志等把它改为'讨论'）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的积极党员，完全明白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际，解释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这一段话的本意是（1）立三及立三路线的一切忠实拥护者，对于立三路线错误问题，再不要固执己见地来掩护和辩论，应该无条件地向全党宣布和承认，以免引起党内的争论而致妨碍了实际工作。（2）中国党的积极党员，应该积极起来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使全体党员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而维它同志等却故意曲解国际来信这一段原文的真义，把它解释成为立三路线问题，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只限于解释工作，只要解释一下便算完事。事实上就是真正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领导同志维它等是担当不起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了解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放弃对于立三路线的拥护态度，以避免引起全党争论！（七）国际来信是给全中国党同志的，维它等同志却决定只把它发到各地方党部；以致

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部，现在还只负责同志见到，顶多也不过区委书记见到，一般同志还不晓得有这样一封信。这种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态度，怎能不引起所有布尔塞维克党员愤激和警惕！维它同志等起草的政治局这一决议，只是在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危机，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因为现在政治局的主要领导者，一部分是立三同志的忠实拥护人，另一部分（维它等）是曾讨论和同意过国际决议的人，这些人在相当时候以后，马上换一副面孔来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他们在同意国际决议后，依然布置全国各大城市的起义，还下命令二次进攻长沙。他们在三中全会上曲解国际决议来继续立三路线，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及三中全会后都拼命否认中央政治局内有过暂时地占据领导地位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国际路线。直到国际最近来信时，他们又作出这样掩护立三路线的决议，他们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这样一来，便使维它同志等领导表示出不能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底危机，因而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

3. 结　　论

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坚决断言：以立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因为对于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有了模糊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党过去的一部分领导者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陈独秀）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底影响残余，因为在六次大会后党的领导同志犯了许多个别策略的错误，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工作经验的缺

乏，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历史阶段上，便产生出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领导者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开始形成于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上，正式宣告破产于长沙事变及在全国儿戏暴动的布置上。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因立三路线而产生的党的领导的深刻危机，有引起党的危机的可能。为着尽党员对党应有的职责，为着负革命者对革命应负的使命，中共所有的积极党员，应该大家一致起来，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以预制党和革命的危机，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

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

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关于立三路线的信）印发给全党同志。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尤其是九十一号、九十二号通告——无效，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并且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4. 再 版 书 后

（或对小册子的补充）

当着这本小册子再版的时候，我想在所谓《再版书后》中说明下列的几部分问题：

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得不充分，或者说的有错误地方以及未曾说到的那些问题；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三、目前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利用相当机会来说明这几部分问题，不仅是为着要相当地满足许多留心中共两年来党内斗争的同志们底要求，而且对于我自己也是一课有益处的学习。

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

A. 补充说明的问题：小册中写得不充分的问题，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二）关于中国经济特点问题；（三）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四）关于中国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此处所说的"不充分"的意义，是说小册子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有许多不大清楚或重要遗漏的意思，而并不是说这几个问题未能从各方面发挥尽致；因为小册子在当时是为着作反立三路线的提纲而写的，为秘密环境限制及节省读者时间计，小册子中的各问题都只能限于提出问题和简明回答，从各方面把问题详细发挥，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中曾经着重反对立三同志的美英资本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前有不同的趋势（前途）的理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未曾进一层指明立三同志对这个问题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于他根本不了解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不平衡发展的了解，实际上是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了解一样的，他把"资本主义各国发展水平

的不同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状况发展底水平底不同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混淆起来”，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便走到否认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有力的事实，因此而走到完全否认在单个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离开布尔塞维克党、离开革命的道路。立三同志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企图在“第三时期”这面盾牌掩护之下，去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底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介绍给中国同志们，是一件非常必要和异常有益的事。究竟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的结论中说：

“究竟帝国主义底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本成分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这样一回事，即是世界被帝国主义各集团已经分割了，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自由的’、未曾被占据的地域，为的占据新市场与原料来源地，为的扩大它们——那就要用力量从别的国家手中去抢夺。第二，就是技术底空前发展与资本主义各国底发展水平底均衡性加强，造成了和便利了某一群国家突进式地赶上另外一群国家底可能，就是比较弱些（但是很快发展着）的那些国家能够赶上另一些原来比它们强些的那些国家底可能底事实。第三，就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间旧有势力范围底划分，每次都与世界市场上新势力关系相冲突，为的造成旧有势力范围与新的势力关系之间的‘均势’，就发生了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来定期的重分世界的必要。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便加剧和加强了。因此——在帝国主

义营垒中的冲突没有用和平办法解决的可能了。因此——考茨基所宣传的可以用和平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的超帝国主义底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反对派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加剧和加强，便走到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地步。这些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特质。”

斯大林同志对于列宁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的正确说明，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了解，才能产生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可能底坚决信心与万分勇气，才不致于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泥坑中。当然，对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当基础的同志们，仅仅看了斯大林同志这种基本扼要的说明，还难于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内容的实质，还需要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问题的研究，然后才能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明的理论基础与实际内容。然而，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去研究列宁主义，毫无疑问地是绝对正确和绝对需要的一回事。

（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异常重要而且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不仅托陈取消派、新月派以及那些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特别造出许多武断的中国经济分析（如“中国没有封建余孽存在，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托陈派）“中国土地过多，中国没有土地问题”。（胡汉民、戴季陶、陈公博、汪精卫等）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论是“海外奇谈”，（胡适之等）……）来曲解中国经济性质的特点，来企图作为自己反革命工作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常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分歧意见。我的小册子中指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指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指明封建剥削占优势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

的。但是，在我的说明中，还没有做到异常扼要和显明，而且在有些字句中或许还有使人误解或难解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把共产国际决议及斯大林同志说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明正确的分析，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异常必要的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情形问题的决议案中，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说：

“中国现在经济状况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的系统的复杂，从财政资本起到氏族社会性的经济残余止，同时，在城市和乡村中，商业资本底各种形式与小手工业及手工工业占有极大的地位。”

“中国乡村经济代表着半封建性的许多残余与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成分最密切地纠缠起来的一幅画图。”

在中国经济分析中，除了少数被帝国主义豢养的所谓学者之流的胡适等而外，对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民众以及使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但是，关于商业资本及封建余孽问题，则直到现在还是托陈派等等拿来作反革命投机事业的武器，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武断宣传还不免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某些幼稚的同志；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明，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很必要的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问题中，对这两个问题有非常明白的答复。当时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狄克同志断言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斗争，反对封建残余还没有反对资产阶级厉害是不对的？能不能说，商业资本或者封建残余在中国统制着？为什么军阀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主而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

“拉狄克同志的确说过像你们在问题中讲的那些话。据我

记得的，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发言里，或者完全否认封建余孽的存在，或者不承认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有严重的意义。这当然是拉狄克同志底很大的错误。如果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如果这些残余对于中国乡村已经没有严重的意义，那么就没有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末，就说不上了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乡村中有没有商业资本呢？是的，有的。不仅仅有的，而且它吸取农民的血汗并不比封建主们差些。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特别地混合着，它学地主一样用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方法来对付农民。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统治与商业资本在保存对农民底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压迫方法中混合着这个特点。军阀制度、督军、省长各种的和一切的现有的混蛋的、强盗式的、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官僚们，就是在这个特点上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物。帝国主义帮助这一部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有些军阀有很多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这件事并不能根本变更事实的本质。许多俄国地主在以前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的企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许多区域的农民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交付地主及绅士；如果地主操着经济方面、行政方面和法庭方面的实权；如果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省份有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就应当承认，在这种中世纪环境中占着统治力量的是封建残余的力量，地主的力量，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与商业资本特别地混合着的那种地主官僚的力量。

这些特殊条件，就造成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将来更要发展的农民底土地运动。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与封建压迫，在中国就没有土地革命的问题——关于没收土地等等的问题了。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土地革命便成为不能了解的东西了。”

斯大林同志底这一段说话，不仅把中国经济性质方面最引起争论的问题给了一个完全清楚明白和绝对正确的答复，而且把这种经济分析争论中所包含的真实政治内容底分歧，作了一个简单的答复。我们从斯大林同志这段谈话中，不仅可以了解拉狄克及与他有相同观点的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特性不懂得的错误，而且可以了解这种经济问题争论中，包含着的革命的与反动的政治实质。斯大林同志及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和结论，由中国千百万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英勇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等行动所证实，由中国好几省的一部分领土内存在和发展着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来证实。而且我们相信，还要由现在和将来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来证实。拉狄克的这种理论已经由国民党、托陈派、新月派、社民党、国家主义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所采用，他们用它来反对和嘲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百万工农英勇进行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

李立三同志等所讲的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与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所讲的根本不同。第一，李立三等不了解中国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简单地笼统地以“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等名词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无论在理论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第二，李立三同志等在所谓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这种笼统定义之下，实际上走到根本完全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畸形发展的事实，这种错误的实际政治内容，在小册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

题，对于革命运动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这一点，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除了立三路线否认这一事实外，很少引起争论，所以用不着多说。至于论到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我们的队伍中，则不免时常有不同的了解。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委的正确了解是：第一，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时常表现不一致（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上海及广州、香港工人运动异常高涨时，农民运动当时还很薄弱；当一九二七年湘、鄂、赣各省农民运动勃发时，许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等——的工人运动因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与农民运动同时并举……等等）；第二，当许多农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区域里已经勃发着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运动时，但最主要的中心城市里的工人斗争，因主客观许多原因，还未能发展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居民，参加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社会成分，最大多数是农民；而最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未曾和未能直接卷进这一运动里去。但是这绝不是说：第一，中国农民革命性比中国工人要大些；或者中国工人比起农民来要落后些；第二，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运动，只是纯粹的所谓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阶级参加和领导的。然而在我们队伍里有时有个别同志们，不免有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过分夸大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的说法；这使得我们感觉到对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

他们根据着“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是纯粹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企图来作出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底特殊革命性的理论，这理论的实质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农民革命性抬高到第一位，使无产阶级由对农民的领导地位降到农民的助手之一的地位；因此（这是必然的）便在实际上走向

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前途有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而认为前途是要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这类同志企图曲解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相互关系的说话来作为自己的特殊理论底基础。他们说：斯大林同志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底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演说），曾经说过：“民族问题从其实质上看是农民问题。”不错，这句话的确是斯大林同志说的。然而斯大林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没有农民的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见斯大林同志的同一演讲）但是，这是不是说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是合而为一的东西，或者说农民问题便包括了民族问题的全部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同一演讲中说：“不能把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合而为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农民问题以外，民族问题本身还包含有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等问题。”很明显的，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法，只是反对谢迷七不把民族问题看成实际上是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特别着重指明农民部队在民族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说法绝不能被曲解成“民族问题即农民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只是简单的农民运动等等，尤其不能解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有超过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即就中国革命本身讲，斯大林同志把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看成决定革命胜负的问题。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底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演讲中，斯大林特别讲到中国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曾特别着重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特殊革命性——超过于工人革命性的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国——无论

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农民的阶级特点底观点的正确，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两重性——劳动者与小私有者两重性；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所以它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不能有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用；因为它是劳动者，所以它有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可能；但因为它的两重性，所以它的革命性能够发挥到怎样程度，以及农民革命能得到怎样结果，首先要看那个有独立政治作用的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对农民取得领导权。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去多论世界革命运动史上的经验，只略举中国最近的历史事变，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足以创造新社会制度的独立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作领导，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终于不免陷入一般农民暴动的悲运——以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始，以“改朝换帝”继续旧社会制度终。义和团是自发的带着浓厚原始性的农民革命运动，因为当时没有独立的先进阶级作领导，结果被中国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利用，并被它们勾结与投降帝国主义一同压迫下去。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虽然是广大农民参加的运动，但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不能起来独立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结果农民群众被自由资产阶级叛卖了，没有得到革命的真实利益。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充满着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领导权，并且创造下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实际基础的历史。正因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经过自己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取得和奠定下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所以才产生了

自一九三〇年——现在正在向前蓬勃发展的苏维埃红军运动。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农民战争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中，不会产生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政权的红旗是广州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底用武装起义力量第一次举起来的。广州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我们有一切事实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现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它的领导者。举几个例说：

1. 中国苏维埃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上，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在各级苏维埃政权选举中被选额数的特权，并且公开地承认这是实际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参加和领导作用。承认以此来保证苏维埃政权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2.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唯一领袖；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组织中，中共不仅有政治上的绝对威信，而且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占领导地位。

3. 在中国主要红军部队中，工人成分（安源矿工、景德镇瓷器工人、铁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等）有时占很大的百分数。

4. 许多人以为现在苏维埃区域只是农民的区域，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手头没有最近的具体统计材料，且把一九三〇年夏季日晖同志关于一九二九年秋季赣南各地情形报告作一个参考：

（A）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分统计表。

县名	人数	成 分		
		工 人	农 民	富农及其他知识分子
兴国	350	10	50	40
雩都	270	10	60	30
安远	70	40	50	10
寻乌	300	15	60	25
信丰	120	20	60	20
南康	80	10	60	30
上犹	60	5	50	45
赣州	60	50	40	10
大庾	60	80	10	10
宁都	200	10	70	20

（以百分数计算）

（B）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赤色武装组织社会成分统计表。

县名	成分		
	工人	农 民	其他
兴国	5	70	25
雩都	5	55	40
安远	20	70	10
万泰县	10	60	30
南康	10	70	20
寻乌	5	70	25
宁都	5	70	25
崇义	10	70	20

（成分以百分数计算）

这两个表当然只能作参考材料，因为它们已经是过时的旧东西。在当时赣南各县不仅城市还未被红军占领，而且许多乡村还不是苏维埃区域。最近两年以来，我们江西、湖北、河

南、福建等红军，已经占领过许多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江西的吉安、赣州、安远、景德镇、宁都、兴国、瑞金；福建的龙岩、漳州、永定、上杭；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冈；河南的光山、潢川、固始；安徽的六安、寿县、正阳关、凤台、凤阳、霍邱……等）。在这些城市中，不仅有很大数量的手工工人、苦力、车夫等，而且还有些现代产业工人——如矿山、邮务、电话、电灯、汽车、印刷、建筑工人等等；虽然有许多城市（如赣州、吉安、漳州等）我们占领的时间不久，虽然有许多城市，我们因战略关系，早已自动退出，然而，最近两年来，工人成分在我们党与群众组织中的数量和比重，毫无疑问地相当增加了。而且即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赣南统计表看来，那种所谓现今中国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的说法，已经是毫无根据。此外，还有一个最近的统计材料，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在苏区中的领导作用。据一九三二年二月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党的省代表大会，共出席三二六人，其中有二五个工人，七五个雇农，换句话说，即无产阶级成分约占百分之三十。大会总结，选举省委员会正式三十一人，候补十一人；正式委员三十一人中，有生产工人四人，雇工及零工十七人，占全体三分之二以上。

至于苏区现有的苏维埃底政权形式和工农红军底武装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方式，革命竞赛、革命突击运动及轻骑队等等许多先进工作方法，无一不充分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在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此外，谁都晓得，中国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虽然还未能达到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底胜利，虽然他们对于苏区红军的领导和赞助，还表现得不够实际上的需要；然而他们曾经用过许多方法去加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上海、广东、武汉、长

沙、安远、景德镇、武长路、粤汉路、平汉路工人们，曾经在中共号召和组织之下，选派自己最好的干部，到苏区去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干部，曾经举行过集会、示威、募捐、成立红军友谊会等组织来拥护红军，曾经经常地不断地举行英勇的坚苦的罢工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起义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见共产国际执委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从这种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断言，现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底迅速发展和胜利，不仅是那些苏维埃区域里面工农联合及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结果，而且是苏区工农群众受中心城市工人革命斗争影响及帮助的结果。当然，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和胜利，同时又影响、推动和帮助中心城市工人的革命群众斗争底扩大和深入。只有这样去了解问题，才能正确了解中国工农斗争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了解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意义何在，才能正确了解共产国际所指示的中共在苏区与非苏区里面“两位一体的”的各种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和判断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当然，这里绝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取得和巩固了，争取、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是在非苏区的主要任务，同样是苏维埃区域中的主要任务，同时，这里也绝不是有丝毫轻视中国农民革命作用的意思，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动力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大的主力军，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这一切，只是说现在苏维埃运动，不是纯粹农民运动或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而已。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当

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如秦[8]同志等）被立三同志等停止了一切工作，我们简直没有知道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的工作情形的可能；另方面在许多苏区里，因为立三路线的工作错误的掩护，许多反革命派别还未能及时地揭露和爆发。因此，小册子中关于这个问题未能特别提出讨论，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讲到了立三路线对于苏区及红军危害时，个别地附带地说到过，未曾一般地说明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及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系的各个问题。目前利用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苏区内部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的各个根本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或者对于许多同志了解苏区内反革命派活动及怎样与之斗争等问题有多少的帮助。

我们苏维埃区域内部有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并且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一部分所谓“共产党员”与“少共团员”，这并非什么偶然的或者奇怪的事。这些反革命派别产生和活动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苏维埃区域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化和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急剧变动。在我们苏维埃区域里，进行着急进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军阀、大买办、封建官僚等）的财产被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富农的土地被重分，在重分时，只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等）得到一定数量的质量较坏的所谓“劳动分地”，在有些资本家的企业中开始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到中农贫农和雇农手里，工人群众得到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空前未有的新权利（八小时工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选举中的特殊权利；出版、言论、集会、罢工等自由），苏维埃政权带着显明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性质，一切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豪绅、富农等等的原有政治特权完全被剥夺

了，而且失去了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一切政治自由的权利。工农红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失去了武装保护自己血腥利益的权利。苏区在革命前与革命爆发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世界。这样一来，不仅把苏维埃区域内部的阶级斗争紧张剧烈到前此未有的程度，而且把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紧张剧烈化起来。苏维埃区域内部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们，那些失去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的老爷、大人们，用一切力量来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受伤了的野兽十倍地发狂些来拼命报复，被打倒了的统治阶级百倍地拼命些来挽回命运”；非苏区内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们，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在苏区里遭受的命运，更加十倍地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来痛恨工农群众，他们不惜用一切最残酷最可耻的手段，来对付苏区与非苏区的劳动群众，企图以此来消灭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和保持住自己的“财产与生命”。苏区与非苏区的压迫者剥削者们，加十倍地努力去反对在苏区统治着的工农劳动民众，这就是苏维埃内部反革命派别活动的主要来源。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们，反对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是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的。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隐蔽形式，是中国地主资本家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露骨行动。然而反革命从经验中学得了教训，就是仅仅从苏维埃区域外面来实行所谓“围剿”、“大举进攻”，是很难收到结果的。于是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们，便极力企图用一切方式组织起来，在苏区内部进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阴谋——从造谣惑众直到反革命暴动等等，来响应国民党的“围剿”；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更动员和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别，到苏区去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结合起来，以便统一和集中“剿共”行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为

的反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一切革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不仅使用一切白色恐怖手段，不仅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处设遍军警侦探机关，而且在南昌特设一个总指挥机关（由杨永泰、段锡朋等主持）专门组织和接济各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活动。这些反革命派别的名称虽然不一致——江西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湘鄂西改组派，湘东南恋爱研究社，鄂豫皖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各地的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等，他们活动的口号虽有时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AB团的口号是："红军终归靠不住的，我们大家总得想个法子，免得失败了杀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反对没收土地，实行二五减租"、"打倒第三国际，拥护第二国际"、 "拥护苏维埃，打倒共产党"……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实行二五减租"、"改组国民党"等等。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等口号是"红军是土匪"、"组织新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方法虽然因时因地而变更——例如暗杀党和红军负责领导人，造谣中伤党和红军的干部，散布红军失败的谣言，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大和"恩惠"，经过医生设法用毒药毒坏党和红军负责干部的头脑，捣乱后方，故意破坏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威信，鼓动农民"反水"，替白军当侦探、送消息，阴谋暴动响应白军……等等，但是，他们都是直接受国民党南昌总机关指挥的，他们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活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消灭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工农群众组织，使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在苏区恢复统治，预防非苏区反动统治灭亡，使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永远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使中国人都作亡国奴。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仅派遣一些侦探设法混到苏区内部的各种机关中去，苏区地主残余及富农资本家等，不仅尽量设法钻进共产

党、青年团、苏维埃、红军、工会等等组织当中去，就是原来偶然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那些“半途革命家”们，当着这种阶级斗争紧急关头，也必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悲观、失望以至投降到反革命营垒方面去；这并没有丝毫奇怪，这首先就由于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阶段的原故，有些高兴一般反帝口号和反对封建军阀口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们，在某种革命运动中，也可以混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但是当着真正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创立工农红军的时候，同时，当着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发现许多艰难、困苦和复杂条件的时候，这些“半途同道者们”便不可免的要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垒中来反对革命。斯大林同志还远在一九二六年底，在他所写的经过联共中央同意的、为宣传鼓动员用的提纲上，便指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困难；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将比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更多多少。”（着重点是我加的——韶玉注）

这类阶级异己分子和害怕革命困难的分子们，当着中国苏维埃新高潮与日俱长而同时又暴露了革命过程中许多严重困难的时候（例如对帝国主义斗争，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创造和巩固红军，实行苏区与非苏区“两位一体”的任务，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有些人便公开地投降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保护自己原来的阶级利益和另找出路，有些人虽然仍留在共产党内，却不自觉地执行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奸细作用。属于前一部分人的，在苏区内便是那些干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等勾当的假共产党员；在非苏区内便是那些干帝国主义侦探生活的顾顺章、任

卓宣、傅胜蓝、廖划平、韩麟辉、王拙夫（唐虞）等一般下流无耻的家伙；属于后一部分人的便是那些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党路线和组织反党派别的分子们。不仅罗章龙派是直接响应敌人进攻红军和共产党的产物（这一点以后我们亦说到），就是李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也是反映出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苏区反革命各派活动问题上，最容易看得明显。大家都记得：当李立三路线在苏区还占重要地位时，客观上掩护着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和发展，使反革命派别，有公开地利用当时党的口号来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可能（例如因立三路线忽视建立根据地及巩固红军任务，使反革命派别各处易于鼓惑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不相信自己胜利的情绪；反革命派直接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立刻打武汉，打到南京”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在当时一方面可使红军受到损失和失败，另方面可把苏区根据地轻易让给地主富农来“复辟”——夺回土地和屠杀工农等），因此，使许多地主残余和富农分子，都能在立三路线极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下，混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和红军中——甚至一部分地方苏维埃和地方党部团部领导机关中去，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立三路线在苏区对反革命斗争的实际，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或者发起狂来拼命大干一下——只知道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不懂得分别首从，不懂得对受反革命影响和利用的那些分子做思想上教育、说服的工作，当然，更不懂得加紧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加紧苏维埃政权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政治教育、自我批评和群众创造性……等等，是揭露和克服敌人在我们内部奸细的有效方法之一了；或者冷淡消极，什么不干——如开始时根本没有肃反的专门组织——政治保卫局等和系统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全党在国际路线的

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转变。中央为着保障和加强国际路线在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正确执行，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成立了中央一级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等），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曾经举行过全区的、全省的、全县的党和团代表大会，加强和改造了各级党与团的领导机关，改选和改造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扩大、加强和巩固了赤色工会、贫农团、反帝同盟、万国革命者救济会等群众革命组织，特别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上，巩固和扩大了我们的工农红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苏维埃区域，在最近一年半的过程中，才得到历历可数的成绩：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和巩固起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法令、建设红军提案……等等颁布和实行了，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对立形势更加明显和剧烈了；两个中国制度的斗争，成了决定中国一切政治生活底第一等事变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都被冲破了。苏维埃中国的领土扩张到原有的好几倍以上而且巩固了，许多分立的零碎的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打成一片了，工农红军的数量增加了，质量大大地改善了，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相当地增加了，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一般地正确的解决了，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在全国劳动群众的心目中的威信，不可比拟地扩大和提高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逐渐成为全中国民众日益相信的口号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各苏区的一切反革命派别都被暴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被发觉和打倒了，如江西的肃反胜利，闽西的驱逐傅柏翠事变，鄂豫皖的肃反胜利，湘鄂西肃清改组派的斗争，广东东江的破获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阴谋等等。在我们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

派别，都被广大工农群众的威力和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所压倒了。当然，反革命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将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向前加深扩大程度而更加不可避免的重新发现。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获得宝贵的斗争教训和创造了相当的战斗基础。固然，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作过许多错误，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是，在我们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在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队和工农红军忠勇奋斗的条件之下，在千百万工农劳苦民众的觉悟力、创造性、组织力和斗争决心勇气与日俱增的条件之下，一定有克服一切反革命派别组织和活动而最终地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可能的。

B. 纠正说明问题：小册子中写得有错误地方的，据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二）关于长沙事变估量问题。

（一）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在小册子中讲到土地农民问题时，根据四中全会后中央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材料，我们应当指出有两个问题写得不对的。第一问题，关于“没收富农土地”问题，小册子在批评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错误时曾说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立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擅自在共产国际政治决议上自加括弧，这是对的；因为国际政治决议原文上，的确没有这个括弧和括弧内那句话。第二，说维它同志等加这括弧的用意，是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因为立三、维它同志等，从来不仅不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公开主张联合富农；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几个月，

维它同志在中央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的指示，便是事实上最好的证明。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但同时主张富农在其土地被重分后，在不作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一部分质量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上，完全采取了共产国际及中共这些主张。这种办法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富农主要地是用半封建剥削方法去出租自己的土地来榨取大量的地租，重分富农土地的办法，在目前主要地还只是彻底肃清封建余孽底土地革命中的一种步骤；所以我们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分给富农以一定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与立三、维它同志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能够消灭富农的观点，也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小册子上说：“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段话，从现在看，有下列几点错误：第一，未能真正抓住维它同志等关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核心，维它同志等所写的“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这个口号的错误实质是：（一）未写明“没收一切地主、寺院、教堂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见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而只说没收地主土地；（二）未显明说明“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见同上决议），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及政府机关对于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什么人的问题有明确的了解，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坚决起来纠正当时在分配土地上底那些不正确企图（或者妨碍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主张把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农民所有生产工具

为原则来分配——见同上决议)。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当时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各苏区各有不同的办法，其办法有时并不与国际决议所指出者相同。第二，我所写的那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从现在正确观点看来，是那时候一种不正确的流行的口号。其实，它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口号。当然，我们每个列宁主义者都懂得：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种办法的真实意义和内容。这种办法，从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观点看，是革命的，从社会主义集中生产工具的观点看，是退步的；同时，每个列宁主义者都记得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主张，即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我们应当尽力赞助这种办法——如果这种办法由农民自己提出和要求实行的时候；但同时我们应当善意批评这种办法的缺点和不彻底性，并宣传我们的“土地国有”的主张。因此，“以平均分配为原则来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以及富农、中农、贫农原有的私有土地包括在内）的口号和办法”，并不能作为我们指导土地革命的口号，而只能是在广大农民群众都自己要求和自愿实行时，我们应当赞助的办法和口号，尤其是在中农不愿或不满意这种口号和办法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中农能够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并且在平均分配原则下得到较多较好的土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根本原则，应当是：“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的动力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雇农贫农和他们与中农的巩固联合。”（见同上决议）同时，我们不仅顾到革命的今天，而且要顾到革命的前途，我们始终是把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看作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底阶段；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在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得到决定意义胜利或完全胜利时实行土地国有的必要的宣传，同时，还须有系

统地极通俗地把苏联集体农庄化的宝贵经验，以及它对于基本农民的切身好处等作广大深入的宣传。

（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在长沙问题（红军第一次占领长沙和第二次进攻长沙）上，当时因为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党的工作，所以我们简直没有知道一点实际材料的可能。因此，小册子中所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只是根据着反对当时否认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以及我们承认有这一可能底一般理论原则来提出和解答问题；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可能来根据实际材料去估量长沙事变（特别是第一次占领长沙）是否盲动冒险。据最近我们收到的中央苏维埃区党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长沙事变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大会的政治决议中说："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险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议对于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行动。"中央苏区党的最好领导和干部，他们根据着实际经验所作出的集体结论，无疑问的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绝不因此而忽略了长沙占领的历史意义，"长沙战争正确地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见同上决议）大会决议上这一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为着使这一问题有更清楚和更周到的了解，我以为还须有一点补充的说明：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〇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主义与立三路线对这一问题的分歧，绝对不是在于：立三路线主张中国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国际路线是主张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都不占领中心城市；而是立三路线在红军力量不够，占领中心城市的其他条件也未具备的状况之

下，要红军去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结果不独不能占领，而且使红军受到不必要的牺牲；而国际路线是主张红军应当逐渐准备并把自己巩固和扩大到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战斗力，同时，准备其他一切必要的前提，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有利于红军的条件之下，才去占领重要城市。

C. 新加的几个问题：小册子中当时未曾说到，现时有必要说明的，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二）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问题。

（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四中全会都确定说："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或"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然而叛徒罗章龙等当时——直到现在却一口咬定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或者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因此，他们说："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和掩蔽立三路线罪恶"。这些叛徒们以为他们的那种说法比共产国际及中共更"左"些，所以他们更是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些。这些叛徒们在这一个"左"的词句下，企图干些什么勾当，已经是人所共知共见了。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曾采纳了李立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曾执行了李立三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是比托洛茨基主义中央和托陈取消派更坏些"——在这面盾牌掩护之下，罗章龙等不仅提出"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资格或党籍"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实行分裂和破坏中国共产党而去另行组织所谓"第二党"的行动。现在谁都明白了，叛徒们这些"左"的口号，绝没有丝毫反对或厌恶托洛茨基主义和托陈取

消派的真义，而只是在这些口号之下，来企图进行诱惑一部分落后的共产党员和团员，跟着他们一路跑到托陈取消派营垒中去。他们实际上是宣传说："看呵！中国共产党比托陈取消派更坏些，我们一路到托洛茨基队伍中去吧！"表面上挂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做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意，这就是叛徒们装腔作势的实质。这也是现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作方法的特点。

罗章龙等叛徒被驱逐出党了，但罗章龙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时在个别的共产党员中间，还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现着；而暴露这类观点的同志们，时常也是表示他们比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见解"更正确"的态度。他们同样以为不把中共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所犯的李立三路线错误看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或比它更坏的错误时，便是轻视了李立三路线的危险实质，便是袒护了立三路线。因此，把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的估计，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目前依然是很必要的事情。

为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的实质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的派别了，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斗争中的先锋队"。（见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底先锋队"呢？首先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正确的说：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例如，在我们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提纲，布尔塞维主义必然腐化等的提纲呢？这个武器是托洛茨基供给他

们的。苏联境内一切反苏维埃的集团，都引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们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腐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恢复的著名的提纲，作为自己必然要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根据，这件事实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思想上的武器，并且还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苏联的策略上的武器与组织上的武器。关于这些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接着上面一段话，就说：

“谁供给了苏联境内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苏维埃政权底公开发动的尝试呢？这个武器是企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行动，振起了资产阶级底精神，帮助资产阶级专门家的专门危害工作，这是事实。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组织上的武器，如企图建设秘密的反苏维埃机关呢？这个武器是组织反布尔塞维克的秘密派别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秘密工作，帮助了苏联内部一切反苏维埃集团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底先锋队。”

看了斯大林同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实质这段正确精彩的说话，还有没有可能来断定，曾经在短时期内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位的李立三路线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东西——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些的东西呢？不能，绝对不能！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当时所犯的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虽然在思想上有许多主要问题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但绝不能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部分同志在执行立三路线时，采纳过或应用过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上的武器和组织上的武器。当

然，李立三同志个人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采用过共产国际一切“左”右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如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另是一回事”、“等打下武汉后再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这是铁一般事实。同时，如果李立三同志个人不及时地在共产国际及全党同志威力下屈服和承认错误，如果他把他个人的反马克思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在实际上继续和发展下去，他有可能地要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估计到执行立三路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们底错误实质时，则应当根据一切事实来作判断的根据。

当我们现在讲到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时，绝不能把他的思想上的武器和策略上组织上的武器分离开来。

因此，当我们估计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时，我们正确地指出它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这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1）因为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同时，是一种盲动冒险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在估计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时说：

“内容是实际上的投降，形式是‘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冒险癖，这种形式是用来掩盖和装饰这种投降的内容——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着的那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制’，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跳进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资本主义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

根据斯大林同志这种论点去总结李立三路线的本性，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这样说：李立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李立三路线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穷困的那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长期残酷压迫剥削制度下，表示出无限的愤激、悲观和失望，在中国苏维埃革命新高涨的紧急关头，一方面眩于革命运动初步胜利的头昏，另方面对革命道路上的困难表示投降的绝望，他们希望或者“一下子”使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更加破产底痛苦和避免革命困难（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冒险盲动），如果这样没有可能，或者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在政策上的消极性和投降性）。

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底估计，正是这样的观点。国际执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上说：“……然而这个方针（指立三路线——韶玉注）虽然用‘左倾’的词句遮盖其消极，实际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主义亦是这样的。”

（2）因为李立三路线对于革命中的许多根本问题，犯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同样的观点。这些带着有托洛茨基理论观点错误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信上，有很简明正确的说明；中共中央四次扩大会议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信上所指示的原则，在自己决议上对于这一点，作了个总结的说明：“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

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有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的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观点，就是因为李立三对于许多原则问题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同。李立三同志否认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有效用，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作用，不了解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不承认中国环境的特点，不了解和忽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对革命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这些都恰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虽然曾经犯过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但他们不仅未采用而且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武器和组织武器，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当时所犯的错误，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的错误，不能把它与早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底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与中共中央这种估计，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罗章龙等直到现在还故意高呼：“中共中央是托洛茨基主义秽物”，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解散整个中共中央，开除整个中央委员党籍”的要求，与“组织新共产党”的行动的“合理”，企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四中全

会“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罪状的正确，实际上企图以此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诱惑少数落后分子到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个臭泥坑当中去，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那些主观上还愿留在共产党内，而同时到现在还坚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远的错误的同志们，以及认为这种说法是反立三路线时所应有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过火言论的同志们，却须格外当心点，却应当仔细把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些，不然，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托陈取消派的反中共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

（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四中全会前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过程，虽然一共只有七八个月时间，然而其中详细情形，绝不是很短篇幅所能说得完的。此处要说的，只是这一斗争在非苏区经过的几个最主要阶段中的几件最主要和最显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现在之所以必要说明，因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小部分同志对于这一斗争经过的情形不明了，时常在文字上和说话中，表示要晓得这一斗争经过的必要。同时，罗章龙派及托陈取消派经常用曲解和捏造事实的办法，来企图加强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地位。这些反革命分子曲解和捏造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的办法，不外下列几种：第一，托陈派可耻的武断说：“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之所以反立三路线，是因为共产国际企图在反立三路线的借口之下，将不听指挥的李立三等逐出中央领导机关之外，而代之以斯大林派的人物，所以中共内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派的阴谋手段……”第二，托陈派与罗章龙派可耻的宣传说：“反立三路线的主要人物不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现在工作的那些干部同

志，而是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叛徒与何孟雄同志等。”托陈派说：“我们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即反对中共中央路线，所以我们是反立三路线的始祖。”罗章龙派说：“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最早和最有力的是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领导的那些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拥护国际路线的英雄们。”第三，不久以前才恢复党籍，原来犯过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分子们，最近无耻的造谣说：“现在中央负领导工作的那些同志们，并未真正作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尤其是他们未曾用过同志关系的说服方法来帮助当时中共中央负责者李立三同志等改正错误，而只是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党的信到中国后，在中央会议上放一阵大炮，把李立三等赶跑了，自己占据了党的领导的位置。”这些分子们直到现在还继续散布这些可耻的捏造谣言，当然是为的要来污蔑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同志，企图以此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同志，并企图以此在中国工农群众面前来破坏共产党的威信，所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破这些分子的造谣，对于使一切中共党员和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了解这些问题的真相，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关于托陈取消派所捏造的那第一种谣言，当然已经没有辩答的价值，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实质，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路线是根本相反和不能并存的实质，现在对于任何人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至于这些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所高叫的，什么“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派把持”等等反革命论调，早已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先进无产阶级分子一致公认斯大林同志为列宁主义的最忠实、最坚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伟大事实中，暴露其反动无耻的原形了，也值不得再加任何的辩驳。关于托陈派所说的，他们是在第六次大会后，即反立三路线的问题，也是值不

得辩驳；因为现在谁也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次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占领导地位前的政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一般相合的。托陈派这种谣言的目的，是在企图证明中共自从六次大会后，即是把陈独秀机会主义和以后的盲动主义完全公开宣布死刑后，特别是把陈独秀、彭述之等逐出党的领导机关后，中共中央路线便不正确了；因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坚决进行过的反对托洛茨基派及陈独秀派的斗争，特别是把托陈派一切分子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以外去的斗争，是完全不正确的。托陈派企图在他们是“反立三路线老祖宗”这面盾牌掩护之下，来达到他们的派一部分人“回党破坏”，来达到他们“无论如何设法留在党内干”的目的，这是很显然而且是无庸争辩的事实。至于罗章龙派及托洛茨基信徒们宣传的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的许多可耻的捏造谣言，因为有些人还不了解有些问题的真相，所以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以便那一小部分还不十分了解这一问题真相的同志们，能对于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

四中全会前在非苏区反立三路线经过，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阶段：（一）立三同志论文发表后至中央政治局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发表前为第一阶段；（二）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后至三中全会前为第二阶段；（三）三中全会至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信在中国发表前为第三阶段；（四）国际来信发表后至四中全会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企图用个人谈话的建议和说服方法，预制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底阶段——在立三同志的许多主要论文散布在各期《红旗报》上和收集在《布报》第四、五合期上发表的时候，就有个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项同志的十数次谈话，与忠发同志等的几

次谈话（当时因工作环境关系，没有遇见立三同志的可能），到六月十一日决议案通过的前夜，有些同志又有与立三同志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都曾诚恳地明白地指出立三同志这些论文中的根本观点的危险，同时，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同志论文中的意见采纳到自己的决议中去。关于这一点，有立三同志自己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书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他声明书中说："（二）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正因为党有伟大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党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所以当立三路线形成之初，即遇到党内同志的反抗。这一反抗倾向的最明显最坚决的代表，便是陈、王、秦、何同志等反对六月决议案的斗争，还在六月决议案之前，我发表《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时，陈同志等已起来反对这些错误观点。"但是，这些同志预制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立三同志的论文毕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底稿。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在领导机关内进行反对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底阶段——当一部分同志听说中央政治局根据立三同志论文通过决议时，便起来找中央负责同志（立三、忠发等）谈话，忠告他们不要把这一决议宣布，要求他们通过新的正确的决议。立三同志等不仅不采纳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公开答复要同这些同志到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去作公开的斗争。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公开起来反对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有几个同志（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并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同志才受到当时立三、忠发等的异常仇视，不仅在政治上到处打击这些同志（骂他们是"右派"、是"取消派暗探"、是"小组织者"等等），而且

在组织上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来对付。关于这一切有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的中央通过的决议作证明，在中央发表的取消这些同志处罚的决议上说："在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发表之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已在中央居了领导的地位。这一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陈、秦、王、何四同志反对此种路线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陈同志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与处分，不仅是不应当，并且更抑制了党员对指导机关的正确的自我批评，与取消了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而复活了六次大会所指斥的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这正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四同志的斗争与处罚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后，曾经有一部分文化工作党团同志（如灵璧等）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同志，以及个别的区委工作同志和支部同志同情和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河南方面，八月间，有以列甫同志为领导的多数省委委员反对当时省委书记的立三路线的领导底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经过，同样有中央文件的证明。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河南争论问题的决议上说："过去中央立三路线的领导，使河南省委工作上陷入严重的错误。去年七八月间，省委以昌勇[9]同志为

代表的少数拥护立三路线的同志们，认为河南全省暴动形势已经成熟，应当争取河南的首先胜利，于是不顾客观形势，到处举行盲动冒险的行动。甚至三个人也要示威，一个同志没有的地方，也要派人去立即组织暴动。这种错误意见，当时曾受以列甫同志为代表的省委中多数同志的反抗，这些同志提出反对盲动冒险和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的任务。一般的讲来，河南省委内的争论，是多数同志们合乎国际指示的正确路线反对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底争论。不幸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依照立三路线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北方局加列甫等同志以‘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与小组织行动的罪名，取消多数省委同志们的工作……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因此在河南问题委员会上，除了对北方局关于河南问题的处置加以肯定外，并给列甫同志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中央告同志书上，又认为列甫同志是破坏党的原则的派别。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中央和北方局这一切处置都是错误的。现在除对于河南工作另有决议指示方针外，特决议取消以前一切对河南问题错误处置，取消对列甫同志的处罚，通告全党，号召河南省的全体布尔塞维克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决议）

此外，在三中全会不久以前（九月一日），发生过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议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发言和他的九月八日声明书。中央在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也曾发表过决议承认何孟雄同志的这一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并且指责了江苏省委当时加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消他的省委工作为不正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才高叫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和右派自供的一切材料，可以毫无疑问地判定下列事实：第一，何

孟雄这一反立三路线发动，不是最早的，而是在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至三中全会前最迟的一次反立三路线发动。第二，孟雄同志并不是最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代表，不幸得很，他恰是最不坚决的分子，因为他在九月三日区书联席会议上受了立三同志打击后，马上便承认了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他虽然在许多同志的帮助和催促之下，送给中央一个意见书，然而当着第二次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报告同志作报告打击他一顿时，他又公开地承认了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请求报告同志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三，根据西更[10]后来向中央的报告，知道孟雄同志当时的这一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参加这小组织会议的西更同志，因为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曾经看见过当时国际执委给中国党的许多新的纠正中央错误的指示，所以能在声明书中写出一些与国际指示相同的意见。此外，孟雄同志曾与当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谈过多次话，这更是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罗章龙派用孟雄同志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这面旗帜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企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更用不着说：孟雄同志在四中全会前后，曾离开了自己原有的比较正确的意见书的立场，而走到与罗章龙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孟雄同志对党的立场与罗章龙等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很相信，孟雄同志如果不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定会与罗章龙派分裂而回到党里来的。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由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中央、省委等）内发展到比较多些的党员群众中去的阶段——三中全会前，党内许多同志曾经风闻国际执委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政治决议（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的政治

决议及其他指示等），并且听说维它等同志已经准备召集中央全会来决定执行国际决议；因此，拥护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都希望三中全会能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的决议。然而事实与这些同志的预料相反，三中全会的领导同志们，不仅在政治上用调和态度来继续立三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加紧实行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来对付那些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把他们任何工作完全取消了（甚至连在立三路线时还保存的一部分反立三路线的同志的工作都取消了），而且连和同志们谈话都一概拒绝。这样一来，就逼得那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原来尽力希望说服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去诚恳接受国际指示底同志们，不能不走到党员群众中去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此，在三中全会决议发表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上海已经日渐包括更多的党员群众。不少的支部、区委同志，某一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及当时因事路过上海的（乃康同志等）苏区和外省的同志，都积极地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当时凯丰、仓皓、戒知等一批青年团同志及则名、劳侠等一批党的同志，给了反立三路线一个极大的帮助。当时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上海来，在各种会议上，多半要遇到反立三路线的言论；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常遇到支部同志——首先是工厂支部同志的热烈的反抗。然而因为许多特殊条件，——革命斗争的紧张，秘密环境的困难，同志们一般理论水平的不够，立三路线主要分子握住了当时党和团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领导机关，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的盛行和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的经验不够……等等条件，当时由一部分干部所领导的下层党员群众所发动起来的反立三路线的力量，还不能使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负责同志们及各主要省委（江苏、河北等）的负责人自动起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以极大限度

的非布尔塞维克的顽强性来企图作继续持久的抵抗；因此，在这一时期，使党的生活更陷入非常不经常的状态。只有在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在中国党内宣布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才动员了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和团员起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三中会议领导同志底斗争，才逼迫得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出自己原有阵地，而宣布向共产国际和全党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上，特别加重地指出说："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那些在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后高叫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先锋"和"始祖"的英雄们，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后，依然是同意立三路线的健将。试拿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几个最主要人物的发言记录中最主要点看一下，便可证明。三中全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时，罗章龙的发言上说："听了报告，看了决议，我对于整个的系统意见完全赞成。报告中严厉的提到自我批评，我也是完全同意的。……三位中央同志，尤其是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认为很好。"余非的发言上说："听了特生、少山[11]两同志报告和几个同志的发言，尤其是立三同志的发言，及看了国际材料和参加了国际的讨论，以及最近参加实际工作以来，对照那些情形，深深感觉得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是没有丝毫不同，企图将国际与中央对立，反对个人的方法，正是过去托洛茨基用的反党方法。"而西更则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中央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我对于维它同志的发言完全同意……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没有

问题的。”

把这些铁一样的材料看了以后，同志们就可以看出罗章龙叛徒等高叫罗章龙及其党徒们是“反立三路线代表”，现在中共领导干部的同志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狂吠，是如何可耻与捏造了！当然，他们这种可耻谣言，只有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上标题为《最近共产党的内幕及总崩溃的趋势》一文，以及中国境内天津《大公报》摘要登载而改标题为《国难中之共党衰落》一文等等），才能取得热烈的欢迎和转载。

第四阶段，是反立三路线斗争普及全党而同时又是真的（站在国际路线和爱护党的同志们）与假的（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上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分子们）反立三路线的阵营的公开划分的时期——在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信公开在中国党内发表后，在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尤其是九十六号通告上公开宣布立三路线错误后，立三路线之危害革命和党，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当时在党内再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反对立三路线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罗章龙、余非等才大吹大擂地活动起来，他们把反立三路线这几个字当作商标一样地向党员群众宣传，他们企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来达到在政治上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在组织上以自己的右派小组织来占据党的领导机关底目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同“左”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样。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高叫他们能够反对“左”的李立三路线，也和立三路线者大吹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曾经“坚决地实行过一条战线上（即反右倾）的斗争”底一样滑稽和愚蠢。“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方面，“什么地方有‘左’的倾

向，什么地方一定有右的倾向”（斯大林），同时，什么地方有右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左”的倾向，“左”右机会主义经常是相互掩护相互帮助和相互助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便是“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立三路线占统治时代，不仅同时还作出许多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土地问题中的错误办法，争自由运动中的幻想资产阶级当时还有革命作用等），而且事实上正掩护和培植着那些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主张和右倾派别的发荣滋长。罗章龙等的反立三路线的立场，不仅不能丝毫反对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正模糊、混淆和障碍了真正反立三路线底斗争。“左”右机会主义都同样的仇视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唯一正确路线，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观点看来，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时，便抬起头来企图将党拉向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去，这是毫不足怪的。当然，右倾分子不能不懂得：如果他们在这种党已经克服了立三路线而实行真正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底关头，公开的提出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那末，他们就必然要马上受到李立三路线一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企图躲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偷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秽物来，以便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抓得党的领导机关，然后再来实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狐狸无论如何灵巧，时常总不免要“露出尾巴”来，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无论如何尽力企图在未夺到领导机关前，暂时不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是，结果依然不能不在许多原则问题讨论中，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最初的发动，是采用许多转弯抹角的巧妙方式：他们不说他们不相信共产国际路线对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只说“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或

者“当时中央所犯的各个问题的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他们不说国际来信中所指出的政治路线与任务不能实用，只说要由他们来“树立国际路线”和“重新讨论一切问题和制定一切新的决议”；他们不说他们估计中国当时形势已经没有革命运动高潮，只说“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已经完全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的差别”；他们不说他们正在准备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只说要“推翻整个中央——开除一切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籍，撤消一切领导机关同志的工作，党内绝对民主化”；他们不说消极怠工和破坏党的工作，只说“在反立三路线的时候，不能进行实际工作，谁提出加紧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口号，谁便是妨碍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他们不说他们反对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只说反对“C. S. S. 小组织”，而却又不说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不说他们对党的发展抱悲观绝望态度，只说“反对九十六号通告上未有宣布党的危机”的扩大和深入；他们不说他们不反对右的倾向，只说“右倾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或者“至少在国际来信后，右倾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一切错误意见，开始是由个别分子在这种会议或那种会议上散布和宣布，最终，由全总一月一日党团决议把它们系统化起来，成为一些隐藏暗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当时的政治纲领。

右倾分子这些错误意见，——在上海各种会议和谈话中发现时，改组后执行国际路线的江苏省委便坚决地与这些错误倾向斗争。江苏省委当时通过的关于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决议，便是坚决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好证明——反对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的立三路线残余，同时反对当时刚才抬头的公开

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同志表示对右倾调和，对右倾有自由主义倾向，这部分同志恰是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致不愿批评别人错误倾向的人，这部分同志当时曾经公开地或暗藏地主张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调和与让步；在这些分子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错误，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重性，都不过是个别问题的“词句”或“名词”不妥当，都不过是反立三路线时不可免的或应有的“过火”言论；同时，这种思想在当时刚承认错误的政治局有些个别同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才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说反立三路线便包括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全部，对于已发现的错误倾向一字不提，不说立三路线破产而说党的危机等等）。然而当时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却深刻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看透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提出的严重性；他们坚决地指出，如果这些倾向公开发展下去，便有成为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极大可能性的来源，不仅由于提出这些问题的分子们绝大多数是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成分，而且由于一方面立三路线“左”倾词句揭穿后暴露出公开的右倾消极；另方面，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的极大可能。同时，不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便不能真正克服立三路线。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拥护国际路线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些同志的意见是缺乏布尔塞维克的党员的警惕性。

在这小册子中，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有些问题原来写得不充分和错误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秘密斗室中，简直没有可能找到比较充分的参考材料；另方面是由于我对许多问题理论上的了解还不够——尤其是当时被取消了一切实际工作，简直没有在实际中来进一步证验和了解立三路线在当时实际工作

中的错误的可能。在这个再版书后中我曾经尽我现在所见到和懂得的，企图把“不充分”的问题补充得“较充分”，“错误的”问题改正到“比较没有错误”或“少错误”。然而这个企图在实际上究竟得到了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自己是很难断定的。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理论学习中及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多的进步，以便将来写别的东西时能够避免和减少许多缺点与错误；同时，有可能再去检查一番这小册子及再版序言中有否其他缺点和错误。此外，并且希望其他读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也在口头上、书面上尽可能地帮助我指出小册子和这一书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一部分当时未曾写到的问题，在当时是还未曾感觉到有写的必要；而到现在，党内斗争的环境，党的发展的利益，党外敌人对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曲解的企图以及许多新干部新同志对最近两年来党内斗争内容的全部了解的意望的迫切……等等条件，使得我们不能不简明地谈到这些问题。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直到现在在我们党的组织内和同志中，还远没有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那样传布得宽广和深刻。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罗章龙派不仅未曾占据住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地被四中全会后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着党的先锋部队——上海党的组织，将它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毁下去和肃清出去；另方面罗章龙派当时的活动主要地域，只限于上海及北方（北平、天津、满洲的一部分）等局部区域。但是，罗章龙派反党反革命行动的残酷无耻，以及党把这反革命派别在斗争中驱逐出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知道和了解的。关于反对罗章龙派斗争的经过，中央、江苏省委、北方党部有许多文件，可以供同志们的研究和

参考的。但因为党处在秘密环境，并且这些文件多半是对于某个人、某个问题或某几部分问题的决议的关系，所以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反罗章龙派斗争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利用反立三路线的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作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简明介绍，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即是不能了解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全部，罗章龙的政治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去掉“左”倾空谈假面具后的立三路线；当然，更用不着说：不了解反罗章龙路线斗争，便不能了解中共两年来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实质和现在与将来发展的前途了。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共产国际估计中共四中全会的实质和意义说：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地指出：中共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打退了那些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路线错误及调和态度的不满意情绪，来达到反党目的的右派分裂者和取消派的进攻，同时，给了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方针和对他的调和态度坚决的打击。四中全会在使党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作了很严重的步骤，改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同时，使党开始了在全部工作转变中来实际的和真正的解决当前紧急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关于中共任务决议）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不仅在四中全会后，而且在四中全会上便实行对党作残酷无情的进攻。在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派除去坚持四中全会前全总党团一月一日决议上的政治错误，以及其他一切右倾分子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更对四中全会本身，四中全会日程、决议及领导机关更新等问题上，提出与国际和党完全相反的意见。

当四中全会宣布开会时，罗章龙、王凤飞、余非、韩连辉等，便起来反对四中全会的开会，要求立刻解散四中全会和改期召集紧急会议；当着破坏四中全会工作这一企图被国际代表和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和打击后，他们立刻反对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他们主张除了政治决议、反国民会议宣言、告红军书、告同志书、改选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议程以外，还要讨论和通过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等决议。因此，他们要求把开会时间延长到三——四天。当着他们这些提议被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后，他们马上便提出“立刻退席”的要求来威吓会场；当着他们这种非党行动受到斥责和打击后，他们便企图在夺取领导机关问题上作一最后的挣扎。当进行改选政治局成分时，他们提出一个整个的政治局名单，这名单中除去被他们诱惑的两个工人同志外，其他的完全是与中央提出和为大多数到会代表赞成的相反。他们提出的这一名单九个人当中，顾顺章、韩连辉不久便成了国民党的侦探，罗章龙等不久便成为托陈派的伙伴。此外，他们并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开除了党籍的托陈派分子王仲一，要求恢复其党籍和中央委员资格。他们的名单和提议，当然被大多数否决了，大多数代表一致通过了由中央提出来的新政治局成分。在他们夺取领导机关的企图失败以后，罗章龙信徒——四中全会后不久即成为国民党公开侦探的袁乃祥，便拍案咆哮，企图给警察侦探以破获的机会！叛徒的这种可耻的罪恶的企图，当然立刻被到会大多数代表们的镇静力镇慑下去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四中全会，在极短时间内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完成了自己各方面应有的任务。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罗章龙派的反党阴谋（在政治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代替共产国际的路

线，在组织上以右派小组织的领袖占据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四中全会上受到严重打击后，他们便马上公开地实行反对四中全会底小组织活动。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第一个理由是：他们原来要求召集的是紧急会议。同志们都知道，在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中——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当时特别提出请求国际召集全党紧急会议的口号。当时提出这要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占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不愿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用调和态度拥护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请求国际采用紧急迅速的办法来纠正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以便迅速执行摆在目前的紧急任务。这一要求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未发出以前——特别是四中全会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和范围内是正确的。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前，对于这一口号还是很冷淡的。只有在四中全会上受到失败后，他们才把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已经放弃，但是原来在党员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影响的这个召集紧急会议的口号，大叫起来，企图在这个口号之下来达到他们反党的目的。

共产国际执委根据着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是异常合乎当时政治上、组织上、工作环境需要上的要求的。这些理由，同志们在附录中《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于中共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上，可以完全看到的。

罗章龙派反对四中全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未能解决它应有的任务。罗章龙派这种意见底根据的第一点，就是四中全会只通过了政治决议、告红军书、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未有讨论和通过其他问题（土地、农民、职工、组织、军事……等）的决议。同志们现在都知道：罗章龙派这种意见的真相，并不是真正为的要通过

新的决议来解决这些任务，而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些问题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通过的那些决议。四中全会认为共产国际的那些决议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依然完全有效，因为当时的革命情况及党的任务与国际决议指示的没有不同。因此，党对这些决议的任务，是在于在实际工作中来执行它们和实现它们，而不是另外再通过些与它们不同或相同的决议；具体执行和实现这些决议的指示和办法，不仅没有在四中全会短时间内做到的可能，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全党组织的经常工作。罗章龙派则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新高涨已经过去，所以国际执委的一九三〇年七月那些决议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必须照他们的退却路线来通过一切问题的新决议。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二点，就是四中全会决议依然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四中全会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同志们现在都知道：四中全会决议不仅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完全破产，不仅宣布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的绝对错误，而且最严厉批评了六月十一日以后至四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各种主要文件上的严重错误，并且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实际恶果，作了一个正确的总结。当然，四中全会在这些主要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采纳罗章龙派的提议，因为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提议中，包含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私货。例如：第一，在对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和九十六号通告的估计问题上，他们企图造成“党的危机越过越扩大加深”的理论；他们的立场是，三中全会决议比六月十一日决议更坏，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通告比三中全会决议更坏，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比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更坏，四中全会比起三中全会来是“更可耻的、更背叛阶级利益的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走狗同一作用”的会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越过越坏，党是向崩溃的道

路发展下去。”党能不能采纳右派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据四中全会估计，中共自国际七月决议——特别是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后，换句话说，就是在立三路线逐渐宣告破产后，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未能迅速地转变到国际路线，同时，虽然在转变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和经过许多困难，虽然领导同志这种迟缓和困难转变的错误，妨害和延缓了国际指示的执行，同时就是妨碍和延缓了革命任务的正确解决；但以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来，党在立三路线破产的过程中和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中，是表现出党日益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党的健全化的程度如何，首先要看党在克服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和执行国际路线底程度如何来决定。坚决不移地执行国际路线，是保障党日益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有力保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日益向前崩溃”的理论，就是他们分裂党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的理论根据。第二，在估计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上，他们企图贩进“革命新高涨已经完结”的理论；他们的论断是：“立三路线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中国革命，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和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了任何群众的基础，工人运动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了。”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必须把对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和对于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这两种估计分别开来；如果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本身包含的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实质，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断定，立三路线实质上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没有好坏的差别；而且从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讲，立三路线正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到当时还没有肃清的机

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底新表现。立三路线如果不受到党内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双方面的、及时的、坚决的打击和纠正，毫无疑问地它可以而且必不可免地要对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同样程度的危害。但是，当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已经造成的结果时，换句话说，即是估计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几个月执行立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时，更确切点些说，就是估计到革命领导错误对于革命主观和客观力量造成的结果时，我们就不能不很郑重地很实际地来考察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只有根据这种估计才能得出对时局估计和党的任务的正确结论。因此，四中全会决议一方面正确地指出立三路线执行期间对于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一切严重恶果；另方面正式向全党宣布它“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完全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换句话说，即是完全同意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决议及十一月来信对于中国时局估计及党的任务的指示。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和中国革命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的理论，就是他们离开党，反对苏维埃和红军（骂红军是土匪，说苏维埃没有前途等），反对一切罢工示威，反对工人政治斗争等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纲的思想基础。第三，在估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形成前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工作情形问题上，罗章龙派企图偷运来托陈取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底私货。他们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或者“因为中央犯有个别严重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甚至“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共六次大会的路线就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那些因为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们（陈独秀、彭述之、王仲一等），都应当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

来”。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如果党采纳了他们这种提议，就是替那些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员们底回党破坏阴谋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四中全会决议很正确地一方面指示“六次大会以来的党的成绩，因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大部分已经消灭了”，另方面却坚决肯定“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为止，中央虽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的成绩”。四中全会深切地懂得：任何方式地对于国际路线正确性的动摇和对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的掩护，都有加以严重打击的必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中共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的理论，就是他们与托陈取消派公开合并起来的思想武器。第四，在估计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错误实质问题上，他们企图大贩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他们的立场是：“执行立三路线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道路还远些，比陈独秀领导更坏些”；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应当整个解散和开除出党。”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党很清楚地知道：罗章龙派这种说法是托陈派自命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谩骂诬蔑“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叛徒”的改头换面的把戏，是他们很久以来企图达到解散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以造成党的混乱和解体的阴谋的另一方式，党不能不给这些可耻的分子以严重的打击。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这种“中共不如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就是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高叫共产党必然崩溃，实行加入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武器。

党不仅不采纳罗章龙派这些反党的提议，而且四中全会给

了他们这些提议以致命的打击，四中全会坚决的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使用了十足的火力。因此，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在政治上是比立三路线更坏的东西”，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三点是：“四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完全是与立三路线调和的，完全没有解决它应有的任务。”他们这种论点的根据是：第一，四中全会的到会代表成分，最大多数依然是立三路线的主要分子，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我们要说明的——连罗章龙派当时也同意的，就是怎样了解和决定“立三路线分子”的问题。如果说“凡是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党员，都是立三路线分子”，那末，我们可以说，当时全党党员中，除去在立三路线时代害病或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参加党的任何工作的极端少数同志外，其他的全党党员都是曾经在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执行工作的。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上，每个下级党部和个别党员虽然对上级指示有不同意时有提出意见以至抗议的权利，但是在问题未解决前还须执行上级决议的。立三路线在几个月内曾经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内占领导地位的路线，所以如果要从这种意义上讲，那么，不仅当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未曾反抗过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是立三主义者，就是那些虽然自始至终坚决抗议，但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根据中央决议还进行了多少的党的工作的同志们，也都是立三主义者了。这种论断显然是不合乎事实和有害于党的，这种论断显然是对于全党同志的侮蔑。因此，在四中全会前和四中全会上，党即曾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认为应负立三路线主要责任的立三主义者，除立三同志个人外，只有当时积极赞助他的路线而且负党的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同志。即是当时政治局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加上江南省委书记、北方

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等几个同志。这当然不是说，除他们几个同志外，其他负比较主要工作的同志们，都不负一点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而只是说他们几个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他们几个人在当时可以而且应当被称为立三主义者。根据党这种正确了解的观点来考察问题，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四中全会到会代表成分是一般的令人满意的。到会代表三十九人中，只有七人是上述那种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其余的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立三路线的干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干部、各主要群众团体的党团负责同志、北方工人干部、少共中央代表、支部同志等。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七个人所以必须到会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及最主要的省委内一部分主要的负责人，需要他们来报告工作和发言，同时正因为他们是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要他们在四中全会上向共产国际及全党公开宣布和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第二，罗章龙派说："四中全会上政治局的改造，完全是不正确的，政治局被'C. S. S. 派'的小组织中人包办了"，在四中全会后的头几天，罗章龙派拼命高叫反对 C. S. S. 小组织，但不说明这小组织的内容，所以弄得有些人莫明其妙。过了几天之后，他们自己把假面具完全揭穿了，他们公开说："C. S. S. 在英文就是 China Stalins Section 的缩写，在中文就是中国斯大林派，斯大林派不独在中国有，而且在德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内都有小组织，斯大林特别指定一些人来包办中国革命和垄断中国党，陈某等就是 C. S. S. 派的人物。""反对斯大林派"——这是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用惯了而为觉悟的无产阶级恨极了的口号，这是一切反共产国际、反各国共产党、反共产主义的分子们无耻的宣传。整个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先进工人群众用一致地热烈地承认和拥护"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挥者，斯大林同志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宣言，答复了这些“左”右叛徒的阴谋诡计。这些托陈取消派的伙伴们，高叫“反对斯大林派”的口号，当然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斯大林的学生，这是很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斯大林的学生，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组织上不正确的主要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们痛恨立三主义的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最厌恶真正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分子。在他们看来，真正拥护共产国际的分子们，对于他们比立三主义者更要危险些（这当然是的确的）。四中全会后，王十人[12]公开找当时的一个主要立三主义者罗×同志说：“还是你领导江苏省委好，我们赞成你来干”；达汗对另一个当时的主要立三主义者××同志说：“现在我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派，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处得来，斯大林派比你们立三派更要危险得多；他们真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如果他们将来永远不错个什么路线，那就越过越糟了；所以现在要乘他们还未巩固时，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一下子。”事实上四中全会上改造的政治局，在正式与候补委员十六人中，有十个工人成分。这在当时有三个工人同志还未表示出他们被罗章龙派利用的情形下，这种改造，是异常正确的。在这一改造当中，撤消了维它、立三两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忠发同志等是在他们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等等条件下，继续担任政治局工作。同时，并吸引了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最坚决的那些同志和工人干部参加中央的领导。然而，在罗章龙派看来，四中全会在组织上自然未曾解决它应有的任务，因为四中全会否决了他们右派小组织提出的名单，打碎了他们夺取党的领导机关来干取消派活动的企图。因此，他们这种无耻叫号，有什么丝毫

奇怪呢!?

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所以对于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示和党的利益及革命需要来解决了它应解决的任务，正是因为它不仅彻底地击碎立三路线，而且同时在全党面前揭穿了罗章龙派等取消派暗探们的反党诡计。因此，在四中全会后，全党绝大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团结地像一个人一样坚决拥护和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在政治局领导之下，残酷无情地来打退那些立三主义残余和罗章龙派的反党活动。同时，罗章龙派、不改正错误的立三路线的分子、托陈取消派们，直到现在都拼命咒骂四中全会。这一切好恶的不同，都是必然的和丝毫不足为奇的事。

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后特别地积极地活动起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党内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残余，而且是由于当时的两种情况所促成：第一，罗章龙派是在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假面具完全揭穿之后，暴露出露骨的右倾消极失望的反映；第二，罗章龙派特别是直接反映和响应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加紧进攻。讲到第一点，读者总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立三路线实质时，根据斯大林同志对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所作的正确估计的原则所下的定义；现在如果我们应用那种同一原理来估计罗章龙路线的实质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罗章龙路线是公开露骨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罗章龙路线一般地反映出那些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本家长期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同时对革命胜利表示完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特别是反映出在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失败和‘左’倾空谈揭穿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到政策中

来，便是公开露骨的取消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便不仅包括了一切右派的分子，同时还参加进去那些不承认错误的立三主义分子。这种“左”右联合的反党派别，是有它的同一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下面这一段话，恰好作为这些反党分子的写照：“‘极左’的情绪，经常总是与公开的机会主义情绪符合着这件事实——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列宁不止一次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塞维克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底反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极左’的反对派之所以干革命，只是因为他等待革命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地，如果革命发生障碍，如果革命明天还不能胜利，他就一定要对革命表示悲观失望。”（见《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演说）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暂时地“兴奋了”“激动了”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便经常表示消极怠工一部分分子（罗章龙本人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之一）的积极性，使立三同志曾经傲然自得地说：“我的路线无论怎么不好，可是它的确曾经把许多很久消沉的分子都变成过积极的干部。”立三同志不了解，那些消极分子之所以一时变成“积极干部”，只是接受“明天革命便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同时一齐胜利”的投机号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罗章龙路线公开发现时，那些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用过极大努力来干冒险盲动的一部分分子（顾顺章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之一），便不迟疑地投到罗章龙派队伍中去（顾顺章在四中全会后，曾经三次找右派分子谈话，表示他与右派合作反党），使罗章龙到现在还扬扬自得地说：“许多很好的干部，（?!）都拥护我们的路线。”罗章龙很懂得，他的路线能够团结一部分对革命完全悲观绝望的分子。

从一定意义上讲，罗章龙路线便是冒险盲动干不通和“左”倾空谈揭穿后的李立三路线。因此，如果李立三用“全世界革命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悲观失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宣告“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李立三用“全国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几个和一个省区的首先胜利的可能底否认，那么，罗章龙便公开“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李立三用“立刻打下武汉，立刻打下南京”等等冒险盲动来损害红军的主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红军是流氓土匪”，“红军没有前途”等等咒骂造谣来损害红军的威信和帮助敌人进攻红军；如果李立三用统一行动、组织暴动等等“左”倾空谈取消团、取消工会和涣散党的力量，那么，罗章龙便公开用“反对罢工，反对示威，根本反对暴动，现在还不能组织赤色工会，党已经要崩溃了”等等谰言来实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第二工会”底活动。罗章龙派这种公开的取消主义的政治路线，不能不使他们在组织上走上离开革命而另找出路的道路。讲到第二点，读者还记得，一九三〇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赞助之下，正组织第一次“围剿”红军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运动。当时帝国主义、蒋介石、改组派、托陈取消派、新月派、国家主义派……等等的刊物和报纸上，同声一气地高呼：“三个月内，中国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必定消灭”的论调；当时国民党除却遣兵调将进攻苏区红军外，同时，还特别加紧组织些新的反共机关（在上海以杜月笙、黄金荣、杨虎等流氓头子主持，在江西由段锡朋等负责，在北方由张开运主持），一方面在苏区内部去组织和帮助 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派的活动；另方面在上海及其他各大城市专门派遣奸细侦探，到共产党内去，同时并

威胁利诱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和异己分子去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党组织。同时，在这个时候，因为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使有些苏区的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失以至部分的失败，有些非苏区——首先是大城市的党的组织及其他群众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形，更使那些对革命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们容易发生响应敌人的情绪。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公开提出取消主义的政纲，这除却直接反映对敌人进攻革命的动摇、悲观失望情绪外，还有什么解释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实行起来分裂党、分裂团、分裂工会并企图分裂红军及其它群众组织（组织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所谓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在北方组织非常委员会，并派几个人企图到苏区去破坏红军等）的行动，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进攻红军和共产党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它公开地方去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捕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拙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获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信徒韩连辉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罗章龙派这些政治上的纲领和组织上的活动，除了直接执行反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革命新高潮时引起共产党内部的破裂和混乱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这种公开帮助敌人和实行敌人指示的罗章龙派，还能

称为共产党内部的派别，那末，什么东西才算党外的反革命派别呢!？罗章龙派从它散布“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反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宣布党的主要干部名单及国际代表姓名，向敌人告密的文件）和实行组织所谓第二党那一天起，它便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派别，而是党外的与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AB团等等一样的反革命派别了。罗章龙派早已不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派别了，它早已是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支小分系了！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在上面所讲的话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章龙派之所以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加紧活动，以及它由党内派别迅速转变成党外反革命派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上面一段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罗章龙派的活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反党小组织做背景的。因此，当它初宣布反党时，曾经诱惑过党内一部分落后分子跟着它跑——当然这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原来参加右派小组织的和不改正错误的立三主义者。然而除此以外，一小部分同志及少数工人干部对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愤恨，也曾经被罗章龙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口号之下利用过。罗章龙派当时用欺骗口号（如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等），武断宣传（把“新”“旧”干部对立，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反对C. S. S. 小组织——当初许多人不知C. S. S. 是什么意义）和反党方法（例如利用原来工作关系，欺骗一部分支部同志及外县同志当时与党隔离关系，不经领导机关同意，私自在各处召集秘密会议……）。然而，罗章龙派领袖们自鸣得意和决心反党反革命的那一天，同时就是它宣告完全破产的那一天。当罗章龙把全总党团秘密印刷机关窃据和印发向敌人告密式的宣言和小册子的时候，当他们的秘书长把全总经费拐到

北方放高利贷的时候，当他们不顾一切秘密工作而召集一切反党会议以致牺牲干部时，当他们对共产国际及中央尽量地谩骂造谣时，一部分好的干部（原来是受罗章龙欺骗的人物）马上便表示不愿走上反革命道路而立刻向党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在罗章龙派反革命面目揭穿的过程中，在四中全会决议、国际各种决议在党员群众中扩大深入的过程中，在中央、省委、区委及支部同志积极动员和积极斗争的过程中，在对犯错误同志的坚决斗争与忍耐说服工作的过程中，到二月末，罗章龙派在上海已经只剩下了残余的挣扎，绝大多数曾被欺骗的干部和支部同志，都诚恳地接受中央当时所提条件（“（一）立刻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向党承认错误；（二）在党所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三）把原来担负党的、团的、工会的……等等工作向党和相当党团交代清楚，向党公开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派活动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反革命派别的一切情形……”），脱离了罗章龙派而回到无产阶级的党内来。只有很少数的始终不承认反党错误和已经不能挽回到党内来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如罗章龙、王十人、韩连辉等等），被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以外去。上海的罗章龙派的反动中心塌台后，马上使他们的北方组织也受到影响而逐渐崩溃；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罗章龙派在北方的活动便成了奄奄一息了。这样，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的活动，便在三个多月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及进行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打得烟消云散，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同样受到可耻的破产与完全的失败。

罗章龙派这样迅速可耻的破产，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的取消政纲及反革命活动在党员群众及工人阶级面前迅速揭露了；

另方面还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及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正确地运用了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法。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一月至四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两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打击和镇压了苏区内部各种反革命团体的活动，提高和巩固了红军的战斗力，改善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改良了苏区的经济状况。在非苏区内恢复和巩固了被立三路线及右派涣散了的党的组织，恢复和巩固了青年团、赤色工会、反帝同盟、贫民协会、济难会等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加强和注意了对群众经济斗争及政治发动的准备和领导。这样一来，就把罗章龙派所高喊的“革命已经失败了，党一天一天塌台了”的无耻谰言，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了。党在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一方面表示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不调和性，另方面采用一切必需的和正确的斗争方法（在全党内作极广大的教育工作，对犯错误同志作极忍耐的说服工作和批评工作，领导机关直接到党、团和赤色工会的支部内去教育和说服那些对问题不十分了解和受罗章龙派欺骗愚弄的分子，与罗章龙派迅速地断绝和隔离一切组织上的联系，驱逐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和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等等）。因此，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能够使一切立三路线主要分子对党屈服，在组织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克服了立三主义者。在反罗章龙派斗争中，能够使绝大多数暂时犯错误和受愚弄的同志们，在完全自觉地心悦诚服的条件下对党承认错误（例如好些同志曾经自愿地写三、四次以上的声明书来逐渐深刻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证实改正错误等等），在组织上在肃清少数异己分子的情况下，打碎了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组织。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和赤色工会队伍里，没有了

罗章龙这类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越健全、越巩固和越发展些，驱逐和肃清自己营垒中的异己分子，就是驱逐和肃清敌人在革命营垒中的奸细，是我们在与阶级敌人残酷战斗中必需的和不可少的步骤和方法之一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史曾经千百次地证实这一点，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史，也完全证实这一点。

三、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

“列宁在我们党内经常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的和明显的孟塞维克的倾向。”“我们的党在和两种倾向——右的和‘左’的斗争中生长和巩固的。”（斯大林）所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是党的一切活动和领导的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立三路线早已宣告死刑了，立三路线在全党面前早已宣告破产了，主要的立三主义者和立三同志早已向共产国际和党实行屈服了；罗章龙路线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托陈取消主义的一个小分流了，罗章龙路线早已在全工人阶级面前宣告死刑了，罗章龙及其主要的同道者早已被驱逐到无产阶级队伍以外去了；然而立三主义和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更正确些说，“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时常在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分子对个别问题上时常发现着。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事。因为第一，使主要立三主义者投降和驱逐主要的罗章龙主义者出党，这是一件事；把他们的思想肃清，这是另一件事，这是比较困难些的事。斯大林同志在讲到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说：“把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和流放起来——这是一件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件事，这比较要困难些。”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党内现在没有了如立三路线或罗章龙路线那一类的已经完成的系统的整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件事；但是，党内还有——也不能

没有个别的分子对个别问题的有“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是另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完全形成了的机会主义不一样的，倾向是还未完全溶化于机会主义而且还能改正的。同时，我们更知道：对任何问题的“左”右错误，如果不能及时改正而任它们发展下去，都可以而且不可免地要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任何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地受到批评和改正，如果放任它自己发展下去，都有成为一贯的机会主义系统的可能。第三，这些倾向是敌对阶级思想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来的反映，是我们队伍中薄弱的、落后的和动摇的分子们受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底反映。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立三路线的残余呢？正确些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有“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更确切点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时常有“左”的错误呢？这主要地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忽视革命运动本身还包含有的困难和弱点的倾向（例如忽视革命不平衡发展，忽视主观力量比客观情势相对的落后……等等），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无条件地在各地组织暴动的企图，无准备地以空洞号召来实现各地总同盟罢工的企图等等。在苏区工作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而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在军事上冒险盲进的倾向，不顾巩固根据地而盲目地到处进攻的倾向，过早地进攻大城市的企图……等等。第二，不估计群众情绪，脱离群众的倾向，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以至个别组织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继续采用指定罢工、命令群众的方法去“领导”工人斗争，不愿深入企业、农村和兵营中去作群众工作，硬用赤色工会纲领——甚至党的全部要

求口号去与黄色工会中工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工会中的民主制度，一切由党来指定和包办，拒绝利用公开环境工作的可能……等等。第三，以“左”倾词句掩盖右倾消极的倾向，例如在非苏区有个别地方同志拿“不要破坏了中日无产阶级团结”，不要煽起“民族仇恨”等“漂亮”词句，来放弃反日斗争的发动和领导，把“拥护苏联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第一等任务”的口号来和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只有组织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才能胜利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个别企业中罢工斗争放弃的消极等等。第四，在苏区有些地方所采取的过早的（如消灭富农企图）和有害的（如忽视与中农联合、有时侵犯到中农利益）“左”的倾向等等。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罗章龙路线的残余呢？换句话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还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呢？这主要的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在对于革命运动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不足的观点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是以一部分工会工作同志们为代表的最近职工运动中的某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据我们最近得到材料看来，有以下各点：（一）以为在目前经济危机条件下任何罢工没有胜利的可能；（二）认为工人斗争在现在阶段上，只能有防御的性质和合法的范围；（三）平时不去作准备罢工的工作，到群众自动罢工时，又借口罢工要长时期准备来阻止罢工；（四）提议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灰色工会来代替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五）完全忽视和轻视女工和青工的力量和斗争要求；（六）对组织反对日本进占上海的总同盟罢工的口号，采取消

极反对的态度，甚至完全否认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和一般政治斗争的必要；（七）企图把赤色工会与党对立起来或脱离党的领导等工团主义的倾向等等；其次，便是那些对于群众的武装反帝斗争情绪的估量不足，以为“谁要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否认民族革命战争有胜利的可能；对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前途抱悲观失望的情绪；否认党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成绩，对党的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问题不相信和怀疑……等等。在某些苏区内一部人中表现得最明显地，便是（一）曲解巩固根据地的策略为“退却路线”、“保守主义”；（二）曲解在一定条件之下去争夺和占领城市的国际路线为无论何时都不能占领任何城市；（三）遇有敌人进攻，不顾及敌我力量对比，便主张“逃跑”、“躲避”和“退让”的政策；（四）不相信红军胜利及工农群众力量能保证革命运动能胜利地开展；（五）根本害怕帝国主义，不准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等。第二，在对于不站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领导权观点上进行工作的问题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例如不愿组织独立的工人反日会；不愿提进工农干部作领导工作；不积极征收工人入党（前此的河北一部分党员有此现象）；不愿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不以同志的说服态度去对付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等等倾向。在苏区中，有些个别地方延缓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使地主残余、富农分得较好的土地，把地主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中农；轻视赤色工会在苏区中的作用和意义；不积极组织雇农工人的独立工会；不作工人改良生活斗争。第三，表现在一部分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上——如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等等。

因此，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

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是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和得到更伟大的成功的保证。

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护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底保证。

这些手段和方法主要地有下列几种：第一种是对任何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调和派之中，有些是对于党内一切反倾向斗争，装做出不懂得和没有兴趣的样子；有些是作出部分地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央，部分地同情于不正确倾向的态度；有些是把一切党内斗争都解释成无原则无意义，同时自命为不参加任何斗争的“清高分子”；无论调和派采取的手段如何，然而调和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调和派是懦弱的机会主义者——是变相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派实质上是腐败的自由主义者。第二种是两面派，两面派之中，有些是在口头上拥护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实际上不执行而且反对这个路线；有些是表面上拥护和接受国际与中央的各种正确决议，暗地里却进行反对这些决议的斗争；无论两面派的手段如何，然而两面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两面派是对党的正确路线底阳奉阴违和口是心非者”，是用阴谋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进行反党斗争者。第三种是各种机会主义的“私贩者”，“私贩者”之中，有些是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偷运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到党的队伍中来；有些是用表面上反对某种机会主义而暗地里偷运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到党的营垒来的方法。无论“私贩者”的手段如何，然而“私贩者”的实质终究是一个：“‘私贩子’是用‘偷运’的方法来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分子。”第四种是企图用

制造无原则派别的手段来达到反党斗争底目的之分子，这般人之中有些是企图把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有些是企图把所有“新”“旧”干部对立，有些是企图把实际工作同志与曾短期学习同志对立，无论这些人用的是那种手段，然而他们的实质终究不外下列各项：“用制造无原则派别斗争的方法，或者来掩盖自己所犯的不正确倾向的错误，或者在反对别人派别的旗帜之下去进行组织自己的反党派别”；这类人的口号是：“党内有些什么派，什么派，人家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不组织起来呵！”这些反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最近之所以特别被采用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以及中央在四中全会后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性，已经成为铁一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那些反对、怀疑和不相信国际路线的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另有某种企图的分子，时常多半不敢公开地表示出反对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态度，时常不能不采取比较隐蔽些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反对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活动。

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早已被揭穿了的、被宣布死刑了的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转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

在我们队伍中，有时听到有一小部分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不要闹了！闹够了！什么‘左’倾右倾呀，两条路线上斗争呀，闹得够了，都是同志们，何必要闹得一塌糊涂呢!?同志们关系简直闹坏了!”。发出这类呼声的主要的是两种人：一种是那些犯了“左”右机会主义倾向错误，而又不高兴党来批评

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人们，他们企图用这一类呼声来模糊和放松党内同志们对他们错误的注意和斗争。另一种是那些在革命斗争及党内斗争战线上感觉到厌倦的人们，或者是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的人们。为使这些同志们能够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内底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著名的话介绍给读者们，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讲到联邦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来源时，曾经说：

"……可以这样想，俄国人太爱闹了，喜欢争论，制造些分歧意见，然后经过克服党内矛盾来使党发展。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是什么爱闹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原则的分歧。事实是这样，矛盾只有用斗争办法才能克服。为这种或那种原则，为这种或那种斗争目的，为使达到目的底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克服矛盾。对于党内关于临时政策问题，纯粹实际工作问题等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各种协调。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联系到原则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协调，任何'折中'路线，都是与事无补的。对于原则问题没有也不能有'折中'路线，或者是这种原则，或者是那种原则，应该成为党的工作底根据。对于原则问题的'折中'路线，是使人模糊头脑的'路线'，是抹煞分歧的'路线'，是使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思想上死亡的'路线'。"同时，斯大林同志坚决认为：

"我们党的历史，是党内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地巩固了我们的党底历史。"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来源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同

上这一演讲中说：

"这些矛盾和分歧，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第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无产阶级中最不稳固的阶层，同样，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不稳固的阶层，时常接受和反映这一压迫。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完全与社会分离或者站在社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是与社会的各种阶层经过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的社会之一部分，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阶层发生联系和不能不受其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习惯、情绪，时常经过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某些无产阶级阶层而侵入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成分不一致，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我想，无产阶级，从其整个阶级看来，可以分为三种阶层。第一阶层——这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常备军，这就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群众早已与资产阶级断绝了联系。这一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支柱。第二阶层——这是不久才从非无产阶级出来的，从农民、市侩、知识分子等出身的人，这些从别的阶级出身来的分子，不久才加入无产阶级成分中来，把他们原有的习惯、习气、动摇、犹豫等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种阶层对于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和'极左的'派别是最好的基础。最后，第三阶层——这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证的一部分，这些人们带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希望，带有很大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带有'出头做人'的情绪。这一阶层对于露骨的改良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是最好的

基础。

“虽然外表上有些差别，但是工人阶级中的后两种阶层，都是或多或少地接受机会主义洗礼的部队，公开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贵族的情绪，用‘左’倾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阶级中那些还未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半市侩等阶层的情绪……

“很自然地，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斗争剧烈化和困难增加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各种阶层的观点、习气和情绪的不同，便不可免地要在党内的某些分歧形式上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迫不可免地要加剧这些分歧，使这些分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形式上寻找出路。

“可不可以避开这些矛盾与分歧呢？不可以，不能够。要想避开这些矛盾，这就等于自欺。恩格斯是对的，他曾说过，长久抹煞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只有由斗争来解决。”

斯大林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来源底这种说明，对于我们中共原则上一般的同样是完全正确的。

当着一九二七年革命处在紧急关头时，爆发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它把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对立，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底尾巴主义，最后并公开走到否认阶级斗争的孟塞维主义，毫无疑问地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队伍中最不稳固的阶层的压迫底反映；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和一九二八年初，爆发了瞿秋白盲动主义，它不去耐心地刻苦地重新集聚革命的力量，以准备革命新高潮之到来，反而用冒险盲动的方法去找求投机取巧的出路，以致使革命组织加倍地受到敌人的打击和摧残，毫无疑问地是那些半市侩式的小资产阶

级分子的情绪底反映。当着一九三〇年——三一年，中国革命新高涨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关头，爆发了李立三路线与罗章龙路线。这一切都证明斯大林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和为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斗争等底来源等指示底正确。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的许多严重困难性（首先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困难），更加重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紧张关头中，中共内部矛盾的爆发和斗争尖锐性。有些分子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各种困难的本身，含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条件，于是时常发生对困难投降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不可免地发生许多“临阵脱逃”或“中途变节”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上，便早已指明了这一点，他说：

“这件事实——帝国主义主要地用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像在十月革命时那样的分裂和战争，那些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得多些的困难，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逃阵和变节，比起苏联在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将更不知要多好些。”

斯大林同志这段先见的预言，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每当紧急困难关头时，在党内便不可免地发生一部分分子的动摇、犹豫以至消极失望；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内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大部分都公开地跑向敌人营垒中去找反革命的出路。

同时，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意义和必要，斯大林同志同样有一段非常正确和明显地指示，他说：

“如果不同时与我们党内倾向斗争，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够。所以不能

够，是因为在后方，在我们党内有敌人意识的反映，在后方留有不相信我们事业和用尽一切方法阻碍我们的运动向前进步的人们，与阶级敌人开展真正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是党的经常任务。”（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因此，恩格斯还远在一八八二年便说过：“大国家的一切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与辩证的发展律完全符合的。”因此，斯大林同志说：“用斗争办法来克服党内矛盾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不仅是联共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其它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是所有较大的党——不管是联共也好或欧洲各国的党也好，都是一样——的发展底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克服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着和巩固着。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加紧了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央会议虽然犯了个别错误，却继续着使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死刑，使党更进一步地走进布尔塞维克化。一九二九年党在打击和驱逐托陈派的斗争中，表示出党在理论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坚定性和进步。一九三〇——三一年党在克服李立三路线和驱逐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使党在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中创造了不朽的成绩。没有这些严重的党内斗争，没有克服这些反列宁主义倾向底斗争，中共布尔塞维克化事业的进步，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正在日益向前扩大深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任何胜利与成功，都是不会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以上所特别着重指明的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解为把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有些同志误解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有时把任何不必要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拿起来举行争论，有时把某个或某些同志对某个问题的错误，而且不坚持主张的错误，便当作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来举行斗争，特别是时常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变成口头清谈，变成无内容的时髦名词，不仅与实际工作丝毫无补，而且甚至在清谈斗争的方法之下放弃和阻碍实际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和有害于党的办法。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也讲得非常明白的。他说：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而且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党内分歧带有原则性，就不能抹煞和忽视这些分歧；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为原则路线而斗争的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影响；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克服党内矛盾的方法，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

因此，**只有使党达到健全与巩固的党内争论**，**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和应该进行的争论**。

党内争论的目的，在使党更加健全与巩固，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把党内政治争论变作个人攻击或个人仇视的现象。一方面，有些犯了某种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时常不仅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不高兴和痛恨那些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因此，拼命坚持着自己的错误，同时，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些曾经或现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人。他们不了解，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不仅为的是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同时也就是为的帮助他们脱离政治错误的泥坑。他们把同志的好意当作恶意，这诚然是非布尔塞维克的表现。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时常遇见另外一种幼

稚的不正确的现象。就是有些同志对于犯过某个问题或某种问题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的人，当然更用不着说对于那些犯过某种问题错误倾向的人了，永远抱着敌视的非同志的态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之一，在党内斗争中，时常不可免地要引起斗争双方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尤其是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们坚持着自己错误并向党进攻的时候；然而这绝不是说，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的人们，一定要抱着敌视的态度，抱着不以同志关系来帮助他和教育他改正错误的态度。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驱逐出去，以便整洁我们的队伍；同时，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能够纠正和愿意纠正的同志们，却要设法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方法，以免减少我们的队伍的力量。同志们，试把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及中共史检阅一遍，便可明了这些说话的正确。

坚决的和正确的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使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布尔塞维克的巩固与统一的前提和保证。

一九三〇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上对于中共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指示，应该成为每个中共党员随时随地的指南针。

“现在，除开解决组织任务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之外，党应当保证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纯一性，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些；但是，要保证坚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任务，要保证党的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只有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有可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左’的盲动的狭隘情绪的倾向，同这两种倾向

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作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如果在共产党内部不进行不调和的、无情的反对那些哪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底斗争，同时，便不能最终地战胜托陈派和完全克服对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进行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精确的和真正的按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的任务。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成为党一切行动和指导的根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

〔2〕即蔡和森。

〔3〕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应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4〕指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5〕即向忠发。

〔6〕本文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此处为："各种决议以及信件等的指示"。

〔7〕本文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版此处为"罗迈、贺昌"。罗迈（乐迈），即李维汉。

〔8〕指秦邦宪。

〔9〕即童长荣。

〔10〕即徐锡根。

〔11〕即向忠发、周恩来。

〔12〕即王克全。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等的指示信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这次给你们的训令（一九三一，二月），是关于国民党军阀准备第二次大进攻苏区与红军时，苏区与非苏区各级指导机关与红军的一般任务与战略的指示。你们应迅速的使红军兵士明了，根据战斗的环境情形，研究并决定方法，以便迅速的见诸实行。现在为了补充这个训令，特给你们这封秘密的信，更具体的指示你们怎样应付军阀的新进攻。望即按照执行。

（一）国民党军阀进攻各苏区的整个计划，我们还没得着确讯，仅知道些在江西方面的消息（谍报的材料附上）。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在第二次进攻各苏区时，除了一般的加紧进攻外，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故残酷斗争的重心当在江西。

他们第二次进攻时期决定六个月，整个进攻计划分为四个步骤进行。第一，调遣并集中部队，以及建筑军事工程；第二，在战线区域，实行清乡，消灭革命分子，巩固政权；第

三，大举进攻以破坏红军；第四，取包围形势封锁红军。关于总攻击期，我们尚未得着确实消息，但应估计到已快要开始，因为清乡系与集中军队同时并举，而集中又是非常迅速的（当地已有二十师，所需增加的已不多了）。

（二）敌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力量，知道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誓死拥护红军，知道了只给我们一个短促的打击，要消灭苏区与红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第二次新进攻计划的战略要点，准备在较长的时间内和我们作有系统的斗争以消灭苏区，并正确的估计到要同红军作战，同时必须与农民斗争。因此须有相当的时间，预计约须六个月。此外，国民党军阀更鉴于在第一次进攻时，各派的军阀们各行其是，相互间无具体的计划和密切的联系，指挥不能统一，这亦是失败原因之一。所以在第二次进攻时，想要改正这个错误和弱点，蒋介石遂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在军事上来讲，何应钦是个比较能干而努力的军官，并能收相当统一指挥之效。现在我们虽无确实的根据，但对此必须要估计到的。

根据我们所得的材料，敌人似乎不采取“包围苏维埃区域”的计划了。这也是他们学得了斗争的经验，知道前次围攻苏区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可靠的部队不够。要想“围剿”红军，消灭苏区，必须有大批可靠的部队。加以苏区领土的宽广，红军又能打破任何包围的敌人，所以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这亦是应该估计到并且应该准备怎样应付的。

（三）我们为了要有正确的战略，指明我们的前途，首先对反革命营垒必须作个简单的分析：目前国内正遇着非常紧张的财政与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者虽已允诺借款（帝国主义者因鉴于银价低落，故允借给中国大量银块以加重奴役，而金子

是不惜的），但至今未支付分文。军队与官僚大宗款项的支付与消蚀，苛捐杂税田赋的加重，物价的腾贵，资本向工人阶级猛烈的进攻，失业工人的日见增加，甚至连黄色工会都要取消，不断的逮捕与屠杀共产党员，即略有革命嫌疑的分子亦遭逮捕，屠杀无辜的工农日必数起，这样来施行疯狂的白色恐怖。

南京政府同张学良虽尚未正式开火，但互争雄长，裂痕毕露，迟早必要走到公开的战争。冯玉祥盘踞山西，指挥着旧属部下，静待时机，最中心的是窃伺着蒋张的隙缝，准备卷土重来。张发奎、白崇禧企图割据广西与西南各省。吴佩孚已重新起来，率领了三万军队，直捣甘肃与陕西的南部，并打算组织中国的西北政府。四川军阀的割据与他们中间相互的火并已成为经常状态，从未对南京政府表示过服从。

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尚无须说到苏区，更是统一的好标志了），而南京政府却自己替自己吹嘘，来掩人耳目，高唱什么“统一”、“和平”，其实正如破衣烂布，日见破裂。并且更实行欺骗政策，以国民会议来号召，定期今年五月五日开幕，为的好取得落后的庸人来歌颂国民党统治的巩固。

统治阶级为着保持统治地位，正与苏维埃区域作殊死的斗争。南京政府认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同我们斗争是最根本的任务，比其他任何任务都更要重要与紧急。他们深深知道，如不解决这一任务，则南京政府不久就要走上死亡的道路。所以他们不惜竭全力来反对我们，而我们对敌人这一进攻亦正不可一刻忘记的！

国民党的军队是些不健全的，士兵的生活是极痛苦的。他们没有任何一师能经常领得军饷，没有任何一个兵士能按时得着月饷，自然他们的战斗力也就薄弱了。在江西的二十师及正

在开拔的各师还比较有战斗力，其他则都很薄弱，他们遂不能很严厉的反抗我们。自然国民党在进攻以前，还会用些改良欺骗政策，发给一部分的军饷及较好的衣食以诱骗士兵作战，但如果我们能深入到苏区及非苏区的敌人广大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去，加紧破坏他们军队的工作，削弱他们改良欺骗的影响，破坏他们战斗的力量，则他们虽有三十万以上的军队，亦将无能为力了。我们在此已特别注意这一工作，并刚开始相当的结果。

（四）反革命营垒中的情形既如此，即令军阀如何加紧来消灭我们，我们依然要提出击退敌人第二次的进攻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可能建立巩固的苏区的基础。你们应将另一训令迅速执行，以求任务的实现。国民党不惜一切来反对我们，但终是孤注一掷。他们的失败，即是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的任务是击溃他们的实力，破坏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各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应当担负起来，而且能够并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这一任务。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同时，我们认为也必须要估计到另一个前途，因为纵令我们有最顺利的斗争条件，我们还不能有一切胜利的保障。如万一我们在江西或其他区域未能击退军阀的进攻，则将采取何种策略？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必须非常慎重的应付决定胜负的战斗，因为某区的红军基本力量的破坏，就是说遭受着很大的失败，必致该区红军难于灵敏行动。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第二集团军可退至鄂西、湘西北及川东，其他各军退却的方向，可由该军军长及政治委员决定，当着特委或军委在该地时，则应由特委与军委决定。

凡红军所在地尚未实行分配土地与建立政权的时候，必须立即动员群众，实行党对土地问题的口号，组织新的地方苏维埃政府。

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环境变更依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我们能变更自己的斗争策略，扩张已有的而组织新的区域，直至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夺取基本的根据地以扩大全国革命。

（五）在这次训令中，已详细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那些任务都是非常迫切重要的。无论是在前进或退却的时候，都应根据各地具体环境，临机应变，坚决执行。我们不再重赘，现在只指出在这次训令中没有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或说得太简单的问题。

苏区内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化的。阶级的敌人不仅企图从苏区外边来破坏我们（军阀的进攻），而且企图利用苏区内仇视我们的分子实行内外夹攻。同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富农、地主残余及其附庸——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改组派、

AB团都是不遗余力的来破坏我们。我们党的组织和红军的领导是处于非常复杂的环境中。阶级的敌人企图以挑拨离间的方法，破坏我们队伍的统一，破坏或拉拢这个反对那个，以减弱我们的战斗力，陷我们于最后的失败。

我们绝不能说在江西或也许在其他区域（我们所以说也许，因为还没有接到报告）已经是万般如意了。敌人在他的工作中已有了很大结果。陈独秀主义者一直到现在还说红军是土匪，托洛斯基则认为不然，命令陈独秀主义者加入红军中进行破坏的工作。南京政府亦以巨款向苏区进行斗争，企图收买我们的个别的工作人员，以破坏我们。

我们应永远估计到：在阶级敌人的破坏工作中，如果我们要是破坏自己的统一，即在我们负指导工作的同志中虽仅有很小的裂痕，都必然是给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使我们的队伍像钢铁一般的坚固，为国际的路线而斗争，反对阶级敌人的奸细，巩固党与红军的纪律，坚固党与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才是击退军阀进攻，得到胜利的根本必须的先决条件。中央特别指示并警醒各地做指导工作的同志注意这一问题。最近在江西的领导机关中已有意见的分歧，无论如何应立即消灭这种分歧的意见，应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针对着军阀的进攻。

（六）现在各部红军中都组织了政治机关（军师团的政治委员、营连的指导员、政治部等），但在第七军则比较薄弱不健全，它没有充分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分配土地，没有组织农民。你们要采取最有力的方法，努力去消灭这种绝不容许的现象。政治机关没有努力的工作，便不是也不能使红军成为有阶级觉悟而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如果不宣传分配土地，不帮助农民分配土地，不煽动与帮助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机

关，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也就不会是红军。这就是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正因为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不充分，使党对土地问题的路线就不能执行，或不能充分执行。所以过去在福建某部队中曾发现红军兵士逃跑甚至倒戈相向来反对红军的事实。

中央热烈迫切的希望你们特别注意信中指示的问题，并将一切指示迅速切实执行。

（七）党在非苏区内当更加努力的帮助红军。我们当从各方面来进行，用最高限度的力量来帮助红军，帮助你们。

此致

同志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一、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经常的负责给党报担任文章，发表他对于各种问题的意见，他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困难与所得到的经验。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彻底了解，给党报担任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与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

二、各级党部必须立刻担负起给中央日报建立通讯网的责任。各省委各区委各支部须指定某一同志负责担任通讯网的建立，在各工厂、各矿山、各企业、各学校以至各乡村中训练出工农通讯员（党员或非党员）并组织他们。

三、各级党部负通讯责任的同志必须经常搜集并编撰各种通讯交给各自的省委，由省委直转中央日报社。在通讯网没有建立以前，省委通讯员必须于每星期内供给中央二篇关于工农斗争的通讯稿子。

四、出版红旗日报的各省委，尤其应该迅速执行此决议。为中央日报通讯与通讯网的建立，就应该是各省红旗报的编辑部负责同志。

五、苏区通讯网建立的责任，在目前拥护苏维埃的运动中，尤其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央责成各苏区的中央局立刻开始这一工作。

六、应特别指出那些在纸上空谈提高党报的领导作用，而实际上对党报毫不帮助的党部或负责同志，实际上同空喊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而实际上不能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此路线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的区别。中央以后在审查各级党部工作的中间，必须合乎此决议的执行程度为重要标准之一。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一、中央根据最近考查，认为目前整个党的组织发展的情形仍然是畸形的状态。全国党员数目约在十二万人以上，但最大多数仍属于苏维埃区域，主要的无产阶级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在重要的企业中（铁路、矿山、兵工厂、海员和大的丝厂、纱厂），我们的党员数量仍然是异常薄弱，有很多重要的企业我们还没有打进去。在社会成分上说，真正产业工人全国仍然不过二千人，在苏区内农民则占绝大的多数，同时在现在组织中还有许多是不能为党工作的挂名支部与挂名党员。在这种情形之下，实际上党是很难真正顺利的去准备领导和进行正在成熟着的革命斗争。

二、所以造成这种情形，绝不能仅拿反动势力的压迫来解释，我们一定要承认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目前党的主要危险以及其他种种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缺点，对此须负最大的责任。立三的组织系统以总行委代替一切组织及其有名的组织自然论，所谓“三天之内可以发展几千百万群众”，实际上是“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拒绝实际夺取群众的坚苦工作。同时立三路线又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及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发展组织上的障阻。因此在立三路线时

代，中国党的组织特别在建立产业支部和吸收产业工人入党这方面，不但没有新的成绩，而且更有坏的现象，许多已有的产业支部失掉线索，许多已入党的工人脱离了关系，这种情形直至四中全会后才开始新的转变。

三、四中全会既然在组织上尽了他的应尽的任务，同时又在全党面前提出实行一切工作的转变，因此就给各级党部以发展党的实际有力的基础。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中心政治任务仍然是国际在去年七月决议案中所规定的任务，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就必须在党的发展上有一个迅速的转变。现在发展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站在两条战线上彻底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在发展组织上的一切障碍与破坏，工作重心移到产业中去，多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巩固已有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握住主要的工人中心，特别是重要的企业及这些企业中的主要部门。在苏区内应有最高限度的努力，党向群众开门，但这绝不是说要把一切志愿入党的都收进来，必须严格的根据国际所规定的条件，使党的组织基础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要尽量发展群众组织，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

四、为着实行上述的任务，中央特规定下列办法，望各级党部根据本地情形切实执行：

1. 各级党部特别是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要利用一切群众斗争和运动规定出具体的计划，求得一定的组织上的收获。

2. 在一切伟大的革命纪念和敌人进攻的关头，要宣传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号召无产阶级和贫农入党，作为实际的纪念和答复。

3. 要尽量利用党报及一切公开刊物，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共产主义宣传。要坚决消灭忽视党报组织作用的现象，要赶

快改良发行推销的工作，要在工厂中组织读报小组，地方党部要设法帮助此种工作。

4. 各支部同志特别是产业支部同志必须经常的做个别征收党员的艰苦工作，要坚决的反对支部同志对此工作的忽视与怠工，或借口在斗争中发展党员而平时则放弃这一工作，说是和平发展。必须排斥一切惧怕新党员只找旧线索之机会主义见解，要把群众斗争中一切较好的成分无所畏惧的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征收的工人对象主要的要注意他的阶级觉悟与斗争情绪，属于产业支部的同志，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

5. 各个省委与地方党部必须调查本地的重要企业，尽力减少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把一部分力量送到那些至今未打进去的重要企业中去，同时要利用群众组织的线索，作为发展党的阶梯。

6. 要在产业支部中发展革命竞赛，在本年“五卅”时，各级党部要举行发展组织的总检阅，务期在这个期间，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

7. 各级党部尤其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应加重训练新党员的任务。新党员入党，要在支部中举行入党手续，要立即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给他们办短期的流动训练班，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使他们一开始便能担负起党的下层工作的任务。

8. 各级党部特别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应把发展组织的问题当为日常工作中心任务之一，看成是一种战斗的任务。每月关于发展组织的工作，对上级党部要有具体的报告，要精确的统计产业支部与产业工人每月所占的百分数。在检阅工作时，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同时上级党部关于发展组织问题，

时常要有个别的具体的指示。

9. 要尽量发展企业中的群众组织和辅助团体（如义友会，姊妹团等），要特别注意赤色工会的工作。在主要企业内要利用一切群众的斗争来组织车间代表会议、斗争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等，务期在党的组织周围有广大群众组织环绕着，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

10. 在苏区内当苏维埃建立的时候，就应该最高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在征收时必须严格遵照去年八月国际东方部在组织决议案中所规定的条件，在成分上无产阶级与贫农必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要绝对的防止富农与反革命分子入党。同时要使党不要代替了群众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

一九三一、三、五中央通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互济会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革命互济会是党的群众工作之一，他的任务是救济被难战士，组织工农革命的群众。党经过互济会去团结工厂、农村、兵营、学校中广泛的群众尤其是无组织的群众，领导他们到同情工农革命的战线，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拥护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引导互济会的工作脱离了群众，离开了互济会革命后卫的立场，去组织武装暴动，实际上作资产阶级的自由运动，这是立三路线恶果之一。同时在戴晓云领导之下，扩大发挥了立三路线。尤其不可饶恕的根本不去救济被难群众及其家属，不及时营救被捕的战士（一九三〇年救济费只占互济会全数经费百分之九），将互济会的经费完全用在官僚腐化的机关中及其个人的私欲中，使被难者及其家属对于互济会愤恨，使广泛的群众离开互济会。在全国委派许多工作人员，建立许多架空机关，不去真正作互济会的工作，使互济会完全变成脱离群众的，离开了他真正革命任务成为官僚腐化的机关，这是极可耻的革命的罪恶。

这里，党在过去从中央以至各地党部没有真正去领导互济会的工作，对于互济会工作的检查完全放弃，地方党部没有真正督促支部去建立互济会的工作，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因此中

央对互济会工作有下列的决定：

一、必须彻底改变过去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现象，各地党部要以支部为中心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及被难家属来进行这一工作。互济会各地的工作人要将他们编入到支部中（如是同志）及参加到生产中、职业中、被难家属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互济会工作。

二、互济会的工作要集中力量转变到救济工作方面来，只有加紧群众的对于被难战士的救济，才能将广大的群众组织到互济会来，因此互济会必须将他所有募捐来的经费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用到救济方面来。目前刻不容缓的去救济各地尤其是各大城市中在狱的群众及其家属。用各种方法去营救被捕的战士，这种救济工作要建筑在广大的群众及被难家属上面。

三、立即在群众中公开过去立三路线的错误，宣布戴晓云的罪恶，坚决的肃清互济会的官僚腐化的现象，取消官僚化的机关，到被难的家属中去吸引被难家属及在业的工农群众来参加互济会的工作，尽量减少专门领生活费的工作员到最低限度，把他们分配到生产中工厂中农村中去进行互济会的工作，要彻底深入群众，在工作上大的转变。

四、在白色区域中首先是上海、天津、香港、武汉、满洲等大的城市中，扩大群众的救济工作，进行募捐运动，扩大反白色恐怖的宣传。真正到监狱、工厂、作坊、农村、学校及被难家属中，利用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去组织群众，建立互济会真正下层的基础。取消那些没有群众的上层的架空的机关（如天津、上海等），加紧去发展互济会的会员，取消团体会员的组织方式，只要每个群众接受互济会的纲领章程，即可为互济会会员。每个会员要缴费，执行互济会的工作。

五、在赤色区域中要广大的发展互济会的工作，要建立真正有群众的下层组织，吸引工人、苦力、红军、农民、农妇及被难家属来参加这一工作。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募捐队等组织，去真正的援助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屠杀围剿。苏区党部要特别注意去建立这一工作。

六、各级党部都要严格的改变过去放弃互济会工作的错误，必须认为他是党的群众工作之一，经常的讨论和领导互济会的工作，要督促和建立这一工作。根据这一决议，各级党部及互济会党团定出具体的计划，急速的进行真正互济会的工作。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知第二一〇号

——反帝大同盟的策略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关于反帝的工作，各地党部要立即加以充分的注意，尤其是对于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一定要党和青年团支部创立或整顿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派得力的干部到大同盟中去工作。党必须经过党团经常监督和推进大同盟的工作，使大同盟变成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知识分子的广大群众组织（大同盟主要的基础，应当是个人会员）。

大同盟的工作可以而且应当广泛的利用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在各种名义之下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和活动，应对于政治生活中每一件事变（虽是极小）站在反帝的立场而呼号。如最近关于反对大借款问题，各地大同盟都应当积极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在工厂和农村中要创立大同盟的支部，坚决与那些认为大同盟不应在工农群众中工作的见解作斗争。

中央计划在四个月到六个月期内成立全国反帝同盟的组织，这个任务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执行。必须各地大同盟工作有转变，必须各地成立大同盟，真正由群众选举代表来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才有意义的。

过去自由大同盟的组织，因为自由运动是不应单独的行动，而自由运动的斗争，反帝同盟也应做的，所以自由同盟没

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中央决定要自由大同盟归并于反帝同盟，各地应运用群众路线，向群众解释，自动的合并于反帝同盟，或者改变并扩大为反帝同盟。各地党部在短期内必须实现之。

在最近各地党部必须讨论到反帝工作，并必须将反帝同盟工作的实际情形专门作一个详细的报告给中央。（详细报告工作状况、组织情形、个人会员与团体会员之数量，经常做些什么宣传工作）以后检查党的工作时，应将反帝工作列为主要检查尺度之一。

国际反帝同盟准备在今年五月举行“国际反帝展览会”，这一信可在各地刊物上发表，各地党部并应负责帮助完成该信中的要求。

中　央

三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
广东党的工作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

中央在审查了大盛[1]同志关于广东党的工作口头报告之后，认为：

一、广东党过去在立三路线统治之下是受了很大损害的。这里表现得最严重的是：在立三路线布置全国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之下，广东党完全脱离了工人的厂内日常斗争的领导，而空喊街上示威与召集厂内集会，完全放弃了农民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而空喊地方暴动与农民战争，在许多中心城市，架空的建立一些机关，委派一些工作人员，使之脱离群众而便利敌人的破获和打击；在东江与琼崖的苏维埃区域则不去彻底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加紧城市工作与附近苏区的农民运动，来巩固这些区域与红军，反而以单纯的军事冒险行动去攻打中心城市。这样，就使广东党与群众的关系大大削弱，党的发动群众与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大大减弱，党的组织也受到敌人严重的摧残，而苏维埃区域大大缩小，红军战斗力也减弱了。这一切严重的恶果，主要的都是在中央指导之下，南方局执行立三路线与以后广东省委执行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所造成的。

二、国际指斥立三路线的来信到后，广东省委也同当时中

央政治局一样，开始还保持着调和态度，直至中央紧急通告到广东后，省委才成立彻底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错误的决议。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李大汉被罗章龙第二党假借全总名义往南方活动，广东省委批评了他的错误，拒绝他的巡视与活动，这是对的。但没有能立即发动一反右派的斗争，这仍表示出广东省委政治上的软弱，没能认清这一斗争的严重（虽然当时四中全会的文件未到，但右派反党反国际反革命的小册子与其它文件却已看到）。最后，省委对于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以及过去南方局广东省委与光生[2]同志领导的批评，据大盛同志的口头报告（因书面的原文还未到），一般的是正确的。只是省委给中央的信中对于韶玉[3]同志缺乏实际工作的批评，还带有过去立三路线之派别观念的影响，这是于党有危害的成见，广东省委应坚决的予以肃清。

三、广东党现在正处在困难的时期。一般的群众斗争是在发展着，但多是自发的缺乏党的领导与组织力量。苏维埃运动在东江海陆丰及琼崖是有他的基础的，但其他各地□又落后，敌人现正加紧向这一方面施行"围剿"，而广东党恰于此时遭受了立三路线的损害，因此，更加显明出执行国际路线的严重与急迫。为要达到这一任务，中央特决定下列几项办法，要广东省委于最短期间求其实现：

1. 广东党要根据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决议，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在广东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影响，予以无情的打击。要使国际路线的执行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的斗争，不仅在文字上在口头上并且要真正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肃清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的右倾消极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及两面派的行动，才能真正集中主要的火力反对

右倾机会主义与右派分裂党的活动。

2. 四中全会前后，中央根据国际路线所发的一切决议，广东省委必须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施行，必须拿实现这些决议案的规定与否来作检查各级党部工作转变的尺度。

3. 在保卫苏区、巩固红军与冲破敌人“围剿”的紧急任务下，广东省委应刻不容缓的在三个月中派遣一百至一百五十工人到红军中去，要征调所有有军事经验的同志百分之九十五到苏区去工作，要派遣党内积极干部百分之六十以上去到苏区加强领导工作，特别是工人干部。征调工人到苏区去必须是自愿的，而且要做成一种运动，使广大工人群众能在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口号之下动员起来。

4. 省委应征调五十至一百的工人及农民干部到敌人军队中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这是对于冲破敌人“围剿”苏区之最有力的打击。同时，省委要动员全广东党、团、赤色工会及各革命团体去进行敌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要加紧组织海员、铁路工人拒绝运兵去打红军的斗争，加紧组织兵工厂工人拒绝制造枪弹去打红军的斗争，并要使敌人一切军事工业及运输路线受到我们的破坏。

5. 省委应有计划的将同志及失业工人干部打入生产中去，至少在两个月内要做到六十人。要有计划的设立与工人接近的地方（如寄宿舍、饭室、茶楼或一切工人辅助组织等——这一括弧内的文字，在发表时必须删去，同时这许多组织的所在地及方式，不允许一般同志以及没有万分必要知道的同志知道，至要勿忽！——秘书处注），两月内要实现三十处，以密切党及赤色工会与工人的联系，以实现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任务。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加紧工人群众的厂内的部分的斗争，以联系到

政治斗争，并发展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特别是要打破香港一部分工人中对于港例的恐惧心理。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也必须有根本的改变，过去忽视与放弃黄色工会的工作，必须代替以派人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与加紧对黄色工会群众的宣传与鼓动。党及赤色工会中至今还有在工人中间的宗派观念，这是必须彻底肃清的。

6. 农民日常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必须加紧，要改正过去只以空喊的口号去找旧的线索之立三主义的办法，要在每一斗争中与日常工作中去发展党及群众的组织。同时，省委要集中在几个斗争发展与党有工作的地方，如惠州、潮梅各属，北江、西江各地，去发动农民游击战争，一方是扩大土地革命运动，一方是牵制着许多敌军不能调动，好给中央苏区及闽西一个最有力的帮助。

7. 在东江及琼崖苏区，必须无保留的立即实行中央最近给苏区的各种训令及决定。

8. 广东省委必须认识这次大破获的教训，彻底改变过去的机关、工作方式，必须尽量减少上层机关，地方党要尽可能的打入生产中去与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以树立秘密工作的保障。

9. 广东党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右倾机会主义与口头拥护国际路线而实际工作是机会主义的现象必然要暴露出来。党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要集中主要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右派分裂党的行动。要加紧发展工人、雇农及贫农的党员，要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特别是要打入大产业中，如海员、铁路、兵工厂等，以转变党现在仅仅在手工业工人中有基础的现象）要毫无畏惧的引进工人干部，这样才能根本改变党内右

倾消极与“左倾”盲动之机会主义基础。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东地区》刊印。

注　释

〔1〕即李富春。
〔2〕即罗登贤。
〔3〕即陈绍禹。

PDG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

湘鄂西特委：

中夏[1]同志一月二日、特委一月十日、克昌同志二月三日的三个报告收到。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亦可看出最近红军进退的状况。同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正在积极的领导全党执行路线上的大转变，因此，中央有必要给你们以新的指示。这里必须声明，国际去年的各种决议与来信，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四中全会前后根据国际路线指示各地红军与苏区党部的训令，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至苏区工作计划大纲的主要错误，在对立三路线没有揭发而调和，应依中央训令改正。

一、去年十一月收到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共中央从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发布后，反国际的立三路线遂占据了领导地位而统治着全党，领导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的道路。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来信后，仍经过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犹豫，最后始发出九十六号通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于今年一月七日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召开了扩大的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上接受了国际路线，彻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在秋白[2]同志领导之下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时又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几个对立三路线主要负责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并增加了中央委员新的成分。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

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厉的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国际、反党的企图。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这一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顺直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满洲、香港进行分裂的活动，更派人到苏区去捣乱红军、苏维埃及党的领导。右派反党反国际的纲领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右倾的悲观估量出发，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主义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正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湘鄂西特委和全体同志应在四中全会接受国际路线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决定，彻底的肃清立三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在湘鄂西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依据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湘鄂西党的工作，应当指明湘鄂西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和扩大立三路线之执行。自然我们绝不否认湘鄂西一年来苏维埃运动之发展与红军的扩大，党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但我们必须彻底的检查湘鄂西党的严重错误与寻求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然后才能实行彻底的路线上的大转变，而领导革命更加向前发展。湘鄂西党自中夏同志到后，仍然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而说中国革命发展走向平衡。因此，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是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中夏同志的报告，也曾提到根据地，但他所说的根据地是打常德要以津澧为根据，打津澧要以

石门为根据，这是军事作战的支持点，而不是国际路线所要求的有群众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有红军可以依据而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的根据地。去年中夏初到时打仙桃镇的行动以及南渡后的一切军事行动，由整个革命战争的配合来说，攻打仙桃镇以威胁武汉，攻下津澧以威胁常德、长沙，这对一三集团军在江西的作战是很有利益的，只是红军的行动若不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斗争，不执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任务，不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与解除他们的武装，则不仅苏区根据地无从建立与巩固，便连军事的胜利也将随着红军的撤退而消失。所以中夏一月二日的报告，除掉“攻城略地”的叙述，并且带领着二、六军实行“上山”逃跑主义外，连土地革命的影子都找不到了，这又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了前线上这种冒进攻坚、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于是在后方就必然使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你们不平分一切土地，要平分时便依人口为标准，连地主家属在内，还要先实行调查，劳动力中分大脚妇与小脚妇，并且还以富农作中农算，对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完全怠工，并说雇农分了土地后便没有雇农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常不是发动群众从下而上的选举出来的，以致许多富农腐化分子盘据了政府机关，使贫苦农民看成为“苏维埃老爷”，说“红军太好，苏维埃太坏”；并且这种腐化分子又利用苏维埃机关擅作威福，不发动乡村中基本农民群众以斗争力量去消灭阶级的敌人与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只简单的执行捕杀。累进所得税的规定是不执行的，反而向基本农民群众实行派捐的办法，于是济难会、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都成了收捐的“衙门”。这样，农民群众便说“现在的牢，我们都有份”，以致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

减弱起来，“群众只认共产党比国民党较好一点，……东来是东的百姓，西来是西的百姓”——这一切，都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所以对城市工作便是完全取消的，对工人斗争（江陵、沔阳）竟借口苏维埃是工人政府而去制止，这完全是离开阶级立场之可耻的机会主义；对真正到敌人军队中夺取士兵群众的工作便完全忽视；对红军的巩固与加强完全是消极的，只等中央派工人成分和干部去加强领导，而没有计划在当地去实现国际决议所指示的加增雇农贫农在红军中的成分，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与政治工作，巩固铁的纪律等等具体办法。同时，却也提过“没收一切商店”、“集体农场”等“左”倾的政策，这无疑的只能帮助了富农路线的发展而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困难起来。在鄂西，富农路线之所以如此发展，也正有他阶级的基础。在七千党员中，据你们报告，工人、雇农、贫农的成分不到半数，显然无疑的，富农甚至地主的残余都侵入到党内、政权的领导机关，红军的干部也有不少的富农，自然“左”倾空喊的立三路线遂更易为这些分子所接受，而掩盖着富农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继续。于是湘鄂西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和群众的关系便大大受了损伤，而土地革命的果实竟被富农攫去。证以监利失守竟因群众不来报信，致红军仓皇无抵抗的退去，洪湖根据地中心丧失得如此之快，南岸二集团军的“上山”，都显明看出红军与群众关系的薄弱，党缺少发动群众巩固这些地域的根本观念。因此，更加助长了苏区内部反动势力如北极会、硬肚会、改组派的发展，加以夺取敌人士兵的工作又完全没有，于是更便利于国民党反革命的进攻。但中夏最近来信及特委的报告，却未曾给这次红军失利以正确的估计，而中夏仍然单纯的计算到“一俟整理后，当然将全军出打硬仗，……前委已决定二日内二军出山，七日内六

军出山，第一步先向石门”。这证明中夏同志的领导是对国际路线没有丝毫了解与接受，他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他一方面传达国际路线，一方面却又在执行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路线乃至富农路线。中央除批评中夏同志领导的错误外，同时要向你们指出，当中夏离中央时，中央正在实行对立三路线调和的开始，直到十一月给你们的指示信，虽然在许多部分策略上的解决是正确的，但因为承继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没有指出中夏同志在鄂西领导的立三路线实际上是帮助湘鄂西富农路线发展的严重错误，所以这种指示是不能给你们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的方针的。

三、现在敌人正在继续增加兵力以进攻红军与苏区。湘鄂西是重要苏区根据地之一，亦受着五六师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在敌人第一次的“围剿”中，各地红军大多得着相当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湘鄂西这次作战的经过，如果是发动了群众，巩固着根据地向前发展，无疑的是可以冲破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依据现在的情势，二军团主力部队已退到五峰、鹤峰一带，段德昌同志领导的四团最近还在南华安一带游击，江北警卫队已退到石首，可是都与主力部队远离着。白军在江北所占领的地域，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农民群众被杀的近万，房屋家具被烧毁，洪湖的后方更遭受极大的损害——这些地方都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区域，阶级的死恨将要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再起的反抗斗争。在这里，要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的冒进政策，同时也就绝对不容许立三路线所掩藏的上山逃跑主义，因为他正是冒进政策遇到挫折后之必然结果。尤其是经过失败的地方，一切消沉、失望、悲观、分散、逃跑等等右倾观念，都将汇合起来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会要求党实行退却的路线——

实际上就是富农的投降路线，这必须湘鄂西党予以坚决的反对！现在正确的方针，除掉一般的已见中央两次给红军及苏区党部的训令外，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彻底的赞助和实现基本农民群众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解除当地的反动武装，无条件的武装基本农民群众去扩大游击战争，普遍的建立与改选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己的政纲，组织手工业工人、雇农的阶级工会，加紧他们加工资与改良生活的斗争，并组织与领导贫农团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以加强反富农斗争的力量而使中农围绕着他，更要特别注重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以夺取敌人的军队，并引进大批雇农贫农到红军赤卫队中去，训练工人干部去当军事政治的指挥员，要提高党在红军赤卫队中的威信与加强政治工作和巩固铁的纪律，这样来巩固红军与苏区根据地，这样来调动一切群众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关于第二集团军，他的目前中心任务，应使他所在的地区首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要广大的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要肃清一切地方的反动武装来武装农民实行自卫，要加强像五峰、鹤峰这些地方的党的工作，以巩固这一后方根据地的领导。同时二军团的行动必须与江左江右两大游击队取得极密切的联络，要派遣得力的工农干部尤其是从敌人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回到敌人军队中去进行瓦解他们的工作。二军团目前主要的行动方向应针对着公安至常德一线，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而江左江右的两大游击队也当更加紧在敌人与二集团军作战的后方做扰乱的工作，以便利二军团来各个击破敌人。江右的四团任务应深入南华安的土地革命与巩固这些地域的苏维埃运动，他对于牵制津澧、常德的敌军去攻打二军团是有很大作用的，同时

他对于岳阳也是一种威胁。江左游击队在他的目前任务上，是应加紧扩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从发动群众斗争、巩固乡村的阶级战线与彻底的平分土地，来恢复原有的苏维埃区域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在恢复失败区域工作上，特委应万分加紧。不论南北岸，赤卫队与白军作战应尽可能的避免正面的硬拼，应配合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实行袭击；对于敌人已用大部队来占领的这些城市，必须以广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和给养来围困他，并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袭击他，务使敌人不能实现"彻底清乡"的计划。在北岸的游击队在与二军团取得联络后，二军团应拨一小部分武装到北岸，组织游击队肃清地方上的反动武装以扩大游击区域，但现时特委却不能等待这一武装的增加才去实行游击与保卫苏区的任务。

湘鄂西这一广大苏区发展的前途应当是：北岸的苏维埃运动在与二集团军主力保持密切联系的条件下，应向汉水北岸发展，为的可与九军联络而威胁武汉；南岸的四团应向津澧、常德发展，同时时时威胁着岳州；施鹤、巴东与桑植、大庸应成为这一广大苏区可靠的后方，并联系上下川东的发展；二集团军主力在这一巩固的根据地区上，应时刻不忘消灭敌人的主力，以便选择着适合政治军事环境的交通要道与中心城市向前发展。

四、关于个别的而是重要的几个问题，在这里分别指示你们：

第一、关于改造苏维埃及苏大会选举运动，中央十一月去信仍然一般适用，但还要指出主要的是应发动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的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建立和改选运动，并推动他们踊跃的参加政府工作，从斗争中将富农成分及腐化分子淘汰出去。这种淘汰，应与平分一切土地、反抗敌人"围剿"及反

富农的斗争联系起来。你们由上而下的组织一种肃清委员会，假使是肃清富农的委员会，那根本便是错误的，假使是肃反委员会，则脱离着群众，会变成官僚形式机关而不能成为一种斗争的力量。苏维埃政府机关必须极端改善，要吸引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参加各部各委工作，要经过苏维埃代表和政府委员向广大群众做经常的苏维埃工作的报告，要使各种机关都能群众化，要彻底摧毁军阀统治下的官僚制度以及一切官僚的仪文。在政府中，必须吸引非党的群众领袖来当委员与参加工作，要根本反对不要非党员当政府委员之党来包办一切的错误传统，并建立政府中的党团工作。对于贪污和违反法令的分子要实行公开的革命审判，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不能例外（党员当然要公开开除党籍）。

第二、关于土地、农民问题，中央前次指示大致可用。最近中央又送去苏大会的土地法草案，是根本改正去年三中全会前颁发的土地法草案的错误的，你们应根据这一草案的一般原则去执行。你们与陈克昌报告，都说对于平分一切土地发生怀疑，因而迟缓执行，这是错误的。中国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在消灭地主阶级与封建剥削，而使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平分一切土地，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之后，同样要动摇富农的土地，不使富农攫得土地革命的果实。所以在法案上规定出同样没收富农的土地，但富农如愿自己继续耕种得分配给他坏的土地。中农则不然，在平分时不一定动他的全部土地。贫农则增加好的土地，雇农则分得土地。这只是举个例子讲，只要基本农民群众愿意，有时一切原有的土地所有关系都改变了。总之，平分一切土地的目的是在以当地所有土地的收获量做基础，平分给乡村中自己耕种的农民，但富农须分给坏地，而地主残余与家属却绝不能分得土地，只能罚做苦

工。因此，平分一切土地绝不等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一口号表现着没有阶级的意义（是哪一阶级来没收哪一阶级?），而且要动摇着广大的自耕农的中农与贫农，是一危险的口号。特委对这一问题的动摇，并不如你们在红旗上所说，因为反对没收一切土地，所以不能主张平分一切土地，其实因为党有了富农路线的领导，所以对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便要说他是接近脱洛斯基主义了。对于雇农与红军及其家属，必须分配他们以土地，并要好的土地。反富农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紧，党内的富农分子要立刻开除出党，政权中、红军中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要从斗争中将他们洗刷出。贫农团的组织只限于乡村，要先从苏维埃政府中的贫农雇农分子组织起，发展到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以至包含到全乡村的贫农。雇农要在这里边起领导作用，即以雇农工会的乡村小组整个加入。贫农团要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吸引着中农在他的周围，而巩固反富农的斗争。

第三、关于经济政策与财政问题，中央最近也送去了苏大会的经济政策决议草案，可作你们执行的方针。此外，在陈克昌同志报告中，很明显看出你们所收的公益捐，群众认为是苛捐杂税，这完全是富农路线派捐来加重农民担负的办法。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而代之以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在乡村则为土地税，城市则为营业税，一切税款的担负应落在富农与资本家商人的身上，要完全免除贫农与城市贫民的一切担负，雇农及工人更不用说了。其次，滥发纸币的办法，应根据中央前信立即纠正，如沔阳县政府滥发几十万纸币，农民怕杀头不敢不用，这简直是自杀政策，那无怪今天收到特委的来信说，沔阳全县“反水”了。这不能说是群众反水，而是我们将群众送给敌人的。其他一切严厉制裁贪污与节省开支的办法，应如前信办

理。再次，合作社的组织，你们是委派大批人员筹办，又变成一种官僚系统的机关。因此，过去堆着许多粮米不能出口，而一切日常用品也就腾贵起来，这必须容许贸易自由与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才能打破与减少这一困难。

第四、关于工人运动问题，前信已严重批评你们不要工人运动的根本错误，并指示你们的办法，最近报告又证明你们作出更严重的错误，就是不准工人罢工。第一，你们以为苏维埃是工人政府；第二，以为政府可以命令资本家改良工人生活。其实，这都是富农路线的借口。现在中国苏维埃还是工农民主专政，还容许私人企业工厂存在，对于在这些企业工厂下的工人为加工资改良生活的斗争，党必须加紧领导，政府必须站在工人利益方面来谋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的动员工人群众来进行监督生产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只有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工人已参加管理，才不需要以罢工的方式来解决改良生活的问题，而应由工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来共同解决。关于雇农工会的会员资格，一切做雇农的人不论他现在是否分得土地，都应要他加入雇农工会。陈克昌同志问雇农工会中作零工的觉得开会日期太多，影响他们的劳动，假使无必要的会期太多，自然要减少，这不仅对于做零工的人为然。另一方还必须领导这些打零工的农民去进行改良生活与分土地的斗争，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

第五、关于苏区白区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除前信已说到外，还要指出三个问题：（一）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你们必须用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做，这不仅要派遣得力的工农干部及俘虏过来的士兵去进行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并且要动员全湘鄂西地方党部、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广大劳动群众去加紧向敌人士兵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以动摇敌人进攻苏区的部

队，尤其是川湘各军，更易于进行这种工作。即使做到小小的动摇与哗变，对于保卫苏区的直接帮助都是很大的。（二）改组派随着你们的富农路线，而深入到苏区活动，因你们采取简单的枪杀办法，致使群众人人自危，这是严重的现象。你们应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的斗争中向广大群众宣传改组派破坏革命欺骗群众的阴谋，引起群众对改组派的阶级仇恨而积极起来作肃清改组派的斗争。这不是说政府和红军对改组派领袖就不应该加以逮捕乃至枪杀，但必须公开审判，召集群众大会宣布罪状，使群众都起来拥护这一对反革命的制裁。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前委解决甘秦是对的，但没有在广大群众中作宣传工作是错误的。（三）反帝的斗争前信已经指出，但湘鄂西党一向不注意这一工作，现在你们应从速发展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并且尽量发展个人会员，要吸引中农与城市贫民都来加入以环绕在工人和贫农的周围，而加强保卫苏区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力量。（四）湘鄂西互济会已成为勒捐的官僚机关，并且是一般富农商人和保命保产的人所组织拿来勒捐以取好政府的（陈同志报告），这简直是反革命的组织了，应当立即解散。如果里边有工人农民群众，则应领导群众起来驱逐这些反革命的腐化的分子，改造这一组织。救济费应当经过广大的宣传的募捐运动得来，对于工人农民的捐助不能有丝毫的强迫。救济费应当用在真正救济革命战士及其家属的身上，不应移作他用。

第六、关于肃反工作，你们必须依照苏区工作计划所规定的加紧进行，尤其是在苏区受了挫折的北岸，一切反动的组织如北极会、硬肚会、改组派乃至蒋介石的侦探都将混入到赤色区域来捣乱。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他们都将采用以企图消灭我们。因此，这一工作已成为万分严重，你们必须在加紧农村阶级斗争的原则下，选择阶级性坚定的工人、雇农、贫农的积

极分子去进行政治保卫处的组织和工作。

五、红军的改造与巩固，是目前苏维埃区域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在湘鄂西这一任务尤为严重。二、六军的成分，六军原来虽多是农民，但并不都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或其子弟（因为没有彻底平分土地），而二军更多是土匪出身的成分，又没分得土地，因此，他们对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观念是不很强固的。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危险。现在要广大的征调自愿的雇农贫农与中农到红军中去，这就必须实现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只有基本农民群众都已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则他们自己及其子弟加入红军去保卫和扩大土地革命胜利的决心和需要也才愈加增高。同时分配土地给红军及其家属与优待红军的一切办法必须尽量实行。这样，红军成分的改造与扩大，必然能见诸事实。红军中的工人干部，你们应选拔当地的手工业工人与雇农给以短期的训练，首先分配他们去担任政治委员或连排长或做政治工作，以学习军事经验。兵士中有战斗经验的人也应引进他们充当指挥的干部。政治委员的领导在红军中必须提高起来，他要成为监督行政、代表党指导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铁的纪律必须成为巩固红军的必要前提，而且要养成每个红军军人自觉的遵守。红军的群众工作，你们必须依去年十一月的中央训令全部施行。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行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鄂西群众拒绝为红军做被的严重现象，才不至于复现。二、六军的改编，中央曾决定苏大会后改为第三军。军事学校的学生成分，必须将富农洗清出去。

六、关于党的组织状况及工作，特委和中夏同志至今未给中央以详明的报告。中央正式警告你们，必须于最近期间作一

详细的报告来。据克昌同志报告，湘鄂西党员三万余人，成分工人占百分之四十，贫农百分之三十，中农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百分之十。这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另一报告又说党员只七千，工人贫农不到百分之五十，总之工人贫农的党员绝不会到一万二千人之多，这是可断言的。党员成分既这样不好，富农分子必充斥党内。据你们报告说，工人干部极其缺乏，党的支部几乎没有生活，党内充满了命令主义和家长制度的精神，“党的组织军事化”至今还成为党内口号。因此，党内没有最低限度民主化生活，没有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纪律的执行毫无自觉性与教育性，不是用枪毙来恐吓，便是根本没有纪律。党内更没有宣传教育工作，腐化官僚主义的分子甚至富农分子还保留在党的指导机关，党对群众也是命令的包办的，党的政治影响没有深入群众，群众不认识共产党，甚至党员也不知道加入了共产党，或者说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或者因为杀改组派而嚎哭，以为自己是加入了共产党。这种现象是非常之严重的。如果不迅速的改正，将不能负起日益高涨的革命领导责任。目前最紧急的是你们应依照国际组织决议案、四中全会决议案给以全部的实现。这首先就须广大的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而坚决的肃清党内富农分子和一切腐化官僚主义分子，对于新党员必须举行入党仪式和初步教育工作。要将国际决议案、四中全会决议案发布到全体党员群众中，发动反立三路线与反富农路线的斗争，领导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坚决肃清命令主义委派制度，联系到支部实际工作。改造支部领导，建立支部生活，并且要改造各级指导机关。要积极培养和引进工人干部，到各级指导机关工作。对于工人干部的引进要带充分的教育性，并且要尽可能办党校或流动训练班，从实际斗争培养新的干部，对于坚决反立三路线与

反富农路线的干部，应该毫不迟疑的引进。要从上而下的检阅各级指导机关工作，肃清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要每一纪律的执行都要有充分的教育党员的意义，而不是惩办主义。各级组织要有经常的巡视员巡视各地工作，领导路线上的转变和支部生活的建立。党报，据我们收到的看来，还是立三路线的刊物（甚至还造谣来欺骗群众，如说武汉总同盟罢工实现，红军三次占领长沙等等），所以首先要转变成为国际路线的刊物，要公开批评过去立三路线和富农路线及一切右倾“左”倾错误，要严厉指斥腐化官僚主义，总之，要成为党的路线以至实际工作转变的喉舌和教育党员群众的武器，因此，编辑印刷都要改良。

党与群众的关系，要在一切群众组织中和政府中组织党团，经过党团作用去领导群众组织，肃清命令包办的传统。同时要极力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使群众了解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党，这里并不是要如特委所决定，要将党的组织从支部以至特委都公开起来。如果党的政策错误，每个党员都不能成为群众的真正领导者，公开也是不能取信于群众的。相反的，在革命战争中，苏区的党要保持因环境而改编的弹性，同样要保持组织的秘密。

最后，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以贯彻国际路线的实现。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对右倾与富农路线，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这正是加强反右倾立场的斗争。同时，要反对对“左”右倾调和的错误，尤其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要如国际决议案所指示，对一种偏向就是还没有形成的，也要毫不容情的打击，才能最终的克服托陈取消派的影响。现在右派反党和分裂党的活动更加帮助了取消派破坏党的行动，湘鄂西党对于右派活动和取消派回党活动，都应该准备着火力

去严重的打击。最后，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到支部和群众工作中去，以加强支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肃清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而巩固党的思想上布尔塞维克一致性。这样，湘鄂西党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执行坚决的转变，领导湘鄂西的群众冲破敌人的“围剿”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此致

布尔塞维克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一、三月十日

附：特委二月份三封短信，因在昨日始到，故只能大体的说到，不必详细复你们了。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邓中夏。

〔2〕即瞿秋白。

PDG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一九三一年三月）

毛　泽　东

一　总政治部的通令

红军各级政治部、政治委员，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

《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为了这个需要，把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写成一个小册子附在下面，发往各地。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文化部接到这个通令和小册子之后，应即速计划举办起来。本部出的《红军报》可以供给《时事简报》的一部分材料，除发给红军之外，从近日起每期（三天一期）发二百二十份给江西省苏维埃文化部，再由省苏文化部转发各县苏、区苏。大约每一个区苏有一份，各县苏、区苏如未接到，望向省苏函索为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于黄陂

二 怎样办《时事简报》

（一）红色区域举办《时事简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

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同志们，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这种现象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努力地扫除这种现象，是苏维埃和民众团体的责任。扫除的方法，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等项固然都是好的，举办《时事简报》更是一种好的方法。

（二）新争取的区域用《时事简报》去推动群众斗争。

那些新争取的地方，《时事简报》更有伟大的作用。当着红军占领新的地方，引导群众起来斗争，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当着这个地方的群众起来做这些斗争的时候，他们一面在那里斗争，一面却时时有一种疑虑：我们不是孤立的吗？我们的斗争不会失败吗？当着革命群众有这种疑虑的时候，正是潜藏的反动分子造谣恐吓的时候。这时革命群众所热望的，是近地及远地革命红军的援助。这时候，《时事简报》跑了出来答复他们这问题。记得去年（一九三〇年）三月红军占领大余时，出了一张《时事简报》，贴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引起成群的人川流不息地去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大余是一个例子。过去红军用这个方法作为发动

群众的工具，收了很大效果的还做了一些，可惜没有普遍地做，更没有经常地做，是一个大的缺点。

（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

1.《时事简报》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

2.《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的消息是：（1）群众斗争消息（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2）苏维埃的活动（开了代表大会，出了重要布告等等）；（3）红军的活动（作战胜利、帮助群众分田等等，但军事秘密如红军的人数、枪支、编制、行动、番号等不可登载，以防泄漏）；（4）统治阶级情形（军阀混战等等）。

3. 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

4. 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

5. 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6.《时事简报》的材料，关于本地的和近地的，那就很容易采取；关于远地和全国的、国际的，从总政治部所出《红军报》采取或从别的报上采取。

7. 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

8. 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

9.《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

10. 编辑办法。地方县苏文化部设一专人，每三天编一张稿。稿子上的消息是本县的、邻县的、全国的、国际的，但不是每期要有各种新闻，几期本县新闻多些，几期邻县新闻多些，要紧的是本县、邻县这两部分新闻，因为它是群众欢迎的。全省的、全国的每期条把就够，国际新闻几期之内登他条把，这些新闻不可没有，没有就不能引导群众参加大范围的斗争，因此一定要有，但决不可多。多了，一来占去篇幅，把本地近地的重要消息篇幅缩小；二来这些消息缺乏兴味，群众不易了解。县苏文化部的《时事简报》编辑员把这一期稿子编好了，按照区苏的数目，每个区苏抄发一张，寄与区苏文化委员。区苏文化委员接到县苏文化部的稿子，在上面加上本区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在《时事简报》里头占着第一等重要地位，因为没有这部分新闻，便缺乏《时事简报》的中心内容，因而也决不能引起群众注意，决不能达到《时事简报》所要取得的效果了。区苏文化委员把本区新闻加上去了之后，把这整篇稿子，按照全区乡苏的数目，每个乡苏抄寄一份。乡苏文化委员接到区苏的稿子，再在上面加上本乡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也是要紧的，它的主要意义是引动看报的兴趣。要到这个时候，全篇稿子才算编成。按照本乡村的数目，每村一张，用大字写在大纸上面，加上红色圈点记号，写上出报日子，派人张贴到各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要到这个时候，才叫做报。县、区两级文化部写的都不是报，只是报的稿子。这种做

法，功效是很大的，假如全县有一百乡一千村，每隔三天全县百乡千村的群众就都看到了《时事简报》。这种报同时又可做识字运动的材料，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真是好得很的办法。

11. 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比如一期《时事简报》有八条新闻，那末县苏的稿子四条（其中本县两条、邻县一条、国内国际一条），区苏加上三条，乡苏加上一条，共八条。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

12. 红军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决不可像过去一样，有些完全忽视这个方法，全不注意编《时事简报》；有些编一张不编一张，断断续续地在那里做一点。这些都是不对的。红军散开在做群众工作时，一定要有计划地编《时事简报》给群众看，但把编好的《时事简报》同时多挂几张在各个伙食单位的宿营地内给士兵看，也是要紧的。红军在集团驻扎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士兵看，但同时多挂几张给当地群众看，也是必要的。

13. 红军编《时事简报》，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由军政治部编成初稿，发往各师；各师政治部或政治委员加上当地新闻及本部活动消息，发往各团；各团政治委员又加上当地新闻及本团活动消息，发往各连。（以上者都是稿子。）由连政治委员指定文书、上士及其他能写字的，按照当地村庄数目，用大字大纸写好，加红色圈点记号、出报日子，每个村庄一张，派宣传员前去张贴，贴到显要之处给群众看。同时留一张贴在宿营地，由连上识字运动委员会指挥识字小组，引导各组士兵去看。红军在集团驻扎训练时，《时事简报》的作用既主要是给士兵看，那末军政治部宣传科编稿时，除了编上地方斗争消

息、国内国际政治消息（一条至二条）、友军消息（一条至二条）外，最要紧的是要编上本军消息（一条至三条）。编好了，发往各师。各师又加上本师消息（一条至二条），发往各团。各团又加上本团消息（一条至二条），由团政治委员指挥宣传队及团部司书按照连的数目，用大纸大字写好，每连一张，发往各连，引导士兵去看。每期《时事简报》条数至多十条，字数至多四百字。

14. 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

15. 《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

16. 《时事简报》一定是要大张纸、大个字写的，油印的要不得。现在总政治部出的《红军报》，省苏、县苏以至区苏出的报纸，各军各师出的报纸，凡属印刷成功的小字出品，不论它的用意是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的，实际都是只有干事才能看得懂（有许多下层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决不能拿了这些报去代替《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日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黄陂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

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向红军的总攻击中，一方面表现着敌人倾其全力，调动了三十师以上的兵力向红军进攻；一方面在敌人这些军队中的广大兵士群众，因为生活的痛苦——不断的军阀战争，长期的拖欠军饷，因为政治的觉悟——红军与土地革命的影响，的确表现着一般的动摇：士兵斗争在各地的发展，不断的兵变发生，但大多数尚是自发的，有党的领导的是占极少数。

为着拥护苏区与红军，打破敌人的围攻计划，敌人军队中的兵士工作的重要是无可争辩的，同时客观条件也是利于兵运工作的发展的。然而我们的党、青年团和革命群众组织，对于兵士运动的工作，一般的仍然忽视这一工作，这就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党部、青年团部以及革命的工农群众的组织能尽了他应尽的责任，这是由于在立三路线之下，空喊着兵变兵暴，实际对于兵运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消极，忽视准备和领导兵士的争斗、兵变和兵暴。

在拥护苏区与红军的目前紧急的任务中，在反革命的国民党积极进攻革命中，我们对于敌人的回答是万分不够的，尤其是最实际的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真正执行国际路线和四中全

会的决议，不但工农群众中的工作要加紧和转变，并且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也要加紧和转变。

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而且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党内对于兵运工作的立三路线的极有害的观点，是还没有遇到应有的打击的。各级党部还不曾把兵士工作当作群众工作，而只视为一种专门人才的工作；因此便不曾动员过全党全团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的组织共同进行这一工作，在组织上也绝少派遣过足够的得力的干部到敌人军队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起有力的领导，在宣传上也很少有很好的经常的普遍的向士兵群众的宣传。于是兵运工作始终是束缚在很狭隘的范围内与很单纯的路线上，这样，无论如何是很难有好的成绩的。现在必须要警告全党同志的注意，在观念上在实际工作上必须要有一个很切实的转变——必须要认识兵士工作是一种群众工作，是党的战斗任务，必须要动员全党全团以及革命群众的组织共同进行，必须要了解在敌人中心部队中建立起一个支部与一种兵士群众组织，应当视为在中心产业中建立起一个支部、一个赤色工会分会有同等重要。

中央在督促全党切实进行兵士工作中，特规定出目前具体的工作如下：

一、在江苏方面：

（1）省委应派出巡视员三人专门巡视全省兵运工作，特别以南京徐海蚌为中心，其次为沪宁线与上海，督促指导并建立各地党部切实进行兵运工作。

（2）派遣得力的干部和非党的工农分子，经过相当的训练，到各中心部队中去建立起有力的领导。由现在到“五一”节，至少应送五十至八十人到各中心部队中去。

（3）各地应经常开办一兵运的短期训练班，施以二三日的训练，每次七人到十人的数目，以便经常的有人打入到敌人部队中去。目前训练好的十四人应即分散到蒋[1]系中心部队中去。

（4）应出版一种对士兵的经常宣传品——兵士周刊，按期分散到兵士群众中去。

（5）在已成立的兵士支部中，党应加强领导，并发动兵士的斗争，扩大其组织。兵士群众的组织也应从斗争中和工作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

（6）应派遣专门的同志打进海军、飞机厂和铁甲车内去，进行这些特种兵的工作，并组织破坏的工作。

（7）在上海兵工厂内应迅速建立起党和团的支部。

（8）应加强并扩大党、团及赤色工会、农会对兵士的宣传，尤其是拥护红军告敌军兵士书应普遍的散发到敌军中去。

二、在湘鄂赣闽粤皖浙等省，省委应照江苏一般的工作，在未有省委或地方党部较弱的地方，由中央派人前去加强指导，尤其是武汉、长沙、南浔等处，中央须经常直接派遣人到该各地方的敌军中去建立工作。同时：

（1）每个省委及地方党部应经常注意进行破坏工作，特别是战区内和其附近应进行破坏敌人的运输——铁路、桥梁、电线等等。

（2）应组织三人五人一队的模范队（冲锋队）在动员和运输的军队中去作宣传和组织工作。

（3）在铁路、海员中努力宣传鼓动的工作，使他们拒绝运

输军队与军械。

三、其他各省方面：

（1）在北方各省应首先建立平汉、津浦、陇海几线的重要城市的驻军工作。在目前山西、陕西军队中不断的哗变，中央决定派人北去指导进行这一工作，并要河北省委在北平征调三四十名学生同志，在全省征调一些工农分子打进阎冯[2]系的军队中去。

（2）四川方面，中央决定派一人前去参加省委工作，转变兵运的路线并负责指导整个兵运工作。

四、青年团应即改正过去忽视兵运的错误观念。青年团除督促各级团部积极组织模范队在各地进行兵运工作外，应征调大批团员及青年群众并规定确实数目，经过短期的训练派送到敌人各中心部队中去。

五、各工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组织，应经常组织宣传队、模范队在兵士中工作，尤其在战区附近更要加紧向敌军工作，如开联欢会、散传单、贴标语与作个人谈话等等。此外，或经过兵士家属通讯的宣传，或经过家属关系进行组织。

六、各地方党部应建立起兵委的工作，由兵委负责一人、工运一人、党组织部一人、团兵运负责一人组织之，以计划指导各地兵运工作。

七、兵运中特别要注意秘密工作，党的组织要非常严密，除小组会外，同志间绝对不能有横的关系。兵士群众的组织可用各种名义发展，对敌军官长亦须尽可能的保持着秘密。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阎锡山、冯玉祥。

PDG

中共中央给共青团四中全会的信

——青年团的三个中心任务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

亲爱的共青团同志们：

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内全体同志，向你们的为了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斗争的四中全会，致热烈的布尔塞维克的敬礼。我们完全同意于你们的政治决议，认为你们在决议上所写的任务是你们团的目前的主要任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你们的团才能完成它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中间的领导作用。

但是除了同意你们决议之外，我们必须要全团的同志特别注意下列三个中心的任务：

第一，青年团同志必须用全副力量做反军国主义与拥护苏维埃的工作，我们认为过去的青年团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完全没有注意，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现象。尤其在现在当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用所有的力量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准备着反对社会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大战争时，当蒋介石用了三十师的兵力企图再来“进剿”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时，这反对世界大战、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中国军阀进攻苏区红军、反对中国军阀间混战的工作特别重要。同时我们不要一刻忘记，这工作的执行是同兵士运动，是同派遣工人干部到红军去不能一刻分离的，只有坚决的执行从敌人军队的内

部造成兵变，用一切方法瓦解他们的军队，以至使他们的军队转变到红军方面来，同时把大批的青年干部尤其是青工干部送到红军中去，我们才真正执行了反军国主义与拥护苏维埃的任务。不然一切反军国主义的与拥护苏维埃的宣传都不过是嘴上的空谈。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严重的指出，过去青年团对于兵运工作与派送青工到苏区去的工作完全忽视。我们在这里要唤起全团同志及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对于反军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士兵运动与送到青工到苏区去的工作的注意，我们要拿这一工作的成绩来批评你们的青年团是否完成了它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与对于中国工农群众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第二，青年团同志必须用全副力量使青年团不是少数青年工人与青年农民先进分子的组织，而是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的群众组织。我们应该特别指出，过去党与团把青年团当做第二党以及取消青年团的思想与行动，使青年团的工作始终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与极少数青年工农之中，实在是十分有害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与行动。我们很坚决的在这里指出，青年团的工作必须是青年的而且必须是群众的，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根本把青年团过去的工作方法与工作形式加以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自从中央局改组以来已经开始，但我们必须说出青年团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是微乎其微。工作的转变现在还限制于上层的指导机关，还限制于决议上，而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我们要号召全团同志以坚决无畏的精神，用各种各样的新的工作方法与形式，去打入青年群众去接近青年群众，去团结去领导青年群众，并且对这些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与贫苦的青年人大大的开门，使青年的劳苦群众大批的跑到团内来，以新鲜的青年劳苦群众的力量来发展与巩固团的组织，来兴奋与活泼团的工作，给青年团开辟一个广大的前途。同时必须尽量把在斗争中

积极的青工干部提拔到领导机关中来，用一种新的工作方法与形式，使青年团变为劳苦青年的群众组织，也是青年团以后最中心任务之一。青年团的能否为青年劳苦群众的领导组织，为青年劳苦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学校，也是拿这一点来决定的。

最后第三，你们必须用全副力量反对青年团内两面派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自从李立三路线在团内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以后，为李立三路线所掩盖着的失望与消极的情绪特别明显的表现了出来，当然要把李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一切工作方法与工作形式完全打破，要使得我们的实际工作得到真正的转变，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只有加倍的努力，我们才能征服这些困难，才能使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出来。但是有些工作的同志投降了这种困难，在这种困难前表示了失望与消极的情绪，他们虽是在嘴上表示拥护国际路线，表示维护党四中全会的决议，但是在实际上对于国际路线的执行是怠工的。这种嘴上拥护国际路线而实际上对于这路线执行怠工的两面派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实是团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我们要告诉全团同志，在目前这一阶段上，一般的口头上的与文字上的和清谈式的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已经是不够了。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这些同志是否在实际工作中反对立三主义，执行了国际路线，坚决打击团内两面派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实是团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消灭这种两面派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国际路线的执行是没有保障的。

亲爱的青年同志们，我们在你们的前面特别提出了上面的三种任务，并不是说其他的任务是不重要的或是次要的，而是说这三种任务的执行为其他任务的完成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青年团的同志们一定能够拿出青年人所有的一切热情一切

坚定性，来顺利的完成这些任务，来帮助党争得对于千百万青年工农的领导。

亲爱的同志们，世界革命的发展现在真是一日千里。为了要领导这加速发展着的革命的潮流，世界无产阶级用了革命的竞赛、突击队等方法，要在最短期之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在这里各国青年团团员是常常站在前线上的。我们相信，中国的青年团团员当然不会是例外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利用一切这些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与他的中央的政治领导之下，团结在你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拿出青年所有的热情与勇敢来加速的完成你们的伟大任务！

中国共产青年团万岁！

少共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万岁！

中国苏维埃与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

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红一方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在第一期龙冈东韶两役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为了避免统治阶级的崩溃作最后的挣扎，为了要维持他们将死亡的生命，而更要向革命作更残酷的进攻。最近加调上来的王金钰部两师（一师已到吉安、吉水一带，郭华宗师尚在高安），郝梦龄（向吉水运动中）、胡祖玉（宜黄）、韩德勤（新干）、刘和鼎（建宁）、罗卓英（萍乡）等五师及在吉安原有的公罗[1]两师，都有积极准备向我们前进之势。第二期的战争就快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这回比前次作战胜利的条件更具备了。蒋张[2]冲突的日益紧张，全国经济恐慌的不能维持，都促成新军阀混战的必然爆发，这是使他们非常不利的。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则已有全国规模的胜利，答复了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特别是龙冈战后敌人不特损失了两师的兵力，同时部队也更动摇了，士兵也更趋向革命了。我们不特得到许多枪械子弹的充实，而且地

---

* 这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

方武装也增多了四千杆枪。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决定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具体方法（在赤区军事会上的讨论）。富田事变的完全解决，使河西的革命势力又要更集中起来。另外我们新增加了一支生力军——第七军（据报该军已到鄗县遂川两处），又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使敌人进攻我们的计划不能不略受牵制。这种种条件都保证我们这回必然要得到更大的胜利。

为了要更确实取得这个更大的胜利起见，我们应将过去作战的缺点检阅一下，而对于这次作战做个更好的准备。除关于政治宣传鼓动方面已有总政治部通同指示外，特将军事方面应准备的工作分列如下：

一、前次作战前后的总缺点

（一）战前

1. 预期作战地区没有事先部署，以致攻击龙冈的略图只是就近调查的，路线也是临时问的，而群众也是临时才去调。

2. 许多部处（参谋处、副官经理处、军医处）没有开会专门讨论准备作战的工作，以致作战时抓不着头绪，或忙做一堆，或不晓得应做些什么，或工作人员一起都派出去了再无人可派，或做起事来器具又没有带（如参谋不带复写纸、铅笔，医官没有带应用的药品）。

3. 给养没有充分准备，以致作战时有些部队两天没有吃饭。

（二）战中

1. 变更上级作战方案时而传达得含糊，接受上级作战命令时又不能领会上级的意图。

2. 指挥上有些掌握不到队伍，有些少机动性，有些不注意战场上全般的状况。

3. 上下级及友军间相互联络很不密切（报告、通报极少)。

4. 部队战时的给养多接济得不好。

5. 各部队的人员组织多是无计划的，不科学的，在战场上或后方，忙东忙西达不到任务。

（三）战后

1. 追击队没有组织。已往追击敌人的部队，上级指挥官也没有给以任务。追击部队没有得到最高级机关的命令，有自行撤回宿营的（如东韶之役)。

2. 打扫战场不是有计划的指定专员，分派部队去负责。

3、各部多没有派人去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特种器具和特种人才等。

4. 战斗结束后，很迟甚至没有将敌人退却的方向、途径、情形报告。缴获、损失数目和部队补充整顿情形报告得更慢到不得了。

5. 战后胜利品、俘虏、伤兵的处置太慢，这是很妨碍追击的。同时也太不注意招待伤兵，饭汤都很久得不到食。

6. 不能立即的饱餐士兵，恢复部队的精神，以致喂马、擦枪等……

7. 俘虏兵没有派专人去负责管理，以致俘虏兵整天没有饭吃（龙冈之役)，对我们不满意。

二、现在应准备的工作

（一）鼓动

1. 除政治鼓动参照总政治部所指示的外，并应各部分别举行誓师。

2. 在出发作战前，应集合部队讲话作鼓动。

（二）会议

运用各种会议，去做战前的准备工作和讨论战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战后的处置，这是达到任务的最好方式。因此各部应即召集下列各种会议。

1. 军或师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1）召集参谋会议，讨论战时的部队注意事项，参谋工作，各方联络法，后方勤务，以及战后搜寻机密图书方法，并目前各部的训练方针。

（2）召集副官会议，讨论关于战时杂务人员的分工，大行李的指挥法，给养的接济法，前方临时事件及俘虏之处置及遣送法，胜利品的处置法，伤兵的招扶给养茶水和转送问题。

（3）召集军医会议，讨论关于伤兵的救护及转送事项，绷带所的设立问题，战后药品、西医、看护等的搜集方法……

（4）召集团长、团副以上的军官会议，检阅过去训练上及战时指挥的缺点，并讨论此次作战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并目前的训练。

2. 团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1）以团为单位召集排长、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一次，检阅过去作战的缺点，和此次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

（2）以团为单位召集副官、特务长、军需上士等给养人员的会议一次，讨论战时的给养接济及战后伤兵俘虏兵的给养问题。

3. 连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1）以连为单位召集副班长以上的连务会议一次，检查过去战斗的缺点和讨论战前的准备及战时战后的注意事项。

（2）开连的士兵会一次，报告此次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意义，及我们应有的努力。

（三）训练

1. 依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军长、师长都要去看操课）。

2. 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一次。

3. 每天早操一律作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间点名时做军事讲评。

4. 杂务兵（特别是挑夫）要派员教他们站队、走路、休息、停止（靠路的一边）等动作，以免阻碍行军及战时队伍的增加。

5. 担架兵、看护兵须联合演习救护法、转送法。

6. 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荫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藏身体（详见长沙时所发之方面军第一号训令）。

7. 对火夫应尽量减少其疲劳，并训练增进其炊爨能力。

8. 讲解武器拭擦法、保护法，并督促士兵实行。

（四）给养

各部一律须准备米十天，钱一个月。

以上各项，各军于接到此令后，要立即开会，自定详

细计划，使所属各部去切实执行，并且一面呈报本部考核为要。

此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公秉藩、罗霖。
〔2〕指蒋介石、张学良。

PDG

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敌我形势和争取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红军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地方各级政府：

（一）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

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龙冈战争虽然取得大的胜利，但仍未能转变这种攻守形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可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攻势强迫着他变成一种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有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败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了，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练。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进一步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争夺领导权冲突的迅速爆发，使各派的力量更加削弱，使各派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加发

展，造成革命的客观形势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促进反动统治区域工、农、兵士、贫民斗争情绪的高涨，斗争实质的加深，斗争范围的推广，扩大旧有的红色区域与红军，创造新的红色区域与红军，使革命发展在全国内更加扩大起来，由此去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至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假使我们不能争取这次战争的更大胜利，便不能转变敌我的攻守形势，那与我们上述的任务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去争取第二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哪一个对于争取这一次胜利不努力，哪一个就是革命的罪人。

（二）目前敌我形势和我们二次战争的胜利条件。

龙冈、东韶战争以后的政治形势，在反动统治方面，军阀战争的危机一天一天继续发展。如最近山西编制问题的就绪；张学良对于军阀旧部的拉拢；北方七省财政会议的召集；蒋介石极力拉拢黄绍竑解决两广问题，召集军官讲话团结干部，派人到各省拉拢小军阀；四川、云南等省小军阀的冲突不得解决等等，都是蒋、张冲突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证据。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第一次的进攻，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失败。第一军在鄂豫皖边界有胜无败，最近打下黄梅等处，蒋介石派七师兵力去打，无可奈何。贺龙等领导的第二军团在湘西鄂边活动，蒋介石也曾派四师兵力打过，也奈何他不得。赣东北的第十军、湘鄂边的第十六军等活动，十六军曾在通城解决敌人整个一团，缴枪千支。闽西、龙岩虽失，红军现又向汀州发展，打了胜仗。广西红七军驰突于桂湘粤三省之交，最近到了上犹、崇义，不日即可和我们汇合。至于我第一方面军第一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是影响全国，给反动阶级以一大的威吓，给各地工农以一大兴奋。据近日上海来人说，上海工人曾起来热烈庆祝这次胜利。至于江西红色区域，除一些城池被敌人占

领，接近这些城池的地方有一部分群众“反水”之外，有些地方还有发展，特别是广昌、石城、宁都、三都、七堡以至永丰、乐安、南丰等地，新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在红旗之下斗争起来。至于宁冈、赣县、吉安、吉水、安福以至北路的群众，都在不怕疲劳的与敌人不断斗争。所以上面这些，一方面证明军阀的冲突加剧，一方面又证明革命势力的顽强，这样使得蒋介石对于南方各省革命势力的镇压，尤其对于第一方面军二次进攻的企图不得不更为积极些。

蒋介石在江西的兵力，除原有的公、罗、蒋、蔡、毛、许、胡[1]等部外，虽然增了王金钰、孙连仲两部，数目较前加多，但后方交通须要许多兵力维持，红军第七军来赣，又要抽兵对付，因此实际用上来的兵力将不能超过九师，仍较上次兵力差不很多。加以张、谭惨败，兵心较前更加动摇，赤区进兵较前更加困难。敌人方面的弱点，原来是很多的。我们方面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敌军，但我们有一个最大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七军到来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三）逼在目前的第二次战争与我们的准备工作。

目前敌人已开始移动。南丰增加一团敌人。王金钰已到南昌设督办署，王部有到南城说。郝梦龄部到达吉水，吉安有部

队增加，并极力拉伕。二次战争的爆发，已一天一天逼近了。加紧准备二次战争的一切工作，是争取二次胜利的必要条件。除关于军事训练工作已有参谋部指示外，本部特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分为红军与地方两个方面指示如下：

第一、红军的准备工作。

（1）以军为单位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会议，除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科长以上人员到会外，宣传队长、士兵会主席均应到会。会的内容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二次战争的意义和军中宣传鼓动计划。报告之后须深入讨论，注意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见解与实际宣传鼓动的执行方法。

（2）以师为单位，召集士兵大会。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对争取二次胜利做一大鼓动，讲话的人除师长及政治委员之外，军长、军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要分别出席。

（3）指导士兵会开士兵会，主要是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各种问题来讨论，使士兵对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能进一步的了解，对于准备的实际工作能使士兵群众自觉的做起来。

（4）以军为单位，在大部队，□□后开誓师大会。部队之外，要发动当地群众参加，主要意义是鼓动士兵、群众，提高士兵、群众的作战勇气。在大会中讲话的内容和技术要简短、有鼓动性，讲话中要插入少数口号，鼓起会场的热气，并须有准备的推动士兵提出一些关于作战方面的问题，连坐法等重复在大会通过。

（5）在群众会、士兵会、誓师会中，都要讲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作战注意作战经验，报告各部队的特殊优点与缺点等）。

（6）组织并鼓动作战附近地区的群众做各种参加及鼓动红

军的工作，如举行赤色区域派代表团到红军慰劳，组织担架队，欢送红军作战，送茶水、粥饭等。

（7）政治部应即进行对俘虏宣传工作及宣传品的准备，办到每个俘虏有一种好的宣传品。

第二、地方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准备工作。

（1）以县为单位召集各级政府主席、游击队长、民众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计划白军前进时坚壁清野及参战的工作。

（2）以区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主要是鼓起群众热烈参战。

（3）选举有说话技能，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组织地方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中鼓励红军作战。来时至好有布置，红旗上面用大字写鼓励红军的口号，写明送给某军、某某地方工农群众或某团体赠送。同时有宣传单告红军战士，能带些慰劳品来更好。

（4）准备敌人经过地方的宣传工作。各村各乡应满写着宣传敌人士兵的标语，散布许多简单明了（加几句口号凑弄来）的传单，但口号条数不要多，到处多写相同的几个主要口号。

（5）各乡村组织士兵运动委员会，做白军士兵运动。

（6）动员群众准备欢送白军俘虏的欢送工作，如俘虏经过的地方政府应招待饭餐，杀猪给他们吃，沿途送茶水、饭粥，高呼欢送新同志的口号，由群众送食物给俘虏，同时对他们宣传鼓动。

（7）地方武装部队参照红军政治鼓动工作准备。

二次作战中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口号：

一、勇敢冲锋！

二、拼命杀敌！

三、拥护共产党！

四、拥护苏维埃！

五、活捉何应钦！

六、打倒蒋介石！

七、二次战争胜利万岁！

八、工农解放万岁！

对白军宣传鼓动口号：

一、白军弟兄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杀工农！

二、白军士兵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

三、白军弟兄杀死反革命的官长，自己举出官长成立红军！

四、白军士兵不上前线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五、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屠杀工农！

六、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打土豪分田地！

七、优待白军俘虏兵！

八、医治白军伤病兵！

九、欢迎白军弟兄下级官长来当红军！

十、穷人不打穷人！

十一、士兵不打士兵！

十二、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主任　毛泽东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刊印。

注　释

〔1〕指公秉藩、罗卓英、蒋鼎文、蔡廷锴、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

PDG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的研究了赣西富田事变的已有材料之后，更根据目前事变的发展，特对此事变成立以下的决定：

（一）红军二十军一部分的暴动，红军学校之被缴械，在AB团影响下的省行委分子之被释放，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之被捕，以及“打倒×××拥护×××”[1]的口号的提出；——这些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

在阶级敌人这种行动中，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减轻此次事变的反革命的实质。

（二）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战斗》第二期。

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红军内以及红军外的一切指挥机关应格外注意反对反革命的斗争。

富田事变指证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的基础建筑在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富农、大商人以及旧官僚的身上，在南京政府与白色区域鼓舞之下，极力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很巧妙的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和工会中进行他的破坏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的进攻。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凭借着苏区内富农的领导，更利用立三路线下的"左"的以及极右的口号，来破坏工农的联合，来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葬送红军的生力。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在个别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有严密计划的在做工作。AB 团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据。同时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以及最近从党内分化出去的罗章龙右派小组织，都必然是江西 AB 团的第二，而且有些地方，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革命的暴动（如闽西的傅柏翠等）。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它将增加党员中群众中不自信的恐慌，并助长立三路线揭发后的悲观、失望、消极、逃跑等等右倾情绪。闽西在傅柏翠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后，一部分群众中失败情绪的增长，便是主要的例证。

因此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1）严厉的消灭 AB 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他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2）立时将一

切反动分子与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3) 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碎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是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4) 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要认识“杀尽一切富农”的口号是不正确而有害的。农村中有组织的贫苦群众，应执行反富农的斗争。用“杀尽一切富农”的错误口号，从上面打击富农来代替贫苦群众有组织的反富农的斗争，只有吓退中农与加强反动势力。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到处组织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在一切地方发展反富农与一切剥削分子的群众斗争。

（三）永阳省行委（这次反革命事变的指导者）应立时解散，立时停止它的一切活动，与永阳省行委执行同样行动的其他党部亦应受同样制裁，如果他们不执行此要求时，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他们。

在未举行江西省代表大会以前，由总前委所成立的河东省委是全权的省委，他应在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之下准备召集省代表大会。赣江以西的各县地方党部如永新、莲花、宁冈、遂川、泰和等在未与河东省委打通以前，得暂归湘东南省委管辖。

（四）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他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用一切可能将二十军挽回到自己的监督下来，不允许以后我们任何队伍重演这种行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对军事组织中的分裂负责。

（五）苏区内的各级党部特别是红军中的党部，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与蒋介石派到苏区与红军中从内

部进行破坏我们红军的走狗们的斗争，这是蒋介石用来补充他的“围剿”计划的新策略。对于这些反革命走狗们的斗争方法，应依照阶级路线去解决。对于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的反革命，应执行极严厉的制裁。对于受反革命欺骗迷惑的贫苦群众，应采用群众斗争的路线，将他们从反革命影响之下分化出来，而夺回到革命方面。

各级党部与红军的指挥部除了此种有系统的斗争外，并应不断的注意考查投降我们的白军士兵和成分，使敌人没有可能从这条路上派遣他的走狗到红军与苏区中来进行破坏工作和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一般的规例是改变这种投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的指挥部，将这些士兵分编到我们已历练出来的很好的队伍中去训练他们。同时在苏区在红军中，应严格注意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右派的新策略与活动，他们实质上与蒋介石、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一样来进行破坏红军消灭苏维埃运动的任务，我们应严格的坚决的反对这种种反革命的企图。

（六）二十军暴动的事实告诉我们：红军中的各级党部还没有了解和执行党与中央指示给他们的任务和责任。红军中各级党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加强红军的革命纪律与战斗力。因此执行上级机关、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的命令是每一个党员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自然公开反革命的命令除外）。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力停止各队伍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力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个别同志的党籍。即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容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

一切这些训令的目的，是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和帮助他实现

革命任务的，但是不能因此训令而取消红军中各级党部的党内生活，相反的，他应在执行党部主要任务与上级机关训令的方向上，特别在执行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训令中来加强党内生活。

富田事变他方面又指示出:二十军中一部分党员受了AB团捣乱的欺骗和迷惑，他们认为可以用分裂军队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争执，因而走上了分裂二十军以及用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机关与其他红军的道路。

中央坚决的指出，在红军问题中，在党的组织问题、经济政策以及土地革命问题中，没有任何党的争执应该引起分裂和破坏红军的行动的，而且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

（七）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有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这是要根据着各区的具体条件，适合着中央所发的军事训令，采用各种战斗的方法来做的。

（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本文在《战斗》第二期发表时，此处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

PDG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

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这两种表格主要地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

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

现在这两种表格，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深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

到底如何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

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

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

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特别是要说清楚：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以上各项，如果调查时不弄清楚，则自己茫无把握，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

这两张表格——土地表格和人口表格有密切联系，填写时必须同时进行。无论个人或团体，填写好了可封好直接邮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收。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 政 治 部 主 任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

闽粤赣特委：

最近没有得着你们的正式报告，仅据闽省委的来信及闽西交通的传述和敌人的报载，知道了闽西目前走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中央认为闽西这一严重状态的造成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过去立三路线种下来的恶因，如放弃巩固根据地的任务，采取冒进攻坚政策，不注意红军成分干部与党的领导的加强，只企图猛烈扩大，一杆枪都要集中到红军来，结果红军攻入东江，使闽西的根据地动摇，红军遭受了敌人的打击，红军的战斗力大大丧失，又如不曾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使富农分子存留在党内，参加到政府和红军中，以及党的组织不严密和政府人员的腐化，经济政策的错误，土地革命的利益被富农攫去；另一方面在敌人向红军的总进攻中，不仅是调动了几十师的兵力，而且动员了整个反动阶级力量，尤其是在过去第一次总攻击的失败和现在第二次总攻击的遭受了部分的打击（如平汉线）的时候，更使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是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我

们指出这两点，是使你们了解我们主观上的原因——立三路线给了敌人以进攻的机会，同时应了解目前敌人向革命势力进攻的形势——动员了整个的反动阶级力量从各方面向我们进攻。

闽粤赣是整个中央区的一部分，他应当巩固这一根据地，打通中央区的联系。但在今天闽西这一严重情况之下，闽西首先应当保持这一根据地，如果企图先将闽西的红军与中央区会合，必然要放弃了闽西根据地。放弃了闽西根据地，便是中央区失掉了一部分后防，使闽西的敌人更容易打击闽西的革命势力，更容易与中央区的敌人联系向中央区进攻。因此，保持与巩固闽西根据地，即是巩固中央区的后防，保障中央区的胜利。中央指示你们必须要在保持与巩固闽西的任务之下执行以下的决定：

（一）你们应当发展闽西的广大游击队动作与敌人作战，将现在的红军从军事方面、政治方面坚强起来，并须要相当的扩大到□□□□人左右，作为军事上的中心力量，同时加紧在赤卫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挑选勇敢积极的分子组织若干游击队，配合广大的群众与敌人对抗。尤其要向敌人后方袭击，并解决敌人部分的武装，牵制敌人退到几个城市中，他的发展的主要方向应当向中央区方面。

（二）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最主要的必须在群众中来揭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并依据着下级党部与群众组织发展这一斗争。尤其是对傅柏翠的问题，一方面你们要派人到傅柏翠欺骗下的群众中来揭发傅柏翠的罪恶，使他欺骗下的群众分化过来，同时军事方面必须要设法解除了傅柏翠的武装，恢复北四区的根据地。你们必须了解傅柏翠的反革命作用将超过张贞、刘和鼎之上。（如果有方法使他立刻离开闽

西，也可采用此方法，以便对他所影响下群众的处置）。

（三）闽西在目前严重斗争情况之下，任何军事行动都丝毫不能离开政治任务的实施。当游击队动作开展过程中，同时就要执行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建立与改造苏维埃政权（乡的区的以至恢复到县的），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雇农、贫农、中农身上，来团结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群众，在无产阶级与共产党领导之下巩固起与内外敌人战斗的战线。

（四）你们必须加紧张贞、卢新铭部队中的士兵工作，不仅要向俘虏士兵宣传，还要动员群众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向张贞部队中作广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张贞部队本已有部分的动摇（闽省委的信），兼之又是本地人，在广大土地革命和红军的影响中，更加易于夺取其兵士群众。省委与特委过去都是忽视这一工作，这是错误的。

（五）根据报载，坎市、湖雷、永定已先后失去，加以傅柏翠反革命在苏区内部的捣乱，苏区内部在富农路线影响之下，一时的失败情绪是必然会增长起来的。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反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以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来。

（六）中央许可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各种干部都应暂时留在闽西工作，分配的决定由××及××三同志共同决定。目前不应以第十三军主力去担任打通中央区的任务，假使有其他办法的交通可通，××及无线电专人应尽先一批走，××则留一时期指导闽西工作，然后再去中央区，其他的干部亦应俟苏区打通后再调出中央区。中央并决定在福建省委抽调一部分干部前来，××同志已调来，他可参加特委。

（七）东江分特暂时划与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并积极组织潮梅的斗争来帮助闽西。

（八）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应特别组织漳州一带的农民斗争，配合已有的游击队发动漳属的游击战争，以牵制捣乱张贞后防大本营，同时加紧张贞部队的士兵工作。

（九）其他各项政治任务，均应依照国际路线、中央各项决议与指示切实执行，并须按时报告中央。

中　央

四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对于鄂东鄂南两特委及红十六军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中央根据鄂东鄂南两特委派来同志的报告、鄂东特委三月十六日的报告及十六军二月九日的报告，并依照目前湘鄂赣的一般情形，特成立下列的决定：

一、因为立三路线领导错误的结果，使鄂东鄂南的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鄂东鄂南两特委没有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观念和行动，反而企图以红军第十五军与第七团甚至以少数游击队去截断长江，进攻武汉；没有依照阶级路线彻底平分一切土地，使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反而将没收的原则应用到中农和贫农身上，使地主残余也分得土地，不去设法帮助雇农的耕具，而空喊组织集体农场，使没有耕具的雇农在分得土地后也还感觉不快活；在经济政策上不了解允许商人自由贸易与保护中小商人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在群众工作上不了解发动群众斗争是巩固苏区的基本力量，反而以破除迷信为当前急务，致使广大的纸钱工人失业无法解决；没有建立真正群众的苏维埃政权，不经过群众的发动和宣传，而由党决定名单，强迫群众举手，不举手的便被呼为反革命，勉强开成群众会或代表会的，亦开得像“解粮会议”一般，没有成为建立政权的会议；没有加强领导游击队与扩大赤卫队的组织以建

立真正红军的基础，没有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提高红军中党的威权，以致红军中开小差的事与肉刑的恶习还时常发现，尤其没有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红军和游击队内做彻底肃清富农分子与在群众中做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组织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反富农路线只能成为各级指导机关富农分子欺骗的空喊，要么便是采取杀富农的政策，影响到中农都要动摇。有了这些主要的错误，遂造成了这几月来鄂东鄂南苏维埃区域缩小与红军游击队节节退守的严重状态。加以最近几月，全党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坚决斗争又因交通阻隔没能传达到鄂东鄂南，致使这一转变还没能真正的开始。因此，鄂东鄂南党内现在便更暴露了在立三路线破产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有的取消游击队如蒲圻，有的等待红军来解决困难如咸宁，有的带着老婆跑反如鄂东与通山，尤其普遍的是党内、政府内、群众团体内充满了官僚腐化的分子，表现着动摇消沉与工作疲倦的失败情绪。这些，都是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二、红军第十六军自一、三集团军第二次围攻长沙失利后，他的游击行动的确是给了敌人以很大的威胁，不论在长武路沿线，或是在赣西北一带，都曾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兵力，这是对于一、三集团军主力所在地的直接帮助，同时在平浏修铜一带也给了群众的发动以极大的兴奋。不过十六军在发动群众，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建立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发动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与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来巩固这一湘鄂赣的苏区的任务执行得还极不充分，尤其是在集中指导这一任务上完全没能实现。以致直到现在，湘鄂赣边区还是四分五裂的组织，鄂东、鄂南、赣北、湘北各存在一特委，浏阳又划归湘东南管辖，这都是极不容许的组织现象，而大有害于革命战

争的统一行动的。

三、现时鄂东鄂南的党与红军十六军必须迅速的执行路线上的转变。去年国际给中国党的一切决议案与指示、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四中全会前后，根据国际路线所成立的各项决议指示与苏大会的法令草案，应成为湘鄂赣党部及十六军行动的基本方针。湘鄂赣边区各级党部及十六军应根据这些方针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将执行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反右派小组织、反主要的右倾危险以及反对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的斗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湘鄂赣各级党部及十六军应认清自己行动的主要方针，必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彻底平分一切土地，改造与建立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改造红军的成分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集中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这样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与国际及中央决议的彻底施行。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人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

四、（略）

五、红军十六军应在这一区域内行动，他应当是建立和巩固这一根据地的主要力量，并要在平浏、在修铜武宁、在鄂东鄂南各成一红军独立团，与红军十六军配合行动，发动着广大群众，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首先便要肃清这一苏区内的一切反动势力与武装。十六军与敌人作战的主要方针在目前应与一三集团军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来实现江西中央区打成一片的计划。各地赤卫队的组织应当更普遍起来，反动武装的肃清，首先应当武装农民，以便广泛的发展游击队。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的指挥必须统一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之下，当着十六军在某一方面作战的时候，该作战区

域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与游击队应该归其指挥。湘鄂赣的地方党部在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任务上，应特别注重发动南部的游击战争，以帮助十六军的行动与巩固作战的后方。……（略）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实际的任务。

六、在这一区域内，应当积极进行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这不仅要在俘虏士兵中工作，而且还要有计划的派遣得力的干部到敌人军队中去，同时并发动工农群众组织以及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去进行敌人士兵中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以动摇和破坏敌人的队伍。并从实际的农民与士兵联欢中，来打破过去士兵怕赤卫队杀他们的疑惧，以夺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过去湘鄂赣党部对于这一工作是非常之忽视的，而且常常从“轻敌”的观点出发，这是绝对错误的，现在立刻不容缓的改正过来。

七、湘鄂赣省区临时政权的组织应当是湘鄂赣边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湖南省苏维埃既已失其作用，应吸引这些工农领袖到工农革命委员会方面来。工农革命委员会可由湘鄂赣省委决定一名单提交工农革命团体来推定，或来不及推定便直接发表亦可。在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命军委会应成为他主要工作机关之一。工农革命委员会最基本的任务是要宣布与负责执行一切苏维埃的法令，负责改造与建立各地方苏维埃政权。在改造与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时，必须同时选出派赴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的选举与派送日期，务不要迟过五月中，要尽可能的在五月二十以前这些代表能达到中央区。在选派苏维埃代表的时候，各地党部要同时选派党的代表（有的可兼做两种代表的），亦依期派赴中央区，准备在苏大会前开苏区中央区党的代表会议。苏大会与党的大会的代表人数可少过原来选举条例的规定，但不得少过三十人，成分除掉农民（富

农绝对不容许当选），可占多数外，必须有工人、青年、妇女的成分参加（详细办法见苏维埃组织法）。

八、在目前反革命从苏区内部加紧进攻的严重状况下，反富农斗争的基本任务更表现其重要。在组织上，党一方面要加紧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要从党内苏维埃政权内红军赤卫队内肃清一切富农分子，并绝对不容许富农分子参加任何的组织，尤其不能容许他们自己进行任何组织。在土地分配上，不仅要给愿意自己耕种的富农以坏的土地，并且要根本取消贫农为苏维埃政府职员耕种的富农办法。关于粮食恐慌的救济，也要根据阶级路线彻底没收一切地主残余的粮食并向富农征发粮食。同时更从扩大苏维埃区域上，图谋粮食的流通与接济。工农联合的关系常常是恶劣的，这里边富农路线的领导常常是主要的障碍。要巩固无产阶级与乡村贫农中农的联盟，首先就需要使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制与加工资的利益，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而反对着富农。在党内，富农的书记必须撤换，必须反对党内主要的危险、消沉、悲观、失望等等右倾情绪与立三主义。这是助长富农路线的根源。富农分子在党内政权内领导着家族的械斗，更必须站在阶级立场上来坚决实行苏维埃的政纲，以促进这些家族内部的阶级分化。

九、红军十六军必须依照国际指示，将自己造成真正红军的铁军，他的成分应当吸引广大雇农、贫农、中农与失业工人来参加，要使加入红军运动成为党及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战斗的任务来动员群众。红军的干部应尽量引进工人、雇农来充当，这首先就须给以随营学校或教导队的训练。政治委员的威信与职权应在红军中提高起来，但连与营不需要设政治委员，连只设政治指导员，除非连或营单独作战时得临时委任一政治委员，或即以连政治指导员临时负责。兵委的组织只限于连，职

权应逐渐缩小，以便在红军巩固以后实行取消。团以上的经济委员会不需要组织，他的经济开支应直接受军部乃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核。红军中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应绝对防止。红军中一切组织系统，党的支部、团的小组、兵委、政治部、政治委员以及军事指挥系统，都是为的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和保证党及苏维埃的政策之实行的，所以这些组织中间的关系与所发生的问题，统应归最高级的政治委员与指挥员去解决，这是巩固红军必须遵守的规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在空喊暴动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在我们党内占着统治的地位时，在苏区内和白色区域内一样，对于宣传鼓动工作，一般的说来是不注意的。不注意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主张巩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而带着红军做旅行式的游击战争的立三主义的领导，不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实是不足为怪的。

二、在空喊的“左”的口号之下，在苏区内所发荣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更阻止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执行。霸占苏维埃机关、侵入党的组织的富农分子，差不多垄断了党与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工作。为了保持他们在土地革命中所获得的果实，他们不但不想种种方法对广大工农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而且有意蒙蔽群众的耳目，有意停止学校，使教育工作完全停顿，以造成党与苏维埃机关内所谓“秘书长专政”的现象。

一般的说来，在各地苏区内党的几个基本口号的宣传与鼓动是完全忽视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多地方是放弃了。湘鄂边苏维埃三日刊上甚至找不到土地革命、八小时劳动制的字

样。第二军团、第七军、第十一军、第一军等转战千里，很少做过广大的本党口号的宣传鼓动工作。

三、在家长式的、官僚式的、没有自我批评的立三主义的统治之下，一切问题，不论是党内的、党外的，都依照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解决就完了。如开除同志、逮捕反革命党、处决反动分子，我们的党在苏区内没有利用这些事件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种决定中教育群众，使群众了解党与苏维埃的政策的正确，以致在逮捕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分子时，群众甚至党员同志都反而有“人人自危”的恐怖发生。

四、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右倾、反对富农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实行实际工作的转变的关头，我们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同样的要求根本的转变。除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宣传工作的指示信一般的也能应用于苏区外，在苏区内宣传鼓动工作当然同白色区域内有不很完全相同的地方。我们以为以下各条，是苏区各中央分局所立刻应该执行的：

1. 苏区内各中央局必须要有健全的宣传部，领导苏区内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应该有计划的经常的做宣传鼓动工作，领导各级党部建立这工作，并经常给以检阅与帮助。在宣传部下面必须要经常的召集宣传会议、各种文化工作人员会议，决定在某一时期内所应该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绝对免去把宣传部的工作限止于党报工作的现象。宣传部必须经常对中央宣传部做宣传报告。

2. 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除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之外，必须尽量登载工农群众的斗争消息、党内生活、苏维埃的工作等等。此外，必须有肃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富农各栏，并且必须在一星期内出一种工农监察委员会的

特刊，登载党内苏维埃内各种病状而与之斗争。在力量扩大时，必须把党报与政府机关报分开。要用很大力量反对以苏维埃机关报变为国民党政府公报的形式。

党报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的。苏维埃的机关报是苏维埃政策的宣传者，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来登载消息。前者必须比较更多的登载党内消息，后者则必须偏重于苏维埃的消息。前者是本党同志和比较接近于党的工农分子的读物，后者是在苏维埃政府下广泛的工农群众的读物。所以后者的编辑也必须特别通俗。

但是不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抓住每一时期党的与苏维埃的中心策略与中心工作的宣传与鼓动。

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经常的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召集工农通讯员会议，读报群众代表会议，从他们中间提出创办报纸与编辑报纸的干部。报纸不论是党的与苏维埃的都要通俗，并与群众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报纸必须有很多的发行部或发行员，大规模的散发到群众中去。它们必须是反映出群众的生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的刊物。

3. 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各乡村各城市创办当地的小报，尤其应该注意到各工厂与各乡村壁报的编辑。各地的党部应该教育工农群众自己来编辑画报、小报与壁报，自己来印刷与散发。中央机关报必须同他们发生密切的关系，从他们中间抽出工农通讯员与编辑员。中央机关报在一定期间，可以召集壁报编辑者会议等类的会议，来教育与训练他们。

4. 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做反帝、拥护苏联、土地革命、八小时劳动日的宣传与鼓动。同时必须很快的对于某一时候所发生的紧急问题，加以解释或鼓动，做成小册子大

批的散发出去。在各苏区必须建立出版部，专司印刷与发行的工作。

5. 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专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做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坚决同那种一切依靠中央派人的观念做斗争。关于这学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学校计划另行抄上）。

6. 党、苏维埃、赤色工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公开会议与群众大会，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切组织上所采取的步骤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宣传与鼓动，使群众明白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而且积极起来拥护我们。一切苏维埃的改选工作，一切红军与党的改造工作，必须同苏维埃、红军与党的目前的任务的宣传鼓动工作密切的联结起来。就是逮捕反革命者、枪毙反革命者，也必须向群众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只是因为没有宣传与鼓动的工作，所以逮捕反革命者反会引起群众的怀惧与恐怖。必须坚决地同把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分开的错误观点做斗争。没有宣传与鼓动工作的准备，决不会有巩固的组织，没有组织，决不能巩固我们所取得的影响。

7. 红军兵士不但是战斗员而且也是宣传员、鼓动员。凡红军所到的地方，必须对当地的民众做很广大很充分的宣传，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红军，我们为什么要斗争等等，同时必须帮助当地民众做斗争，组织他们，经过他们来消灭当地的民团与地主，夺取后者的土地，而分配给农民。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各军各营的政治部。要坚决反对那种沉默的游击战争与旅行式的“行军”的方式。应该指出，

那些以为地少人稀，不能做宣传鼓动工作，或以为巩固革命根据地要紧，所以奔回根据地要紧，沿途不必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实际上还是过去立三主义的保守者。

8. 在苏区内必须经常做慰劳红军、欢送与欢迎红军、提高红军战斗力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宣传与鼓动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使革命的工农自动的加入红军，老年人与妇女自愿的组织起来帮助红军。对于红军的家属必须时常召集在一起同他们谈话，报告红军斗争的情形，特别给他们以安慰与厚遇，帮助他们写信给他们的父子或丈夫，鼓励他们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此外，还可以做馈送礼物给红军士兵的募捐运动，做宣传鼓动的工作。

9. 对于俘虏的兵士的工作，不能限于发给旅费护送回家就算了事。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也积极起来为苏维埃与红军工作。主要的要做到使他们回到他们的旧部中去，做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或使士兵拖枪到红军中来。必须彻底了解最能做兵士运动的人，就是兵士自己。

10. 必须特别加紧白军士兵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白军士兵经过的地方，必须利用传单标语鼓动他们，不打自己的兄弟，想法由当地工农同他们开联欢会，或是利用他们的家属来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必须消灭那些对于北方兵士没有办法的错误见解（如像在湘鄂西）。一切同白军士兵接触的可能都应该充分应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派人投进白军内部去瓦解他们。

11. 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八”应该是宣传劳动妇女解放，使劳动妇女起来参加一切斗争的日子；“三一八”应该是宣传与鼓动反对白色恐怖，发展济难会的日子；“五一”应该是宣传鼓动苏区工农检阅自

己的力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应该是列宁纪念周，大规模征收党员的日子等等。

12. 在苏区内必须经常做公开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在这种宣传中大批的吸收工人干部到党内来。要尽量分别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与确信共产主义的分子，用各种群众组织去吸收同情者。必须消灭过去大批农民入党的非常的现象。

13. 应该大规模的做国际宣传教育工作。要经常的把苏联工农的生活告诉给工农群众，借此以宣传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苏联之友”的群众组织必须在宣传鼓动中组织起来，经常由它发起做各种拥护苏联的工作。设法写信给苏联某一工厂的工人（如像普基洛夫斯基钢铁厂、亚莫厂、汽车厂等等），并设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回信。每一个从苏联得来的消息与文字应该是做大规模宣传鼓动工作的导火线！

14. 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等工作。在每一个俱乐部下应该有唱歌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等组织。在每一组织内应该尽量吸收群众，尤其是青年男女。必须使苏维埃内群众的生活不是死板板的，而是活泼有生气的。只有活泼有生气的工农群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一切失败的情绪。在这里青年男女一定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他们应该用种种方法宣传与鼓动他们的家属为了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

15. 苏区内的教育文化工作必须要有彻底的转变。必须编辑成年人及青年儿童的识字课本，绝对禁止以三民主义为苏区内学校的教科书。小学校内贫农雇农及工人子弟完全免费，富裕的中农则必须酌量征收学费。必须立刻开始贫民识字运动。这里可以利用苏区所有同情于革命或至少是不反革命的智识分子，做通俗教育的工作，但必须在党与苏维埃的监督与领导之

下。党、苏维埃及职工会等各种机关内必须完全废除过去秀才式的八股文章、呈请文章以及命令公文的滥调，一律采用简单明了的白话文章。

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必须定出教育文化的工作计划，利用群众力量来执行这种计划。必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包办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非常的现象。

16. 在苏区内除了各种纪念节外，必须举行各种宣传鼓动的运动。如现在春天到了，必须做春耕的宣传与鼓动，要贫农中农尽量的扩大耕种土地（当然这只有在正确的单一累进税政策之下才有可能），由苏维埃政府决定对于扩大耕种地的农民以特别的好处。秋天到了，必须做秋收运动。此外，如像欢送红军的运动、识字运动、卫生运动等，必须经常的举行。在每一运动时期，各种报纸、各种会议必须尽量的提起群众对于这一运动的兴趣，而自动的参加。到处应该粘贴关于这一运动的口号与标语。对于这种教育群众的方法，我们是绝对需要应用的。

17. 在目前，在苏区内应该立刻开始革命竞赛、模范队、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等的运动。我们的党应该利用反革命对于苏区进攻、残杀工农的一切事实，鼓动革命群众对于建设与巩固党、苏维埃、红军与职工会的热情，由他们自动举行革命竞赛等工作。我们应该拿革命的热情来冲破右倾的消极与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失败情绪，来创造出新的从前所没有的。

18. 要尽量宣传男女间的健全关系。在男女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原则之下，要竭力反对以此为口舌，实行乱交的一夫多妻的不健全现象。在每一宣传鼓动中必须指出，女子的真正解放只有女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的时候，只有女子同男子一样参加一切社会工作的时候。必须打破为了恋爱问题而发生的

各种纠纷，消灭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对于恋爱所抱的那种神秘不可思议的态度。

19. 对于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新共党等一切反革命的宣传鼓动，要做很大的反宣传与鼓动，在这中间即做肃反的工作，使这种工作的执行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但这里必须指出，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置，必须以阶级的成分为出发点。如若参加反革命的是工农分子，那苏维埃政府对于他们必须采取教育的感化的政策，不能同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反革命一律看待。必须很灵敏的洞察反革命分子被捕后诬告党与苏维埃等负责同志的诡计。

20. 跑反群众，现在已经成了苏区内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党与苏维埃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或把他们送回原地做帮助革命的工作。

21. 宣传与鼓动工作，是互相为用、不能分开的。但一切宣传的口号决不就是鼓动的口号。譬如土地国有、集体农庄，在目前是宣传的口号而不是鼓动的口号。反对迷信、反对祠堂庙宇，在民众没有完全了解时，应该先做宣传的工作，决不能立刻鼓动少数先觉分子（如少年先锋队）去做拆毁祠堂庙宇、打倒祖宗牌位等行动。只有明白了解宣传与鼓动的相互关系，才不至发生脱离群众的行动。

22. 必须经常派人到邻近白色区域做宣传鼓动的工作。这里应该利用志愿的模范队跑进白色区域中去。利用亲属等关系，以写信等方式去做宣传鼓动的工作。游击队在这里应该负有很大宣传鼓动的使命。白色区域的党部与革命组织同赤色区域的必须发生经常的关系，使两方面的工作，能得到适当的配合。

五、总之，一切我们党与苏维埃的口号、我们的政策，必

须是有大多数工农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这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目的。虽是，在苏区，我们的困难是到处都可以碰到，但是在革命工农的共同努力的条件之下，这些困难都是不难征服的。只有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才能消灭立三主义的一切遗毒，给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去执行列宁主义的国际路线！

各苏区地方党部接到这决议后，必须立刻有一简单明了的与具体的宣传鼓动工作，连同这一决议，发给各级党部。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红七军工作报告*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邓　小　平

一　八军的经过

（一）我去年由中央到龙州是二月七号，到后知道龙州已于本月一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八军全部正在出发，会同七军攻南宁。我仅与留守后方的宛旦平同志会面，得知八军及左江工作大略：1. 左江政权仍在动摇时期；2. 革委虽然成立，然尚无实际工作；3. 大军出发后，留守后方的是极靠不住的收编的队伍；4. 八军本身的基础完全在旧军官手中，甚至有好些同志都没有分配带兵的工作。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及这些条件，乃停止了下南宁的行动，并电七军亦停止此行动，并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上来估计，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果，特别是第八军本身问题上更为危险，如到南宁打了败仗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二）停止了攻南宁之行动的第三日，即得到七军由右江来的电报，报告已在隆安失败，同时我们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包括地方党部），决定八军暂时组织一个前委，因为当时我的

* 这是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计划是与七军汇合后八军即取消，健全七军实力。在会议中我根据中央指示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决定了八军及左江工作方针：1. 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的组织，我们是这样进行了。2. 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3. 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这一工作因作豫[1]同志执行不力发生了极大的困难。4. 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因技术上不完善只解决了大半），武装农民（发了三百多枪），好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为扩大红军之基础。5. 此外对于党、政权、红军的工作均有相当具体的决定。

（三）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干部简直没有）收效仍然不多，发动群众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众的问题，斗不过敌人的把戏。

（四）同时我们注意到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因为左江与法占地接壤，一般群众反法的热情很高，"打倒老番"的口号每一个群众都懂得都热烈的拥护，不过过去反法的运动为流氓及封建势力所领导，所以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在二月中旬群众大会中通过了没收海关、领事馆、教堂财产并驱逐法领事出境（当时并不懂得可以讲一讲外交政策），群众甚高兴，游行时亦甚热烈。我们并利用了无线电发英法文通电于全世界。后法政府曾派飞机一架到龙州附近之上思县侦察示威，适我军一营开往游击，当即号召了千余群众，口号之声震天，士兵开枪，司机慑群众威，致飞机跌下，得机关枪一

挺、手枪几支、炸弹十余个。三法人一死二重伤（住医院医治）。后阅报载法政府曾将此事向南京政府抗议，结果不知。总之帝国主义对龙州赤色政权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安南革命的影响，给法以极大之恐慌，故敌军之迫不及待的向龙州进攻，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五）在龙州工作不久，即确知我七军已退出右江，何往不知，并得探报，桂系将以重兵犯龙州，我们当时考虑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敌来必退，同时八军如不与右江七军联络将感极大之困难，故决定速下靖西，加紧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决定后我即率一纵队攻靖西。因为与右江联络我自己去比较好，同时八军第一纵队的改造也要我自己去才有办法，靖西有电话，指挥龙州工作不成问题。

（六）攻靖西数日不下，适右江向都县委书记来到，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中，故我决定带一连人去联络，转达中央指示，临行时电告龙州务须照前决定原则进行，如敌来即向右江前进，即敌不来，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亦须照前决定迅速向右江推进，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七）我一连人冲到右江，始知沿岸完全为敌占领，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惟沿岸还有几个赤色乡村，故得偷渡右江，在一乡村（赤的）住了半月之久，始得机会冲到东兰，其时已是三月下旬了。

（八）到达东兰之第二日，适作豫派了两个卫队（东兰人）亦到，报告龙州已于我离靖西之第三日失败，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还不知道是桂系主力，以为是土匪，及至接触了两小时后听到大炮、机关枪声才懂得，但结果是被敌人冲散，全部无法退右江，只得逼退安南方向之凭祥，又受敌追兵打击

（旦平同志即于此时牺牲），曾一度冲向右江但无效，乃又退回粤桂边企图去玉林一带工作（作豫家乡，过去有相当的基础），但中途即发生部队叛变（叛变官长是作豫始终不肯撤换的），作豫仅得几十卫队曾一度冲向右江来联络不果，后闻将武装交给地方同志，只身到港遂被捕。攻靖西之第一纵队（龙州的为第二纵队）得到龙州失败的消息，乃经滇边向右江前进，企图到东兰与七军联络。到右江之凌云（接近苏区仅数十里），因技术上及侦探不好，受了敌人极大打击，损失三分之一，乃退贵州边界，受编于贵州一个土匪队伍（改组派收编的），仍与东兰设法联络，几次不成功，直到七军回右江才取得联络，更于七军第二次向外发展才会合起来，此时该纵队仅存二百支枪了。这部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改造得比较好的原故。八军失败龙州政权亦失败。

（九）八军开始成立时的武装约枪一千支（内坏枪约有三百），组织两个纵队，每纵队两营六连，另有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还有一个手枪连。

（十）以上就是八军的成败兴亡史。

二　七军的经过

（一）由百色转变到隆安之役。

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革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

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敌人的损伤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伤亦不小，好几个很得力的干部亦于此役牺牲，加上作战的指挥太差，双方都成为各自为战的局面，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耗费了子弹不下五十万发。

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当时右江群众情绪虽已开展起来，但过去并没有经过斗争，始终是暴发户，纯粹由红军弄起来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打下南宁固好，打不下，一失败下来则必给群众一个大的打击。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色区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豪绅民团）的扰乱。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区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败到向外游击时期。

隆安失败后，完全放弃了右江沿岸，平马为敌占领，我军曾一度进攻平马但无最后决心，故未成功，乃向东兰退去。此次攻平马没有决心是一错误，因为如果攻下了平马可以保持群众的情绪，事实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后可以得了敌人不小的辎重。后敌人追至亭泗与我接触，战甚烈，双方损失均不小，结果双方均同时撤退。这次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军两团，因在作战中我较占优势也。亭泗作战时我军士气仍好，失败后则大不如前了。

亭泗战后，前委即讨论行动问题，决定向外游击一时期，乃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右江工作，一二纵队向河池方向游击。本

来是一步步发展的计划，后来变更了，一直经怀远到思恩，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敌人袭击受了一个小的挫折，后又向贵州之古州（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也比较提高。本来他们当时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们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之始终不愿与我们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会议与回右江的决定。

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我已到东兰近一月，得消息后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1. 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2. 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3. 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4. 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因此决定回右江一个短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但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此时是阴历五月初）。

（四）回右江后的工作。

回右江后即恢复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权，在百色解决了敌军五六百武装。在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师经百色到南宁攻桂，我军在力量上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故决定暂时退到平马，准备在平马运用群众战术扰乱他，打击他的一部分。结果在果化作战有五日之久，敌人损失甚大，团长死一伤一，营长死二伤一，士兵死伤五六百。我军亦死伤官兵六十余人。但因军事技

术上的缺点，没有能实现打击敌人之一部的计划，仅得到两万发子弹而已，算起来我们还是吃了亏，虽然滇军对我们再不敢轻视，攻南宁失败后再不敢与赤色区域为难。

与滇军作战后即回师攻百色，因等大炮问题及被一个连长领导一营叛变（当土匪）问题牵延了一个时期，后百色加了兵（滇军）难攻下，故又改变不攻百色而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加紧工作，相当创造右江的基础，改造七军发展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向中心区域发展的出发伙食费。

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的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1. 经济未解决；2. 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的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2]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1. 改变军队编制为三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2. 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敌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3. 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

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了一个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

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人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的达到全州，此时已由四团而缩为三团了。武冈作战时阵亡了一个很好的团长何子祁同志。

武冈失败后，大家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故决心到湘南，估量湘南总有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来武冈敌人的援兵，报上载名义十团实则约五团，宝庆两团，长沙用汽车运来一团，还有两团新成立的游击队，飞机两架。如果当时我们军事布置缜密，以战斗力论，决不致失败得如此之狼狈的。

（九）到全州后直到攻连州。

到全州后开会讨论，结果都感觉到要休养补充之严重。当时估量江华、临武一带最少可以休息一下，发动群众，故决定到江华一短期仍向小北江发展。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

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发了点零用钱。此时士兵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仅是老兵，而且许多是农民。

后知敌人（桂系）来全州，故我们即照决定出道州，一路只有小的接触。到道州后已是空城一个，仅有贫民还在。城周围几里路就是豪绅的武装，侦探都难派出，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现还好。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仍照原计划到江华。当天奇寒，苦极，士兵冻死数人。江华的环境比道州还坏，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仅没收了大批布匹发给士兵，但无处成衣。

原来对于江华一带的估量成了幻想，宁远也不能去，只得离开江华，想到湘桂边之桂东、桂岭一带工作（皆山地），得到一个被囚在江华狱中的前县长带路达到了桂岭。离江华时四面八方打起来，我军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了枪二十余支。

到桂岭后即布置工作，但该处豪绅力量太强，强迫农民守住炮楼不出来，如果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故计划又不成，乃决心继续到小北江。在桂岭住了四天，将部队整顿了一下，缩编两团。为提起士气起见，以主要官长兼团长，李明瑞

及龚鹤村两同志任之，两团组织比较完密，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行军三天到了连州属之东陂圩（离连州六十里）。当时讨论到是否攻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果攻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工作，因一攻连州北江即不易通过，同时估量北江此时还无重兵，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干路是可能的，故决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工作（该处过去是经过斗争的，且多险要山地，鹤村同志很熟悉）。军行至星子圩（离连州八十里），得报说离此三十里之黄沙堡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名义上是两团。据鹤村云，该处有一山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到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作了小小的尝试，不五分钟伤死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使我们不能再攻。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作了一点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后得报告粤军邓辉一团到连州来援，乃决定消灭该团之布置，并退入一好布置阵地之山地。此时我们计划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住三日，一面作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堡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致失掉了一大好机会，因为在力量说来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

到黄沙堡果有湘军千余驻守，但不敢与我作战，仅一小接触即退守圩场，我即绕过圩场向北江前进。

在连州附近之山中时并与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我们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经乳源大山（匪巢）运动，接洽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妨碍我们的运动，同时想派人打入进去作点工作，结果因时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十）到北江后至乐昌渡河。

到北江后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支）。但不几天即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是大好机会，仍决定布置消灭该部，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本定拂晓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实现，至午前十时前卫团才达到河边，本部两时后才到，又因前卫团没有达到掩护渡河的任务，结果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兵来，致后卫团仅过一连。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同志未能过河，未过的一团即由他率领，过河的一团由明瑞同志兼团长。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后经多方设法均不得达到联络目的。

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中央的紧急通告，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庾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庾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向粤赣大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作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之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汇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八九百支（给了湘南特委约二百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支，迫击炮一门，机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支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分：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数，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八九皆南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军党的组织：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

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余惠同志（团政治委员）。

三　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右江：

右江的指导机关是右江工作委员会，共有东兰、凤山、平马、田州、思林、向都六个县委及凌云、百色等处设特支。共有千余党员，成分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成分虽如此，但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多是民国斗争到现在的，故在党的地位上变成了党的中心。他们不但阻止了党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的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及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又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后一口号主要是反富农的作用，因为富农必然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

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但我们指出，虽然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结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乡为单位。

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至于其他地方，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时东、凤等处也发生苏维埃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及亲戚的事实，故当时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号，我们出发一时期正积极执行这一口号。

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均是个别的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至是如此解决的：1. 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2. 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3. 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4. 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的表示是由苏维埃给以使用证比较安心些，有了凭据，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5. 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6. 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力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工。有些区域

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的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是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会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的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

实际问题的办法）。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走光，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作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大庾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的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作，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的给以

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作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他们，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 AB 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3]，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抨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是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边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

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 AB 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 AB 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 AB 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 AB 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 AB 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

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站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的感觉。到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的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的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一个

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七军是坚决的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做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即俞作豫。
〔2〕即邓拔奇。
〔3〕指毛泽东。

PDG

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四月）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的路线。自从六月十一号政治局决议案起，他就完全统治了中央，统治了全党；但在苏区中，从苏大会起，立三路线就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在国际七月决议给予中国党以正确路线时为要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三中全会，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把党从立三路线之下解放出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反而向立三路线调和，使国际路线不能在党内得着实行。

扩大会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的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他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给党的政治路线一个彻底的转变，正确的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同时四中全会又改造了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把立三路线负责最重的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及中央，吸引了新的积极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及政治局来。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又给予罗章龙等所领导的反国际反党的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并且能够克服右派。四

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

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四军前委是坚决为工农政权而斗争，曾经坚决的反对过不要政权的流氓路线。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此外前委又认清武装地方群众，正确的执行城市政策。前委为了坚决执行这些任务，曾向盲动主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流氓路线作了长久的坚决的斗争。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坚决的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前委之所以能正确的坚决的为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路线而斗争，是因为前委能正确的分析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特别认清半殖民地的中国斗争的实质、农民战争的作用，才确定苏维埃之能够存在与发展，又从苏维埃运动实际斗争中获得经验，才能正确的运用策略，反对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四军与三军汇合，成立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如土地问题、地方武装问题、红军的群众工作等，前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但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

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显的确定了这个转变。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的斗争，才有这个结果。最后在宁都的黄陂会议，更具体的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三军团在过去的军委及后来的三军团前委领导之下，作了许多英勇战斗，如长沙、岳州、平、浏、大冶等战争，确在红军战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三军团过去关于夺取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是忽视的，红军的战略是流动式的游击。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正确的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关于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分析，前委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估量），是因为三军团的英勇斗争。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战争明显的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着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的走上正确路线。虽然全国党部并未能立即了解长沙的战争的教训，来反立三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引敌深入，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的伟大胜利。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第一，是一九三〇年二七会议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赤色区

域已经开辟二、三年了，还不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充满了党和革命团体，土地革命已经发动了，却不能正确的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基础。

第二，是二七会议（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这一时期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这才发动了赣西南的广大群众几次攻吉的英勇斗争，创造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二七会议是提出了“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但这一时期的缺点，没有从组织上坚决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巩固工作。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到二十军三十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的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在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虽然在许多单个问题上（如地方武装问题、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红军中的C.Y.问题等）有了正确的解决。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

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而指出军团只是为了准备军阀混战而来进攻红军（见八号通告）。这种错误的估量，有放松我们的主要任务——击破敌人进攻——的执行，产生等待军阀战争的情绪的可能，仅只因为过去总前委已经有了正确的估量，才没有发生这种不良结果。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

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内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中央局没有认清革命的目前民主阶段，没有认清在中国现有土地关系之下，党是应该坚决的领导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中央局决议对平均分配是动摇的，如说“平均分配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这是不认识平均分配土地是消灭封建关系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平分之后，农民认为平分是已经平均了贫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这是幻想。党对这种幻想应当谨慎的加以批评。一般的说平均分配是幻想，这是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决议，这是可以被利用来反对土地革命。再中央局决定以劳动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而预先没有经过详细审查与研究，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这是不审慎的。再中央局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的争取群众。此外，关于反富农问题，中央

局没有分清暴动前与暴动后反富农策略的不同。在暴动前，主要的不但从政治上反对富农的领导，还要在经济上废除富农的债务，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暴动后（如现在时候），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肃清富农的影响，驱逐富农出苏维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使富农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是照中央局通告所说的“从经济上解除富农的武装，消灭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分田后，半封建的剥削已经消灭了）。中央局的错误指示，不但不能纠正过去对富农问题的一切左倾错误，反而要助长这些错误。最后中央局没有深刻的采用过去执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重视过去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斗争的经过。这都是中央局犯了上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局对于改造苏维埃，创造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及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与宣传等等问题的注意力，还是不够。这一切都是调和路线的结果。

立三路线在苏区执行的恶果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区域相当的缩小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中去了；党与苏维埃在某种行动上说，是脱离了群众；党与苏维埃在组织上涣散了；AB 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得着机会发展，并且能得攒进党内与苏维埃内；红军因为过去执行猛烈的扩大，也受了相当的损害。

扩大会议在估量目前形势时，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反对军阀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以及中央给红军的几次训令。扩大会一致认为，最近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的团结，来进攻革命，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实行欺骗政策。如“国民会议”、“大赦”、“裁厘”等等来欺骗群众，组织苏区内的反革命团体，如 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北极会等等，企图从内部破坏苏维埃与红军。但同时必须指

出，统治阶级虽一致进攻革命，但他们内部矛盾，不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中国革命势力发展的不平衡，使革命势力对于各系军阀的威吓的程度不相同，所以它进攻红军时，军阀战争仍旧是有爆发的可能。并且最近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北方军阀备战的形势非常紧张。这是证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大规模军阀战争的积极准备。

南京政府虽派遣重大兵力向红军及苏区进攻，但红军是有击破这种进攻的充分可能，因为白军是不健全的，官长和士兵是不一致的，士兵的生活是痛苦的，进攻红军的各派小军阀间也是不一致的、有冲突的。在红军方面，上下完全一致，“万人一心”，又有广大工农的拥护，完全不是孤军作战。所以在红军与白军的残酷斗争中，红军与广大工农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争取得第二次伟大胜利，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龙岗东韶第一次伟大胜利就是证明。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一）动员一切力量，把工农群众与地方武装正确的去与红军主力配合，应用一切于我们有利的战略与战术，去击破敌人的包围与进攻，在击破敌人进攻的过程中，要达到把江西苏区创造成全国苏维埃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与号召，应当立即开始。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尽量提拔工人来担任领导工作。改进士兵的军事训练，建立铁的纪律，肃清红军中的 AB 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

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应当立即消灭党包办政府工作的现象，“党是立法机关，政府是行政机关”的恶现象。应当建立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一贯的工作系统。政府应当立即颁布选举法以及经济政策条例。

（四）关于土地问题，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地主的家属和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如道士、和尚、地理家等人中间的剥削分子，没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但允许他们租用土地（详细办法，当另有决议案），商人（乡村小市镇的贫民分子，多以农为主，以商为次的人，不在此例）不能分得土地。至于地主及其家属的房屋，亦应一概没收，转分给贫苦群众，但可以允许这些分子移到已经空出来的坏房子去。

（五）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健全的阶级工会与工会工作，正确的去领导阶级斗争，去实现政府劳动法。在目前的苏区内，雇农工会的工作是工会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但独立劳动者分得田后，如仍是贫农地位，得照其他贫农一样加入贫农团。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七）加紧苏区内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与宣传，特别是反帝国主义进攻苏区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对正在准备着的进攻苏联的战争，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

（八）坚决的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洗刷异己阶级的成分，彻底改造干部，创造新的真正的工农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

（九）加强在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白军军队里的革命工作，以求领导白色区域革命运动，捣乱敌人的后防，瓦解敌

人的军队。

扩大会议指出，只有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用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以及四中全会的决议，这样一定能够引向新的伟大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央巡视条例*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通过）

一、巡视员的条件——中央巡视员必须具有下列的条件：（1）党籍须在三年以上；（2）忠实刻苦，能正确的了解与传达党的路线，为党的总路线的执行而斗争；（3）过去曾在地方党部作过负责工作。

二、巡视员的基本任务——中央巡视员必须执行下列的任务：

1. 经常研究国际和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切决议案，特别是最近的决议案，把它们具体切实地传达下去，向各地党部负责同志作深刻详尽的解释，考究一切决议不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找出一切工作中的具体缺点与错误，并及时想出纠正和转变的方法。同时遇有当地发生的新事变，必须迅速予以解决和布置，报告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详情，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

2. 严格地检查各地党部的领导成分与领导方式，坚决地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在目前特别要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具体地揭发一切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真正的在工作中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严重的打击对于反倾向斗争的自由主义，执行四中全会以后党的号召——缩小机

* 这个条例后经中共中央组织局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重新审查通过。

关，党到群众中去，与现在党所提出的“面向支部”的口号。很虚心地接受下层的意见，为党的决议每一点的执行而斗争。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但直属中央的党部，必须报告中央取得批准。

3. 考查各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仔细地研究各地党的工作环境（如产业工人的分布与痛苦、情绪与要求，农民劳苦群众的痛苦与要求，敌人力量的分配，各种反动派别的活动和影响等等）。

4. 考查各地党部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反帝同盟、妇女组织、士兵组织、农民组织、互济会及其他群众与辅助组织的工作，彻底转变一切党团的领导方式，细心研究各地罢工斗争、反帝运动、游击战争以及革命兵变等教训，特别注意于各地目前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趋势，以及党和群众组织对于这些斗争的领导。

5. 在巡视中必须执行教育和提拔工农干部的任务，首先须深入下层，深入支部，用种种方法来发现新干部，彻底揭穿一切提拔干部的消极和怠工，与那些只在口头上喊“干部缺乏”不在实际上培养干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残酷的斗争。同时必须检查各地现有的干部，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中央。

6. 把下层党部的（特别是支部）实际状况与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详细报告中央，使中央能够随时真正了解各地党的工作，而易于领导。

三、巡视员的工作方法——

1. 巡视员在未出发以前对于他所要巡视的地方，必须作充分的准备，同时要与中央讨论，确定这次巡视的中心任务。

2. 要绝对消灭过去立三路线下官僚式的巡视制度，要站在检查和帮助地方党部的工作观点上，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

性、团结干部于党的路线上，为党努力工作。

3. 要向省委或地方党的主要负责的同志作坚苦的个别教育工作，向他们解释党内的一切重要问题，替他们想出许多实际办法，克服一切工作的困难。

4. 要免除走马看花只凭审阅文件的工作方式，巡视员在各地须依工作的需要，住留较长的时间，尽量参加一切工作会议，在日常工作中审查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

5. 巡视员的工作，绝不能仅限于省委或其他主要领导机关工作的审查，要尽可能到各中心区域去视察。要废除以耳代目的方法，要在各区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支部中，去审查上级机关对于他们的领导与下级机关执行的程度。

6. 找同志谈话绝不能仅限于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要随时找几个支部中的同志或其他负次要责任的同志谈话，很虚心地问他们对于工作的意见。

7. 在巡视时，要特别发展地方党部和支部大多数同志对于工作（尤其是对上级领导的工作）的自我批评，通知各地党部同志，尽量写意见书给巡视员，在适应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必须召集各种会议，要各负责同志作工作报告，以便批评。并将这些材料，设法送给中央。

8. 要根据最近中央组织局所印发的两种大纲（区委工作检查大纲与支部工作检查大纲）来检阅地方党部与支部的工作。要消灭过去无系统无计划的工作方法。

9. 要特别注意各地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要根据各地的特殊情形，与当地党部负责同志商议中心产业支部的对象，检查当地已有产业支部的工作状况。检查的方法，绝不是笼统的包括一切支部，做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结论，而是要择一二产业支部为标准，仿造中央支部检查委员会的办法，做一次彻

底的检阅。并将检查经过和结果报告中央。

10. 对于区委和地方党部的巡视，须特别注意他们对于支部工作的领导方式，要绝对纠正机关式的领导，要他们缩小机关，将党的力量深入到群众中去。同时对于干部的引进和培养，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在地方党部的周围应努力造成许多不拿生活费的在业工人与农民活动分子，随时可以调动，给以适当的工作。巡视员在工作过程中须帮助各地办短期训练班、晚间谈话班。

11. 要克服一切工作转变中的阻碍，特别是在困难面前投降或根本忽视工作中的困难。因此巡视员除唤起同志作一般思想上的斗争外，要为布尔塞维克的工作速率而斗争。要运用种种工作的新方式——如革命竞赛、模范队，向地方党部解释并帮助他们发展这一工作。

12. 要随时随地检查各地的秘密工作，如发现有破坏或忽视秘密工作的事实，必须给以严重的批评与制裁。同时必须注意交通工作的建立，保证中央与各地的亲密联系。

13. 要特别注意群众组织的工作，检阅党团的工作，就各地的情形召集党团重要负责人谈话，参加党团会议，考查各地党部对于党团的领导和党团与党部的关系。同时为着更深刻的了解群众工作的状况，必须设法经过党团的介绍与可靠的赤色群众谈话。

14. 对于各种刊物（特别是工厂小报）的考查须切实认真，甚至于拿一张标语传单为根据，都须与当地党部以批评和纠正。同时必须注意当地的发行工作是否能够按时传达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15. 为着充分的搜集各地的政治经济材料，除上述方法外，应随时注意当地的公开出版物（如报纸、杂志和书籍之

类）以便参考。

16. 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须尽可能的多写文章和通讯，供给中央党报，以便将各种实际经验汇集起来，供各地参考和讨论。同时鼓励和纠正各地党部的工作。

17. 巡视员为着建立各省各地的巡视制度，必须向各级党部详细解释中央巡视条例，特别要帮助和教育当地的巡视员。在必要时，应帮助当地党部举办巡视员的短期训练班。

四、巡视员的职权、教育与纪律——

1. 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

2. 巡视员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在巡视地方党部时，须表示自己是忠实的领导者，生活必须下层化，经济必须节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如有浪漫、怠工或犯原则上的错误，地方党部必须执行自我批评，并将经过的详细情形，报告中央，以便纠正，或予以严格的制裁。

3. 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必须做巡视日记，至少两礼拜向中央报告一次（将报告编成号码），要绝对消灭过去“一次算帐”的办法。中央接到每次报告之后，应按时回答，并予以新的指示。在回到中央以后，首先须作极详细的书面工作报告，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不得推诿或虚报。中央对他提出的问题，须负责作切实答复。

4. 巡视员在回到中央尚未出发的时候，须尽力研究一切中央文件，参加列宁小组的政治讨论，同时必须利用时间，做种种临时工作，不得偷懒拒绝。

5. 巡视员对自己巡视的地方工作，须特别细心。如有前后不符，或因处理不当，致遭损失，须向中央负政治的责任。

6. 各地党部在中央巡视员工作完结之时，对巡视员须作一总的批评，用书面写给中央。

五、附则——

1. 各省各地须参照本条例建立自己的巡视制度。

2. 苏区巡视条例，大体可参照此大纲规定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通过）

一、中央听了组织部关于全国组织报告以后，认为四中全会确给了全国实际工作以转变的有力基础，可是在目前看来，此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许多重要工作还极不能令人满意。各地党部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仍保留许多旧的残余，转变的速率还很迟缓，党的发展与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还很少成绩，干部问题仍感受很大的恐慌，尤其是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引进，成绩非常之少。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的状况还很模糊，苏区附近的重要地方组织与白色省份的中心农区组织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巩固起来。许多工人农民自发的斗争还不能完全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领导。在几个大的运动节中，还没有很好的组织准备，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五一”工作的准备竟没有把“五一”委员会好好地建立起来。党与群众组织间的关系还时常有不正确的倾向，或者党忽视群众组织工作，或者代替群众组织，有时工会工作人员也表现出“工团主义”的倾向，党与青年团的关系有些地方还表现出对立的现象。最近很多组织遭受敌人的摧残，同时证明许多党部特别是领导机关还不能真正了解地下党的作用与工作转变的真实内容，有些党部还未有执行四中全会向全党的号召——缩小上层机关，党到群众中去。凡此种种都是目前全国组织上的严重现

象，若不能迅速地克服这些现象，对于实际工作的转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的。

二、此等现象的造成，客观的困难——敌人加紧压迫自然有很大的作用，可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和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或在困难面前灰心消极，回忆旧的工作方法，以为目前的工作困难是证明新的路线走不通，而不是党在走向健全化的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阻碍。因此完全忽视四中全会后工作转变的新基础，甚至认为目前困难是空前未有的现象，表示张皇失措，而发生取消观念，不愿在坚苦工作中运用种种新的方法来克服一切困难，或根本不认识工作的困难，对于一切严重问题，都不愿切实地探讨各种工作困难的真正原因，只是在口头上空谈转变，实际上对党的工作不负责，甚至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样自然不会尽最大的努力，想出许多办法来代替旧的工作方式。因此在目前与这些倾向做斗争，却是工作转变中的先决条件。

三、目前全国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本着四中全会的精神，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首先就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与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揭发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团结和引进良好的工农干部，坚决地改用活的领导方式与新的工作方法，与留恋一切旧方法的倾向作残酷的斗争，肃清委派制度，巩固各级党的领导，在各大企业中建立巩固的基础——产业支部。在党的发展上，须于最近检阅各地党部对中央决议的执行，务期达到党员社会成分的大转变。在农村中必须注意中心农区工作的建立，特别是环绕苏区的白色区域。对于苏区内的组织，必须特别注意党的基础与工作的检阅，要彻底肃清党内富农分子，把党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

基础上。最近因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反动势力的压迫，更迫切的要求全国组织加倍注意秘密工作，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在任何条件之下能够经常地进行工作。

四、为着执行上述各种基本任务，中央特别指出下列各点，望各级党部加以切实的注意，并根据此决议订出具体的计划迅速执行：

1. 为着彻底实行全部工作的转变，废除过去文件的领导方式，改用活的领导，必须建立完全的巡视制度。为着要肃清委派制度，也必须改用巡视的方法来加强对于各级党部的领导。对于各省工作，上自省委下至产业支部，必须有经常的巡视。巡视的方法要根本废除过去走马看花不切实际的空批评，必须坚决的站在巩固地方党部、团结干部、创造下层的中心产业支部的帮助工作观点上，以便各省与中央的领导有最活泼的联系。

2. 革命的发展，对于干部的问题必须有最彻底的解决。各级党部首先必须了解干部的真正意义，要彻底揭穿一切对于干部的不正确的观念，要规定具体的方法，来引进和培养新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这里主要的方法，就在运用组织上的分工，地方党部与支部要根本消灭过去对干部问题不负责的错误。地方党部的周围必须有许多产业支部的积极分子做经常的个别工作，在这种过程中，造出源源不断的工农干部，同时也只有这样的干部才有保障来消除目前的现象——各省各地都向中央要干部的现象。

3. 关于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在各省必须有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在各大产业区域，必须利用种种方法——如打进生产、发展辅助组织等，打进重要的企业中去。支部的建立必须是真正党与群众的连环，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有牢固的

基础，支部在工厂中要有紧密的群众组织围绕着。坚决地与支部不作群众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

4. 关于地方党部必须坚决的转变过去的领导方式——由上边派一批与生产没有关系的同志，到地方上建立很大的机关。地方党部的领导必须与产业支部紧密的连络着，坚决的缩小机关，把党员送到生产中去。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一部分生产，同时须有在业的支部同志参加地方党部的领导工作。

5. 关于农村中党的组织，各省必须规定几个中心农民区域，建立农村支部，把农村中党的主要的力量，放到这些地方去，同时可以调一部分城市工人同志到乡村中去参加领导工作。在农村支部的周围，必须有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围绕着，但不要使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起来。

6. 对于群众的组织工作，除加紧检阅与指导一切群众组织外，最近必须在地方党部和支部工作中具体的规定。务使在地方党部和产业支部的周围有广大的群众组织，经过这些组织来发动群众和领导他们作斗争。各个产业支部必须把建立群众组织和辅助组织看为日常中心工作之一，在各个大的运动节，必须在组织上进行种种动员的工作。

7. 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它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要坚决地与一切忽视或拒绝此种工作的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

8. 关于苏区和红军内的党组织，首先就要注意到的基础必须坚决地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群众上，彻底地肃清富农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与铁的纪律。党员在苏维埃和其它机关内要特别负责，为一般人的模范。

9. 在苏区附近的重要白色区域内，必须加紧我们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地方的企业内，必须种下组织的深根，工作的方式要特别灵活，适应环境，要使在任何条件之下，敌人不能摧残，甚至于各个组织不必有一般的形式上的连系，主要的是在于打进生产、职业化，取得社会的掩护，使各个组织单位与个别同志与生产部门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

10. 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中央发展组织决议案，经常检阅各地党部执行的成绩，特别是产业支部的建立与工人入党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注意，来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

11. 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工作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各级党部的工作同志必须以自己的组织为单位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

12. 中央党报、地方党报及工厂小报在地下党的时代有特殊的组织作用，中央必须加强和巩固党报的领导，建立此种工作的坚实基础。要与一切忽视党报组织作用的倾向作斗争。

13. 要尽量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关于革命竞赛、模范队、共产党礼拜六（这在苏区特别重要）等工作方式，必须有极普遍的解释，使之成为工作转变中的广大运动。对于已经开始此类工作的地方，党部必须尽可能加以鼓励和宣传，并给以实际帮助，使之发展。

14. 必须加紧工作的速率，提高党的纪律，一切实际工作中必须实行个别负责制。在苏区须立即组织轻骑队，经常地检查各机关的工作。在白色区域内亦必须在分工时，各个组织的单位有一个人对上层机关负责执行一切决定。

15. 必须根据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改造和巩固各级党的领导，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与党

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须作最残酷的斗争。在目前转变过程要特别注意一切工作的明确性，要与一切疏忽不认真的现象做斗争，对一般的工作必须加以极严格的注意，在这些地方尽量揭破一切口头承认国际路线、实际违反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16. 必须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如地方党部必须成立秘密委员会，专门负规划和检查此工作之职责，研究各种破获的原因。在各部分组织内要指定一人向秘委负责。要与扩大机关、不注意秘密工作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切自由行动、破坏秘密工作的同志，均须受组织上严重的制裁，直至开除党籍为止。

17. 党要加紧对青年团工作的帮助和指导。党对青年团的忽视及与青年团对立的倾向，还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党必须从支部起建立与青年团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且要在党中作反对对于团的取消倾向的斗争，而要从实际工作中帮助团和检查团的工作。

18. 各级党部必须根据上述各点，具体地规定最近三月的工作日程与执行的方法，尽可能的使一切工作都走上有计划的道路，并且要忠实的执行上级党部与自己所决定所通过的决议与计划，按期实行检查并报告中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红一方面军关于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一）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施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这种卑劣残毒手段，我们应立即动员打破他这一政策，使苏区所有田土按时耕种完毕，求得第二次大战胜利前的工作必要条件。

（二）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做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时，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三）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

（四）若遇有白匪骚扰不能栽秧的地方，应派兵游击掩护栽种完毕。

（五）预防青黄不接时，理应早为筹备种各种蔬菜瓜类及豆麦等类，以应急需。

（六）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做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害作战。

（七）帮助工作时应与乡苏及村苏商同办理，此种工作才不致帮助在富农家里。

此令

总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中央读了你们的报告之后，觉得赣东北苏区的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赣东北省委虽是一般的是站在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之下，但是很无疑的，赣东北的党还没有能够同党内还占有很大势力的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做坚决无情的斗争。甚至赣东北的党在报告中没有公开的指出富农路线存在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赣东北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一、赣东北的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在坚决的反对富农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检查赣东北党各方面的工作，觉得是富农甚至是地主不但盘据在苏维埃内、在红军内，而且也在党内。他们阻止把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他们反对土地革命的彻底执行，而尽量把土地革命的果实拿到他们自己的手里。他们包办乡村苏维埃，依靠党的、红军的、苏维埃的地位，压迫民众，欺侮民众，甚至剥削民众，使民众不但对于苏维埃，红军与党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甚至使他们发生反感，觉得苏维埃实与国民党的军阀政府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对于这类富农分子、这类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必须用全部力量把他们从苏维埃、红军与党内肃清出去。不肃清这类异己分子，我们的党决不能执行它所负担的重大任务。我们认为赣东北的

党目前必须做一个很大的反对富农路线、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这种反对决不是口头上的空喊，而是根据于苏维埃区域内目前的基本任务的执行与否来检阅一切苏维埃的、红军的与党的工作的运动。这是最主要的。

二、更具体的说来，赣东北的党现在必须立刻实行没收地主、军阀、官僚、豪绅、寺院的一切土地及一切生产工具，经过苏维埃分配给雇农贫农与红军兵士。富农的土地也在没收之列。但是他们如若愿意用自己的劳力去耕种，那他们可以分得一部分坏的土地。如若富农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则他分得的土地与其财产均应实行没收。我们应该绝对反对把土地分配给"一切乡村男女"的观点。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与剥削他人的僧士绝对不能分得任何的土地。他们的一切财产、一切房屋等都应无条件的没收下来，分配给贫农与雇农。根据于这种原则，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定的"土地分配法"实在是缺乏阶级性的。你们的土地分配法没有明白表示你们是把土地革命当做是贫农雇农与中农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你们在那里竟没有说到在土地分配时最初就应该估计到贫农雇农的利益。譬如你们在报告中自己说："土地委员会就仅仅订立一个土地分配法，其余工作没有什么可言。新的革命区域对于分配土地执行十分迟缓，如浮梁、乐平虽占领了二月之久，浮梁完全未分田，乐平土地只有一部分分配了，使群众得不到土地革命的利益，损失甚大！"这当然是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在那里作怪。

三、赣东北的党现在必须立刻做改造苏维埃的运动。在这次你们所召集的各县苏维埃主要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你们所列举的许多事实，证明出你们那里的苏维埃很多不是工农群众的苏维埃，而是反对工农群众的、为富农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所把持的苏维埃。借各种名义诬陷群众，敲诈群众的财物，冤杀革命分子，压迫民众的自由，以及一切腐化官僚化的现象，都足以拿来证明这一点。这些现象并不像你们所说的简单的"错误"，而主要的是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罪恶的表现。你们现在必须开始做很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方法把这些法令草案散布出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尽量揭发那些富农分子与反革命者的罪恶，把他们交给革命法庭审判。你们就要在这种鼓动工作的准备中间，实行苏维埃的改选。这样，广大群众才会了解选举的意义，才会积极的参加选举，才能在选举中提拔贫农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的领导工作。赣东北的同志必须明白了解没有有力量的有工作能力的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就不能有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拼命拥护的政权，就不能冲破敌人的"围剿"，就不能巩固苏区。

在你们关于苏准会工作的报告中，你们对于代表人数的选出，还只是一般的规定。你们没有给工人以选举中的优越权。比如说工人十人选出一代表，农民则五百人选出一代表。你们也没有注意到被选出者的阶级成分，这种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你们必须立刻纠正。我们的一切观点都必须从阶级出发，决不能拿"好人"这两个字就当做一切的标准。

四、苏维埃所颁布的税则应该大大的低于军阀时代的税则，应该正确的运用累进税原则。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绝对要估计到中农的利益。要用种种方法鼓励雇农贫农与中农扩大耕种地。对于各种私人的企业，在资本家服从苏维埃法律、不做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只须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不去没收。坚决反对限制贸易自由的企图。对于食盐、煤油等日常必需品，国家必须采取节制与管理的办法，由合作社站在阶级的立

场上去适当的分配。严格的防止商人的投机，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以有同样的价值。为了工人及红军的需要而收买粮食时，应按货给价，不准从农民那里用武力征取粮食。在与富农反对给红军存储粮食的宣传做斗争时，要动员广大的中农与贫农群众，并经过他们搜取富农的粮食储藏。要特别提倡节俭，当然这不是说叫红军少吃东西，而是说要反对各种浪费。

五、关于土地买卖一层，你们在报告上说："我们这里实际情形，所有土地都分了，自然不会有买卖，要是我们告诉群众说，可不禁止土地买卖，一定引起群众的反对"。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在苏维埃统治之下，虽是苏维埃政府用种种方法来帮助贫农，但是农民的分化还是要发生的。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之后，必然会发生比较富裕的中农或富农与贫农或雇农，必然有一部分农民自愿出卖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给新发生的富农或中农耕种，而自己去做雇农或工厂工人的。这种土地的买卖是苏维埃政府所不禁止的。苏维埃政府所禁止的是富农投机的或旧的地主收回土地的收买。苏维埃政府不强迫农民做土地的买卖，他只是不反对农民所需要的买卖。这当然不但遭不到农民的反对，而且是农民所拥护的。我们应该坚决的相信，只有从积极的方面帮助贫农雇农以耕具耕牛，才能减少他们的困难。只有组织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教育他们，发动并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并且准备将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才能最后消灭富农，消灭农民的贫困与资本的剥削。说土地平均分配后不会有农民的分化，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均产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派"的反动思想。

六、赣东北的党应该承认，以党代替政权、以党来包办苏维埃的一切职务或是轻视苏维埃的工作，以党内最无能力、最

不良的分子送到苏维埃机关中去，实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实是争取群众的最大障碍。在暴动胜利、旧政府被推翻了之后，我们应该立即成立新政权。即使我们只占了几个小村落或一个小城市时，亦须立即成立政权。只有成立了新政权之后，才能领导新政权区域的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其他苏区的政权建立关系。这政权机关开始时一般的是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它是由暴动的领导者——地方党部、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军队中的党的前委与政治部所组成的。工农革命委员会要准备和进行苏维埃选举，苏维埃成立后，即应取消。虽是革委是临时的政权形式，但它同样执行一切苏维埃的法令与办法。

七、在赣东北目前还没有比较巩固的苏区的形势之下，临时政权的最高机关应该是赣东北工农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面应该有土地委员会、劳动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财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邮务、运输和工农检查所等。这些组织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有经常的工作。只有下层苏维埃的组织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时，你们才能自下而上的建立赣东北苏维埃政府。现在所急需做的是各乡村城市苏维埃的改选与选派代表到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去的主要任务。但是如若赣东北省苏维埃已经选出，那很明显的就没有取消苏维埃成立革委的必要。

八、赣东北的党现在必须立刻把广大的工人雇农以至手工业者组织在各自的工会中间，你们过去几次占据景德镇、乐平、河口、鄱阳四处，但对于那里几十万工人的生活与组织从没有加以注意。这实在是犯罪的行为。在赣东北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真正工人加入的工会。你们自己在报告中也说："各县的区雇农工会是组织起来了，各区雇农小组也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形式主义，在组织上是不健全

的。有些真正雇农不得加入雇农工会，不是雇农也加入了”。直截了当的说，在你们雇农工会中的不是雇农而是富农，同样的把持各种工会工作的分子，也有不少是富农分子、官僚化的知识分子，或是过去剥削工人的老板。你们自己在报告上又说：“还有些工会工作同志看见区苏政府每月用的经费多，工会用的经费少，于是他们说‘做工会工作没有做苏维埃工作好，做工会工作饭都找不着吃’。很多区工会工作同志因此怠工”。难道这些不是混进工会来找饭吃，来想法剥削工人的旧日的老板或是富农分子吗？这决不但是像你们所说的“过去工会内教育训练工作的缺乏”，而主要的又是富农分子与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在那里作怪。这些人的轻视工会工作、工人的教育与组织，实是不足为奇的。赣东北的党对于这种分子必须坚决的斗争，必须坚决执行劳动法草案上的一切条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发动广大的真正工人群众来改造他们自己的工会，把这些异己的分子从工会中间赶出去。只有赣东北的党在这一方面实行彻底的转变时，才能说得上增加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与领导作用。你们必须明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不消灭工人与雇主间阶级斗争，而且却正相反，在苏维埃政府之下，这种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化。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府必须在种种方面去发展这种斗争，而且帮助这种斗争，在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

九、你们对于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必须有彻底的了解。苏维埃是政权的机关，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政府自然是保护工会的，它的劳动法就是工会与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律的保障。工会当然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不但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与命令，而且监督与帮助它们的执行。工会应该不断的把它们自己队伍中最积极的与最好的干部

送到苏维埃机关中，代替那些腐化的异己分子，去担任领导工作，以加强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的领导。没收财产、罚款处刑这是苏维埃政府的事，但工会会员可以帮助苏维埃做一部分这类的工作，同样苏维埃也必须依靠工会会员做它的拥护者与执行者。至于党领导工会工作必须经过党团，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了。

十、你们在你们的报告上说到贫农团在赣东北已经有了普遍的组织，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但这种组织决不是形式上的，它应该变成苏维埃政府在乡村中的依靠者、苏维埃法令在乡村中的传达者与执行者。苏维埃必须经常的教育贫农分子，使他们能够积极的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做反对地主与富农等的斗争。同时要积极的吸引中农分子参加苏维埃政府与一切群众的工作，以巩固对中农的联盟。贫农团不像职工会那样是有独立系统的群众组织，而只是各乡村苏维埃下面的柱石，上级苏维埃下面是不需要这种组织的。

十一、赣东北的党目前党内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系统的将一切不良分子如富农、旧官僚机会主义者从党中清洗出去。只有工人、苦力及雇农在党员中占大多数的党的组织，才能够执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领导工农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的革命工作。应该不间断的做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立三主义的“左”倾，同时也反对我们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你们在赣东北特委二次执委会决议上把党内保守观念认为你们党内右倾的唯一表现，这实是非常错误的。右倾的表现，在赣东北党内表现于富农路线，忽视与放弃苏维埃与工会的工作，不敢发动群众斗争，官僚主义，对于革命工作怠工、消极等等。如若你们不坚决的消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你们决不能在一切工作中实行彻底的转变。

十二、你们能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小组织，这是非常对的。以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现在不但在理论上是反革命的，而且在实际上也做着反革命的工作。他们用公开告密、绑票等的方法破坏我们党的机关，与在群众中的信仰，残杀我们的同志。上海、天津、唐山等处党的机关的一再破获，都是右派反革命工作的成绩。右派的反革命还不止这样，他们还想用造谣欺骗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英勇的红军内部的团结，夺取一部分势力去做他们反革命的工作。赣东北的党对于这类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必须严行防备，一经发觉，必须处以严厉的制裁。但只有在坚决的反对右倾、反对立三主义残余的路线之下，才能教育党内外群众，使他们能自动的来反对这类反革命分子。此外，更必须加紧反对改组派及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十三、不管你们与军阀的武装斗争的情形如何的紧张，绝对需要审慎的准备赣东北党的代表会议。在此代表会议上产生出新的赣东北省委，并讨论苏区革命斗争中一切主要问题及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同时必须选派干部到中央区去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党大会。必须尽量改善省委委员的成分，提拔工人及雇农的干部到里面去。省委必须有经常的工作计划，必须免去过去党完全做红军尾巴的现象。

十四、关于军事策略方面，赣东北的党现在立刻应该消灭苏区内所有的反革命武装，把所有零碎的苏区打成一片，以取得苏区的巩固。同时在敌人退出的区域内尤其是后方，必须尽量发展游击战争，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扩大农民群众争取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在失败区域内的工作也应该同样的加紧。只要我们能认真发动群众，配合着红军第十军及游击队的行动，我们必能继续巩固已得胜利的苏维埃区域根据

地，而向外扩大。即使敌人以大部队压迫我们，我们避免正面的作战而采取袭击、截击、扰乱、围困等等策略，以发动游击战争。同时我们必须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我们的力量向敌人为坚决的进攻，击破和击退他们，一直到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为止。

要执行国际对于我们红军所指出的中心任务，党应特别注意军师团及营连内的政治委员制及政治工作。应选派政治上最可靠的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担任此工作。同样要加强军队行动区域内的群众工作，宣传鼓动并组织跑反群众使他们参加斗争。此外更须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这一工作你们完全忽视了）以及敌人士兵中的工作。在军队中更应建立特务部（即政治保卫处），清除我们军队中及群众中反革命的走狗们及侦探们（参看关于特务部的指示）。只有这样做去，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在红军中建立党的威信。

十五、在你们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上，虽是你们嘴上说，对于军阀内部的冲突的紧张不可过抱乐观，但是这种乐观的态度在你们的通告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们说“因为新的军阀混战快要爆发，所以白军对苏区已取了防御的形式”，说“这种布置不是进攻革命的积极而是剿匪的尾声”。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害的。军阀内部的冲突固然日益紧张，这在今天当然尤其明显。我们对于他们内部的矛盾，固然应该尽量利用，但是忽视他们对于苏区的各种新的进攻策略，如像加派军队进攻红军，利用苏区内反革命的分子破坏苏区内部，组织民团向苏区游击，收买红军内与党内动摇分子分裂党与红军，利用各种欺骗的宣传蒙蔽革命的群众等等，决不能有丝毫的忽视。我们只有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组织这些群众于苏维埃职工会与贫农团等中间，我们才能利用白军内部的冲突而向他们

反攻，追击他们以至消灭他们。对于这一点，却却是你们在这一通告上完全忽略的。这不能不说是绝大的错误。你们知道光是背讲“进攻的巩固，巩固的扩大”这两句话，对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丝毫帮助，而是应该想法如何才能是工农群众参加的巩固与工农群众参加的扩大。

十六、此外白军对苏区的新的进攻策略，不单是在进攻“围剿”，而是在突击与长追，一方面企图与红军有真正的接触来消灭我们，一方在断绝赤区与白区的交通，使外面的商品不能运入赤区，使赤区的不能运出，以造成赤区内部的经济上的困难与饥荒，以此来造成民众对于苏维埃政府的不满，以至反水。我们在这里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工作外，在这里更应该特别注意赣江流域的船夫的工作。我们应该打入到船夫的旧组织中，分化他们，夺取他们这些帮口下的船夫群众，利用他们做赤区与白区的交通线。赣东北特委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建立起这一交通线。这不但对于商品的运输上对于我们有绝大的便利，而且对于中央与你们的关系上也有绝大的意义。

我们现在派曾××[1]同志为中央驻在赣东北的代表，他是全权代表中央的，一切省委工作都应该同他协商进行，他的权力高出于省委，但这并不是说他应该命令你们。他同你们将很亲密的一起工作，将帮助你们实行各方面工作的转变。

十七、最后还有一段要补上的。对于肃反的工作，你们以后必须加紧，真正阶级路线的执行必然在苏区内部引起新的分裂新的叛变。改组派、AB 团、社会民主党、新共党各种各样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必然要加紧破坏苏区的反革命工作。这在闽西、在赣西南中央区等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必须拿十二万分的坚决，肃清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内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肃反的工作决不单是组织的工作，而也是宣

传鼓动的工作。每一个反革命的捕获，反革命阴谋的发觉，我们必须利用来在群众中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为群众所了解，而且为群众所拥护。对于反革命者的处置，我们也必须从阶级立场出发。如若是土豪劣绅地主与富农，那就必须枪决。如若是工人、雇农、贫农或中农，那我们必须要用教育的方法，使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回复到我们的斗争队伍中来。在群众大会上由群众自己动手打死或枪毙的方法，应该尽量免去。反革命者给群众审判以后，即交苏维埃政府执行。

对于这决议，中央希望你们加以详细的讨论，而且立刻去坚决的执行。中央坚决的相信，赣东北的我们的党必定能够完成它所负的重大的使命。

中　央

一九三一，五月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曾洪易。

PDG

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我们读了鄂豫皖省委的报告，认为鄂豫皖苏区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紧急重要的关头。只有坚决的勇敢的执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各种法令草案（土地法草案、劳动法草案、经济政策草案、苏维埃建设法草案等）中间所包含的一切政策，我们才能冲破敌人的大举进攻，巩固鄂豫皖苏区的任务，这是最主要的。

在四军的区域内，我们认为有以下具体任务需要立刻执行的：

一、立刻坚决的改正过去分配土地问题中所犯的错误路线，立刻没收封建地主、军阀、官僚、豪绅、寺院的土地及一切生产工具。经过苏维埃分配给雇农贫农与红军士兵。这些剥削者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再取得任何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同样的没收，一般的当他们愿意自己耕种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富农，当然要没收他的分得土地与财产，并施以处罚。绝对不要侵略中农的利益。各种苏维埃农场应该立刻取消，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自己愿意集合的共耕，也须得积极的从帮助贫农雇农的生产工具入手以求得解决。要坚决的同那些占得很多土地的党员、红军的军官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做坚决的斗争。绝对消灭所谓“革命职业家”的

分得土地、委托农民耕种的现象。

二、苏维埃所颁布的税则，应该大大的低于军阀时代的税则，应该正确的运用累进税原则，坚决的反对没收式的“累进税”与对贫农也征收累进税的方式。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绝对要估计到中农的利益。要用种种方法鼓励雇农贫农与中农扩大耕种地。坚决反对限制贸易自由的企图。对于煤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国家必须采取节制与管理的办法，由合作社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去适当的分配，严格的防止商人的投机。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为了工人及红军的需要而收买粮食时，应按货给价，不准从农民那里用武力征取粮食。在与富农反对给红军存储粮食的宣传做斗争时，要动员广大的中农与贫农群众，并经过他们搜取富农的粮食储藏。要特别注意提倡节俭，当然这并不是说叫红军少吃东西，而是要反对各种浪费。

三、必须实行劳动法草案上的一切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工人运动的工作，党以后应该加以绝大的努力，实行一个很大的转变。应该同一切忽视工人运动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如若在军事行动期间，须要增加最高度的生产力（如兵工厂、衣服等等），而又不能达到需要时，可以做很大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使工人们自动的起来，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同时必须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加他们的工资。将没收的房屋分与工人居住，以改善他们的居住问题等。

四、党应该特别注意苏区中央政府及各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有许多错误和缺点。没有工作能力的政权机关绝不能执行正确的革命政策。党代替政权和包办苏维埃的一切职务，或是轻视苏维埃的工作，把党内最无能力最不

良的分子送到苏维埃机关中去，是最严重的错误，是争取群众的主要阻力。在暴动和推翻了旧政权之后，应立即建立新政权，即使我们只占领了几个小村落或一个小城市时，亦须立即成立政权。只有成立了新政权之后，才能够领导广大新政权区域的斗争，与其他苏区的政权建立联系。当红军占领了新的城市和区域以后，应马上建立革命政权的机关。这种政权机关开始时，一般的是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它是由暴动的领导者——党的地方组织、革命的群众组织、军队中的前委和政治部所组织的。工农革命委员会要准备和进行苏维埃选举，苏维埃成立后，即应取消。

工农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性质，但它仍应执行上面所说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它是第一个政府，它应该建立未来的苏维埃政权，并且应该具有各部的工作，颁布和执行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法令等等。在现在第四军的有些区域内还没有苏维埃的地方，应该立刻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和进行苏维埃的选举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在已有苏维埃的地方，应大规模的做苏维埃改选的宣传鼓动工作，使改选出来的工作人员确是劳动群众的领袖，真能执行革命政权的各种政策的。党应该经过在苏维埃内的党团，实现他对于政府和各种机关的领导，应该坚决的反对党包办苏维埃的危险，应该经常的同苏维埃内异己分子与官僚主义做无情的斗争。

鄂豫皖苏区政府的组织系统是：两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间，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苏维埃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它从执委中选举五人或五人以上组织常委会，常委会下设立如下各部：土地、外交、财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教育、卫生、人民、经济、邮务、运输和工农检查所。常委会选举一主席，必须时再选举一副主席，各部部长由常委会指定，并受它

的指导。此组织系统亦适用于革命委员会，他的分别只是在未选举以前不能成立执行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政府亦应如此组织。

五、有系统的将一切不良分子如富农、旧官僚等从党中清洗出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只有工人、苦力及雇农在党员中占大多数的党组织，才能够执行正确的策略，领导工农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工作。应该在党员和团员中以及群众组织中有系统的解释党与政府的政策和任务，应该不间断的做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与“左”倾。这种斗争是我们实行国际路线的必要条件。党不必将所有干部与组织都公开出来，以便革命在某区域失败后留下工作。这里我们不必再讲到托陈取消派、第三党及改组派等，因为大家已经都知道应该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了。

不管我们与军阀的武装斗争的情形如何，绝对需要现在就审慎的准备各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包括鄂豫皖区域）。在此代表会议上应该产生出新的鄂豫皖省委，并讨论苏区革命斗争中一切主要问题及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中央本身，过去对于中央局与地方党部（如鄂豫皖省委）的分别没有明晰的见解。中央过去把中央局当作了地方党部，实是代替了地方党部，取消了地方党部，这是异常错误的。中央局的责任应该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它有权力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但主要的是在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决不是代替党委。中央局是中央指定的，党委是当地党大会选举出来的。这并不是说中央局的同志不能充当党委的委员，但这必然要由党员群众选出来的（关于这一问题，中央另有决议）。中央指定张特立[1]、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特立为书记，特立同志兼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泽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六、对于青年团、工会、雇农工会以及贫农团等的组织，必须特别注意。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建立起这些组织，便不会有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斗争。发展苏区以及靠近苏区的白色区域内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斗争，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才能消灭各种机关内的富农分子以及各种反革命者，才能消灭党内的失败情绪与右倾的消极。

同时党应该特别注意吸收劳动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工会，经济的、合作社的以及文化的工作，中央局和省委应设立妇女工作委员会。

七、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注意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红军应该和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消灭此区内的白军，以达到这一任务。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在铁路两旁的区域内组织工农群众的游击战争，并开始建立苏维埃区域政权的小的炉灶，以执行威胁铁路的破坏工作。应该尽量扩大农民群众争取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应该派遣得力干部做白色区域的工作，但工作的重心不是组织空机关，而是群众工作的基础的建立。

八、党应该特别注意军师团及营连内的政治委员制及政治工作，应选派政治上可靠的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担任此工作。中央局应极力帮助各队伍中的政治机关的工作，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同样，要加强军队行动区域内群众工作及宣传鼓动并组织跑反群众，使他们参加斗争。此外更须加紧反帝斗争及敌人士兵中的工作，红枪会等组织应该打到里面去，夺取下层群众领导。

在军队里要建立特务部（政治保卫处），清除我们军队中及群众中暗藏着的反革命的走狗们与侦探们（参看关于特务部的指示）。

当我们获取了新的武装时，应立刻成立新的军队，组织系统是二或三团成一师，二或三师成一军。团的组织系统是：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到五班（每班十人左右），每团要有一千至一千五百条枪。如果军队已经超过一军或三师以上时，应根据军委制定的编制条例，组织一总指挥部，内分若干处，如不能如此组织时，则第四军的军部应执行此总指挥的职务。

九、中央局应指定鄂豫皖区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此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如第四军、独立师、第九军以及工农赤卫队等等都隶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下面，只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失了联络的时候，第九军、独立师以及赤卫队才能根据着苏区地方党部的指示独立行动。

革命军事委员会我们现在指定下列同志担任：张特立为革军委主席，邝继勋为总指挥，曾钟圣[2]为副主席，沈泽民为省委书记。此外再由中央局指定一二地方上的负责同志加入。

以后中央局应完全负责与上海建立经常联系并按期作工作报告。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即张国焘。

〔2〕即曾中生。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自从去年蒋阎[1]战争暂告结束之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调动了三十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了一切反动势力，联合一致的向红军苏维埃区域进攻，同时在非苏维埃区域施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以镇压革命运动。这还不足，反革命的国民党又采用欺骗群众（如开国民会议，宣言取消领事裁判权，明令裁厘以及污蔑共党暗杀杨虎与做土匪等等）与分化群众（如在苏区内组织反革命的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取消派，在非苏区内派遣侦探打入中共党内与收买中共的阶级异己分子自首告密等等）的策略，来破坏革命的战线。这种革命与反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统治的不稳而日趋崩溃，另一方面也就证明了红军苏维埃的存在与发展的确是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不管反革命的动员是如何宽广，他进攻革命的策略是如何狠毒，只要红军苏维埃区域真能依照国际路线，发动广大群众，执行正确的土地、劳动、经济、苏维埃建设等政策与红军进攻的策略，敌人的“围剿”计划总是遇到失败的。江西鲁涤平两师的全军覆没，公秉藩、路孝忱两师的先后失败，京汉路上岳维峻两旅人的缴械，袁英、吉鸿昌、夏斗寅、赵观涛乃至蒋光鼐、蔡廷锴各部队的不断失利，福建卢新

铭杂色部队的损失，这都是反革命军阀在两次“围勦”中所受到的严重打击。在革命方面，除掉江西红军一三集团军与鄂豫皖第四军在每次胜利中都得到壮大外，便连湘鄂西的游击队、湘鄂赣的十六军、赣东北的第十军，在最近以极少的兵力，配合着广大群众，都能支持着原有的根据地，不断的给敌人以打击。尤其是江西苏区 AB 团的被解决与闽西社会民主党的肃清，这更是给敌人捣乱苏区内部的一个严重回击。

不但如此，国民党在群众面前所施行的欺骗政策，也一件件的暴露真相。首先是裁厘结果，变成征收统税、特种消费税，而各地苛杂不仅未减而且更加多，这样，连大商人都通电说得不到好处，要讲价钱，结果只有更加重工农贫民的担负。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宣言本是一纸空文，他不仅为现在各帝国主义者的在华特权加了一层保障，并且还预许将来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顾问咨议的名义之下干涉中国的内政。国民会议的开幕更证实他是十足的官僚、军阀、资本家、豪绅、工贼的反革命会议，这只就他出席代表的成分看来便知。工贼官僚托名代表工农来参加国民会议，只能接受镇压革命剥夺工农自由的“约法”与拥戴蒋介石做屠杀工农的“大总统”。真正工农贫民的代表只有参加那官僚、军阀、豪绅、资本家、工贼以及一切剥削者除外的工农兵会议，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求得工农劳动群众真正的解放与中国的完全独立。尤其是在国民会议开幕的同时，广东陈济棠对南京政府表示了独立的行动，北方的石友三、孙殿英等等杂色军队亦正在团结第三派势力来对抗蒋介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不一定立即开始，但英帝国主义也恰于此时宣布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决裂，这不能不是英帝国主义从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同时日帝国主义在华北更要利用这一时机尽量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美帝国

主义也很露骨的教训南京政府要加紧进攻苏联，这正是与国际形势紧相关联。最近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日千里的进步，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又日益严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亦异常发展，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最近法意海军协定与国际商会大会上，便更加露骨的表现出他们对于苏联进攻的急迫。这一方自然表现出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其经济恐慌仍是无法避免，另一方也就表现出他们对于苏联的进攻是完全一致，而中国国民党便是他们在东方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南京政府企图与苏联恢复邦交的目的，据他们自己说，不恢复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即是说恢复邦交是为更便于向苏联借口挑衅。并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间日美间的矛盾，反映在中国国民党各派与各系军阀中间，改组派的继续活动，蒋胡间的冲突，四川云南的军阀战争，北方阎系军队的不断哗变，湘鄂赣三省“围剿”红军的军队不能协同动作，这都足以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统治是日益加强，而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他们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且更加加强起来。这正是摆在国民会议前面的一幅与统一和平恰恰相反的画图！

二、但无论如何，却不容许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在军阀战争的加紧布置与开火中间，国民党军阀对于红军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已经不是主要的危险，或者更进一步对于反蒋的其他各派军阀存有丝毫的幻想，这都是离开阶级立场之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认识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冲突，只能成为我们利用之以击破敌人“围剿”的弱点，绝对不能消灭反革命各派进攻革命的一致。所以不论改组派也好，胡汉民派也好，北方的阎冯[2]残部也好，他们攻击蒋介石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剿共不力”。事实上国民党十九路军即使真开回广东去对付陈济棠，

或者再调去更多的兵力，但“围剿”江西红军的计划却丝毫不会改变，并且敌人在屡次挫折之后，进攻红军的战略也有了不少改进，如对红军不用极呆板的“围剿”，而改用“长追”、“堵击”、“会剿”、“预备”等等部署，并倚赖着民团的游击队、国民党的宣传队与苏区内部反革命的阴谋，来企图根本消灭苏区与红军。同时南京政府对于群众的欺骗政策虽是不断暴露真相，但他仍将层出不穷的来施行欺骗。在白色统治区域，最近各地中共党部的确遇到不少次的破获。尤其是党内主观上的原因，自四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上虽有坚决的转变，但全党经过右派的分裂、两面派的动摇、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还没能很好的引进，以致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右倾消极的现象，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苏维埃区域还没能在路线上有彻底的转变，红军没能实行真正的改造，根据地没能真正巩固起来，最严重的是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领导力量也表显得非常薄弱，但群众自发的斗争却仍在发展。特别是五一运动，在几个中心城市表现出党之发动群众工作非常不够，甚至有消极的现象。这些严重的错误与弱点，是使党要成为一切事变前的尾巴。现在比任何时机都好，比任何时机都便于我们发动群众，揭破敌人欺骗与利用敌人弱点以击破反革命对苏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在这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与目前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沉状态。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三、为着上述的目的，中央政治局特规定目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如下：

1. 中央政治局本身对于加强对苏区的领导的任务，必须

更实际的进行。中央派赴各苏区的中央局的组织或中央代表，必须加强他的成分。有些苏区如赣东北湘鄂赣还没实行这一制度的，必须立即派遣得力的中央代表前去。对苏区干部的供给，自三中全会后，全数虽已将近二百五十人，但在成分上看来，（工人成分仅占百分之十五）极不能令人满意。且派遣干部到苏区是为加强领导工作与训练广大的新干部的，故干部的标准，今后中央组织部必须注意他的成分和工作能力，特别是政治认识。关于输送工人到苏区的工作，不仅没有丝毫成绩，并且发生许多错误，主要地是全党没有将这一工作看成是一种战斗任务，在群众中做成运动，特别是要与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只有在工人群众热烈的拥护红军的情绪之下，才能有自愿的往苏区去的真实要求。中央在五六两月中要严格的督促几个中心省委，在他们已经承认的定额中，要求他们“兑现”，并且要拿这一工作是否做到成为各省省委是否执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第一等任务的测验。关于输送工人的交通路线与办法，也必须立即改善，并须规定出更具体的办法。中央政治局责成军委对于国民党反革命新的进攻红军的计划，速即起草一训令给各红军与各地党部，由中央政治局通过迅速发出，并督促各地执行。

2. 关于反国民会议、反黄色工会、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应成为全国目前特别是红五月运动中的最主要任务。中央宣传部与各级党的宣传部应领导全国的宣传工作，在这一任务上编印便于在群众中散发的传单小册子特别是标语与画报，组织宣传队在工厂、作坊、农村群众中去进行广大的宣传，即使开始只是三四人的小队、一两厂的活动，也是万分需要的。在国民会议开会中与开会后，我们要努力做到在某些工厂中通过反对国民会议、拥护工农兵会议

的决议与宣言，这是最有伟大意义的斗争。各级党报与赤色工会的报纸必须在这一任务上多加宣传。苏维埃区域的党更应在实现各级苏维埃的改选与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任务上来对抗国民会议，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以揭破国民会议所允诺的统一和平建设都是欺骗，这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

3. 根据各地五一运动的教训，中央特别号召几个中心城市的党部，如上海、南京、香港、厦门、青岛、天津、唐山、北京、太原、奉天等地，必须极艰苦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尤其是职工会的工作，去准备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要以反帝斗争做中心，并且要执行反帝运动策略上的转变，使反帝运动的日常斗争与部分口号成为吸引广大工农群众乃至下层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帝的革命运动旗帜之下的必由之路。五卅运动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要尽可能的在工厂、作坊、农村中立即建立起来，要吸引各派的群众来参加以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同时，应更进一步组织分区的或地方的五卅运动委员会。五卅运动必须与厂中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但不能等待斗争而不做关于五卅运动的发动。在发动五卅运动中，要利用各种群众集合的场所，去举行飞行集会，要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去号召“五卅”的罢工、罢业、罢操与示威，特别是在斗争条件更成熟的工厂，更应组织工人经济罢工或同业罢工来发动。在“五卅”当天，要尽可能的坚决的做到有群众的示威，如不可能，至少应有决心去布置在有群众地方的飞行集会。如认准备飞行集会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或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不在运动的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如上海某区），这都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党必须予以坚决的斗争，同时立三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必须坚决肃清。苏区关于五卅纪念的举行，应依照

中央通过的红五月运动中的苏区工作计划执行，特别重要的应于工厂、作坊、农村、兵营中放假一天，一切武装群众尤其是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应举行武装示威，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但必须与作战的任务联系起来。

4. 全国各地党部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成绩与各地兵变潮流及兵士斗争的发展是极不相应的。尤其在国民党军阀两次"围剿"苏区都受了失败与正在准备他们自己的战争当中，不论苏区与非苏区，到敌人军队中的工作更应成为全党的第一等任务。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必须将中央通过的目前兵运决议案全部实施起来，尤其重要的是进攻红军的敌人部队中的工作，黄河流域的兵运及红枪会运动、两广的兵运农运、淮河流域的农民斗争，中央及省委与地方党部都应有单独的指示和工作计划，并定期考察他的成效。同时为得要统一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下面必须设法成立农民部。

5. 没有比现在再重要的是党内思想的稳定与一致，这首先就需要全党加紧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的斗争，特别是在国民会议开幕的现在，将资产阶级的影响从党内根本肃清出去，更成重要。肃清立三主义的运动，尤其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必须与实际工作中联系起来。并且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与党内立三路线破产的现在，党员间的拼命情绪特别是消极与逃避观念将更加浓厚。因此，党报上党的一切会议上一刻不可忘记的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各级党部对此工作执行得迟缓或松懈的，便是对执行国际路线不坚决，上级党部及党员间应执行自我批评的检举。

6. 只有在全党思想的稳定与一致之下，才能谈到党的指导机关的巩固。阶级敌人现在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党来捣乱党，右派罗章龙小组织分化出去之后，接着就是敌人的奸细侦

探发现于党内，阴谋破坏党的机关与摧残党的干部。为着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巩固与安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工作。但保存与发展党的组织之最真实的基础，还是使全体党员特别是白色统治区域的党员都能打入生产中去，打入社会中去，密切群众的联系。党现在一切组织工作中心都应放在这一目标上。没有真实的生产和社会基础，没有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便绝对没有稳固安全的领导机关。打破机关主义委派制度与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是现在组织上最切要的斗争任务。中央省委及各地党部都须在这一原则上重新审查自己的一切组织方式与机关，凡违反上述原则的都应坚决的予以取消和改变。党内异己分子的淘汰，也自能在这一转变中肃清出去。在苏区关于巩固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任务，应依照中央关于富田事变决议案的原则执行。在这里，特别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及其组织，应与保存党的一部分秘密基础同时进行。只有在党与阶级战线巩固的条件下，党才能更有力的领导着红军与工农群众击破敌人的“围剿”，争取革命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阎锡山。
〔2〕指冯玉祥。

PDG

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

七军前委：

自听到了×、××和××诸同志关于七军的详细报告之后，中央认为：

一、七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确的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七军转战数千里，但从没有做过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做没收土地与改良他们生活的斗争，对商人、地主都表示出特别的谦让，甚至于对他们的财产不敢有丝毫的侵犯！自从几次盲动冒险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在七军内部充满了失败逃跑的情绪，一听到敌人军队到来的消息，不问这消息是否可靠，立即逃走，甚至有草木皆兵之感。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的明显的了！所以七军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坚决的反对立三主义的“左”与在这“左”的言词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后者在目前立三路线遭到我们严重打击之后，是更其危险的。必须在两条路线上做很大的斗争，七军的党部才能真正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具体的说来，就是组织工人与

农民实行反对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富农的群众斗争，利用群众力量来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不组织群众，不领导群众的斗争，而想单靠军事行动来取得“江山”，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错误思想。七军党部必须征服这一转变中的一切困难，坚决的实行这一任务，创造七军所在地的群众基础与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他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巩固革命根据地，并不像七军党内有些领导同志所想的，把军队驻扎在某一区域，想不离开，而是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把斗争放在本党的领导之下。

三、七军党部在实行这一转变中，必须尽量肃清党内一切异己分子，如像混在党内障碍布尔什维克路线执行的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等，尽量改进党员的成分，对工人与雇农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开门，把他们引进到党、红军与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内。必须彻底纠正七军党部过去对于党内教育的忽视，健全军队内党的生活，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七军党部必须彻底了解，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党，就不能有革命的胜利。同时七军党部必须用全部力量同立三[1]时代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做坚决的斗争，一切党的决议的执行必须要经过群众与依靠群众，脱离了群众就是宗教式的小团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四、中央决定将赣西南之二十军合编为七军，以充实七军的力量，以统一军事的指挥。在改编二十军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就是二十军内部少数干部曾受了江西永阳省行委中一部分AB团的影响，曾经脱离了过去总前委的领导，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行动。中央已有决议，认为毛泽东等同志对于过去江西省行委中暗藏的AB团分子的断然处置的路线，是十分正确的；

中央又认为在二十军中亦不过受了少数AB团分子的影响，二十军本身的基础完全是赣西南分得土地的农民。前委在改编二十军时，应当很谨慎的、很周到的不使二十军的群众发生误会，要把AB团的阴谋在群众中揭发出来，要把二十军中拥护总前委的可靠的干部和士兵群众夺取过来，合编为七军。中央决定七军军长为×××同志，以××为政治委员，××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同志为军参谋长，其他指挥员和二十军的各级指挥员的调动，均可由前委斟酌实际情形，决定分派后报告中央。

五、在七军、二十军合编后，七军的任务应当是……（略）与一、三军团会合，如二十军已渡江与一、三军团会合时，七军本身的能力当然较薄弱，此时应发动赣西南群众起来扩大游击战争，不断的向敌人游击，以牵制进攻中央区之敌。目前两广军阀复有联合反蒋的行动，陈济棠已将陈铭枢驱逐，取得广东的统治，张[2]桂军首领已到广州，蒋、蔡[3]两师有南撤的消息，军阀的内部的冲突又将有新的爆发。我们对于这些军阀的内部冲突，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因为不论是谁取得胜利，对于我们的屠杀政策是同样狠毒的。但是我们应很好的利用他们的矛盾和弱点，用革命的战争来消灭他们反革命的战争。对于军阀联合进攻的惧怕与无办法是不对的，但不知利用他们中间矛盾和弱点，来给他们以严重的打击以致消灭他们，也是错误的！

六、中央决定，目前七军未恢复赣西南根据地与中央一、三军团会合前，仍须组织前委为该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除将原由七军选举之前委委员，中央批准外，中央复派×××同志为前委书记，×××、×××、×××三同志为前委委员，在××同志未来到前，前委书记由××同志代理。中央坚决的相

信，久经战斗的七军同志，在国际与四中全会正确路线领导之下，一定能顺利的执行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许多中心任务！此致布的敬礼！

中　央

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李立三。
〔2〕指张发奎。
〔3〕指蒋光鼐、蔡廷锴。

PDG

中央通知第二二三号

——永远开除叛徒顾顺章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和一切叛徒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过去中央负责之一的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又名黎明或张华）最近在汉口被捕后，立刻投降了中国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他在武汉供出了许多我们党的机关，并将他所知道的在狱战士指名枪毙，甚至诬陷许多工农分子以邀功。现在他正在南京总司令部与蒋介石等那批刽子手在一起，计划怎样在全中国尤其在上海大规模地破坏我们的机关与屠杀我们的同志。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污点，也是最可耻的叛徒。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更加紧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更严密我们的组织，更特别注意我们的秘密工作，更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致起来消灭中国工农群众的敌人顾顺章以及一切共产主义的叛徒！同时中央坚决相信，只要全党同志加紧努力群众工作，在革命群众的伟大威力之下，一定能够迅速地消灭顾顺章及一切革命的叛徒。江西的 AB 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一类有组织的革命敌人，均在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威力之下受了严重的打击，这便

是很好的例证。阶级的坚信，群众的威力，便是我们消灭顾顺章及一切革命叛徒的最有力的保证。

中　央

五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陕西省委：

中央检阅了你们寄来的文件，并同你们派来的吉、黄[1]两同志详细讨论之后，对于你们那里的争论与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一、中央认为你们四次全会的决议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们这决议是根据于不正确的三中全会的调和决议而成立的。你们那决议同三中全会的决议一样，对立三主义同样的采取了调和态度，同样的没有给立三主义以严重打击。只是因为你们没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解释你们对于四中全会及非常委员会动摇不定的态度。你们的六次全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还是不正确的。这种严重的政治上的动摇，决不能单拿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错误的组织观念来解释。这种动摇只能拿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来解释，才能合于事实的真相。对于你们过去所犯的严重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希望你们有深刻的了解。

二、同时中央必须指出李艮、张子萍、刘独胜三同志所提出决议案，也是不正确的。这决议案很明确的表示出这些同志对于陕西革命的形势有了右倾的估计。这些同志太夸大了陕西灾荒的略略减轻的作用，太相信了杨虎城的改良欺骗作用，以至自己上了他的大当。说革命形势低落，反对尽量发展罢工运

动，反对在群众斗争中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围绕中心城市，主张总任务是注意群众的落后意识，利用群众的合法观念等等。无疑的，这决议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同志结果还是接受了右派的政纲，对目前陕西的革命工作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陕西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中央认为你们根据于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成立的六次全会的决议，一般的是正确的。但中央必须指出你们对于陕西省委四次全会决议的错误估计。同时，中央还要指出，你们在六次全会的决议上，没有抓着你们工作的重心。陕西党目前的工作重心，不是在空谈革命高潮的程度，而是在加紧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党的群众基础。李艮、张子萍等的错误，并不在他们主张加紧对于日常斗争的领导以走向政治罢工与暴动，而是在他们根本否认党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去走向政治罢工与暴动的可能，于是根本对于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拒绝领导。他们虽是嘴上也说到领导日常斗争联系到最后的出路等等，但是他们的消极怠工，完全表示出他们实际上是不愿领导这种斗争的。在陕西党中工人成分少到极度，工会工作完全放弃。他们虽也主张注重工会工作与吸收工人入党，但他们同时却提出加紧知识分子中的工作以取消苏区的任务。在农运中，他们以贫农团为组织上中心任务，而放弃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提，这是将苏维埃区域的中心任务错放在非苏区的农运中间。在兵运上，提出绝对不要无前途的兵暴，这会在实际上放弃目前北方广大兵变潮流的发动和领导。这些人如若不能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必然会走向罗章龙等一样的反革命路上。

四、陕西党在坚决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必须要坚决反

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口头上服从决议而实际上违反决议的可耻的两面派行动。但是要顺利的完成这一任务，陕西党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旧的工作方式，用活的领导来代替死的文字上的纸头上的领导，用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来代替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打入生产作坊、农村和兵营中去，必须采纳新的工作经验，并且必须发展群众的创造能力。我们应该坚决的反对空洞的不兑现的工作计划。计划必须是具体的切合于实际的。对于这种计划的执行程度，你们必须有经常的检阅。

五、你们在四全会的修正决议中说："党的基础建筑在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与富农身上，无产阶级成分几等于零。指导机关完全在知识分子手中。"这的确是陕西党内最严重的现象。你们的动摇，你们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派别观念，特别是对中央领导机关引进新的成分的错误了解和反对，以及一切清谈倾向，都是同党的成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你们在党员成分的转变上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尽量吸收工人与雇农到党内来，并把他们的干部引进到指导机关中来。中央认为陕西党部过去却有借口陕西落后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固然陕西没有很大的现代产业，但是作坊工人（如西安等）和乡村无产阶级都是广大的群众，陕西党今后在几个较大的城市和主要的农业区域必须有计划的征收这些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强固的支部，同时丝毫不畏惧地把积极的工人同志引进来做领导工作。并且你们必须同你们对于干部的错误观念作坚决的斗争。你们以为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老党员才有"工作经验"，以为只有他们在国内做过多少年"实际工作"的才能做党的领导者，这实是大错误的。你们必须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干部。凡是能为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在实际工作

中表示对党忠实、表示积极、表示能有新的办法的同志，不论他党籍年龄如何的幼稚，我们应该尽量的把他们吸收到指导机关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以新的力量来代替旧的空喊缺乏干部的“老党员”。中央近来深刻的感觉到过去委派各省省委委员的错误，因为这实际上拿中央的干部去代替地方的干部，而不是利用中央的干部去教导与引进地方的干部。所以中央不能再给你们书记，但中央将派一个得力的巡视员来指导你们帮助你们的工作。

六、陕西是中国一个最大的灾区，加之统治阶级极残酷的剥削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们都处在奄奄待毙的地位，陕西党必须认识这种情形坚决地组织灾民斗争。同时发动广大的农民运动，以西安为中心，开始在渭南、同州、蒲城等附近的地方组织农民委员会（以乡村为单位）与农民协会，进一步建立整个陕南工作。至陕北工作因地理上的关系，中央以为必须组织中心县委与山西党联在一起。关于这种变更，我们不久即将派人去实行。

七、陕西同时是一个小军阀割据的地方，士兵群众不但受欠饷的痛苦而且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陕西党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士兵工作的决议尽量组织士兵运动，这一工作在目前红军发展军阀战争又将爆发的时候，特别重要。最近你们必须派人打进陕西主要的部队内（如杨虎臣等），同时经过种种群众的组织和线索来加紧这一工作。

八、关于各种实际工作转变（如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的方针，中央已有各种个别的决议，你们必须切实的执行。党报出两种，在现在陕西党的力量上实办不到，最好极精悍的出一种党报，主要的是真能传布到群众中去。省代表大会定在五卅前，也太仓卒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

中去，有了真正的转变后再开代表会较为合适。同时中央将委托巡视员与你们当面解决一切问题，订立各种工作发展的计划，因此现在不一一叙述了。

中　央

五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吉，指吉国桢。黄，可能指黄平。

PDG

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央政治局：

我和昌浩同志于四月七号到达黄安赤区南边，直到现在已四十七日，此期间事情经过很多，现在只能先作简单报告。

一、当我于四月十一号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即得到当地同志报告，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当时鄂豫皖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于两天前完结了，C. Y. 扩大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正在新集举行，中生[1]及其他负责同志多在新集。十二号到新集，始知到长江下游蕲水一带的理由是：（一）接助中央苏区；（二）恢复黄梅广济赤区；（三）截断长江，威吓武汉；（四）解决四军物质缺乏问题。我当即根据中央决定指出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包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并提议目前四军任务应迅速肃清商城之亲区[2]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山与皖西形成一片，来巩固和扩大这一赤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央苏区。这一提议得到当地同志同意。那时我没有时间来详问同志们当地情形，也没有时间来做一个党内两条线线上的斗争和鄂豫皖苏区的任务的详细报告，我只最简单的形式说明了一些中心，却是指出敌人"包剿"的

严重，批评他们举行很冗长的会议，没有得到具体任务的答复之错误，指示目前是反“包剿”的国内战争紧迫时期，须立即执行几个具体任务：（一）经过宣传煽动工作，发动工农群众加入红军，“五一”以前要号召三千人武装群众，党员、团员军事化等；（二）立即设法集中十天粮食在苏维埃手里为红军之用；（三）白军、民团中兵士工作；（四）非苏区的群众工作等等。红四军军事行动的计划，在新集的同志虽然同意了，但红四军那时已到达商城之亲区，正在准备经由皖西到长江下游去，因此我于次晨又赶到亲区去转变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十五号到亲区，邝继勋同志却已由皖西金家寨会合十二师预备下长江。四军负责同志对于军事行动计划的改变，都表示赞成，可是这时敌人已不让我们去从容肃清亲区了。那时四军与黄麻联系已断绝，同时陈调元部已占据了皖西麻埠向金家寨进攻。我和泽民同志就于四月十七晚在亲区会面了，当即决定红四军首先解决麻埠、独山之敌，因交通关系，我随同四军一同进行。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消灭了独山陈部约二千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把麻埠敌人也吓跑了。把麻埠工作布置一番，即兼程专回黄麻。黄麻赤区中心七里坪、新集一带却正在五月一号前后被吉鸿昌骚扰了一次去（虽然损失并不大）。四军于五月九号到达光山之后，曾击退了由泼皮河去进攻新集之李口永师[3]。泽民、传贤同志近来到黄麻，中央分局才于十二号在新集正式成立起来，工作才数天。

二、鄂豫皖的中心赤区，是包括黄安北部，麻城西北部，光山、罗山的南部，东西约二百里，南北约一百五十里的区域，人口約百四十万人。黄安南部，黄冈的北部，黄陂南的一部，还有赤区，一些和游击战争环绕着。在我们周围的敌人，你们是知道的，不用多说。我们接好几次消息，都说蒋张[4]战

争已在剑拔弩张之形势中。今天又接到消息，说蒋系军七师以上向潼关开，就是从赤区四周敌人看来，光山泼皮河敌人原系五团，说只有二团，京汉路赵观涛部向北移，这些都证明上项消息有几分可靠。即使敌人因军阀混[5]绝他的粮草。（二）敌人近来动员地主豪绅反动势力组织，加强和恢复民团清乡，并配合民团与白军一致行动，由地主豪绅强迫农民入联庄会、大刀会等。（三）经常由白军配合着民团骚扰赤区，割赤区农民的麦子，牵农民的牛，烧农民的房子，砍农民的头，强迫农民投降他们的联庄会、大刀会等，送柴米草料给敌军，派大批侦探反动分子到赤区内部来从内部破坏。这些阴谋，敌人是在有计划的进行。最近敌人并且得到相当的成功。在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都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

敌人的阴谋虽然造成了赤区边界相当危机，毕竟我们在第二次“包围会剿”第一个浪头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这些胜利是由于红军、苏维埃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掩护。

红四军现在共有十三团，每团有机关枪四挺，内十二师共四团在皖西，一共有一万二千支枪，子弹平均每支枪有四十颗。兵士成分百分之八十五是农民，百分之十五以上是贫农雇农，中农也占一个相当数量，富农有些单个分子，百分之十至十五是俘虏兵和哗变过来的兵士。五月上半月中，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红军，现在红军中枪还多过于人，四军现在起码还要二千人补充。除红军外，黄麻、皖西两赤区约有四千支枪的群众武装，组织在警备营、游击队、袭击队、特务队等名词之下。可惜这种士兵家庭分得土地的状况没有详细调

查。我曾亲自问过二三十个兵士在分土地中所得到的利益如何，有一个雇农和他的家属得到了十七斗田，在一斗田有一担至二担谷，他非常之高兴的来参加红军。另一个青年十七岁，也分得了五斗地，他母亲非常之高兴的送他的儿子去当红军。但是以后随着我一块走的一个兵士，他家有十斗田，三口人的家庭，但分出去四斗田，现在只剩六斗。以前笃三[6]同志的传令兵，家中七口人，有田八斗，也分出去一斗。虽然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可是红军士兵的发展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特别是由地方武装生长出来的红军士兵成分还要好些。因此，我们的红军虽然在技术缺乏、生活恶劣的条件下（有时甚至终日饿饭），每次战争都是非常勇敢，形成愿死不愿伤之心理。独山之战，十一师独攻敌人而得胜，十二师在麻埠之高山，终日不退而得胜，使敌人终不能在赤区停留。而且在游击战争和四军历次作战中，的确造成了不少的干部，但每次作战，伤亡特别多，因此干部始终非常缺乏。当然，我们的红军还有很多的弱点，还有许多国民党式军队的残余，政治工作特别的差，政治工作人员干部的缺乏，俘虏兵变成军事干部之相当重要。组织的混乱，纪律的不严密，极端民主和平等观念的倾向，□□□□□□□□□□□□，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企图经过兵士的家属来破坏红军等等，夏斗寅、岳维峻（他还被围在这里）都企图经过□□部哗变过来的，或派人□□哗变过来破坏红军等等。红军现在不但能冲锋陷阵，且能时时作战，可是作战不懂技术的，特别是射击不好，不能攻坚，能攻不能守。红军有了这样的基础，有些弱点是容易克服的。

在黄麻这一苏区，土地又重新分配了一次。这次分配，大

体说来，还算正确，改正了过去许多错误，贫苦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土地。现在仍然有错误，就是他们常有“集中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号，因此，贫农和中农会想到他们的土地也在集中和没收之列了。分配土地时是只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 C. P. 包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有时都平均出一些土地去了。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或归苏维埃，山地更是不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最好办法。但是这里发生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这是因为 C. P. 和苏维埃组织游击队、群众武装去领导群众去打民团首领，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我经过商城，看见最大多数的房子都被顾敬芝烧了，男人以至小孩都拿去砍头，女人拿去卖，每个女人换一支到两支枪，抢掠更不必说了。同志们，假使我们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当要得到农民何等热烈的拥护！

苏维埃改造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绩。现在各乡、区苏维埃的成分大体不错，贫农雇农占大多数，许多苏维埃机关中的富农和腐化分子被改选掉了。但是，最大的毛病是：这一改选运动只是技术的，没有从政治上去改造。指出苏维埃过去成员政治上的错误及以后苏维埃应有的转变和任务，因此一般人都说，苏维埃现在换了一班老实无用的人了。苏维埃虽然设立起来了，每天不知要办多少事，但是有点像地保或兵差代办处，不大像群众革命政权机关。这些群众在我们党在苏维埃内工作

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不知政权是什么，只知学国民党政权的样式衙门化。分明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学着办公事，接应□差。虽然有这些怪状，终于雇农贫农不会是国民党官僚，有些下级苏维埃的确有他的群众。我曾在高桥区第一乡苏维埃坐着，围着许多的男女在那里，我问他说：你们如何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他们一致回答说："男子去当红军，女子参加生产，童子站岗放哨。"我问他们苏维埃是什么？他们说："苏维埃是我们穷人自己说话的机关。"一切气象都证明乡苏维埃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的错误是误认苏维埃是单用命令统治农民的，有些地方证明农民群众的了解政权是我们重要的武器。一切地方党部不知发动农民自觉的建立苏维埃。

红军和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正确的关系。现举两个例子：一个红军军官向苏维埃要一双鞋子，苏维埃的执委说没有，他回说"你们生成是驼皮鞭子的"。商城区乡苏维埃写信给四军军长称"哀求军长大人"。同区某乡苏带领一些女子到红军许[7]师长马前，跪求红军代他们打寨子。这些都证明苏维埃红军是怎样受着国民党军队的流毒的影响，同时并证明我们的党还要做许多的教育的工作。

群众对于红军都是非常拥护的，到处都有农妇替红军缝衣、洗衣、做鞋等。昨天军委还接到七里区送来的一百双鞋子，乡间的老太婆甚至将好吃的小菜留起来，说等红军来送给他们吃。征募红军新战士时，有数百小足女子和小孩要求参加红军，经苏维埃劝阻不听，一定要走六七十里路问军委是否可以要他们到红军中去。现在红军中已有少数小足女子和小孩做宣传工作。

赤色区群众对红军如此拥护，可是白色区群众是在反动势

力影响之下，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关于红军的谣言。第二[8]，从前有一时期，有些地方捉了白色区的人，不管是农民是地主，胡乱杀起来。第三，红军到了白色区，赤区农民就去运输粮食。有些运输队，甚至红军到了那里，他不管是农民的是地主的，什么东西拿了就走，形成赤白对立的现象。红军打下了光山十几个寨子，运输队乱拿当地农民的东西，虽然督促很紧，立即进行解释工作和检查监督的工作，但这种现象还是有。

这一苏区最感困难的就是粮食问题。皖西粮食情形更坏，商城要欠三个月的粮食，黄麻光罗去岁也要缺少一个月，现在农民已经没有饭吃了，苏维埃机关还是乱费粮食。最近我们对粮食想了许多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整理好。特区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一面设法没收白区地主粮食，一面严管粮食。新集附近虽然打了寨子，挑了四千石以上的粮食，但光山县苏只集中了八十石粮食，弄得伤兵医院都没有粮食吃，即是在这件事情上充分证明有些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机关中简直没有革命气味，更谈不上做共产党员，因为他们自己吃饱了，并不十分注意伤兵和农民是否有饭吃的粮食问题。经济更是无政策。特苏政府、军委、军队和党部穷的要命。因此在财政□□粮食这条战线上还要有极大的努力。我想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去想办法，也还没有得到相当干部去执行这一政策。特苏银行已于本月十五号开幕，信用非常之好，农民都是用这银行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里坪一处几天工夫已用四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给市面。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

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

中央分局成立时，我们曾指出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并不能证明特区党内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我们当时指出三点：第一，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曾申明“关于红军曾受到失败”一点不同意，实际有走到取消接受四中全会的决议的倾向。第二，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充分发展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与当地具体工作联系起来的自我批评。第三，往长江下游去的军事计划的不正确。当时得到了中生同志的承认错误的表示，我们认为是满意的。笃三同志的确在工作中对于他自己过去的错误没有再重复，而且有申明书到中央分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工作中表现很好。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妥协改组派，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的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是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中央分局除中央最初指定的六个委员加上我和昌浩同志共八人外，再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工人）、高敬亭（农人）三同志，候补拟定十五人，还未正式通过。军委决定国焘、中生、继勋、徐象谦[9]、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七个同志。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现在

中央分局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他承认他曾奉右派的使命来这一区，他承认他的错误，但是他还没有公开他到这里后的活动和指出他自已错误的性质，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右派组织上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一个他的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

我想上面这些叙述，已经指示给我们：（一）在反对立三主义的错误路线之下，这些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二）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来实现，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些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他的发展前途是未可限量的，只要能够不动摇的执行正确策略。我们的干部是很缺乏的，党、苏维埃和红军主要力量都用在战争的任务上。五月一号前后又被吉鸿昌部在赤区骚扰了一次，自然很难得建立经常工作。我们现在准备积极提拔工农干部。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延期在七月一号举行，现在正要准备在这会以前的党和团的扩大会和苏维埃大会。

我们要求中央的事件是很多的：指示、干部与材料。

（一）刘伯承、李特二同志和其他的军事人才、骑兵、炮手（尤其是迫击炮手）都要。（二）诊伤的医生和诊梅毒、疥疮的医生。（三）大批工人干部。（四）做党的工作、团的工作以及文化工作人员。（五）无线电与无线电生。（六）我们四周围工作的非苏区工作的加强，中央须多派人到信阳、广水、黄、麻、皖北一带工作。（七）鄂北、豫西工作特别重要，请中央派人去，此间找不出适当的人。中央能多给我们一份人才，我们这苏区就要多巩固一分。无论如何，多派和快派人来，多多益善，材料也请多多给我们。

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和堡垒的形势：一是商城、亲区民团

的顾敬芝善于游击战争和侦探工作，压迫当地农民服从他，四军每次到那里，农民都被他压迫跑反走了。二是新集西北至东北一带有百多山寨（我们已打了十几寨）都是地主同民团的武装。三是水圩子。要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和扩大赤区，非打破这些堡垒不可。

我们已决定于二三日由新集将四军主力调到黄安附近来消灭黄安附近之敌，来巩固这一苏区，保护农民的麦子。等这一任务实现后，四军主力还是要去执行肃清亲区的任务。

国　焘

五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曾中生。

〔2〕亲区，称“清区”，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山区。

〔3〕似为李韫珩师。

〔4〕指蒋介石、张学良。

〔5〕原文此处缺字。

〔6〕即余笃山。

〔7〕指许继慎。

〔8〕原文无“第一”。

〔9〕即徐向前。

PDG

中共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中央审查了最近各苏区党的报告与中央对他们的指示以后，发现党的组织上有几个严重问题必须立即指正，同时并规定正确的办法如下：

一、中央为加强对于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遣派中央代表去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可是因为组织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将苏区当地的最高党部委员会代替了和取消了，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确的委派制度的残留。因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假使各级党部都照这一组织方式去领导工作，则各级党委都可被上级派遣的代表的集体组织所代替了所取消了。事实上，因为在鄂豫皖与湘鄂西要设立中央分局，便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特委取消了。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

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在上述这些区域的党的代表大会没开以前，中央局得直接指导上述各苏区省委的工作，既开之后，就应产生闽粤赣湘鄂联省的党委员会，中央局经过他去领导上述各苏区省委的工作。鄂豫皖在四月初开的特区党代表会上所产生的特委，应即依照新的名称划一为鄂豫皖省委，鄂豫皖中央局经过他去领导鄂豫皖党的工作。湘鄂西省委即暂就湘鄂西特委改组，俟湘鄂西党的代表会开成后，应即产生新的省委。湘鄂西中央局应经过他去领导湘鄂西党的工作。中央局的委员可同时被推选为当地最高党部的委员。中央为加强苏区党的干部起见，亦可派遣得力同志参加当地最高党委或充当书记，但中央局或中央代表在任务上在组织上必须与当地最高党委分别清楚。

二、各苏区特区委员会统改称省委员会，他成为地方党部（县委市委或区委）与中央之间的一级经常组织。省委管辖的区域如太宽广时，可指定某些中心县委兼管其附近各县委，或联合数县乃至十数县成立道委员会，以介乎省委与县委之间，但这不是极经常极普遍的组织。如在鄂豫皖省委下，皖西北特委即改为皖西北道委。中心县委不宜兼管县委太多，道委可扩大至十数县。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形势，党的省区既划小，省委之上因一时期不能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得联合附近几省委成立联省党委员会，这也是非经常非普遍的组织，必要时方须设立。

三、红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红军中团能组织小组，隶属于党的连支部之下，同时上级党委下也须组织团的工作委员会来计划与管理团的工作。党在红军中必须帮助团的工作进行与发展。党对于红军的领导，除经过政治委员与红军中党的组织外，上级的指挥系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远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红军，党得组织前敌党委员会加以直接指导，如红军第七军（原第七军与第二十军合编）在赣西南行动时，便应成立这样组织。前委与地方党部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行动上为着全部战争的利益，他得指导地方党部。

四、各苏区党的改造工作必须有系统的进行。首先是党员成分，必须以城镇工人与乡村雇农为基础，坚决的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应停留的将他们洗刷出去。党内一切腐化、消沉与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做肃清的斗争。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要放胆的引进他们到党的指导机关到各种工作中去学习，对工人农民干部应用最大的注意力帮助他们，对引进新干部不能有丝毫的躁急与不经常性，且必须与反政治上组织上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政治上不坚决的分子绝不能负组织上最主要的责任。各苏区党要在这一认识上，去进行各级党部的改造，从支部到省委都应在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定期召集支部全体会，区委、县委、省委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各级党委。在全体会或代表会上，要特别讨论苏维埃各种法令草案、巩固苏区与击破敌人“围剿”的行动方针、国际与中央的指示，并检查各级党委的工作，加紧反立三路线特别反右倾机会主义与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最近方开过省（即特区）代表大会的苏区党

部，也要加紧进行地方党部直到支部的改造工作。最近没有开省代表大会的苏区，应先行改造地方党部，召集支部全体会与地方党部的代表会，同时选出赴省大会的代表，以备开省代表大会。湘鄂西、湘鄂赣、赣东北全应准备开这样党的省代表会。在江西中央区要准备在全国苏维埃大会前开一闽粤赣湘鄂党的代表大会，讨论苏维埃大会的工作，并产生联省的党委，这里主要的成分应是闽粤赣、江西、湘东南、湘东南，湘鄂赣各省委与其管辖下的各县代表。联省党委与省委的当选人，应是群众中最有威信而政治坚定的党员，特别要有工农成分。这些代表会要统在五六月内完成，他们的经过与关于组织上的改变，统须报告中央批准。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

工人们，农人们，红军战士们！

在世界革命运动正在高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莫大胜利的国际条件之下，中国已经有两个政权了，一个是革命的苏维埃政权，一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国民党政府，一个是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的政权，一个是豪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不断的坚固与扩大，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日益逼近于死亡！

在两个政权对立的形势下，革命火焰飞快的高涨，尤其是中国南方各省——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的苏维埃区域，一天一天的巩固。各地方的红军，一天一天的壮大，这个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固柱石，已经使帝国主义国民党吓得发抖。

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一切反革命派为要挽救自己的统治，拼命来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想要来消灭中国革命。但是他们第一次进攻完全被工农群众和红军打破了，第二次更大的进攻计划又被我红军和工农群众击溃了！他们的“国民会议”欺骗，不但不能动摇工农劳苦群众，反之全国各地的苏区红军和工农斗争，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不断的进攻

下更加发展，更加扩大，更加强固。

最近红军一方面军的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击溃了二十万的白军，十数日之间转战四五百里，白军尽被击溃，这是开展了革命的新局面，这是证明，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反动统治不能消灭的革命势力了，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有力的推动者了。在这时候反动统治的内部矛盾又加紧张万分，军阀混战立刻又要爆发。

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之下，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为革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了！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在今年八月一号（现已改期至公历十一月七号）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全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

全国的工农兵劳苦群众们！热烈的来拥护全苏大会，踊跃的选出你们的代表！扩大你们的革命斗争，坚决的向你们的一切压迫者进攻！苏区内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们！来积极参加全苏大会的工作，来改造你们的政府，来扩大你们的红军，来反对 AB 团及一切反动分子，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区域！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党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可是现在苏维埃政府有许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没有成为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所以在全苏大会准备时期，要切实的改造各级政府，严格的批评过去的缺点与错误，选出工人雇农贫农来充当政府委员，要从政府机关中赶走富农、流氓、腐化怠工的分子以及官僚等。在全苏大会

代表的选举中，党、团、工会、贫农团一定要切实的领导群众，要使忠实的积极的分子能够当选为代表，要严防富农 AB 团的捣乱，或钻入这次选举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只有这样，全苏大会才可以得着圆满的结果，苏维埃政权才可以更加巩固起来。

全国的革命群众们！要认清全苏大会的召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将要建立中国革命的巩固根据地，将要贯通全国的苏区，汇合全国的红军，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苏维埃的红旗将飘扬于全国！起来！

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打倒国民党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英勇的工农红军万岁！

工农解放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下）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将近全部完成（明年秋季又将通过新的建设计划），国际工人运动的突飞进展（最近法国十五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及交通工人的同情罢工、波兰的罢工与巷战、瑞典的总罢工、挪威的群众骚动、西班牙的总罢工与革命骚动、日本工人的绝食同盟及不出矿坑的罢工、美国失业工人的示威与骚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印度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工农革命运动更继续高涨，尼加拉圭、阿根廷、安南、朝鲜的罢工与群众骚动的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入和剧烈（金贵银贱的危机无法挽救，生产凋蔽失业增加……），使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崩溃过程日益加速和加剧。国际帝国主义为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起见，不惜用尽一切可耻的方法去恶化本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在社会法西斯蒂的帮助之下，用尽法西斯蒂手段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积极从各方面加紧进攻苏联的行动和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劳苦民众的血汗，同时，用尽一切力量积极准备着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反革命的实业党及孟什维克在苏联法庭上供词中所说的，以法帝国主义为领导的一九三一年必须进行进攻苏联的战争的计划，已经在国际帝国主义会议

上公开讨论（国际商会大会、国际谷物会议、国际军缩会议等，今年都已经在议事日程上公开提出对俄问题，帝国主义正在指挥中国国民党强取中东路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也是战云密布（英法意海军谈判公开宣布破裂，法意边境时常军事冲突，日美海陆空军不断举行作战总演习，英国赶紧在直布罗陀山坡建筑巨大的飞机站，各国连德国在内均争着制造新兵舰与飞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武力压迫更加残暴，它们的国家军队在中国、印度、安南等处，差不多时刻都实行所谓“非正式作战”的军事行动。无论从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观点看，无论从投资及销售商品和剥削贱价劳动力与原料供给的观点看，中国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必须集中来争相宰割和侵略的最重要的对象之一。几千万甚至几万万啼饥号寒愁苦病疲的劳苦群众，成千累万的所谓“盗匪”随时随地被刀砍枪杀，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百十年来统治中国的成绩的真实照片；二十年来不断的军阀战争，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相互间火并战争的缩小预演。最近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指挥和帮助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工农红军和镇压全国工农兵贫民革命运动，另方面指挥着国民党各派军阀积极准备着军阀混战（广东与南京的战争），因之，使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达到更深刻的地步。

二、国民党几年来统治中国的结果，使各国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地位均更加巩固。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宁案、汉口四三案、济南惨案、张案、水案……均被国民党一手拍卖。被工人群众用革命威力收回的汉口、九江英租界，均被国民党双手送回。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空军均日有增加，工商业投资及政治军事借款也日益加多（例如蒋介石自己在国民会议报告中都承认帝国主义工厂从今年二月到五月便增加四五十处之多）。

满期的不平等条约都加了一层新的保障（如镇江英租界、天津比租界等），未曾开放的领空领海与内河也都甘心听外人宰割（如中美、中德航空协定，日渔航侵入浙江沿海捕鱼，日轮时常任意驶入内河等等）。为取得帝国主义欢心起见，国民党政府竟强占民地来替美国公司建筑煤油池（如老鼠沙案等）。南京政府更公开请国际联盟来指导经济委员会及派各种专家来宰割中国。至于越界筑路，越界建筑房屋，任意屠杀和殴打中国劳苦民众以至兵士警察，更是在上海、武汉、天津、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处所屡见不鲜之事。

三、然而帝国主义与其走狗们对于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残酷的非人的压迫与剥削，是不会没有结果的。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六二三运动，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武汉革命时期以及广州暴动，都曾经给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各派军阀官僚统治以有力的打击。最近红军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日千里（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两次“围剿”计划，建立了几百县的苏维埃政府统治区域），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已经是最近将来必然实现的事实，这一方面给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以根本的威胁，另方面却兴奋了全中国劳苦民众革命的情绪，使中国工农兵贫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是日益高涨着。因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间便用尽了一切分工合作、异途同归的手段，来企图消灭群众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除不断地增加驻华海陆空军以威胁中国劳苦群众外，最近并且随时随地公开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实行其挑衅和示威的行动（直接屠杀湘鄂赣各省的工农红军兄弟及革命工农群众，同时上海在四月间有法巡捕打死忻海珊案，法巡捕殴伤法电工人案；在五月间有美水兵打死工人顾金根、码头小工戴亭左，杀伤戈登路小商店主璩子祥及其店伙马瑞祥，杀

伤浦东江北小工杨金儿、岗警孙德宝、新顺昌轮渡王金发、小工马树，英商电车公司勾结国民党逮捕铜匠乔生发，英商老怡和纱厂勾结公安局逮捕工人马振开……)。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从蒋介石到汪精卫、陈公博等，便一方面更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和用尽白色恐怖的手段来摧残非苏区的群众的革命运动，另方面却领导其走狗们——邓演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国家主义派、罗章龙右派、黄色工会工贼等等，空喊一些反帝的武断宣传词句（例如国民会议通过什么“自动宣布废约”、“收回租界”等决议，发表废除领事裁判权宣言，检查外人入口护照，指使上海黄色工会领袖成立假的顾案后援会，国民党下级党部纷纷通电要求废约，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来模糊群众的阵线，来和缓与阻止真正群众的反帝运动。

四、中央特别号召全党同志深切认识国民党所作的“反帝”的武断宣传的作用：国民党及其走狗们均利用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来进行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以及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企图在“爱国”、“保障民族生存”等口号之下，强迫工农群众为资本家地主去安心“造产”，士兵群众为进攻苏联牺牲。在目前工农红军冲破敌人两次“围剿”，军阀战争一触即发，劳苦群众革命化日益加速的情势之下，南京政府特别在最近玩出许多所谓“反帝”的遮眼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很明显地蒋介石是企图一方面把日益高涨的劳苦民众反帝情绪抓到自己的领导下来，使它们的运动不超过自己所能控制和所需要利用的范围和程度，以便一方面消灭群众的革命运动，另方面再大大向各帝国主义大人面前做一笔有利的买卖；同时，另方面，企图把工农兵劳苦民众反对南京政府和整个国民党各派的不满情绪，转向到所谓“对外”，以便一方面和缓群众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愤懑情绪，另方

面延缓军阀战争到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发动。中央坚决断言，蒋介石以及整个国民党这类可耻企图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同时中央特别唤醒全党同志认识国民党这一企图对于阻碍和延迟群众革命化过程中的危险——尤其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并且号召每个同志用尽一切力量来动员群众去反对和击碎国民党这一可耻的企图。

五、中央坚决地以自我批评的武器指责中央及各级党部在四中全会以来，还未能迅速的根据国际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指示，在反帝运动中作到真正的工作的转变，尤其是对于拥护苏联的工作，犯到极不允许的忽视的错误（如对实业党、孟什维克审判案都未曾在党内党外作应有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上海及其它有些城市中，虽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和成绩，但还不够得很。并且陈独秀时代及立三路线统治时代对于反帝运动的根本错误（前者以为民族革命中不谈土地革命，后者以为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以及把反帝运动看成只是少数学生或几个反帝党团工作人员的任务，或者以为乡村用不着反帝运动等等错误观点，依然随时随地发现。已有的反帝组织的工作方式也还是未能作成群众运动，而多半还只是狭隘的秘密工作方式。因此，中央要求全党在国际去年七月来信、四中全会决议及本决议等的正确指示之下，马上进行一个反帝运动工作的严格检查，同时，并规定各地的定期的反帝的具体计划。中央要求全党立刻动员起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进行下列的反帝运动的具体工作：

（一）在党报上及革命群众团体的出版物上经常的登载关于反帝运动的系统文章和各种材料，同时，必须抓紧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每一暴行和国民党各派的每一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作具体对象，立刻印发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宣言、传

单、画报、壁报及小册子到各种群众中去散发，以揭穿国民党最近的各种“反帝”假面具，尤其是国民会议开幕以来的各种把戏，上海顾、戴、璩、马、乔各惨案，六二三纪念，八一运动，成立中国反帝大同盟，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等等，应该成为目前反帝运动的主要宣传鼓动材料。

（二）在各种固定的反帝纪念节（如行将到来的“六二三”、“八一”、“九七”……）和临时反帝事变（如最近顾、璩、马、乔各惨案），必须用一切方法召集各种革命群众的反帝会议（群众大会代表会等），坚决地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反帝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同时，抓紧这一切机会成立反帝的各种群众组织。

（三）尽力建立反帝的各种群众组织——反帝的主要组织当然是有国际性的“反帝同盟”，但为他利用公开路线和便于吸引广泛群众起见，可以而且必须成立各种各式的反帝性的群众组织（例如收回租界委员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委员会、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委员会、外债研究会、金贵银贱问题委员会、苏联五年计划研究会、国际失业问题研究会、国际谷物会议研究会），以便经过这些组织吸引群众加入反帝同盟和扩大反帝运动。这类组织这一方面既便于吸引较广大的群众参加，另方面又易于在实际行动上揭穿国民党及其它各反革命派别的“反帝”宣传的假面具。反帝同盟及其它各种反帝的组织基础，主要地必须建筑在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当中，各组织的会员，主要的是个人会员（只团体会员，时常容易成为空架机关）。同时，必须尽力把一定城市或一定区域的反帝组织经过代表会、联席会等各种方式统一起来，成立某一地方或某一城市的反帝总组织。

（四）立刻在各地成立顾案后援会、璩案后援会、乔案后

援会，以及包括最近各惨案的群众后援会等公开的群众组织，向广大群众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组织公开的宣传队、募捐队、纠察队等去公开地进行马路、工厂、作坊、学校、兵营、农村以及兵营附近的群众演讲，募捐工作，号召群众起来实行群众威力的反抗（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抗议等等）。

（五）抓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迫切痛苦的各个问题，在各种群众中进行经常地反帝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例如反对火油涨价，反对米粮涨价，反对加房租委员会（如在上海租界内等），反对巡捕踢小贩摊子，反对巡捕殴打工人苦力，反对巡捕捐码头捐等等。）

（六）责成中央宣传部与江苏省委加强对上海反帝同盟党团的领导与帮助，把它转变和发展成为更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组织。同时，要求各地方党部，首先就是香港、满洲、天津、北平、徐、海、蚌等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及苏区各级党部，对于各地已有之反帝同盟组织必须经过党团工作加以整顿和发展。在原来没有反帝同盟组织的地方，要努力在六七月份成立反帝同盟以及其他反帝组织，以便在全国反帝同盟的第一次代表会开会时，能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帝组织中选出的代表来参加。同时，各级党部委员会中必须指定一人计划和领导反帝工作。

（七）中央责成中央宣传部及江苏省委帮助上反党团具体计划和准备号召与组织全国反帝同盟。上反党团必须在六月半前完成反帝同盟纲领的修改和公布工作，同时，并须立即改善和充实上反出版物的内容，在其中提出反帝同盟纲领，反帝同盟全国大会各种决议材料等引起群众热烈讨论。

（八）中央最近须起草一专门指示信给苏维埃区域的地方

党部，指出它们对于反帝运动注意力的不充分以及各种缺点和错误，要苏区党更加努力地去进行群众的反帝工作，成立反帝同盟及其它反帝组织，使各苏区在今年八一全国反帝大会上有群众反帝组织选出的代表参加。

六、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鼓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拥护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紧密地适合地联系起来，必须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彻底认识，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唯一领袖，只有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彻底把中国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唯一武器，只有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制度人类才能得永久的和平幸福。同时要在各级党报上经常登载揭发立三路线及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反帝运动的取消、投降的理论与实际。此外，并须提出“立刻收回租界”、“立刻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空军”、“立刻废除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者从中国滚出去”……口号，以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和吸引群众实际行动起来。

七、共产国际去年七月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中的一段说：“党应当企图包括全城市的行动委员会去与各种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组织与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学生小手工业者等等），在斗争的具体问题上进行临时的联合。这个方法——经过参加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建立为着具体目的的各种特别行动委员会，经过这些委员会吸收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以及学生的贫苦阶层群众参加斗争——是加强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且使之革命化的主要方法。党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缔结临时战斗的联合，应当严格地注意到使这些联合不是牺牲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曲解党的政治口号的，同时使他们一定要成为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到革命斗争中来的工具”。中央特别唤起全党同志注意这一指示的正确，尽量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把它在扩大反

帝运动的工作中应用出来。

中　央

附注：

建立"收回租界委员会"、"废约委员会"这类能够公开存在和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这绝不是合法的办法，而是利用公开路线去进行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我们在这些组织中应当进行真正的群众的革命工作，指导群众走向加入反帝同盟和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实际行动。

各级党部接到此决议后，须立即在党内作一个热烈的讨论——而且必须在每一支部——首先是重要产业、学校及农村支部，作详细的讨论，以便造成全党的一个反帝工作的真实转变。各级党部对于这一决议执行的程度如何，首先就要从目前对于各惨案后援会工作、"六二三"工作、"八一"工作及反帝各种组织的建立工作来检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央通知第二二八号

——党的机关组织与工作方式的转变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

革命运动剧烈的发展，阶级分化愈加尖锐，敌人动员一切反动阶级的力量“围剿”苏区，同时加紧在非苏区的白色恐怖。许多省份的领导机关，最近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些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在立三路线之下脱离群众而形成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尚未根本肃清。真正生长在群众中的组织获得群众的掩护，极少为敌人所发现，即使发现，亦因为有群众力量的保障而不易被敌人摧残。这一严重的血的教训，必须为全党深刻的注意，切实执行机关组织与工作方式的彻底转变。中央本身已经开始这一转变，但各委对于这一问题的注意仍极缺乏。中央根据具体的经验，决定下列的原则，各级党部必须立刻讨论具体办法，迅速执行！

（一）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必须实行群众化的原则，彻底肃清架空的机关主义的组织方式，吸收在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参加指导机关工作。现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努力打入生产或寻找职业，要使一切工作人员都有真实职业的掩护，尤其要使指导机关密切与群众的联系。

（二）采用活的领导，极力减少文件的来往。省委，市委县委直到区委都要有固定的巡视员，经过巡视员传达指导机关的决议与检查下级党部的工作。要根本转变过去公文形式的指导而成为实际有效的活的指导，机关内部要根本转变过去只凭书信来往的方式而成为个人负责当面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去根本肃清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

（三）各部委的工作，更要吸收在业的积极分子参加，接近支部一级的组织，完全引进支部当中——尤其是大工厂支部——的同志参加部委的工作，从中央起，必须废除各部的秘书制。

（四）各级党部的预算，必须随这一转变，重新制造。党的经费的用途，主要的是建立支部工作、宣传、巡视与交通，机关的用费要缩减到极小限度。从七月份起，即须实行新的预算。从机关中节省下来的经费必须用在遣派同志参加生产，建立附属组织，加强巡视工作。

（五）各级党部的书面报告绝对废除空洞的虚文，要有实际材料的内容，提出具体的问题，严格的裁判过去立三路线下夸大、欺骗的恶习。

（六）各级党部一切的接头与会议必须估量环境，减少人数。重要会议必须实行保留一二负责同志在会场之外。会议时间必须限制，一般的不得超过四小时，发言的人更须受严格的时间上的限制，绝对不容许过分延长。非重要政治问题的讨论应废除记录。

（七）党员名册与干部的登记必须改变为极安全的方式，或有些临时调遣，应单凭记忆，绝不容许给敌人以摧残的机会。

（八）在秘密工作的执行上，必须严格的执行检查。破坏秘密工作的分子，实行铁的纪律的制裁，绝不容有丝毫的犹豫动摇。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苏联五年计划将近成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前提的日渐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日益露骨，使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同时，使国际帝国主义更加加紧对于中国的压迫与剥削，国民党几年来统治的结果，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而扩大和加深了全国经济的破产。不断的军阀战争，加倍的官僚制度，空前的捐税剥削，非人的白色恐怖，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更加陷于水深火热的地步，使这些饥寒交迫的千百万群众不能不从革命道路上自求解放。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在有些区域经过两三年的奋斗，更加兴奋了劳苦群众的战斗情绪和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中国最近事变的发展，显明地表示出国际政治经济总危机及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最近事变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工农红军得到空前的胜利，冲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国民党统治正式分裂成南京与广东两个政府。这样，将使革命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反动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

（1）革命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苏区的工农红军得到空前的胜利，又冲破了敌人第二次的“围剿”，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势力（AB团、社会民主党、恋爱研究社等）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农红军更加巩固和壮大，苏维埃政权得到工农民主专政的初步巩固，巩固以至扩大了苏区根据地。

二、反动统治区域的有些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日趋于重要产业部门，日带有显明的政治性，日益加重进攻的性质。

三、春荒时期的农民斗争的普遍爆发，各省所谓“盗”、“匪”的日渐增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运动日益发展，分粮吃大户运动蔓延到关外各省。

四、国民党军阀军队士兵的革命化和闹饷哗变的事实日渐增多。

五、反帝反国民党的情绪在一般群众中日益高涨，因而影响到中小商人也在罢业等行动中表示出对国民党的反对情绪的增涨，有些地方的学生开始着罢课运动。

（2）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这主要地表现在：

一、从地域上看，虽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运动除湘鄂赣闽外，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有了新的进展，但在其他各省的工农斗争还未达到直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程度，而且严格地看起来，全国反动统治区域的各地的群众斗争，也表现出各种各式的（地域上的和社会成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现象。

二、工人斗争虽然在有些中心城市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比起广大的农民的苏维埃运动来还显然落后。中心城市内工人斗争不但还未曾达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并且斗争也还表显出严重的散漫、自发和不普遍的状态，党在工人斗争

中的领导尤表现异常的落后。

（3）反动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主要地表现在：

一、中国统治阶级的最近一个新的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在广大群众中实际教训宣告破产。统治阶级各派都还未能找出更新的统治形式。

二、南京政府的假的统一完全宣告破产（广东成立临时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加急剧，军阀战争将一触即发。

三、统治阶级的财政状况几乎已到水尽山穷的地步，外债满期的达四万万八千三百万元有余，福建、湖北、安徽的省政府均宣告财政破产，声称辞职，江西全省警察的欠薪总辞职，税捐繁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时常引起全业商人的罢业。

这些特点，充分证明出中国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继续增长，造成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日渐成熟，直接革命形势在湘鄂赣这几个主要区域正在逐渐生长着和成熟着——首先就是江西省区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已成当前的紧急任务。这种事变的发展形势，更证明共产国际去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决议、十一月对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及中共四中全会决议的绝对正确；另方面也就宣布了立三主义者、罗章龙右派及托陈取消派等对于红军苏维埃发展抱悲观失望，对于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取怀疑态度，对于共产国际及四中全会作造谣污蔑等行为的完全破产。

（二）目前国民党统治正式分裂成两个中央政府（南京与广东），北方各派正在进行着反蒋的军事团结与各种派别的分合活动，军阀战争已经处在剑拔弩张的形势。这固然一方面反

映着国际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冲突的空前紧张（最近在反蒋问题上，主要地表现着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当然同时在各派军阀中也反映出英日之间的矛盾），另方面反映着军阀制度及中国各派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异常尖锐。但主要地还是中国统治阶级各派，在南京政府两次大举“剿共”遭受惨败及国民会议实验宣告破产之后，为着用各种分工合作异途同归的政策来各找挽救反动统治的垂死命运的出路。因此，国民党改组派、西山派、第三党等，深恐群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情绪会发育滋长起来成为革命火焰的高涨与统治阶级的解体，于是打起反南京政府“剿共不力”的旗帜来，企图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团结在“广东临时国民政府”的周围，以赓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孙石韩[1]进行着第三派的团结，阎冯[2]及奉系旧派等新北洋系的酝酿，久已消声匿迹的吴佩孚及安福系均跃跃欲试，都不外乎想把“剿共”重责自己担负过来，以免因国民党统治形式破产而根本中断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血腥统治。国民党蒋系的南京政府当然也不能不作困兽犹斗的挣扎，它一方面拼最后一滴血去“努力剿共”，另方面尽最后一息去准备对粤和对北方作战。然而，统治阶级各派在各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这种各找出路的斗争，不能不造成更有利于红军苏维埃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斗争发展的各种条件，统治阶级各派相互间的冲突和斗争越复杂剧烈，对于革命运动发展自然就愈加有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统治阶级营垒中目前还能这样公开破裂和剧烈斗争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外，主要地还因为一方面中国革命运动在目前依然发展得不平衡，另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还未能达到使敌人营垒中已经没有了暂时用这些分工合作的方法各找不同的出路的可能。如果工农红军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占领了湘鄂赣区域的一个或几个中心

城市，则革命的发展将更促进反革命力量的团结，中国各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不可免地将要立刻暂时统一起来以集中的阶级团结力量来对付革命的危险（当然，其它原因也能形成这样的结果——例如，某些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赶上了农民的苏维埃运动，或者湘鄂赣以外主要区域有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怒潮的爆发等）。这一可能与必然的形势，在目前已开始显露其端倪。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已经异口同声提醒与教训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北方各派军阀们，应当暂时“和平妥协”起来，去对付共同的仇敌——工农红军。蒋介石与广东政府最近的各种函电，北方各派军阀的通电、宣言，上海总商会特别发出通电，都把“剿共”列在第一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矛盾永远超过于反革命内部的矛盾，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各派在自己内部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依然是企图以暂时统一的反动势力来镇压革命运动。

（三）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各派的这种反动企图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斗争及中国各派军阀相互间的战争，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及军阀制度才能避免。在共同进攻革命的一致中，不独不能真正消灭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而且要增加和尖锐化它们相互间的各种新旧矛盾，因此，在它们的“剿共”前提的暂时联合之下，也并非就完全消灭了它们之间因剧烈矛盾而给予革命方面以可乘或利用之机。而且我们相信：中国几万万工农兵贫民劳苦民众与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的友爱的坚决的革命团结，一定能够战胜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的黑暗团结。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增长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全中国政治经济危

机日益尖锐化的基础之上发展着中国革命运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各派无法能够消灭产生中国革命的那些政治经济的前提，便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消灭中国工农兵贫民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因此，我们相信：不仅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各派现在对付革命所采取的一切残酷的压迫与可耻的欺骗政策，将要立刻在我们胜利的工农红军及高涨着的群众运动之前迅速破产，就是它们将来采取更进一步的压迫手段与欺骗政策，结果也只有惨败。蒋介石第三次进攻红军的计划，在军事上只是要更加多给红军以可乘之机，在政治上只是更加暴露国民党反对群众和脱离群众的罪恶与弱点。蒋介石亲自出发江西，即不作张辉瓒、胡祖玉之续，恐也难免作鲁涤平、何应钦第二；广东政府准备派赴江西"剿共"的香翰屏、余汉谋等料定也不会比南京政府过去的许多战败将军起更多的作用；北方军阀虽然再多送几批兵马去湘鄂赣"剿匪"，料想也不过又是些另外的岳维峻、公秉藩、孙连仲。就是英美日法帝国主义者当着国民党军队无力支持而实行公开武装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行动时，我们以几万万工农兵贫民群众团结的威力，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民众的援助和同情之下，一定也能够步苏俄的后尘，战胜帝国主义这种可耻的反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反动统治区域施行空前的白色恐怖，虽然使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组织受到许多肉体的摧残和暂时的打击，但任何白色恐怖的手段绝对不能根本消灭革命运动，而且不可免地更要激起广大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愤恨与誓死奋战的决心。湘鄂赣三省是白色恐怖最严厉的区域，同时也就是红军苏维埃运动最先发展和最先巩固的区域，这一方面给了反动阶级的白色恐怖以实力的回答，另方面给了劳苦群众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冲破白色恐怖的坚强的自信。在国

民会议这个总的纲领之下，从蒋介石到陈独秀，从汪精卫到邓演达，作了不少呕尽心血的改良主义及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的欺骗，然而在国民会议这幕迷剧开演以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双方实际行动，没有一时一刻一桩一件不直接间接地揭穿这幕迷剧的可耻真相。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其走卒们——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等——最近玩弄的许多假反帝的遮眼法术，在广大群众真正反帝斗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免地要遭受到可耻的破产。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罗章龙右派及黄色工会农会领袖们所宣传的那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所谓工农政纲——如二五减租、改良水利、部分的没收土地、国民党劳动法、工厂法等等——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运动扩大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遭受到死刑的宣判。叛徒傅柏翠一类地“成立新共党”、“土地归农民，不要苏维埃”的“新式”欺骗，托洛茨基教训陈独秀等的“不要骂红军，只须骂共产国际及中共的领导”的“巧妙”计策，或者将来更进一步地学习俄国反革命经验来作些“土地归农民”、“不要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类的欺骗宣传，我们也能应用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经验来揭穿它们和战胜它们。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它们长期反动统治过程中，不仅已经掘成了自己的坟墓，并且已经培养成了大批的有足够力量埋葬它们到坟墓中去的群众。历史已经注定了它们的命运，对革命势力的任何压迫与欺骗不能根本挽回他们的厄运。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帝国主义与各派军阀政客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是抱着誓不并存的仇恨的，它们一定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和工农红军拼命。蒋介石第二次进攻红军时比第一次增更多的兵力，定出更残酷的计划，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出过更大的力气。在这次第三次“围剿”当中，国际

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们一定要用更多的军力来和红军作殊死战，一定要更加重对全国革命运动的压迫与欺骗手段。我们绝不能因为我们两次冲破“围剿”的胜利，便存下轻敌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认识：冲破第三次“围剿”，需要我们比冲破前两次“围剿”用更多的气力，就是揭破敌人的各种武断宣传的欺骗，也还需要我们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努力。冲破第三次“围剿”的迅速与否，全靠我们苏区与非苏区的工作如何而定。实现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完成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一定需要党领导广大群众作更艰苦的战斗！

（四）因此，无论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如何有利，无论反动统治的维持是如何的困难，如果革命领导方面没有及时的正确的策略，那么，在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还不能保证革命方面的必然胜利。目前革命运动的发展更加证明这一断言的正确。凡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的正确路线的苏区（首先就是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目前都得到强固工农红军及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的伟大胜利，而且各苏区最近所得胜利的大小与他们各个实行国际路线先后和多少成正比例；只有未曾得到国际路线指示而继续受立三路线领导的如二集团军过着逃跑奔窜的生活而时常受到敌人的打击。反动统治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还表现出严重的散漫、零乱及自发性，反帝斗争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有组织行动，江浙各省、西北、东北及北方各省的农民斗争多半还带原始性、半原始性及自发性，与我们党过去受立三路线领导以致不正确的领导工人斗争，放弃反帝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以及现在还未能走上群众这些斗争的真正先锋地位，有极大的关系。中央唤起全党同志注意：苏维埃区域一般地还都是刚才开始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反动统治区域在执行国际路线过程中还很少令人满

意的成绩，立三路线与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两面派的手段、调和派的思想还随时随地的障碍着我们实际工作迅速的转变，党的领导还未能走上各种群众斗争的前卫，时常还表现落后。党要能迅速地完成当前的紧急任务，首先就要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指示，不仅苏区党要更加有力地动员起来，非苏区党同样地要努力起来为着当前紧急任务而奋斗。非苏区党部对于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作得极不充分，必须有一彻底的转变。中央要求全党同志立刻动员起来，执行下列具体决定，以便迅速地完成党的当前紧急任务：

（1）江西中央苏区至迟在八一以前必须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它各苏区代表大会也必须立即举行。同时，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首先就是上海、香港、北平、天津、满洲、徐海蚌——须立刻动员起来，领导广大劳苦群众热烈地作庆祝红军胜利的群众示威、集会，广泛地宣传全国苏大会开幕及其政纲法令草案，号召工农兵贫民选派代表去参加苏大会和加入工农红军，发起广大群众的慰劳工农红军的募捐运动。

（2）各苏区利用自己连次战胜的经验及敌人可乘的弱点来决定我们的新战略，以巩固根据地的阵营，配合着诱敌深入及击破一方的战术，来摧毁敌人“长追”的部队，以发动广大群众后方骚动和四出游击的计划，以瓦解敌人“堵截”“预备”的队伍，以广大地组织和应用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及加紧邻近苏区的反动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及兵士工作，来打破敌人“利用民团游击”及“党、政、军、民合作”的计划。一方面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单纯的军事投机观点，以为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红军便可毫无顾忌的离开根据地而冒险轻进；另方面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对国际路线曲解的庸俗观念，以为巩

固根据地的策略内容便是使红军永远保守着几个狭小区域，在任何时候我们的苏区和红军均不应扩大。英勇卓绝地时时占在军事的主动地位，处处从应用广大群众力量去战胜敌人着眼，不丝毫放松敌我对比的优势机会乘机消灭敌人的主力，加倍地巩固苏区根据地，同时，沿着根据地的周围，巩固的向前发展，以扩大苏区的领域，是目前中心的战略。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之下，应该实行采取保存红军主力与避免正面冲突的战略，在现时也依然有效。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首先就是进攻红军的主要后方区域的党部，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组织士兵的革命哗变和领导自发的兵变，进行军事上的破坏工作，响应苏区的军事行动。

（3）建立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首先就是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岳州、南浔路、武长路、京汉路等，要成为苏区及非苏区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必须尽力把这些区域的党的组织基础及群众组织基础建立起来，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响应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4）必须利用现时战胜的便利条件，更加加紧建立与巩固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强固战斗力的真正“铁军”似的工农红军的任务。把最近作战的胜利经验中的优点和弱点搜集起来训练我们的红色战斗员，并且要把战胜得来的各种武器能够有组织地利用起来，开始作大规模平地战及城市战的演习。非苏区党部团部必须尽量把军事专门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及军事政治人才输送到苏区去。

（5）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起“政治保卫处”专门组织，同时，要把肃反工作的真实基础建筑在广大革命群众阶级自觉性及积极性的身上，坚决地实行“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

中农的”这一正确原则，加之以无情的思想斗争，这样来吸引广大贫苦群众积极参加苏区的肃反工作和使动摇的中农分子不受反革命欺骗利用。

（6）必须作到真正动员全党加强士兵工作的转变，中央要求苏区及非苏区的地方党部——尤其是邻近苏区及军事要塞的反动统治区域党部，立即把所有党员动员起来，同时，把青年团员及一切革命的工农成分都动员起来，要它们作一定计划的士兵工作，选派一部分政治坚定和能吃苦耐劳的党员团员及一般革命工农分子，给以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送入到敌人的各种（海陆空军）部队中去进行瓦解和夺取敌人士兵的艰苦工作。苏区党部除派人打入敌军外，必须领导红军士兵加紧作战场上与敌军士兵“联欢”的工作，对俘虏士兵工作必须有一彻底的转变，不应该只着重于开欢迎大会后给资遣散，应该是多动员广大群众对他们多作一些较长时间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然后把它们之中较好的成分吸收到红军中去，分编到我们坚强的红色战士一块去，使他们学的军事技术能够拿出来帮助工农兄弟，而我们的红色战士能够在政治上改造他们，同时，并应该分配他们以土地。当然，不愿意留在苏区的，我们必须给资遣散它们，鼓动他们到敌人部队中去散布我们的影响。

（7）红军累次的胜利与群众斗争的高涨及为着加速地冲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更加重了党在中心城市工作的任务。过去几个月来，党对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表现出严重的落后现象，许多自发的斗争党未能去领导，甚至有些地方党部忽视和放弃对工人斗争的领导。中央要求全党立刻进行职工运动的转变，从中央到区委，必须立刻建立起有经常系统工作的职工部以加强对工会工作的注意和指导，产业支部应该起赤色工会的党团作用，加紧领导各种工人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罢工，组

织和领导有可能的某一产业（如上海丝厂及电车等）的同盟罢工，加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是对于我们工农红军的有力帮助。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必须成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经常工作。

（8）春荒夏荒时期的农民斗争正需要党去领导。党应该把发动农民的抗捐、抗税、抗债、分粮、吃大户种种斗争，夺取农民半宗教性组织内的群众，准备与发动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民群众的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组织，成为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9）反帝运动在红军苏维埃发展的影响之下，在有些地方已经日渐卷入更广泛的群众，苏区与非苏区党部必须根据中央最近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决议的指示，作到一个真正实际工作的转变。同时，要立刻纠正过去对于青年与妇女工作的忽视错误，加紧对于各地团部工作的领导和帮助，立刻在各级党部之下成立有经常工作的妇女部。许多党的省委及地方党部都没有妇女工作的现象，是再也不能一天继续下去的。

（五）能够真正完成上述任务的前提，是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上的一致、组织上的强固与革命的积极性。党必须对于党外敌人的一切反共产主义的反革命的思想，加以残酷无情的斗争，必须把共产党的政治面貌与政治要求与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政治面貌与政治口号，划分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反革命派别提出的一切武断宣传与欺骗口号，都要及时地揭露其反革命性。要努力肃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及民族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在党内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须要具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一切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哪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斗争。加紧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

向（首先就是对于革命运动形势的估量不足，等待军阀战争而放松拥护红军苏维埃任务，以为军阀战争不爆发什么没有办法，放松群众斗争的发动和领导……等倾向），丝毫不放松反对“左”的立三路线的残余，坚决地反对那些以为“四中全会后立三路线已经不成问题”、“立三路线残余已经肃清，不必虑及”的立三主义掩护者的武断宣传，残酷地打击那些以为“罗章龙右派破产后，右倾机会主义已经不十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士的可耻论调，随时随地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消极、怠工等作决绝的斗争，对于口头拥护国际路线实际反抗和不执行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以及对“左”右机会主义的调和派坚决地开火，尤其要对那些反对自我批评的各种倾向（如以家长制度压制自我批评，用怠工辞职方式反抗检查工作，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等等）作残酷的斗争。因为没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残酷无情的自我批评的武器，那么，所谓加紧两条战线斗争及实行党的工作转变与组织改造等，都变成了一些时髦的空话。只有在锐利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的锋芒之下，才能揭露那些一切离开国际路线的反党倾向的原形，才能转变那些客观上帮助敌人破坏和隔离群众联系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才能将那些消极、失望、腐化、怠工、投机、动摇的异己分子，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下层组织中洗刷出去，将那些阶级意识坚定、工作情绪积极的好的干部——首先是工人贫雇农干部吸引到党的领导及组织中来。同时，坚决地打击那些保持着各种派别观念及对共产国际领导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们的侮蔑造谣的，残酷无情地揭露以瞿秋白、李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曾经有过的“小团体观念”对于党的危害和罪恶，反对任何方式的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倾向的活动，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此外，目前

紧急任务的执行需要提高和发扬每个党的组织与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除却应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外，必须广大地采取革命竞赛的工作方式（不仅组织与组织间应订竞赛合同，个人相互间也当采用）。只有把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尽量发挥和运用出来，才能够加速地完成党的当前紧急任务。

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我们在五个月时期内冲破了；第二次“围剿”，我们在三个月便冲破了；现在敌人正开始着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中央相信，全党在接到中央这次训令后，一定能够立刻动员起来对于过去两次训令所指示过的工作作一严格的检查，根据过去一切胜利和失败的教训，依据这一训令的原则，立刻规定具体的工作计划，以十二万分的革命勇气和热忱来实现党的当前紧急任务。那么，我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完成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的光荣胜利！

（这一训令应与《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地方党部的训令的参考材料》同时讨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指孙殿英、石友三、韩复榘。
〔2〕指阎锡山、冯玉祥。

PDG

毛泽东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以栗同志转边界工作委员会
震林同志转十二军军委：

此次十二军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清流、连城应让第十二军作第二步工作区。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的工作。十二军担任这三县，三十五军担任瑞金一县，三军担任于都会昌二县，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十二军两个月要做三县工作不是容易的。一次战争后，四个月中十二军做了石城一县宁南半县工作，现在宁南是半色区域，石城是全色区域。过去成绩如此，现要两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要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推广到清连二县，并且把十二军主力三十四师摆到二县去，那末十二军工作将又是毫无效果。因此须变更康都决议，把三十四师迅速调返来，使他担任宁化全县，三十五师担任石城全县，三十六师担任长汀全县，军直属队在三县之间。望坚决照此布置。

依大局看来，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四军去宁安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

应如此蠢。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出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军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三军团应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尤溪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给。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赣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是广昌，使之联系建宁与石城。所谓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工作时期暂定两个月，延长下去可到六个月。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十二军在宁化、长汀、石城工作，要力戒二期在石城、最近在建宁工作之失败（石城游击队尽是流氓、富农，通通反了水），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若三县工作再如过去建宁、石城一样，那末军委和三个师委须负严重的责任。

总前委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于建宁

石城信所说三个月工作时间须缩短一个月，因敌进攻紧迫。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夏）

刘 少 奇

一、危机的深入

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之下，中国的危机是更加深入。上海有三个纱厂关门，一个纱厂停止日工，失业者达一万人，又有两个纱厂换三日班。丝厂在年初大部关门，失业者达四万人，现在新丝上市，还有许多关门。上海电汽电话要裁减工人三千人。彩印失业者六百人。江南纸厂裁减工人四分之三。外国轮船公司有很多轮船停航，实行合理化，大大裁减工人，如大东公司以前每船用一百三十人到一百四十人的，现在只用四十六人；渣哗公司以前用七十——八十人的，现在只十五人；昌兴公司每船减少六十人。太平洋航线每船亦减少数十人。海员在上海、香港等工作者，经常在四万人以上，包工头对他们的剥削特别加重。铁路上如北宁路裁工人达八百人，京汉路有裁去工人四分之一的消息。中国资本的矿山大部停工，仅贾旺煤矿恢复一部分工作。太原兵工厂裁工人二千人，各地小棉织厂很多关门。以前停工的烟厂、火柴厂、油厂等还是继续停

---

* 这是刘少奇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

工。失业工人是大大的增加。因银贱影响，贸易低落，出入口减少，商店在全国各城市关门者及缩小范围者极多，店员很多失业。农村经济的破坏还是继续深入。一般物价增长得特别快，房租也大大增加了。同时，革命的危机也在增长起来。广大的农民战争，红军的发展与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的各派虽然在用全力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问题上联合一致，但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不独没有消灭，还是继续加紧，酝酿军阀战争。

二、工人斗争的继续高涨

经济危机的深入，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广大发展，城市工人斗争也是继续高涨的。工人的斗争包括了许多产业部门，有了比较大规模的罢工，在斗争中表现工人阶级的反攻。在上海和北方都爆发了许多罢工运动。在铁路上有北宁路失业工人的斗争，胶济路总厂罢工十二天，反对国民党取消年关休息及路局苛例，沪宁路总厂的怠工，粤汉路总厂工人包围武昌公安局，京汉路工人反对强迫开车及索薪的斗争等。海员在黄色工会领导下每月增加工资六元，有开滦运煤海员的罢工，南洋失业海员要求面包包围华民政务司，大连、香港海员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等。在纺织业中：有天津纱厂一万二千人自发的罢工（仅二日被武装压迫上工），上海有四十余家丝厂约二万女工的罢工要求恢复原有工资（仅三日被压迫上工），上海、青岛、汉口纱厂丝厂还有许多个别的罢工（日华、申新、统一等厂）。此外上海英美烟厂八千工人怠工，邮务工人要求十元房贴的斗争，公共汽车工人的怠工，海关报关职员罢工，人力车夫、马路工人及码头工人的斗争，店员有典业、帽业、酒业的罢工，兵工厂要求年关双薪的斗争，以及上海二十几次的年关斗争等。在天津有自来水工人的怠工（要求加工资，承认工会代表

权及开除工人须工会同意与开除工贼等共十二条），电车工人的要求。北京制油工人的罢工。山东猪鬃、发网及医院女工的罢工。太原兵工厂三千工人捣毁工厂合作社（因合作社强迫工人购物，价比市价高）。唐山矿工的斗争。蚌埠工人和商民总罢工罢市，反对国民党征收米捐及枪杀帆船工人（在商会领导下）。由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各地都是不断的爆发，在工人中普遍的酝酿了极端的不满和斗争的要求。但是这些斗争大部分都是自发的、散漫的，缺乏组织，没有自己阶级的工会来作领导，以致许多斗争都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武装压迫和欺骗手段之下控制起来。还有一些经济斗争是完全在黄色工会领导下进行的（如海员的加薪，天津自来水、电车等）。绝大部分的罢工在国民党的黄色工会的仲裁、调解和交涉、怠工之下解决。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现状及其在斗争中的作用。国民党黄色工会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有内部各种派别，欺骗群众和压迫群众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黄色领袖一致的口号就是“劳资合作”、“服从国民党和政府的指导与法令”、“服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如果不能完全压住群众的时候，他们在某几点不重要的地方表示一些不满意国民党的态度，为的是欺骗群众，用交涉、请愿、调解等等方法来对付工人斗争；再不能压住工人的时候，就用和平怠工的办法来代替工人的罢工。他们对共产党和赤色工会是用直接的逮捕和告密的方法来破坏。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工会是直接压迫工人剥削工人的机关（如汉口、青岛及其他地方的），因此常常引起工人来反对这些工会，捣毁会所，殴打工会职员及征收会费人员，甚至工人起来罢工反对工会（如嘉兴人力车工会）。

在上海还有一些新的黄色工会成立，如出版业工会成立

(包括编辑及印刷工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际联盟劳工局在上海分局局长均到会；发起成立上海纱厂工人联合会，并有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到国民党请求组织工会；其他如轮船、木业、闸北丝厂、瑞康玻璃厂均成立黄色工会。有些黄色工会还组织有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互助社，及武术团、京剧社等。国民党的海员工会本来是空机关，现在因为向各轮船公司交涉加了每月六元工资，拟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人力车夫也呈请国民党组织工会，但国民党均没有批准。上海邮务工会因为反对国民党改组及要求增加房贴，工人对工会的幻想又增加起来。

最近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在群众中还大部保存其固有地位，在工人斗争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

三、国民党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反动工厂法、工会法及改组工会

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工人斗争的高涨，给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消灭红军和苏维埃区域，隔断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联系，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唯一条件。国民党已经派遣三十万大军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发生激烈的战争；同时颁布土地法、工厂法、工会法，召集国民会议等，来缓和群众的不满，并向群众的革命斗争施行有系统的进攻和镇压。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施行的第一步，就是命令“改组”一切的工会，实际上是解散黄色工会，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根据国民党的工会法与改组工会的命令，现存的邮务工会、铁路工会、市政工会以及所有兵工厂、人力车夫等黄色工会，及各地店员工会均需解散，其余一切的工会均重新改组，不许有全国性质的工会组织。上海分成十区组织区联合会，上

海市总工会解散，即最反动的广东总工会也需解散，法西斯的机器工会禁止开会。据国民党的报告，上海有九十二个工会需要改组或解散。以前黄色工会与业主订的条件须经过重新审查，认为不合法者取消。在改组期间禁止一切工人集会、结社及罢工。很明显的这是国民党向工人阶级举行大规模的进攻。

国民党为什么要解散和改组黄色工会？其原因：1. 因为国民党大举进攻红军，城市工人的每一次群众行动都要妨害国民党的后方，国民党以前所能允许的黄色工会的行动，现在对国民党都是有妨害的了。2. 工人斗争的高涨，群众的行动常常不是黄色工会所能范围得住，需要用更进一步的方法来压迫群众。3. 要保证将要召集的国民会议的工人代表完全是政府的忠实走狗，所以对于现在不十分可靠的黄色工会，要予以解散或改组。

因此，国民党施行工厂法、工会法，解散和改组工会的政策，与进攻红军及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是不可分离的。

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在群众中发生了很多的反抗（当然有许多工会依法改组，并且宣传一定要改组成为合法的工会，才能保护工人），单根据反动报纸的消息就有以下的事实：

1. 上海工会为和平苦争工会改组案，拟乘年关大休息，不居罢工之名而行罢工之实。先由邮务发动，次为报界。又十三日邮工大会议决坚持十元房贴要求，否则取最后手段。

2. 上海南货业等店员工会反对与同业公会合并。

3. 国民党因恐酿成邮务工潮，允许邮务工会继续存在。

4. 国民政府为谋店员职工参加同业公会补救办法，修改同业公会法第十条：同业公会代表在每超过十人以上之店铺，得选派店员一人为代表（原法只有店主可为代表），但最多不

得超三人（店东反对这条修改，提议店员代表至多不过二人）。店员要求改善待遇得呈请党政机关调解；以前与店主所订条件，允由党政机关重加审查，予以保护，其有不合法者取消之。

5. 上海药业等三十二个同业公会联名呈请中央，店员除参加同业公会之外，不应再有任何组织，请明令即日解散店员工会。

6. 对于铁路工会国民党颁布了一种“铁路工会分事务所组织简则”。

上海邮务、报界等工会曾发表宣言及告工友书，他们提出“反对改组，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组”、“要求列入特种工会之例”等口号，并有“对现在政治痛苦流涕”之语。同时还有一些工会也发布告工友书，提出“必须依法改组”、“改组后就成为合法工会”、“合法工会才能保护工人”等口号。上海国民党及社会局连日召集各工会代表谈话，许多工会代表赞成改组。又据工人报上的文章，取消派等也提出如黄色工会一样的“反对改组，维持现状”的口号。

赤色工会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及改组工会问题提出什么策略呢？全国总工会有决议宣言，工人报上的文章及各种传单等，并在纪念节的工作及经济斗争的宣传煽动中都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口号。我们的中心口号是：“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自己的工会，为组织工人自己工会而斗争!”全总提议用什么手段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呢？对于这一问题在各种文件中都没有正式的提出而给以回答。在各种文件中有“应当用加工资，加米贴房贴，反对加重工作，反对开除工人，组织工人自己工会等要求，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应当有步骤的来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应当

参加黄色工会的会议，用赤色会员个人的资格来部分的或全部的提出关于这一斗争的纲领。”仅在全总宣言上提到“以怠工罢工包围资本家的行动，力争集会罢工组织工会之自由”的口号。从各方面知道中国同志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不能反对国民党改组工会，为的是怕帮助了黄色工会，更形成我们工作的困难。在赤色工会中这种意见似乎是占了领导地位。在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说出对于国民党解散工会改组工会我们所取的态度。似乎是这样认识：我们只反对国民党及黄色工会来破坏（或者解散）赤色工会；至于国民党去解散或者改组国民党“自己的”黄色工会，我们就无须管他，用不着去反对，因为所解散的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所以在邮务斗争中我们只号召工人坚持十元房贴，打倒黄色工会。还有一种意见：我们只要宣传苏维埃区域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劳动保险、保护童工女工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号召工人推倒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而斗争，至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就用不着提出这些要求向国民党斗争，因为这些要求国民党的统治是不会给工人的，如果提出这些要求只是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上面这些意见在莫斯科的同志中也有赞成的，我们在东方部的讨论中曾经发生过争论。其他改组后的黄色工会，及工厂会议，中国同志决定我们是要参加。但在这里的同志是主张不参加工厂会议。关于这点我还有些动摇，倘若全厂工人都去选举代表，我们不参加，让国民党包办选举一些工头工贼，于工人又有什么好处？还有同志主张赤色工会的积极分子根本不应该参加黄色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但我是主张有条件的参加。

还有几个同志的意见以至我的意见，不能拥护全总规定的策略和立场。

第一，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工厂法、工会法，同时

我们应当提出工人阶级的要求纲领，和国民党对抗，作为群众反攻的口号。在要求纲领上应当规定八小时工作、青工六小时工作、保护女工童工、最低工资标准、失业救济及工厂卫生疾病死亡之抚恤等，工人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工会工厂委员会之代表权。认为这些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群众革命斗争逼迫之下没有部分的实现的可能，一切都要等到国民党统治推倒之后苏维埃政府成立才来实现的主张，这是中国同志很旧的机会主义主张。就是放弃部分斗争的主张。

第二，国民党及其政府来解散工会，改组工会，干涉工会的一切行动，我们无条件的是应该反对的，不管他解散的是赤色工会或者是黄色工会。因为国民党不承认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取消工人阶级的一切自由。认为国民党解散赤色工会我们就反对，解散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这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认为国民党可以解散国民党工会（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命令解散或改组赤色工会或苏维埃区域现存的黄色工会，李立三解散全总，武汉时代的总工会曾以强力改组过一些工会等，都是一贯的），就是根本不了解工会的独立性，认为我们不要帮助黄色工会的群众反对国民党解散他们的工会，我们只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来破坏工人自己的工会，这就是站在运动之外，抛弃与黄色工会群众建立联合战线夺取黄色工会群众的任务，将运动的领导权送给黄色领袖。他们的认识是：要么我们不管黄色工会只为赤色工会而斗争，要么我们就作黄色领袖的尾巴。

第三，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纲领用我们的口号与黄色领袖的口号对立起来，揭破黄色领袖的口号的妥协和叛卖工人阶级的作用，与黄色领袖争取对运动的领导权。应该向工人提议联合所有的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共同反对（实行广泛的下层联合战

线），召集各种会议及代表大会，提议用同盟罢工示威的方法来反对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及解散工会。号召群众起来改组黄色工会，推翻那些出卖工人阶级的黄色领袖的领导。在斗争中联系到工人的经济要求（尤其是被取消的于工人有利的条件），联系到“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如果认为只“用加工资，要米贴的口号去反对工厂法、工会法”，我们不能向群众提议用政治罢工和示威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我们不在“经济斗争中来联系到政治口号，联系到争自由的口号”去反对工厂法、工会法及国民党解散工会，这就是以经济斗争来束缚我们自己，就是抛弃政治斗争，就要落在可耻的黄色领袖的后面。黄色领袖还提出和平罢工反对改组的口号。

此外在全总的文件刊物中还有许多个别的错误，不去说他。

四、赤色工会的现状与工作

全总新委员会开始工作不到二月，已经规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恢复中央的刊物，注意到职工国际决议和路线之传达与研究。组织女工委员会，把自己的工作转向到下层群众工作。在上海恢复了一些企业中的职工小组，建立了四十个以上很小的辅助组织（如俱乐部、姊妹团、饭堂、茶馆等），还领导了很少的日常斗争，并得到胜利。开始了我们的妇女工作并得到了一些成绩。“三八”我们领导一个纱厂停工叫口号，开了三个庆祝会，后来在日本纱厂中领导罢工胜利。开了一些女工会议，在会议上报告苏联女工生活，提出要求纲领及讨论她们的斗争等，上海纱厂丝厂烟厂中有十多个女工辅助组织。出席五次大会的女代表回去发生很好的作用。在天津、满洲、香港还有很少的职工组织，现在正才派人去。海员、矿山也有很少的

组织。全国白色区域的产业工人目前与我们有联系的还只有二千人到三千人。全总还组织了不多的工人到红军中去，对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运动已组织了一个有力的委员会派去。出版了不多的小册子，准备研究黄色工会的工作。

在以上的工作中看来，全总的工作的确是转变到下层的群众工作方面来，抛弃了过去空叫空喊的路线。但这种转变是否足够？在工作中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我们现在根据很少的传单宣言及刊物的研究，可以说出下列几点：

第一，在经济斗争中没有运用下层联合战线。我们在许多经济斗争中，在黄色工会群众起来作经济斗争时，我们的口号总是“组织工人自己的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工人的斗争才能胜利。他们认为在赤色工会还没有建立以前，在黄色工会还没有打倒以前，再没有别的办法使工人的经济要求能够达到胜利。因此总不向工人提议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办法。用这样的口号来掩盖他们对于领导经济斗争的消极，站在群众及黄色工会的经济斗争之外去另外建立工人的赤色工会。比如上海工联准备电汽车工人斗争已经有四星期，工人已被开除一百多人，斗争还没有发动。工联在告工友书上提议下面三个办法：1. 我们要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各车间各班成立赤色工会的小组，这就是准备斗争前必要的先决条件；2. 我们要积极参加工人自卫队和纠察队，保护工人自己的工会；3. 我们在上海工人自己的总工联领导之下，坚决斗争，反对仲裁调解。在其他的许多传单上均没有提出罢工怠工的办法，还提出“大家抱义气”的口号。我们活动四星期的结果，范围只进到三百人（全体二千多人）。工人中就有提议去请国民党来调解，因为工人再不能等了。在青岛铁路工人的罢工中，我们也只说出组织自己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罢工才能胜利。下

层联合战线的策略，在这样的办法之下是被取消的。

第二，把各种纪念节的工作，作为赤色工会的中心工作，纪念节工作的目的就是游行示威。不是把纪念节的工作、游行示威的目的，来服从赤色工会发展和领导经济斗争，提高群众的情绪，建立赤色工会基础，争取群众的主要任务。他们似乎是这样想的：以前号召南京路示威，总罢工是不对的，现在号召分区示威，厂内集会关车，总对了。一切的工作方法通照过去一样。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运动中常常不能使群众更走向我们，反而更离开我们。赤色工会在企业中的组织在纪念节的关车和示威中消灭了削弱了（“三八”纱厂关车被开除数十人，闸北和沪东的失业工人组织因工作方法不好，又弄到工人不敢再来了），群众更畏惧起来。还有在纪念节工作中联系到经济要求，是十分机械的，甚至忽视各纪念节的政治宣传（上海工联“三八”传单全部是经济要求，没有一个关于“三八”的口号）。我们的口号一般的也是如此：用加工资、要米贴、反对开除工人等口号，来纪念“二七”、“三八”、“三次暴动”等。

此外，在文件中还表现有许多具体的错误，表现同志们在各种实际问题中思想的杂乱动摇，没有一贯的清楚的立场。如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还表现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海总反对国民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没有说出一定的策略办法，对失业工人委员会一定要隶属赤色工会之下的主张，在辅助组织中不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各种刊物文件及工作方法之特别抽象不群众化等。此外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全总新委员会发行的职工国际五次大会的决议的译文，错误到一塌糊涂，与在莫斯科的译文有许多不同。原文有二十三条，他们的只有二十一条，自由的加些话上去，又自由的去掉一些话。许多语句简直把原文的意思和路线都改变了。这简直是对职工国际的路

线开玩笑！虽然这译文是以前的，但全总有俄文很好的同志，将这样的译文印成小册子在刊物上发表，发行到群众中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五、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

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主要的如下：

1.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解散工会、改组工会及一切干涉工会的行动，反对取消工人的一切自由。提出工人阶级自己的要求纲领，号召群众用罢工示威来反对国民党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并联系到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国民会议。

2. 反对黄色工会所提出的口号，用赤色工会的口号来代替、揭破黄色领袖的欺骗和叛卖工人阶级的作用，号召群众推翻黄色领袖，选举革命的工人来代替。

3. 为争取对于经济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组织脱离黄色工会而独立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力争由这些委员会来解决罢工，反对黄色工会官僚的谈判、调解和仲裁。

4. 扩大与群众的联系，在每个企业中建立革命职工小组，并扩大这些小组，使他们巩固起来。在企业中建立工厂委员会、工厂代表会，切实来考察和指导这些小组的工作。把工作重心放在企业中。

5. 普遍的建立辅助组织，使辅助组织能帮助赤色工会的发展及基础的建立，帮助工人的经济斗争。注意失业工人运动，使失业工人委员会变成广泛的群众组织。注意女工青工中的工作。

6. 使领导机关的工作群众化，改善刊物，注意分析群众实际生活，回答群众一切所关切的问题。

7. 与实际问题联系来研究职工国际的决议和文件，使这些决议通俗化，传达到群众中去，肃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和立场。

8. 反对右派，暴露他们的罪恶，揭破他们的欺骗，号召在右派影响下的群众回到职工国际路线上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PDG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第一号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帝国主义及他的走狗蒋介石屡次都想扑灭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曾经调动了二十万大军来进攻红军及苏维埃区，可是都为我英勇的红军和广大的革命群众把他杀退了。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阀内部又在紧张的冲突起来，两广自立政府，号召北方冯阎[1]各部起来讨蒋，他们正为着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而来一个狗打架。可是我们工农红军第二次战争伟大的胜利，使反革命十分恐慌，吓得蒋介石亲自出马跑到南昌来，调兵遣将想再来和我们工农作最后的一战，这要算是第三次的革命战争了。这一场恶战，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和帮助下是很快很快的到来。

革命的最后胜利是从劳苦工农不断的斗争中获得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各军必须立刻召集各县区乡村的和全军师团的群众大会，要用十二万分的努力来发动一切劳苦群众和全体红军战士，实际作第三次战争的一切准备，以争取第三次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够保障我们已经获得的第一次、第二次战争的胜利，而开展全国革命新的发展形势与胜利。

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各军，应立刻号召一切革命群众和红军战士迅速的执行如下的工作：

一、各级政府立即召集群众大会，红军各军召集军或师的全体誓师大会，宣传和鼓动群众，积极准备的争取第三次革命

战争的胜利。

二、加紧肃清地方和红军中的 AB 团，并彻底消灭其组织。这一工作须十分加紧，不得有丝毫忽视。

三、各级政府要立即动员群众，把白军从前做的工事完全毁坏荡平，白军遗弃各地枪炮子弹加紧收集，不得秘密私藏起来给 AB 团利用。

四、立刻下戒严令，加紧赤区戒严，特别注意内部 AB 团漏消息及外来小贩做侦探。

五、努力对白军士兵做宣传，改正过去不实际的宣传方式（如插竹片），要切实的使他们动摇，使他们瓦解。

六、对于通敌要路，须把路挖断桥拆毁，有计划的阻止敌人前进。

七、要多派侦探，多来报告白军的消息。

八、立刻进行坚壁清野工作，并运用过去的经验纠正过去许多缺点。

九、按照最近决定，所编各独立师立即编好，加紧训练，并须担任警戒和阻敌工作。

十、各警卫营连、各游击队，须立即整顿训练，执行阻敌扰敌工作。各赤卫队须加紧整顿担架队、运输队交通等，亦须迅速组织起来，以便工作。

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接到此训令后立即按照执行，不得违误。此令

根据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
《苏维埃》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阎锡山。

中共苏区中央局特别紧急通知

——动员准备三次战争的问题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自红军二次战争大胜利之后，革命新的开展给统治阶级以更大的威吓，整个统治阶级都以“讨赤”为共同的政治中心口号。特别是南京政府更动员了一切的力量来拼命的进攻革命，以图最后的挣扎。最近增调军队来江西，对北方军阀让步，对广东取守势，蒋介石亲自到南昌，都无非是要与我红军作又一次的拼命。现在敌军已节节向我移动了！第三次战争就要很快的爆发了！这一次的战争，我们胜利的条件——群众好，红军好，地势好——比二次战争时更加充分。而敌人的弱点——军阀内部的矛盾，兵士与军官的矛盾，群众反对，地势不熟，运输粮食困难等等——比二次战争时更加增大。因此我们争取三次战争的胜利，只要策略运用得正确和工作的努力，是有更大的把握的。现在红军正在准备应战了，各级党部要立刻动员起来，扩大三次战争的宣传鼓动，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加紧三次战争准备的工作：（一）立刻召集群众大会，加紧作三次战争胜利的宣传鼓动，并多贴标语传单（中央局发有争取三次战争胜利的宣传大纲），并有计划的具体的动员群众去实际准备三次战争中的具体的工作。（二）各地的地方武装要迅速加以最大的整顿，帮助新编的独立师立即成立和各地的游击队的整

理。要加强其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要将地方武装中的富农流氓驱除出去，采用迅速方法将队伍中的AB团肃清，要充分运用二次战争的经验，作各种应敌骚敌的准备和警戒。（三）要更加猛烈的进攻AB团，运用党的正确路线，彻底执行肃反工作，务须将AB团及一切反革命的分子从各级党部、政权机关、武装组织中、群众组织中洗刷出去，以巩固赤区，消灭反动在赤区的阴谋。（四）立即实行赤区戒严，特别是边界，更加重要，严密的放哨，检查行人，检查路票，丝毫不能有一点疏忽，严防敌人侦探混入和AB团等反动派逃脱与敌人通消息。（五）赤卫军、交通队、侦探队、运输队等组织必须重新整顿，加强其领导与督促，并要能时常演习，统一指挥，准备能在最短时间动员行动起来。（六）坚壁清野的工作马上要进行，首先是边界各区。在二次战争中，这工作有些地方做得太坏。现在应运用过去经验，补救缺点，实际去做。对于边区的秘密工作准备，过去完全忽视了，敌人一来，一切工作都坍台。在战争中，不能运用秘密工作，领导群众力量与红军配合以消灭敌人，这是应该纠正的。（七）战后的清扫战场工作在二次战争中做得非常不好，以致有许多武器未能很快的收集起来，甚至还有丢弃或落到反动分子手里的。这次应运用二次战争的经验与教训，事前应有很好的准备与组织。每一次战争一结束，在有红军负责打扫的地方，立刻领导群众帮助红军参加这一工作。如红军开到更前线去了，各级政府应该马上领导群众，分区分岭分段有组织的去搜山、去捞河，务须将一切的武器，如大炮、迫击炮、机关枪、长枪、短枪、手榴弹、一切子弹及空子弹壳、有线电、无线电，以及一切不知名的东西（特别对于无线电机及不知名的东西要加意保护），均须收检起来交政府登记，送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次战争的胜利品，

无论如何不要使有一片铁遗落，不要使有一粒子弹落在反动分子手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应事前好好准备。在这次战争中，对于红军的伤病兵，必须发动群众来很好的安慰他们，招待他们，并由各级政府负责很快派担架队送他们到红军医院。

对于白军俘掳兵工作应发动群众沿途向他们作宣传鼓动工作，并要送茶送粥送饭把他们吃，不要存一种厌恶他们的心理。对战场上的死尸，必须很快的掩埋。

同志们！第三次战争又要开火了，这一战争关系中国革命的发展是非常之巨大极其残酷的战争，我们要用布尔塞维克艰苦斗争的精神，运用几次战争的经验，毫不疲倦的加十倍的努力，以争取三次战争伟大的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上）刊印。

PDG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一九三一年七月）

朱　　德

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铁的红军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

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为要达到这一历史任务，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

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的主要的组织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农贫农及中农。它的军事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应该把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出身的放在第一列。乡村中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尤其是城市总工会，应该按期调动自己政治上坚定的分子来充实和扩大红军的队伍。把游击队、赤卫队中有斗争历史的积极分子抽调来当红军，更有必要，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都可以证明。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十四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战斗》第二、三期。

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中国红军产生的前一时期的游击战争，即是共产党在领导。共产党正确地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争取群众的策略，逐渐把游击队转成为红军，逐渐扩大和加强红军的力量，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去消灭军阀混战，扩大苏维埃运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这些伟大的繁难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正确地配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了解全世界革命运动进展的程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定出完全有利于革命的策略，坚决地去执行和完成。

取消派认为土地革命的发展，是农民领导了无产阶级，乡村领导了城市，甚至于说红军是“土匪流氓的乌合之众”，不久便要消灭。取消派根本否认红军是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本否认红军的壮大是在土地革命深入，得到乡村中广大的贫苦群众的拥护以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已经认识清楚红军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形成的伟大的革命武力，我们自己更应该从阶级立场上明确这一点。红军中的军事指挥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训练的实施，必须完全由共产党领导执行。

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在政治委员直接指导下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红军中的党部应在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指导之下进行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给红军的第一号命令中很明显地指出：政治委员是红军中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对于部队中的纪律、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加强等，他和指

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与团的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红色战斗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战斗力与纪律。政治委员对于部队的情状负完全责任，自然对党的组织的情状也要负责。

只有照着上述指示，才能建立红军中坚强的政治委员制，才能使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很正确地实行。同时党必须十分注意政治委员的选择，各级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充当，要尽量提拔和培养最好的工人干部做政治委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成为铁的红军。

三、政治训练的重要。

红军的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了解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了解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完成其一部分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尤其要了解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和前途，全中国及全世界革命日益高涨的现状；深刻地认识整个敌人营垒中经济政治恐慌高度的紧张都有利于中国革命，充分

地相信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可以战胜到了末日的反革命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

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军事技术的提高。

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

技术落后的中国，在战争中逐渐采用进步的技术已有半个世纪以上，采用日本德国的战术也将近半个世纪。固然现在中国军阀所采用的技术和战术，还远不及帝国主义，但因有帝国主义在后面经常地供给和帮助，使中国的战争日益近代化。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中国红军的战术从长时间的游击战争中得到不少新的经验，特别是在南方的山地战中有许多新的收获，并且养成了红军旺盛的攻击精神。但现在革命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预备在全国的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事实上红军在龙州、长沙及长江中部已经多次同帝国主义的大炮飞机接战。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军编制的改变，在组织上加强

了作战的力量。红军新教范的编订，废除一切形式主义，注重野战攻城的实用，就是适应革命开展时期的新的需要，初步预备铁的红军的技术和战术。

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

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红军在与敌人战斗中，不仅有一致的行动，并且有一致的意志；不仅不妨害阶级的和革命的利益，并且要能为阶级的革命的利益而奋斗以至于牺牲。

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

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特殊组织，它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柱石。红军不仅要与国内军阀的军队作战，它还要与武器最进步、组织更完备的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因此红军本身的编制，必须力求进步，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要有统一的训练，集中的指挥。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但在这里，我必须重复说明，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

最后我要说的是，铁的红军的创造，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进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需要来搜集并整理过去红军斗争的经验，切实依照上述的条件，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来完成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朱德选集》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灾荒、秋收斗争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

一、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使全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加速的破产与农村经济的空前的崩溃。全中国近年来所发生的兵灾、匪灾以及一切水灾、旱灾，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中国民众的赠与。今年全国所发生的大水灾，不过是历年来继续不断的灾荒中更为空前的罢了。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民众完全变成了没有饭吃，没有工做，没有地方居住的灾民，整千整万的人现在正等待着饿死与冻死。

二、我们的党认为任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派别以及取消派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灾荒问题。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除了用暴力来屠杀灾民，镇压灾民的斗争外，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灾荒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事实已经证明：推翻了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苏联农民才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从饥饿贫困与奴役之中，得到了最后的解放。只有南方各省的苏维埃政府还能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联合“围剿”之下，竭力给广大的农民群众谋幸福，实行各种保护农民利益与避免灾荒的具体政策。

三、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赈灾机关与赈灾的宣传，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他们的奴隶的欺骗。不但这样，帝国主义的华洋义赈会利用赈灾的名义，把西北的灾民变成它的奴隶，把赈灾机关变成剥削灾民的企业。国民党经常以赈灾名义搜括来的捐款，只充作了各种官僚机关（如像水利局等）的费用，或者直接用来做他们军阀内部的战争。我们的党，对于这种假慈善的欺骗的宣传与行动必须经常给以揭破。

四、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之下，在苏维埃与红军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今年普遍全国的灾荒，一定更会促进农民斗争的发展。任何欺骗的宣传已经不能熄灭灾民的饿火。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斗争一开始，就采取了抢米、分粮与吃大户等的剧烈斗争方法。在有些我们的党曾有相当影响的区域内，那里的农民很迫切的要求我们去领导他们的斗争。这种斗争愈是逼近秋收，将愈益发展。

五、我们的党除宣传我们党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外，在这一日益扩大着的斗争中应提出下列行动的口号：

1. 不还租；2. 不纳税；3. 不还债；4. 要求国家给养灾民；5. 要求分粮；6. 要求减低粮食价格；7. 没收一切屯积粮食，分配给灾民；8. 腾出一切空房，分配给灾民居住；9. 住到大户家去；10. 吃大户去；11. 要求以全部军费移赈灾民；12. 反对压迫灾民；13. 反对军警屠杀灾民；14.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商人奴役灾民；15. 反对军阀强拉灾民；……

六、我们的党必须在上述的许多口号之下，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斗争中把这些口号提高，一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土地、打倒国民党军阀官僚、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基本口号之实行。到处我们应该组织各种灾民自救团、抗租抗粮团、

分粮或抢粮团、吃大户团等，使这些组织变成农民委员会或游击队的组织，一直引导他们到革命。对于已经有的各种自发的灾民的与农民的组织，党必须加入，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要有步骤的，要依据灾民等斗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斗争。必须同左倾幼稚病与右倾的消极，尤其是后者，做坚决的斗争。

七、各省委接到这一决议后，应立刻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布置这一斗争。中央极端反对口头上接受这一决议，而不执行这一决议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表现！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红一方面军关于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

（一）进崇贤之蒋蔡[1]部约三团，其前进哨位置于通高兴方向之大垇（大垇之哨已进到锅都尖山上，在敦丘可以望见），今日上午八时我三十五军与之接触，据报敌有向高兴前进之势。其目的在占兴国。

蒋鼎文、赵观涛到半迳曲洋两处，有进迫于都之势。古龙冈、三寮、青塘、江口、南坑、君埠、良村均无敌，黄陂有赵师之独立旅。龙冈一带之陈诚、罗卓英、韩德勤师于八月一日到富田，龙冈到沙溪一线只有郝[2]师一旅（三团）、唐郭[3]两师残部（约六团）。

东固至崇贤一线有蒋蔡两师（共十团，余在富田、新安、吉安）、李云杰师（六团）、郝师之一旅（三团），共十九团左右，其目的在到兴国。其一部占领东固协助富田之敌对付已到富田附近之红军。

（二）我方面军决心于明（四）日消灭由崇贤进高兴之敌。

（三）明（四）日攻击部署如左：

敌进高兴圩之后，三军由现驻地（新圩）从右翼打去，十二军由现驻地（枫林、库村——在崇贤到长迳口之间）从左翼打去，四军由现驻地（长迳口）打敌之正面。三军团、七军由

现驻地分为两路，一路由小遥岭进至长迳口附近，一路由石陂圩走大小遥岭左边之小路（本日十二军走的路很好走，由石陂圩木桥边分路）到枫林、库村附近。三军团、七军的任务是总预备队，相机增加击敌。

（四）今明两日总部在黄土垇。

附记：

1. 敌不进高兴，我军明日不动。

2. 三军团、七军须于本日夜十时开动，拂晓到达目的地。

总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蔡廷锴。

〔2〕指郝梦龄。

〔3〕指唐奉珍、郭华宗。

PDG

红一方面军关于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

（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

（一）敌之整个布置见蒋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已另录。龙冈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1]部，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达到龙冈。

（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

（三）攻击龙冈部署如左：

三军团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

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

三军在小别。

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

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埠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头坑。

（六）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蔡廷锴。

PDG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给各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各省委：

根据中央军部关于各省军事工作的实际考查，中央对你们有以下的指示。

（一）各省最近军事工作的结果是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计划，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各省委对兵委的指导缺乏，没有将军事工作布置在省委主要议事日程之一。第二，是地方党部还存留着忽视军事工作或者以为军事工作只是军委同志的工作的错误观念。因此经过党的路线和群众路线对军事工作的动员异常不够，甚至有些地方党部还阻碍军事工作的进行，这更是不能容许的错误。第三，是兵委组织的不健全和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因为人的缺乏和能力的较弱，结果兵委负责同志实际上成为接头招待的技术工作人员，而不能按照一定的计划有规律的独立工作，所以一旦在某种特别环境之下，不能与指导机关发生关系时，就使工作要停顿或者散漫下去。关于实际工作的问题，不能具体的解决，其结果遂使省委对军事工作的计划变为空文，在实际工作中表现怠工的状况。

（二）为着要完成军事工作的具体任务，各省委必须立即开始完成下列的任务：

1. 积极的经常的加强军事工作的指导，特别要健全兵委的组织。

2. 改善省委对兵委的日常关系，经常检查兵委工作，加强各地对军事工作的指导，建立兵运的巡视工作去推动地方党部，纠正各级党部对军事工作机会主义的观念。动员全党，经过党团的作用动员群众加紧兵运工作。

（三）依据目前革命形势，我们希望各省在最近两月中，必须以十二万分努力完成下列几个具体任务：

1. 建立和发展现在已有的士兵支部工作，同时还要动员全省的党征调十五个至二十个干部，经过兵委的训练打进各省主要部队中去，建立兵运的巡视工作。要有计划的扩大对士兵的宣传鼓动，士兵周刊要使之真能散发到全省的兵营中去而不只是停留在一处。要迅速加强几个中心地方党部的兵委工作，加强士兵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要积极的注意组织兵暴和自发兵变的领导，同时应以最大的努力注意敌人军队军需、交通、运输的破坏，当地党部更应动员党和群众利用各种关系有计划的进行这些工作。在技术上、经济上，省兵委在中军部帮助之下，要去积极帮助地方党部争取这工作的实现，即是小的兵暴的发动，或敌人交通的破坏一处小的成功，对于扰乱蒋介石后方，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军和苏区，都有莫大的帮助。

2. 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和游击战争的发动，各省委应派专人到几个中心区域去领导帮助，要使当地党部视此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农民群众组织的发展和农民武装的建立，要同省兵委共同决定目前可能实施的工作。要认识农民斗争的发动对于苏区红军的斗争具有莫大的意义。在最近两月中，你们对这一工作要加以十倍的注意。

3. 工人武装的建立异常没有成绩，各省工会的工纠部，

成为空洞的机关，且与省兵委无关系，这不仅因为党目前的基础薄弱，实际上也是你们对于工人武装工作无形的放弃。因此各省委必须加强工会党团对于工纠部的指导，充实工纠部的工作。在最近两月中，必须在党能领导的群众斗争中，丝毫不放弃工人武装的工作，建立起工人武装的基础。在这两月中至少要有真正经常工纠的建立，加强其训练，发展其作用。

4. 在有外兵的省份，必须特别注意外兵工作的建立与加强，批评一切忽视外兵工作的错误，以便切实地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建立我们的力量。

各省委接到此信后，必须即时召集军事工作的专门讨论会议，规定出更具体的实施计划，并应督促兵委和地方党部每半月按期作军事工作执行的报告，随时检查和督促工作。

中　央

八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给四川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四川省委：

中央审查了特生[1]同志关于四川组织报告之后，有以后的指示给你们：

一、四川党在组织上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恢复与创造工人支部。成渝兵工厂、造币厂、印刷、电灯、邮政，重庆的自来水，自贡的盐井，潼川顺庆、嘉庆、合川的丝厂，叙渲渝万的码头苦力这些工人中，七八九三月必须打入进去，派人入厂作工或利用旧有的基础，在每个主要部门建立起三五人以上的支部，加强对这些支部的教育与领导，加紧支部中的群众工作运用，厂内活动去独立领导群众斗争，保证这些支部的巩固发展，在几个主要产业中建立模范支部。

二、检阅自己的工作，发展党内的民主，发展由下而上的自我批评，肃清立三主义下的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提高党员与各级组织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这样去肃清四川党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小团体生活派别成见、地方观念，使党成为集体的组织，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同时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危险。

三、省委要求得领导巩固与深入，必须经常建立巡视工

作，运用活的领导代替公文式的书面指示。省委要挑选三个至五个观念清楚、积极、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巡视员。代表省委去指导与检查各地工作，省常委三人中经常抽出一人到外县巡视。这些巡视员在未出发之先，省委必须规定他们巡视的任务、工作方式、日期等，巡视员出发之后，要保证与省委有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省委巡视员必须作第一期出发，这期巡视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四中全会与中央的决议，开始路线的转变，改造各地党部，建立中心支部与加强兵士运动，实行全川党内各级组织与各部门工作的检阅。

四、现在四川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工人支部与中心农村支部的恢复与创造，减少上层架空的不必要的组织，将力量集中到群众中建立深厚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与群众紧密的联系，了解群众的生活，自主的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消灭脱离群众与尾巴主义的现象。因此，中央提议暂时取消川东南两特委，将特委中的得力分子调任省委巡视员，以及建立中心县委的工作。川东可成立重庆、合川、梁山（将来移万）三个中心县，川南成立自贡、溢、叙三个中心县，邻近中心县的各县，可划归中心县管理。这样去密切省委与各中心区域的关系，加强省委的领导。

五、干部的训练与引进在四川党内是忽视的，经过许多斗争，很少新干部的发现。这是由于反立三路线与反右倾斗争至今没有开展与深入，同时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没有从支部当中去引进干部，所以经过白色恐怖的摧残，干部日益缺乏。四川党只有加紧支部工作，勇敢的引进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首先分配到区委、县委、省委的各部担任部分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特别利用斗争与个别教育的方式，这样去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引进到领导机关，才不是形式主义。

省委应当经常有短期训练班，训练干部去供给各地党部的需要，但是要坚决肃清专门由上委派而不以当地下层组织中引进新干部的遗毒。

六、赤色工农会的清理与创建，反帝同盟、互济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必须引起四川各级党部的注意。这些群众组织，首先要建立起独立的系统与工作，肃清党去包办或与党混合的现象。开始不是要恢复上层架空机关，而是要建立最下层的基本组织，因此党要动员每个支部去发展这些工作。为着群众组织的发展，附属组织应当尽量的建立贫民学校、缝纫班、读书班、剧社球队、踢球队、俱乐部、兄弟姊妹团之类的组织，是帮助赤色工农会发展的工具。但要注意吸引附属组织中的分子加入赤色工农会，使附属组织革命化。群众的武装组织是工人纠察队、农村赤卫队，要同时注意有巩固的发展。

七、四川党从支部到各级指导机关的改造，异常迫切。目前阶级分化的尖锐反映到党内来，使党内隐藏的异己分子——任卓宣、张子和的暗探，豪绅地主与富农分子以至一切失望动摇的分子，必然从党内分化出去。下东特委全部的叛变，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苏爱吾叛变后，引起省委的争论（所谓特殊的叛变）。黄超裳同志的动摇，抛不开个人感情，继续与叛徒苏爱吾发生关系。这一切现象，应当引起四川党的认识，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只有坚决改造党，洗刷党内异己分子，保证党内思想的一致，加强党内教育，现在比任何时期都迫切。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自首叛变的现象，使党健全化。

八、省委机关的庞大，机关工作人员上十个之多，有内交等三分之二，省委本身机关经费浩大，这是不合于地下党的条件。省委应当兼成华工作，常委三人，经常有一人出去巡视。技术机关应当缩小，现时秘书处所谓内交、抄写、保管等工

作，可利用在业同志担任，各部工作更须吸引在业分子参加（如职工可吸引工人支部中的积极分子，宣传可吸引学生支部中的积极分子参加）。省委除开巡视与到外地交通外，至多有五个至七个的专门工作人员。军事工作必须有专人负责，可从四川军事同志中挑选最积极最有经验的分子充当。

中　央

八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向忠发。

PDG

中共中央为扩大灾民斗争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

各级党部：

中央根据最近关于水灾的决议和宣言，认为要使各级党部更能切实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动员广大的灾民群众起来斗争，必须有以下具体的指示：

（一）迅速成立灾民斗争委员会——现在灾区已达十六省之广，灾民即照反动报纸统计至少已有五千万以上，同时目前的形势，水灾是在急速地发展，各级党部若不乘早成立专门的斗争委员会来领导这一斗争，显见将有尾巴主义的危险。此种委员会主要的意义与任务：是在利用群众公开的斗争方式，实现我们党的领导，同时此种委员会既负有专门的责任，更可以集中一切精神注意到各方面斗争的联系，毫无疑义的这种组织在目下是万分必要的。它的组织方法与其他临时斗争委员会相仿，以农村、工厂、水堤或街道为单位。凡有我们的直接关系（如党、团、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所在的地方）或间接关系的地方（如派人，经过我们的组织，经过灾民）都应马上成立。委员会具体的名称可依各种环境而不同（如抢粮团，灾民自救团所推选的委员会），不要机械地称为灾民斗争委员会。委员会的产生，不必一定拘拘于普通形式上的选举，只要灾民

聚集的地方（如灾民逃难处、收容所，抢险和筑堤的时候，打水利局打差船的时候，灾民被军警压迫的时候，灾民抢粮分粮的时候，以及其他种种斗争聚会的时候），即应加紧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告诉他们的真正出路，经过我们组织下的人或个别积极的灾民分子，来发动提出带有最大鼓动性的口号，由此产生灾民斗争委员会。开始甚至于不能包括全体灾民，由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发起推动其他部分。根据“八一”及万宝山惨案的教训，要绝对反对形式主义、等待主义，因为这在实际上，等于取消斗争、放弃斗争。自然，这里要绝对反对一切离开群众、失掉群众的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例如仅由党、团的上层机关指定成立，或地方党部在名义上成立一个架空的委员会就算了事）。至于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与内容，我们认为可依各地的环境，定出具体的分工。在不是直接受到水灾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成立灾民后援会，在这里一方面援助灾民斗争，一方面与水灾的影响作斗争（如米粮加价，借放赈加征的各种税捐等）。最后关于灾民斗争的具体行动，我们认为必须根据中央所提出的具体的部分口号（如分粮吃大户，不纳税，不纳捐，反对军警压迫灾民，反对奴役灾民等），发展为具体直接的行动，与目前正在发展着的红军苏维埃互相呼应。

（二）组织灾民自卫队——目前灾民的斗争在许多地方已经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警察军队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汉口的特别戒严，安徽的抢粮运动，江都灾民焚烧水利局差船时的斗争），同时各地成千累万的灾民避难在啼饥号寒的条件之下，更易促起广大的灾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取直接反抗的形势。另外一方面，灾民的斗争对于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却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在各地

灾民中有积极组织灾民自卫队的必要。此种组织的任务：主要的是在扩大并巩固灾民的斗争，使灾民的力量更能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斗争更能深入尖锐，以至与游击队红军的力量互相应和，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它的组织方法，可由灾民斗争委员会号召群众自愿加入，人数不必一定，即无新式武器，棍棒农具均可，主要的是在它是真正灾民群众的武装力量，它的斗争是与广大灾民斗争配合起来的，而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军事行动。

（三）尽量扩大灾民斗争的宣传鼓动工作——这里我们要提起各级党部注意的：第一，必须揭穿国民党帝国主义关于水灾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天灾”，几十年一循环的自然现象，实际上中国水灾、兵灾、旱灾所以如此之大，年年不断，完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水利不修，农村经济破产，连年军阀混战种种原因所造成。第二，必须揭穿和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关于水灾的一切压迫、欺骗、奴役、剥削的行动（如工赈急赈、善后、赈灾捐、军警压迫灾民、灾区宣布特别戒严、逮捕灾民以及华洋义赈会的种种行动），拿我们党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斗争方法来领导灾民。第三，把扩大灾民斗争的宣传与红军苏维埃的发展联系起来，说明彻底解决灾荒的办法，只有推翻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

（四）灾民斗争与其他斗争的联系——过去许多地方两个极端的错误，不是把某种斗争与一般斗争对立起来，便是看不出某种斗争在一定时间内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认为灾民的斗争已经包括了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许多地方已经爆发为抢粮烧水利局的斗争。这一正在发展着的灾民斗争，恰在全国危机更加深入的基础上与红军苏维埃的胜利、城市的工人斗

争的发展互相错综。无疑的这种形势需要我们的党以最大的努力把它汇合起来，这一点是我们在领导灾民斗争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中　央

八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徐向前、曾中生等关于鄂豫皖苏区红四军情况给中央军委等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

中央军委并转中央：

没有经常给中央报告，致不能经常得到中央的指示，这完全是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在沿江一带大举进攻敌人，以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特此时机向中央作这一详细报告，并派罗××同志前来中央请示一切。

一、红四军的改编经过：

红四军是红一军、红十五军在今年一月间前特委指导下改编而成的，其时正在敌人第一次“包围会剿”的严重时期。改编之后，立即受军事委员会的命，与夏斗寅部六团之众剧战三日夜于麻城之磨角楼，这一恶战虽未将敌人击得逃之夭夭，但是全部包围黄、麻苏区数师之众，均相互观望而成退守形势。至此，过去红一军、十五军不能作持久战的精神为之一变。此次战役之后，红四军立即执行肃清苏区内部反动武装的任务，经十余日之包围与技术的准备，将梗在光、黄苏区的反动中心

---

* 这个报告是曾中生起草的。

市镇——新集攻下，反动首领与武装全部消灭；同时许多农民武装（在反第一次“包围会剿”中建立的）攻下了许多反动寨子，解决了许多反动民团，苏区一时渐臻巩固。这时红四军是准备出京汉线的。先是前特委已于沿京汉线反动区姚老约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的游击战争，这完全是使红军有阵地的到京汉线上去。红四军在新来胜利之下，亦马上加以内部的切实整理，开了全军党的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来建立了党的领导作用，特别纠正了部分干部对立（如大骏[1]企图与笃三[2]对立，继慎企图与继勋对立等）的恶倾向，相当开始改正个人的英雄的领导方式。全军一致提起勇气来执行到京汉线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口号，结果消灭了柳林袁英部之一旅和双桥镇岳维峻部之三团，岳维峻及三团官兵夫几无一逃者。此时红四军的任务，准备一面肃清亲区[3]（商光路线）和保障苏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面准备出发广、蕲做恢复苏区的工作，同时截断长江以配合中央苏区。其时苏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刚要闭幕，红军长江行动并未成行，而敌人的第二次“包围会剿”已从各方面严重起来了。恰恰国焘[4]同志赶到了苏区，除一面取消了红四军到长江行动的意见，同时将红军主力移到皖西苏区，将盘驻独山、麻埠之敌完全击溃。不料吉鸿昌、张印相两部侦察我们黄、麻赤区空虚，乘机而入，我们虽能以原有红军两团并集合农民武装三千以上与之剧战一昼夜于苏区中心之檀木岗，使敌人不能不迅速逃出苏区（连夜开跑），可是苏区之物质经济破坏不少了。未久红四军从皖西东移，经过桃花、泼皮河数次剧战后，敌人是仍然各方采取堵截形势，我们又重新准备进攻了。至此，第二次“包剿”又告一结束。这时候我们主要行动任务是肃清商光路线

的反动武装，同时要准备大举进攻敌人的一切必要工作，这一前提是没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关于兵力的配备却有两种意见，一是全部兵力集中在亲区，限期肃清亲区以便将来红军大举进攻敌人；一是以一部分兵力留在亲区做发动群众工作来肃清亲区，大部兵力要迅速准备向外发展。后一意见是被拒绝了，结果亲区是反动的游击战争，大军云集，已无用武之地，给养更成问题，加之两次"包剿"以来，全军不但没发过一个零用费，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这样全军士气遂呈每况愈下的危险现象，兵士潜逃并日有所闻。这时红军中的负责同志一致向中央分局建议，主张以两团兵力留在亲区，继续工作，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发展，以配合中央苏区。因时紧迫，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决定。不意中央分局军委会指示这一决定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自然，这一行动计划取消了，而执行长留在苏区边境五十余天的游击生活。据当时中央分局的理由，是说红军干部过分估计了军阀战争，故急欲向外进攻，如果那时向外进攻，则敌人再来进攻苏区，苏区必又遭危险。这一解释是不能说服红军干部的。当然红军干部在组织上是采取了绝对服从的态度。其时中央分局开扩大会议，中生、笃三、继慎等去出席这一会议，对军事行动经过多次的讨论，才决定了"在巩固阵地发展上配合中央苏区是最迫切的任务的前提，而以少半数部队（五团兵力）留在苏区巩固阵地，大半数部队向外发展"。这一意见是首先得到了国焘同志赞成的，可是泽民[5]再三坚决反对，最后以多数意见取决，才把这一意

见见诸执行。红军在这一决定下，即不顾一切困难（如没饭吃、没夫子、没新兵、地方工作不能配合等）而坚决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于八月一日打下英山，将陈调元部一团以上的兵力全部消灭，自团长以下官兵夫、县长、县党部无一逃去，缴步枪一千二百余支，机关枪十八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军用品无算。在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是要我们打下英山后出安庆的，我们估计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立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当地群众革命情绪俨如武汉时期），解决红军物质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乃于前日一昼夜而行百二十里之盛暑行军，拂晓即歼灭漕家河敌人王光宗部全旅（两团以上兵力），俘一千六百人以上，河中淹死者约三四百人，缴械一千二百余支，迫击炮十四门，机关枪数挺，王光宗被擒，团长一被俘，一落河淹死。此一战役，我们以两团兵攻敌一旅以上兵力，约一小时半而全部战局告终，且是很复杂的地形，这不但是一件痛快胜利，而且证明红四军最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广、蕲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

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发展而出安庆。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

二、红四军的编制：

红四军目前是编成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师了。十三师留黄麻行动，最近三十九团曾突击过东篁店与王家店（即报载邝匪等……其实邝在亲区，此是三十九团），三十八团在安南行动，亦有胜利，三十七团在光山以北，二十九、三十二两团继勋率领在亲区行动。十二师大部到了英山，小部仍留皖西苏区工作。战斗力以十及十一两师为主力，就山地战言，敌人无论哪种军队都不能以一团对付我们一团。武器每师三千枪以上，短枪、盒子合计在六百以上，迫击炮每师四门，机关枪每团六挺（有多不能携带与使用）。兵士成分大都是贫农、中农。十二师战斗精神甚好，成分尚差，因成立时期较短，十三师成分甚好，大都是分得土地之农民，他是第一次反“包剿”当中由武装而成立之四警卫团改编为十三师的，除三十七团外，其余还不能作较大的剧战。党员在十、十一两师（十二、十三不详）有同志二千四百三十七人，其成分贫农57.7%，中农5.7%，雇农7.5%，手工人17.1%，店员0.6%，贫民2.5%，小商人1.2%，产业工人0.6%，知识分子7.1%，富农1.2%，小地主0.3%；干部成分为产工1.4%，手工业13.4%，贫农36.2%，雇农2%，中农9.8%，知识分子16.6%，小商人4%，贫民5.5%，店员2.8%，富农4%，小地主6%。从此我们对红军成分的改造，特别是干部成分的改造，还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这里除黄麻办有一彭杨学校外（第

一期人数较多，第二期因粮食问题困难只约百人），军部有干部学校，皖西亦办一干部学校，均以训练工农干部为目的，惟因教育人才太缺乏，也可以说是没有，所以成效很少。此外，我们在红军中经常注意干部的训练与干部的提拔，班、连、营、团除有副的主管军政官外，并特别注意班长教育之成排长，排长教育之成连长，以此类推，以补充各级干部，就我们的经验，这是一个最可靠的办法。但作战太多，牺牲太大，老干部所有无多，而红军又日益扩大，干部的改造与补充，的确是最严重的问题了。

三、红四军党与政治工作：

在红四军改编以后，党与政治工作方面确有一些转变，如红军与地方党部对立，红军党、政治工作与军事系统形成对立的错误，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组织系统根本上没有建立等主要危险，都相当改变了。可是当时大骏同志仍然当政治部主任，许多地方还是保持他的工作路线的，如党的下层基础没有，政治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不注意地方工作，不注意地方政权、土地革命及肃反工作，并且根本上养成一些错误，这些的确是到最近才有切实的转变。我们最近对党的工作除加强支部小组经常生活与领导作用外，并建立各级党务委员会的工作、青年团务委员会的工作。教育上也编有经常训练支部的材料，党报“红军”也相当的进步，各级政治部亦都有报纸，连也有壁报，由士兵自办的。支部联席会、支部党员大会、活动分子会，对某一问题的政治动员会，不但能经常举行，而且的确能获得群众的效果。政治工作对内除早晚政治训话，某次行动的政治动员，还有特别对军官干部的政治会议，兵士的识字运动，青年的列宁学校，红军须知

的一般教育，战士委员会自动的政治教育等等；对外做群众工作，特别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工作，武装农民的工作，建立地方党部的工作，建立地方秘密工作基础等等政治宣传。我们的一般的宣言、传单、标语口号、群众会议、小册子的编纂、报纸等外，还有河流[6]等宣传工作，每个兵士（除宣传队外）都可参加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工作，我们曾把群众工作开展连与连、兵与兵的竞赛办法，可惜执行得还少。

四、红四军干部的分配与发展的计划：

最近中央分局军委会对红四军的干部是有些调动，中生调前方来当军政委，原军长继勋调十三师师长（他的弱点是在犹疑，决心时常变的），现以徐向前当军长（黄埔一期学生，在此作了长期红军工作），刘士奇当军政治部主任。刘英当十师师长，康荣生当政委（甚弱，缺乏军队工作经验），关叔应当政治部主任（积极）；周维炯当十一师师长（有点冲劲，但偏重个人感情），余笃三当政委（工作与能力都适宜，并曾承认在过去苏联的错误），曹学楷当政治部主任；许继慎当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北军委会主席，庞永骏当政委，熊受喧当政治部主任。十三师邝继勋当师长，陈奇当政委（由红八军到十五军的，尚积极），甘济时当政治部主任（黄麻一个积极积同志）。这些同志忠实于党是绝对的，当然各人还有各人的弱点，特别是一般的说来，能力都是弱的，但在党的强有力指导下是必然能实现党所给予的任务的。红军发展的计划，我们决计要在这一次行动扩大师成为军，使四军成为四集团军。根据目前的发展言，有了广大群众的基础，每战都缴敌千械以上，只要能动员群众大批来参加红军和干部有了准备，马上成为四集团军是

很容易的。这里除我们已从各方面加紧这一工作的准备外，特别是要请求中央给予极大帮助的，我向中央提出这样一句，就是“中央在加强了中央苏区与红军的指导外，万望不要忘记此地的苏区与红军”。

五、我们的缺点与经验：

第一、政治上领导还是很弱，政治委员的制度最近虽然相当建立了，然在师以下还是不够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是全军无论上下都还有国民党军阀的残余观念，对政治委员（党代表）制度根本缺乏认识。当然政治委员的政治基础不够与成分不好或不军事化的生活，而不能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亦是主要原因之一。政治部的工作系统更是未能强固的建立起来的，一般对政治部甚至上层同志还不深刻了解政治部有党与政权的代表作用，其余技术人员如参谋处、经理处对政治部更是看不到的，其原因当然不外上述两点。我们也正从这两点来转变，但对这一问题的组织观念，的确全党还未建立起来，这不能不请求中央加以严重注意的。

第二、我们的军事人才太缺乏了，中下层干部有的甚至无军事常识，除了英勇条件外，军队中军事训练我们无论如何怎样去推动，然而结果是收不到大的成效。客观原因这尽是一些农民干部（军事训练较之政治训练还要差得甚远），至于特种技术人才、各大炮、迫击炮、机关枪等简直是没有，甚至夺得敌人武器而没有人用，这的确是目前扩大革命战争时期一大严重问题。

第三、我们与群众配合的军事行动还是非常不够的，得到后方工作上的帮助可以说少到极度，前后方的联系也不密切。

最近几次大的胜利，许多胜利品与伤号也不能运回去，得到枪支除武装农民外就不能补充红军，因为来的新兵甚少。这里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则四军不但不会成为四集团军，而且打一仗人又少了几百，其势将要削弱了。这里除了再三要求后方注意外，我们在开创与恢复苏区工作，必然与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密切联系起来。我们估计黄、广、蕲是有办法的。至于对敌军中的工作，最近党与红军都只有标语而无工作。

第四、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完全要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六、我们的要求与请示：

1. 关于要求的问题：（1）请中央把最近数月来对全国党的指示之各种文件和许多翻译的军事书籍、中央苏区红军斗争的经验都搜集供给我们。（2）给我们各方面的详细指导，并以后经常给我们以指导。（3）干部人才要求很大批的补充，我们具体的意见是要军事的政治的最高级指挥员，有高级参谋长材料的人才二（军事委员会要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要一个），师

政治委员要八人以上，军、师、团的军政干部须十人以上，德、英两国同志的军政高级指挥员和专门技术（如大炮、飞机制造）人才各二、三人（来法，罗同志报告），火炮、飞机、机关枪、无线电、有线电、化学人才、兵工厂主持人才、医生各在四人到十人以上，此外政治工作人员能做文字工作人员、做地方党（此地必要一得力书记）的、妇女工作的、青年工作的，都是多多益善，能时时供给我们为好。我们认为这些请求都是中国革命发展来逼着我们的，我们要重复一句“中央不要忘记这一苏区的红军”。

2. 关于请示的问题：（1）红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系统上，我们现在是党务委员会和政治部平列，政治部要受司令部指挥的，政治部对各部处如参谋处、经理处在政治上是领导的，这种办法是否妥当，请指示。这里我们还要问中央：过去发下的政治工作条例是否适用抑或有了变更。在这条例，党是受政治部指导的，现在我们是平列，是否适宜呢？（2）红军工作人员的等级，应发下一个详细表，各种组织系统也请如此办法。（3）中央军委对全国红军的经验教训及敌人进攻的策略计划及许多军事必要的材料，应请中央专门搜集，供给技术拙劣的今日红军。（4）大城市的工人同志应多派些到红军中或红军学校中来，在此工作可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回去可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和带回一些军事经验，大城市工人群众顶好组织参观红军或参加红军的专门组织。最后还请求中央对中央分局的领导还应该设法充实，皖西党、黄广蕲党、京汉线党（信阳一带）、鄂北党都要充实领导，使之容易联成一片的苏区和快要变成苏区的地方很迅速的打成一气，这对大江以北的发展是有无限量意义的。

最后我们还有几点很郑重的报告：第一、红军的干部对四中全会对现在的中央是绝对拥护，因为他已领导我们完全进到国际路线之下，我们只有坚决在四中全会与新中央领导之下，来完成巩固阵地发展，健全红军为铁军的任务。我们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及其残余和调和路线，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借反立三路线来反国际及四中全会反新中央的小组织。他们已做了反革命，他们是站在敌人方面去了。同时我们不要忘反右倾的主要任务，把国际路线当防御来实行。第二、是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这一问题，我们除了密报到中央分局外，还有一件事要报告中央的，就是他说他加入余洒度（黄埔一期学生，第三党的）所主办之黄埔革命同学会，是共产党员袁镜铭、刘庭杰两人介绍，袁、刘二人过去中生在中军工作时曾知道党派过他们工作（刘庭杰到南通工作），可见这些第三党的分子还是夹在党内的，应请中央加以特别的注意。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意义。

中生身体不得了，在军事行动中一面吐血，而工作完全是凭着一点工作情绪，中央能快来人，中生的确有休息的必要。途间不便，只带来两斤金子，请查收（中生的女人能来，请多带药来，如“Palatol Solocson”三那星等）。

敬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军　长　徐向前

政　委　曾中生

军政治部主任　刘士奇

（中生稿）

八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曹大骏。

〔2〕即余笃三。

〔3〕亲区，称“清区”，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山区。

〔4〕即张国焘。

〔5〕即沈泽民。

〔6〕即在小木板、竹片等易飘浮物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涂以桐油，投入河内，流向白区。

PDG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最近提出的土地法令草案，是正确的解决了中国土地革命中的一切问题，并且决定了很多具体的方法。各级党部应当领导地方政府来坚决的实行这个法令。

国际与中共中央明确的指示：中国土地革命是根本消灭地主的封建的剥削。但是土地革命应当是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的利益应当落在贫农中农手中而不让富农去窃取，我们应当实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及教堂、庙宇、祠堂等的一切土地，这样来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地主阶级。在分配土地时，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

中国的富农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所以他们的土地也应当没收，在分配土地时富农可以分得一份较坏的土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富农是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份土地。

被没收的土地应当按照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数量上质量上的平分，就是多少同好坏分匀），来分给农民，因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关系中的封建制度最彻底的办法。平均分配土地应当以人口为标准，因为中国乡村中人口过剩土地缺乏的客观条件，土地革命发展之形式（农民战争的形式）

要求迅速的分配土地，所以以人口为标准来平分土地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坚决拥护的。这样以劳动力为标准或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在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是可以以劳动力为标准来分配土地）。在平均分配土地的一切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匀、好坏分匀。但是分配土地时只有雇农、苦力、乡村中失业工人、贫农、中农绝对有平均分得土地的权利，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得坏田。

这种对富农的办法并不是为得消灭富农，因为民主性的土地革命不能消灭富农的，并且在革命后富农还是要产生的要发展的，只有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革命才可以消灭富农。富农分坏田这种办法是打击富农的政治经济的地位，使富农不能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使中农贫农得到更大的利益。因此现在“消灭富农”、“杀尽富农”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有害的。

这是执行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的正确方法，这是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

在江西、闽西等地的苏维埃区域中，是实行了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但是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是把土地分给乡村中的一切男女，豪绅地主家属和富农等都同贫农中农享受同等的权利，分得数量上、质量上同样的土地。

这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不正确的，是非阶级的。这种原则在事实上没有执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是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因为在分

配土地时地主及其家属仍旧分得土地，并且时常保留其原有土地的一部分，富农的土地没有没收，所分得的土地是与贫农中农同样多同样好，并且时常偷取较好的土地。

这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容易使地主阶级瞒藏土地不拿来分配，是容易使富农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而不能使贫农中农取得土地革命的最大利益。这种原则是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意义，缓和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自然这是阻止了贫苦工农的革命积极性的发展，而使地主子弟、富农等易于混进了政府、军队、党的组织中来进行反革命的工作，组织反革命的团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

现在应当按照国际的指示来转变路线，从"分配土地给乡村中的一切男女"这种非阶级的路线转变到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我们应纠正过去的错误，来执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土地法令。在执行这一阶级路线时，我们要坚决的来反对一种"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闽西已经发生），就是主张"富农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农分好田"。这种倾向似乎使贫农得到最大利益，但在实际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我们与中农的联盟。这是使雇农贫农孤立，使中农跑到富农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去，来反对雇农贫农，这样不但不能使贫农得着革命的最大利益，而是根本断送土地革命，使他走上失败的道路。因此，我们要坚决的反对表面上是右的而实际上是破坏土地革命的"左"倾。我们应当认清：在平均分配土地中，雇农、贫农、中农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而不应有丝毫的差别。

在新发展的赤区内，党应当一开始就要执行最近提出的土地法令。在旧有的赤区为要执行这一路线，首先就要收回地主豪绅及其家属的土地。凡是革命前据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专门

剥削农民的人，不问其据有土地的多少，都是地主阶级的一分子（那些出租一部分土地自己还耕种一部分土地的人，只要出租部分比自己土地多的时候，就应当当着地主看待，他们的土地应当收回）。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及其家产农具都应完全没收，少数参加革命而实际上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子弟的土地也应当收回，坚决的反对所谓"优待革命分子，参加革命的豪绅地主及其子弟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的右倾机会主义。

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和尚、尼姑、道士、阴阳先生等，凡是专以宗教事业来度生者的土地，都须一概收回，至于以农为主、以宗教事业为副的分子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等的土地，在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应许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

商人是不应当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应当收回。但这种办法只限于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商人，至于以农为主、以商为副的则不在比例。

至于流氓，在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时，可以分得土地。那些已经分得土地而自己不耕种，使土地长期荒芜的流氓的土地，在大多数农民赞成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

参加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团体——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的分子，凡属于地主、富农、商人等阶层者皆须没收其全家土地财产，凡受欺骗加入这些活动及这些团体的工农分子的土地不须要没收。至于贫苦工农的分子在反革命团体中充当坚决分子和领袖时，则他们本人的土地应当没收。凡家属在赤区内而本人在白军充当士兵者，只要本人是雇农、中农、贫农者都可以分得土地。贫苦农民在靖卫团充当团丁者只要他们回家，其本人及其家属都可以分得土地。

政府及各机关工作人员，凡过去不是雇农、苦力、贫农、

中农者都不能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仍当收回，再各级政府不应当保留很多的土地不分给农民，政府现在还保留土地的应当立即拿出来分给农民。

红军战士绝对应当分得土地，家中无人耕种者及劳力不够耕种者，政府应组织农民来帮助耕种，过去这一点完全没有做到，各地方党部应当特别担负这个责任，领导政府来纠正过去的错误来领导农民代红军战士家属耕种土地。

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生产工具等应当按照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来分给工人、雇农、贫农、中农（房屋则可以留一部分给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使用）。被没收者根本不能再分得任何土地，也不能据有其原有房屋的一部分，田中的稻禾以及已收获的谷子也都应当没收，一部分要分给农民，一部分归政府以便救济被难的群众。土地被没收的豪绅、地主、和尚、道士等及其家属在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的条件之下，得允许其在赤区内开垦或做苦工，但有反革命行动时则须要以革命法律来处置他们。

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当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但只有在富农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份坏田的条件之下。在执行这个办法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富农与中农的分别，只有在革命前据有较多土地，自己耕种一部分而以一部分出租或放高利贷及经常雇用雇农的人才叫做富农，才能向他们执行上述的办法。应当坚决的反对和防止把对富农的办法应用到中农身上——靠自己劳动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农身上。（至于农忙时临时雇用工人，家中稍有谷余者都是中农而不能归入富农一列）。我们要重复的说，侵犯中农的利益是土地革命中的最危险的倾向。

在执行收回地主土地及重新分配富农的土地时，不一定须要实行普遍的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彻底的地方，尽量的使贫农中农能够保留其原来已分得的土地。而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彻底的地方（如赣东一带）则须要按照土地法令执行彻底的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点要根据贫苦农民的大多数意见来决定。

分配土地最好以乡为单位，并且要尽量的办理移地（即把这一乡的土地划归另一乡分配）移民的事业，但必须取得广大群众的赞同，绝不能以命令来执行。

重复的说：土地的买卖与出租，现在仍旧不禁，但严禁富农的投机与地主买回土地，但是土地国有的口号应当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在执行土地革命路线转变，我们必须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领导作用来使贫苦农民自觉的拥护党的路线，而来反对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来反对富农。我们应当坚决的反对用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来执行上述的一切办法。再各级党部应当把土地革命中的路线转变与苏维埃政府和党与团的改造联系起来，进一步把豪绅地主子弟和富农从革命队伍中洗刷出去。

党应当用全部力量来领导土地革命中的这个转变，要坚决的反对现在最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对阶级路线执行的怠工，对地主豪绅和富农的让步与妥协，同时不能丝毫放松反对侵犯中农的利益，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斗争。我们相信，党在坚决的领导执行这种阶级路线的过程中，能使贫苦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发扬起来，能够使党、苏维埃政府一切革命群众团体巩固起来，一直达到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附）军队中及地方上各级委员会和支部在接到这个决议

后，一定要详细讨论，并规定具体计划来执行这个决议。此外，还须把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法令一同来讨论，一同来执行。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

八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党在四中全会后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与实行全部工作伟大转变的过程中，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的缺乏，形成干部恐慌的现象，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

干部恐慌现象形成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党在过去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恶果与四中全会后革命高潮新的进展，工作的加紧，敌人不断的摧残，迫切的需要大批干部去巩固各级党部和恢复已被破坏的组织，如先后不断的建立或加强各省委的领导与中心城市的组织，巩固或改造各个苏区党的委员会，建立中央局及各分局，建立红军政治委员制度和加强政治部工作，加强军事领导，恢复各种群众组织及其党团工作，帮助青年团独立组织的恢复，建立巡视制度和代表制度等，在在都需要干部。另方面：由于党在过去根本没有真正注意干部问题，一般支部生活的不健全，各级党部对于干部问题的忽视，以及用盲动主义的方法断送许多干部；由于反动统治更加凶残的摧残和逮捕，勾结取消派、右派叛徒、社会民主党、AB 团，从党内党外来破坏我们，以及党内一般的忽视秘密工作，缺乏对于动摇消极分子的警戒心，使得中央至各级党部先后不断的遭受或轻或重的破坏；由于一部分立三主义者、右派、两面派的

消极、灰心、恐慌、怠工，不能克服一切困难作艰苦的工作，甚至由动摇而走到公开的叛变；由于各级党部至今还是没有充分的了解干部问题的重要，和如何去提拔与训练干部，没有战胜一切困难去进行流动训练、训练班、列宁读书班及个别教育等训练的工作，这样，使得干部异常缺乏。

这一干部恐慌的严重问题，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可以用“简便”的方法，如取消工会青年团及一切群众组织，把这些干部拿来充实这一个所谓“行委”的组织系统来解决，在今日则需要党用艰苦的工作和斗争来解决。

（二）中国党在历史上由陈独秀机会主义到立三路线时代，从来没有真正的注意干部问题，而且对于干部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上认识上以及工作方式上都是极端模糊与错误的，其结果，正可以说明今日工人干部如此缺乏的原因。这种错误主要的表现在：

（1）不懂得干部是什么？不了解干部是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实现党的决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夺取群众团结于党的周围，巩固党的全部工作的中心主力。干部要建立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要在广大的劳苦群众中去求得。要在群众日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干部才能真正组织群众、宣传群众、领导群众斗争，而成为先锋队的先锋队。

（2）始终留恋旧干部，害怕引进新干部，不了解扩大新的积极的干部的重要与意义。以为只有在党内做过长期领导工作的同志才算是干部，不相信新干部的工作能力，不允许青年党员作积极的党的工作，所以干部始终停留在旧的基础上与狭隘的范围内，这是对于干部问题标本式的右倾机会主义。

（3）党内的家长制度与委派主义妨碍提拔下层干部，以至消灭和破坏下层干部，过去往往一批一批的派遣那些与生产无

关系与群众无联系的学生分子到各级党的、工会的、少共的组织中去，建立一些空架的不做工作的官僚机关，积久成习，养成上级包办下级、下级依赖上级的恶劣观念。

（4）对于铁的纪律的了解与执行，表现两个极端错误的观念。第一极端便是家长式的滥用纪律，根本放弃说服与教育工作；第二极端便是废弛和轻视纪律，对于那些腐化怠工的阶级异己的不可救药的分子抱着姑息态度，在所谓“民主”与“反对惩办主义”的口号下实行自由浪漫主义，走到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组织原则。

（5）不懂得正确的运用组织上的分工，不会科学化合理化的利用干部，或者机械的分工，不了解各部分工作机体的关系，或者不按照每个干部的能力、经验、兴趣、环境而适当的分工，减少了工作的成效，或根本不愿意做教育训练工作，而幻想万全的万能的干部。

（6）干部的提拔与引进，不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系统，从政治上斗争中工作表现上去选择，分配工作无所谓原则与标准，而是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往往许多来历不明的分子，可以由一个负责同志的“保荐”甚至不经任何手续，而随便拉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

（7）提拔新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把它看为铺张门面的形式主义，不经过基本的教育训练，不经过个别简单工作的锻炼，一开始便马上拉到领导机关负重要的指导责任，结果不能胜任他的工作，造成“秘书长专政”的现象。

（8）支部生活和党内生活一般的不健全，一般的忽视党内教育工作，没有从政治上组织上在日常斗争与实际工作中去教育干部，没有注意在工作过程中对于新干部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使机关中的干部尽可能有接近群众的机会，没有经常的检阅

工作，养成每个干部工作的自动性与个别负责制，结果不是实际脱离了理论，便是理论脱离了实际。

（9）各级党部依赖上级的观念，使他们根本放弃自己训练干部的工作，不去战胜一切困难来进行各种各式的训练班、列宁读书组、研究委员会、个别谈话等教育工作，特别是苏区的党部没有很好的利用公开的便利经常举办大规模的党校、军事训练班等造成干部的工作，各群众组织中的党团亦没有注意自己训练干部的工作而完全依赖党。

（三）目前革命高潮进一步的向前发展，更明显地反映着现时干部问题的严重性，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因为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没有真正能工作的干部，一切计划和决定，将成为纸上空谈。我们要能使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的真实执行与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以准备群众动员群众去进行当前革命的决战，便必须凭借与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思想上组织上坚固的积极干部。因此，加紧培养和巩固领导的积极干部在国际和四中全会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这些干部于各级党部的周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成为目前组织上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之一。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全部工作，需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积极干部。要实行这一任务，便必需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来战胜一切困难，纠正过去一切错误，反对忽视干部问题，不注意提拔与教育干部的工作，与下层党部对于干部问题不负责的态度，反对破坏和阻碍提拔新干部的任何企图，反对委派制度、形式主义、依赖观念及一切不正确的见解。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对那种留恋旧干部，害怕引进新干部，以及对干部困难情形投降叹气，不从积极方面想办法求得解决的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的在

最近期内将国际再三反复着说的关于党的指导成分的无产阶级化的指示实现到实际中去。

为要实现上述的中心任务，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列具体办法。

（1）从最近每一个斗争中——罢工、示威、游击、作战，经常地注意那些积极勇敢的新党员，把他们吸收到各级党部所成立的各种研究委员会、各种工作部门中去。首先和他们作个别谈话，然后给以个别的工作，要他经过下级党部及群众团体中去执行，注意他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和缺点，扼要的给以指示与纠正，再依次给以某种较复杂繁重的工作，反复的去教育锻炼以后，才更进一步的吸引他们到指导机关中去作负责的工作。

（2）在日常工作中加紧锻炼教育干部。各级党部各部各委的领导同志必须负责的提倡与切实的进行，建立各种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学习会议，最广泛地进行个别教育的工作，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每个干部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学习，在研究学习中紧张日常工作，彻底纠正那些脱离实际的专门学院式的研究，或者完全放弃学习的事务主义。这样，才能一方面推动工作的发展，另方面加强干部的工作能力。

（3）必须在最近对各部门的干部举行一个总检阅，考查他们的社会成分及经历、工作能力及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表现，合理化科学化的运用组织上的分工来重新分配工作。在检阅中要切实执行缩小上层机关，最高限度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那些浪漫、腐化、消沉、敷衍、怠工、雇佣劳动化的表现，必须加以严格地审察和肃清。对于干部中的不正确倾向必须作不调和斗争，使现有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

（4）各省委与地方党部必须战胜一切困难，有计划的去进行各种训练班的工作，按期的挑选一部分下层积极分子去受训练。每期学生不必很多，须按照实际环境可能程度而决定。训练材料与方法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上级党部应尽可能供给下级党部以训练人员材料，予以实际的帮助和指示。

（5）流动训练班或临时小组讨论会亦须经常的去进行，各地方党部与中心支部更要随时注意这个工作。每次只要有三五人，时间三四天或一星期均可，地方也不必租一定的房子，可以利用适当的地方。中央与省委便可以利用下级党部来接洽工作时，随时组成小组给以训练。这类流动训练在任何严重条件下都要不断的进行。

（6）中央训练班必须按期的经常进行。根据过去经验重新定出计划，改善教育方法及训练材料，保障教员按期上课。此外军事、妇女及带有特殊性的工作，亦须尽可能定出计划举办训练班，去造就带有专门性的人才。

（7）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才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苏区干部的自给，并能派送干部到苏区周围的主要城市、农村以及白军中去工作。要把这一工作看成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这是在组织上从党的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中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及富农豪绅领导最具体的办法。

（8）青年团、赤色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党团，必须加紧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对于改善团的支部生活、赤色工会生活以及举办有系统的训练班的工作，必须迅速地去进行。团的中央、全国总工会、互济会必须对干部问题定出具体的办法，并给下级组织以具体的指示。各省委及地方党部，必须尽可能

帮助当地团的工会的组织去解决干部问题。

(9) 干部的提拔与调动须严格的经过组织。分配工作须按照一定的标准，首先就是要按照社会成分及政治的坚定性，反对个人感情的无原则无标准的调动。不得上级组织的许可，绝对禁止把干部往上级送。要很合理的去利用干部，考察他的长处，纠正他的缺点，反对不做坚苦教育工作，而幻想“万能万全”的干部。干部的工作须尽可能的继续较长的时间，尽可能的保存固定性。

(10) 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才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才，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才的供给。

(11) 根据现在的情形，党的个别组织与个别同志任何时候都有暂时与上级党部断绝关系和脱离组织的可能，所以干部工作的自动性是万分必要的。每个干部遇到这种情形时，必须仍在该地继续进行工作，或其他地方创立工作，如打入生产中，到白军中去，一到取得党的联络时，必须报告在这个时期内的工作经过及成绩。要坚决反对一切借口脱离组织，放弃工作的现象。

(12) 废除委派制度，把过去“面向上级”转变为“面向下层”。各地党部委员会的成分主要的应该在当地党的组织中拉起来，打破专门倚赖上级的观念。

(13) 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加紧，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保护干部”，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反对拼命主义，注意干部的环境而调换工作的区域或工作性质。注意工作人员职业

化、社会化，把机关建立到群众中去，严格地执行秘密工作。

（14）正确地执行布尔塞维克的铁的纪律，消灭对铁的纪律两个极端错误的观念（如滥用纪律或废弛纪律）。要严格的制裁干部中许多不许可的现象，如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要求一定的地域，不作技术工作，害怕白色恐怖，向困难投降，留恋旧的工作方式，用种种借口退避工作，雇佣劳动化，不紧张工作，没有工作自动性，不认真不切实的敷衍、怠工，生活浪漫腐化，经济观念不清楚，和浪费，不守纪律，不虚心学习，不注意秘密工作等表现，以及种种两面派的行为，隔岸观火的态度。必须毫不姑息的执行铁的纪律，使这些分子不能有一刻钟逍遥自在的混在领导机关中。

（15）中央及各级巡视员应该把干部问题看成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巡视制度应该是发现下层干部、提拔下层干部的最好方式之一。巡视员应该对干部作广泛的个别教育工作，帮助建设党内生活，提高干部政治水平线，帮助当地党部计划与进行训练班、列宁读书组的工作，规定训练的材料和方法。根据中央决定，坚决的纠正当地党部对于干部问题各种不正确的观念，给以正确的指示。

（16）各地党部接得这个决议后，必须加以切实的讨论，定出具体的计划，并按时报告中央对于这个决议执行的成绩。

中　央

八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分局的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

你们送来的许多文件，因为洗的不好，脱落的地方很多，没有法子看清楚。同时水灾关系使我们没有法子用电报回答你们所发出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不能不写信给你们。

一、对于苏区的灾荒问题，我们认为湘鄂西的党应尽量的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指出这不是天灾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的赐予。尤其国民党掘堤水攻苏区的事实可以利用来做很大的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宣传。党应该尽量组织灾民，给他们以相当的训练要他们向非苏区去做发动灾民的斗争。现在武汉差不多有五十万以上的灾民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一切我们去号召与煽动，必然会引起很大的骚动与斗争。这对于拥护苏区红军对扰乱敌人后方有很大意义。党应从积极方面去做灾民斗争，而不是简单的等待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

二、湘鄂西的党在目前这种困难状态之下，应积极动员群众准备向敌人的弱点进攻而消灭其一部分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必须坚决的相信，并且必须广大的工农群众相信，只有积极的发动苏区的群众向非苏区发展，我们才能在困难中找到新的出路。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在目前形势之下决不会放松的。必须彻底了解反革命向苏区与红军进攻是目前革命形势的

主要特点，不要梦想军阀内部的矛盾会减轻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必须打破和平共居的幻想，从政治方面与军事方面积极准备革命的战斗。

在最近江西方面，我们的军队开始反攻，我们已经获得了不少的胜利，鄂豫皖的红军近来在鄂东也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岐水、黄梅、广济等又在我们的手中。孔荷宠的军队逼近阳新、大冶，与邝继勋的军队有会合的趋势。全国革命运动是在向前发展，北方兵变近来又不断发生，农民运动、城市工人斗争差不多每天都有，经济恐慌、财政恐慌是在继续加深。全国现在是空前的灾荒，灾民已达全中国人口四分之一，北方南方反蒋[1]的斗争正在向前开展。……一切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敌人现在是处在非常困难时期，虽然这种困难只会推动他们在疯狂般的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中找求出路。四川军阀内战现在又开始了。你们应该利用敌人一切这些弱点向敌人进攻。

三、关于贫农要求没收富农一切生产工具与粮食和平均分配一切中农的粮食问题。我们认为如若真是广大贫农的要求，那末在现在这种特殊件之下，即水灾与粮食恐慌的条件之下，没收富农的粮食与生产工具是可以容许的。但是这只有在不妨碍同中农联合的条件之下来进行才可。党应当反对任何妨害贫农与中农联合的任何极左的行动。坚决反对平均分配中农一切粮食的口号。但党可以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中农自愿的把他们的剩余粮食捐给或借给苏维埃政府。这些粮食最初要拿来给养红军，再及其他贫苦的农民。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四、从二军团方面近来不知有什么消息吗？最近报载有襄阳、樊城一带被红军占据的消息，不知道红军是否是二军团。关于二军团的行止问题，现在当然不简单的要他回洪湖问题。在目前的

状况之下，二军团回了洪湖，给养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我们需要先纠正二军团的错误路线，他在鄂北适当的地点（如襄阳、樊城等县）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并和湘鄂西与鄂豫皖苏区发生密切的关系。关于二军团的政治委员，中央现在正在物色中，×××同志不久可到。对于湘鄂西边特，中央分局应加紧政治指导，尽力于最短期间把这一区域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

五、中央批准中央分局的一切工作布置，并认为在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的工作上，湘鄂西的党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绩。现在所需要的，是把这一工作继续的加紧和发展斗争，以准备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六、最后，中央自老头子被捕之后，接着有立三主义，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等的叛变，在工作上受到相当的损失。现在各种工作又已恢复原状，照常进行。最近中央力求各种组织工作的检阅与自我批评的发展，在这中间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巡视员已能经常出发，遭到大破坏的各省工作也在逐渐恢复。现在我们竭力注意于下层党的工作的建立，而不去建设空洞的上层机关便利于敌人的破坏。总之，中央工作决不因敌人的进攻而停顿，却正相反，中央将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之下开展它的工作，加紧它对于全党的领导。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　央
八月三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PDG

中共中央关于江苏省委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中央检阅了江苏省委最近的工作之后，认为：

省委近来的工作是有相当进步的。这主要的表现在：（一）在思想上与组织上打破了右派小组织，使参加小组织的工人分子的最大部分都回到党内，参加党的实际工作，同时对于“左”的立三主义的残余也做了很多的斗争，巩固了江苏党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二）党的组织的发展，党员与支部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改善；（三）在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以及白军士兵中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转变；（四）建立了巡视制度，使省委更能了解县委的工作，加紧了省委对于县委的领导；（五）省委本身更能依照计划而工作，并且开始能检阅自己的工作；（六）相当的发展了自我批评，提起了下层工作同志的积极性。一切这些都证明出省委是执行着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与中央的一切指示。

但是省委在工作上还表示出了许多错误与弱点。这主要的表现在：（一）省委个别负责同志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二）有时对于党动员群众力量过高，以至夸大了自己的力量，犯了个别“左”的以至急性病的错误，有时则估计太低，不能充分的利用所有力量领导群众斗争；（三）立

三主义的工作方式还没有完全肃清，很多地方还不能利用新的工作方法来执行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四）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非常薄弱，以致不能领导大多数工人自发的斗争，由党发动起来的斗争更是稀少；（五）党对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对反帝斗争与反白色恐怖的斗争的领导非常不够；（六）党还没有在黄色工会中开始工作；（七）省委区委与支部内各部工作如组织部、宣传部等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八）两条战线的斗争，还没有具体化与深入党员群众；（九）党内和平发展的倾向；（十）反对改组派、第三党、人权派、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的工作非常不充分。（十一）对于团的领导的不够。

根据这许多情形以及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央给省委指出下列中心任务：

一，必须加紧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这一工作在目前是中心工作中的中心。一切工厂、农村、兵营中的斗争，都要能够使他们转变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斗争。要使我们的同志以及群众更深一层的对于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的了解上去做这一工作，而不简单的等待他们胜利的消息。

二，必须加紧厂内活动。虽是我们党在厂内也有些支部的组织，然而这些支部还不能领导厂内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实现群众中心的核心作用，甚至脱离群众。至于有些没有我们支部的企业，尤其是一些重工业，我们的影响更是没有。党必须最坚决的用全部力量巩固这些支部，创造新的支部，尤其是在重工业与市政工业中，加强支部在厂内的影响与领导作用，这样才能领导目前开展着的工人运动。对于工联的领导必须加紧。

三，必须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中央虽是曾经屡次要省委注意这一工作，尤其在目前黄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增加的时候。省委对于这一工作，虽曾经也有屡次的讨论，然而

这一工作始终没有切实去做。省委必须立刻具体的去讨论这一工作的进行。

四，必须加强反帝运动的领导。反帝斗争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帜之一。然而我们的党还没有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与各种方法去发展与领导这些斗争。万宝山惨案，因为我们党的消极，现在无形中消沉下去了。必须最坚决的同反帝工作的忽视与消极做斗争。上海反帝同盟必须立刻改组，开展群众工作。

五，必须加紧对于灾民斗争的领导。水灾在江苏现在也变成了严重的现象。省委除通过关于这一斗争的决议外，必须立刻定出领导这一斗争的具体办法，有计划的分配同志到灾区去，尤其是江北一带，去发展与组织这一斗争。必须把这一斗争同工人斗争、农民斗争以及游击队的斗争等紧密的联系起来。

六，加紧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武断宣传。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工作，江苏的党差不多没有加以注意，加以全国互济会机会主义的领导，把互济会变成了红十字会，以致对于反对白色恐怖的群众工作也完全忽视。省委必须坚决的同这种忽视与错误斗争，使反对白色恐怖的斗争与一切群众斗争联系起来，同时必须密切省委与互济会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武断宣传必须经常的揭破。

七，必须加紧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在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这种发展是在和平状态中进行的。我们还没有能够充分的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的组织，吸收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党的战斗力量还是非常软弱。同时我们党的发展的速度，还远在革命发展的速度之后。江苏的党以后必须同这种和平发展的倾向做坚决的斗

争。并且应该利用几次大的政治事变或大的纪念节做征收党员的运动（如红军第三次的大胜利，与十月革命纪念节）。

八，必须经常的检阅工作与发展自我批评。虽是省委最近已经开始检阅了省委本身的工作，但这还是不够的。省委必须经常的检阅各级党部的工作，尤其是区委的工作。对于各种群众组织尤其是工联的工作，必须定期的检阅。在检阅中必须尽量发展自我批评与下层工作同志的积极性，来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但省委必须最坚决的打击一切派别的斗争与个人的无原则的纠纷，尤其要防备那些利用党的工作的缺点或个别错误，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或一切混在党内的异己的分子。

九，必须加紧反对改组派、人权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等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些拿对于国民党取在野态度，以攻击共产党为中心工作，欺骗工农的派别的斗争，是非常不充分或者完全没有，以致这些派别还能影响一部分群众。党必须经常揭破这些派别的欺骗作用，利用下层统一战线，把他们的群众夺取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十，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失望，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以及“左”的闭门主义以及立三主义时代的工作方式，在江苏党内还是非常严重的现象。省委必须利用每一次斗争中以及每一个同志所犯的错误，来加紧这种斗争，使这种斗争更其具体化，更其深入。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消灭各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与消极，才能创造出各种新的工作方法来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

十一，加紧对于团省委的领导。党省委同团省委的关系，过去是不好的，近来虽比较好些，而且对于团内发现的一些消极、不动、清谈等倾向做了一些斗争，然而对于他的领导显然是不够的，以致不能很早的指出团省委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

义，而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党省委以后对于团的工作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使团的组织真能深入青年工人群众，使团真能开始发动并领导青年工人的斗争，并能提拔一部分青年工人干部供给党。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

万宝山与朝鲜之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的屠杀中国民众了！

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半年以来从万宝山、朝鲜一直杀到青岛，现在又杀到奉天、安东、营口，中国劳苦民众被牺牲已经累万盈千，过去"五卅"、济南惨案等更擢发难数，现在他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

帝国主义强盗看得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十九期。

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

同时帝国主义强盗也非常明白：现在世界革命积极发展，中国工农革命日益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又英勇的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第三次的"围剿"，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浪潮尤其在万案韩案之后已经大大汹涌起来。这一革命浪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被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最后，现在正是各国帝国主义内部互相矛盾冲突，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更剧烈发展的时候，它们这种冲突和危机必然引导它们到第二次公开的厮杀，尤其是太平洋日美冲突的风云甚嚣尘上，中国便是它们这冲突火并不能放过的战场。它们一方面指使各自的军阀实行火并，另一方面有机可乘便直接出兵中国，以扩张它们在华的统治利益。这种事件不一而足，过去英

日屡次进兵中国，最近美国帝国主义也正高唱用十万大军进占中国。这次日本强占东三省，显然是捷足先登，准备大规模的屠杀以牺牲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们！

正当受着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工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镖，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

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拥护苏区与红军！

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

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

中国工农兵苏维埃斗争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

江西工农红军主力在一个多月英勇的战斗中，击溃了国民党十一个师以上的兵士，消灭了五个师以上的步队，使国民党左中右三路全线溃退，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计划完全失败，使蒋介石不能不从前线逃回南京，宣告“剿匪军事已告一段落”。此外，鄂豫皖苏区除巩固原有阵地外，更占领了广济、蕲水、英山等县，击败与消灭了敌人进攻的步队。湘鄂西苏区除巩固原有苏区外，更占领了潜江、天门等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工农红军的这些伟大胜利中，无疑的开展了更广大的发展前途。这些胜利更充分的证明出中央关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训令的估计与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最近对于中国的决议的完全正确，同时也就又一次地给予那些对

* 这是中共中央的决议案，原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六期。

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于工农红军造谣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罗章龙右派、邓演达第三党等，以及党内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那些立三主义残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我们工农红军所以能够战胜兵士数量上比我们超过数倍、军事技术上比我们高明得多的国民党军队，当然不只是由于我们为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而战的工农红军将士的伟大的革命热情与勇敢善战，而且也由于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这一次我们的伟大胜利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只有彻底实行国际与中央所指出的正确路线，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与红军，以及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我们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地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但是对于苏区数十万红军与游击队以及千百万掌握着苏维埃政权的工农群众，却是一帖最有力量的兴奋剂，使他们更其相信自己的力量，振起他们战斗的决心与勇气。对于千万万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饥饿着死亡着奋斗着的工人农民与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却是一盏指示出路的明灯，使他们更加易于跑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自求解放，更加唤醒他们对于苏区工农红军的拥护与创造新的工农红军苏维埃的热忱与勇气。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方面使中国的农村经济急速破产，另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力无从发展，以至造成了长期的经济恐慌与不断的灾荒。今年泛滥全中国的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这一四十年来所未有的大水灾，一方面更深刻的表现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将更进一步的使这一危机益陷于全部崩溃的境地。

全中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等待着饿死、冻死与病死的灾民，现在已达一万万人，即占全中国人口四分之一。国民党虽是用了种种“赈灾”名义，又从民众身上搜括了不少金钱，但这些金钱大都为国民党的军阀官僚所中饱。国民党在广大的灾民群众面前，完全表示了无办法与张惶失措的情绪，使他们不能不疯狂般用戒严、监禁、屠杀等方法去对付这千百万无告的灾民群众。

这一部分的广大灾民群众现在已经逐渐明了：国民党不但不能救济他们，而且只能剥削他们，压迫他们与屠杀他们。他们现在也开始知道用自己的力量来救济他们自己了。示威游行，抢米、分粮，杀土豪、地主以及反对国民党官吏，同国民党军警的冲突的斗争，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开展出去。实行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正在蜂起云涌般的推向前来。他们在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之下，将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了解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创造苏维埃与红军，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无疑的，这一千百万灾民的斗争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致命的打击。

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以至在几个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使帝国主义对于苏联，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对于一切革命运动的进攻，更其加紧了。同时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正在日益增长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间的错综关系，就是这一分析的最好的具体例子。而日本帝国主义却更露骨地明目张胆地表明了他一切的愿望，用武力占据了他所需要的东三省，要把东三省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

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同时，这一事件，必然将更其加紧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与对于苏联的进攻，并且使帝国主义内部（尤其是英、日、美）的矛盾更其增加。这一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

但是伴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加紧侵掠而来的，是中国民众反帝潮流的高涨，尤其在日本占据东三省之后。东三省的占据，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当然，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所以如此迅速，不单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也是由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与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下流无耻的行为所造成的。国民党"反帝"的欺骗的武断宣传不断破产，使全中国的民众觉悟到，只有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的民众在实际斗争中，现在已经很快的了解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要打倒国民党，而且实际的经验将告诉他们，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同帝国主义做彻底的斗争。

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它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藩篱与城堡。

在红军胜利、灾民斗争与反帝斗争开展的背景上，我们当然也明显的看到工人斗争的发展。这斗争的反攻性质已经带有很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并且它开始从自发的散漫的汇合成为更自觉的更有组织的更伟大的斗争了。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同盟罢工的形势已经日益成熟。农民斗争随着灾荒而更其发展。兵士的动摇也日益加深。兵变的潮流现在已经普及于全国。在华北，革命的士兵第一次公开的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了。中间阶级的动摇与他对

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也日益增加。一切这些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四、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因为经济危机的加深，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不断斗争，因为财政的破产，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但是促进国民党的崩溃使国民党走向灭亡道路上去的主要动力，自然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正在更剧烈的更广大的向前开展着。

无疑的，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的扩大与深入，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不能调和的矛盾，以至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及中国各派军阀政客间在目前还正在加速尖锐化着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占据东三省，使英日美三国间的冲突更其露骨化，使北方冯阎[1]军阀加紧了反张[2]与反蒋的斗争，因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而使广东出兵湘南。而且反动统治营垒中的冲突、矛盾与斗争愈加剧烈与复杂，客观上便越有利革命斗争的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革命的发展必然的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当着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是同样抖颤着，他们将不惜用尽一切方法来求得到进攻革命步调上的一致。日本出兵满蒙所发的“反俄与防止华北赤祸”的宣言，无疑地是得到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情，英美在华报纸都异口同声地警告国民党各派军阀小心着“今冬武汉有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要国民党各派忠实同

志联合一致去加紧“剿共”工作。最近苏维埃与红军的大胜利，灾民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勃发，将更其推动国际帝国主义更直接地更明目张胆地更血腥地向中国革命进攻。

自从满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正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团结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准备向革命做新的进攻。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的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很明显的，这种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在这统一战线之下，国民党可以在任何时候，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向工人农民与兵士进攻，实行它屠杀的拿手好戏，很巧妙地将民众的反帝情绪转移到破坏民族战线的“国贼”身上。国民党现在正在“抗日救国”的呼号下面，同帝国主义做着买卖，准备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再用血与铁来消灭革命运动。一切国民党欺骗宣传的急速破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五、我们固然相信，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几千万以至几万万中国劳苦群众，在他们的先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能够继续不断地战胜反革命的进攻，以至根本推翻反动的统治。但是中央必须唤起全党注意：虽然我们红军主力已经冲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虽然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时，恰当中国革命急速向前发展的时候，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目前还没有到达已经再不能再与革命抗争的死亡程度。他们是正感觉着死亡的逼近，而加紧顽强的抵抗。

因此不仅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敌人再没有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思想，是童稚的自欺，即以为第三次“围

剿"冲破后，再不会有像蒋介石第三次"围剿"那样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不合于事实的空想。实际上正因为我们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的"围剿"，正因为冲破了第三次"围剿"后中国的政局是怒号着革命的大风暴，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大军阀才更要努力企图用"团结一致"的力量，去首先对付革命运动的先锋——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革命的弱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不平衡，在目前不但在工人与农民运动中存在着——(这是指工人斗争在主要的城市中还没有到达直接争取政权一点而言)，而且在地域上也还存在着，虽是革命运动的急速发展正在使这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也不能不说是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党在四中全会后的转变，还没有深入到下层党员群众。党的政纲还没有为更广大的工农群众所彻底了解，党还没有能完全领导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斗争。

所以在目前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为要得到更伟大的胜利，需要党在苏区与非苏区内更加十百倍地去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成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需要党更加十百倍地努力去领导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以及千百万劳苦群众去更热烈地更英勇地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

六、为得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方面，应该立刻执行以下的紧急任务：

(一) 苏区的党在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必须立刻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已得的胜利，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引起最广大群众斗争的热情，来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贫农团、雇农工会与职工会等，并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

退却步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

（二）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红军十六军、十军及闽西新十二军必须与中央区打通。湘鄂西的第九师必须与鄂西红军打通。二军团必须向汉水流域发展，取得与湘鄂西第九师与鄂豫边第九军的联络。此处十六军与鄂豫皖、鄂豫皖与湘鄂西必须取得联络。这样来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

（三）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必须做最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更彻底的实现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政府。坚决地与那些借口军事紧张而推迟这一工作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四）立刻扩大与巩固红军。坚决依照新颁的红军组织条例及政治工作条例实行改组。同时，必须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中，挑选积极勇敢的分子来扩大红军。中央区应扩大到比原有的数目增加三分之二，鄂豫皖增加二分之一，湘鄂西增加三分之一。闽西十六军、十军等都必须扩大成为军或师。此外必须成立红军补充军。中央区及鄂豫皖区各县成立一团。其他各苏区各县至少成立一营。中央区须成立警卫师，湘鄂赣省、湘赣边省与鄂西皖西的独立师应充实起来。中央区与鄂豫皖省区至少创办红军军官学校及军事政治学校各一所。各军建立随营学校。此外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

（五）立刻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日帝国主义军队占领

满洲，反对太平洋战争与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游行。必须坚决的同那些以为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在苏区内成立反帝同盟，更有计划地与更经常的领导与发展反帝的工作。这一工作，在目前帝国主义更猛烈地向中国革命进攻的形势之下，应该特别加紧。

（六）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取得苏区四周围民众对苏区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地选派党员、团员以至积极的工农干部，到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的工人、灾民、农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中央区与豫鄂皖至少须派出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其他苏区五十至一百人）。坚决打破一切白区工作都应该依靠中央的错误观念。此外要尽量的将苏区内部的灾民群众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相当的训练，派他们到白色区域去“报灾”，去进行灾民中的工作。

（七）中央及河北、山西、陕西的党部，必须共同派遣十个到二十个干部到晋绥边新成立的二十四军中去，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使之成为燃烧起华北红军苏维埃运动的火焰。

（八）在非苏区方面，必须加紧拥护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胜利。最广泛的将红军胜利的消息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庆祝红军胜利，征调工人干部，选派代表与为红军募捐的运动。必须把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更多的翻印，分散出去，向群众做关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同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成立纪念日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

（九）必须立刻订出具体计划，征调干部和工农中的积极分子去到灾区工作，尤其是武汉、芜湖、江北等地。在灾民工作中，党要注意到使灾民斗争联系到失业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斗

争，以至继续发展到农民的秋收斗争与冬荒斗争。要团结他们在灾民团、灾民自卫队内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要从要饭吃的斗争引导他们到抢米、抢劫军粮等广大的灾民的骚动，以至走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必须同因为反帝斗争的开展而忘记千百万灾民的斗争的倾向做斗争。

（十）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应该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发行反帝日报与传单标语，并且组织宣传队等，利用各种公开名义到街道上尤其是工人区域去演讲。在上海等地，现在应该立刻以“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但是这些口号绝对不能同“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拥护工农兵苏维埃与红军”等口号的宣传分裂开来。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罢工，使斗争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斗争扩大与深入。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队战争与兵变。同时这一反帝斗争，必须同揭破国民党的反帝欺骗与反对国民党密切的联系起来的。全国反帝同盟，要利用反帝斗争的开展，在今年内成立起来。

（十一）在上海、天津、唐山、香港、哈尔滨、大连的党部，在中央帮助之下，应该动员得力干部去加强正在开展着的工人斗争的领导，去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和打入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特别是去建立海员、铁路、兵工厂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中（如上海、唐山、天津等）努力去准备和组织

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

（十二）江苏、安徽、广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党部要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队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如山西、河北、河南），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要的表现在，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或者企图等待战争来讨“便宜”的情绪，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得到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把土地革命和反帝斗争分割开来，对城市工人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与忽视，富农路线、黄色倾向、反帝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以至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等。“左”的机会主义——立三主义的残余也时常表现出来，如不愿深入群众中去作艰苦的工作，而空喊脱离群众的口号，不愿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不知道利用下层统一战线，以至惧怕利用任何公开与半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关门主义等等。此外，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对右对“左”的调和情绪与口是心非的两面派，都是执行上述紧急任务的仇敌，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以加紧秘密工作（任何所谓“小”的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都须给与严重的制裁）和深入群众的主要方式去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建立以少数党员为几千以至几万群众的核心的支部工作，更广泛地灵巧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工作联系的工作方法，从最近革命战斗中吸收工人、雇农、贫农的先进分子，以至愿终身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战的智

识分子来扩大和充实党的组织。这些都是使我们党更能适合于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的组织的迫切任务。这些思想上组织上具体任务的完成，更需要党善于使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每位同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阎锡山。

〔2〕指张学良。

PDG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借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芦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1. 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地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国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争斗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争斗之严重，罢工争斗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

进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

2.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地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得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地使日帝国主义恐惧惊怖。尤其是苏联的存在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争斗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使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崴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俄渔区与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

3. 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的屡次溃败与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争斗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分，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二十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分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能够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

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

4. 而促进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后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头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上实行的。他们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地榨压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之下，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地疯狂地进行反苏联战争准备的情势之下，日本公开地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各地之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路南段的强占与路员工人的屠杀，到处表露

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的反苏联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部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上反苏联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战线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到：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极度紧张的现在，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争斗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三、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的饥荒与土地争斗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争斗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争斗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争斗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与革命及苏维

埃争斗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更加残酷的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争斗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紧张，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

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

1. 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争斗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

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

2. 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3. 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以及全国苏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

4. 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的。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之方法之一。

5. 在灾民争斗中（不论在城市中与农村中的），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争斗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争斗，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

6. 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

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7. 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附注：关于苏区党目前的任务，中央另有决议。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刘少奇关于工运的意见给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

中央：

前次职工部会议，我们在几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关于目前工人斗争形势问题，因为中央早有决定，故我只能和你们来讨论。对这个问题在会议之后，我还有许多疑问，故我提出以下的许多问题给你们。同时我以为对于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应该平心静气的在组织范围内作彻底的讨论，因为这样能发现我们的错误和纠正我们的错误。

一、工人斗争的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或是进攻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我以为应根据下列三点：第一，资本进攻的形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斗争中力量的对比关系；第二，在斗争中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和斗争口号；第三，斗争中力量的重新组合，斗争口号和要求的如何转变。

二、我们为着什么要确认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和进攻的？我以为是为着要规定我们在职工运动中的策略和我们用什么口号与要求去鼓动和组织工人的斗争。

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中，资本继续进攻，还是不是严重的事实呢？还是严重的。减低工资，延长工时，加重工作，开除和裁减工人，欠发工资，物价高涨，关厂停业，克扣

工资，合理化等等。同样，国民党黄色工会和雇主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也还是不是严重的事实呢？也还是严重的。禁止罢工，解散和改组工会，强迫调解与仲裁，完全剥夺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逮捕工人领袖，开除工人活跃分子，厂警搜查和武装镇压等。

四、以上资本进攻与国民党黄色工会雇主的联合进攻，是不是最近许多工人斗争中的重要问题呢？反对减工资、加工时、加重工作，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克扣和罚工资，反对关厂，反对包工头的剥削等，是不是最近许多工人斗争中的重要口号和要求呢？这些口号和要求在今天以后是不是还是重要的呢？同时反对禁止罢工，反对解散工会和剥夺工人的自由，反对强迫调解、仲裁，反对逮捕工人，反对厂警搜查和武装压迫等，又是不是今天以前和以后的重要要求和口号呢？（而且上面的要求和口号不仅仅是引起斗争的导火线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最近许多工人斗争是为反对资本及国民党的进攻，同时又承认工人斗争“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这又是不是矛盾呢？就是在今天以后，如果有人把反对资本及国民党进攻的口号，放在毫不关重要的地位，又是不是正确的呢？

五、我们还应该注意一种事实。当我们的鼓动家拿着全总的要求纲领（改良工人生活的要求）去鼓动工人的时候，工人答复我们说：“这个纲领好是好，可是目前做不到。”这是说明什么呢？为什么在“二七”以前，“五卅”以后，武汉和广东时代，听不到一次工人对我们有这样的答复呢？海员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呢？反对洗马沙[1]，反对开除，反对海关搜查，反对改用银币发工资等。铁路工人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呢？发清欠饷，按月开支，发给花红、年终双饷和储蓄金，反对军队强

迫开车等。这是说明什么呢?

六、最近有许多工人斗争是在积极要求改良生活的口号下面进行的（如上海装订、印刷，天津、唐山等)，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要求是由黄色工会提出来，但也只有在群众的逼迫之下黄色工会才提出来。但我们不能仅仅承认这一方面（进攻)，而否认另一方面（防卫)，实际情形完全不是一致的。在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的条件下，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形。如果我们只承认一种而否认其余的或者毫不重视他们，这是否对的呢?

七、自然，我们应估计到目前反帝高潮及国民党的工厂法对于工人斗争的影响和关系。工人愈是积极起来参加反帝运动，则工人将愈加会要为本身利益起来斗争，国民党的“劳资合作”与“提高生产”也是阻不住的。但因为工人组织不够和敌人压迫，工人还没有如“五卅”时期那样广大的参加和表示自己在反帝运动中的威力。目前我们号召工人广大的参加反帝运动，并组织工人向雇主和国民党的反攻与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又不要忽视国民党与土著资本家正利用提倡国货与增加生产的口号更加紧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反对资本进攻，还是很重要的。

国民党为得欺骗工人，在工厂法上规定工人一些权利。我们利用法律的条文组织工人的反攻与进攻，也是完全必要而正确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工厂法、工会法是保障和便利资本进攻的。

八、在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决议上，认为工人的经济斗争不只是防卫，而且有许多提出了反攻的要求。这当然没有指明中国来说，但也没有把中国除外。在决议另一地方说：在中国、印度工人的经济斗争与一般革命形势相交错。在中国，经济斗

争包含了无产阶级的主要群众（矿山，北方铁路，南方海员等），及至今还站在斗争之外的群众（青工女工）及落后区域（四川自流井等），组织罢工委员会，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在经济斗争中加强了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大意如此）。这是指着具体事实简明的说法。比“防卫”、“反攻”、“进攻”抽象的说法易懂多了。那末我们现在可否这样说呢？“……已经有整个产业的同盟罢工（丝厂），……在斗争中不仅反抗资本家国民党的进攻，而且有许多斗争积极提出改良工人生活的要求，……在斗争中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

此外，某同志说：“在革命危机存在的时期，工人斗争再不能是防卫的。”当他说工人斗争形势不能与总的政治形势分开时，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公式是否正确的呢？

以上的问题希望你们尤其研究过问题的同志详细考虑一下，并给我答复。你们如将这信转给 TOSS，那对解释我的疑问将更有益。

仲　篪

十、五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注　释

〔1〕即包工头。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关于动员和组织拥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运动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

一、全国第一次苏大会将于十一月七日在江西开会。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情势之下，在英勇的工农红军光荣的胜利之中，在苏区和非苏区的劳苦群众的革命争斗的空前的高涨的基础上，苏大会将毫无疑问地得到伟大的成功与顺利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今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节日，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全国政权机关能够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来，这是中国革命运动极大的胜利。全国苏大会及其产生临时政府（人民委员苏维埃）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争斗的明灯，是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工农兵代表政府的产生，将极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争斗，将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吃人制度及国民党的刽子手的统治更加震撼、动摇和崩溃，一直至根本的推翻它们。

二、非苏区的各级党部必须深刻的估计到苏大会及中央革命政府产生的重大意义，加紧动员和组织拥护苏大会的运动。要使这个运动能成为真正的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吸收不仅先锋

队而且基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参加，必须将他与一切群众的政治的经济的争斗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说，不论在反帝运动中、水灾争斗中、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的争斗中，我们必须坚决地为群众的部分的日常要求而争斗，同时指出和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说明只有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才能够根本地消灭一切水灾与兵灾，才能够真正的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估计着，落后的甚至基本的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意义和政策还缺乏清晰的了解，各级党部必须编印各种传单、画报、小报、小册子、歌曲、标语来说明关于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一切问题，大量的印发苏大会的一切劳动法、土地法、基本法及其他一切文件的草案，在群众中组织专门的读书班、读报班来解释这个问题。党报上更应加紧的注意这个问题，经常的加以解释。

三、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必须与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工作联系起来。党要向广大的劳苦群众解释十月革命的意义及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与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战争准备的积极，动员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为拥护苏联而争斗。特别要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蒙的运动中，加紧对于苏联和平政策及苏联劳苦群众同情中国工农群众、援助中国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争斗的宣传。必须开始在学校和工厂中组织五年计划研究会、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研究会及苏联之友协会等等的组织。

四、为着组织群众对于反动统治的愤恨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热忱，在反动统治区域中，党必须准备动员和组织十一月七日的罢工与示威。自然，这个罢工与示威不是用大的空空的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去号召，而是要善于利用群众的一切部分

的政治的经济的要求去组织他们。尽可能的利用群众的反日情绪与公开半公开的组织方法（各种筹备会、委员会、后援会、追悼会等等）及上海双十节的分区示威的经验，并不要幻想组织一切工厂的总罢工，紧紧的抓住几个中心工厂去集中力量来准备。即使不能全厂完全罢工，那一车间的罢工或停止几小时都是有重大意义的。示威的组织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并不要一定幻想全城市的总示威（如果条件不可能的话），有力的工人区域的分区示威，其意义其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将并不比总示威减少。在没有可能组织罢工的工厂中必须准备露天大会、车间会议、代表会或者各种群众组织的会议，赤色工会小组、兄弟团、姊妹团、友谊会、俱乐部等。在各色各种露天大会或屋子里的会议上必须说明关于苏大会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劳动法令的宣传，并通过简单切实的决议（如本工厂中动员几人到红军中去，募捐多少慰劳金，组织苏维埃之友协会，红军之友协会等）及致全苏大会的贺电，特别应该根据他们的切身的要求和劳动法的条文而提出自己的条件组织他们争斗。这些文件，除交上级党部设法转送苏区外，必须在当地党报上、工会机关报或壁报上登载。学生中同样必须进行各种的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团结学生中的贫苦的阶层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

五、在农民群众与灾民群众中，拥护苏大会的运动必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地主与国民党官僚们的一切剥削争斗，发动抗捐、抗租、不还粮、吃大户、开仓等各种各式的斗争。在这些争斗中，指出苏维埃的意义，宣传苏大会的土地法，引导他们到游击战争与建立苏区的道路上来。对士兵群众必须估计到随着满洲事变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而来的士兵情绪急剧的变更，向他们指出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罪恶，说明只有推翻自己

的长官，与工农在一起，或转红军方面去，才能够得到士兵群众的真实的出路。必须深刻的记得，在反动区域发展游击战争与兵变，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开展是极有力的帮助。

六、为着使得群众能更亲切的与红军苏维埃关联起来，关于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工作，这个动员应该严格地反对以前的招募式的办法，应在群众充分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愿为红军苏维埃坚决争斗的基础上，自愿地到红军中去。在有多数群众而一时不能送入苏区时，应将他们组织在苏维埃之友协会或红军之友协会内，成为这些组织的骨干而将这组织广大地发展起来。其次即募捐慰劳金，数额不论多少，主要地是将这些群众与红军的争斗与前途联系起来，并派选代表团到苏区去参观。在这一运动中与其他运动中一样必须严重的注意到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之必要，极大限度地发展党的及群众的组织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们！

今年全世界劳动群众热烈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在中国江西将涌现出一支雄伟的工农革命的柱石，这柱石就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这一大会是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情势之下，在英勇的工农红军第三次冲破敌人联合"围剿"之后，在工农劳苦民众革命斗争日益开展，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各派统治，尤其是在广大民众抗争满洲事变运动猛烈高涨的基础上开幕的。这一大会将成立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一临时革命政府毫无疑义将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它将更燃起全国革命的火焰，极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争斗，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剥削制度与各派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震撼、动摇和崩溃，一直到根本颠覆它们。它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并且它更要继承广州公社光荣的传统，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解放的明灯，继续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史上

写下新的伟大的一页。

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劳动法、土地法及对国内各弱小民族主张完全民族自决权与各种重要经济政策的法令。它将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它将保障八小时工作及全部劳动法令的实行，努力提高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它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苛捐什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它更将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工厂企业，否认外债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它将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将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给与劳苦民众，实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德谟克拉西。同时它公开宣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它依靠工农红军的武力，要镇压一切反革命派别颠覆苏维埃政权恢复旧制度的企图。

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们!

满洲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强盗更公开实行瓜分中国践踏中国民众，同时也更积极进攻苏联，中国各派国民党反动统治，不论是南京政府或是广东政府不但不能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且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一致压迫民众反帝运动与一切革命斗争，把中国更陷入殖民地命运，驱使广大劳苦民众到饥饿、奴役、死亡的境地了！只有推翻国民党整个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根本地消灭一切水灾与兵灾，才能够真正的根本地改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生活状况，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

全中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民众们，起来!

罢工罢课罢操游行示威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武装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共和国!

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

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鄂豫边区特委：

中央听了边区特委代表×、×两同志报告以后，认为必须根据国际和四中全会后目下全国和边区的革命形势，特给特委以下的指示，以便彻底转变边区的全盘工作。拜望边区同志以最大的坚定性与积极性来接受这一指示，并立刻把它实行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边区在两年艰苦奋斗的过程中，的确获得了以下的成绩：（一）创造了边区党与红军第九军的基础；（二）在几个区域内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雏形；（三）在几个区域内已经开始分配了土地并且相当的兴奋了工农群众，领导他们为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初步的成功，当然由于当地的干部与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拥护与奋斗，但是外部的助力（如第三军的助力）尤其是全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也不能不说是这些初步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央在检阅边特工作时必须首先指出的。

二、特区虽有上述的初步成绩，可是本着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中央必须指出，边区对于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执行以及目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实是非常不够的，甚至于根本忽视或不了解。自从边区的党过去在立三路线指导之下遭到了严

重的失败与打击之后，即转入了另一极端，即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与不动主义。虽是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相当接受以及军事上一些胜利，开始兴奋了党内的一些干部，使他们逐渐去执行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但是一直到现在，边特党还没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边特的党在苏维埃区域内，只有少数地方的土地开始依照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分配。但是就是这里分配，也还是依靠党与苏维埃的命令执行，而不是在发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实行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就在这些地方土地的分配还是非常不彻底，以致土地分配的利益一部分还落到地主残余与富农的手里。至于苏维埃的劳动法（如八小时工作制）与经济政策，则根本没有实行。地主富农的残余甚至小军阀以及民团团长之类，还得存在党、苏维埃与红军内部。红军内部的政治工作差不多完全没有，红军至今还没有真正与当地群众发生密切关系的根据地，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反帝同盟等等根本没有，其余如贫农团、互济会等也不过是一些架空的机关。所以当边特同志说，鄂豫边苏区内根本没有地主残余与富农，没有阶级的斗争，而且统治着“和平”，这实是无形中否认了苏区内部阶级的存在，给地主富农做说客。

在白色区域内，边特的党差不多完全陷在消极怠工的形势之中，对于鄂豫边日益开展的工人斗争、农民斗争与士兵运动简直不能领导。悲观失望的情绪充满了各级党部中间，仅有的农民协会的工作也没有真正起来，党内的上层干部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残余、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很明显的这些分子往往因与工农利益痛痒无关，不但不能真正的积极执行阶级路线，而且必然要采取消极怠工以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障碍阶级路线的执行。就是边特党的领导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边

特的委员各自出外巡视，各自负责。经常的边特的集体领导工作是没有的。每个同志犯了错误也无法检查，无法纠正。以至边特以及一切下级的党部，根本就没有思想上以及实际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的党当然不能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以一直到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富农路线、和平发展的倾向，还在边区党内占着统治的地位。

三、中央根据边区党内这些实际的情形以及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边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必须彻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与富农的土地重新分配。拿好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与雇农，同时保障与中农的紧密联络。在反富农的斗争中，积极组织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开展他们的工作，把党与苏维埃内腐化的知识分子、富农尽量的洗刷出去，而拿反富农斗争中积极的工农干部提拔起来担任领导的工作。劳动法上所规定的一切条文，尤其是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累进税等经济政策，必须立刻的执行。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的组织都必须立刻建立起来，红军的成分尤其是红军长官的成分必须有立刻的转变。必须拿在土地革命中获到了利益的雇农与贫农分子做成红军的骨干。并且提拔红军内部积极的工人干部来代替那些异己的长官。必须依照红军政治条例来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没有这一工作，边区的党决没有法子来消灭红军部队成排或甚至成营的被不良长官拖去投降白军的悲痛的事变。没有这一工作，把鄂豫边的红军变成铁军完全是无望的事。同时必须注意肃反工作的建立，反帝工作在苏区内也不容许有丝毫的忽视，尤其在帝国主义准备更直接的向中国革命进攻的情形之下。

只有在反富农的斗争中间来改造党、苏维埃、贫农团，来成立青年团、雇农工会以及一切其他群众的组织，建立他们的

全部工作，才能真正说得上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必然要有千百万群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了苏维埃政权而坚决斗争的地方。在鄂豫边建立这样的根据地，是边特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四、中央认为边特目前应该把它工作的重心移到苏区，边特所在地应设在苏区根据地。离开苏区根据地较远的地方如豫南诸县，应该成立南阳中心县委，归豫南特委直接领导。只有在环绕苏区各县（洛水两旁各县）白色区域的工作归边特直接管理。

中央认为边特在白色区域的工作应该立刻有一个坚决的转变。在白色区域工作中，最主要的同样的是在同党内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与怠工做坚决的斗争。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认为边特的党必须立刻开始群众工作，坚决的打进群众中去，领导群众一切日常斗争。第一，它必须在襄阳、枣阳、宣城、老河口等几个工人比较多的地方发动与领导工人的斗争，尤其在运输工人中（汽车工人、船工、码头工人），把它们组织起来。第二，在广大农民群众以及灾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烟苗捐、反对地主豪绅、反对民团、要求分粮乃至抢粮的斗争中，必须有党的领导。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以至灾民团、灾民自卫队等，必须成为群众的组织。尽量发展农民与灾民的武装组织，发展游击队的战斗。第三，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加紧兵士与民团中的工作。鄂豫边军阀的力量比较散漫不集中，内部成分也比较复杂，兵士同农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这给予了我们党在士兵工作中的良好条件。过去在鄂豫边只有白军军官或民团团长拖跑红军士兵的现象，而没有看到白军士兵不断向红军投诚的事实，这一方面表示出土地革命没有深入，没有给士兵们以很大的影响，但同时表示出我们党对士兵工作的很大忽

视。我们必须在群众工作的开展中，在党开始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中来改造党，来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最坚决的把一切消极怠工的“左”右的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与地主、富农的奸细从党内洗刷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五、中央认为旧时的边特必须改组，整个苏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中央上面的指示立刻执行一切工作中的转变。新的边特必须建立他们的集体领导，建立边特本身的工作，要严格的检查自己与各级党部的工作，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改善与发展自己的工作。过去的边特因为根本没有集体领导，所以就根本不能检阅自己的工作，自我批评也无从发展，边特同志所自夸的党内和平实际上正是党的工作的停滞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缺乏，是党的病态而不是党的健全。此外，特委必须健全完善的巡视制度，从下层的干部中训练出巡视员，而不能把一切常委负责同志派去巡视，使常委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应该特别注意地方党部与支部的工作，务使他们能在群众中发生核心的领导作用，应该尽量发展党的组织，特别要向工人、雇农分子开门。在边特这样大的地方，党员人数不到二千个，实是不容许的现象。最后必须加紧党内的教育工作，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利用实际斗争的经验来教育同志。

六、中央认为在反富农的斗争中，在群众工作的开展中，在党及苏维埃与红军等组织的发展与巩固中，来巩固与扩大现有的苏区，把均县、房县、郧阳、谷城、保康、宣城、襄阳、枣阳、南漳、钟祥等县打成一片，成立苏维埃政府领导整个苏区的工作，应该是边特党目前所能有而且所能实现的前途。要达到这一目的，边区党除执行上述的任务，九军力量应该集中起来，并且把它扩张到××人以上，成立×个师，尽量消灭苏

区内部一切反革命的武装，进一步预备集中力量于一点，利用良好的政治军事的环境，消灭敌人的一方面，而向外发展。绝对不要梦想在目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如此尖锐的条件之下，苏区根据地能够同白区有长久的和平共存的可能。应该时时刻刻准备好力量同敌人的决死战。此外发展围绕苏区白区内的游击战争，以扰乱敌人的后方，也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中央认为边区发展的方向……（略）。

七、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于十月革命纪念节在江西召集。在这一大会上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宣布一切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这一革命政府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力量同敌人决战中初步胜利的果实，也是中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最主要的指标。它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可以不用多说。边区党不论接到中央这一指示在大会前或大会后，必须立刻开始拥护这一大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彻底执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发展群众反富农的斗争，做改选苏维埃与扩大红军的运动，虽是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已经来不及参加大会，但当选举代表仍应设法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参观。同时边区党必须利用机会向更广大的劳苦群众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意义，使他们更能了解这一工农自己的政权，为这一政权的巩固而斗争。必须使苏维埃政府真正成为工农群众的政府，真正成为千百万工农群众所拥护的政府，而不是党所包办的政府，这一苏维埃政府才能巩固与扩大。

八、同三军的关系，中央因为对于三军所在地不很知道，所以不能做很具体的指示。中央认为如三军仍在边特苏区内部，边特就必须与它取得直接的关系。那时边特直接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九军、三军统归湘鄂西军事委员会指挥。据最

近报载三军已攻下陆安府，并且似乎与段德昌部队已取得联络，那当然这一领导就不成问题。但如若边区与湘鄂西苏区无法打通，那边特就直接归中央领导。中央将派一特派员到边特，暂时代表中央领导边特与三军的工作。

中　央

十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张　闻　天

苏维埃与红军的新胜利，全中国的灾民斗争，反帝运动的高潮，以及各种革命斗争的发展，使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加崩溃，使中国日益生长着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了。为着要保持这一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各派间近来正在竞争着把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卖给帝国主义，正在拼命的用压迫与屠杀向中国民众进攻，正在实行买卖式的南北的“和平谈判”，正在利用一些“一致对外”与“对日宣战”等的滥言，欺骗民众。同时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更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张，愚弄民众，来巩固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这些反革命的在野派别，从国家主义派一直到托陈取消派，虽是他们间的主张稍微有些出入，然而他们在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革命上是一样的。不在广大的工农群众前面，揭破这些派别的欺骗，革命运动就无法走向更高的阶段。因此同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做坚决的斗争，应该是我们党目前中心任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三期。

务之一。

我们现在先行分别介绍一下这些派别的主张，然后再加以简单的批评。

（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国家主义派

久已销声匿迹，和平镇静地为吴佩孚、张宗昌之类的国家主义者当秘书参谋，替书局报馆学校之类当编辑、新闻记者、教授之类的国家主义，现在又苏醒过来了。他们最近出版了他们的民声周报，发表了《我们的主张》。这主张一共包括两点：

“第一，我们主张对日本应断绝国交，立请宣战”。

“第二，我们主张，为应付国难起见，中国今日应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

但是他们为什么主张绝交宣战呢？他们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

“明知我们与日本战争，败在我们，胜在日本，然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们要为这野蛮世界留点正气”。

不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在国家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帝国主义，而是为了“正义”，为了“民族精神”，岂不壮哉！？

至于他们要组织国防政府，废除一党专政的理由如下：

“我们很诚恳的忠实的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同时我们很诚恳忠实的相信，如今当国的国民党，亦似有与全国人‘一致团结，共御外侮’的诚意。……如今南京与广东忽有息战讲和的呼声，未始不是国民党本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好现象。……然而为团体组织上的效率起见，我们希望国民党做政治上进一步团结的功夫。我们希望马上有个集中全国人才，代表全国各派政见的国防政府产生。只

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才能得到四万万国民精神上一致团结的实质”。

国家主义者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希望国民党”能够把这些国家主义者的“人才”提拔到国防政府里来，使“有官大家做，有钱大家赚”，成为他们与国民党间“精神上一致团结的实质”。至于他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国家主义者的卑鄙无耻，概可想见！

国家主义者对于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只有跪求，只有希望它把桌子上的肉骨头赏赐他们吃，这种奴才的态度，在下面几句话中，尤其表现得明白：

“为当国的国民党打算，在这种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事公诸国人，亦是减轻责任，使人民共赴国难的一个办法”。然而在这种丑态下面，国家主义者更说：

“同时为达到上项目的起见，我们进一步主张：民众自由集会，实行救国运动”。

“民众自由集会”！这不免有些“革命”气息了，然而这种气息，是国家主义者所极端反对的。所以他们说：

“只要认清了仇人，看真了对手，这种民众自由集会的办法，是绝对不发生危险的”。

很明显的，这种所说的“民众”，当然是国家主义者之类的“民众”。在酒馆里喝喝酒，谈谈天这类先生们的集会，当然是绝对不会危险的！至于其他工人农民学生之类的群众集会，那当然是非常危险，应该严格取缔的！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如此！

（二）博士如毛的新月派

满洲事件发生之后，代表中国亲美派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月派，首先由胡适之博士等出名打电给美帝国主义，要美帝国主

义主持公道，帮助中国。其次为罗隆基博士的沈阳事件与王造时博士的救亡两大政策等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实际上同国家主义派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更其带有“美国博士”的气味罢了。

罗隆基博士在他的沈阳事件上开首就说：

“研究这问题的步骤，第一，我愿为日本人借箸一筹”。

博士给“日本人”（实际上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者——著者）打算了一下之后即说：

“在我们看来，田中所谓的积极政策，是绝无现世政治智识的计划。一方面任武人一意孤行，将陷日本于欧战后德国的覆辙；一方面为共产添个声援，将使亚洲成为不可收拾的共产局面。这是我们为日人借箸一筹的意见，希望日本有眼光，有智识的政治家和人民注意的”。（原书第八页）

博士的出发点，自是不同！他拿他博士的丰富的历史智识与远大的洞察的眼光，向日本的帝国主义者献策！这比请求国际联盟与美国帮忙的先生们，竟更进了一步。

除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献策之外，罗隆基博士更向国民党的当局献计道：

“而今政府人员，在这种危急存亡的时机，单独负担国家重大的责任，这是我们所感激的。不过这样总使我们小子无接触国事的机会，无了解国事的机会，总说是我们小民不平的一点。假使今日当局真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国事公诸国人，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认定，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我们希望有个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来暂时负担国事，做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这里一八七〇年法国的国防政府，是个前例。目前英吉利

三党合组的政府，应付财政的困境，亦是一个实例。

"在本国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人应同舟共济。政治上的意见，是可以牺牲，是应该牺牲的。我们如今主张改组政府，不但消灭了国人在政治上的一切的成见，并且减轻了目前政府人员应赴国难的责任。国本是国人的。国难亦是国人的。希望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

罗隆基博士这一段非常精警的文字，内容同国家主义者完全一样！甚至有些地方，语句方面也是相同的！

至于王造时博士的救亡两大政策，也不外：

"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见原书四十页）

王博士这两大主张，当然同国家主义者完全相同，虽是他比国家主义者说出了更多的理由。在许多同日本宣战的理由中，除这一战争可以引起日本内部革命外，还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与外人的同情"。他说：

"在日本方面自然愿把'大事化小'，看做'地方问题'，以避国际的干涉。在我们方面应该把这事扩大，变成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使列强共同加入干涉。但如何能扩大范围，便非与日本战争不可"。（同书四十六页）

王博士主张宣战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

"我认为与日宣战，可以保存国民党的领袖地位。……若这次日本空前的侵掠，国民党大权在手，没有坚决的表示，甚至于压迫救国运动，那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民党终必被人打倒无疑"。

至于王博士主张取消一党专政的理由，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可以伸张民气"，使胡适之这类"少数急公好义的爱国志士"

取得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取消一党专政，可以集中全国人才”，使新月派一类博士，也能登上政治舞台，尝尝官场的风味，尤其是：

“取消一党专政，可以团结全国国民。在一党专政之下，党高于国，国属于党，党员构成统治阶级（?!），国民构成被治奴隶。一般国民，平常既无参加国事的权利，今遇这种问题若仍不开放党禁，使其参加政治，而欲其与国民党合作，万众一心，以听政府的指挥，在理论上讲不过去，在事实也不可能。于是一班国民，不是趋于消极不管国事，即是趋于反动（即倾向共产党——著者注）与政府为难。两者都非党国之福。”

在目前一党专政还没有取消以前，国民党应该马上决定的，据王博士的意见是：

“（一）开放言论自由，使一般国民能起来督促当局，不至逼上梁山，去做反政府的革命运动。（二）解放民众运动，使全国一盘散沙的人民，能在最短期内自由组织起来，做外交后盾。”

“开放言论自由，解放民众运动”，这当然是国民党所惧怕的，因为这“会给反动分子所利用”！对于这种恐怖，王博士这样的安慰国民党：

“怕反动分子利用吗？则爱国为国民天职，人人有参加义务，只要其不出范围，又何必因噎废食？否则，过事压迫，民情郁结，反动分子倒易利用。其危险数百倍于公开自由的运动。”

这里，很明显的，王博士所主张的言论自由，解放民众运动，都以“不出范围”为标准。出乎范围的，当然只有压迫。

人权派，新月派博士们的主张就是如此！在这些主张中，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绞尽心血所想出来的种种办法还不过是在如何能更好的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如何使国民党继续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罢了。

（三）绝交救国论的社会与教育派

社会与教育派，就是从前的新生命派，新生命派就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忠实同志”。但社会与教育派现在所以自成一派，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用一些在野党的态度，并且用许多合法马克斯主义的思想做三民主义的宣传。它的危险性也就在此。

满洲事变发生之后，社会与教育派就出了反日运动特刊，这一特刊，现在已经出了好几期，其中代表的作者自然是陶希圣、胡愈之与樊仲云三人。这些人文章的内容，可以拿“绝交救国”四个大字包括起来。

胡愈之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中，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政府应该：

“立即向日本政府送致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占据辽吉两省军队，如到期未撤退，立即宣告对日断绝外交关系”。

照胡愈之的献计，绝交的好处，可以使事件的扩大，引起列强的干涉，破坏日本的预定政策。

不但如此。“假令我国能忍痛一时（其实已非忍痛不可），实行对日绝交，只要坚持数月，日本帝国主义必不能支持。因为绝交以后，中日两国间一切现行条约自动地效力终止。数十年来日本用以宰割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一旦完全抛弃，所谓‘既得权利’亦无从借口。以后即使复交订约，我国外交当局，亦容易设法对付。而且日本在我们南部商业，占重要地位，绝交后日本不能享受领判权，和优惠关税特殊权利。

在华日侨经营的银行，工厂，商铺除在占领区域者外，我国都有权监督取缔。日货输入，我们可以无限制增高税率。这

样，除南满外，对日经济绝交，可以完全做到。日本工商业以南满为养命之原，如对华商业完全断绝，不出数月，日本经济恐慌，将达极度，国内将起极大的不安，甚至爆发革命。军阀政府将根本动摇。从这些情形看来，我们可断定如中国宣布对日经济绝交，不出数月，日本政府必然地对我们让步。不然它自身也不免崩坏了”。（见反日运动特刊第一期）

但是如若你同日本断绝国交后，日本同你宣战呢？胡愈之回答道：这是不会有的事！

“日本侵略中国有一定的限度，即不防害别国在华利益。这次事变完全为日本对华单独行动，列强断不能和日本帝国主义取一致行动。假使日本要占领满蒙以外的中国海口城市，列强决不能加以谅解。尤其我们的中南部，为英美商品的重要市场，英美帝国主义决不能让日本单独攫取。至于帝国主义联合宰制中国，在目前亦无实现的可能性”。（同上）

胡愈之这种主张的滑稽可笑，同国民党要人们以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把中国命运交给国际联盟与美国帝国主义之手内的主张，完全没有二致。他的目的，只是要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造成这种美丽的幻想，使他们不直接起来反对日帝国主义国民党！

当然，胡愈之之类这类幻想，很快为铁的事实所击破了。广大民众不再相信国际联盟与美帝国主义能帮助中国了。于是胡愈之就不能不乘风转舵，在他的第二篇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省中国际形势的解剖》中，说：

“日本帝国主义何以能获得满盘的胜利呢？这是因为最近数月来国际局势，给日本以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换句话说，就是太平洋的列强均势已经破坏转变了，而这均势的破坏，却是有利于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反日运动特刊第二期）

实际上，不是在“几个月来国际局势”变动了，而是在几天内民众的情绪转变了，所以逼得胡愈之不能不在一星期内也改变了他的“学者”的分析。

失望之余，胡愈之又在民众前面，不，是在国民党政府前面，提出了新的主张。他现在找到了新的法宝——他找到了国际联盟约章的第十条，非战公约的第二条与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九国公约上的四大原则。

这些法律与原则，最近国民党政府在日内瓦的代表施肇基博士也已经提出了。然而同样的没有效果。这当然不能不使胡愈之先生完全失望！

挺身出来为胡愈之救急的，或更正确些说，为国民党救急的，是樊仲云与陶希圣。樊仲云在《反日救国之最后的一步》一文中慨然的说：“政府当局虽然有的是反日决心，却毫无具体的办法”。（反日运动特刊第四期）

然而樊仲云的所谓办法也不过是“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把问题扩大，以引起列强的干涉而已。同时这种反对还可以避免国民党各派内部的“迫切的内战的危机”，使国民党的统治，能够苟延残喘的维持下去！

比较能够从积极方面，给国民党政府想“办法”的，还是空喊“中国四万万劳苦群众”的陶希圣。他在一篇似乎说得非常“左”的文章《亡国之路》上，这样给国民党想法：

“中国民众要民权。

“中国民众要民权主义的政治。

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应当服从这个民权！实践民权主义的党纲。民众要拿这个党纲向党政府兑现。

“中国民众要组织及言论之完全自由。

“中国民众在这外患濒临的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要监视

政府的外交，要改革政府的政治”。(见同书)

社会与教育派诸位编辑先生的办法，就是如此。这种主张也只能得到“对日绝交宣战”，建立“废除一党专政的国防政府”的结论而已。

(四)“左”倾反革命的托陈取消派

在国民党统治发生动摇时，从中国共产党内滚出去的托陈取消派，同上面所说的派别一样，也尽了拥护这一统治的责任，虽是他往往利用一些比较“左”的空谈来欺骗革命民众，来掩盖他的反革命性。

足以为托陈取消派言论的代表者，当然要推取消派的祖宗陈独秀先生自己。陈独秀先生在取消派刊物火花第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出版)《此次反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一文上这样说道：

“在此次反日运动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

“先说排货，第一，我们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斗争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与决心行之，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即是说排货者自身，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长期忍受极难堪的痛苦，以期获得被排者政治的让步……第二……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

“再说对日宣战……第一，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第二，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国民党丧失了军队即丧失了政权，它宁肯牺牲民族命运，而不肯牺牲政权。要对

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国民会议，或苏维埃而实现，是由其组织的内容与斗争来决定），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令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使他不得不向中国革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火花第四页）

这就是陈独秀先生的"康庄大道"！

陈独秀先生在这里说到了"革命的民众武装"，"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很好听的东西，然而总括起来，也不外"排货"，"对日宣战"与"革命的民众政权"！陈独秀先生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中国的工业"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长期忍受极难堪的痛苦，以期获得被排者政治的让步"。陈独秀先生为得要"对日宣战"，要国民党应许"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要国民党不去"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因为"若没有广大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击"。最后，陈独秀先生甚至要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全国抗日救国会"来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以至他们在自己党纲上所写的"直接平等不记名的国民会议"，也可不要！可见陈独秀的"革命的民众政权"，是完全依照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决定的！至于说这一政权"或者"会经过苏维埃而实现，那当然是陈独秀有意同自己开玩笑，而想拿这一在工农民众中普遍的名词，来欺骗民众！请问天下之无耻孰有甚于取消派的领袖者乎？

实际上，取消派所说的"革命民众政权"，即他们一贯要

求的"国民会议"，究竟同其他反革命派别所要求的国防政府，有什么区别呢？

取消派在他们的刊物工人报第六期反日特刊上（九月二十七日出版），他们的"宣言"中，喊出这样的口号：

"举行各界联合的总示威运动！

"工农学商联合举行总罢工！

"召集全权的革命的国民大会！"

取消派更在他们"沪东区委"九月三十日所发的"反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宣传和行动大纲"上，讲到"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时说：

"所以眼前最具体的步骤，须要工农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兵士倒戈，工农学商兵自动很快而广大的组织'全国反日大同盟'！同时举行全国的，或地方的，继续不断的示威运动，尤其是日本厂的工人赶快积极罢工！只有这样的组织和行动，才能恐吓日本帝国主义将东三省收（退）回来"。

很明显的，取消派现在正在梦想五卅时代所谓民族统一战线，与那时的工商学联合会。取消派所说的"革命的民众政府"，"革命的国民会议"，当然就是士农工商各界联合的政府。看呵！说一九二五年五卅时候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反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那时根本不应该同它实行联合战线的取消派，在一九三一年忽然觉到了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重新到来，并且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而要求与之联合了。

这当然不是五卅运动的复活，而是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

这种各阶级联合的"国民会议"，当然同一切反革命派别的国防政府，没有丝毫不同！这会议的任务，也是在"决定对日方针，并国家的重要问题"！与"宣布对日绝交"！

请读者再看取消派“法南区委”的刊物《起来》第一期上（十月九日出版）的宣言中，提出的口号：

“召集直接平等不记名的紧急的国民会议，决定对日方针，并国家主要问题！

“民众自动的布宣对日绝交！武装，罢工，罢课，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

“恢复中俄关系！

“反对内战，反对‘剿赤’！”

一切这些要求，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反革命派别的要求有什么区别呢？所不同者，只是这里在“反对内战”之下，加上了反对“剿赤”！

我们真不知道取消派所反对的“内战”，到底还是军阀与军阀的战争，还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但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取消派都是在帮助反革命，反对革命！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众坚决的相信，只有革命的战争，只有苏维埃与红军在这一战争中的胜利，才能消灭中国的军阀战争，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而取消派却反对内战，却只想吓吓日本帝国主义！

呜呼，取消派！

（五）各反革命派别为什么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

在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满洲，屠杀中国民众的时候，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无抵抗，镇静，逆来顺受的政策，当然只会加强全国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不满意与反抗。反日运动愈是高涨，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协同帝国主义屠杀与镇压民众反日运动的真相愈是明显，他在一部分民众中间的所能有的“威信”，也愈是一落千丈。为得要维持国民党在群众中间的幻想，使国民党的统治不致完全破产的国家主义派，人权派等发表了

他们“绝交宣战”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宣传，要在民众中间造成对于国民党的幻想，似乎国民党还能够对日绝交宣战，使民众等待国民党的绝交宣战，使民众对于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协同帝国主义屠杀与镇压反日运动的愤怒，排泄到对日宣战的幻想上去，去投入国民党对外宣战的“准备”中去。

但正因为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使全中国的统治阶级不能不在“宣战”的名义之下竭力准备武力，举行新的“救国借款”募集“救国基金”，武装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流氓无产阶级的分子，以及黄色工会的领袖与一些被他们所欺骗的工人，以便加紧屠杀与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最近譬如蒋介石联合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一些流氓头如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用了好几百万的金钱来组织他们的义勇军的计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此。所以目前一切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宣战的口号，实际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为了对付革命民众。

至于各派都想利用对日宣战的名义，发展各派的武力，预备相互间的斗争，那当然也是非常明显的事。譬如最近报载阎锡山、冯玉祥之类，因为要对日宣战，准备出兵平津，陈济棠等因为要对日宣战，预备出兵上海等等，都是这一套把戏。但各反革命派别所以如此一致地主张对日宣战，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对付革命，维持在革命恐怖之前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但是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

南京政府、广东政府以至东北政府等等，在广大民众前面，已经完全破产。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东西，来欺骗民众，来

维持中国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新的政府，即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即所谓能够实现民主政治，团结各种人才（当然如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社会与教育派，以至取消派等等的领袖）的国防政府。

这一政府的目的，当然不是为得要“抵御外侮”，而是为得要投降帝国主义，协同帝国主义，来镇压革命的政府。这一政府的目的，是在团结一切反革命力量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立，是在同它“宣战”！盖所谓“对外必须对内”，“安内即所以攘外者”，即此之谓也。

我记得在一八七一年，法国革命史上，当普鲁士的军队进占巴黎时，法国资产阶级组织的“国防政府”不但不去抵抗普鲁士军队的进攻，而且同普鲁士订立投降的条约，引普鲁士军队入城，利用它的武装来镇压武装的无产者，来消灭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大批的屠杀了英勇的巴黎公社的社员！

我当然很佩服中国的这些反革命派别中的“学者”，他们居然在历史上找到了这样一个适当的名词！

中国的巴黎公社、中国的苏维埃，现在正在南方各省发展与巩固着，这不能不使中国的梯亥尔着急起来组织中国的国防政府与之抵抗。当然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同一八七一年法兰西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在这一次剧烈的国内战争中，将要取完全胜利的，不是中国的国防政府，而是中国的巴黎公社！

（六）国民党怎样接受了各反革命派的救国方案？

蒋介石三次“围剿”苏区与红军的惨败，灾民斗争与反日运动的突飞猛进，以及国民党统治的急速破产，使国民党内部不能不另想方法维持整个国民党的统治。这一方法，就是现在

所甚嚣尘上的和平统一会议！

一切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现在都在拼命宣传和平统一会议，说，只有和平统一会议，才能成立中国的统一政府，才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甚至过去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监禁，开除党籍，以至通缉的“叛徒”，如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胡汉民、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徐谦、程潜、居正、方振武之流，现在集中到上海来，为“和平统一，一致对外”而奔走了。

请看广州非常会议的代表团汪精卫等怎样宣传着他们和平统一的目的：

“此次同人等受非常会议之命，来沪磋商和平统一，其目的不外欲完成吾人一贯之主张，集中全国之力量，对内期民主政治之实现，对外筹商共赴国难之办法，誓以不损我国一丝一毫之领土主权为原则，以解决我们目前外交上之难点，盖不丧权不辱国为我人一向之对外精神，亦即过去国民党光荣历史之所系也”。（见二十七日申报）

而且汪精卫在二十三日招待上海新闻界时，甚至说到：

“昨天蒋先生来到上海的时候，同人等曾当面要求，不再检查报纸，使人人有自由发表意志的机会。蒋先生昨天已经切实地答复，这点是不成问题了”。（二十四日申报）

在汪精卫二十五日发表谈话中间，更说到：

“蒋先生下野通电与广州国府取消通电，其最大意义，是把几年以来的纠纷做一个结束，而从此以后展开一个新局面”。（二十六日申报）

除了汪精卫等以外，当然我还可以从很多人所发的通电、宣言、谈话之类中，找出同样的主张，但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从汪精卫等的谈话中，已经可以看见国民党是已经完全接受

了上面我们所说各反革命派别的“救国方案”。在那里说到“集中全国力量”，“对内期民主政治的实行”，“对外筹共赴国难的方法”，更说到“言论自由”，“结束一切纠纷”等等。这同在野的各反革命派别所主张的有什么不同呢？

国民党内各派别，近来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急速破产，不能不用这种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来团结他们的内部，以镇压革命。他们的“和平统一会议”，他们的“统一政府”（也可名之曰“国防政府”）的宣传，就是为得要达到这一目的。虽是因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为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本身矛盾的存在，使他们内部的“纠纷”无法“结束”，而且很明显的表现出国民党各派宣传的本身，就是他们内部斗争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在拿这种武断宣传来遮盖整个国民党的破产，来给腐臭的国民党鼓吹，在民众中间造成种种幻想，使民众为这种幻想所惑，而放松反国民党的斗争，同时统治阶级却正好利用这一时期，各自巩固他们的力量，选择机会向民众为坚决的“统一的”进攻，并且在他们内部开展新的“纠纷”！

当然从屠杀民众的刽子手胡汉民、汪精卫口中所说出的“民主政治”，“言论自由”等的武断宣传，民众不大容易相信。过去这些“垃圾”的历史，告诉了他们，这些“伟人”的话语，实际比放屁都不如。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社会与教育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的欺骗宣传，特别表示了他们的作用，给了国民党的统治以很大的帮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对这些派别的斗争！

作者附白：

正在我发稿付印以前，我看到上海反帝同盟机关报上（第

二十期）所登载的关于和平统一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完全表示出了上面我们所说那些反革命派别的宣传，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同志。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同那些反革命派别一样，向和平统一会议建议，希望这一和平统一会议能够实现一些他所提出的“民主”的要求，并且愤然的说，如若和平统一会议不能实现他所提出的要求，那就是国民党自绝于民众！这位同志简直完全做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俘虏，因此，同这些反革命派别的斗争也愈形重要！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及目前苏区中心任务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中央局：

欧阳[1]来后，中央有一长信指示你们，恐未到，现电告要点如下：

1. 苏区伟大成功在冲破“围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巩固红军，提高党的领导，AB团活动失败，而成为中国革命危机主要标志。

2. 但苏区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党还未尽一切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苏大会久未准备，临时政权组织又取消，忽视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党内更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这都使阶级战争的进行遇到困难。

3. 中央过去路线错误是造成苏区错误主要来源，但苏区只在中央局扩大会后才向国际路线转变。二全会、汀州会议、吉安大会都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后，中央局是调和路线，即扩大会后也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

4. 目前全国全世界形势都有利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区中心任务是最大范围发动群众，巩固扩大红军，支持长期艰

苦阶级战争，冲破敌人“围剿”，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建立巩固根据地，在这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实施苏维埃政纲，以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为更广大更有力进行阶级战争，党必须发展苏区内阶级斗争，加强群众组织和自卫力量，有组织的派人到白区及敌军中工作，组织游击队，发展新苏区与后方。分配土地，大致以人口劳动力作混合标准，不能租土地给地主种，分坏田给富农，不动摇中农土地，贫农雇农分得好田。必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红军扩大，要肃清富农商人分子，要吸引工农分子及俘虏士兵，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条例须逐渐施行，红军学校须集中举办。须认真做各地苏维埃改选运动，十月节必须开苏大会，产生临时政府，党代替政权包办一切错误须铲除。须加强地方党部工作，引进和训练新干部，大量发展工人、贫农新党员。党工作中心在支部，特别加紧宣传教育工作。反 AB 团斗争是绝对正确，但错误在没能把这一工作同发展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很密切的联系，没能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加紧党内教育工作。你们应分散他们力量，孤立他们，加紧反对各种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夺回其影响下群众，征服自己阶级内错误思想，并有系统进行政治保卫处工作。中区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讨论经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欧阳钦。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发展苏区等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央局：

十月三日长电悉。

（一）三次战争的胜利，反日运动的高涨，灾民斗争的严重，各苏区的新胜利和发展，北方新苏区的成立，大城市工人罢工形势的紧张，与兵变潮流的继续前进，使中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使国民党与他的走狗——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第三党、取消派等高唱一致对外与和平统一，来缓和民众反国民党的斗争，一致投降帝国主义，来共同压迫革命运动，尤其是向苏区红军进攻。但同时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因日本之占领满洲而更形紧张，尤其是日美之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日益逼近。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也无法解决，最近在上海召集的和平会议的谈判，已有破裂现象。因之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定夺，各讨赤将领如何、朱、孙、蒋[1]等纷纷来沪休息，十九路军与陈济棠军的交替至今尚未议妥。一致对外和平统一的欺骗，在民众心目中很快的破产了！

（二）中央区正宜利用现在时机，继续胜利的行动，巩固的向外发展。现在中区之敌情既守吉赣富及宁广之间的两线，

以防我向赣州、吉安、抚州发展，我军急宜以主力军出击宁都、广昌，此处敌力较弱，胜利可恃。敌人钳制之势一破，然后佑军情变迁，向有利方面发展。同时，以少数兵力及地方武装向上杭、永定发展，巩固苏区后方，恢复闽西赤区，解决部分经济问题。尽量发展赤区周围之游击运动。

（三）若困处瑞金一隅，避免与敌接触，恐惧四次战争爆发，因而向闽西北、赣西南十六县发展，则不但给养难解决，自放弃良好时机，自处被动，使敌人得从容布置，且无法巩固根据地。现有根据地之巩固，必须消灭宁广之敌，绝不能将现有之根据地，准备作新战场，此无异取消红军根据地。

（四）红军可编为一、二、六、七、八、九六军，地方独立师要尽量改编为红军，另由地方武装成立警备师。俘虏士兵大多是破产农民，要努力宣传他们加入红军。红军作战要尽量利用游击队与群众作袭击扰乱敌人与搜索战场之用。医药及射击飞机器具我们当设法，但你们须将闽西交通打通。向外求胜利发展的方针，望在苏大会上做热烈鼓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何应钦、朱绍良、孙连仲、蒋鼎文。

PDG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了。在最近三四年来，由零星的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目前强有力的红军，由微小的游击区域发展成为目前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了。在这些苏维埃区域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了土地给中农贫农；消灭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建立了工农的军队。

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对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最近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进一步的崩溃，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产生，使这二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化，这二个政权的斗争更加剧烈化。

这二个政权的斗争，是不能调和不能中断的斗争。在苏维埃运动一开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不断的来进攻红军与苏区，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派遣几十师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力量来与苏维埃运动作殊死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剿共”计划完全失败，红军与苏区获得伟大胜利，这更证

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这一切事实更给所有不相信和污蔑苏维埃运动的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以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苏维埃运动在其发展中，因为路线的错误——立三路线，曾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国际路线的执行，使苏维埃运动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苏维埃运动中立三路线的错误与恶果我们必须作一个总的检阅，这样的来更深刻的了解国际路线的正确，来定出苏维埃运动的方针。

苏维埃运动中的两个路线——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

苏维埃运动的开始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产党在最近几年的艰苦斗争中，领导着苏维埃运动获得了伟大胜利，但同时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现在必须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检阅过去的工作。

在最近一年来，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了立三路线，这路线确实使苏维埃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与挫折。但在四中全会以后党开始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克服了立三路线，而使苏维埃运动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由立三路线到国际路线的转变，确实是苏维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立三路线之下，党不去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反而采取不顾力量对比的向中心城市冒进的政策，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巩固和扩大地方武装，反而取消地方武装，不顾及一切社会成分的去胡乱的扩大红军，结果使苏维埃区域受到打击和削弱，使红军受到挫折和部分失败。

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进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对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主义的

行动，但是它确实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但长沙战争的过程，铁一般的证明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破产。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苏维埃根据地开始巩固，红军开始改造，苏维埃运动开始走到巩固发展的道路。

立三路线不仅是简单的冒进主义，而是根本不认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不认识真正发动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立三路线过分估量军事力量，而根本忽视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之建立，因此苏区的群众不能广大的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一切群众组织成为空的纸面上的机关了，苏维埃政权机关也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结果苏维埃运动不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参加，不能得到强固的群众组织基础。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群众开始发动、开始组织，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开始建立与巩固。

在立三路线之下，苏区的土地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土地问题上立三路线是"左"的面具——集体农场、苏维埃农庄，掩盖着极右倾的富农路线——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再立三路线是根本忽视土地问题，因此在很多苏区中，地主富农的土地很久没有没收，土地很久没有分配。至于分配了的地方，有些是按照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十足富农路线，有的是按照立三路线所领导的苏代会之土地法令。就是注重土地问题的江西苏区的党部也同样没有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种"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非阶级路线是大多数苏维埃区域的普通现象。上述一切错误，使土地革命不能深

入，使贫苦农民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如没有分配土地的地方），或者没有得到最大利益，而使富农偷取土地的果实。这些错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模糊起来。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土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执行了土地革命中的明确阶级路线，执行了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最大利益，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苏区的群众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立三路线是根本不认识党的领导作用，它不但继承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实行包办一切，并且直接取消了工会、青年团等组织。苏区执行了这路线是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是取消了政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作用。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使赤区中与赤区附近的白区中的党员与干部受着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立三路线在党的发展上在干部的提拔上都没有阶级路线，结果使许多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组织反革命派，使党受到极大的危机和困难。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党开始改造，党的作用提高，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始肃清出去，党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了。

立三路线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不能具有明确的阶级路线。但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这一现象在苏区里表示得特别明显，并且是普遍于一切苏区的，这是因为苏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薄弱，农民的落后思想反映到党内的恶果。在过去，不仅是在土地问题上，并且在一切政策上，在政权红军工会群众团体的成分上、干部的提拔上，同样也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结果，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充分的发展，反而模糊起来，工农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而使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地主豪绅子弟、富农、商人混进了政权和一切革命组织，在干部中也充满了这

些异己分子。

立三路线的执行，使我们不能在组织上来巩固革命的果实，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反而使阶级异己分子能够混进革命组织和党的组织里来，使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得到利用立三路线的错误，来发展反革命的政党——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派等等——的一个机会。这些反革命分子并且有时是占据了政权及党的领导机关，这样的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与暴动。这些反革命的政党与反革命的事变已成为一切苏区的普遍现象。

富田事变就是这种反革命事件的最明显的表示，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局扩大会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阶级路线开始执行，政权开始改造，阶级工会与贫农团开始建立，党内异己分子开始洗刷出去，贫苦工农的积极性开始发扬，反革命派受到严重的打击，苏维埃运动组织上的巩固得到初步成功。

总之，由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的确是苏维埃运动中的主要关键。在立三路线、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以及过去一切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红军受到损失，苏区受到削弱，群众力量不能发扬并且未能组织起来，加之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的确使苏维埃运动遇到极大的危机。但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苏维埃运动巩固起来，并且得到大的发展。最近各苏维埃区域都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围剿”，获得新的胜利，都是国际路线执行的结果，尤其是中央区三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表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

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担负在中央苏区的任务也就特别重大，所以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是绝对必要的了。

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与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以前，不仅地方党部就是红军中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执行立三路线，扩大会议前的中央局是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确是转变到国际路线的开始。可是对于中央指示信上所指出的中央区的极严重错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仍旧没有明确的了解和及时的纠正。中央局八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纠正这些错误的开始，是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大会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大会认为扩大会后尤其是八月土地问题的决议后中央局的政治路线是一般正确的。

大会首先指出，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的白军，开辟了战争史中的新纪元。在中央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实行了平分土地，并还在八月土地决议后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实行中央所提出土地法令草案。在中央区建立了强有力的红军，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有了初步的肃清，贫农占了多数，工农干部也开始提拔。在中央区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开始提高，党在群众中的

信仰提高，一切反革命派特别是AB团遭受极严重的打击和失败。

中央区虽然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但中央区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些错误就是中央指示信上所说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大会除同意中央的全部批评外特别指出：

1. 苏维埃根据地问题：赣东南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主要根据地，这根据地应当伴着闽西苏区和河西与湘东南苏区，而把这些苏区打成一片，建立起更广大的根据地。但是中央区的根据地还是很流动的，与闽西苏区只在最近才能贯通，与河西苏区仍是隔离的。在中央区的根据地上，阶级群众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群众的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纲没有最大限度的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从阶级群众一直到党的干部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不深刻不清楚的。因此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而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领领导机关。结果，一切任务的执行只有从上而下的命令，而没有从下而上的群众发动与批评。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并且还有许多纸上空文。在这里要指示出，中央苏区的地方工作是赶不上闽西和其他苏区的。

2. 红军问题：红军一三集团军确实获得了伟大成绩，成分上实行了改造，工农干部开始提拔，共产党在红军中的信仰很高，反对军阀倾向的残余，曾经做了残酷的斗争。但是红军中的工作仍有错误与缺点：首先在改造红军的成分上不以肃清地主、富农、商人等分子为中心，而笼统的提出"洗刷流氓"，同时又把白军的一切士兵当作流氓，这是模糊了阶级路线。根本肃清地主、富农、商人及一切异己分子和提拔工农干部尤其

是工人干部的工作没有全部执行。其次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是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的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等等。因为党的包办，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员的权能表现不够，政治部不能建立，而且没有从上而下的系统，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都不充分。此外，军阀倾向的残余仍旧存在，具体表现就是在指挥员对战斗员和军队对工农群众的恶关系，以及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恶习惯。

3. 土地问题：中央局在八月土地问题决议后，过去的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开始纠正，但在执行中，仍旧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来执行这个决议，仍旧有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目前最严重的就是反对中农，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错误。中农分中田，不允许中农去参加苏维埃政权，把贫农团来代替苏维埃政权，这都是这种“左倾”错误的表现。雇农工会、贫农团、合作社的组织是不健全的。

4. 苏维埃政权虽然经过屡次的改造，但还有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等——混在苏维埃政权机关里，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从上而下的政权系统没有树立，而且党包办政权工作。政权的基本组织——城市苏维埃和乡村苏维埃——根本没有成立，而代之以乡村政府执行委员会及政府小组。政权的组织和工作不是按照政权的形式，而是仿造群众团体的方式（如政府成立宣传部、妇女部，政府委员可以随便调动，政府可以随便改组等），并且又是一贯的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政权机关忙于“办差”（找伕子等）、“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非政权的工作。

这一切都使苏维埃政权不能变成群众的有工作能力的工农的阶级政权，不能变成工农群众斗争的统一意志的表现。

5. 工会运动与反帝运动：工会运动在赤色区域是一般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企业主、老板、独立劳动者甚至于和尚、道士、地理阴阳先生都加入工会。工人反对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八小时工作制一般的是没有实现，其他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工会的领导的斗争是独立劳动者对农民的斗争，这是破坏了与农民的联合。最近工会虽有改造，但工会的整个系统仍旧没有建立，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仍没有充分发展。同样，反帝运动是一般忽视，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群众中进行非常少，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只在开始建立。

6. 党与青年团问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极高，成为革命唯一领导者，这是党的唯一成绩。但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在党的工人和雇农极少，而地主子弟、富农、商人这些异己分子仍旧有混在党内的，这是过去在党的发展中缺乏明确阶级路线的结果。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生活非常缺乏，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倾向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差不多没有，党内自我批评缺乏到极点，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并且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这一切都使党的组织、工作与生活不能健全的建立起来，而使党在一切组织中与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削弱。青年团的工作一般是忽视的，党对青年团的组织与工作一般是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与帮助非常脆弱。

7. 肃清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中央区的肃反工作是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肃反工作中仍旧有很大的错误。首先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是非常缺乏，尤其是反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的斗争更是缺乏，而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缩小到破获、捕拿、处决的范围里去，同时，又把一切反动分子、一切不满分子、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当做AB团看待，肃反代替了党内思想斗争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党内生活与群众政治生活落入非常状态。这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并且过分估量AB团的力量，轻视革命力量，因此发生恐怖，而把AB团扩大化了，并且在处理AB团时未能每次都把领袖与被欺骗被威胁的分子分别开来。这一切错误形成了一种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肃反中心论”——认为一切工作只有从肃反做起，结果，群众没有发动，党、团、政权及一切群众团体不能改造、不能建立，而这样的肃反有时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肃反的专门组织不健全，破获反动的工作不能成为一种专门的特殊工作，而一切党部反把这种肃反工作当着普通的群众工作来做，而根本不去进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错误。

这一切错误与缺点，都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表现与结果。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

目前国际的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得到惊人的伟大胜利，五年计划不但执行而且超过，农业飞快的集体化，富农日益消灭，工农生

活大加改善，政治和文化程度大加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正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上，经济危机发展到最高度，生产大缩小，金融大混乱，失业达到惊人的数目，各国财政陷于破产的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恶劣到万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榨取比以前更残酷。世界革命工人运动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正在高涨，革命条件在许多国家里日渐成熟，世界革命的大风暴不久就要到来，资本主义制度正向死亡的末日走去。

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对抗日益加深，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为争世界霸权为争市场的斗争更形剧烈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世界大战特别是为反对苏联的战争，最近日本占领东三省，固然使日美英各国间的冲突加烈，同时目前战争的主要危险——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日益逼近。

在中国，政治经济的总危机更加深入，反动统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水灾普遍于十六省，灾民达六千万，工人、农民、贫民达到极贫穷的极痛苦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内政外交完全破产，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增加，红军与苏区在胜利后有了新的大发展，日本出兵东三省引起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大发展，工人运动高涨，苏维埃运动大发展，北方开始出现苏区，反动军队的兵变与哗乱正在继续，这一切都表示中国反革命统治之进一步崩溃，表示革命条件之逐渐成熟。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是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的内部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定能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的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和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

这是世界革命的新局面。在这种新局面下，苏区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的转变党的路线，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发展新的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现全苏大会的一切政纲与法令，建立健全的地方苏维埃政府，这样来支持不断的艰苦的阶级革命战争，来发展苏维埃运动。

1.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个任务在中央苏区与其附近（闽西、湘赣边与湘鄂赣边等等）苏区中更加重要。为要建立根据地，不仅是要去扩大和建立红军铁军，还要最大限度的去发动苏区的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组织他们到工会，到一切群众团体，到地方武装组织中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消灭地方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还要以最大的决心建立赤区附近的白区的秘密工作，进行白军中的革命工作。苏区必须扩大，中央区与闽西的连系必须巩固，中央区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2.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巩固和扩大铁的红军。为使红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红军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传统，建立起严密组织的、有先进军事技术的、有强固的有系统的政治工作，军事上强固的、政治上坚定的铁的红军。阶级异己分子应当继续肃清，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党的包办应当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条例应当坚决执行，政治部应当建立经常有系统的工作。要坚决的增进军事技能，要教练阵地战、街市

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义的经验论。同时要反对不尊重苏维埃政权、不爱护战斗员的和其他一切军阀思想与行动的残余。红军必须扩大，并要进行扩大红军的经常运动。

3. 为着发展苏维埃的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必须进行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应当迅速洗刷出去，"以党治国"的国民党的理论与党包办政权的恶习惯应当根本肃清，政权应当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系统，建立起各部的经常工作，应当吸收广大工农群众来参加政权的各种工作。为要改造苏维埃，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乡苏维埃与城市苏维埃，建立起这个经常的代表会议制度的政府，政权的民主化必须发展。这样使苏维埃政权变成工农的真正的群众政权，来实施全苏大会的宪法与一切法令，团结起广大工农群众与苏区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4.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在新区域中一定要明确的实行全苏大会的土地法，在老区域中没有执行中央局八月决议的要继续执行。土地的分配，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做标准。红军必须分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代为耕种，外籍的红军战士必须由苏维埃政府在各地划出公田分给他们，以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要坚决的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的错误。为要实现中农贫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一定要发动并组织广大雇农、贫农、中农的群众，要认清若不发动广大劳苦农民的土地斗争，土地革命的利益不会真正的落到雇农、贫农、中农的手中。

5.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左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作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为要发展职工运动，必须坚决的反对忽视工会与工人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苏区工人很少没有什么工人斗争错误的观念，要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一切老板师傅等分子要洗刷出去，工会要坚决的正确的领导工人反雇主的斗争、雇农反富农的斗争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来实现劳动保护法。同时这些斗争必须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工农联盟的原则之下去进行。这样来发扬苏区工人的积极性，来加紧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

6.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的战争，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必须了解，只有发动并组织广大的群众，改善我们各方的工作，建立强有力的党和政权，要进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教育，我们才可以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与消灭一切反动派别。否则仅靠“肃反”工作是不能达到巩固革命的目的的。肃反工作要集中到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去，对付反革命组织的方法与技术必须改造，要搜集各方面的材料，绝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坚决实行自新自首的政策，要坚决反对肃反的中心论，要反对把反革命派扩大化而产生的恐怖，要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论，要反对处决中的非阶级路线。

为要执行上述的一切任务，必须巩固党的组织。首先要改善党的成分，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理论

政治水平，勇敢的提拔工农干部，对干部进行专门的教育。党的发展工作必须坚决的实行阶级路线，党的生活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建立去改进，党的宣传工作要有系统的去进行，党与政权及其他团体要建立适当的关系，组织党团，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消灭党的包办制度，支部工作与生活必须变成党的工作中心，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必须反对党内对青年团工作的取消倾向。

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的斗争，反对一切错误的思想与倾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狭义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党内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可能的发展，反对命令主义与惩办制度。

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但不放松反“左倾”的斗争。只有坚决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才能执行路线的转变，才能纠正和肃清过去的一切错误，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我们的全部指示，才能完成革命的重大任务，完成中国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一）苏区党的环境与任务

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建设工作的总方针：

最近一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飞速的发展。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要建立强固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更加重了苏区党的任务。苏区党的一切建设工作，应当适合于向前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的革命需要，和正在进行着的国内革命战争环境的需要。

苏区与白色统治区域环境不同：

苏维埃区域党与白色统治区域党所处的环境是不相同的。在苏维埃区域以内，是已经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保卫及发展这一政权的工农红军。

苏区党的任务与建设工作的重要：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

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

（二）苏区党的现状

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主要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苏区党在四中全会后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政治路线上，逐渐脱离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而走上了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正确阶级路线。但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对于肃清隐藏在党内的及反动分子——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洗刷富农、地主成分等，确有相当成绩。提拔工人干部与转变工作方法，相当的引起注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威信提高了，这些表现是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但是尚有许多重要工作还极不能令人满意，最主要的是表现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

目前党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党的阶级基础薄弱，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问题：（甲）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到异常的程度。党内的领导机关大多数仍然操纵在知识分子、中农及独立劳动者手中，甚至还有地主、富农分子暗藏在党内指导机关以内，在某些地方表现有党对雇农苦力工人关门的严重状况。一般的状况是忽视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根本问题，很少注意工人运动的领导。

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包办一切的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乙）各级党部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了解，是非常模糊而不正确的。以为要保障党的领导作用是要由党来

包办一切。党办一切的理论，造成政权与群众组织完全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这种现象的来源，仍然是立三路线取消群众组织的残余，同时表现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的遗毒。

支部工作不健全，不注意群众工作的领导：（丙）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的工作很少建立起来，一般的状况，是支部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能在群众中起有组织的核心作用，常常做了群众的尾巴。上级党部一切重要决议很少能传达到支部中去，支部缺乏经常的分工和检查工作，很少努力群众组织工作的领导，这样使党员不能过完善的党的生活。

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工作方式很少转变：（丁）党内生活表现缺乏积极性活跃的状态、固执迟钝的现象，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很浓厚。党内民主化的运用与自我批评的执行，一般的是很缺乏。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在党内与政权机关中滋长，而党又没有正确的执行纪律。各地党部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仍然保留许多旧的残余，没有坚决从工作中去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方式来代替旧有的方式。

教育工作缺乏，忽视理论，形成事务主义状况：（戊）党内教育工作与思想斗争也是很缺乏，一般党员对党的基本主张与重要策略的了解是很浅薄的。还有许多党员不认识党的阶级性，把党看成是工农或穷人党，相信党的个人甚过于相信党的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常识的系统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而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党的发展不及客观发展形势，不注意干部提拔，介绍新党员方式错误：（己）虽然革命斗争是一天一天胜利的向前发展，

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是在不断的增长，然而党的发展却赶不上这一形势。甚至有些地方党员的数量是减少的。特别是对于提拔雇农、苦力、工人干部的工作，许多地方尚表现是消极的形式主义，尤其过去赣东南地方与红军中拉夫式的介绍党员，是非常错误的。

指导机关不健全，上下级关系不密切：（庚）各级党的指导机关，从支部委员会起都是不健全。没有科学的分工，没有建立各部的经常工作。一切工作多半是集中在书记一人身上，缺少集体领导和巡视工作。上级党部对下级尤其是支部工作情形，不能有很深切的了解。上下级党部的关系异常不密切。

党内反革命派别活动仍是一个严重问题：（辛）因为在机会主义时代，党内混进了一批豪绅地主富农成分。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斗争真正深入就动摇叛变革命。加上立三路线的恶果，以及党本身的弱点，造成反革命派别——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在苏区党内政权红军及群众组织中发展的机会，甚至篡夺了一部分指导机关。现在各主要苏区党虽积极领导肃反工作，渐次夺回了党的领导。然而这些反革命派别在党内红军政权与群众组织中的活动，仍然表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健全状况的客观上和历史上原因：以上这些党内不健全状况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现有的苏维埃区域以内缺少广大的无产阶级基础。农村落后的散漫的小生产经济生活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落后的散漫的生活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同时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侵入到我们党里来，以及过去党对革命理论一般忽视，和过去立三路线恶影响，党的组织发展上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等，都是造成党不健全的客观上和历史上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但是党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对国际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作路线的彻底转变，党内缺少思想上及两条战线的斗争，和自我批评发展的不充分。没有充分努力去进行强固党内阶级基础和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任务，这些是造成党不健全状况主要的原因。

（三）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

共产党是阶级先进的领导群众的有严密组织的政党：共产党是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的目的是领导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没有阶级也不要政党了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他必须是先进的时常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向前斗争的，他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绝不是固执落后而随着群众尾巴跑的。他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本身必须有极强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和极严密的民主集中的组织，来担负着正确领导革命的责任。

党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现在阶段中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然而他将来是要领导这一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我们党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要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坚决执行全部工作彻底转变：依据当前革命形势，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与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的斗争，使党能迅速克服这许多困难而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使党得到新的工作上的伟大进步。

（1）强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保障领导作用，绝对不是由党来专政：在现在苏维埃政权仅及于偏僻地区的情形之下，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是保障这一运动绝对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前发展的唯一主要条件。这里党必须认识清楚，保障党与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作用，绝对不是由共产党专政来包办一切，而是要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共产党在这一政权中，经过无产阶级成分和自己的党员来负起领导的责任。

巩固阶级领导不仅是要政治上来争取群众，而且要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要达到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任务，首先就要党能运用明确的阶级路线。不仅要极广泛的扩大党的政纲与策略的宣传，努力动员并领导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在政治上来争取苏区中所有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要加紧工会、雇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工作与政治领导，使党在这一基本群众中——工人、贫农、雇农、苦力——能够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影响，推动他们来参加政权工作，保障政权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关系。

要纠正一部分同志与群众的错误观念：这里党必须与一切动摇阶级路线、忽视工人运动与半无产阶级贫农中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党应当注意，纠正有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和党的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一模糊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就是时常把工会与政权对立起来，造成工人与农民的隔膜现象。这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强固无产阶级领导，是要在一切实际斗争与工作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成为群众所信仰的模范者，才能够真正成为领导广大的群众中的领导阶级。

（2）强固党的阶级基础建立支部工作

党的基础要建立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上，反对对无

产阶级关门倾向：关于党组织上的改造，首先就要注意到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坚决的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上。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党坚决的顽强的执行阶级路线。这一方面是须要彻底肃清地主、富农、师傅、老板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坚决改变干部的成分，尤其是要肃清一切对无产阶级——工人、雇农、苦力关门的倾向，要在斗争中吸引这些成分中觉悟的进步的分子来增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

支部工作必须彻底转变，支部要作群众工作：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必须培养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支部必须负起对于政府和周围群众组织——工会、雇工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反帝同盟、互济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经常的领导的责任。努力巩固党在这些群众中政治影响，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没有这些群众组织的地方，就要领导群众建立起来，要坚决反对支部不管或忽视群众工作和把支部看成是单纯的教育机关的倾向。

(3) 健全各级委员会

健全各级党的指导机关，改变指导方法：建立强固的各级委员会——从省委直到支部——是目前党的组织任务中最中心任务之一。要最高限度提高这些党部委员会的积极性和实际工作的效能。各级党委员会必须有经常科学的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要消灭过去一人包办一切的手工业家长式的工作方式，取消秘书长制度。要肃清党内一切不经过正当组织上的超组织的只信仰个人的现象，上下级党部须建立亲密的关系，下级党部对上级必须经常有口头的或书面的工作报告。上级党部必须切实建立巡视工作制度，经常派人巡视下级党部，检查并实际上帮助其工作。对下级党要随时给以具体的活的（口头的）指

导，改变文字的不落实际的指导方式。

（4）改进党的生活

提高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与党内生活的健全与否是有极密切的关系。以后党应当注意推动党员对于党内一切问题的讨论，提高全体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要注意党的政策上的讨论，使每个党员能够明了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经常检阅党内工作，上级党部必须向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报告自己的工作，引起同志在自我批评精神和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来讨论与批评。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肃清命令主义、通知主义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党的进步与缺点、各种新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消灭一切事务主义，培养自动工作能力，养成生活的政治化。

推行党内民主化，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与超组织的政治自由倾向：要适当的推行党内民主化来消灭委派制度的残余。民主化推行的程度当然要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来决定（如在当地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问题严重情形之下自然是不广泛的适用民主原则），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红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致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红军的同志是应该绝对服从上级军事政治指挥员的命令（如果发现上级指挥员有反革命的阴谋，当然例外）。但一般的情形，以后地方党委员会和红军各级的党务委员会的产生，非在特别情况下，均须由党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经上级党部批准。这一原则，同样要适用到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指导机关的产生。

实行自我批评，防止派别观念与成见和制造派别的倾向：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

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后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务要使每一个对党的路线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反对一切抑制自我批评，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以免除一切背着党表示不满而引起消极怠工的恶现象。在厉行党内自我批评中，同时要防止一切派别的成见和感情的无原则的争论，与攻击个人等不正确足以妨碍党进步的倾向之发展，要消灭一切派别观念或制造派别的企图。要使自我批评成为为着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斗争的工具。

（5）创造党的新干部

坚决提拔干部训练干部，反对动摇这一路线的企图：提拔干部是目前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坚决从下层提拔在各种斗争中表现积极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工农分子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代替旧有不好的干部，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委员会周围，成为党的最好的活动分子。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我们要与地方及红军中一切对于提拔工农干部犹豫，留恋旧干部和形式主义做无情的斗争。这些不放心或以为工农分子工作能力薄弱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企图阻碍工作路线的转变的右倾的机会主义。对于干部的培养，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还须要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经常挑选一部下层积极工农分子去受训练，训练的方式与材料都须要有很实际的充分的选择与准备。

（6）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

加强党内教育，防止两种倾向，注意思想斗争：党内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要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一方面是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

以后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尤其是每一次的斗争之后，必须把斗争中一切经验和教训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实际教育的材料，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引起同志讨论。对于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应当要抓住来做思想上的斗争，使每一个党员能得到正确的阶级认识。

过去反立三路线、反右派及托陈派等类的思想斗争，及国际路线的传达与讨论，是非常的不充分。这一工作以后还须要继续进行。对于反改良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派别思想和理论的揭穿，亦得要引起党的注意。

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中，必须要很灵活的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还须要注意有系统的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为着这一工作，党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办法：（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二）在支部大会或特别召集干部会议，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在各种训练班要按受训练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定出这种问题的课目。（六）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同志应自己看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

书籍。

对新党员必须有特别教育工作：关于新入党的党员，党必须给以特别的教育与训练。一方面是要适当分配以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去使之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须要施行个别的谈话式的和集体的——组织新党员训练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在进党以后的短期中能够了解了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常识。

（7）严紧党的纪律

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是严密并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方法。现在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下级党部与党员对于上级党的决议，应负绝对执行的责任。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这尤其是在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中更加重要。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

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在严密党的纪律当中，必须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产生。第一种，就是假借说服，要防止惩办制度，或是因为感情关系而放松纪律的执行，以致走到根本忽视党的纪律。第二种就是完全不用说服的精神，采用机械的或过分的施行纪律的惩办制度，这种惩办制度的结果，是足以妨碍干部的培养，减弱党员积极性发展的。

（8）建立红军中党的组织工作

实现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条例：以上的原则与方法，同样运用于红军的党部。为要强健红军中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党应当切

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各军党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并指导其工作。中央局对各军党的工作指导亦须经过总政治部。同时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应有明确的适当的分工。这些工作上的划分，是为着培养新的干部，推进一般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工作的效能，绝不是减轻政治委员对军队中所负党与军事领导上的政治责任。

（9）建立健全的党报

反对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要消灭过去党一贯的忽视党报作用，在全党树立对党报的正确观念。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立工作重要的一部分。

党报内容要最大限度的具体指示性：各苏区的各级党部，应当集中力量组织一个党报。党报的论文对于下级党部应带指示文件的性质。所有内容应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指示地方党部如何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以及每一个斗争的策略与方法。应当发表许多斗争的经验教训和新的工作方法。经常提出党建设工作的多种问题，帮助路线彻底转变的执行。但是党报的文字须力求简单通俗，尽量求得能适合党员的需要。

为着建立完善的党报，每个党员尤其是干部，应当负责供给党报的材料与文章，并且要努力负起发行的责任。

（10）建立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领导关系

党只能经过党团实现自己的领导，不应机械占据政权与群众组织整个机关：党对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没有权力直接命令政权和群众组织，尤其是不应当去包办其一切工作。

以后在政权及群众组织指导机关当中，党应当注意引进非党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培养这些分子的能力，提高这些群众干部的积极性。政府和群众组织必须真正经过群众选举产生，绝对禁止党来指定委派的制度。党员不必机械的占据这些机关的最大多数，尤其不须要使全体委员都是党员，而以能够保障党的领导为标准。

建立党团的经常工作：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党团，来保障党的领导。党团应绝对服从所属党部的指示，执行其一切决议。经常保持党团在会议上一致的意见。加紧对于在机关内非党员的政治工作，达到取得多数来实现党的一切领导。党团在每一次政府和群众组织开会之前，必须召集会议准备自己的意见，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加紧对党团的领导工作的检查。

（11）发展党的组织

执行对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苏区党的发展是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党的发展当中，必须特别要执行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地主富农分子完全不能容许入党。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必须有严格的条件。要防止一切投机分子混进党里面来。但是吸收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中先进觉悟分子入党，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在大的斗争之后或重要的纪念节，可举行公开征求党员。

发展组织与扩大党宣传不可分离，新党员入党必须根据自动原则：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宣传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党必须经常向群众解释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纲及当前任务与策略，使工农群众对党有正确的认识，自动要求入党。要绝对消灭赣东南与一部分红军中过去不经过本人同意的正当介绍手续，而秘密拉夫式发展党的方法。对于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

后，必须严格执行候补期。

要注意秘密工作的建立：苏区党在公开存在的条件中，仍然要注意秘密工作的建立。尤其是边区的党要准备随时可以转入秘密工作环境的基础。这就是保留一部干部与同志的秘密，来担负新环境中的工作。

要注意邻近白色统治区域及重要城市中秘密党的建立：根据苏区党执行向外发展的任务，党必须注意赤区邻近的白色统治区域与中心城市中秘密党的建立。同时建立白军中党的工作是目前苏区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党必须选派一部分适宜的干部，到这些地方去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群众的组织。

（12）党团关系问题

过去团的严重状况党没有积极领导是一个重要原因：团的组织与工作比党表现更加严重状况。这种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立三路线执行的恶果，团的阶级基础薄弱，在许多地方曾被反革命派篡夺了团的领导，造成了现在的严重状况。然而过去党忽视团的作用，对团的取消观念，没有积极领导团，帮助团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党应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自己的重要任务，建立党团密切关系：青年工农群众在苏区与红军中的作用显然是增长的，党应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是自己重要任务的一部分。要加强对团的领导，帮助团的工作路线的彻底转变。为着团的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党必须调一部分适宜青年运动的干部做团的工作。

各级党与各级团在组织上必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要切实执行互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制度。

反对党内对团的取消观念：党为着加强对团的领导，首先要给党内一切对团的取消观念以有力的打击，并且须要使党员了解青年运动的重要意义和 C. Y. 工作路线的实际内容与工

作方法。

（四）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防止转变中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党实行全部工作彻底转变当中，可以产生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在发现党内各种不健全状况，因而对党的力量和领导作用估量的不足，走向悲观失望的错误认识。一种是对党的各种弱点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深刻的了解这些弱点的严重意义，因而对于执行彻底转变的路线会要走到消极的怠工，企图继续现有的状况，或者口头承认，而实际不去真正执行彻底转变的任务。另外有一种“左”的不正确观念，就是夸大党的进步，以为这种转变是很容易的事，不了解这些党内不健全状态是有长久的历史根源，必须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与说服，克服一切不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彻底转变的任务。这种任务一遇到转变的困难，同样会要走到悲观失望的前途。

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因此党在四中全会与国际路线基础上来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工作彻底转变当中，要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在目前转变当中，要特别注意与一切悲观失望和估量不足的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不能深刻认识转变中的艰苦斗争的“左”的不认真的倾向作斗争。要反对一切党内和平观念、派别观念与小团体和地方观念的倾向。同时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要坚决反对这种两面派阻碍实际工作的彻底的转变。

防止肃反工作代替两条战线斗争：肃反是当前苏区的重要

任务，然而要防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而阻碍两条战线斗争，甚至于代替了这一斗争的错误。

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巩固党的战线、保障国际中央路线的正确的执行的。党必须坚决的从两条战线斗争中，消灭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发展过程中，由零星的工农游击队伍生长出来，他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了英勇坚决的斗争，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将本身组织壮大起来，成为目前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

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为要消灭中国革命发展，曾动员了很大的反动势力和数十万技术精强的军队来三次围攻我红军及苏区，结果都被我英勇红军配合群众力量冲破了，因此使中国统治阶级更极度的动摇和加速的崩溃，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英勇的红军在这几年的坚决的斗争中表现了他的伟大力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劳苦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要建立强固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一省及几省政权首先胜利，红军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主要力量，所以目前红军一切的建设应该适合于实现这一任务的要求。

在红军中党的路线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如成分的改善，战斗力的提高，红军的扩大和巩固，战略战术的采用，都能渐次实现国际正确路线，使立三路线之下的衰弱的红军逐渐巩固扩大起来，打破了数十万技术精强的敌人，成为目前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力量。

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组织上一般的松散，各工作机关没有精确分工，也没有建立经常工作，作战自由行动，纪律不严明，教育训练不切实加紧去创造技术精强的部队，后方组织工作没有精确计划，更没有深远计划，这些涣散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成为红军中最严重的状况，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绝大障碍。但反对游击主义绝对不是反对游击战术，恰好相反，游击战术要尽力采用，尽力发展。

党过去在红军中是起了领导作用，但一般说来仍然是薄弱的，并且还是不能得到一般的正确和明显的了解，把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看作党在红军中管理一切，将军事和政治机关的经常工作，由党来包办。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党包办一切的结果，将党变成了事务主义的机关，反而放轻了党在红军中的本身工作。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的生活也不健全，党员的领导作用异常薄弱，党的发展很迟缓，党对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也不去加紧，因此不能很紧密的将整个非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种严重情形已成为红军中普遍现象。

红军中军队军阀残余，在过去虽经过坚决的斗争，大体消清，而成为创造工农红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在某些方面仍未彻底消清，如关于管理教育，还不能完全站在阶级路线上及实际要求上去实施，还带着形式主义（如打骂责罚的态度等）。尤其对党及地方政府机关的关系，有些还充分表示像国民党军队对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态度，以为红军是政府的创造者，政府机关应小于红军，没有认清红军是苏维埃政府一部分，政权机

关是工农专政的工具。红军中生活腐化的现象有些还是存在着，到处都有表现。

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在党内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组织上产生了各级党的委员会，这种组织是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过去对于干部的洗刷培养和训练，仍然缺乏明确阶级路线和极端注意，对于提拔和培养工人成分的干部，做得非常不足。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也不能在自己实际工作中加强工作能力，使其工作专门化。这是因为党包办了一切，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工作不能健全起来的结果。对于集中力量有组织的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创造大批干部，提高红军作战的技能，仍然表示过犹豫的态度，这是因为狭义的经验论和小团体观念没有完全打破的缘故。

目前中国革命形势转到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全部崩溃，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更加尖锐化，中国革命高潮猛烈向前发展，这一发展前途必定引起反动阶级更猛烈向苏区红军进攻，但这种形势的转变，是非常利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展。当前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不仅在政治上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地理条件上、经济环境上和群众基础上都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因此，红军一切的建设，必须根据当前和将来作战的环境和任务转变过来，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反对游击主义的传统，建立周密而有系统的

组织，建立科学的分工。大会更具体的指出，在军事政治组织上及提高红军战争力上一切必要的实际办法。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只有立刻健全这一严格集中的指挥机关，才能坚决的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计划与统一行动，才能战胜军阀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达到当前革命任务。

（二）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首先就要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组织与工作。因为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军队中党的生活，应该是为巩固红军战斗力和保证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的。

（三）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应有系统的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健全和巩固党的组织与政治机关系统，才能保证政治工作的实际，才能提高一般政治水平低落的干部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红军战斗力，才能将整个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工具。

（四）红军中主要干部成分要是工人、雇农、贫农以及在战斗中表示最勇敢忠实的革命战士，应尽量提拔和吸引进来。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学生成分要多吸收工人与雇农，在教育上理论与实际应融合起来，以打破单纯的狭义经验论及空谈论调。

（五）加强红军中政治及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为巩固红军战斗力主要条件。在军事训练须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高，特别

要注意特高技能，要有堡垒战、白刃战、街市战、夜间战、射击飞机等的演习。政治教育精神上，须基于军事化、苏维埃化国际化几个重要原则上提高红军的阶级觉悟水平，及将整个红军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作坚决的阶级斗争。

（六）红军编制须统一起来，要开始适合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要根据目前器械地理条件社会机关及作战对象，并以中央颁布红军编制草案为基本，制定统一和适应的编制。

（七）健全各级参谋处组织和工作，尤为目前迫切需要。因为现代火器的发达影响于作战环境异常复杂，而且在战斗条件之下，一分钟时间都有决胜负的意义。如果没有严格的而有力量的参谋处组织和工作，就不能在复杂战斗条件之下组织作战行动和统一指挥。

（八）提高军纪、指挥员威信，为巩固红军战斗力重要条件。红军军纪是建筑在阶级利益上，须以自觉和相当监督精神维系之。红军军纪要于每个战斗员在日常生活上养成坚忍的勇敢、团结的精神。提高指挥员威信，须与加紧对指挥员在思想上、行动上确能做红军的领导者。

（九）应制定颁行红军优待条例、惩罚条例及各种条例。

（十）巩固红军后方组织，就是保证红军后方战线与前方战线的胜利。关于军械军医及一切军需用品，均应精确的统一的而有深远的调查和计划。

（十一）为应付目前作战环境和完成目前任务的要求，各苏区红军须巩固扩大。红军一三军团于最近期内须扩大，至少要增加到一万人。在扩大红军运动中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和招兵买马的观念，应扩大并加紧对独立师及地方工农武装的领导，这样来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到红军中去。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

群众路线的方法，吸收最勇敢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分子到红军中来。为着巩固的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各项任务，必须很坚决的反对红军中一切不良的倾向和思想、游击主义、党的包办主义、事务主义、军阀军队残余以及狭义经验论和空谈论调，这些都是障碍红军巩固发展的坚石，尤其是游击主义为目前红军须要适应于大规模作战中最大障碍。在红军中加紧二条战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重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中央局：

宪法原则要点如下：

一、宪法任务在保证苏区工农民主专政达到全国胜利并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二、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者反革命分子没有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权利。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为全国苏维埃大会，闭会期间临时中执委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下设人民委员会。

四、凡十六岁以上工农兵劳苦民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皆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五、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六、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更使工农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

八、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特权，宣布不平等条约无效，没收帝国主

义的一切财产、企业与租界，目前许可外国企业在遵守苏维埃法律条件下另订租借条约。

九、拥护和参加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责任，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

十、保证工农劳苦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十一、保证彻底实行妇女解放。

十二、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权利，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

十三、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和反宗教宣传自由。

十四、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十五、庇护受反革命迫害的中国民众及世界革命战士。

十六、苏区内劳动的外国人享有法律上一切权利。

十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与苏联结巩固联盟。

望提此原则要点在苏大会通过。全文即补送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

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

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

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

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全世界劳苦民众与各国的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节于江西正式成立了。它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它是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它正式宣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的朋友与同盟者。它的目的是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任何侵掠，而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的劳苦民众与政府宣言：它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与屠杀民众借用的外债。它主张一切帝国主义的租借地都应该无条件的收回，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都应该滚出中国去。尤其为得要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它主张没收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四期。

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劳苦民众与各国的政府宣言：它的最后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但是在目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声明，任何违犯苏维埃法令的行动，立刻会使犯罪者失去一切自由与他们所有的一切财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更认为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的目的，是在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与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众，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坚决的反对任何的秘密外交，而主张外交的完全公开。它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劳苦民众的监督与拥护之下，进行国际间的一切交涉。它将无条件的宣布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一切密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号召全世界劳苦民众起来，帮助并拥护中国唯一的工农兵革命政府，并同他们的兄弟姊妹们在一起，去消灭全世界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走上苏联工农们所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必须声明，它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

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于江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

起来！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全中国造成了贫穷、灾荒、战争、疫疠与死亡！千万万的外债，重重叠叠的苛捐杂税，百分之七八十的地租，高利贷等等一切重担，都加在全中国劳动民众的仔肩上，再加上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种种剥削，使全中国的经济完全破产，使全中国的劳动者失地失业。那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官僚间的不断战争，更加速了这种过程。一切战争的负担，一切战争中所破坏的财产，所死亡的人民又都是我们劳动的民众！

全中国的工人与一切劳动民众们！我们过着的真是奴隶牛马的生活。我们的呼号是没有人听见的！我们的痛苦是没有人怜惜的。当我们的满腔热血，为愤怒而沸腾时，当我们拼着性命起来同我们的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做反抗斗争时，我们就是“反动”，就是“叛逆”，就是“共匪”，我们就遭毒打、杀头、枪毙！在帝国主义

国民党统治下，我们的生命真是蚂蚁都不如。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下，我们是奴隶，我们是牛马，我们只有饥饿，流血而死！

然而这种压迫剥削与屠杀，我们终究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们开始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觉醒了转来。我们开始知道了组织与团结的力量，我们开始同统治阶级做群众的斗争，我们后来知道夺取统治阶级的武装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最后知道怎样起来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建立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了。我们在同帝国主义国民党长期的血战中，我们牺牲了千百万我们英勇的兄弟姊妹，我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毒气炮、毒瓦斯弹、机关炮、机关枪底下遭到悲惨的命运，我们过着艰苦卓绝的生活，然而我们前仆后继，我们奋勇杀敌，我们终究在残酷黑暗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世界中打出了许多光明的红色的区域，创造出了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我们更能在许多胜利的革命战斗中间，召集了我们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

起来！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

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我们工农兵自己的国家！在中华苏维埃中间，我们已经没收了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贫苦的农民；我们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人监督生产，改良了工人的待遇与生活；我们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了统一的累进税，以及种种保护工农利益的经济政策。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间，我们取消了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一切武装力量，没收了它们的一切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政治权利，用武力镇压它们的一切阴谋与反革命，而宣布了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的一切劳动民众的自由平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他们的祖国苏联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打倒造成全世界经济恐慌、贫穷、灾荒、战争与死亡的帝国主义，去永远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只有消灭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我们才能从一切剥削者的铁蹄之下得到解放。在江西瑞金集合的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号召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团结起来与武装起来，去实现这一目的，去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全中国的胜利与巩固而斗争！一切对于统治阶级的希望都是徒然的。必须打倒它们，必须把政权放在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手里，我们才能依照我们自己的希望与意志来安排与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

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或是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所应该选择的！

在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为了苏维埃共和国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怎样在它们灭亡的命运之前，颤抖着挣扎着，怎样利用它们所有的一切力量来压迫与屠杀革命的民众，来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呵！它们更驱使它们的走狗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第三党、AB 团、人权派、陈托取消派等等向苏维埃政权狂吠，造出种种欺骗宣传，要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来“改

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叫我们不要梦想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它们把我们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民众，目为洪水猛兽，它们把我们“赤色的苏维埃区域”描写成为人间的地狱。它们号召全世界的反动力量来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实现它们消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

然而这只是统治阶级与一切它们的走狗的造谣欺骗！只是因为在赤色区域内，不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工农劳动民众的政权，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专政，而是工农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它们这样咒骂着苏维埃共和国，这样痛恨着“赤化”。但是正是“赤化”，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正是苏维埃共和国是我们要建设的。“赤化”的苏维埃的区域，对于统治阶级与一切剥削者是地狱，然而对于我们却是天堂！在白色区域内我们是奴隶，然而在赤色区域内，我们是主人！

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向全世界全中国的统治者声明：一切它们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造谣欺骗，一切它们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都是劳而无功的！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更坚决更奋勇的同江西、两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河南等省的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以及一切劳动民众在一起，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去推翻它们的统治，去争取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起来！全中国饥寒交迫的奴隶们！

起来！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

我们要失去的是锁链！

我们要得到的是全世界！

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江西瑞金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中央苏区中央局：

本年八月你们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现已收到，知道你们已正在开始抛弃过去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非阶级路线的办法，而接受——国际和中央的决议，但这仅仅是开始。在你们决议案中，我们还发现有很多非阶级路线的观点和办法必须立即加以纠正，才能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正落在贫农雇农和中农的手中，而不为富农攫去。现将主要各点分别指示如下：

（一）欲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必先对于中国农民的各阶层有明确的认识，以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他们的态度，因此，中国农民各阶层的定义必须首先弄清。过去有一时期，苏区对农民各阶层所给的定义是以收获量的多少来判别富农中农与贫农，这当然是非阶级的错误观点。在这次决议案中，你们说："只有在革命前，据有较多土地，自己耕种一部分，而以一部分出租或放高利贷及经常雇用雇农的人，才叫做富农"，"中国的富农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所以他们的土地应当没收"。照这样看来，那不兼地主、不兼高利贷、只是经常雇用雇农的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

人，就不是富农，他们的土地就不应没收了。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第六次大会已经明显的指出，凡是剥削一个雇农或一个雇农以上的农民都是富农，不论他们兼不兼地主，放不放高利贷。

你们对于富农的不了解，不但使革命前许许多多的富农逃出了你们的法网，并且把革命后，所有的富农都放走了。因为革命后的富农，依法不能兼做地主，兼放高利贷。在这里，你们无形中替富农做了辩护。

此外你们说："商人不应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应当收回，但这种办法只限于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商人，至于以农为主以商为副则不在此例。"这岂不是说富农的土地不应收回吗？因为富农正是"以农为主，以商为副"的农民！

最后，你们说："至于流氓在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时，可以分得土地。那些已经分得土地而自己不耕种，使土地长期荒芜的流氓的土地，在大多数农民赞成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我们不了解，你们所说的流氓到底是指什么？我们想如若苦力与雇农分得了土地，而你们不去想法帮助他们工具、种子、肥料等等时，他们拿到了土地还是不能耕种，以至土地荒芜。难道这些苦力与雇农都属于"流氓"，以至他们的土地应该收回吗？

这些当然完全是富农的主张！

（二）要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各阶层的态度，还须首先认清土地革命的中心对象是在消灭封建剥削关系与地主阶级，因此，过去苏区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还动摇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私有的观念，以为连他们的土地也要被人没收。现在国际更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也同样含有危险性，使广大的自耕农（富农除

外）感觉到自己的土地也有被人拿出平分的危险。所以正确的口号仍当是去年七月国际对中国问题决议案所指：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祠堂、庙宇、教堂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彻底平分给贫农雇农与中农，这样，才不致使目前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模糊起来，而动摇农民群众的战线。你们这次决议案已经承认把土地分配给乡村中一切男女是错误的，你们更应深刻的认识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同样是错误的；同时你们在决议案中还没批评过去容许租田给地主家属种，也是错误的，而只严禁地主买回土地，并容许他们及其家属“在赤区内开垦”，这仍然是变相的分田给地主耕种的办法与给他们暗中租田的机会。一句话，要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绝对不能再容许地主阶级及其家属在其土地被无偿还的没收以后，又重新与土地关系结合起来。凡有这类的企图，都是给地主复辟的机会，我们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和反对。

（三）根据目前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在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当然不能得出消灭富农的政策，但决议案指出：“只有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革命才可以消灭富农”，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中国革命即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后，也必须进展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时，才能提出消灭富农的任务，这就是说即在革命转变后也还要经过一个过程。苏联十月革命后，富农还有一个时期的发展，中国将来这个过程的快慢，主要的决定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帮助。至“杀尽富农”的口号则与“杀尽资本家”的口号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应提出的口号，这不仅现在提出才是“绝对错误的”。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无产阶级政党对富农的态度是以抑制富农发展为总方针。因为中国富农的特征多兼有半地主半

封建的剥削，故没收他们的土地，但仍可分配他们一份坏的土地，只要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表示当没收时，决不分别谁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谁是仅仅雇用雇农者，而是一概加以没收；当分配时，则须以自己劳动力去耕种为条件而分以坏田，以一律肃清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你们决议案中只有兼地主和高利贷的富农的土地才没收的主张，当然很可给不兼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富农拿来做护身符，避免他们好的土地之被没收，这是一。第二，你们决议案中又绝未提到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只提到没收地主的农具，这又给富农一种回避执行土地法令的借口。第三，你们又肯定说在人口多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平分土地的标准是正确的办法，而且能迅速分配土地。假使在富农家属人口多而贫农雇农多是“光杆儿”，即有家小而自己又因穷困所迫出外谋生一时不能回乡的地方，富农正好利用你们肯定的原则，很迅速依照人口标准平分土地，则结果必致贫农雇农与中农受到损害而富农蒙其实惠。这三点全是决议案中对抑制富农发展的方针有所动摇。

（四）决议案中，再三声明“侵犯中农的利益，是土地革命中最危险的倾向”。不错，土地革命基本的群众是贫农与中农，从无产阶级观点上看，必须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才能使土地革命彻底完成，但不能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便要牺牲贫农雇农的利益来迁就中农，这样，将使贫农雇农愈加无力领导中农，而富农反得从中影响中农。相反的原则，应多抑制富农的发展，在贫农雇农绝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使中农也能多得利益。假使闽西苏区提出“富农中农分坏田，贫农雇农分好田”的主张（原决议文在此处写得不清楚，只能了解大意如此），当然要坚决反对，因这是送中农给富农最好的办法。但你们对巩固中农联盟的具体方法，却是“雇农、贫农、

中农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生产工具等按照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来分给工人雇农、贫农、中农），这里边实包含许多错误。第一，不同的农民阶层绝没有绝对平等可说，同样多而又同样好常常会变成一种空想，否则便要牺牲贫农雇农的利益，因为一个地方的土地大多是有上中下三等田，坏田既给富农，中田又给谁？如上中等田各人都分一点，则既嫌零碎，且事实上亦常做不到。故好田必先给贫农雇农，中农最好是不变更他原来耕种的土地，即使是好田亦然。如他们原有的收获量比平分后的收获量较多（也只能较多，决不会太多，太多便不是中农而是富农了），则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亦不必要他割出，如较平分后的收获量为少，自然应给他补上，则补上的即使是中等田，也仍然与他有利。所以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具体办法应是如此，贫农雇农对中农必须的让步便在不再要他（中农）割出原有的较多的收获量，而好田仍应首先分给贫农雇农。国际东方部对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上，曾剀切说明：中农即使在平分土地时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但他已经免除了地主的佃租（佃农）或军阀政府的田赋（自耕农）以及一切官僚豪绅国防的征发和剥削，这在他已经大大的获得土地革命的利益。第二，如提到分配土地，则不应将工人与贫农、雇农、中农列在一起。如专指分配没收地主豪绅官僚反革命的房屋财产，则应分给城乡的一切贫苦民众，而不应只提工农。森林则又当别论，大的山林应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小的竹林、桑田、茶山以及造纸的树林应照稻田同样分配给农民。至于生产工具，则只能是地主的与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必须分配给没有农具耕牛的雇农与农具不足耕牛缺乏的贫农，即使在分给雇农贫农之后仍有多余可给中农，那却是例外的事。所以将雇农、贫农、中

农聚在一起，平分没收来的农具耕牛，完全是侵犯雇农贫农应得的利益，使他们仍然感受农具不足之苦，而使中农于本身不甚缺乏的农具外（中农之所以能够生活，农具必不甚缺乏，即使稍有缺乏，也必不如雇农贫农之甚），反又多得一份，以便利其向着富农方面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办法。假使你们在分配没收来的农具耕牛时，是主张将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牛都计算在内，合并起来重新分配，这不仅事实难以做到，且将引起广大农民私有观念的反抗和不安。如你们因为某些地方经过战争之后，连中农的农具耕牛都被敌人烧光杀光，故非连中农一同分配不可，但这不能算做一般的原则，尤不能以此当做巩固中农联盟的具体方法。

（五）根据以上各项所指，我们已经看出决议案对于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发展巩固中农联盟所采取的办法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了，而更严重的则是该决议案竟对于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群众——雇农与半无产阶级的贫农，没有一语提到他们特殊的利益，如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所指以好田分给贫农雇农，以没收地主的及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分给贫农雇农，为贫农雇农组织农具经理处与耕牛站，借种子肥料给他们等等。这决不能说法令中已有，决议案中可以不提，因为你们处处以雇农贫农与中农并列，提出绝对平均绝对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反变成以中农为中心，使贫农雇农处在绝对不能平等发展的状态下了。这更加失掉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的阶级立场！

（六）在平分土地问题上，我们既不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在实行上，我们也就不应在决议案上肯定的主张在各地都“应把已经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假使某些地方，中农开始时不愿参加土地的

分配，即使他们每人据有的收获量较多于平分后每人应得的收获量，但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则下，应对他们让步，可以不将他们土地与他们自己加入分配土地的范围内，同时，我们应坚决反对强迫中农拿出他们的土地一同参加平分。总之，没收与平分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土地给他们坏田自种，可以订之于法令，至于平分土地的范围是否包括中农（富农的自耕农不算，因已在没收之列）在内，这要决定于他们的自愿，不能以法令来强迫。

（七）关于平分土地的标准，决议案中肯定以人口为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中央以为这是错误的。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不愿肯定只有一种办法是适当的，而只说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因为我们肯定的是平分土地的原则，应没收富农土地给他坏田自种，分好田给贫农雇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至于分地的标准，应依各地环境在上述的原则之下，看如何能使贫农、雇农、中农更有利便如何办，这点农民自己在他们本乡本土，比我们知道还清楚。至于决议案肯定说“人口过剩土地缺乏”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分配标准，“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才可以劳动力为分配标准，这使我们不能了解。因为国际与中央提出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分配标准，正是为人多地少的地方设想。我们知道人口多的地方，一定是贫苦阶层的农民群众更多，而“单身汉”的苦力雇农与从外边流落回来的贫民当亦不少，即有家属子女的贫农、中农，他们的家属人口亦常较富农为少，富农则几乎人人都有家小，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使他们易于成家。在这样情形之下，如以人口为分配标准，每人可分得收获量三担谷，然而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富农全家的收获量将较原先每人三石谷的全家总和为少，而“单身汉”

的苦力雇农与外边归来的贫民，每人将分得较三石谷为多的收获量，家小人口较富农为少的贫农雇农亦将分得较多收获量，中农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原则下，或者与原先收获量一样多或者较多。至有劳动力的人应分多少，无劳动力的人应分他们的几分之几，而劳动力的标准限制在几岁以上几岁以下，则可依各地实际情形以何者最有利于贫农、雇农、中农为定。所以在我们看来，以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为标准一般是对于贫农雇农有利的。只有在特殊条件之下，以人口为标准，才对于他们有利。但你们的观点却正相反！

（八）关于分地的对象，你们决议案中没有提到对于红军中还有非苏区的农民与俘虏哗变过来的士兵如何办，因为他们大半在苏区是没有家属的，这点在中央上次指示信中已经提到，那种红军公田的办法是在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试行了而有成效的。在白军中当兵士的家属如系农民，我们只能以其家属的农妇地位分土地给他以影响她的丈夫或儿子，不应如红军战士一样，连白军兵士“本人”也分得土地，决议案这种规定是不对的。

（九）综合这上述一切，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决议案与国际中央的决议和法令草案有很大实质上的不同。国际和中央所要实行的是：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及他的家属；凡是富农的土地都须没收，只有在他们自己耕种的条件下才分坏田给他们，富农的多余农具耕牛，也须没收，要分给雇农贫农使用；巩固中农联盟要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向他让步，贫农雇农必须分得好田，要为他们组织农具经理处耕牛站及借种子肥料给他们；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不应提出，在实行上，只有在自耕农（中农贫农）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将他们的土地拿来一起平分，分配土地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

混合为标准。你们决议案中要实行的则是：容许地主开垦，未禁止他们租地，富农只有在革命前兼有半地主半封建剥削的人的土地才被没收而给以坏田自种，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巩固中农联盟是要侵犯贫农雇农的利益，与贫农雇农绝对平等的分得同样好的田，与贫农雇农绝对平均的分配没收来的生产工具及财产房屋；没有专门为贫农雇农谋利益的特殊办法，而使他们附属于中农；分配土地，不仅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并且肯定主张将地主富农及中农贫农土地一起拿来平分，并肯定以人口为分配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实质很明显的，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路线的办法，后者是非阶级路线的办法。因此，你们决议案虽在原则上接受了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声明抛弃了过去非阶级的路线，但这些对立的实质和办法，将完全取消了你们所接受的原则。无怪这一决议案中，一方面承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非阶级的不正确的办法，另一方面却又说“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在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彻底的地方尽量的使贫农中农能够保留其原来已分得的土地”，便十足的表现这一精神！要知江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成绩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他的成绩是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分这些土地，推翻国民党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和巩固工农红军，绝不是在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相反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恰恰是土地革命进行中一个富农路线的办法。至于所谓“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彻底的地方，无论他怎样彻底，贫农总还保有他们所谓少的瘦的那块土地，不过另外加了一些多的肥的，以与富农所保有的没被抽出的那块肥田在收获量上相等。现在要贫农中农保留其原来已分

的土地，等于给富农一个机会讨巧而不变更他们保有的那份肥地。

所以这一决议案与国际决议及土地法令同时发表，必将给富农以更多便利来曲解和不执行国际决议和土地法令，来攫取土地革命的果实，以影响中农而更加削弱贫农雇农的力量。中央要求你们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改正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办法，重新成立决议，使目前苏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能毫无修改和曲解的在群众中彻底执行。中央相信你们有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勇气，必能坚决的毫不迟疑的顺利的达到这一任务，领导苏区广大群众和工农红军好更有力的开展土地革命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一、一一、一〇

附：关于“移地”的事业，我们不甚了解，故未加以批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的经济危机，在日益剧烈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之下，空前的扩大与深入。农村的经济空前的崩溃，工商业的衰落与大批的工厂关闭，普及全中国的水灾，以及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搜括与剥削，造成了大批失业失地的工农群众，使他们的生活日益陷入绝境。全中国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形之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尤其表现得明显。但中国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开展，当然也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指标。

从党的四中全会以来，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显示以下的特点：

（一）罢工斗争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反对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斗争日益剧烈，目前正在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

（二）罢工斗争的反攻中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这在最近的斗争中更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三）罢工斗争包含了整个产业（丝厂）及各主要产业的工人（上海市政、纱厂、印刷、北方铁路、矿工及纱厂工人）。

斗争一开始就带有几个工厂同盟罢工的形势，而且在许多产业部门正酝酿着同盟罢工；

（四）斗争大部分还是自发的经济的猛烈的发动，还缺乏持久性与组织性。

因为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危机的成熟，一方面推动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同时使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更加残酷的使用暴力来压迫工人的斗争。主要的在以下的事实上表现出来：

（一）国民党使用强迫仲裁与工厂法、工会法来压迫工人阶级，几次命令禁止一切“劳资纠纷”，逮捕争斗的工人。

（二）资本家使用开除政策（整个的部分的开除罢工工人）来对付罢工，要求工人赔偿罢工、怠工的损失，日本资本家更以关厂政策对付工人。

（三）国民党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到处收买流氓工贼，在企业中组织法西斯蒂队伍，分裂工人的战线，鼓动工人起来械斗，利用失业工人及灾民来破坏罢工。

（四）在工厂配置武装厂警，施行严格的搜查，架设机关枪，实行在工人区域戒严。

（五）在“一致对外”及“增加生产”的口号之下，加重工人工作，减少工资，进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在“退职”的口号之下来反对工人的反日罢工，解散罢工工人，禁止工人的“非法行动”，枪杀游行示威的工人。

国民党资本家这些压迫的政策，是直接在黄色工会的积极拥护之下进行的。黄色工会拥护国民党资本家进攻工人阶级的一切政策，与国民党资本家及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来压迫工人的革命斗争。因此，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信仰大大的缩小，主要的倚靠工厂中的法西斯蒂队伍及国民党的警察维持自

己的地位。同时，因为国民党内部斗争加紧，黄色工会的派别斗争也剧烈起来。改组派正在想利用工人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利用工人的经济斗争，进行欺骗群众的工作，企图握取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打击蒋介石派。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右派，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严重进攻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应该罢工，也就是和黄色工会一样帮助统治阶级来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仅仅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赤色工会是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组织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进攻。党和赤色工会在最近的工作中得到了以下的成绩：在几次反帝示威中提高了工人的情绪，党的政治影响在工人中扩大，有些企业中增加了党员及工会会员，并团结了部分的工人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始建立了工厂委员会；领导了一部分的罢工斗争，组织了一些工人的反日会、义勇队及辅助组织；在工作中开始运用公开工作的方式及下层统一战线等。

但是党和工会组织还是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还非常不够，还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有：

（一）在组织反日罢工中充分表现我们组织的无能和不积极，不会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口号联系起来动员群众，许多日本企业的罢工与辞职没有去领导，使罢工还没有成为目前反帝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成绩极少，缺乏有计划的耐性的准备，很少去领导工人的自发罢工。甚至有人说，工人只有在组织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之后，才能举行经济罢工。同时赤色工会又不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已得胜利。

（三）赤色工会在企业的组织非常薄弱，尤其是各重要产业部门。缺少经常工作，不能将企业中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大多数群众。散漫和会员的流动现象还没有消灭。

（四）空有庞大的上层工会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雇佣化与对工作的敷衍以及悲观消极和清谈的现象，还非常严重。没有将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企业里面。

（五）不了解工会工作的中心是解决工人切身的日常问题，不会利用工人的切身问题来联系到党的主要任务，常常使工会的工作与党的工作完全一样，用建立党的方式来建立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不善于运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去接近和领导群众。

（六）不会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没有组织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或者由少数赤色会员推举罢工委员会，脱离广大的群众。不会利用公开并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

（七）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建立有力的革命反对派，不愿在黄色工会的群众中去工作，不注意研究黄色工会欺骗群众的方法，并拿住每一个事实来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同时投降黄色工会的倾向还时常表现出来。

（八）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忽视建立工会和参加工会工作的重要，许多工厂的同志不加入工会，认为建立工会仅仅是工会工作人员的事。

（九）对于失业工人运动及青工女工工作一般的忽视。

（十）在苏区的工会工作，在有些主要区域内（如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有些苏区内（如中央区、湘鄂赣苏区等），一般的是忽视了工会工作，工会还是空洞机关，没有领导工人争斗及大大的改良工人生活，甚至劳动法及八小时工作也不能充分实行，并有认为在战争紧急

时期必须放弃工会工作的理论。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就是使党和赤色工会落后于客观形势的主要原因。

党为着完成自己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成为目前反帝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及完成土地革命而斗争，就必须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使这些斗争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消灭党和工会在职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保证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完全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力量来迎接当前的伟大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需执行下列各项：

（一）党与工会的组织应以极大的紧张和毅力来组织反帝国主义罢工。开始发动那些中心日本工厂，利用日本资本家的关厂政策来组织工人的进攻。努力使罢工扩大到一切工厂，同时反对国民党并竭力拥护工人的本身利益，使工人的经济罢工与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密切的结合起来。应坚决反对国民党借口“救国”来禁止“劳资纠纷”，反对资本家借口“提高生产”来进攻工人阶级。应广泛的利用公开来建立广大工人群众的反日组织，应很好的答解工人对罢工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救济费等）。同时应宣传只有工农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才能战胜帝国主义。

党和工会应采用各种方法去领导那些反日的自发罢工与辞职，使工人的行动转向积极的有组织的斗争。

（二）党和工会组织应集中力量来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这是夺取工人群众到党和工会周围所必须拿住的关键。赤色工会及革命反对派应在群众的经验中去证明自己是群众切身利益最忠实的拥护者，与黄色工会的欺骗、拍卖和背叛完全不

同，证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不只是对远大的政治问题有办法，并能使群众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那里得到一切切身问题满意的回答与解决。这是吸引工人的自发斗争来寻找赤色工会领导的最好方法。

党和工会的组织应使自己不落后于群众，就应经常查明和表白群众的情绪，把群众的不满变成简单明了的要求，时时都准备来领导群众斗争。

应提出各产业部门的要求纲领来准备每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扩大工人的每次罢工，组织群众的“同情运动”，来发动同盟罢工。同时赤色工会还应该动员自己的组织及在自己领导之下的工人去援助自发罢工，用写信、慰劳、招待、派代表、组织后援会等方法与罢工工人发生联系，在刊物和印刷品上向罢工工人作各种提议，用这些办法去扩大自发罢工并给以领导。

（三）党和工会应该用种种方法使罢工政治化，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的罢工。我们的组织应该在罢工进程中提出各种为工人群众所了解的政治口号（如反对用军警压迫工人罢工，反对把机关枪架在工厂门口，反对公安局捕人）来使罢工政治化。应该组织群众来反对禁止罢工、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工人团体及封禁工人报纸和搜查，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等的自由等，反对国民党的仲裁调解，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一直到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直接斗争。只有忍耐的经常的向工人群众宣传我们的政治口号，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使工人群众在自己经验上了解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我们的口号才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拥护，才能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为了我们的口号而斗争！

（四）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必须广泛的运用下层统

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应基于下层群众的共同要求（首先就是工人的切身要求）上建立起来。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应该普遍成为领导斗争的组织形式，应该号召全体工人或大多数工人来选举罢工委员会，使罢工委员会一分钟都不要脱离群众。秘密的赤色工会应依靠自己在罢工委员会的小组来领导罢工委员会，完全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黄色工会有力量的企业中，更必须采用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方式来夺取经济斗争的领导权，努力使这些委员会脱离黄色工会和国民党来独立领导。

（五）应该努力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利用各种可能来征求会员（尤其在罢工时期），召集赤色工会的代表会，建立各种产业委员会等。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应该把工会工作放在工作日程的最重要地位，尤其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党的支部就应该担负建立工会组织的责任。

党和工会应集中力量克服一切的困难，在铁路、海员、五金及重要矿山中工作，建立组织，夺取这些重要产业下面的群众。

赤色工会应利用一切的可能跳出目前的秘密状态，应组织群众的力量来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利用罢工委员会在结束的大会上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在可能时直接把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群众的赤色工会。利用各种临时紧急问题（如大的罢工，目前的反帝高潮等）来召集各种工人团体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联合的组织。赤色工会组织应积极参加这种联合的组织握住领导权。

（六）党和工会应在各地建立各种公开辅助组织。这些组织应适合群众的需要，经过党员和会员在群众中去发起来建立。应在这些组织中扩大党和工会的宣传影响，吸收党员和会员，并利用这些组织来帮助工人的斗争。

（七）为着与被收买的流氓工贼及法西斯蒂队伍作斗争，应组织罢工纠察队及工人自卫队。应利用目前工人对于武装的迫切要求，利用各种公开的名义来普遍的组织工人的武装队。

（八）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主要任务之一。应采用各种方法和步骤去进行。切实推动在黄色工会中的同志和赤色小组去工作，训练他们的工作方法，在与黄色领袖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征取群众。联合赞成赤色工会纲领的工人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反对派应在每次斗争中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利用各种事实揭破黄色工会的纲领和欺骗。当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就可以从黄色工会分裂出来。

党员和赤色会员参加黄色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只有群众选举的才允许），主要的目的，是在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而说话，是在不断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并揭破黄色领袖们的欺骗作用与他们的出卖行为，把群众夺取到赤色纲领之下。党和工会对于被选者应有严格监督与领导。他们不应脱离企业，不应领受国民党的津贴。

（九）应该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取消派、罗章龙派等等。在斗争中揭破一切这些派别的阴谋与欺骗，指出他们反对工人阶级、投降统治阶级的实质。这一斗争在目前尤其重要。

（十）应特别注意组织失业工人运动。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用各种方式来组织和帮助失业工人。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来解决目前切身生活问题，向政府和雇主要救济，住到空着的和公共的房屋中去，联盟不交房租，自动分配公共的和私人的粮食等，组织失业工人及一般失业群众的示威。使失业工人运动与在业工人联系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收买。反对关厂，反对资

本家的开除政策。应宣传工人失业的原因和出路。应向工人解释水灾的原因及其与工人生活的关系。号召工人援助灾民的斗争，使失业工人运动与灾民斗争打成一片。

（十一）整个组织应重视青工女工工作。在青工女工中发起组织读书会、体育队、音乐队、儿童团等。召集青工女工代表会，在斗争中提出青工女工特殊要求并联合全体工人为这些要求斗争。号召青工女工加入工会及纠察队等。加强对青工女工的教育，组织特别的训练班。还应在工人家属中工作。

（十二）应注意建立工人的报纸、工厂小报及画报等。拿住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切身问题和斗争问题来讨论分析。注意揭破黄色工会纲领及国民党的武断宣传，组织大批工厂通讯员并教育工人投稿。使报纸大部发行到工人中去。应宣传苏维埃区域及苏联的工人生活，宣传苏联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人的关系。

（十三）党和工会应将一切工作重心放在企业里面，坚决执行“面向生产”的口号。应帮助得力的同志去参加生产，经常检查支部，派最有经验的同志指导支部工作，从企业中培养大批干部。短期训练班应普遍到许多工厂、矿山，并提拔新干部到指导机关负责。

应与工会会员的流动性作斗争，就应该建立工会生活，使企业中的组织有经常的实际工作，绝不允许到支部中清谈。应极力缩小工会的上层空机关，把工作人员分配到企业中去，消灭工作人员的雇佣现象。

（十四）应该加派职工运动的干部到苏区，严格训令苏区同志执行国际中央和全总对职工运动的决议，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和改组苏区的工会，发动工人斗争来大大改良工人生活，实行劳动保护法，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救济失业及社

会保险等。在苏区应训练大批的工会干部，尤其注意雇农工会的组织和建立。在战争紧急时更应加紧工会工作，经过工会发动群众来参加战争。

在国民党的后方应动员群众来援助苏区和红军，扰乱国民党的后方，破坏军事交通等。应在工人中组织“红军之友”，募捐慰劳红军，征调工人到苏区和红军。

（十五）为着执行上述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保证工作方法和方式的彻底转变。尤其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各种黄色倾向，投降黄色工会的主张，和平合法的观念及消极不动的情绪，与清谈、敷衍的现象。每一具体的错误倾向，必须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教育同志。应尽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具体化，并且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湘赣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湘赣苏区省委：

中央接到你们十月二十六日给中央苏区党中央局的工作报告，虽是因为没有其他材料，不能很详细的了解你们那边的情形，但即根据这一报告，中央认为有给你们指示信的必要。

最初中央必须指出，湘赣省委在它两个多月短时期的工作中，的确能够执行了国际与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各方面的工作得到了相当的转变。尤其是在反对AB团与改组派的斗争中，它能够很坚决的迅速的把那些反革命分子从党、团、苏维埃与红军等领导机关中清洗出去，给了他们的领导组织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中央更必须指出，湘赣省委在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中间，还有很多的缺点与错误。这些缺点与错误除省委代表大会在自我批评中所指出的之外，中央认为有些中心问题是值得省委以后特别注意的。

一、中央认为省委对于发动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反富农的斗争，未发动广大的雇农贫民群众，来重新分配土地，来改造党、团、苏维埃，来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的了解与努力是不充分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许多工作在许多地方表示从

上而下的、和平发展的、党包办一切的现象。自下而上的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来，一直到现在下层群众还不能充分了解土地的分配、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肃反工作的进行等等，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党或者红军的赐与，而等待党与红军来替他们改善生活，替他们寻找他们的出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虽是工会会员有统计的已有一万三千余人，贫农团团员有二万余，互济会有五万余人等等，然而这些群众很多都是登记式的加入而不是在斗争中加入的。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也比较的薄弱。所以怎样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发展反富农的斗争，怎样把这一斗争同彻底改造党、苏维埃与红军等的任务，怎样把已经有的群众组织积极化，把它们的工作建立起来，更密切的联系起来，应该是湘赣省委工作中心的中心。

二、中央认为，省委在完成国际予我们三大任务之一的任务上，即使苏维埃政府真正成为千百万工农群众所拥护的政权的这一任务上，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你们自己在报告上说："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还是不好，群众对苏维埃还没有认为是自己的政权机关，有些地方（如遂川）群众还有些怕苏维埃"。固然，这里有许多是过去党内 AB 团、改组派反革命分子与党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的残余，然而有很多地方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够把苏维埃的工作深入群众所致。苏维埃所做的工作还不过是打条子做招待的事情。苏维埃还没有能够经常的替工农群众着想，如何来具体的改良他们的生活条件，如何能使他们取得到土地、增加生产，如何能使劳动法更彻底的实行出来（甚至关于劳动法的实行程度，就是你们在这样冗长的报告上也一字未提）。只有真能为广大工农群众谋日常的实际利益，

而不是空洞的叫喊，群众才会相信苏维埃，拥护苏维埃，并积极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不然，苏维埃自然变成像你们所说的空洞的找不到出路的机关了。这样的机关，群众至少亦不过“敬而远之”地了，要变为工农兵群众自己的政权，当然完全是空想！

三、中央从你们的报告上觉得，你们在湘赣苏区目前所执行的只是土地法（当然这一法令还执行得非常不彻底！），至于“劳动法”与“经济政策”差不多完全没有执行！这实是不能允许的错误。关于劳动法你们根本没有提及，我们现在不去讲它。关于经济政策，则从你们的报告上可以看出你们没有征收累进税，没有设立工农银行，苏区内部的纸币是不统一的，你们也没有想利用各种方法，使你们那里的剩余粮食同白色区域发生经常的商业关系。

中央责成省委用很大的力量，坚决的去实现劳动法与经济政策。省苏的工作必须有计划的建立起来。省苏下必须有军事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劳动委员会等，去负责在省苏常委的指导之下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与政策。比如你们报告中说及你们苏维埃的用费与红军的给养没有办法，然而你们的统一累进税却没有征收。这里表示你们苏维埃是没有工作，没有想出具体的方法去解决这些困难问题。所以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设立是必要的，它应该经常的计划如何去开源节流，如何去把苏维埃政府的负担放到剥削阶级的肩膀上，如何使财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它必须最坚决的去督促各县苏也成立同样的委员会，使他们同样的能够经常工作。中央相信，在比较富足的湘赣苏区，这些困难，只要能够坚决的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都是容易解决的。对于其他问题，也是同

样的情形。

中央必须告诉省委与湘赣的全体同志，只是把苏维埃的成分改变，决不能使苏维埃变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的政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苏维埃真正能够为了他们的利益，具体的去解决民众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的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必要的，但只有在我们能想出具体的办法来实现这一路线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执行了这一路线。

四、在使红军变为铁军的任务上，你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红军内部政治教育工作。没有这一工作，我们没有办法使红军士兵真正能够拼着性命的去为了苏维埃政权的扩大与巩固而斗争。湘赣的党必须用全部力量把这一工作建立起来。

其次，你们必须用很大的力量来扩充你们的红军，在这样大的区域中间××以上的枪支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这在说明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能够……而且只是经常的在防御战中间，应付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赤色区域是经常的在各种地方武装的骚扰与威吓的中间，没有法子更进一步的巩固起来。

中央责成湘赣省委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与巩固红军。这里依赖中央苏区的供给是不行的，这里需要能够动员湘赣苏区的工农群众，动员党员与团员等，自愿的去加入红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工作，而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只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反富农的斗争，分给红军士兵以良好的土地，苏维埃能够负责给红军耕种他们的土地，订出优待红军士兵的条件等等，广大的工农群众才肯大批的加入红军，为了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至于组织慰劳队、洗衣队、群众的欢迎大会等等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认为湘赣的党必须在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巩固苏维埃与红军的基础之上，把现在几个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努力消减在苏区内部的白色分子与一切挨户团、靖卫团、守望队等反革命的武装。必须要做到不是豪绅地主的武装向苏区经常的游击，而是我们的游击队到白区游击。只有这种向外发展的进攻的策略，经常派出我们的游击队在白区游击，我们才能保证反革命武装不来侵掠，保证春耕与秋收运动的安全。同时为得要达到这一目的，你们必须扩大地方的武装。

（略）

五、湘赣苏区内部所以有这样多的白色点子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由于你们对于白色区域工作的完全忽视。在白色的城市中间，在苦力工人、运输工人、煤矿工人中间，我们的基础是十二万分的薄弱，我们没有丝毫的计划去布置我们在那里的工作，我们对于农民斗争根本没有去加以领导，以致敌人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向我们苏区的腹地进攻。中央认为这种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湘赣省委必须用很大的力量来转变这一工作。只有经常的纠正加紧这一工作，发动白区的阶级斗争以及游击战争，我们才能顺利的使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在白色区域工作的布置上，中央认为你们应该集中力量注意赤白交界的以及赤区与赤区间的白区工作。你们首先应该向那里的工农群众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利用你们的游击队发动他们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帮助他们分配地主的财产与土地。我们的任务不是到白区去抢夺农民地主的财产粮食，而是帮助那里的农民去抢夺地主的财产与粮食。只有这样，我们的势力才能很快的扩大出去，才能逐渐使白区的工农群众为了苏

维埃政权而斗争。

白军中的士兵工作，你们也是完全没有注意。这里你们必须尽量利用俘虏兵士，训练他们，教育他们，然后把他们派往环绕苏区的白军区去瓦解这些部队。同时要尽量扩大对于动摇着的白军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拖枪到红军中间来。

六、在肃反工作上，虽是你们已经得到不少的成绩，然而你们这一工作还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你们还没有能够使广大的工农群众了解AB团与改组派的罪恶，积极的起来帮助我们做这一工作。根据你们的报告看来，在各种组织中还有不少这些反革命分子潜伏在中间，等待与利用任何一个便利的机会来进行反革命的工作。中央认为要使这一工作深入下去，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加紧肃反的工作，把一切腐化官僚主义的异己分子从党与苏维埃等机关中清洗出去。一切和平的状态是最便利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发荣滋长的。

此外，必须加紧反对AB团、改组派的思想斗争，揭破他们一切欺骗与反革命的罪恶。当然同时政治保卫处的工作也必须加紧（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阅中央关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别的斗争的决议）。

七、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你们能够依照苏大会的土地法草案去执行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只是你们还没有能够充分的把这一决定去执行，当做斗争的任务，而表现出许多和平的命令的不正确的倾向。但是农民单是分得土地还是不够的，苏维埃政府必须具体的能够想出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雇农与贫农能够从他们分得的土地上得到实际利益，想出种种方法，如耕具站、耕牛站、借贷等，帮助这些贫苦

的农民。

关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中央认为这只有在不妨害中农的利益，在中央赞助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为了保持与中农的联合起见，我们最好以不动中农土地为原则。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告诉我们，中农一般的是反对拿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的。

你们那里以人口与劳动力为混合原则来分配土地，是完全正确的。最近接到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上面反对以人口与劳动力为分配土地的原则，原因是他们那里人多地少，而且依照人口分配比较迅速。中央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一般的说来，总是雇农贫农家庭的人口少，如以人口为标准，自然吃亏的是他们了。同时决议案上说贫农、雇农、中农在分配土地与生产工具时，应该绝对平等。中央认为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原来雇农贫农同中农是不平等的，绝对平等的观念当然是对雇农贫农有损的。中央认为苏维埃政府应该特别注意雇农与贫农的利益，使他们从分得土地上得到实际的利益，决不会像中央局所说的那样会破坏同中农的联合（中央关于这一决议案将有批评给中央局，同时也分送给你们）。

中央重复的说苏大会的土地法草案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该更坚决的去执行这一法令！

八、要完成上述各种任务，当然必须要更有活动力，更能同工农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更能为了国际与中央的正确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在这里中央必须指出，省委的集体领导还没有能很好的建立起来，省委委员都忙于奔走，忙于做其他的工作，但对于形成党的领导的中心上是做得非常不够的。

中央认为省委常委的同志，虽是可以兼任其他的工作，但他的主要的工作应该在省委。党是苏区内苏维埃、红军、工会等一切组织的领导者，没有这一领导的中心，决不能使其他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省委常委的同志应该停留在省委的所在地，决不能各人跑出去巡视，或去做其他的工作，而使省委本身的工作完全停顿。然而你们甚至于把你们的秘书长也拿出去做巡视员了，那请问你们省委本身的工作在那里!？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现象!

你们党的工作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你们没有能够发动下层党员同志的积极性，你们路线的转变还停留在上级干部上面。要消减这种缺点，你们必须发展自下而上以至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尽量发展与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去严厉的打击消沉、失望、畏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以及左的清谈与关门主义等。在这些为了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的工作上，你们是做得非常不够的!

此外，你们为得推进工作的进行，为得要使工作深入与具体化，必须经常实行工作的检阅。你们不但要检阅党的工作，苏维埃的、C. Y. 的、红军的、工会的等等，你们都应该详细的去检阅。指出这些工作的错误与缺点，提出改进这些工作的具体办法，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推动各方面的工作，使工作很快的向前发展而不至停留在旧的水平线上。必须了解工作的检阅不是节期式的运动，而是党的经常工作的有机的一部分。

九、干部的培养问题应该是湘赣党最大的任务之一。在目前干部的缺乏，不但在湘赣苏区是如此，即在其他苏区与白区也是如此。所以干部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中级与下级干

部，应该是各地党部的主要任务。你们必须在斗争中，在工作中，大胆的经常的提出积极的工农干部来担任指导工作。在省委下面必须设立经常的各种工作人员的训练班，来补充干部的不足。同时必须同留恋悲观消极的旧干部、惧怕提拔新干部的机会主义倾向做斗争。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造成苏区内部干部的自给。中央在可能时，当然还可供给一二高级的干部给你们。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　央

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及其强盗集团——国际联盟告全国革命民众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全国工农及一切革命民众们！

东三省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及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反动行为，已经更大踏步的前进了！两月以来，日本强盗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帮助之下，已经由掠夺奉天、吉林更进而占领黑龙江，由蹂躏东三省更进而践踏平津沪汉各地民众。现在不但东三省已经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全国各地除苏维埃区域之外的革命民众都已更加惨受奴役宰割的痛苦了！

不但如此，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实际步骤，同时亦因日本侵略政策之猛进而更着着迈进。事实上现在中东路已被日本野蛮截断，各帝国主义强盗对于苏联的挑衅侵袭已经更加公开的进行了！最近法美的联欢，英国政府之改组，尤其是所谓“新道威斯计划”与“远东罗加诺公约”之风传，都在在证明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之积极进行。

在这紧张局面之下，国际联盟之实际作用也就更明显，他

们屡次的集会，屡次的撤兵决议，其目的都在利用日本的进占满洲以便趁火打劫的来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与企图用新的封锁及战争去消灭苏联。因为各帝国主义相互之间虽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它们对于进攻苏联与干涉中国革命却是一致的要求。而且正因资本主义的世界无力排除它们自身内部之矛盾，更不得不另辟蹊径，用国际联盟之类的组织及把戏，以图达到它们干涉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革命运动及消灭苏联之最大目的。最近英美法日等列强对东三省事件之一切阴谋把戏，都逃不出这一范围。过去国际联盟两次限期撤兵的决议，都已完全拆穿西洋景，如今它们更公开组织什么调查团来“考查中日纠纷”了！这也就可证明国民党政府（无论南京或广东）所谓“信赖国际联盟公道解决”，完全是在赞助帝国主义之殖民地政策，与实际拥护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之一切行为。

全国工农及一切革命民众们！

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战争与瓜分中国已经实际开始，国际联盟及一切非战公约的西洋景已经完全揭穿，中国各派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面目亦已公开暴露，我们不能够再忍耐了！我们要驱逐日本强盗，从一切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得中国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工农劳苦民众的彻底解放，就必须立刻自动组织并武装起来，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明灯照耀之下，实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呵！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三省！

反对国际联盟的中立调查团！

反对瓜分中国的新道威斯计划！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各派国民党！

拥护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的通令*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朱德、彭德怀、王稼蔷[1]、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2]、关向应、王盛荣十五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蔷、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蔷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二、本会已经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组织成立，同日开始工作。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暂行设立如下各机关：

总政治部；

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

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

军医处——处长贺诚；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

---

* 这个通令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

三、今后，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中各工作部门的建立，经常工作的进行，及相互间密切的联系，都应该立即建立起来。因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中各级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机关在正确关系之下，要有经常不断的各种报告与指示。

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各直属军对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级政治部对于总政治部的各种报告，各级参谋部、各级经理机关、各级卫生机关相互间的各种通报，在今后必须要严格地进行。这样才能使红军全部生活好像血脉非常流通似地活跃起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2〕即徐向前。

PDG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陕西省委：

根据巡视员的报告与你们带来的一些材料，中央对于你们的工作有以下意见指示你们：

中央认为，你们与巡视员共同成立的中心工作决议案在路线上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因为它开始了两条战线的斗争，规定了党的主要任务，将陕西党部由过去右倾机会主义与五次全会后到六次全会的调和路线转变到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并且实际执行了巡视外县的工作与开始注意西安市工作的建立，能够实际去参加并注意领导一些群众革命斗争，如西安印刷工人斗争与蒲城盐车工人斗争等，证明确实有相当的进步。但是中央也不能不更严重指出，你们所有这些进步以之与革命形势发展客观的要求相比，显然表现出还非常落后，尤其是你们最近几日来的工作表现证明不仅没有充分执行夏季中央给你们的指示，而且你们自己所决定的工作计划大部分都已落空。这自然有种种客观的困难，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你们的消极怠工，缺乏执行工作的积极性，只在口头上纸面上接受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没有在实际中如何来执行这些指示，从你们九月十五日的来信的精神看来，这一现象尤其表现得明显。你们只会推托省委工作人员不够，而不肯艰苦的去训练同志，只晓得

责备工人同志在斗争失败后动摇自请出党，而不肯更深一层的研究出所以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教训，只会对困难屈服，而不能艰苦的去设法克服困难。结果国际与中央路线，你们也只是口头上接受，事实上很少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客观上群众斗争尽管迅速发展，但我们陕西的党却很少能够真正抓住这些斗争以发展我们的工作，而反成为群众的尾巴。这便是陕西党部目前主要的错误与弱点，怎样在具体工作中去克服这些错误和弱点，实是你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现在政治局势的特征，便是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实际步骤又更推进了一步。最近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更极力在巩固他在满洲的殖民地统治，另一方面更拼命向北满、蒙古与关内进攻。他的目的就是想在更积极进攻苏联的前提之下，以缓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完全实现他对北中国的掠夺霸占。同时英美法帝国主义也更积极在加紧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最近巴联会议与所谓“新道威斯计划”及“远东诺卡洛公约”等，都不外这一阴谋。在国内，则苏区与工农红军革命战争又取得了新的胜利，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已经成立，城市工人斗争与灾民斗争及反帝国主义运动都有新的发展，全国革命条件更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崩溃破裂，所谓宁粤和平统一会议已经变成一幕滑稽剧，新的军阀混战又在积极准备之中。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绝不能因此以为国民党不会再去“围剿”苏区与红军。恰正相反，国民党因为革命愈发展，对于他的统治危害愈大，便更积极实行镇压革命，更残酷的去进行“围剿”红军。因此目前我党的中心任务，很明显的就是加紧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动员广大群众斗争力量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滚出中国，反对

国民党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与红军的新企图，拥护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各种动派别（国民党各派——改组派、第三党及新月人权派、国家主义派、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等）及一切改良欺骗，加紧组织工农灾民斗争，汇合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灾民斗争、工人运动等各种革命浪潮，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你们目前应在上述中心任务之下，更实际的转变自己的工作到实际斗争中去，就是说你们应该把上述中心任务更具体的在陕西去运用出来，以建立陕西党新的生命。现在根据陕西具体情势与过去工作缺点，中央更指出你们目前具体工作方针如下：

（一）首先你们应该抓紧目前陕西群众斗争，尤其是反帝斗争开展的条件，更实际的走进群众之中去。不要望着西安市印刷工人斗争失败就灰心，以为工作就没有办法。相反的你们正应该深刻研究这次西安市印刷工人与修械局工人斗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要克服你们自己现在这种灰心失望的失败情绪，深刻的去了解这次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更积极的去做群众工作，艰苦的去告诉群众这次斗争为什么会失败，以后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而且要把蒲城盐车工人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消息与经验告诉广大群众，以鼓舞他们斗争的情绪。事实上，现在西安市西安日报社工人反对工头与增加工资的要求，文化日报社工人发清欠薪的要求，及修械局工人反对官长殴打学兵、增加工资的要求，都没有能够达到目的，而且一定还要其他种种日常要求及不满情绪，这些便是我发动他们作第二次斗争的基础。群众在失败之后，因为敌人压迫的加紧，自然难免有些害怕心理，例如印刷工人同志自请出党等。问题就在我们要艰苦的去接近他们，采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去宣传组织他们，以打破

他们害怕的心理，恢复并提高他们斗争的情绪，逐步提出能够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的经济的与政治的要求，以发动他们的斗争。关于蒲城盐车工人的斗争，主要的是要抓紧他们这次得到初步胜利的条件，以进一步提高他们斗争的要求，打破他们告状的幻想。同时我们不应该只限于经济斗争，而应该将经济斗争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目前更重要的是要迅速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赤色工会与党的基础，以强固群众斗争的力量。

（二）加紧农民运动在目前尤其重要的就是组织灾民斗争、冬荒斗争。你们现在对于这一工作的消极态度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据巡视员的报告，现在陕西有广大饥寒交迫的灾民，一方面大批的饿死，另一方面便是成批的去当土匪，而我们陕西的党部始终没有注意去开展工作，这是极大的错误。再则据省委巡视渭蒲同富的报告，更可看出陕西党在各地农民运动中的富农路线简直还非常浓厚。虽然省委巡视员报告中讲了很多要反对富农的话，但实际上就是在省巡视员直接指导之下，他们的策略也仍然被富农路线所支配。不但渭南蔡郭村农民与官人算账的斗争直接在富农领导之下，结果一方面富农领导农民去打官司，另一方面富农更利用打官司的事情去剥削贫农（所谓富农出头贫农出钱），而且姚里农民反对派烟款的斗争也被我们的同志领导去打官司，甚至在蒲城农村中广大贫困农民灾民自动的以分粮食为中心的斗争竟被党所取消（这是省委巡视员直接参加决定的）而代之以反捐税斗争。你们说以分粮食斗争为中心是立三路线，因为他忽视了整个农民反捐税的要求，其实这正是你们做了富农路线的俘虏，而犹以反立三路线来做保护色。没有疑义的农民反对捐税的斗争，我们应该积极去领导，使他们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但是你们应该懂得，在广大贫困农

民灾民正待饿死冻死的情形之下，不去积极领导他们最迫切的分粮食斗争，一直引导到土地革命，而反企图缓和他们的斗争，斤斤以反捐税斗争为中心，这是何等错误的观点。因为此时广大贫困农民灾民已经破产到一无所有，尚能纳捐纳税的自然只有地主富农，至少是一部分的中农。而另一方面贫农灾民的分粮食斗争，则不但要直接反对地主豪绅，同时也要妨害富农的利益，所以此时正是地主富农需要把贫农灾民分粮食的斗争转移到去反对捐税。我们的党也跟着他们这样决定岂不是完全做了富农的俘虏吗？这一层你们需要深刻的认识和转变。你们应该根据中央对灾民斗争决议的精神指示，充分估量广大贫苦灾民的痛苦，坚决的将中农、贫农、雇农从富农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广泛的去建立穷人会、灾民团、贫农团、农民委员会等组织，提出他们目前最迫切的如分粮食、吃大户、抗粮抗税等要求，坚决的反对富农，夺取广大中农、贫农、雇农、灾民到我党影响之下，实行革命斗争。一直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在运动中建立雇农贫农的领导，亲密的联合中农，肃清一切富农路线。

（三）同时对于兵士工作你们也需大大的加强。陕西兵士比其他各省的兵士还要痛苦，而且兵士自发的斗争也不断发生，如三原兵变、毕杨兵变、西安西大营盘一连多兵士的哗变以及其他各地的闹饷逃亡等更不一而足。然而我们陕西党部对于工作的领导却非常落后，甚至在三原兵变中由我们同志所领导的一连因为一时找不到出路，竟把队伍带回自请国民党处分，结果都被杀戮，这简直是莫大的罪过！现在你们必须实行坚决的转变，仅可能的利用现在我们在军阀队伍中所有的基础及线索，同时要在白军主要部队中（如杨虎臣）设法扩大与创造我们的兵士工作。特别要注意到陕西白军系统的复杂及兵士的非

人生活，要坚决的反对那种不愿在白军中做较长时期艰苦工作、建立牢固基础的情绪。要坚决的发动并领导兵士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把这些斗争与扩展红军、建立红军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四）C. Y. 及互济会的工作亦必须加紧去领导，C. Y. 的第二党倾向必须坚决的克服他们，指导他们深入到广大青年工农士兵群众中去工作。互济会的工作不能因为一两人的卷逃就使之停顿，应该迅速的建立起来（这两种工作因为你们报告中简直没有什么具体材料，因此指示也只得比较原则一点）。

（五）在组织方面，你们现在主要的弱点就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不但是非常薄弱，而且简直是没有。在全省一百九十个同志中工人同志只有七个，现在西安市印刷工人同志四人又退出，更加是不成比例了，因此征收党员的工作实是你们现时党的当前的各种中心任务之一。你们必须有极大的决心，实行征收党员的工作，尤其是在工人斗争中应该设法吸收积极的新的分子入党，同时要艰苦的建立支部尤其是工人支部以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再则对于干部问题，你们的观念必须要有彻底的转变。实际上你们轻视工农同志的观念乃是提拔干部的重要阻碍，你们应该艰苦的训练同志，引进新的干部，尤其积极的工农同志起来作指导工作，坚决的纠正现在独脚跳舞与个人包办的现象。

（六）关于宣传鼓动方面，最主要的是要艰苦的去建立下层群众的宣传鼓动提出群众迫切的日常要求、口号，去鼓动群众斗争，同时使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密切的联系并且及时的转变它们。目前你们更应抓住满洲事变、第一次苏大会及准备纪念广州暴动等中心问题，在广大群众中作宣传鼓动。你们这次带来一些宣传品，因为技术上的关系，写此信时尚未看到，以后审查出如有意见，当专门写信给你们。

（七）最后关于党内的教育与两条战线的斗争，你们更必须

加重的注意。根据你们的报告可以看出，你们对于这一问题还只是原则上的了解，在实际工作简直非常疏忽，而且省委本身还犯了很严重的右倾及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像前面所已指出过的富农路线及清谈消极等，实是执行国际路线的绝大阻碍。这种现象同样在你们对麻俊卿事件决定中也可看出来。根据省委巡视员的报告，你们决定对麻俊卿叛变的教训的结论，只是消极说以后要怎样秘密防止敌人破坏，而根本没有从积极方面指出真正的出路，甚至有人以为麻叛变后党已无法信任。“每个同志都有麻某这种可能”，这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总之你们必须深刻的了解两条战线斗争的意义，锐利的去反对一切理论上实际上右倾“左”倾的错误，尤其要集中火力去与右倾作斗争，这是党的一切行动的基础。

你们接到此信后应该加以详细的讨论，更加切实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定出以后工作的具体计划。中央以后将拿你们的实际工作，来断定你们是否真正执行了国际及中央的路线。一些空洞的决议与工作计划以及一些责备中央没有每月给你们派一个巡视员等的信件，中央决不能认为是你们执行国际与中央路线的实际工作，而且却正相反，中央认为这实是你们想拿这些东西来代替你们的实际工作！对于立三时代的空头报告，中央是绝对反对的。

关于目前反帝斗争，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具体工作，请你们即刻告诉我们。

中　央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凡在企业、工厂、作坊及一切生产事业和各种机关（国家的，协作社的，私人的都包括在内）的雇佣劳动者，都应享受本劳动法的规定。

第二条　对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服军役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不受本劳动法的拘束。

第三条　无论何种已生效力或未生效力的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的劳动契约，倘他的劳动条件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条件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

第四条　雇农、森林工人、季候工人、交通工人、苦力、家庭的女工、厨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工人，除享受本劳动法的一般规定之外，并得享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劳动部对于这些工人所颁布的个别劳动条件的规定。

第五条　对于苦力（搬运工人、拉车夫、拉船夫、轿夫、挑夫等都包括在内）的荷重量由中央劳动部另行规定之，以及独立劳动者在被人雇佣时所应享受本劳动法之规定权利，另由中央劳动部颁布详细条例。

第二章　雇佣的手续

第六条　雇佣工人须经过工会和失业劳动介绍所，并得根据集体合同，严格禁止所谓工头、招工员、买办或任何私人的代理处的各种契约、劳动包工制、包工头等。

第七条　所有失业劳动介绍所须由各级劳动部组织并管理之。严格的禁止私人设立工作介绍所或雇佣代理处。

第八条　严格禁止并严厉处罚要工人出钱买工做或从工资中扣钱作介绍报酬。

第九条　凡欲寻找工作的人，须至劳动部所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登记，列入失业劳动者的名册内。

第三章　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

第十条　集体合同是一方面由职工会代表工人和职员与另一方面的雇主所订立的集体条约。在该集体合同上规定出企业、机关、家庭及私人雇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并规定了将来雇佣劳动者个人与雇主间订立劳动合同的内容。

第十一条　集体合同的条件，对于该企业或机关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他加入了职工会与否，都发生效力。

第十二条　业经劳动部注册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合同上所规定的日期起发生效力。

第十三条　劳动合同是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与雇主订立的协定。劳动合同的条件，倘与劳动法、现行的劳动法令及集体合同的条件较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有期限的集体合同和劳动

合同的有效期间，不得超过一年，工会在合同未满期以前，有权要求取消合同。

第四章　工 作 时 间

第十四条　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

第十五条　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

第十六条　所有工人在危害身体健康之工业部门中工作（如地下矿工、铅锌以及其他带毒性的工作），每日的工作时间须减至六点钟以下。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种类及某种工业每日之工作时间减至若干点钟，由中央劳动部制定公布之。

第十七条　所有在夜间做工之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较通常工作时间少一点钟（通常八点钟者减至七点钟，七点钟者减至六点钟，余类推）。

〔附注〕　由下午九点钟到第二天上午六点钟称为夜工。

第十八条　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第五章　休 息 时 间

第十九条　每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四十二点钟的连续休息。

第二十条　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继续工作到六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二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在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须有四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

第二十一条　下列的纪念日和节日，须一律停止工作：

（甲）一月一日　　新年

（乙）一月二十一日　　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逝世纪念日

（丙）二月七日　　军阀屠杀京汉路工人纪念日

（丁）三月十八日　　巴黎公社纪念日

（戊）五月一日　　国际劳动纪念日

（己）五月三十日　　五卅惨案反帝纪念日

（庚）十一月七日　　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

（辛）十二月十一日　　广州暴动纪念日

〔附注〕　各级劳动部得商同当地的总工会，得按当地情形，规定地方的纪念日作为特别休息日，休息日和纪念日的工资照发。

第二十二条　休息和纪念节日的前一日的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超过六点钟。

第二十三条 在本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内包括半点钟至一点钟的吃饭时间，不得扣工资。

第二十四条　工人和职员若因生病或生育小孩所得的休假，不得算入第二十条的例假之内。

第六章　工　　资

第二十五条　任何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部所规定的

真实的最低工资额，各种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额，至少每三个月由劳动部审定一次。

第二十六条　各种工业内（国家的合作社或私人的）实际的工资额，由工人（由工会代表工人）和企业主或企业管理人用集体合同规定之。

第二十七条　所有劳动检查机关和工会所特许的额外工作，工人须得双薪。

第二十八条　由劳动检查机关的许可，工人在休息日或纪念日做工作，应发双薪。

第二十九条　女工、青工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领同等的工资，童工、青工虽按缩短时间做工作，但工资仍须按照该职业的工资等级，以全日计算。

第三十条　夜工的工资须高于通常的工资，工作八点钟者增加七分之一，工作六点钟（危险工作）者增加五分之一的工资。按件计算的工作，如为夜工，除应得的工资外，工作八点钟者应照其平均工资增加七分之一，工作六点钟者应照其平均工资增加五分之一。

第三十一条　所有工资须现金支付（不得用货品），经常每周或半月支付一次（不得迟过半月，并禁止任何方式积欠），且直接交给工人之手。

第三十二条　工人和职员，遇每年的例假时，在例假期间的工资，应在例假前提前发给。

第三十三条　按件的工作可由工人（由工会代表工人）与雇主双方面订定集体合同，所有按件工作，须规定每日的平均生产率与每日的中等工资（按照每一工业按件所作之工作时间计算）。

第七章　女工、青工及童工

第三十四条　女工、青工及童工，除享受本劳动法各章的普通权利之外，并规定下列的特别保护女工、青工、童工之条文。

第三十五条　凡某些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业部门，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在里面工作。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工作之工业部门，由中央劳动部审定公布之（如地下矿工、橡皮、铅、铜、胶、水银、锡、铸造及其他同样矿场，过高或过低的地方的木工等等）。

第三十六条　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过四十斤之企业内工作，若在某种特殊工业或工作过程中必须包括一部分女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通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

第三十七条　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及怀孕和哺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夜工。

第三十八条　所有用体力的劳动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发。使用脑力的机关女职员（如女办事员与女书记）产前产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发。如小产（堕胎），休息两星期，工资照发。

〔附注〕　女工产前、产后的休息期内及小产时的工资由厂主担负，如若社会保险处已经成立，则经过社会保险处发给。

第三十九条　生产前五个月内及生产后九个月内不许开除女工，若不得她的同意，并不得令其出外办事或迁移到别处去。

第四十条　哺乳的女工，除享受本劳动法第二十三条所规

定的休息外，并规定每隔三点钟休息半点钟来哺小孩，不得克扣工资，并在工厂内设立哺乳室及托儿所，由工厂负责请人看护。

第四十一条 十四岁以下的男女，严格禁止雇用。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经过劳动检查机关许可后才能雇用。

第四十二条 每企业必须完备的详细的登记青工童工的年龄，工作时间和工资等等。

第四十三条 设立工厂或商埠学校，以提高青年工人的熟练程度，并给他们以补充教育，经费由厂方供给。严格禁止旧式的学徒制和养成工制。各种形式的学徒制，凡与本劳动法条文所规定的条件恶劣者（工资、工作时间、待遇等）宣告无效。

第八章 劳动保护

第四十四条 任何机关或企业，不经劳动检查机关检查和许可，不得进行工作、开设或迁徙地方。

第四十五条 所有机器须设置防护器，未经劳动检查机关检查，与适当防护器的设置，不得增设新机器。

第四十六条 无论何种企业，必须发给工人工作专门衣服，工作专门衣服的种类及穿着的期间，由中央劳动部特别规定之。

第四十七条 工作条件及工作过程特别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企业（如温度无常、毒气等），企业管理处须供给工人特别的保护衣服及其他保护物（如护眼器、面具呼吸器、肥皂、特殊食品、肉类与牛乳）。在有毒企业内供给消毒药品或器具，这些设备不得由工人担负，并须按期检查工人体格，借谋

保护。

第四十八条　各种罚款与克扣工资须严格禁止，赔偿损失亦被禁止。同时对雇用工人后任何时间内，征收工人保证金或储金制度一律严格禁止。

第四十九条　因厂方过失，中间停止工作，不得克扣工资（如机器损坏或缺少原料，厂方不能实行苏维埃法律的规定等）。

第五十条　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当见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

第五十一条　工人或职员，被征到红军中去服军役，因此而失去他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中，须预先发给他三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五十二条　雇主必须供给工人以工作的工具，并不得因用工具而克扣工资。倘若工人用自己的工具，雇主必须偿还工人以原价，其详细的办法由集体合同规定之。

第五十三条　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的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未建筑寄宿舍的，每月由工厂津贴相当的房金。

第五十四条　工人和职员若自愿的解除劳动合同，雇主须发给他半个月的中等工资作为卸工津贴费。若雇主开除工人和职员，雇主须发给他三个月的中等工资，作为卸工津贴费。

第五十五条　工人和职员若暂时丧失劳动能力，雇主须保留他原有的工作地位和原有的中等工资。

第五十六条　由劳动检查员监督劳动法之实行。凡劳动检

查员认为某一企业将有立即危害工人身体健康及生命者，劳动检查员有封闭该企业之权。劳动检查员的工作任务，由劳动部另行颁布之。

第五十七条　所有受雇后在工作过程中所得的职业病，本劳动法认为与职业遇险同，并应全部抚恤之。

第九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地方的组织

第五十八条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联合全国各企业与机关的工人和职员所组成。各项职工会及其地方组织，须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而组织之。不根据该章程所组织的各种联合会，不得称为职工会，也不得享受职工会在法律上应享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苏维埃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有宣布并领导罢工之权，代表工人交涉并签定合同等权。各省和各县的产业职工总会得代表工人签订该商业工业或地方工人的集体合同。

第六十条　一切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由工厂或店铺委员会监督执行，因为这是职工会在企业中的基本组织，并得监视劳动法及各种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之执行。

第六十一条　职工会主要的任务是代表个别的或集体的工人，保护一切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并努力设法改善工人的一切经济及文化的条件，用各种方法积极的帮助和加强发展并保护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府。

第六十二条　在一切国有及协作社的企业中，职工会是直接参加和佐理这些企业的经济与管理。在私人的企业中，职工会成立特别机关以监督生产。

第六十三条　苏维埃政府给职工会的组织以物质上的帮助，并与职工会以享受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市政公用品及铁道、轮船等优待条件。

第六十四条　由雇主出工资总数以外的百分之二的数目作为工会的办公费，又百分之一作为工人的文化费。

第六十五条　雇主开除工人须得职工会的同意。职工会的工厂委员会、店铺委员会代表工人加入评判委员会，以解决劳资间的一切纠纷。

第六十六条　每个工厂及店铺委员会为直接保护自己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每个企业中的工厂委员会，须组织劳动保护特别委员会，从工人的活动分子中选出三个至七个组织之。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

（甲）视察劳动法中关于保护劳动及集体合同的一切条文是否执行。（乙）劳动检查机关的检查记录之提议是否执行……等。

第六十七条　职工会有向苏维埃政府提议颁布各种劳动法令，提出并提荐劳动检查员之权。工厂委员会之委员，根据工厂委员会的证书，有自由进出工厂和参观全部工厂之权。

第十章　社会保险

第六十八条　社会保险，对于一切雇佣劳动者，不论他在国家企业、协作社或私人的企业，不论工作时间之久暂及付给工资的形式如何都得施及之。

第六十九条　由雇主于应付的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数目，作为社会保险之基金，该项百分比例表另由中央劳动部以特别命令颁布之。绝对不得向被

保险人征收保险费，也不得从工资中克扣。

〔附注〕　保险基金，绝对不许移作与保证工人无关系的用途。

第七十条　社会保险的优恤的种类如下：

（甲）免费的医药帮助——不论是普通病，或因工作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

（乙）暂时失却工作能力者的津贴——如：疾病、受伤、受隔离、怀孕生小孩以及服侍家中的病人等的空缺时间内的工资。

（丙）失业津贴费——（甲）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一年以上就可得失业津贴费，非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二年以上才可得失业津贴费。（乙）失业工人必须在失业劳动介绍所或在当地工会注册，或由机关证明曾被雇用过，或有职工会会员证作证，才能得到优恤金。（丙）支付失业津贴费时间之长短，可按照当地情形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状况加以限制，但于失业工人仍可继续领相当的优恤金。

（丁）残废及老弱的优恤金——凡工人因一般的原因或遇险或职业病而遭受部分的或全部的残废，或年老不能工作，经过特别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而确定此种残废的程度与性质及其家庭的状况后，须得现金优恤。

（戊）婴儿的补助金——如工人生了小孩，得领取补助金来买小孩十个月所必需的物品和牛奶，但此项补助金的总数不得超过二个月的工资。

（己）丧葬津贴费——工人及其家属之死亡，都由社会保险处领取丧葬费。

（庚）工人家属贫困补助金——凡工人的家庭，专依靠工

人赚工钱生活者，若工人死亡或失踪，应得优恤金，此项优恤金的数目之大小，支付时间之长短，要看工人的家庭大小等条件，由专门委员会审查决定之。但于受雇任何企业六个月以上的工人，都得领取之。

〔附注〕一，疾病优恤金从得病第一天算起，可达工资同样的数目，但不能超过相当规定的最高限度。由职业病而残废的人，同样可领疾病优恤金，到规定领残废优恤金为止。

〔附注〕二，未成年人的失业津贴，不问他的工作时间之长短，做何种工作，都得领取之。

第七十一条　社会保险处之管理与社会保险基金之用途，雇主不得过问，雇主只尽纳保险费之义务。由职工会的代表大会选举社会保险机关的管理委员会，并由政府批准而在职工会和劳动部的监督之下管理社会保险基金之收集与用途。

〔附注〕在社会保险处未成立以前，本章所列举的各项津贴费，由雇主担负之。

第十一章　解决劳资冲突及违犯劳动法的机关

第七十二条　凡违犯劳动法的案件以及劳资的纠纷，或由人民法院的劳动法庭判决强制执行之，或由劳资双方代表所组成的评判委员会及设在劳动部的仲裁委员会以和平解决之。评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工作细则，由中央劳动部另行颁布之。

第七十三条　凡违犯劳动法及一切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集体合同等，无论他对于刑法受何种惩罚，都归人民法院的劳动法庭审理之。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本劳动法有疑问或在执行上发生争执的时候，由中央劳动部解释之，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由该苏维埃省政府的劳动部解释之。

第七十五条　凡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凡中央劳动部有权颁布之各种细则和表册，该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有颁布之权。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项　英　周以栗　曾　山
邓　发　张鼎丞　陈正人
朱　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为着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工农革命联盟的巩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下列条例，作为目前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根据。

一、工业方面

（一）为保障完全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等）。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如这些企业主违反这些条件，实行怠工，关闭企业或干涉苏维埃政府的内政，拥护反革命，则必须立即没收作为国有。

（二）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尚不实行国有，但由工厂委员会及职工委员会，由工人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如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即

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协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

（三）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

二、商 业 方 面

（一）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但苏维埃必须严禁商人的投机，以抬高价格，应解散商会，禁止大小商人以商会名义垄断价格。如遇商人怠工，或经济封锁，危及基本群众主要生活商品的供给，或因红军需要，苏维埃政府应规定必须物品之最高限度之价格，但这种方法，须在必要时施行，有可能即须恢复商业自由。

（二）与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还绝不能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同时苏维埃政府应实行监督这些贸易，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须商品的供给，银币输出必须得该地苏维埃允许。

（三）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改良劳动群众必须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给以财政的帮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将一部分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并且为要保障劳苦群众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提倡公共仓库积蓄粮食，以便实行廉价供给与接济。

三、财政与税则

（一）消灭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的捐税制度和其一切横征

暴敛，苏维埃另定统一的累进税则，使之转由资产阶级负担。苏维埃政府应该豁免红军、工人、乡村与城市贫苦群众家庭的纳税，如遇意外灾害亦应豁免或酌量减轻。

（二）取消过去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各种债务，严禁预征或债务的奴役，应以革命的法律严防并制止一切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退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

（三）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

（四）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实行借贷，以发展其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征税收。

（五）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

四、市 政 方 面

苏维埃应实行相当调剂，以减轻城市贫民的房租。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的房屋和财产。这些房屋应交给工人苦力学徒居住。财产由城市贫民分配，或由苏维埃用作公共

事业。城市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办法改良贫苦人们的居住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火线中，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反对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无情的斗争中，中国各地零散的工农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

从三年以来英勇斗争的过程中，红军表现是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最坚决的执行者，虽然有一些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他仍然是为着建立苏维埃的中国而继续与一切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国红军已经引起了一切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奴隶主、官僚、警察、刽子手、侦探、牧师以及白俄）之极度的仇视与妒恨，他们动员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和军阀军队加紧向红军进攻。现在敌人虽有极大的军队和精巧的技术，并且在帝国主义充分帮助之下，但仍然不能消灭经验缺乏和技术尚拙劣的红军。

现在国内和全世界的工农劳苦群众，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都是表示无限的喜悦和爱戴。

这些情形，完全证明中国工农红军是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武装力量，这也就是证明中国工农群众从长期奴隶生

活与一切压迫（地主豪绅军阀的残酷压迫以及血腥的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剥削）之下求解放的斗争已经开始，而且顺利的向前发展了，中国革命已经达到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

坚决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向前发展着，但是为着完成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之前尚摆着艰苦斗争的道路，因为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尽一切力量向革命的工农与红军进攻。这一已经开始了的历史上的阶级战争的胜负，将要以武装的力量来决定。

为保护苏维埃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和保障革命的胜利，为加紧与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作艰苦的斗争，中国工农群众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在数量上质量上去巩固红军。

红军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保护者。他是阶级的军队，不论在任务上和精神上，他与国民党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根本不相同的。

军阀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与群众隔离的，是压迫工农侵略殖民地的工具，是进行侵略战争与军阀混战的，而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是解放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且负有极伟大的国际任务的。红军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加速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的崩溃，消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军队的。

红军是依照劳动群众的国际任务与精神去训练并行动的政治的军队，他是中国历史上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组织成的。每个红军战斗员都知道为着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一切劳苦群众而服务，绝不是替剥削者和资本家去压迫工农的。

红军政治委员政治部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红军中的直接代表。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是红军不可分离的组织成分。

一切劳动者，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都有武装起来保护苏维埃政权的权利。一切属于统治阶级的和剥削

者，军阀、地主、豪绅、官僚、资本家、富农及其家属，都不准加入红军。

为着革命的利益，在红军必须建立严格的自觉的革命纪律。一切指挥管理以及给养机关必须完全集中统一，用一切力量经常巩固并提高红军的争斗力量，同时必须尽量在红军中提高苏维埃政权的威信。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迅速实现组织并巩固红军斗争力的一切必要的实际办法，大会更具体的有以下委托：

（甲）指定最高军事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红军总司令，管理红军的给养与组织以及军事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只有严格集中的领导（包括一切红军），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计划与统一行动之条件之下，红军才能战胜军阀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扩大苏维埃区域根据地。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其附属机关的一切训令，红军应立刻坚决的执行。

（乙）设法增加红军中的工人与雇农成分，尽量吸收工人、雇农加入红军，同时大会号召非苏区的工人团体经常输送革命的工人到红军中来。只有增加工人雇农的成分，加强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工作，巩固红军中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才能保障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丙）大会特别指出，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共产党与青年团是执行阶级的任务，对于红军政治人员的政治教育和巩固红军战斗力是有极伟大作用的。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制定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在红军中的责任与应有权限的各种条例，并使每个斗争员都能深刻了解这些条例的内容。

（丁）经常注意改善红军指挥员的质量，这首先就要引进

工人、雇农、贫农以及过去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忠实而富有经验的革命战士，去担任军事指挥员及政治工作。

（戊）采用一切有力的方法扩大红军的数量（组织新团、师、军），改造红军的质量（按照战术条件去组织争斗单位，创造红军学校，出版军事法令及各种书籍），以帮助红军战斗力去战胜革命的敌人。

（己）为保障红军军械及一切必需品的供给，应组织弹药制造厂、兵工厂和统一集中的供给机关。

（庚）没有苏维埃政权各方面的积极帮助，红军作战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苏维埃政府应制定革命的法律，规定各级苏维埃机关对于红军的权利和义务，以巩固红军和帮助红军的作战行动。

（辛）应制定颁行红军斗争员的誓词。

为红军的巩固与扩大、红军战斗力的加强，大会特制定《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附后）

苏维埃大会号召各级苏维埃、共产党、青年团、职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给红军以更大的帮助。要记得谁不帮助红军，不去赞助红军的力量，不去赞助红军的纪律，他在客观上便是反革命，反对红军。

大会相信有过去光荣胜利的红军，在广大工农群众拥护之下，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去坚决执行上列各种任务，将来一定是能够消灭全国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完成他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国工农红军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到现在的四年艰苦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配合广大工农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从豪绅地主阶级手上夺回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自己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打破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三次大规模的进攻。这种为工农阶级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斗争的精神与胜利，是值得钦佩与称扬的。苏维埃阶段中革命运动向前开展，更需要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去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达到建设苏维埃的新中国，而完成红军在历史上的阶级任务。因此，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应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优待，大会特颁布下列优待条件：

第一条　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其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

第二条　凡红军战士家在白色区域的，以及新由白军中过来的，则在苏区内分得公田，由当地政府派人代耕。

第三条　红军中退伍士兵不能服务准给长假的，准由红军公田内分配土地给他耕种。如有在苏区安家的，其家属仍分得土地。

第四条　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无劳动力耕种家中土地或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区政府计划，乡政府执行）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所派人工，每年不得少于五十工。红军战士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应按其需要予以补助。

第五条　为要执行上述条例起见，特规定凡未在红军中服务者，应实行无代价的“优待红军工作日”。每人每月帮助红军家属工作两天，时间与工作种类依红军家属之要求而定。

第六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之一切捐税。

第七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家属所居住之国家房屋免纳租金。

第八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其家属得享受国家商店百分之五减价的优待。当必需品缺乏时，有优先购买之权。

第九条　凡红军战士乘坐轮船、火车，其费用概由公家发给。

第十条　一切戏场每月须有一次免费欢迎红军看戏，平时票价减半。

第十一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

第十二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因伤病须休养时，应送到最适宜之休养所休养。在休养期间，一切用费由国家供给。

第十三条　在红军中服务五年以上，年龄满四十五岁者，可退职休养，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本人不愿退伍愿继续服务者，应得特别优待。

第十四条　国家设立残废院，凡因战争或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者入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不愿居残废院者，按年给终身优恤费，由各县苏维埃政府按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现时每年至少五十元大洋。

第十五条　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可寄回家。红军家属寄信到红军中，则由当地政府盖章，亦不贴邮票，可寄到红军机关中转发。各级政府及红军机关应切实负责。

第十六条　凡红军战士在战争中牺牲，或在服务中因劳病故者，须照下列条例抚恤之：

1. 凡死亡战士应将其死亡时间、地点、战役、功绩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汇集公布。

2. 死亡战士的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表纪念。

3. 死亡战士应由当地政府帮助红军机关收殓，并立纪念碑。

第十七条　凡红军死亡或残废者，其家属优待办法如下：

1、子女弟妹幼小的由国家设立革命纪念学校，专门教育他们，并由国家维持其生活，直到年满十八岁由国家介绍职业为止。

2、父母妻子由国家维持以相当津贴。

3、本条例之三、四、五、六、七、八等条照旧有效。

第十八条　凡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得同意，政府得禁止之。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节在江西苏区开会，议决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

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蔷[1]，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甦，胡海，滕代远，萧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伯，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等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第一次会议，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

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蔷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受全国代表大会的付托，当竭全力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纲、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一切法令和决议，建立巩固而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至于取得全国的胜利。现当政府开始工作之

时，特为布告全中国工农兵士贫民和一切被压迫群众，一体明白。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PD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斗争继续发展，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疯狂似的要来抵抗，可是苏维埃运动还是向上增长并且扩大，日益使中国的农民武装了自己，组织了红军，一县又一县的农民从数千年来在封建地主豪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没收并分配这些压迫者的土地，打倒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是能够完成中国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的政权。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为使没收和分配土地有一个统一的制度起见，第一次大会站在基本的农民群众与革命发展前途的利益基础上，采取下面的土地法令，作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保障。

第一条　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乡村失业的劳动者，在农民群众赞成之下，可以同样分配土地。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

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

第二条　红军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先进战士，无论其本地是否建立苏维埃，或尚为反动统治，均须分得土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替他耕种。

第三条　中国富农的特性是兼地主或高利贷者，对于他们的土地应该没收，中等农民阶级的土地不没收。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些土地。

第四条　没收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者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参加反革命者的财产与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的被勾引反对苏维埃，经该地苏维埃认可免究者可作例外，对其首领则须无条件的按照本法令执行。

第五条　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办法。不过苏维埃地方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如大多数中农不愿意时，他们可不参加平分。

第六条　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的交给农民。但执行和处理这些土地时，须得取得农民自愿的赞助，以不妨碍他们宗教感情为原则。

第七条　凡较富裕的农民企图按照生产工具分配被没收的土地，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这是富农有意阻碍土地革命发展，为自己谋利益的反动企图，须给以严厉的制止。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原则来分配土地，或按照每家有劳动力之多少，同时人口的多少即混合原则进行分配，或以中农、贫农、雇农按照人口平均分

配，富农以劳动力（即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地方，富农每个有劳动力者所得分田数量，等于人口平均分配每一人所得的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去分配。分配土地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在土地分配时，还应尽可能的适合的进行土地改革，预备消灭窄狭片断大阡陌的各种封建遗迹。

第八条　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的房屋、农具、牲畜及水磨油榨等亦须没收。经过当地苏维埃，根据贫农、中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一部作学校、俱乐部、地方苏维埃、党及青年团委员会、赤色职工会、贫农团和各机关使用。牲畜和农具可由贫农、中农按组或按户分配，或根据农民意见自愿的将各种没收农具办初步合作社，或在农民主张苏维埃同意下设立牲畜农具经理处，供给贫农、中农耕种土地的使用。经理处应由地方苏维埃管理，农民得按照一定规例交付相当的使用金。所有农具的修理，经理处工人的供养，以及新农具新牲畜的购置，由农民加纳使用金百分之几以资弥补。

第九条　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及土地，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民对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所有旧地主与农民约定自愿偿还的企图，应以革命的法律加以严禁，并不准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

第十条　一切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建设，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桑田、竹林、茶山、鱼塘等，得如稻田、麦田的一样，依照当地农民群众的自愿，分配给他们使用。

第十一条　为着实际的彻底的实现土地革命的利益，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雇农工会、苦力工会，贫农团是必要的团体，认为这些组织是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坚固柱石。

第十二条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才是改善农民生活最可靠的方法，而事实上就是转变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步骤。不过实际实行这个办法，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苏维埃政府应将土地与水利国有的利益向农民解释，但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

第十三条　地方苏维埃如在该环境应许条件之下，创办下列事业：一、开垦荒田；二、创办移民事业；三、改良现有的与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五、加紧建设道路，创办企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十四条　本法令不但适用于现存在的苏维埃区域，而且应用于非苏维埃区域及新夺取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各苏区已经分配的土地，适合本法令原则的不要再分，如不合本法令原则者则须重新分配。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项　英、周以栗、曾　山
朱　德、张鼎丞、陈正人
邓　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第一条　为实行财政统一，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中央及各省、县区财政部及城市财政科）按照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税则征收，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规定税则或征收。但每年或每季开始征收税款，必须接到中央财政部关于收税的时间与手续等的规定的通令，才能征收。中央财政部得指定银行代理收税。

第二条　各级财政机关所收入之税款及政府经营事业的入款或罚金或没收的财产以及其他收入等款项，概应随时转送或直送中央财政部或中央财政部所指定之银行。各级财政机关在未得到上级财政机关的支付命令以前，不得自行支配、扣用或抵补，亦不得延期不缴。

第三条　各级行政经费、各军伙食杂用等经费，统由各该部分的财政机关造具预算，交它的直接上一级的财政机关审查，并报告中央财政部批准，统由中央财政部依据批准之预算付款。

第四条　凡中央财政部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各省政府财政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总经理部），应于每月二十五日以前，造报其下月预算，送交中央财政部审查批准。其他各级财政机关，应于每月二十日以前造报其下月预算，送交其直

接上一级财政机关，以便审查总合造报。

第五条　中央财政部在批准它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之预算后，依据预算发给该财政机关的发款通知书，该财政机关依次批准它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的预算，并依次发给通知书。

第六条　各级财政机关接得此发款通知书后，填具领款证，由财政机关负责人及其政府机关或军事机关负责人共同署名（如省政府的领款证须有财政部长及省政府主席之署名），才能向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领款。

第七条　凡中央财政部直接下一级的财政机关，须于每月十号以前将它的上月决算表，送交中央财政部审查批准。各级财政机关须于每月五号以前，将它的上月决算表，送交它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审查批准。

第八条　各级财政机关送决算表时，应将它的一切单据贴在单据簿上，随同送交它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此等决算单据即保存于各上一级财政机关，不要再行转上了（如师部之决算单据等保存在军部经理处，区财政部之决算单据等保存在县之财政部）。但上级财政机关认为有必要时，随时调取各下级财政机关的单据、表册及所要的材料等。

第九条　不能取得单据之用款，由经手人代填单据，并须声明不能取得单据的理由。

第十条　各级财政机关之预算表、决算表，应备同样的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它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所有各级财政机关，凡关系财政事项所使用的账簿、表册、单据等，须一律遵用中央财政部所规定的统一格式，不得沿用旧式账簿，或另立新奇。

第十二条　所有各种账簿单据，他的银钱记账单位，应一律折合大洋计算，并须将所折合的时价附记清楚（多少小洋或

同元值一元大洋）。但如收入是金条、银锭及不能十足通用的纸币，应将原件缴送中央财政部，不得自行折价。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机关的账簿、表册、单据等，保存期间为五年，过期得由该机关负责人监视销毁之。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 刊印。

PDG

建立辅助组织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刘 少 奇

一、什么是辅助组织？

工人阶级的组织，有政党，有工会，还有辅助组织（工人合作社、俱乐部及其他文化的、互助的工人团体）。政党和工会是为工人阶级全部利益的斗争组织，而辅助组织，则只是帮助政党和工会能解决工人阶级或某一部分工人的某些单独的任务。比如，工人消费合作社，可以帮助工人在购买消费品时减少商人的剥削，又可以在罢工时从经济上来帮助罢工。工人的文化教育团体可以帮助党和工会来教育工人群众。工人互济会可以帮助罢工及被难和遭遇不幸事件的工人。所以辅助组织，是工人群众在某些个利益需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组织，他们（辅助组织）不能代替工会，更不能代替政党。他们本身并不是罢工的领导机关，而是罢工辅助机关。他们的组织也不拘一定的形式和系统，可以是全国范围的国际的组织（如欧洲的合作社、互助会、体育会等有几十万至几百万的会员，及国际工人互济会、国际戏院、国际海员俱乐部等），也可以是某一部分工人的组织。他们是能适合最落后工人的组织形式，在各种环境下面都能够公开。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一期。

二、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和参加辅助组织?

辅助组织对我们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要在工人中建立辅助组织。对于国民党黄色工会，及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这样的团体，我们也要参加进去活动。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团体：

（一）取得公开半公开的机会，来进行赤色工会所要做的一些工作；

（二）利用这些团体团结一部分工人，扩大我们与群众的联系；

（三）我们在这些团体的群众里面和会议上，可以扩大自己的宣传影响，用赤色工会的纲领来教育工人，并可在这里面吸收会员等；

（四）在罢工中或准备罢工时，发动这些组织来帮助罢工。

我们参加和建立辅助组织，就是为得要达到上列各项目的。如果我们参加了或组织了这些团体，而不在里面进行上列各项工作，那就是无目的的行动了。同时有一些人（尤其是黄色工会和基督教徒）反对这些团体来帮助罢工和工人斗争。我们应该坚决打击这种主张。此外还有一种观念，夸大辅助组织的作用，把他们看作与工会、工厂委员会有同等的作用，当作赤色工会最主要的任务来进行。甚至还有人说：工人阶级只要这些辅助组织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一种幻想。至于在立三时代，要把一切辅助组织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要把这些团体都变成罢工领导机关，大家已经知道是非常的错误的。但是还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形：（1）有些工会常常假用“俱乐部”、“互助社”等名称，但实际是工会（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所以有些工人把辅助组织看作就是工会）；（2）当工人爆发了斗争，仅仅只有一个辅助组织的时候，这个辅助组织就

常常自然的成为斗争的指挥机关。

三、我们怎样来建立辅助组织？

我们在工人中建立辅助组织，首先应注意下列几点：

（一）要适合群众的需要，比如，电车汽车工人常常压死人要吃官司，那末互济会律师对他们是需要的；海员到岸要买很多食品和货物，那末合作社对海员是需要的，寄宿舍和俱乐部（演戏等）对海员也是需要的；外省工人常常被人欺侮，人地生疏，那末同乡会、问事处、互助会等是需要的；车夫码头工人需要茶馆、饭店，青年工人需要体育队、音乐会；失业工人需要找工作等。如果我们能够在群众中考察工人的迫切需要，在这些需要上来组织工人，帮助工人，切实能够满足工人某些需要，那么这种组织一定能够吸收很多工人来加入，变成群众的，以至广大群众的组织。过去我们建立辅助组织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有很多塌台，我们去租好了房子，可是群众不来。

（二）不要助长工人的封建行会思想。有些口号能够吸引工人，但是与赤色工会的纲领是冲突的，如帮口、拜把子及同乡会等。我们只能完全在另外的纲领之下来利用这些名义和方式来团结工人。如有些上海工人“拜把子”的纲领是“保护工会，为全厂工人利益作事。不替厂家国民党当走狗”。应反对工人中的封建行会思想。

（三）应该联络企业中的工人来发起建立，在工人中征收一些经费。因为只有如此工人才感觉这个组织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才积极负责。而且一经建立以后，一定要实际去工作，有经常的工作，给群众一些成绩看，方能支持发展下去。并且作事要庄正有秩序，完全公开，群众才感觉到是正式替他们作事的，不是拆烂污和利用他们的，他们才敢来。尤其开始进行我

们宣传的时候，要很慎重的采取很好的方式，不要使群众一看就知道是“另有作用”。并且要常常召集会议，报告工作及账目，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建议。过去我们建立辅助组织，完全不预先通知工人，又没有经常的工作和成绩给群众看，工作方式又不好，而且不公开，又没有专门主持的人，甚至还有借此向我们敲竹杠的，所以总是收不到多大的成绩。但是还有些辅助组织可以不必要工人在群众中发起也可以办的，如工人学校等。

（四）要有专门的主持负责人。辅助组织要办得好，一定要有几个忠实热心积极的人来主持。而且这些主持人中有赤色工会会员及同志才好。

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可以说：工人学校（子弟班与成年班），俱乐部与儿童团，是有过很大的作用的。“二七”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就是派人到全国各地联络工人办工人学校，以后再组织俱乐部，由俱乐部准备罢工。差不多大半都有极大的成绩。后来还从工人学校中训练出大批干部。学校主持的人活动得最好的，所收的成效也很大。过去的经验，现在有些地方（如满洲）还可以用，就是上海也还是可以用的。

此外，工人中原有的组织，如海员的宿舍、水手馆等，各地工人的同乡会、帮口、行会等，我们也应参加进去工作，进行我们的宣传，在罢工时就鼓动这些团体来援助罢工。还有在技术工人中普遍有一种“请会”的习惯。有些工头利用“请会”放高利贷。但也有一种完全是工人互助储蓄性质的“请会”，过去在营救被难工人问题上是有过作用的。我们应把这种“请会”扩大变成工人储蓄的组织，反对高利贷性质的“请会”，尤其在“援助罢工”、“营救领袖”、“开办合作社及工人

学校”等问题上来“请会”，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中国工人中很普遍的习惯，我们应想法来利用此种方式。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考查各省的反帝工作，觉得许多省委（如河南、满洲等）根本没有抓住这一反帝斗争，作为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争取广大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来的党的中心任务。有些省委（如江苏）虽然有一些成绩，但只是把反帝斗争的领导当做节期式的运动，把反帝斗争同日常的经济斗争对立起来，没有去加紧的组织反帝的罢工，以为做了反帝斗争，就不免要妨害日常斗争。还有些省委（如广东、陕西）那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在反帝中间的具体工作。对于利用反帝斗争，公开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使群众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使群众斗争从反对帝国主义到直接反对国民党，使群众在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只有工农自己的武装、工农兵自己的政府，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还是凤毛麟角。在我们两个多月的宣传鼓动中间，我们还没有能够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民众革命（即工农兵的革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才能终止国民党政府继续出卖民族的利益，造成新的民族的耻辱，并且使他们为了这一革命而斗争。没有利用广大群众要求民族解放的热情，来深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出卖中国的斗争，没有利用“排货”的运动来转变为反帝

国主义、反国民党资本家的激烈的斗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是没有能够成为普遍的口号（如河南省委根本没有提出这一口号）。反对进攻苏联、宣传武装拥护苏联的工作非常不够。对于救国义勇军，我们也没有能够领导。尤其严重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发动与组织一次伟大的工人群众的罢工，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一反帝运动。

中央分析我们工作中这些错误与缺点的来源时，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

一、我们还没有能够抓住目前领导反帝斗争的中心任务，没有把这一任务当做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的斗争任务。

二、我们没有能够很广泛的对于每一具体的事变提出我们的口号与主张，使我们的口号与主张真能喊出群众心坎中的要求，来动员与组织群众，而只是限于一些在广大群众还不很了解的基本口号的宣传。我们还没有能够依着形势的转变，而转变我们的口号，而提高我们的要求。

三、我们没有能够在斗争中揭破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实，我们没有能够很广泛的很清楚的把以民众革命来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与中国民族统一，同国民党以及一切派别反对民众革命、投降帝国主义、造成民族耻辱与瓜分局面的民族主义的一切武断宣传与欺骗对立起来。我们甚至怕谈民族两字，怕落进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圈套中去。

四、我们动员群众的工作方式，还陷在很狭窄的与秘密的范围内。我们惧怕公开，惧怕群众，对于群众民族的情绪，我们表示畏缩。我们更不能把群众反帝的斗争同群众切身的利益密切的联系起来，使斗争扩大与持久。许多公开的反帝组织，

我们没有能很好的去利用，并转变它们的性质。相反的，有的地方，如上海工联一个工作同志提议取消电话抗日救国会，认为利用公开路线去争取群众是作国民党的俘虏，以及好些地方又取消了党的独立领导，提议与改组派合作（如沪东、北平）的种种错误的行动。

五、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深入群众，尤其深入到企业中去。一切到企业中去的口号还不过是纸上的空谈。真正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坚持耐苦的去发动与组织罢工，尤其是日本工厂中工人的罢工斗争，对于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再三指示，只有敷衍了事。甚至对于各厂已发动的反日斗争还茫然不知。或者已经发动的反日罢工（如日彩印厂）而不去积极领导。

六、两条战线的斗争也还不过是嘴上的与决议上的。在实际斗争中，在每一具体问题上，两条战线的斗争还很少看见。对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左”的关门主义者的打击，表示非常不充分与没有力量。

中央认为这些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国际联盟与美国承认日本并吞以及派遣所谓中立调查团、设立中立区域等等的决定，表示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危险日益加深。国民党公然承认国联与美国瓜分中国的决定，出卖民族利益，使国民党的一切欺骗更进一步的破产，使它的统治更形动摇。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更加开展与深入，很多示威行动与斗争已表示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不信任，而找求着新的出路。然而正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上述的错误与缺点，这一蓬蓬勃勃的反帝斗争还没有得到我们党的坚强的领导，还没有能够使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做斗争的中坚。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斗争的主要弱点。

中央认为这一反帝斗争如若得不到广大的罢工运动为中

坚，如若得不到本党坚强的领导，这一斗争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派别的联合的压迫之下，必然会遭到暂时的失败。所以中央要各级党部接到这一决议后，立刻讨论这一决议，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原则之下，坚决的揭发自己工作中的一切这些错误与缺点，坚决的同这些现象做斗争，并定出开展与深入反帝斗争的具体工作计划与布置。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

——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日益巩固与怒长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正在着着的准备着新的进攻。在军事上，固然在“对日宣战”、“蒋介石北上收回失地”与“宁粤协作”的口号之下，调动和动员了新的进攻的部队，规定了新的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更其用尽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捏造各种谣言与假文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描写成为杀人放火的穷凶极恶的匪徒与阴谋家的小团体，甚而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积极地利用一切在野派别与叛徒“理论家”来努力地准备进攻苏区的舆论。

在军事方面，敌人进攻苏区的新计划，大致是对于江西中央苏区取暂时的守势，而向鄂豫皖苏区作大举的进攻。派遣较大的兵力，将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来加紧“围剿”湘鄂西、湘鄂赣与湘赣边各苏区。在中央区，赣南敌军现蒋蔡[1]十九路军已离开赣州，粤军一时尚未接防；吉安、富田、万安一带，原

有八师兵力，现赵观涛师拟调京汉线，蒋鼎文师调抚州，李抱冰师调南丰，富田敌军撤至吉水。广昌、宁都屯集孙连仲两师及毛炳文、许克祥等三师残部。据此，敌人似拟侧重临川至宁广线的兵力以固南昌，对于赣江上游及赣南防守较松。闽西方面，永定、龙岩苏区恢复，及与中央区联系一起后，张贞、刘和鼎均取守势。在赣东北方面，敌军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驻万年乐平一带，第十八师戴[2]旅驻贵溪，浙江警备师（两团）驻常山、玉山等华埠一带，此外尚有第四师与江西警卫团分驻苏区边境，闽北为刘和鼎部队，向十军取包围堵截的形势，步步为营，建筑炮垒与防御工事。在湘鄂赣与湘赣边两区，湖北敌人对鄂东南取守势，湖南平浏的湘军约五师与修铜之谭道源师正向红军十六军取积极的进攻。罗霖部亦从吉安出动进攻红七军于莲花一带，株萍线与湘军约二师正向湘东南独立师进攻。在广东方面，敌人对于东江红军与游击队正计划“包剿”，对于闽赣边红军则取堵截形势。在湘鄂西，敌军据襄河两岸（潜江、沔阳、天门、汉川各县）而守的有十四团兵力正与驻在监利的川军五团相互策应的以步步为营的策略向苏区中心进攻。此外，在宜昌周围的约有川军十团，江右有川湘军近十团，襄樊的敌人兵力则较弱。很明显的，鄂豫皖现在成为敌人进攻的中心目标，现在环绕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约有十二师兵力，皖西有陈调元、王均部三师，豫南有吉鸿昌部队约二师，平汉线上有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徐庭瑶的四师以及沿长江向黄冈、圻水进攻之萧之楚、徐源泉、夏斗寅部三师。屯集郑州的战斗飞机已有十四架，还有十四架正待命出发，每机都带有充足的毒瓦斯炸弹。此外敌人更经常的以飞机飞入苏区，投掷炸弹，轰炸群众与房屋（全苏大会开幕时，敌人曾以十数架飞机去轰炸，大会幸未遭殃，在群众热烈的拥护与庆祝之中，安然

的开会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二）敌人的政治的、舆论的、经济的与军事的进攻苏区的准备与行动，正在加倍的积极的进行。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的空前紧张，各派军阀内部矛盾之激烈，军事指挥之无法统一，国民经济的破产与崩溃，反动统治财政状况的山穷水尽，都是敌人的不能克服的弱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锻炼与产生出来的工农红军，得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热忱与拥护，与红色战士闻所未闻的英勇善战；全国革命急剧的高涨，满洲之失陷警醒了广大群众的民族的醒悟，与对于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的愤懑与痛恨；使得统治阶级更困难的造成进攻苏区的舆论，更容易使群众了解国民党的无耻；空前的灾荒，千百万的灾民正在饥饿与寒冷的冬天面前战栗，由饥饿而产生的革命的火焰将燃烧于全国的反动统治的领土上，变成为苏维埃运动的狂热；资本向极端恶劣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残酷的进攻，饿死与反攻成为工人阶级唯一的选择，蓬勃的工人争斗，粉碎了国民党禁止罢工的命令，与红军战士的争斗遥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反动统治的新的进攻，将和以前一样受到惨败，其结果必然是蒋介石报纸上的“胜利”，无数的白军士兵兄弟哗变到红军中去，土豪地主的悲呼惨叫，与工农士兵的热烈兴奋，红军的更进的壮大与强固，苏维埃革命获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三）为着利用目前极端顺利的客观环境，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争取这个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党在苏维埃区域应该毫无二语地执行一切正确的土地劳动与经济政策，加紧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的宣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功与其决议，加紧发动由满洲事变而起反帝运动的领导，将苏维埃革命与民

族解放的纲领提出来，广大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民族的耻辱。发动苏区周围反动统治区域中的工人农民与荒民的争斗，领导与开展这些区域中的游击运动。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在这一任务之下，红军的行动应该更加**积极化，更加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只有全国红军有彼此呼应的整个计划的配合的行动，才能打破敌人现在所取的各个击破的策略，才能够真实的帮助现在敌人进攻的中心——鄂豫皖苏区，才能取得与巩固我们的胜利**。所以，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在这一总的发展方向之下各苏区的行动方针应该是：

A. 中央区　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对赣南（寻乌、崇义、安远、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孝义等县）、闽西北（清流、宁化、归化等县），应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对于闽粤赣及湘鄂赣两苏区要保持绝对的联络，并与赣东北取得联系。

B. 湘赣边　红军独立师应以吉赣线附近为主要行动方向，与红军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完成赣南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以游击队的行动与湘鄂赣苏区取得密切联系，并发展遂川、崇义、泰和、万安一带及湘东南的游击运动，推广苏区与

土地革命的发展。

C. 闽粤赣　在中央区的帮助之下，首先取得永定、上杭、武平，恢复龙岩大埔苏区，巩固的向闽北发展。应设法帮助漳浦的游击队壮大起来。东江海陆丰苏维埃区域应该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恢复和发展韩江上游的根据地与闽粤赣和中央苏区联系起来。

D. 赣东北　应在巩固原有的根据地的条件之下将红军主力军移向信河南岸与闽北苏区打成一片。而向资溪、临川方向发展，并努力争取与中央区的联系，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要真实的组织省委所规定的五大区域（金资贵余、上广、华德婺、上玉德与万余间）的游击运动。

E. 湘鄂赣　十六军主力可向樟树方面移动，威胁敌人进攻苏区的后方，以帮助中央区与红军一方面军，占取赣南的一二中心城市，并巩固之。同时并帮助鄂东南与鄂南及株萍武长路附近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更加开展与深入，以便与鄂豫皖互相策应及取得联系，造成时时可以威胁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后方的形势。

F. 琼崖与广西右江　两苏区应各自巩固的向前发展。琼崖苏区不应硬攻海口，宜广大的发展琼东、琼南各区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根本铲除地主在乡村的武装，右江苏区应注意到贵州南部与湖南西南部的发展，造成湘贵桂边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

G. 鄂豫皖　在使皖西圻黄与黄麻光罗打成一片而得到巩固的发展的条件之下，应乘敌人进攻的军事布置尚未周齐之时，以红军主力击破敌人一方，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造成在京汉路与长江边运动自如的形势。与鄂北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应取得联系，以便能时时以京汉路沿线的游击运动骚扰敌人交

通要道。与湘鄂西在湘河北岸的发展亦须密切的联系起来，以便在应城、孝感、安陆的苏维埃运动更进的发展之下，汇合起来。皖西鄂东与豫南应以极大的力量去发展游击运动，才能顺利的击破敌人进攻的企图。

H. 湘鄂西　在绝不抛弃襄河南岸（洪湖）的原有根据地的条件之下，红军主力军可以移到襄河北岸傍着原有苏区准备时时可以击破敌人一方，以发展新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同时应留少数部队配合群众赤卫队支持原有根据地并恢复与发展江右的苏维埃运动，造成对长江上游的威胁。五鹤、桑石的苏区，应扩大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而逐渐向宜沙方面进展。房郧独立师应在巩固原有根据地之下，争取与鄂北九军的联系。

I. 这里首先应该将襄樊、枣阳的苏区巩固起来，西与房县保康苏区联系，向南发展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并与鄂豫苏区取得密切联系。

根据上面的指示，红军各军与苏区最高党部应估计到敌人的变动，决定自己的军事计划。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四）在指示出的红军的积极化的必须与行动方向之下，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建立强有力的红军的铁军是头一等的任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十倍地加强，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必须全部地实现起来；红军的编制亦应按照各军的实际情形与中央的红军编制条例重新改编。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十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边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

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一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后，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辖。地方武装应每县成立赤卫军一师至两师，归军分区指挥部指挥，暂不脱离生产。此外各地的独立师与中央警卫师则脱离生产。地方武装应有一部分编成游击队在苏区周围进行游击活动。

中央坚信，目前良好的客观环境，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勃发与其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热忱，党员群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与努力，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将在最短时期中实现起来，反动统治的丧钟是在响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

中　央

十二月四日（一九三一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蔡廷锴。

〔2〕指戴岳。

PDG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

——关于敌人加紧“围剿”鄂豫皖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中央分局：

急密。据情报及报载：敌人正在计划对鄂豫皖区作大举的军事进攻。就我们所知道的在鄂豫皖区周围屯集者已有十二师以上之兵力，皖西有陈调元部二师与王均之一师余，鄂东从黄冈、圻水进攻之萧之楚、徐源泉、夏斗寅三师，豫南则有吉鸿昌之二师，京汉线上有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徐廷瑶等四师，并拟从江西抽调赵观涛师来。在郑州已屯集有战斗机十四架，尚有十四架待发，此等飞机均带有充足之毒瓦斯炸弹。敌人似拟由侧重豫东南军力企图从这方面进攻苏区。蒋介石并拟在北上抗日收回失地的名义之下，驻节郑州，指挥对苏区的进攻。除军事的积极准备之外，在政治与舆论的准备亦在着着进行，造种种谣言与假文件企图污蔑我党为匪徒与阴谋家的杀人放火的小组织，甚至于勾结日本出卖中国之帝国主义走狗。此时敌人准备尚未妥全，更因帝国主义侵略之积极与露骨，群众争斗的日趋紧张与革命化，一时政治舆论的准备更觉掣肘，我们急需给敌人进攻的企图以猛烈的打击。中央已发紧急通知动员非苏区党部进行广大的

反对敌人进攻苏区的群众运动，对于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领导干部亦已发新的训令，号召他们作更有计划与多少一致的积极行动，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援助鄂豫皖区。安徽与河南两地方党部亦已给专门的指示。关于鄂豫皖赤区对于反对“围剿”的运动，中央认为应该在工农群众与赤色战斗员中积极发展起来，在军事与政治方面重大而周密的准备，动员一切力量击破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企图，巩固与开展苏维埃运动。这里：

一、在军事上应该乘着敌人尚未布置就绪的时机，利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迅速的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之一方面，并灭之。对于红军的行动方向与敌人的选择应该有周密的考虑，完善的准备与神速的推动。

二、为使战事能得预期的胜利，必须在“一寸土地亦不让敌人蹂躏”、“为保持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战”的口号之下，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参加和拥护红军的作战。地方赤卫队一部分应该随着红军出发作战，另一部分应该担任保卫后方维持治安之责。组织农民自愿的运输队、看护与慰劳队。动员赤卫队与少先队的优秀的分子与队伍加入红军。扩充红军四军，编成四军、九军两军。

三、敌人后方游击运动的开展，将给敌人的进攻计划以极大的打击。中央分局与省委应十倍的加强对于环绕边区的反动区域中的工作。中央分局与省委可以而且必须派遣忠实勇敢的同志率领少数的武装农民，在环绕着苏区的反动统治区域中——首先是京汉路沿线——去发展游击运动，一方面可以骚扰敌人的后方，袭取敌人的粮食与军械的供给，进行各种破坏工作；另一方面，这些队伍可以成为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

者，他应得发动当地的农民争斗，生长成为较大的游击队伍，造成苏区扩大的基础。这些队伍不可过大，成分的选择必十分注意。他们必须熟悉当地的详细的情况与地势，与游击地带内之居民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必须能很迅速的集合与分散（参阅中央最近印发之“游击队怎样行动”的小册子）。对于皖西北寿县及蚌埠附近的游击运动，苏区党部应该加以十倍的注意。

四、由于生活的痛苦及满洲事变后国民党的无耻的不抵抗主义而引起的白军士兵群众的对于国民党将领的愤懑与痛恨，造成我们在白军中工作的顺利的条件。中央分局与省委必须坚持与顽强地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这里经过俘虏来士兵中的良好的政治教育与土地革命的宣传是有重大作用的。自然，除此以外，派人加入白军与其他接近士兵的方法，同样不能忽略。白军中如有良好的工作，则能更好的促进红军胜利的保障。

五、战时后方的组织是极端需要军械与粮食的供给，后方医院的组织，小规模的兵工弹药厂的设立，红军人的补充的准备与训练，地方武装的训练与扩大，都是必须着手进行。依持着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与党员团员的艰苦工作，在这方面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六、为着使我们的红军能够支持长期的剧烈的国内战争，则红军战士的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是应该十倍百倍地加强。中央分局关于改造四军的决议案应该很快完全实现，因为建立铁的红军的工作是鄂豫皖区工作的弱点之一，而武装红色战士的手和脑却是保证苏维埃运动胜利的前提。

七、现有苏区的更加巩固，数百万的农民群众更密切的团

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是我们胜利的最好的保证。因此对于下级党部与苏维埃在分配土地问题上的一切曲解与误解，在改善工人生活上及工会工作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消极，在租税问题上对于阶级路线的放松与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特苏的通令是不正确的，另详中央关于土地税与商业累进税决议，下次可带上），是一分钟也不能忍耐的了。切实的对于下级党部工作的检查与督促，无情的自我批评揭发与纠正任何地方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苏维埃法令的最小的曲解，加紧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发展群众的肃反运动，将更加激发群众的革命的积极性，将更加推进苏维埃运动的成功。

八、在剧烈的战争环境之中，保持与鄂北、湘鄂西两苏区间的联系与相互呼应是迫切的需要。因此中央分局应想一切方法保持与创立与这两区之间的联系，以便作战上的呼应，及大江以北整个苏区的打成一片的任务的完成。

九、与中央的联系与交通关系，中央分局应该加以严重的注意。与中央交通总站双方设立保持在剧烈的国内战争环境中的交通关系，是丝毫不能忽略的。……（略）

中央希望中央分局在接得此信后，即刻发动广大的群众的反对蒋介石对鄂豫皖区的新进攻的企图，动员一切党员、团员、工农群众与赤色战士，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与敏捷，给蒋介石与一切反革命派以新的教训。

为反对蒋介石的新的进攻而战，为苏维埃运动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战，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胜利而战，胜利将是我们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苏维埃运动怒潮的澎湃，灾民的饥饿的烈火燃烧成为革命的巨焰，城市工人的反攻与进攻的剧烈的斗争，反帝运动的如火如荼，反革命营垒的分崩离异，财

政经济之山穷水尽，都告诉我们胜利是有把握的。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毫不倦怠的工作来争取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的胜利吧！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张　闻　天

检查各级党部在满洲事变中的工作，觉得我们没有能够抓紧民族革命运动的主要意义。我们的宣传品上，只是一般的做了本党一些基本口号的宣传，而对于国民党如何出卖民族利益的各种阴谋与表现，揭破得非常不充分。我们没有能够很明显的把我们关于中国民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要求，在民众的前面提出来，使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族运动的真正态度。

我们在全中国民族觉醒的前面，没有能够很充分的利用这一觉醒，来开展民族革命的斗争。我们对于抵制日货的运动，完全采取了关门主义，以致这一运动完全为民族资产阶级所利用。我们对于学生的义勇军，对于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参加与领导都表示不够。我们甚至惧怕民族两字，恐怕一谈民族，就会堕落到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泥坑中去似的。

正因为我们在广大的民族革命运动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所以我们不能很顺利的揭破各反革命派别民族主义的欺骗宣传，使他们还能利用民族主义来欺骗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这些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觉醒转来的民众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

们，正因为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落进了各反革命派别的民族主义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尤其是社会与教育派在这一方面，给国民党做了不少拥护的实际工作。

无疑的，共产党在这一反帝斗争中，是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然而还有广大的群众，总还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远水救不得近火，还觉得共产党没有能灵敏的满足他们的民族的要求。甚至以为共产党是根本反对“爱国运动”、“抵货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当然民众这种感觉是有它的真实根据的。这一根据，就是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

譬如在马占山军队对于日本进攻的抵抗的事变中，不少反革命派别能利用当时民众激昂的情绪，以募捐的运动来代替民众反国民党的斗争。然而我们却除了对于募捐运动取反对态度之外，没有任何行动上主张，来转变民众这一情绪到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上去。许多这类的事实，我们都是轻轻的放过了。这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欺骗，而无形中却是维持了这一欺骗！

所以我们觉得要真正揭破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必须更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口号，更积极的参加与领导广大工农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斗争，使这一斗争走上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正确道路上来。我们要在实际斗争中证明给民众看，我们不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然而当我们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时，我们不能一刻忘记向广大的群众指点出，只有民众罢工、罢课、罢操，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民众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能对日宣战，才能厉行革

命外交，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要在斗争中，使民众在切身的经验上了解到要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只有实行民众革命，把政权拿到民众自己手里来的必要。

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对于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宣传工作，是做的非常不够的。我们只是机械的在每一宣言上写上“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口号，然而我们还不能在日常的斗争中使民众了解民众的革命与民众的武装的意义，使民众了解只有这一革命才能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因此使苏维埃与红军变成与民族革命运动漠不相关的东西。因此，“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口号，也不免变成有些空洞而不落实际。

民众的武装、民众的政权与民众的革命的宣传鼓动，在目前当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崩溃，民众走向革命化的路上的时候，应该更广泛的提出。必须要在民众对于这些口号的了解的基础之上，加紧进行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运动。

民众自动的武装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现在是因为国民党假面具的逐渐揭破、国际联盟的欺骗的破产而更其迫切了。我们的党对于这些要求没有能很好的利用，使这些武装变为民众自己的武装，变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压迫的民众自卫的武装，却为国民党所利用来武装一部分反动学生与工贼走狗来反对革命运动。甚至有些党部对于这一口号，完全表示忽视。

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是很快的消失了。很多地方学生的请愿团变成了学生示威团，开始同军警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许多群众的组织对于国民党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表示了严重的反抗。在全中国正酝酿一个伟大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号召全中国工农与革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自动组织起来，去推翻帝国主

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反动统治正在动摇着。革命的工农民众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给以致命的打击！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刘伯坚给季振同、赵博生等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振同、博生、山宇、振堂[1]诸同志：

我代表红军以十万分热烈诚恳的敬礼，欢迎在中国革命中奋斗多年的诸位同志，来同红军共谋劳苦工农的解放，同时把将要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夺回来，交给全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手中，这是何等光荣何等伟大的历史际会呵！

同志们，我看了你们给我的满含着血泪和革命热忱的来信，使我回想到我们过去在西北风沙中转战四千余里的三十万国民军，到如今都是百战余生，白白地牺牲了无量的热血，没有得到一点革命的结果！使我回想到诸同志朴质忠勇的风格，冲锋陷阵的无敌的英勇，同样的奋斗到如今，没有结果，反转成了诸同志在革命历史中的缺陷，要你们重新来补写，都只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着正确的领导。同志们，我们一别五年了，别后的辛苦不必尽述，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在一起往前奋斗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我应当为全国劳苦工农距踊欢呼，庆祝中国革命成功的到来。

同志们，你们一字一泪、一句一条血痕的来信中说得万分沉痛的是："现在我国民族将被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压迫得毫无生路，认清了只有共产革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弟等同是穷人出身，同在重层压迫之下……"使我相信诸同志彻底

觉悟过去被军阀的愚弄和欺骗，明白了国民党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压迫和剥削全国工农，造成了连年不断地军阀混战，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水灾，并且断送了东三省，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共管区域。帝国主义者进一步预备借口共同派兵维持中国秩序，实行瓜分中国。

同志们，国民党的罪恶已是尽人皆知了。全国劳苦工农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潮流已经汹涌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而奋斗了。

我们同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铁蹄下的难民，同在重重叠叠不断地灾祸中挣扎。只有同来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作一拼命的死战，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统一。

同志们，我已将你们的革命热忱转告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负责同志，他们都十分热烈的企待着诸位同志前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并要我代表他们的欢迎的热忱来同诸位同志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接洽一切。

相距不远，快晤在即，一切都俟面谈。这里我先向你们致一个热烈欢迎的革命敬礼！

刘　伯　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于瑞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董振堂。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政治局：

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自然肃清社党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殆有过之无不及。群众之死于社党之罪的并不都是社党领袖，甚至因其与社党领袖假共党之名在一起开会的也被列为社党而杀了。因此，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党接近，恐怕结果又是社党。究竟社党与共党之别在那里，何种情形方可算罪，群众简直答不出。扩大红军，说群众不积极，十二军团长团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贫农），给以严刑（只据别人一点口供，还说不打不招，等问审问清白，连释放都难，因为身体已伤），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这样无怪现在扩大红军之遇到最大的困难了。红军团长说，过去红军说了六千 AB 团，虽有很多群众与并未完全审问清楚，但因军事作战时期不得已。好一点不得已！这件事结果的严重，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 AB 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我现在只顺便择一两件可告的材料告你们，还不能算正式报告，因未经多方面

证明，故你们还无须即刻来信。然我有一坚信，即在中央时我们所讨论的原则与对他们的批评完全是正确的，将决以中央路线与此严重问题斗争！

假使文炽[1]在申犹未归，望将闽西反社党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与他详细一谈，最好根据他的报告，作一有力的决议指示此间，因他们只承认（在文件中）反社党思想的斗争上不足而未言其他。中央如对闽西有决议，对中央区亦有力也。

伍　豪

十二、十八于赴汀途中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卢永炽。

PDG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女工与农妇，除在工农已经得到政权的苏区以外，都是处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压迫之下，早已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残酷的非人的剥削。最近由于全国经济危机空前的扩大与深入，农村经济的破产，十七省以上的水灾，工厂的倒闭与歇业，生产合理化的加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紧迫，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更使她们成为失业与灾荒的普遍现象中最大牺牲的对象。目前资本家为着应付经济恐慌加紧剥削，一方面大批裁减工人（目前因被丝厂、纱厂裁减或开除而失业的女工已占着惊人的数量），特别增加女工工时（普通女工工作时间总在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以上），减少女工工资（普通女工工资每日不过二毛至四毛），另一方面利用女工工资的低廉与比较缺乏组织性和抵抗力，以她们来代替男工，企图分裂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联合战线。至于乡村的地主与豪绅自然更乘灾荒的严重与农村的破产，加紧他们对于农村劳动妇女的剥削与奴役，使她们完全成为地主豪绅的牛马和奴隶。

二、中国的劳动妇女处在这种压迫与剥削之下，自然要求解放与参加斗争的情绪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国民党与其他

一切反动派别对于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究竟怎样呢？他们除了露骨的压迫与剥削以外，只有采取一切欺骗和牢笼的方法，来蒙蔽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这里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点，便是：以性的分别来代替阶级的分别，以单纯的“妇女问题”来代替劳动妇女的阶级利益，例如国民党的“妇女协会”、“妇女参政协会”以及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第三党等等）对于“妇女问题”的主张都是如此。他们所谓“妇女群众”总不出乎太太、小姐的范围，所谓“妇女问题”总不外乎婚姻与社交的空谈，至于广大劳动妇女的阶级利益不但深讳不言，而且更采取积极压迫的方法，利用中国劳动妇女的比较落后，常以反动的封建道德与极端的男女界限来反对和污蔑真正的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例如国民党拼命捏造苏区“共妻”与破坏“伦常”的事实，便是铁证）。很明显的，国民党与一切反动派别对于劳动妇女不但不会有丝毫的解放，而且只有加增她们的锁链与痛苦。

三、无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地主和资本家如何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无论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如何巧妙的欺骗与蒙蔽，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斗争不但要爆发，而且已在爆发了。现在能够领导这种斗争的，当然只有唯一的拥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过去已有很多的证据，而且在目前更成为铁一般的事实。最近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由于自己切身的痛苦加深，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日渐崩溃与苏维埃红军的伟大胜利，由于全国一般工农斗争的高涨，已经能在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之下，加倍表现她们的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在各大城市纱厂、丝厂女工斗争的发展与苏区内劳动妇女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参加斗争的积极上（如洗

衣队、慰劳队、救护队、作鞋队等）完全可以看出。无疑的，这种劳动妇女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与扩大，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与成熟的过程中，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伟大的力量。

四、四中全会以后，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由于路线与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如苏区妇女群众组织的发展与上海女工附属组织的建立等），可是这点初步的转变还非常微弱。根据目前妇女工作的检查，中央认为现在仍然充分的表现着以下的缺点与错误：

1. 各级党的组织、工会与青年团仍然一般的忽视妇女工作，没有注意巩固和建立妇女工作的领导，没有认识劳动妇女工作是全部工作重要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至今仍有许多地方认为女工与农妇的工作只属于妇委工作的范围。

2. 至今仍没有切实的把我们工作的对象完全放在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的身上，许多地方仍然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国民党妇女协会的残余，认为妇女工作的内容只是所谓单纯的“妇女问题”，不了解多数党所谓妇女群众的利益主要的是她们的阶级利益，不了解我们在妇女中工作的意义，引导她们参加整个的革命斗争和为她们的特殊利益而斗争。

3. 至今在各大城市的轻工业中，特别是纱厂和丝厂的女工群众中，严格地说起来，我们还没有打进去，这证明各级党部与群众组织还没有真正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殊情形，即纺织工业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越的地位。

4. 在农村中特别是在数千万啼饥号寒的被灾的劳动妇女群众中，除苏区外，一般的说我们还没有工作。

5. 由于上面的原因，我们对于劳动妇女的斗争，不但不能站在积极的主动的地位去组织和领导她们，而且对她们许多

自发的日常斗争都时常落在后面，甚至于完全不知道。

6. 在苏区内，至今仍有几个地方根本忽视妇女工作（如中区、湘鄂赣），其他区域（如湘鄂西、鄂豫皖）虽曾作了些工作，但是仍然赶不上劳动妇女积极性的发展，甚至远远落在她们的后面，不会（或不充分）利用劳动妇女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加以正确的领导。反而许多地方（除鄂豫皖较好外）竟将整个妇女工作的范围束缚在婚姻问题上，以至无法解决，甚至发生禁止或限制婚姻自由的错误，使一部分劳动妇女表示暂时的不满或消极。

7. 无论在苏区或白区内，对于劳动妇女的教育工作还有很多缺点。苏区的妇女生活改良委员会与妇女干部训练班还没切实的普遍的组织起来，白区内的妇女教育团体（如姊妹团、读书班）也是凤毛麟角，关于妇女生活或斗争的刊物更是微乎其微。

五、根据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我们工作的缺点与错误，现在党在劳动妇女中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在白区内，根据劳动妇女的特殊地位与痛苦，尽量发动她们为本身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加紧领导她们一切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用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吸引她们参加整个的工农的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在苏区内，应加紧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尽量发展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并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改良自己的生活，同时无论在苏区或白区必须彻底肃清国民党的工作方式的残余，站在两条战线上坚决的消灭一切对于劳动妇女工作的忽视和错误。

六、为着执行以上的中心任务，各级党部、工会与青年团必须立刻进行以下的实际工作：

A. 在白色区域内

(1) 党和团的组织必须立刻加强对于劳动妇女斗争的领导，特别要抓住纱厂、丝厂中女工的工作，坚决地执行“面向劳动妇女群众”的口号。省委和中心县委必须从速设法建立和巩固妇女部的领导，区委及支部必须有专门负责的妇女组织员。

(2) 在大的产业中心（如上海等处），必须立刻开始准备女工代表会的组织，努力使这种组织逐渐成为党在女工群众中直接工作的方式。为着适应目前的客观环境，最好首先组织女工代表会发起人的筹备会。

(3) 赤色工会必须立刻加强对于女工的一切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领导，坚决地打击那种把领导女工斗争的责任完全推在妇女部肩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总工会及目前已经成立的各产总必须建立和巩固妇委会的领导，各个城市中的工联与企业中的赤色工会小组必须指定一人负责女工工作。

(4) 估计到我们在女工中组织基础的薄弱，必须择定若干重要工厂为对象，继续派遣坚苦积极的女同志或赤色工会的会员去参加生产，以便与女工群众打成一片。对于已经参加生产的女同志，必须时常给以指示并检查她们的工作成绩。

(5) 为着加强我们对于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联系与教育，必须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在工厂和农村中组织妇女的附属组织（如姊妹会、读书班、识字班、互助会等）。

(6) 对于工人的家属与家庭工人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与她们发生亲密的关系，并设法组织她们，吸引她们参加一般的工人斗争。

(7) 在农村中特别是在灾民中，必须加紧领导贫农雇农妇女的斗争。在有农民协会同农民斗争委员会的地方，必须有妇

委会或妇女组织员负责领导乡村劳动妇女的斗争。在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可设法召集乡村劳动妇女代表会，以便扩大她们的斗争与党的影响。

（8）各级党和团的妇女部与工会的妇委会，为着加强对于劳动妇女斗争的领导，引起一般同志对于妇女工作的注意与讨论，必须有公开的劳动妇女刊物，或在一般刊物上专辟妇女栏，以便解答各种问题。此外妇女通讯亦须经常地有计划的进行。

B. 在苏区内

除上述各种方法均应参酌实行外，更须切实执行以下的工作：

（1）必须立刻加强对于劳动妇女斗争的领导，吸引她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党的妇女部与妇女组织员必须健强起来。

（2）必须加紧发展劳动妇女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如洗衣队、作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来领导和组织她们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

（3）为着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交换各处的实际工作经验，党与群众组织必须经常地召集妇委代表会及妇女组织员的大会等。

（4）利用苏区的公开环境，必须设立各种劳动妇女干部的训练班，以便从工农劳苦群众中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妇女工作人才。

（5）要坚决地反对那种把妇女工作只束缚在婚姻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这种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是在引起劳动妇女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兴趣，领导她们参加阶级的斗争，用各种教育的方法使之觉悟，而不是加以禁止或限制。

七、最后，党认为要保证这一决议的切实执行，必须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肃清立三路线，特别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一切忽视或曲解妇女工作的机会主义。

中　央

十二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只有“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使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胜利的前进。因此发展苏区革命职工会的工作，是苏区党的战斗任务。

四中全会后，苏区革命职工会的工作已经有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主要是：（一）广大的建立了雇农工会的组织，建立了产业工会支部（如蒲圻铁路工会），工会会员已过十万，在一切苏区的城市和乡村差不多都有了工会组织。（二）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工会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如湘鄂西、鄂豫皖等处。（三）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并领导了一些经济斗争——如湘鄂西、鄂豫皖。（四）提拔了工人优秀分子到苏维埃红军作领导指挥工作，广大的工人参加了冲破三次“围剿”的战争。（五）把富农、老板、AB团等反革命分子从工会中肃清出去，提拔了真正的工人干部来领导工作——如中央区、鄂豫皖。（六）举行了一些工人代表会议，颁布了工人斗争纲领——鄂豫皖。

这些成绩，当然不能过分的估计，当然不能掩盖我们工作的严重缺点和错误。苏区工会工作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在下列几个主要的错误中表

现出：（一）阶级的异己分子——富农、老板等侵入了工会，甚至富农把持了工会（赣东北），阶级工会变成了行会组织（中央区）。（二）不去积极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工人斗争的力量，彻底的实现劳动法，同时工人的经济利益与农民土地革命的任务不能联系在一起，常常使农民与工人对立，牺牲工人的利益，或者将很高的要求加在中农身上去，八小时工作制大部分还没有实现。（三）没有将赤色工会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积极挑选优秀分子到红军苏维埃作领导工作，反而使工会与苏维埃对立，强迫工人替红军作无代价的挑夫，在红军作战时放弃工会工作。（四）不相信工人群众斗争的力量，用政府的命令来增加工资，肃清反革命分子。（五）忽视女工童工的工作，甚至在国有企业中尚不实现平等待遇（鄂东兵工厂女工不分伙食尾子），或者使青工与成工对立（如赣东北组织独立的青工联合会）。（六）不广大的执行工会的民主化，重复了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错误。（七）没有加紧附近白区工会工作，特别是重要的产业里。

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非阶级的工会路线，助长了富农、老板、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的活动。他们侵入了工会，利用工会组织，实行破坏苏区的阴谋。

因此：（一）改造苏区赤色工会成为真正广大群众的阶级工会；（二）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彻底的实行劳动法；（三）发展并领导农民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四）吸引积极的分子到苏维埃红军中作领导与指挥的工作，使赤色工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以准备“由现时的民主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应是苏区赤色工会主要的任务。为达到这些任务，必须执行下列的工作：

（一）在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进攻反革命的过程中，彻底的实行改造工会的运动。赤色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决定中国苏区革命职工会的根本任务是“根本的改造群众的革命工会”。现时好些苏区的工会为富农、老板所把持，使工会去发展阶级斗争、巩固苏维埃政权成为不可能。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确立工会的阶级路线，真正去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实行彻底的反富农老板的斗争，启发群众的积极性，以群众的力量从斗争中将富农老板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工会中肃清出去。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及工会代表会议，自下而上的改造工会，选举真正工人领袖到工会领导机关，使工会真正在工人的手里，成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推进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动力。要反对不去动员群众力量，只用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或党的包办来肃清工会的反革命分子及不发动阶级斗争，而只在形式上改换工会组织。

（二）坚决的发展和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制定各种产业、各种职业部门的斗争纲领，提出工作八小时、增加工资、劳动保险、失业救济等口号，使每一工人清楚的了解。发动工人向雇主斗争，要求劳动法彻底的实行。与雇主订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使每个苏区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中斗争中得到一切日常生活的改善，取得阶级工会的自由，保证无产阶级独立的作用。工会应经常派人检查雇主、富农对于合同的履行，注意雇主、富农欺骗和利用工人破坏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用罢工、封锁等方法来对付那些顽强的雇主、富农。到资本家违犯苏维埃的法律，用关门停业等方法来对付工人时，工会应要求苏维埃来解决，同时不能专门依赖苏维埃的制裁，来取消工人的斗争。

在发展经济斗争中，应该将工人的利益与农民土地革命及

反帝国主义的利益、巩固扩大苏维埃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不要使工人与基本农民对立，不要使罢工斗争妨碍了红军的行动和击破敌人的进攻。但绝不能以此借口来取消工人的斗争，相反的，“工人阶级生活激进的改善，是巩固苏维埃最重要的条件”。即使在苏维埃区经济严重的破坏之下，工会也应该用种种方法来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减少工人的痛苦，提出许多方法，经过苏维埃把经济恐慌的重担加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去。

（三）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分配土地的运动中，工会应该起来领导农民反富农的斗争，打击富农地主残余一切反革命来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坚决的领导和组织农民彻底平分土地，拥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雇农、苦力只要他们愿意获得土地，绝对有权力取得土地。农村中的手艺工人及失业工人应按照他们的要求分给土地。工会不能提出一切工厂作坊工人、手艺工人都分得土地的原则，而应将工人要求生活改良的运动与农民分配土地的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苏区工会应正确的实行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对于中农应根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雇用辅助劳动临时条例》来保障工人的利益。同时不能将对付富农的要求完全加在中农身上，也不能以对付富农残酷的斗争方法去对付中农。要订立双方协商同意的劳动合同，同时反对在中农的经济中牺牲雇农和工人的利益。工会必须要积极领导贫农，拥护贫农在土地革命的利益，使乡村的雇农、苦力工会及工厂工会会员整个的加入在贫农团里，在工会指导之下组织小组，领导贫农反富农的斗争，建立与中农贫农巩固的联盟。

不能一刻延缓的去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会号召广大

工人群众，领导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区、封锁苏区经济，将一切苏区的痛苦转到进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上去。工会应发起组织反帝大同盟，领导它成为真正广大群众的反帝组织，加紧拥护苏联的宣传和国际教育。

（四）赤色工会是巩固苏维埃最重要的柱石，应积极的提出优秀分子到苏维埃红军中作领导工作，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各方面帮助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巩固。工会应努力帮助苏维埃政府武装工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赤卫队，加紧政治军事训练，保卫苏区，肃清反革命和保护工人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大部分是不应脱离生产的，赤卫队应归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总部管辖。除开赤卫队，工会不必要另外组织武装纠察队，已组织的应改编为赤卫队。在红军作战时，工会应动员群众参加到红军和赤卫队中去，帮助红军的运输，征收粮食，监视和肃清反革命分子，巩固红军后方和苏维埃区域。

工会应动员群众帮助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执行，但不是代替了苏维埃的工作，或与苏维埃对立。但苏维埃用命令来解散工会，和禁止罢工和工人斗争，一样是不允许的。

苏区工会应组织工人实行监督生产，选出忠实有经验的工人组织监督生产委员会，要雇主报告企业的生产量及营业状况，防止资本家、投机商人怠工和破坏苏维埃经济，并学习管理生产。

工会在国有企业中与非国有工业中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工会应当积极的帮助苏维埃工业的发展与巩固，并应提出积极分子到国有企业及一切工业中去作领导工作。苏维埃政府要将劳动法首先在国有工业中彻底实行，改善工人的生活，同时工会

要帮助苏维埃政府切实保障工人的利益。

（五）巩固和扩大工会的组织。苏区工会应为吸收广大工人自愿入会而斗争，反对用“不加入工会，不准在苏区工作”的强迫办法，要以改善工人生活实际的利益（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社会保险等）、宣传教育的方式来吸引工人自愿的加入到工会里。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扩大工会组织。提出真正工人领袖到工会机关（不识字不要紧），驱逐富农老板一切阶级异己的分子出工会。旧时的地主、豪绅、官吏、军官、侦探、警察、民团及其家属以及和尚、道士、牧师等宗教的负责人，虽在苏区作工，但不能加入工会组织，已加入者肃清出去。工会会员在六个月至一年完全不作工，改营独立经济者（如经商、经营土地等）亦不能再留于工会组织，但在红军中的工会会员应保留会籍（工厂、作坊工人失业一年亦不能开除）。

工会应依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组织雇农工会、运输工会、职员工会、建筑工会、海员港务工会等从上而下的系统。这些工会又应加入白色区域的赤色产业工会，联成整个的机体。

加紧的在斗争中训练新的干部，开办职工运动的学校与训练班。实行工会的民主化，肃清工会的命令主义和委派制度、官僚主义、少数人包办和秘书专政的现象。建立各级工会的经常工作，保证上级工会及指导机关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会生活，来巩固工会的组织。动员工人自动缴会费，筹备工会基金，号召苏区工会正式加入全总，按月缴纳会费。

（六）加紧青工女工的工作。在各级工会中设立青工部、女工部，吸收青工女工加入工会，帮助扩大少年先锋队、儿童

团的组织，召集青工女工大会及代表会议，规定青工女工特殊要求的纲领，领导他们参加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为特殊利益而斗争。反对苏区内尚存着不平等待遇女工，反对雇主、师父对青工、童工、学徒的压迫，要求劳动法中一切青工女工利益的彻底实行。反对忽视青工女工的工作，同时要纠正将青工女工运动与整个职工运动对立起来（如赣东北）的现象。提高青工女工的政治水平，深入反宗教迷信和封建关系的教育。但令青工童工去打神像、掘坟山的过早的行动，只能助长富农、地主煽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

（七）工会注意失业工人的工作，吸收失业工人加入工会，办理失业登记，设立劳动介绍所，要求雇主及苏维埃政府救济，号召失业工人加入红军，组织工人的劳动公社及合作社。工会应帮助苏维埃想各种方法来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

（八）扩大宣传教育工作，创办工会的报纸。在苏维埃的帮助下，有计划的设立工人学校及工人子弟学校，举行工人的识字运动（首先是工会领导工作的），使工人读书班、阅报组等组织普遍到一切工人集中的处所。创办工会报纸，发行画报、小册子、壁报，宣传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富农、老板一切反革命破坏苏区的阴谋。告诉工人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与工农民主专政中的使命和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工人的阶级任务，领导工人的阶级斗争和拥护工会。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拥护苏联，加紧工人的国际教育。建立工会的宣传队、俱乐部、各种文化教育的组织。扮演新剧，化装演讲，以扩大宣传。

（九）苏区工会应注意附近白区的工作，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及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处的重要企业部门。工会要派得力干部到白区的生产里，扩大苏区工人生活状况的宣

传，建立白区的工会组织，领导他们的日常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斗争，组织白区工人到红军中去，及参观苏区，募捐帮助白区工人的罢工，并相互派代表及交换刊物。

要完成上列的任务，党必须确立阶级的工会路线，动员各级党部加紧工厂、作坊、农村的工人支部的工作，以支部为枢纽去努力进行。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与非阶级的工会路线、机会主义的消极作残酷的斗争。反对不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轻视和放弃工会工作的观念，反对工会代替苏维埃及与苏维埃对立、包办工会等一切“左”右倾的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的残余与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奋斗，并使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二十六路军革命士兵委员会敬告全国士兵兄弟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全中国的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民团、警察的士兵兄弟们：

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全体士兵兄弟二万七千余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当红军进攻宁都头陂的时候，全体大会一致议决杀掉反动长官投降红军。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抚州，决定立即攻击南昌。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开大会的时候，决定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全国的士兵兄弟们，希望各地的士兵兄弟接到我们的报告后，立即开会庆祝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兄弟找着了出路，得着了解放。更希望你们高举红旗，像我们一样杀掉国民党反动的长官，投向红军中来，我们正准备来欢迎你们。

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为什么要反叛国民党投向红军呢？

第一，自从国民党统治了中国之后，“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口号是专门弄来欺骗群众的东西，事实上是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看哟！工农兵收回的汉口、九江的租界，国民党交还帝国

---

* 这是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后的通电。

PDG

主义去了；群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济案、汉案、宁案等，国民党反转向帝国主义赔款道歉，像这样的事情说起来不知道有多少。因为国民党一贯的投降帝国主义，引起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兄弟们！你们听到的最近东三省是整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了，国民党是怎样对付的呢？“信任国际联盟”，“镇静，不抵抗”，反将天津交国际共管，锦州到山海关划为中立区。此外法兵进攻广西、云南，英兵进攻西藏、川边，国民党假装没有看见。兄弟们！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已经够了，我们劳苦兄弟是成千上万被屠杀了，我们的土地和城市是被占领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你们没有看见么？许多工人、学生、贫民、兵士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是采取的什么手段呢？屠杀，监禁，拘捕，驱逐。我们已经明白了，国民党平常要我们“为国为民”，才是为的帝国主义的“国”和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这些人的“民”。同时我们在“剿匪”的时候，看见只有苏维埃红军才真正是帝国主义的对头，许多牧师走狗被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矿山、铁路被没收了，在苏维埃区域一切帝国主义的力量被推翻了。兄弟们！中国目前不打倒帝国主义是会亡国灭种，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只有苏维埃才是真正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主力。兄弟们！起来！起来同工农联合自动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帮助苏维埃红军，实现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

第二，年来国民党的忠实同志间，因为英、美、日这些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市场和他们争地盘权位的冲突，说这个是反动，说那个是军阀，不知道打了多少仗，蒋桂战争，蒋冯[1]战争，蒋唐[2]、蒋阎[3]冯战争，粤桂战争……兄弟们！我们都是

受他们欺骗参加这些战争的。我们回想着这些战争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士兵们的肉身拿去挡大炮、机关枪、毒瓦斯，打死了的尸无人收，打伤了的没有医药，痛死拖死，幸而没有死伤的，是过的地狱一样的生活。打了胜仗是国民党军阀当大官，发大财，多讨几个姨太太，多修几座洋房子，我们士兵兄弟还是“十块零五”，顶多两块钱的奖赏。打败了呢？国民党军阀下野，有钱出洋住租界，我们士兵兄弟是缴枪，脱军服，搜腰包，遣散，滚蛋。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因为国民党军阀连年的混战，几千万里的生产是破坏了，战场的同胞房屋焚毁了，粮食没收了，妇女被奸淫，少壮被俘虏，老弱被践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城市是物价高涨，金融混乱，交通破坏，工商业破产。兄弟们！这些恶魔——国民党军阀为帝国主义争市场，为他们争地盘夺权位，不知断送多少士兵兄弟，害死了多少工农同胞，打来打去。据报载，这些魔鬼又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听说通通在南京开什么四全大会。兄弟们！他们权利冲突的时候互相火并，利益一致的时候又和平共居了，他们的戏法正多呢。兄弟们！要防备着，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战争，你们不要再作他们的炮灰，再上他们的圈套。只有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才能消灭军阀战争，因为苏维埃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没有封建势力，也没有军阀，他们都是为工农利益而斗争，根本说不上个人权利的冲突。来！兄弟们！大家一齐到苏维埃红军旗帜之下来。

第三，今年的水灾真是骇死人，十六省的地方变成“灾区”，四分之一同胞变成“饿殍”，这样大的灾荒真是“天灾”么？不是的，乃是人祸——帝国主义、国民党制造出来的！国民党、帝国主义把同胞们最后一滴血都刮削去了，农民哪有钱

来防止灾荒，国民党又把修水利筑河堤的钱通通装进腰包，湖北建设厅长刘文岛侵吞筑堤经费五百七十万，江苏建设厅长王柏林侵吞治河款子三百五十万，这样的例子各省都是一样，又怎样不发生灾荒？兄弟们！骇人的灾荒发生了，国民党又怎样办呢？（1）借名救灾大向帝国主义卖国借款，来肥家人己和扩充战费；（2）假仁假义募捐赈灾，党国要人发了大财；（3）宣布维持党国秩序，残酷地屠杀、驱逐、鞭打饿死冻死的灾民同胞；（4）千百种苛捐杂税压榨在没有饭吃、衣穿、屋住的灾民身上；（5）帝国主义呢乘机借款，趁火打劫，利用灾民要借钱恢复耕种，经过银行、钱庄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兄弟们！我们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灾荒是必然要产生的，望他们救济吗？回答的是子弹、大刀、牢狱、棍棒！兄弟们！几千万的灾民将要饿死冻死，再不能等待了，我们要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压迫灾民的命令，我们的枪弹、刺刀要帮助灾民同胞分粮食、抢米的斗争。起来！兄弟们！用他们发给我们的枪弹、刺刀送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吸血的魔鬼到地狱中去。这些禽兽生存一天，我们劳苦兄弟多在地狱一天。大家看呵！苏维埃下面解放的农民是没有灾荒了。国民党军阀不是要我们作征发队去夺取农民的粮食吗？兄弟们！我们的枪是有眼睛的，这眼睛是时常望着工农兵士的敌人去瞄准，再不要像过去那样傻了，帮豪绅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当走狗，去屠杀自己的兄弟。兄弟们，睁起眼睛做走狗“不是人”，明知是出路不去奋斗“是奴隶”！

第四，我们是北方的军队，今年春间蒋介石调我们到江西来“剿匪”，那些宣传员时常向我们宣传：这里的红军即是“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起初我们还不相信，而我

们那些长官也是这样向我们讲，我们想北方人断不至欺骗北方人。及至与红军作战的时候，我们就很奇怪，红军既然那样的坏，为什么所有的群众却帮助他们呢？又看很多红军贴的“穷人不杀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标语，更加怀疑起来，问我们的长官，就是一阵臭骂、马鞭子。过后几个俘虏兄弟的来信，才把这闷葫芦打破了，红军、苏维埃与他们说的完全相反。红军是工农阶级的武装，在他得到胜利的地方，农民分得了土地，不完粮税，不还账了；工人加了工钱，改善了生活与待遇，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红军分得了好土地，还有人帮他耕种，红军内的生活，官兵一律平等，没有官长的打骂与压迫，有些红军士兵居然做起苏维埃政府的委员。我们得了这些消息非常高兴，认为只有加入红军才是出路，但又不相信哪有这样的军队和政府。七月间我们派了三个代表开小差去侦探，他们转来的材料更多，尤其当报告他们看见赫赫大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士兵一样的穿草鞋着布衫，同士兵一般儿吃饭睡觉，我们竟不顾环境欢笑起来！最近听说红军要进抚州，我们一致主张响应他们。十六号早上发动，当天下午与他们会合。说也奇怪，当我们杀掉反动长官打出红旗之后，几十万的群众都来欢迎我们，带了很多的东西来慰劳我们，同我们在白军的时候截然不同。三天之内有三千多兄弟得着五亩好田和耕具到广昌、宁都等处耕田去了，二千多兄弟得着十五块到十块大洋回家去了，七百多兄弟得着工具作工去了，一百三十七个兄弟选到苏维埃办事去了，这些都是他们自愿。我们仍然参加红军，但也分得三亩好田，二千多伤病疲劳的兄弟被工农兄弟接到他们家里休息去了。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找着了出路，得着解放。你们呢？还是同我们十天以前一样，半年没有关饷，吃的还是

稀饭，还没菜与盐，这样冷还没有棉军服，军棍、马鞭子这是长官时常给与我们的恩典。兄弟们！国民党军阀真的没有钱吗？国民党向帝国主义卖国借款和在工农身上每月剥削的几千万血汗，到什么地方去了？大部分装入了腰包（日本抄没张学良的金条有八万万，蒋介石存在花旗银行有一万万五千万，其他的哪一个不是发了财），或用在兵工厂，买飞机、毒瓦斯准备进攻红军。起来！兄弟们！起来打倒这些“吸血鬼”，拿子弹、刺刀回答他们，一致向我们的安乐窝——红军苏维埃——中去！

兄弟们！我们不要再做国民党的“杀人机器”，我们再也不当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的走狗和奴隶了，起来！赶快起来！

打倒残暴凶狠的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工农兵士自动起来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滚出中国！

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压迫反帝群众的国民党！

反对军阀战争，消灭混战的祸首——国民党各派和帝国主义！

反国民党压迫灾民，帮助灾民分粮食抢米的斗争！

打倒制造灾荒和压迫剥削灾民的国民党及帝国主义！

反对进攻红军，不打红军，杀掉反动长官，拖枪到红军中去！

拥护工农兵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政权！

拥护工农兵士的红军，帮助红军，消灭国民党的白军！

反对克扣军饷，威胁长官关饷，补欠饷，发棉军服！

不关饷就不下操，不放哨，拒绝一切勤务！

打倒剥削士兵，压迫士兵的国民党军阀，拥护官兵生活一样的红军！

拥护土地革命，全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万岁！

工农兵士的解放万岁！

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工农民众与革命兵士兄弟大联合万岁！

中国红军中央军第五军团全体战斗员大会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钟

于江西抚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

〔2〕指唐生智。

〔3〕指阎锡山。

PDG

中共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近来检阅各苏区的报告，觉得各苏区党部对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问题的解释与执行是不相一致而且有错误的。譬如皖西北特委，在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上说：

“有些地方是离开了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实行彻底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形成了一贯的富农路线。”（七月三十一日）

从这一段话上看来，似乎不彻底实行“分配一切土地”，那就是犯了富农路线的差误。但是在皖西北地方苏维埃政府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上，又说：

“商城分配土地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没收的原则应用到中农的土地上去。所以商城不是没收豪绅富农的土地，而实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六月底）

从这一段话看来，则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在鄂豫皖区苏维埃给皖西北地方苏维埃的信上则说：

“对中农的土地，不可变更他原来的位置，如果已经变了的，必须宣传叫他提出意见来。如不满意，必须以山地等补充之。”（七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说不可变更中农原来的土地。这就是说在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之下，中农的土地是不包括在内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麻城县委的信上也说：

“侵犯中农的利益，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九月十六日）

这是在鄂豫皖苏区的情形。

在黄××同志巡视鄂东苏区的报告中说：

“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口号之下，把中农土地没收，使中农动摇。”（七月十一日）

这就是说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之下，也没收了中农的土地，也分配到了中农的土地，以至使中农动摇。

在赣东北苏区，赣东北特委政治决议上说：

“在扩大会决议上，没有特别指出‘平分一切土地’是错误的。”（七月二十二日）

赣东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决议上指出省委的中心任务，是在：

“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十月十三日）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及其一切土地一律经苏维埃平均分配。”（赣东北省委报告，十月三十一日）

在中央苏区，则以为：

“被没收的土地应当按照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数量上质量上的平分），就是多少同好坏分匀，来分给农民。因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关系中的封建制度最彻底的办法。……在平均分配土地的一切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

匀，好坏分匀。”（见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八月二十一日）

在湘鄂西苏区，在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则这样写着：

“武装农民发展农民战争，同时宣传平分一切土地并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之下实行。”（八月二日）

中央认为虽是有些苏区，正确的了解到“平分一切土地”口号的执行，决不能侵犯到中农的利益，然而有些苏区对于这一口号的了解与执行，还是模糊的与错误的。

中央必须再一次的告诉苏区的各级党部，共产国际远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在《中国问题决议案》上分明的写着：

“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党对于这种富农的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

中央根据国际这一指示，曾经起草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该草案上关于中农的土地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问题给了很明确的如下的回答：

“中等农民阶层的土地不没收。”（第三条）

“平分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一切束缚最彻底的方法。不过苏维埃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下，才能实行。”（第五条）

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明的看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中心口号仍旧是“没收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大私有财产者的一切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在没收之列，但在富农不参加反革命、自愿耕种土地的条件之下，仍可分得坏的土地（像赣东北党那样所提出的“没收地主与富农的土地”，把地主与富农平等看待是不正确的）。中农的土地绝对不能没收。至于没收来的土地平均分配，或是更进一步的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自然中农的土地也在内），那最好由农民的最大多数去决定。

中央认为有些苏区的党部，如赣东北、中央区等，只是机械的去平分一切土地，以为不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就是富农路线，就是机会主义。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在这种了解之下，完全忘记了中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中央根据各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在实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对于那些利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去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企图，必须给以最严厉的与坚决的打击。但是我们不反对而且赞成在“基本农民群众（自然中农也在内）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去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因为这是土地革命中最彻底的办法。而且我们在目前还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的宣传，苏区的党部是忽略的。

苏区的各级党部必须向广大的雇农贫农群众解释，他们要保持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要扩大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坚决的去战胜反革命与富农，他们必须同中农结成最密切的同盟，必须不但不损害到中农的利益，而且要给中农以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就是中农所有的土地比雇农贫农所分得的较多些，我们也不能以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去分配他们的土地。妨害中农的利益，强迫平均分配他们的土地，必然会使他们动摇到

敌人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利益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

中　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赣东北省委：

看到省委的各种文件，认为赣东北的工作最近在国际路线的转变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尤其是加强红军领导的问题。同时有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你们极大的注意。

（一）红军行动积极化与发展方向

中央在最近对于苏区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已经指出，目前革命的危机日益成熟，依据着客观胜利的环境，争取广大群众，争取湘鄂赣（以南昌为中心）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是放在全党第一个议程里。因此，使红军的行动积极化，坚决的发展红军胜利的进攻，争取几个重要的城市，是目前苏区党的第一等任务。

红十军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有多数工人、雇农、贫农成分的，有绝对可能造成政治坚定战斗力强的工农红军来执行他胜利的进攻敌人的任务，可是右倾机会主义残余阻碍着这任务的发展。事实告诉我们，赣东北右倾的保守观念是非常浓厚的，立三路线揭破后，更暴露出

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有些同志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足，口头上外交式的拥护国际路线和省委的指导，在实际工作中表现悲观消极，对敌人恐惧，不相信红军和苏区群众的力量，以埋伏击、扎口子、避免经常战争方式，来代替了红军的积极行动，以退却路线代替了红军胜利的进攻，使敌人从容布置的进攻苏区，以致一直的受到损失，使群众觉到红军不能坚决的消灭敌人而作战，影响到红军的锐气和群众的斗争情趣。这种现象必须坚决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存在的。我们同意省委十一月十五号关于十军工作的决定（但决议对于发展红军，胜利的进攻还是不够的），同时我们指出，省委扩大会议对于军事工作之决议没有严重的打击立三路线揭发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以及对于红军发展方向的动摇模糊是错误的。

目前赣东北正在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斗争中，根据中央最近的来信、苏区训令和当地实际情形，去发展红十军胜利的进攻，配合着中央区的行动，取得几个重要的城市，争取广大群众——尤其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去实行争取湘鄂赣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实际行动，必然使赣东北的红军群众积极兴奋，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一切战略与战术的主要关键，是在进攻的路线之下，去攻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的主力。要坚决的去打击那些退却、逃跑、保守、犹疑的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盲动主义。报载十军已到××方面，要发动加紧××××的游击战争，巩固苏区后防，是十分必要而正确的。但以此为主力军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是不利的，省委要根据实际情形动员红军主力与闽北打成一片……同时加紧发展各区的游击战争，彻底实现省委的决议，配合红军行动，取得整个的胜利。

发展红军胜利的进攻，争取几个重要城市，与巩固扩大红军是不可分离的。关于这一工作，上次信中已详细的指示。省委必须认识，改造和巩固红军，不仅是要反对国民党的方式，而且是要反对和平的改造，尤其是“避免主力军经常作战，尽量的把红军力量达到巩固地位”（军事工作决议），提议中央区派兵送枪，认为蒋介石再派兵来即没有办法，这实际是放弃巩固扩大红军的任务，最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省委彻底地纠正这种错误，要从红军的积极行动中和胜利的进攻中去真正努力的扩大和巩固红军。目前主要的是：

一、从土地革命的胜利上去奋兴红军，从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上取得群众的拥护——在重新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要坚决的拥护红军的利益。苏维埃政府要动员群众为红军代耕土地，彻底的改良红军的生活，以最大的努力解决红军的棉衣、被服、疾病等问题。动员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少年先锋队等广大的群众与红军开群众大会、联席会议，鼓励红军的士气。同时要红军坚决的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告诉他们积极的起来帮助红军，向敌人坚决的进攻，保障他们得到的土地革命的利益。使军队与群众了解，过去军队有打骂群众的事实，是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苏区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的改进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取得群众绝对的拥护。

二、加紧政治上的动员，去提高红军的战斗情绪。动员全体党员苏区的群众及一切报纸刊物，从政治上鼓励红军的战斗情绪，将各苏区新的胜利，尤其是最近中央区取得宁都城市，孙连仲一万五千人投到红军中去和鄂豫皖肃反的胜利，白区的反帝运动的怒潮，群众直接与国民党冲突——到处打国民党党部、打坏了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等事实，扩大宣传，利用讲演新剧等来启发红军的积极进攻国民党的情绪。

三、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改善各级政治部的工作，规定政治部的工作条例，提拔积极的工人干部充当政治委员，建立各连的识字班、读书班、读报组。严整红军的纪律，省委必须以中央过去的指示及省委的决定，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实现在实际中去。党要随时的检查这一工作执行的程度，作为检查工作的尺度。

四、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发展红军胜利的进攻的运动中，动员广大工人、雇农、贫农到红军中去，驱逐富农分子混入红军，彻底的改造红军的成分，打破地方观念，提拔新的工人干部作领导与指挥的工作。这一工作不仅靠各地党部的努力，要经过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来动员群众自觉的加入。

五、动员红军战士加紧肃反的工作，肃清反革命在红军一切的阴谋，破获他们的组织，这是兴奋红军吸收群众加入红军最重要的工作。

六、扩大地方武装，加紧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建立红军的补充队伍、红军的补充的学校等来有准备有计划的扩大红军的组织。红军的休养及补充是必要的，但主要的是在进攻和扩大的原则上来解决，不是用避免作战的机会主义的方式来代替。

七、改造省军委的组织和领导下级军委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取消这种组织，成立军区指挥处及军分区指挥处，受军委领导。红军中党的支部要加紧工作，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作用，支部应经常的召集会议。关于调换×××同志的工作，我们同意的，但主要的问题是要加紧红军的政治领导，从政治上去坚定红军、启发红军的积极行动，不要以为调换几个人的工作即可了事。

（二）分配土地的问题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你们重新分配土地的详细报告，但有几个问题是不正确的。

一、对于中农联合的问题——关于土地问题，我们主要的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大私有财产地、祠堂、庙宇、教堂等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至于彻底平分一切土地，主要的是在农民群众的同意之下来进行，一般的说是不动中农的土地，绝不能在这一口号下来强迫分配或没收中农土地。你们在分配土地时，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结果必然使中农动摇，被富农利用去而脱离我们的，这是非常错误的。你们在重新分配土地时，必须坚决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与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条件下进行。若不是在农民的同意的条件下，不能动摇中农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毫无问题在平分土地中，要全部取来分配，但你们决议案中有“没收地主阶级和富农土地”的字句，把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的口号并列看是非常错误，这样必然混淆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助长了富农煽动中农反苏维埃的阴谋，你们必须迅速的来纠正这些错误。

二、劳动力与人口的标准——我们反对中央区只以人口为标准，认为拿劳动力作标准是不适当的观点。同时你们执行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标准的办法——分为五分之三的劳动田，五分之二的人口田，我们觉得这是书生们机械的设想，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不懂得的。什么劳动田、人口田、五分之三、五分之二，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将没收的土地彻底的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用什么标准来分配？——或以劳动力，或以人口，是依据农民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是反对你

们以劳动力人口的混合标准，我们是反对机械、烦琐群众不懂得的办法的。

三、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分配土地运动中，发动群众自动的来进行是非常不够的。你们必须加紧这一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不是只靠苏维埃的命令和党的包办。要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进行这一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要改造红军，发展红军的胜利的进攻，加紧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改造苏维埃等整个的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三）肃 反 工 作

反革命分子在赣东北非常活动。工作转变的迟缓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富农路线的残余尚未肃清，而反革命的破坏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在赣东北的肃反工作并没有深入的进行。最近鄂豫皖肃反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功，将国民党改组派、国际第三党整个破坏苏区的计划和组织（特别在红四军中）完全破获，拘捕了反革命的首领（如师长许继慎等），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倍的加强，激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加入了红军，苏区得到了空前的巩固。无疑的赣东北军队中打骂群众的事实，是反革命破坏红军的阴谋。红军的消极，群众不愿加入红军，都是有反革命从中作祟的，党与苏维埃政府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紧肃反工作，在党内，红军中，苏维埃工会、贫农团中动员红军及工农群众十倍的努力加紧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巩固和严密党与群众的组织，有计划的深入肃反工作，整个的来肃清反革命破坏苏区的阴谋和组织，同时要严防反革命利用肃反工作来实行屠杀工农群众的阴谋。

（四）两条战线的斗争

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工作，赣东北作的是非常不够的。目前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悲观及立三路线富农路线的残余，是非常严重的。外交式的接受错误，甚至仇视批评及不愿得罪人的和平敷衍的方式，使红军中发生不良倾向，如极端民主化、消极抵抗等严重错误。这一方面是由于反革命的阴谋，另一方面是同志不了解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意义。因此，党要十分努力的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大力反对右倾，同时与立三路线、调和路线、极端民主化、两面派等作坚决的斗争，彻底的肃清各种不良的倾向（尤其是红军中）。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检查工作，发展自我批评，加紧教育说服的工作，提高党的纪律。不仅发一次决议，并且要使每个同志每个红军战士了解，起来拥护和自觉的改正错误。省委要号召全党同志艰苦长期的努力。

中　央

十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